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 34 卷（包括总目录 1 卷），总计近 2000 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18～119 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例说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俄国档案文献包括 8 个专题。

“联共（布）政治局的决议和会议记录”：该专题共收录了 78 份文件，内容涉及 1926～1941 年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及其下属的十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及决议。

“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来往信件”：该专题共收录了 64 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等人之间的来往信件。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该专题共收录了 31 份有关向政治局会议提交问题、召开会议程序、发送决议、监督决议执行等问题的规定。

“30 年代文化领域的“左”倾浪潮”：该专题共收录了 38 份文件，内容涉及除历史学以外的文化意识领域中的斗争情况。

“‘左’倾路线下的历史学界”：该专题共收录了 47 份文件资料，内容涉及 20～40 年代历史学界的斗争，以及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情况。

“30 年代俄国侨民中的法西斯党”：该专题共收录了 7 份有关俄国侨民法西斯党在中国东北活动情况的文件资料。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对远东的新方针”：该专题共收录了 6 份文件，主要是斯大林同蒋介石关于苏联援助中国问题的来往信件。

“境外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思”：该专题共收录了 3 份文件，包括米留可夫和克柳奇尼科夫关于立宪民主党新策略的报告及讨论的意见。

徐天新

2001 年 2 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11 - 1

联共（布）政治局的决议和会议记录

（1926年9月至1941年5月）

专题说明 11 - 1

No020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司法）案件委员会规则
（1926年9月23日） 11 - 4

No02005 托夫斯图哈关于改变保密局下属各部门名称致
中央书记的便函
（1929年5月10日） 11 - 6

No02036 政治局关于扬松所提问题的决议
（1929年12月5日） 11 - 8

No02088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
分配的决议（1930年1月26日） 11 - 9

No02091 政治局关于鲍曼声明的决议
（1930年4月18日） 11 - 10

No02024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改造黑色冶金工业工厂问题的
会议记录（1930年5月30日） 11 - 13

№02009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23日)	11-16
№02010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30日)	11-18
№02037	政治局关于简讯《富农的反革命出击》的决议 (1931年4月20日)	11-22
№02038	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问题的决议 (1931年7月10日)	11-23
№02146	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组织局代表的决定 (1931年7月19日)	11-25
№02096	政治局关于米高扬申请辞职的决议 (1931年10月15日)	11-26
№02025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党员专家工资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1年11月21日)	11-27
№02026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通过干部加强铁路运输问题的 会议记录(1931年12月10日)	11-29
№02098	政治局关于改组经济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议 (1931年12月23日)	11-32
№02052	政治局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2年3月16日)	11-33
№02031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2年6月6日)	11-34
№02053	政治局蒙古委员会会议记录(节录) (1932年6月26日)	11-35
№02039	司法案件委员会关于几宗极刑案件的会议记录 (节录)(1932年7月8日)	11-37

- №02054** 政治局关于埃利亚瓦的蒙古问题报告的决议
(1932年9月1日) 11-39
- №02040** 政治局关于实行公有财产保护法细则的决议
(节录)(1932年9月16日) 11-40
- №02018** 政治局关于分配黑色和有色金属的决议
(1932年9月16日) 11-42
- №02033** 政治局外汇委员会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通知
(1932年10月14日) 11-43
- №02034** 古比雪夫关于进口设备问题给政治局的便函
(不晚于1932年11月19日) 11-44
- №02041**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等人电报的决议
(1932年11月22日) 11-45
- №02007** 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
说明(1932年12月8日) 11-46
- №02042** 政治局关于对外贝加尔和乌苏里斯克铁路法院
判决的决议(1933年1月20日) 11-49
- №02043** 政治局关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3年2月1日) 11-50
- №02044** 政治局关于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9日) 11-51
- №02045** 政治局关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问题的决议(1933年3月10日) 11-52
- №02019** 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处理党员过错时与
联共(布)中央进行协调的决议
(1933年4月11日) 11-53
- №02046** 政治局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三人小组的决议(1933年5月7日) 11-54

- №02055**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的决议
(1933年5月22日) 11-55
- №02047** 政治局关于埃赫电报的决议
(1933年7月11日) 11-56
- №02048** 政治局关于亚戈达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3年8月11日) 11-57
- №02058** 政治局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决议
(1933年8月18日) 11-58
- №02020** 政治局关于负责干部乘飞机飞行问题的决议
(1933年9月11日) 11-59
- №0200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改组中央
委员会保密局的决议(1933年11月13日) ... 11-60
- №02113**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任用中央机关工作
人员的决定(1934年1月17日) 11-61
- №02059** 政治局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决议
(1934年2月15日) 11-62
- №02027**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医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和
物质生活状况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4年4月19日) 11-63
- №02028**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改善医务人员状况会议的
速记记录(节录)(1934年4月29日) 11-64
- №02046** 政治局关于到国外出差的决议
(1934年5月7日) 11-67
- №02021** 政治局关于派往国外就医和支付外汇办法的决议
(1934年6月4日) 11-68
- №02118** 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4年6月4日) 11-70

- No02061**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4年6月28日) 11-71
- No02049** 政治局关于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决议(节录)
(1934年7月10日) 11-72
- No02050**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电报的决议
(1934年9月19日) 11-74
- No02029**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把农产品分散采购转归对内
贸易人民委员部管辖的预备会议速记记录
(1934年11月21日) 11-75
- No02062**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34年12月25日) 11-82
- No02120** 政治局关于交通人民委员等职务任命的决定
(1935年2月27日) 11-83
- No02121** 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5年3月10日) 11-84
- No02122** 政治局关于日丹诺夫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工作的决定(1935年4月20日) 11-85
- No02056**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1935年6月17日) 11-86
- No02057**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的决议
(1935年6月25日) 11-87
- No02051** 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对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工作
进行检查的报告(节录)
(1935年11月5日) 11-88
- No02032**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所属军事技术局的决议
(1936年3月21日) 11-90

- №02015** 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莫斯科河改造
决议的附函（1936年5月28日）…………… 11-91
- №02016**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降低黄油零售价格的
决议方案的附函（1936年6月9日）…………… 11-94
- №02063**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4月4日）…………… 11-96
- №02011** 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4月27日）…………… 11-97
- №02064**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5月11日）…………… 11-99
- №020132** 联共（布）中央十月全会有关中央委员会和
政治局组成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节录）
（1937年10月12日）…………… 11-100
- №02017**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向蒙古政府贷款的决议
方案的附函（1937年11月11日）…………… 11-104
- №02065** 政治局关于发行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决议
（1938年2月26日）…………… 11-105
- №02134** 政治局关于丘巴尔安排问题的决议
（1938年6月16日）…………… 11-106
- №02135** 政治局关于丘巴尔的工作的决定
（1938年6月17日）…………… 11-107
- №02022** 政治局关于审查负责干部的决议
（1938年9月20日）…………… 11-108
- №02137** 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8年11月27日）…………… 11-112
- №02138** 政治局关于热姆丘任娜的决定
（1939年8月10日）…………… 11-113

№02139	政治局关于解除热姆丘任娜职务的决定 (1939年10月24日)	11-114
№02140	政治局关于热姆丘任娜任职的决定 (1939年11月21日)	11-115
№02023	政治局关于有色金属和橡胶问题的决议 (1939年12月16日)	11-116
№02066	政治局关于新影片预审和发行放映委员会的决议 (1940年8月22日)	11-117
№02141	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 委员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节录) (1941年2月21日)	11-118
№02012	政治局关于加强苏维埃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 工作的决议(1941年5月4日)	11-119
№02013	政治局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的决议(1941年5月7日)	11-120
№02014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1941年5月30日)	11-121

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来往信件

(1930年3月至1940年10月)

专题说明	11-122	
№02089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克里沃罗格区农村情况致 斯大林和柯秀尔的信 (1930年3月22日)	11-123

- №02090**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农村
情况致斯大林和柯秀尔的信
(1930年3月23日) 11-126
- №01154** 莫洛托夫关于鲍曼的错误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30年4月20日) 11-128
- №11678** 斯大林关于鲍曼的错误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1930年4月20日) 11-129
- №01155** 斯大林关于发送格罗曼等人供词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日) 11-130
- №01156**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肃反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8月6日) 11-131
- №01157** 斯大林关于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问题致
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13日) 11-134
- №01158**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肃反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8月23日) 11-136
- №01159**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人事安排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4日) 11-138
- №02092** 莫洛托夫关于人事安排和经济问题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0年8月29日) 11-142
- №01160** 斯大林关于十月中央全会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底) 11-145
- №01161** 斯大林关于防备波兰进攻和生产面包房设备
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日) 11-148
- №01162**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和宣传集体农庄问题致
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9月2日) 11-151

- No01163** 斯大林关于修建北方运河和使用囚犯问题致
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7日) 11 - 154
- No01164**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1 - 156
- No01165** 斯大林关于经济状况的宣传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11 - 159
- No01166** 斯大林关于李可夫等人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1930年9月15日) 11 - 161
- No01167** 斯大林关于领导班子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2日) 11 - 163
- No01168** 斯大林关于工人管理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8日) 11 - 166
- No01169** 斯大林关于顿巴斯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10日) 11 - 169
- No11679** 莫洛托夫关于转交斯大林来信给奥尔忠尼
启则的便函 (1930年10月11日) 11 - 170
- No01170**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的一些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11 - 171
- No02093**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11月12日) 11 - 173
- No01171** 斯大林关于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稿
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1年3月11日) 11 - 175
- No02094** 莫洛托夫关于古比雪夫要求调离等事致
古比雪夫的信 (1931年8月14日) 11 - 176

- №02095**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金属和煤炭的生产情况致
斯大林的信（1931年8月25日） 11-178
- №01172** 斯大林关于削减进口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9月24日） 11-180
- №02097** 伏罗希洛夫关于打猎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1年12月13日） 11-181
- №01173** 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2年6月19日） 11-182
- №01174** 斯大林关于革命法制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1932年6月25日） 11-184
- №02100** 卡冈诺维奇关于粮食收购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2年7月2日） 11-186
- №02101** 卡冈诺维奇关于缩减投资、增加有色金属的
进口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2年8月2日） 11-188
- №02102** 莫洛托夫关于解决燃料等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2年8月28日） 11-192
- №02004** 古比雪夫关于擅自动用储备煤炭问题致
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便函
（1932年11月14日） 11-194
- №02099**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给化工品销售机构指示致
古比雪夫的信（不早于1932年12月4日） ... 11-196
- №02103** 莫洛托夫关于化学工业工作决议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2年12月9日） 11-197
- №02104** 斯大林关于阅读巴克尔等人著作致加里宁的信
（1933年1月21日） 11-199

- №01175** 斯大林关于莫洛托夫报告的国际部分致
莫洛托夫的信（不早于 1933 年 1 月 24 日） … 11 - 200
- №01176** 斯大林关于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3 年 4 月 23 日） …… 11 - 201
- №02105** 基洛夫关于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学员的补助金
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 年 5 月 20 日） …… 11 - 203
- №02106** 莫洛托夫关于商谈第三季度计划问题致
古比雪夫的信（1933 年 6 月 5 日） …… 11 - 204
- №02107** 基洛夫就泥炭的运输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 年 6 月 25 日） …… 11 - 205
- №02108** 加里宁关于回乡见闻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3 年 8 月 11 日） …… 11 - 207
- №01177** 斯大林关于产品配套运动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 年 9 月 1 日） …… 11 - 210
- №01178** 斯大林关于拨款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 年 9 月 12 日） …… 11 - 212
- №02110** 莫洛托夫关于 1934 年控制数字等问题致古比
雪夫的信（1933 年 9 月 12 日） …… 11 - 214
- №02111** 莫洛托夫关于五年计划材料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3 年 9 月 16 日） …… 11 - 216
- №02112** 卡冈诺维奇关于矿石运输等问题致
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不早于 1933 年 9 月 24 日） …… 11 - 217
- №0211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休假致基洛夫的信
（1934 年 3 月 25 日） …… 11 - 221

- №02115**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会面致基洛夫的信
(1934年4~5月) 11-222
- №02116** 莫洛托夫关于第三季度计划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4年5月22日) 11-223
- №02117** 莫洛托夫关于粮价措施等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4年6月5日) 11-224
- №02119** 斯大林关于乌拉尔之行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4年9月18日) 11-226
- №02123** 伏罗希洛夫关于少年犯罪问题致斯大林、
莫洛托夫、加里宁的信
(1935年3月19日) 11-227
- №0212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重工业企业招募复员军人
问题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5年6月16日) 11-229
- №01179** 斯大林关于1936年控制数字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7月21日) 11-231
- №01180** 斯大林关于1936年控制数字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5年7月28日) 11-233
- №01181** 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8月5日) 11-234
- №02125** 卡冈诺维奇关于粮食征购情况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5年9月4日) 11-235
- №02126** 米高扬关于延长治疗时间问题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5年9月23日) 11-237
- №01182**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和粮食收购问题致
莫洛托夫的信(1935年9月26日) 11-239

- №02127** 卡冈诺维奇关于农业等方面的情况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6年9月30日）…………… 11-241
- №02128** 卡冈诺维奇关于汽车生产等问题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6年10月12日）…………… 11-245
- №02129** 伏罗希洛夫关于红军演习等情况致奥尔忠尼
启则的信（1936年10月16日）…………… 11-249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

（1927年6月至1940年6月）

- 专题说明**…………… 11-251
- №0206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保存、熟悉和
归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制度的决议
（1927年6月10日）…………… 11-252
- №02068** 政治局关于保密工作的决议
（1929年5月16日）…………… 11-254
- №02069** 政治局关于归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全会
记录的决议（1929年5月23日）…………… 11-259
- №02142** 政治局关于无休息日工作周的决定
（1929年9月30日）…………… 11-260
- №01996** 政治局关于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的决议
（1929年10月5日）…………… 11-261
- №01997** 政治局关于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的决议
（1930年9月5日）…………… 11-262
- №02076** 政治局关于边疆区委会和州委会答复中央委员会
有关亚麻大麻采购的电报决议
（1930年11月30日）…………… 11-263

- №02077** 政治局关于检查政治局决定执行情况的决议
(1930年12月10日) 11-264
- №11680**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1930年12月30日) 11-265
- №02078** 政治局关于在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中央
委员会检查中央委员会指示的执行情况的决议
(1931年1月23~24日) 11-266
- №02079** 政治局关于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执行政治局
决定的决议(1931年3月5日) 11-267
- №01998** 政治局关于地方当局质询的现时问题的决议
(1931年4月30日) 11-270
- №01999** 政治局关于向政治局会议提交材料的程序的决议
(1931年11月5日) 11-271
- №02000** 政治局关于向政治局会议提交材料的程序的决议
(1931年11月15日) 11-272
- №02144**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等召开会议
时间的决定(1931年11月25日) 11-273
- №02080** 政治局关于斯大林建议的决议
(1932年4月8日) 11-274
- №02001**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2年5月29日) 11-275
- №02002**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2年9月1日) 11-276
- №02003** 政治局关于斯大林声明的决议
(1932年10月16日) 11-277

- №02070** 政治局关于伊克拉莫夫把政治局记录遗留在
旅馆的决议（1933年2月1日）…………… 11-278
- №02145**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日的决定
（1933年4月23日）…………… 11-279
- №02071** 关于政治局会议记录归还情况的报告
（1933年8月8日）…………… 11-280
- №02072** 书记处关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委会遗失联席
会议速记记录的决议
（1933年11月14日）…………… 11-285
- №02147** 政治局关于党的监察委员和苏维埃监察委员出席
政治局会议的决议（1934年2月19日）…… 11-286
- №02148** 政治局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
委员会的决议（1934年3月5日）…………… 11-287
- №02081** 政治局关于不执行中央委员会有关莫斯科铁路
修配厂决议的决议（1934年3月31日）…… 11-288
- №02008**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致费用的清单
（1934年8月）…………… 11-290
- №02030** 政治局关于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准备
问题的决议（1937年4月14日）…………… 11-292
- №02073** 政治局关于寄送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
记录的决议（1938年10月16日）…………… 11-293
- №02074** 书记处关于让中央监委全权代表了解中央委员会
记录的决议（1939年10月5日）…………… 11-294
- №02075** 政治局关于使中央监委在各地的全权代表了解
中央委员会记录的决议
（1940年6月10日）…………… 11-295

30年代文化领域的“左”倾浪潮

(1929年4月至1938年2月)

- 专题说明..... 11-296
- No05181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关于贯彻改组决议的通知
(1929年4月6日) 11-297
- No05182 马列维奇关于取消造型艺术研究实验室给斯维
杰尔斯基的报告(1929年4月20日) 11-298
- No05183 赫沃伊尼克关于马列维奇的评价致斯维杰尔
斯基的便函(1929年5月27日) 11-302
- No05184 斯维杰尔斯基关于呈报改组现代艺术研究
委员会的材料致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的信
(1929年6月18日) 11-303
- No05185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关于保留马列维奇实验室致
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总局的信
(1929年7月18日) 11-304
- No05186 斯维杰尔斯基关于保留其实验室致马列维奇的信
(1929年7月25日) 11-305
- No05187 弗龙娜关于马列维奇在基辅艺术学院兼职工作
条件致施米特的信(1929年10月24日) 11-306
- No05188 施米特关于马列维奇兼职问题致俄联邦教育人民
委员部艺术总局文学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信
(1929年11月19日) 11-307
- No05189 艺术总局文学艺术事务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发放
马列维奇薪水给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信
(1929年11月24日) 11-309

目 录

- №05190** 伯恩斯坦关于有声语言科研前景给卢波尔的报告
(1930年4月22日) 11 - 310
- №03373** 考尔、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反苏活动致雅罗斯
拉夫斯基的报告(1930年6月) 11 - 315
- №03374** 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的反苏行为致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情报处的报告(1930年6月) 11 - 316
- №03375** 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
手稿的材料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的报告
(1930年6月) 11 - 321
- №05423** 梁赞诺夫的供词
(1932年2月18日) 11 - 339
- №03379**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毁坏藏书现象致鲁祖塔克、
斯大林和波斯特舍夫的信
(1932年9月5日) 11 - 362
- №03380** 马尔采夫关于毁坏藏书现象致鲁祖塔克和雅罗斯
拉夫斯基的信(1932年9月21日) 11 - 366
- №03381** 布勃诺夫关于马尔采夫9月21日的信致斯大林等
同志的信(1932年10月22日) 11 - 373
- №0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图书馆清洗工作的
会议记录(节录)(1932年10月23日) 11 - 376
- №02525** 格拉巴里等人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致
斯大林的信(1933年8月27日) 11 - 377
- №02526** 卡冈诺维奇在莫斯科共产党员建筑学家
会议上的发言(摘录)(1933年9月4日) ... 11 - 380
- №02527**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问题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1933年9月18日) 11 - 381
- №02528** 卡冈诺维奇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致斯大林的信
(摘录)(1933年9月20日) 11 - 382

- №05424** 梁赞诺夫关于限制其住地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2月22日）…… 11-383
- №02529** 尤翁等人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致斯大林的信
（1934年4月17日）…… 11-386
- №02530** 斯大林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致休谢夫等人的信
（1934年4月22日）…… 11-388
- №11681** 斯捷茨基关于《公社报》发表瓦西里耶夫文章
给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报告
（1934年5月）…… 11-389
- №05218**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公社报》
发表瓦西里耶夫文章的决议
（1934年5月29日）…… 11-391
- №02531** 卡冈诺维奇关于苏哈列夫广场改名问题致
斯大林的信（1934年10月25日）…… 11-396
- №02532** 卡冈诺维奇关于光荣榜的建造地点问题致
斯大林的信（1934年10月26日）…… 11-397
- №02533** 斯大林关于建造光荣榜地点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4年10月26日）…… 11-398
- №05217** 中央报刊和出版部主任关于书刊检查工作给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信
（1936年1月5日）…… 11-399
- №03177** 肖洛霍夫要求接见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6月19日）…… 11-404
- №03178** 斯塔夫斯基关于肖洛霍夫处境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9月16日）…… 11-405
- №03179** 肖洛霍夫关于维申斯克案件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10月5日）…… 11-410

- №03180** 肖洛霍夫关于接见之事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10月7日) 11-411
- №05219** 凯洛夫关于乌克兰卫生人民委员部大批解除专家
职务致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的信
(不晚于1937年11月17日) 11-412
- №05220** 普罗珀-格拉先科夫关于大批医务人员被解职致
叶若夫的信(1937年11月17日) 11-414
- №03181** 肖洛霍夫关于维申斯克案件致斯大林的信
(1938年2月16日) 11-417

“左”倾路线下的历史学界

(1928年12月至1944年7月)

- 专题说明**..... 11-441
- №05116** 罗日捷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列宁格勒图书馆人员被
捕致马尔的信(1928年12月5日) 11-442
- №0511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其住所被搜查致
马尔的信(不早于1928年12月24日) 11-448
- №05653**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路线
问题致红色教授学院历史学家组的信
(1929年10月12日) 11-451
- №05654**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对泰奥多罗维奇的批评致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
(1930年2月27日) 11-453
- №05655**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修建十月革命档案馆等事致
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3月3日) 11-457

- №05656**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清洗俄罗斯联邦中央档案馆等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0年8月31日) 11 460
- №05657**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学界状况报告致萨韦利耶夫的信(不晚于1930年12月25日) 11 464
- №05658**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学界状况给萨韦利耶夫的信(不早于1930年12月26日) 11 - 465
- №05659**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泽尼斯等人的声明致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信(1931年1月16日) 11 - 473
- №05660**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编写历史战线上的意见分歧的报告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年2月3日) 11 476
- №05661**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学界状况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31年2月5日) 11 477
- №03310** 高尔基就《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波泽而恩的信(不晚于1931年8月10日) ... 11 - 485
- №05662**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信件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委会的信
(1931年12月19日) 11 - 488
- №05663**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委会的构成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年12月21日) 11 - 490
- №05664**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研究所的工作责任致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信
(1931年12月29日) 11 494
- №05425** 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对其回忆录的评价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不早于1932年1月8日) 11 - 496

- №03311**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曼努
伊尔斯基的信（1932年7月27日）…………… 11-517
- №03312** 明茨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拉狄克的信
（1932年9月9日）…………… 11-518
- №05120**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往事致奥尔登堡的信
（1933年2月3日）…………… 11-519
- №03313**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克雷连
柯的信（1933年2月8日）…………… 11-522
- №03314**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明茨的信
（1933年6月29日）…………… 11-523
- №03315**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
斯大林的信（不早于1934年4月1日）…………… 11-527
- №03316**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
斯大林的信（不早于1934年11月1日）…………… 11-530
- №03317**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伏罗希
洛夫的信（1934年12月9日）…………… 11-532
- №0439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信件问题致彼特卢舍夫
斯基的信（摘录）（1935年2月2日）…………… 11-533
- №05118**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就巴赫京问题致彼特卢舍夫
斯基的信（摘录）（1935年2月2日）…………… 11-534
- №11682**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致彼特卢舍夫
斯基的信（摘录）（1935年2月26日）…………… 11-535
- №05117**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致
布尔斯基的信（摘录）
（不晚于1935年3月1日）…………… 11-536

- №05121**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格列夫斯情况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5年5月6日） 11-537
- №03318** 明茨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致
加马尔尼克的信（1935年8月19日） 11-538
- №03319** 别尔津关于《国内战争史》内容问题致该书
总编辑委员会（1935年12月12日） 11-541
- №0511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致
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8月9日） 11-543
- №05122**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自由和真理问题致
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8月9日） 11-544
- №11683**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信念问题致
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9月19日） 11-545
- №05123**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中世纪书信史》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6年10月19日） 11-546
- №05124**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新年
贺信（摘录）（1936年12月25日） 11-547
- №05125**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就自己的心情状况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年3月7日） 11-549
- №05126**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对她的“控诉”问题致
科马罗夫的信（1937年4月3日） 11-550

- No11684**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对她的“控诉”问题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
(不早 1937 年 4 月 4 日) 11 - 552
- No03112** 卢金等在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党的公开
大会上的发言记录(摘录)
(1937 年 5 月 5~6 日) 11 - 557
- No11685**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林德赛逝世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 年 8 月 18 日) 11 - 603
- No05127**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别涅舍维奇的专著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 年 10 月 11~12 日) 11 - 604
- No05128**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拜占庭学家的命运致
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 年 11 月 6~7 日) 11 - 606
- No02270** 斯大林在宣传员会议上关于《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的发言(1938 年 10 月 1 日) 11 - 607
- No05119** 巴赫京娜关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逝世致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信
(1939 年 9 月 8 日) 11 - 652
- No05179** 亚历山德罗夫等人就史学著作中的缺点错误给
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4 年 5 月 7 日) 11 - 653
- No05180** 亚历山德罗夫等关于呈送有关大国主义错误材料
致中央书记处的信
(不早于 1944 年 7 月 1 日) 11 - 677

30年代俄国侨民中的法西斯党

(1933年5月至1937年)

- 专题说明..... 11-683
- No03128 旺夏茨基致俄国法西斯分子总司令部的公开信
(1933年5月10日) 11-684
- No03124 西瓦琴科夫要求加入俄国法西斯党的申请书
(1934年2月3日) 11-687
- No03125 西瓦琴科夫关于海拉尔法西斯党情况给马特
科夫斯基的汇报信(1935年1月17日) 11-689
- No03126 西瓦琴科夫关于海拉尔分部工作情况致法西斯党
远东部长的汇报信(1935年6月1日) 11-693
- No03127 西瓦琴科夫有关三河地区现状的汇报信
(1935年6月9日) 11-698
- No03129 全俄民族革命党的一张传单(1937年) 11-702
- No03130 全俄民族革命党宣言(1937年) 11-704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对远东的新方针

(1937年11月至1939年8月)

- 专题说明..... 11-706
- No02459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
(摘录)(1937年11月11日) 11-707

- No11857**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致
斯大林的电报（1937年11月26日） 11-709
- No02460**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11-711
- No02461** 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偿付贷款方式致蒋介石的电报
（1938年5月10日） 11-714
- No02462**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6月22日） 11-715
- No02463**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8月26日） 11-717

境外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思

（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

- 专题说明** 11-718
- No07814** 米留可夫关于修改人民自由党策略的报告
（1920年12月21日） 11-720
- No07815** 人民自由党柏林小组对修改策略报告的意见
（不早于1921年1月9日） 11-730
- No07816** 克柳奇尼科夫关于立宪民主主义的新任务的
报告及讨论记录（1921年2月17日） 11-737

【专题说明】

联共（布）政治局的 决议和会议记录

（1926年9月至1941年5月）

政治局是苏共的中央集体领导机构。在苏共历史上，第一次设政治局是在1917年10月23日（俄历1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的，其任务是从政治上领导武装起义。当时的政治局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作为常设机构的政治局是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从此政治局成了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使此前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日益徒具虚名。列宁去世后，政治局开始了斯大林化。斯大林先后解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1930年末，又对政治局进一步“清洗”，使得政治局基本上完成了斯大林化，同时也使得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1941年5月斯大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从而使得党政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斯大林一人之手。

政治局负责处理所有事关党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物资分配、机构调整 and 外汇使用等等。总之，苏联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政治

局做出。

政治局的决议大多数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形成，或以苏维埃的形式形成，成为政府机关的指令。不过，并不是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所有问题都由政治局最后作出决定。一部分问题由政治局转交给书记处、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部门讨论决定。政治局还常常将最终决定权转给某些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的特设委员会。到1937年，政治局授权一小部分人作最后决定的办法已经合法化了。

随着党的最高机构和国家行政机构的结合，也就确立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对事关国家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共同作出决议的原则。政治局批准人民委员会所有重要的决议，同时，政治局也常常将已经事先经它审议过的问题转到人民委员会批准。政治局批准人民委员会决议的程序是这样的：将有莫洛托夫或其副手签字的说明附函和某个决议的草案一同送交政治局审议。有些情况下，政治局不批准人民委员会的议案；也有议案在提交政治局审议之前就被斯大林驳回的情况。

根据当时的党章规定，政治局是在联共（布）例行代表大会后由每一届新的中央委员选举产生的。在各次代表大会之间也对政治局的个别成员进行改选。但这一规则逐渐遭到了破坏。到了30年代，政治局的构成实际上是由政治局自身决定的。斯大林本人在政治局成员的任免中起决定作用。

为了处理各类问题，政治局内设了众多的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组成。它们根据政治局会议对某个问题的讨论意见拟定相应的方案，然后将这些决议提交政治局批准。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从一天到几个月不等。同时还有一些委员会是为了检查贯彻决议的执行。

收入本专题的文件包括了现实问题、常设、国防、外汇、政治（司法）案件、蒙古、铁路运输、国外出差、预审和发行放映新影片等10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决议。

令人惊讶的是，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许多琐碎的小问题。这一方面

是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弊病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治局要充当不同利益者的独特调节人，必须处理一些本属某一部门的问题。

遗憾的是，这里搜集到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决议很不全面，例如，缺少政治局及其下属委员会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讨论过程及各位委员的发言记录。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从这些档案文献中了解苏联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和内幕。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鲁桓、吕存亮翻译）

№020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司法）案件委员会规则

（1926年9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司法）案件委员会规则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6年9月23日批准）

1. 中央委员会政治案件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任命的3位同志组成^①，并将自己的活动毫无例外地扩展到苏联全境；

2. 地方苏维埃和党组织应把地方党组织认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或认为应听取公开诉讼的一切案件的起诉书提到中央委员会政治案件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预审这些案件前，地方党委不能就本条内指出的案件对司法机关和侦查机关发出任何指示；

3. 中央委员会政治案件委员会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

① 1928年10月22日政治局批准了政治案件委员会的构成，成员有：扬松（主席）、明任斯基、什基里亚托夫。30年代加里宁任主席。1931年加里宁休假时由叶努基泽临时代理，因此1931年9月1日叶努基泽也被纳入了委员会。1935年9月9日加里宁休假时，政治局又把彼得罗夫斯基纳入了委员会。委员会的构成不同时期都有变化。1933年1月16日政治局指派亚戈达和普罗科菲耶夫进入委员会。1934年2月15日又指派苏联检察长阿库洛夫进入委员会，他不在时由副检察长维辛斯基代行其职。1937年1月23日政治局任命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为司法案件委员会成员，他不在时由其副手别利斯基代行其职，与此同时将亚戈达和普罗科菲耶夫开除出委员会。1937年10月4日切尔内绍夫被接纳为委员会成员，取代了叶若夫。1939年6月19日，新任检察长潘克拉季耶夫取代维辛斯基成为委员会成员。1940年8月17日，潘克拉季耶夫的继任者博奇科夫接替前者进入委员会。

局报告认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所有案件，以便得到相应的指示和把这种案件移交给当地司法机关；

4. 实际上政治案件委员会（当地有的话）不会对所审案件向党组织和法院发出任何直接的指示。

No 02005

托夫斯图哈关于改变保密局下属各部门名称 致中央书记的便函

(1929年5月10日)

致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莫洛托夫^①、卡冈诺维奇^②、斯米尔诺夫^③、鲍曼^④ 诸同志

为了使保密局的职能更加保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可能滥用诸如“政治局”、“组织局”、“密码局”等名称，我认为将整个处按序号改为7个处以代替原来的“政治局机关”、“组织局机关”等机构的名称是适宜的：

第一处——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助手及其机关（顾问，首长身边的公务人员）；

第二处——主管政治局公文处理的秘书处；

第三处——处理组织局的公文；

第四处——处理密码公文；

第五处——登记和监督秘密文件的回收；

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政治局委员，1930—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② 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1893—1991），政治局委员，1924—1925、1928—1939年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5年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③ 斯米尔诺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78—1938），中央委员会书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④ 鲍曼，卡尔·雅诺维奇（1892—1937），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第六处——中央委员会的机密档案室；

第七处——办公室（收发登记，对内对外的通讯联络，打字和速记）。

将相应地改变工作人员的职称。

诸位是否有不同意见，请告知。^①

中央委员会保密局处长 托夫斯图哈

1929年5月10日

^① 文本上有批示：“赞成、斯大林、莫洛托夫”。

№02036

政治局关于扬松所提问题的决议

(1929 年 12 月 5 日)

74. ——扬松同志的问题

修改早先公布并实行的政治局决议，规定在法院审理反革命案件的下列程序：

州的（边疆区的）检察长和自治共和国的检察长侦讯完毕后检查专业技能（条款）的正确与否，并负责把案件送交法院。法院把判决书的副本呈交政治委员会，而政治委员会再给上诉级法院发出自己的指示。

这一程序也适用于各加盟共和国。

做出极刑（枪决）判决的案件，上诉级法院批准后，连同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以监督的方式由共和国检察院通过。

№02088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分配的决议**

（1930年1月26日）

26.——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分配

由于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改组，要对中央委员会原来决议作补充：

1) 根据原来的决议，保留斯大林同志为政治局会议准备问题及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进行全面领导的权力。

2) 委托莫洛托夫同志领导文化宣传部和列宁研究院。

3) 委托卡冈诺维奇同志领导组织指导部和行政、经济与工会干部分配部。

4) 委托斯米尔诺夫同志领导鼓动和群众运动部及办公厅。

№02091

政治局关于鲍曼声明的决议

(1930年4月18日)

70.——鲍曼同志的声明^①（见附录2）

中央委员会接到鲍曼同志的声明后，认为必须指出：

1) 鲍曼同志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州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应当站在莫斯科州党组织中那些要求同歪曲党的路线和掩饰错误作坚决的和无条件的斗争的同志的最前列，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保证对干部进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教育。

2) 然而，鲍曼同志不是去执行自己的这种任务，而是在莫斯科州党组织的三月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亲自掩盖错误，实际上对背离正确路线的“左”倾过火分子表现出了调和态度，允许同要求与歪曲党的路线作坚决斗争和尽快消除错误的那些参加全会议的委员争论，不自觉地以此将全会引入迷途，并使得对干部进行正确教育出现了困难（见鲍曼同志在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否认在州内集体农庄的建设实践中存在急冒进和行政强制的作法）。

中央委员会决定：

1. 满足鲍曼同志的请求，解除他莫斯科州党组织书记的职务。

^① 罢免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州委书记鲍曼是反对所谓集体化中“过火”行为的一部分。当时由于农业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全国性农民起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0年春，斯大林谴责了“过火”行为，但仅仅追究了在农村采取强制措施的地方工作者的责任。一些最“突出”的领导人，包括鲍曼被撤了职。

2. 鲍曼同志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调他到中央委员会工作。

3. 建议由卡冈诺维奇同志担任莫斯科州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务，同时保留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①

政治局记录№124，第70项

附录 2

鲍曼的声明

鉴于：

第一，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一月全体会议上根据我的报告所作的决议中犯有原则性错误，错误既表现在执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将富农作为阶级消灭的任务方面，也表现在执行全面消灭新兴资产阶级的任务方面。这些错误后来莫斯科委员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进行了纠正。

第二，莫斯科委员会做出了不正确的、与中央委员会1月6日的指示^②相矛盾的关于该年春季完成全盘集体化的指示，对此，

① 1930年4月22日，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莫洛托夫所作的关于4月18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报告免去了鲍曼的职务，选举卡冈诺维奇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② 1930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的《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援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1月6日在报上刊登），决议说：“……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按照五年计划的规定完成20%的播种面积的集体化，而且能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像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

我作为第一书记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三，莫斯科委员会工作中所犯的 error，因我在莫斯科委员会最近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中对许多情况不清楚和一系列不正确的看法而加深了，这为掩盖在集体化事业中业已存在的错误提供了借口，同时也阻碍了对错误的坚决改正。

我请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解除我在莫斯科委员会担任的书记职务。

卡·鲍曼

1930 年 4 月 18 日

№02024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改造黑色冶金工业 工厂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0年5月30日）

主席：李可夫^①

出席者：加里宁^②、奥尔忠尼启则^③、鲁希莫维奇^④、梅日劳克^⑤、古比雪夫^⑥、罗森戈尔茨、什维尔尼克^⑦、古列维奇（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诸同志。

列席者：弗·帕·米柳亭、劳叶尔和古格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

-
- ①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1881～1938），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任到1929年）；1926～1930年同时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 ②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75～1946），1919年起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③ 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86～193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2月18日因与斯大林在大清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自杀。
- ④ 鲁希莫维奇，莫伊谢·利沃维奇（1899～1939），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国防工业人民委员。
- ⑤ 梅日劳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1893～1938），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
- ⑥ 古比雪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1888～1935），1927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0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 ⑦ 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888～1970），192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46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6年起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会^①)；叶夫列莫夫和丘德诺夫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诸同志。

听取：——“关于黑色冶金工业工厂的改造问题”

通过决议：

1. 认为在五年计划末期保证生产出 1500 万吨生铁和 1350 万吨轧钢是必要的。

2. 责成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这一计划：

就生铁和轧钢生产及保证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所需的燃料和矿石向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提出更加准确的计算；

专门阐明为保证生铁和轧钢的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进行煤炭（焦炭）和矿石的采掘所必需的外汇支出。

3. 认为在我们工厂立即着手组织生产初轧机和轧钢机以及冶金工厂所需的任何其他设备是必要的。

4. 责成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的期限内制定出——为履行本决议的第 3 项——某些工厂的工作计划，并精确地指出在什么工厂，加工制作什么，什么样的零部件和用多少经费可以生产出来。

5. 认为选出专门的组织对初轧机和轧钢机的生产进行监督是必要的。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 10 天内就这一问题和这一组织的领导岗位的候选人提出具体建议。

6. 先决定订购两台初轧机，费用从今年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和库兹涅茨克工厂所规定的国外定额中支出。

7. 认为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听取有关马里乌波尔工厂和

^①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苏联经济管理的最高机关，成立于 1917 年 12 月，直属人民委员会领导。

“南部地区炼钢工业托拉斯”下属工厂的问题以及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受托就此事所作的报告是必要的。

8. 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 10 天后召开。

委员会主席 阿·伊·李可夫

№02009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23日)

7/36——莫洛托夫同志所提（执行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等）的问题

(1) 取消副手会议^①。

(2) 取消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调度会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所属特别委员会替代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调度会议，特别委员会由莫洛托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②、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诸同志组成。

(3) 为了加强检查苏维埃纪律的执行情况和巩固苏维埃纪律，成立附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常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

① 指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及其副手的会议。召开副手会议的制度不是苏联宪法规定的，而是按李可夫1926年1月的指示确立的。1926年5月政治局规定，副手会议应一周召集一次以便制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最近一周的工作计划。副手会议在实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在斯大林与李可夫的关系破裂后，该会议引起了斯大林的特别不满。

②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1881--1969），政治局委员，国防人民委员。

成员有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①、波斯特舍夫^②和什维尔尼克诸位同志。在有关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政府决议之前写一引言，指出加强检查纪律的执行情况和巩固纪律的必要性。

（4）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莫洛托夫、鲁祖塔克^③、古比雪夫、安德烈耶夫、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雅科夫列夫^④、格林科^⑤、伏罗希洛夫、米高扬^⑥、卡尔马诺维奇^⑦。

-
- ①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895～1971），1920～1927年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7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4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 ② 波斯特舍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1887～1940），联共（布）中央书记（1930～1933）兼组织局委员（1930～1934）。
- ③ 鲁祖塔克，扬·埃内斯托维奇（1887～1938），1926～1937年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7～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
- ④ 雅科夫列夫，雅科夫·阿尔卡季也维奇（1896～1938），1929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农业部长。
- ⑤ Г.Ф. 格林科（1890～1938），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
- ⑥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1895～1978），政治局委员，时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
- ⑦ М.И. 卡尔马诺维奇（1888～1937），1929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国营农场人民委员。

№02010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0年12月30日)

7/17——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一、批准下列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1. 米罗什尼科夫同志。
2. 伊·伊·梅日劳克同志。
3. 莫吉利内同志。

二、撤销苏联人民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相应的法令在10天期限内公布。

三、批准政治局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及其机关的如下指示（见附录1）。

四、政治局认为加强各加盟共和国参与解决苏联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必要的，由此加强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立法机关中的代表也是必要的。政治局认为必须：

1. 规定今后苏联人民委员会中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而苏维埃系统中的代表则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

2.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另一些措施，以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参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加强。

五、确定下列人员出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见附录2）。

六、同意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三位同志的关于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与其副主席之间分配职责的建议及列入会议的修改意见。

七、从苏联人民委员会撤掉下列机构：1) 水文气象委员会，2) 化学化委员会；把这些机构移交给哪个人民委员部的问题，责成苏维埃系统解决。3) 把标准化委员会交归国家计划委员会。

八、取消：1) 堪察加和萨哈林事务委员会，2) 国家定货委员会，3) 最高仲裁委员会。

九、批准由鲁祖塔克（主席）、古比雪夫、卡尔马诺维奇、格林科、罗森戈尔茨、阿库洛夫诸同志组成的外汇委员会。认为该委员会是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委员会，责成委员会委员亲自出席委员会会议（无替代权）。^①

十、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即他将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之后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

附录 1

政治局记录 No22，7/17 项的附录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紧急审查苏联人民委员会机关（机构和人员），最大限度地精简和缩编机关工作人员，以保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机关主要工作人员的党务和专业科学水平的提高。撤销现今的人民委员会下属咨询专门问题的研究所。

^① 1935 年 6 月 13 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当鲁祖塔克外出时，由梅日劳克任外汇委员会主席。1937 年 5 月 16 日，政治局决定由丘巴尔（主席），罗森戈尔茨，梅日劳克，斯米尔诺夫等人组成外汇委员会。1937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决定由米高扬代替丘巴尔担任外汇委员会主席。

附录 2

政治局记录№22, 7/17 项的附录

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程序问题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1. 除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外, 必须出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有:

(1) 苏联人民委员 (如某个人民委员外出时, 由副人民委员出席);

(2) 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其副手。

为了作记录, 召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和速记员出席。

2. 能够出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并有发言权的人: 苏联各副人民委员; 苏联人民委员会中的各加盟共和国代表; 国家银行行长及副行长; 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常设代表; 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苏联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主席; 与一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责任编辑, 《真理报》编委会委员能够出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会议。

3. 除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外, 必须出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有:

(1) 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

(2) 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书记和执行委员会书记。

为了作记录, 召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和速记员出席。

4. 能够出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并有发言权的有: 苏联人民

委员（如某个人民委员外出，副人民委员可以出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中的各加盟共和国代表——讨论直接与加盟共和国有关的问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常务代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和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责任编辑和《真理报》的编委会委员能够出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

5.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人应是：

（1）有关苏联各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提出的共同问题，报告人是各人民委员（机关领导）；而有关特殊问题的报告人，要经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特批，是委员会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2）有关各加盟共和国提出的问题，报告人为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或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各加盟共和国代表。

№02037

政治局关于简讯《富农的反革命出击》的决议

(1931年4月20日)

3/8——关于简讯《富农的反革命出击》(1931年4月19日《真理报》^①)

一、承认对莫斯科州叶夫列莫夫区富农案件做出处以极刑的判决是严重的错误，实际上，就莫斯科州法院方面而言，把这一判决的简讯刊登在《真理报》上是不允许的。

二、建议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撤销莫斯科州法院做出的枪决6名富农的错误决定，责成州法院重审这个案件。决议在报刊新闻栏公布。

三、坚决重申中央委员会以前关于政治案件未经中央委员会核准不应宣判处以极刑的决定，并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指示，它们的责任是严格遵守这个程序。

^① 简讯报道说，莫斯科州法院在叶夫列莫夫市开庭审理了“16名富农和准富农分子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一案，6名被告被判处枪决。

№02038

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问题的决议

(1931年7月10日)

45 (1/13)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①的问题
(政治局, 1931年6月30日, 会议记录№46, 第1/17项)

(莫洛托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奥尔忠尼启
则诸同志)

1. 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 未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和同意, 不得逮捕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或在这一机关外围工作的共产党员中的任何人。

2. 未经相应的（联盟的或共和国的）人民委员同意, 不得逮捕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军事专家、农学家、医生等）中的任何人, 一旦发生分歧时, 把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3. 因被控诉犯有政治罪而被捕的公民, 未经审讯的拘留不得超过两周, 在侦查中的拘留不得超过三个月, 此后案子应当结束, 或移交法院, 或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独自决定。

4.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做出的处以极刑

① 国家保安机关。其前身为1917年12月20日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 简称契卡。1922年2月6日契卡被撤消, 由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勃乌代之; 苏联成立后, 将国家政治保卫局改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7月改为国家安全总局, 再次纳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所有判决都应呈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①

① 1931年8月5日政治局做出决定：“认为7月10日政治局决议的第4款，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所做出的极刑判决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批准一款，不涉及刑事罪”。

№02146

**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派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组织局代表的决定**

（1931年7月19日）

40/36——关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组织局的代表

批准安德烈耶夫同志、阿库洛夫同志、安季波夫同志、伊林同志、克里尼茨基同志、索尔茨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扬松同志为驻政治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

批准阿库洛夫同志、叶努基泽同志、捷姆利亚奇卡同志、克里沃夫同志、罗捷曼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为驻中央组织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

№02096

政治局关于米高扬申请辞职的决议

(1931年10月15日)

2.——米高扬同志的申请
(米高扬同志)^①

不接受米高扬同志的辞职申请，同时责成米高扬同志就供应人民委员部在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及时提出决议草案。^②

① 括弧内的人名是指这一决议案的提出者，下同。

② 1931年10月14日政治局责成米高扬在1931年10月28~31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供应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做总结报告。

№02025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党员专家 工资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1年11月21日）

机密

出席者：吉洪同志，叶列梅耶夫同志（劳动人民委员部），菲加特纳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加马尔尼克^①（陆海军人民委员会部），什基里亚托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米罗诺夫、古德科夫（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叶若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洛博夫、阿夫杰耶夫、什维多夫（供应人民委员部），吉安（农业人民委员部），佐夫（苏联水运人民委员部），杰久欣（教育人民委员部）。

一、关于共产党员专家的工资问题

1. (1) 责成主管部门在5天期限内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应与非党专家工资相等的共产党员专家职位名称表。

(2) 在编制名称表时，应考虑到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党员专家的工作量、所负责任和业务熟练程度，并指出他们同非党专家的哪一级相等。

(3) 为了预先熟悉和研究主管部门提交的名表，划分出由克拉瓦利、菲加特纳和齐布爾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分会。委员会分

^① 加马尔尼克，扬·鲍里索维奇（1894—1937），先后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会的工作期限为自主管部门提交名称表之日起3天。

(4) 请求党中央委员会把对共产党员专家工资问题审查延缓到今年12月5日。^①

主席 安·吉洪

① 根据什基里亚托夫的报告，1931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对共产党员经济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问题进行了审议研究，通过了决议，一批共产党员劳动者：工厂厂长，铁路机车库主任、车站站长和区段段长及水运上在相应岗位上的任职者，在生产及科研院所工作的专家的工资收入超出党员的最高工资限额，分为三个级别：400—500卢布；600—700卢布；800—900卢布。责成由吉洪、什维尔尼克、菲加特纳、雅科夫列夫、洛博夫、米罗诺夫、佐夫、勃诺夫、加马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和叶若夫组成的委员会对职位名称表进行研究并分类，以便使有技术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的工资收入超出党员最高工资限额，不低于从事相同工作的非党专家的工资。委员会应在10天内将相应的决议方案提交政治局批准。关于共产党员经济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问题，1931年12月16日政治局重新进行了审议。责成由波斯特舍夫任主席的新委员会根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重新拟定决议方案。1932年2月8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共产党员经济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问题”的决议。

№02026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通过干部加强 铁路运输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1年12月10日）

绝密

出席者：波斯特舍夫、安德烈耶夫、布拉特、叶若夫、雷切夫、罗森塔尔、梅尔宗、阿莫索夫、图马诺夫、尼古拉耶娃和米特克维奇同志。

主席：波斯特舍夫同志。

1.——关于动员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决议

（1）中央委员会分配处动员的工作人员名单，名额21人——批准。

（2）列宁格勒州委会动员的工作人员名单——名额19人，乌拉尔州委会动员的——名额20人——批准。

（3）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选拔的工作人员名单，名额50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选拔的15人，委托叶若夫同志征得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同意，同意后就算批准。

（4）责成多年科同志在两天内从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的积极分子中为运输业重审和提出一份工作人员新名单，名额25人。

（5）委托中央委员会分配处在两天内从莫斯科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中为运输业选拔出10人。

(6) 批准按下列名单^① 动员到运输业的工作人员。

关于动员指定的同志们的问题，移交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批准。

(7) 委托叶若夫同志查明有无可能用别的能力相同的工作人员替代卡尔采夫同志（中央化学工业托拉斯主席），如有可能替代，把卡尔采夫同志派到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

(8) 委托中央委员会分配处在5天内结束对派往运输业的工作人员的动员工作。

(9) 动员工作进行完毕后，在委员会听取交通人民委员部作关于被动员到运输业的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的报告。

2.——关于动员工作人员从事党的工作的问题

责成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员在5天期限内从中央机关和红色教授学院^② 学员（从超过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定额，但已被吸收的同志）中动员38人（27名交通人民委员部各区的组织书记，6名铁路局党的组织者和5名基层党组织指导员）从事党的工作。

3.——关于中央委员会各处运输工作计划

委托由梅尔宗、叶若夫、阿莫索夫、尼古拉耶娃、罗森塔尔和谢梅里科夫（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诸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并吸收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党组织、莫斯科州委员会、列宁格勒州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两三个最重要的铁路局的代表参加，编制最近三个月（12月、1月、2月）的中央委员会各处和上述组织的统一的工作计划，以保证托付给运输部门的生产任务的完成。

^①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列出名单。

^② 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培养高校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及科研机构、党中央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教学机构，30年代关闭。

编制计划时应考虑到在这三个月的过程中，要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听取两三个最重要的铁路局的工作报告，并有相应的州（边疆区）的党和工会组织参加。

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 5 天。

建议梅尔宗同志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以咨询的方式）批准。

主席 波斯特舍夫

№02098

政治局关于改组经济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议

(1931年12月23日)

6.——改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1) 采纳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改组经济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决议草案，并移交给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诸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

委员会由斯大林同志召集。^①

2) 不接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辞职的建议。^②

3) 指定政治局的专门会议来审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与莫洛托夫同志相互关系的声明。

① 1931年12月25日政治局做出的《论经济组织的实际工作》决议经过最后审定，获得了通过。在决议中规定：“将轻工业（纺织品、毛纺和亚麻工业、制革和靴鞋、缝纫、肥皂制造业等）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成立一个单独的人民委员部”。

② 奥尔忠尼启则不同意取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建立几个人民委员部。在古比雪夫的档案全宗中保存有奥尔忠尼启则所写的这样一份便笺：“我听到了这种说法，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将他们直接纳入劳动国防委员会都有相当大的困难，会把形势搞乱。我坚决反对”。在第二页有古比雪夫的附注：“谢尔戈10月11日的关于取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便笺。”

№02052

政治局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2年3月16日）

……为了解决涉及蒙古的所有问题，成立由伏罗希洛夫、卡拉汉^①、波斯特舍夫和埃利亚瓦诸同志组成的政治局常设委员会。^②

① 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1889～1937），苏联国务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主管东方司；1919年7月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和1920年9月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② 1932年4月16日政治局做出决定，任命伏罗希洛夫为政治局蒙古问题委员会主席。1933年3月8日政治局因“委托安季波夫检查政治局所做出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将他和卡尔马诺维奇都接纳为蒙古问题委员会成员。

№02031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2 年 6 月 6 日)

73/27——国防委员会问题

1. 采纳国防委员会关于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立坦克基地，确定 1932 年进口额为 300 万卢布的建议。

2. 为了保障已批准的“新索尔莫沃”工厂生产火炮系统的计划的实施，苏联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确定增加进口额 300 万卢布，并在 1932 年交付定货。

No 02053

政治局蒙古委员会会议记录（节录）

（1932年6月26日）

出席者：伏罗希洛夫、波斯特舍夫、皮亚特尼茨基、卡拉汉、别尔津诸同志；邀请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托尔马乔夫两位同志；全苏运输管理局佩列皮奥尔金同志，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塔马林、加伊和平斯基三位同志。

听取：

1. 关于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运送面粉和稷米问题（第一季度从拨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18000吨中运去了9000吨；第二季度没有继续拨给）。

通过决议：

请求政治局在最近的会议上安排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作保证供应蒙古面粉和稷米的报告，责成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完成1932年的全部供应计划。

听取：

2. 关于蒙古工业联合企业的建筑工程（政治局1932年5月16日的决定）。

通过决议：

（1）确认政治局5月16日的决定没有执行。

（2）责成以卡冈诺维奇同志和叶廖明同志为代表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在5天期限内向蒙古委员会提出有关对蒙古联合企业建设的供应和财政拨款的情况，何时发走了建筑工程

必需的材料，如果没有发走，是何原因，由于谁的具体过失造成的等资料。

(3) 委托叶若夫和莫斯科温两位同志在 10 天期限内为蒙古联合企业建筑工程挑选出制革联合企业技术领导一名，安装工程师一名和纺织联合企业技术领导一名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4) 委托叶若夫和吉洪两位同志尽快研究保证为蒙古联合企业建设提供熟练工人（500 名）的可能性，并尽快把工人们运送到目的地……

听取：

5. 关于任命劳动国防委员会临时全权代表负责领导和监督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调拨货物、筑路工程和运输事宜。

通过决议：

请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上乌金斯克任命劳动国防委员会临时全权代表，委托他监督和领导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调拨货物及在蒙古运输线上的筑路工程和运输。

听取：

6. 关于保护蒙古运输线上后继货物的问题。

通过决议：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急速在蒙古运输线上建立岗哨以保护运输中的货物……

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

委员会委员 波斯特舍夫

列·卡拉汉

№02039

司法案件委员会
关于几宗极刑案件的会议记录（节录）
(1932年7月8日)

主席：米·伊·加里宁

出席者：波斯特舍夫、什基里亚托夫、阿库洛夫、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卡梅龙诸同志。

审理

1. 判处公民叶夫谢耶夫以保护社会的极刑案件。（苏联最高法院提出）。

决议：批准保护社会的极刑判决。

审理

2. 判处公民 Н. 谢特金、А. 谢特金以保护社会的极刑案件。（苏联最高法院提出）。

决议：改极刑为剥夺自由 10 年。

审理

3. 判处公民艾达罗夫、萨利姆以保护社会的极刑案件。（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

决议：改极刑为剥夺自由 10 年。

审理

……

7. 判处公民 И. И. 绍明和 П. К. 科瓦廖夫以保护社会的极刑案件。（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

决议：批准保护社会的极刑判决。

审埋

……

10. 判处公民 Л.Л. 菲尔索夫、А.Я. 雷巴科夫、И.Д. 费多谢耶夫、М.А. 索科洛夫、Л.М. 普里谢波夫以保护社会的极刑案件。(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

决议：批准保护社会的极刑判决。

主席 米·加里宁

委员 马·什基里亚托夫^①

^① 该记录于1932年7月10日被政治局批准。

№02054

政治局关于埃利亚瓦的蒙古问题报告的决议

（1932年9月1日）

9.——埃利亚瓦同志关于蒙古的报告
（埃利亚瓦、伏罗希洛夫两位同志）

建议蒙古委员会将斯大林同志纳入委员会，就埃利亚瓦同志的报告详细制定具体措施。

No 02040

**政治局关于实行公有
财产保护法细则的决议（节录）**

（1932 年 9 月 16 日）

31/16——实行公有财产保护法细则

（政治局 1932 年 9 月 8 日，会议记录 No115，第 52 项）

.....

二、1. 取消批准判处极刑的法定程序——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2 年 8 月 7 日颁布的财产保护和加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法令^① 中规定案件所作的极刑判决，在获得批准后立即生效：

- （1）在共和国法院审理的案件由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宣判；
- （2）在运输法庭和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宣判；
- （3）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宣判政治教导处审理的案件。

苏联最高法院和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在受理案件后 48 小时内做出自己的决定，或批准或取消处以极刑的判决。

接到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

^① 1932 年 8 月 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决定规定，“对在铁路和水路运输中盗窃货物的行为采取司法镇压措施”，而“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行为”——实行保护社会的极刑——枪决并将一切财产充公，情节不严重者代之以剥夺自由 10 年以上，财产充公。

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的判决的通知后应立即执行极刑的判决。

2. 责成苏联最高法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每月两次通报起诉的盗窃案的数量以及这些案件的罪犯数量（并指出已采取的社会保护措施）。^①

3. 禁止在报纸上刊载开庭审理盗窃案件的报告和判决的报道。

^① 据官方资料统计，到 1933 年初，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 1932 年 8 月 7 日法令共对 54645 人进行了定罪判决，其中 2110 人被处以极刑，大约有 1000 件案子的判决获得了执行。

№02018

政治局关于分配黑色和有色金属的决议

(1932 年 9 月 16 日)

30.——关于黑色和有色金属的分配问题
(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两位同志)

一、认为政治局批准黑色和有色金属（铜、铝、镍和锡）的季度和月生产计划，以及按人民委员部、最重要部门和特别重要的企业 and 新建筑工程进行分配的计划是必要的。

二、建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把配给金属的企业和新建工程名单提交给政治局下次会议，以便政治局批准。

三、规定季度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而月份计划由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并附有国家计委的鉴定。

№02033

政治局外汇委员会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通知

（1932年10月14日）

机密

外汇委员会 1932年10月16日会议

1. 关于粮食出口的进程和完成10月计划的措施；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采购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

2. 关于1932年11月的出口和外汇计划；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

3. 关于1932年“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进出口联合公司”在国外的投资；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4. 关于从出口货物中撤掉60吨粗麻碎布和50吨漂白纸浆以制造绘制地图用纸；

（海军人民委员部）

5. 关于补给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10000卢布的外汇作为高尔基的稿酬；

（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鲁祖塔克同志的办公室于上午11时召开

1932年10月14日

№02034

古比雪夫关于进口设备问题给政治局的便函

(不晚于1932年11月19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斯大林同志

政治局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有关在国外紧急采购滚珠轴承和电极的申请书交给了外汇委员会。为了审查，我成立了一个由别列尼基同志(工农检察院)担任主席、博耶夫同志参加的委员会进行审查，委员会得出结论：一致认为进口数额为160万卢布的货物是不可避免的(110万卢布给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50万卢布给农业人民委员部修理拖拉机和50万卢布购买电极。

我认为进口是不可避免的。请求批准别列尼基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决议方案。^①

瓦·古比雪夫

附件：

1. 别列尼基同志的报告和政治局决议方案。
2.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两份报告。^②

^① 1932年11月19日政治局以咨询的方式批准了有关滚珠轴承和电极的决议。

^②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个附件。

№ 02041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等人电报的决议

（1932年11月22日）

71/47——莫洛托夫、丘巴尔^①、斯特罗加诺夫和卡尔马诺维奇诸同志的电报

在粮食的收购期间，授予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中由斯·柯秀尔、列津斯和基谢廖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判处极刑问题以最后决定权，以便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每旬一次就这些案件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决定。

^① 丘巴尔，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1891—1939），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02007

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

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

（1932年12月8日）

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说 明 书

自1932年1月1日起至9月31日在内的9个月的经费开支如下：

1. 自1月1日起至10月1日支付给工作人员的工资 = 202265卢布。^①

2. 打字员、通信员和第六科办公室人员在革命假日所干的一些额外工作和紧急工作的加班费金额为1231卢布42戈比。

3. 办公用品、日用品和烟卷开销金额为21549卢布。

办公用品的费用主要用于蜡纸、手摇油印机用纸和复写纸。

日用品为肥皂、汽油、抹布和器皿。

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

1) 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2) 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3) 波斯特舍夫的秘书处，办公室和住

^① 每月工资的零头除外，每月工资总额平均为2万~2.5万卢布。

宅 3000~4000 支；4) 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一个月 500~1000 支；5) 会议大厅每月 2000~2500 支。

4. 用于印制表格、信封、便条的印刷费，书籍装订费，印公报和国外报刊的综合报道以及许多其他工作的支出金额为 29270 卢布 31 戈比。

5. 拍密码电报的费用，在“4”中提到的一系列事务，电话交谈，谢利茨基同志寄信，共计金额 133785 卢布。

6.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机要通信发送费一个月 4500 卢布，10 月 1 日前总额为 40500 卢布，自 10 月 1 日起，由于机要通讯员和助手工资的提高，费用将为 6500 卢布。

7. 转发秘密信件，通过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要通信发送急件的金额为 31680 卢布。寄发的外埠信件：

1 月——3436 封公函

2 月——1608 封公函

3 月——3940 封公函

4 月——6136 封公函

5 月——2429 封公函

6 月——3564 封公函

7 月——2568 封公函

8 月——1513 封公函

9 月——4828 封公函

8. 寄发外交邮件的金额为 2196 卢布。

9. 食堂方面的开支为 66088 卢布 40 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 24098 卢布 32 戈比

卡冈诺维奇同志的秘书处 12044 卢布 06 戈比

波斯特舍夫的秘书处 12234 卢布 32 戈比

会议大厅 16265 卢布 22 戈比

为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茶、糖和各个委员会按定量供给的夹肉面包共计 1450 卢布 48 戈比。茶和糖发给全体工作人员。

定量供给的夹肉面包发给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处，助手和顾问 6 人，此外，还发给身边公务人员，切秋林、帕尔申、舍拉莫维奇、切尔诺夫和在 23 点以后仍留下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

发给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助手和顾问 6 人，除两名身边公务人员外还发给费奥多罗夫、卡普兰、斯塔索娃、斯洛瓦京斯卡娅、杰缅季耶夫和索洛维约夫。

发给波斯特舍夫同志的秘书处，助手和顾问 5 人，此外，还有身边公务人员。定量供给的夹肉面包发给节假日值班的全体工作人员。

我通知，依照与兹拉托波利斯基同志商议的结果，不再编制秘书处 1933 年的开支预算。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 杰缅季耶夫

1932 年 12 月 8 日

№02042

**政治局关于对外贝加尔和
乌苏里斯克铁路法院判决的决议**

(1933年1月20日)

32/13——关于对外贝加尔和乌苏里斯克^①铁路法院的判决

授予加马尔尼克、布拉贡拉沃夫及相关边疆区党委书记组成的委员会对苏联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及乌苏里斯克和外贝加尔铁路军事铁路法庭做出的保护社会的极刑判决以批准权。

^① 中国称其为双城子。

№02043

政治局关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3 年 2 月 1 日)

121/103——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问题

准许北高加索边疆区的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如现在已授予它的那样，不仅对盗窃案的判决有最后的批准权，而且对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怠工案件也有最后批准权（条文 58—8 和 58—14）。

№02044

**政治局关于白俄罗斯共产党（布）
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3年2月9日）

37/2——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满足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授权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人小组对由富农分子和白卫军分子组成的反革命组织和集团案件采用极刑的请求。

№02045

政治局关于乌克兰共产党（布）
中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3年3月10日）

27/4——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授权由巴利茨基、卡尔松和列普列夫斯基三位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审理乌克兰的骚动和反革命案件，并可采用保护社会的极刑。

№02019

**政治局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处理党员过错时与联共（布）
中央进行协调的决议**

（1933年4月11日）

46/22——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处理党员过错时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进行协调的决定（组织局1933年4月7日，np144，n.14~c）

依照党章第62条，为了加速进行党务工作，简化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员过错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获得同意的过程，规定如下制度：

1. 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下列问题的决定必须取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1）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案件的决议；

（2）开除出党的决议；

（3）党内处分：严重警告和撤销区、边疆区、州和共和国的工作人员以及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领导职务。

（4）恢复党龄；

（5）恢复党籍；

2. 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员过错的所有其他决议，如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记录后10天内没有异议，便开始生效。

№02046

**政治局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人小组的决议**

(1933 年 5 月 7 日)

75/62——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人小组

1. 禁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人小组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远东边疆区除外）作极刑判决。

2. 批准 Л.Г. 米罗诺夫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委员。

№02055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的决议

（1933年5月22日）

40/49——关于蒙古委员会

一、准许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蒙古委员会有一名负责的常任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

二、批准鲍里索夫同志为蒙古委员会秘书，同时解除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02047

政治局关于埃赫电报的决议

(1933年7月11日)

62/53——埃赫^①同志的电报

1. 授权由全权代表亲自担任主席的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导处三人小组对用恐怖手段威吓当地居民和已定居的劳动移民的匪徒采用保护社会的极刑。

2. 认为让无业游民到西西伯利亚的亚历山德罗瓦霍夫斯基区劳动新村去是可能的。

^① 埃赫，罗伯特·英德里科维奇（1890～1940），1929～1937年为联共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02048

政治局关于亚戈达所提问题的决议

（1933年8月11日）

116/102——亚戈达^① 同志的问题

暂时授予乌克兰、北高加索边疆区、下伏尔加边疆区、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导处司法三人小组对武装匪徒案件的组织者和匪徒积极分子使用极刑。

^① 亚戈达，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38），1920年起为肃反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一副主席，自1934年7月到1936年10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3月前，为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后被逮捕并于1938年被枪决。

№02058

政治局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决议

(1933年8月18日)

44/23——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

为了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保证铁路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国防委员会类型的铁路运输委员会，成员有莫洛托夫（主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奥尔忠尼启则、布拉贡拉沃夫诸同志。^①

^① 1933年8月20日鲁祖塔克也进入了铁路运输委员会，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席。

№02020

政治局关于负责干部乘飞机飞行问题的决议

（1933年9月11日）

123/107——关于负责干部乘飞机飞行问题

一、没有中央委员会就每一个别情况做出的专门决定，禁止下列级别的负责干部冒开除党籍的危险乘飞机飞行：

1.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2.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3.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4. 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5.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6. 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负责书记。
7. 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8. 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人民委员及其副人民委员。
9. 苏联人民委员部主要管理局局长。

二、违反本决议者，无论是什么人一律开除出党。

三、委托古比雪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别列津三位同志制定飞机从机场起飞必须履行的规章，授予航空站和机场场长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禁止起飞的权力。

№0200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改组中央委员会保密局的决议**

（1933年11月13日）

198/4——关于中央委员会保密局的改组

（1）改组中央委员会保密局，办法是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机关的保密局划分出来，命名为中央委员会保密局。

（2）保密局直接归斯大林同志领导，斯大林不在时——由卡冈诺维奇同志领导。录用和辞退保密局的工作人员须经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同意。

（3）规定中央委员会保密局的工作人员（密码室人员、速记员和打字员）的工资应比其他机构发给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额高出30~40%。

（4）责成萨姆索诺夫同志在一个月的期限内满足中央委员会保密局工作人员对住宅的所有申请。

（5）责成萨姆索诺夫同志提交完全供中央委员会保密局支配的五座别墅和为其服务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人员。

№02113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任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决定**

（1934年1月17日）

关于任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1）规定如下：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的任用或解职均须经过卡冈诺维奇同志或斯大林同志批准。

（2）联共（布）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必须严格遵守这一决定。^①

^① 决议的最初方案是由卡冈诺维奇拟定的，最初方案的内容是这样的：“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的任用或解职只能由中央书记批准。”后来由斯大林对卡冈诺维奇的方案进行了修改。

№02059

政治局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决议

(1934年2月15日)

45/25——关于铁路运输委员会

(政治局1933年8月18日的记录№.144, п.44/23)

修改政治局1933年8月18日的决议，任命下列人员为运输委员会成员：卡冈诺维奇（主席）、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布拉贡拉沃夫。^①

^① 1935年4月7日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由莫洛托夫任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14日丘巴尔也进入了运输委员会。

№02027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医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和 物质生活状况问题的会议记录

（1934年4月19日）

出席者：日丹诺夫^①、格林科、梅日劳克、卡明斯基、列别季、帕霍莫夫、古列维奇、坎格拉里、卡梅涅茨基诸位同志。

主席：日丹诺夫同志。

1. 关于医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和物质生活状况问题

委托梅日劳克（召集）、古谢夫、拉比切夫、卡明斯基、康托罗维奇、戈列里克、巴尔苏科夫、阿夫杰耶夫和马尔库斯诸同志根据已交换的意见，就一定类别的医务人员（乡村医生、地段医生、医院院长、外科医生、中低级医务人员等）的法律地位和物质生活状况问题详细拟定出具体建议，不容延缓，并对1935年的同类问题草拟出初步建议。

工作期限——5月15日。

主席 日丹诺夫

^① 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1896—1948），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02028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改善医务人员 状况会议的速记记录（节录）

（1934年4月29日）

日丹诺夫：这里在提出了物质生活状况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私人开业行医的问题。卡明斯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私人开业行医问题的建议。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些建议理由不充分，并把这一问题转给我、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进行仔细研究，而且附有卡明斯基的建议理由不充分的这类批示。这个问题在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系统进行了研究，也大致作了一些规定，把推广私人开业行医放到一边，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受理这件事，那时有关医生的物质状况的问题就会有根本改变。从这个观点看，这里提出的建议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卡明斯基想马上推行私人开业行医，增加工资额和定量配给品的措施。假如我们推广私人开业，而且我们应该推广，那么，医生的物质生活状况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变。我认为，中低级医务人员的问题就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我们应大力相助。

对城市医生来说，私人开业行医会大大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原则上我毫不反对必须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但是，我认为不能笼而统之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区别对待，不然，我们怎么也不会因此而获得生产效果。我们应当挑选出流动性大、要求和怨言较多、最重要、最迫切需要改善物质状况的一类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情况确实如此，需要做些什么事。不过若

是由我们来照顾各种各样的医生，我们不会因增加的东西得到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选出最重要的一类——乡村医生、医院院长、流行病医生和某些奇缺的专业的医生，正是对这些类的医生提出了提高物质水平的问题。

格林科：今年花费 3.45 亿卢布的方案，无论是什么样的都必须取消。我们不能破坏中央委员会为今年制定的规则。我们不给任何人提高工资，如果我们破例的话，那也只是在不大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只能分阶段解决，而不能不加区别地解决。一小部分人可以在下半年增加工资，而对其余的则应从新的预算年度开始。否则我们将破坏为所有经济部门规定的原则。

在他们所作的计算中，不管工资提高多少，必须从他们不能消除兼职出发。因此他们给的可以不是工资额，而是医务人员实际挣到的钱。

我认为首先必须提高某些类别医生的工资。哪儿类呢？这就是对医院负责的和不能私人开业行医的领导成员。看来还必须提高像外科医生这类医生的工资，因为他们也不可能私人开业，他们只能在病房动手术。我觉得私人开业行医的问题能根本改变城市供给体系。私人开业行医——一天接诊 5 个病人便会大大改善他的工资收入。

关于乡村，这里应当更有条理地挑选材料。那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地段医生的问题，他们不可能私人开业行医。必须拉住他们，不得不提高工资和增加供应品。但这就应该对所有材料认真地加以研究。

日丹诺夫：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分清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可以稍等一下暂缓解决的问题。谁该提高物质生活状况呢？这就是低级医务人员，还有中级医务人员。我们的某些级别的护士，看来不得不给他们提高工资和增加供应品。但是这又不

是全部，而只是给某些级别的人。还得建议卡明斯基提出今年我们马上要进行的和我们准备 1935 年要进行的这一工作的提议方案。这些提议应该有所区别，并不涉及所有的人，而只是在限定的范围内的一定的类别。至于乡村医生，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考虑，必须看具体情况。看来，应该给这一范围的医生提高工资和增加供应品。

但是，对于乡村医生的供应还需要说几句话。如果我们靠国家来供应他们并确定这样的方针，即像提供定量配给品那样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仍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认为我们最好是给予帮助，为他们提供贷款搞副业，否则我们照样不能解决粮食问题。

№02046

政治局关于到国外出差的决议

（1934年5月7日）

39/23——关于到国外出差

1. 未经中央委员会国外出差委员会的许可，禁止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和地方组织派代表或小组和代表团出国，国外出差委员会成员有：日丹诺夫（主席）、B.И. 梅日劳克、叶若夫、阿格拉诺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

委员会在决定到国外出差的问题时，不仅应从政治的可靠性观点出发，而且也应从业务的适宜性观点出发。

2. 现存的出国委员会^①自行取消。

^① 出国委员会成立于20年代，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调配处的代表构成。

№02021

政治局关于派往国外就医和
支付外汇办法的决议

(1934年6月4日)

87/75——关于派往国外就医和支付外汇的办法

一、警告医疗委员会，不执行中央委员会1933年5月10日关于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向派到国外就医的同志支付外汇都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决议^①是不容许的。

二、重申确实需要去国外就医的同志，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方可派遣。

三、兹规定医疗委员会决定为每个病人支付外汇时，不论其党内地位如何，都不应超过800卢布，而且一旦需要超过这个数额时，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方可。

四、禁止苏联驻外机构（全权代表处，商务代表处）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未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许便向就医的任何负责同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1933年5月10日的决议。但1933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137）的后面附有1933年4月23日以咨询的方式通过的政治局关于向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支付外汇的决议：1）对到国外就医所支付的外汇总额不作明确规定；2）在解决去国外就医问题时，医疗委员会应规定付给每位就医者必需的支出数额，提请中央委员会批准；3）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用于医疗设备和药物方面的外汇支出经医疗委员会审议之后，由医疗委员会提交中央委员会审议。

志支付外汇。

五、责成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本决议的刻不容缓执行进行严格监督。

№02118

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4 年 6 月 4 日)

90/78——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分工

确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分工如下，同时他们要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进行监督：

斯大林同志：

- (1) 文化部；
- (2) 特别局；
- (3)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卡冈诺维奇同志：

- (1)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
- (2) 工业局；
- (3) 运输局；
- (4) 共青团；
- (5) 党的监督局。

日丹诺夫：

- (1) 农业局；
- (2) 计划—财贸局；
- (3) 政治行政管理局；
- (4) 党的领导机关局；
- (5) 事务管理局；
- (6)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02061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34年6月28日)

25/7——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出差委员会问题

一、允许施密特、绍卡利斯基、莫特廖夫和巴兰斯基四位同志参加在华沙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地理学会议。

二、派遣利特温—莫洛托夫同志参加教育工作者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

三、满足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请求，派下列人员参加7月3~9日在剑桥召开的第四届理论和实用力学国际会议：

Н.И. 阿基莫夫——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教授，

Л.П. 利文森——莫斯科矿业和航空学院教授，

Ю.И. 亚根——列宁格勒机械制造学院教授。

四、不接受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关于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 А.Ф. 约费出国的请求。

№02049

政治局关于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决议（节录）

（1934年7月10日）

鉴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体制和行将把原先以非司法程序审理的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审理，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正确地审理这些案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一、关于法院的工作

1. 在苏联最高法院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边疆区和州法院以及自治共和国主要法院之下，成立由法院院长和两名成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叛国罪和反对行政制度的违法行为应由专门委员会审理。

2. 背叛祖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爆炸、纵火和破坏活动，按照法院的管辖范围，应归军事法庭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

3. 在铁路和水路运输线上的犯罪案件，按其所属，应归陆路和水路运输法院及苏联最高法院运输委员会审理。

4. 其他所有的案件应在人民法院依一般的程序审理。

5. 在苏联最高法院属下成立由最高法院院长和两名副院长组成的司法监督委员会，以便审理对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和苏联最高法院委员会判决提出的异议。在司法监督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务必有苏联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参加。

6. 司法监督委员会根据共和国最高法院和苏联最高法院委员会做出的极刑（枪决）判决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要提交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批准。

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所作的极刑判决未经过苏联最高法院司法监督委员会的，应提交苏联最高法院政治委员会批准，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直接提交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除外。……

№02050

政治局关于莫洛托夫电报的决议

(1934 年 9 月 19 日)

51. ——莫洛托夫同志 9 月 19 日的电报

采纳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授权埃赫同志在 1934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对西西伯利亚判处的极刑进行核准。

No02029

**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把农产品分散采购
转归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管辖的
预备会议速记记录**

（1934年11月21日）

日丹诺夫：政治局就韦采尔同志提出的把调整农产品的分散采购事宜转归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管辖问题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决定在委员会召开之前预先讨论这个问题，以便得出一个统一的想法，如果能做到的话。^①

我希望韦采尔同志说明的不只是问题有争议的那部分，而且也说明这件事的实际状况。

韦采尔：去年分散采购共计1900万卢布。今年如果顺利地完成全部计划，分散采购共计1900多万卢布。

主要采购了什么呢？牲畜、家禽、野禽、鱼、油、奶、土豆、蔬菜和水果。采购的土豆、水果、动物油脂和野禽在分散采购物中占的份额非常大，增长了5%，主要是土豆和水果。牲畜同去年比则减少了12%。

我们实行采购员按区分配的办法，而且有些采购员在若干个区内采购。在莫斯科有工会组织地方委员会进行工作，该委员会对莫

^① 1934年11月9日，政治局以咨询的方式决定，将韦采尔和克莱纳提交的对农产品实行分散采购制的便函转给由日丹诺夫（召集）、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米高扬、韦采尔、克莱纳和捷连斯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20天。

斯科的采购员问题作了些调整。比如，狄纳莫工厂有6个采购地区，而且在所有这些区内它的采购品仅是这些地区该物品采购量的不大一部分。地方委员会规定给这个工厂3个地区，因为在一个地区内有若干个采购员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工厂有7个地区，卡乌丘克工厂有4个地区。

必须指出，这是按地区机械地分配采购员，而不考虑他们得到的规定定额的供应品。在我们莫斯科有许多工厂工人委员会，它们没有领到定额的肉。它们应该在划给他们的畜牧业地区进行分散征购，可是划给他们的地区肉很少。例如，在扎维多夫斯基区9个月才采购了一吨肉，6吨牛奶，24吨蔬菜，而这个区就有5个采购员。

如果把分散采购量与我们供应的总量相比较，许多产品仅占不大的百分比。比如，肉类产品为22%，鱼为8%等等。若是把就地采购量与运到市场的东西相比较，数量就更少了。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农产品采购委员会应当采购那些具有赋税性质的产品，而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产品，应由我们采购。应当考虑到分散采购与规定定额的供应品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调整这件事应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

在莫斯科和各州有公约委员会。中央公约委员会在农产品采购委员会属下，它实际上不起作用。所有这些产品的销售价格均由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在当地规定。结果完全脱节。从这个观点看，分散采购也应由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管辖。

日丹诺夫：韦采尔同志，去年，也许是前年，在购买者之间分配地区时，曾经规定下伏尔加地区不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运送蔬菜，——这仅仅涉及蔬菜还是全部产品？

韦采尔：只涉及新鲜蔬菜。

克莱纳：我认为分散采购是不能脱离集中采购的。在9个月

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通过集中的办法我们采购的各类肉产品为 37.9 万吨，而通过非集中的办法采购的总共只有这个数量的 21%，而去年则为 16%。分散征购的油脂所占的百分比更少，总共为 4.4%。今年的蛋为 9.1%，蔬菜为 25.6%，而去年则为 26.3% 等等。

如果我们使分散采购脱离集中采购，我们将会蒙受很大损失，首先是集中采购蒙受损失。现在我们拥有的有效强大手段，在集中采购进行得不好的那些地区，禁止就地分散采购。我们让企业工人供应部改为同集体农庄订长期就地采购合同，而且企业工人供应部可以在经济服务方面给予集体农庄一定的帮助。

第二个问题。在分配就地采购地区时，我们考虑了许多因素。大企业的企业工人供应部得到更大的、纯农业型的地区。小型企业的企业工人供应部得到的是更小的地区。这种分配是由公约委员会进行的，而且这些地区的分配都有全体缔约人参加。我们给每个人民委员部都指定了相当数量的地区。如果需要撤掉某个不认真进行采购的企业工人供应部，我们就把它从该区撤掉并分给同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其他企业的企业工人供应部。

组成公约委员会的有供应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公约委员会聚在一起开会，只是为了分配这些地区。我的业务工作程序中每天都有公约委员会委员们。这些同志参加公约委员会的工作，总能提出重新分配地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把这件事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合适的原因。

捷连斯基：情况是这样：在这个地段必须建立某些秩序。无秩序的现象是因为采购员数量多而对他们工作监督得薄弱。用于各种全权代表和采购员的费用非常庞大。数以千计的小的和极小的采购

机构不称职。但是，这个问题完全不在于谁来领导这件事。这个问题不管是搁置不动还是移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都必须研究清楚。至于领导的问题，我认为很难把集中采购的问题和就地采购的问题分开，尤其是当这些采购在同时进行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就地分散采购只是在完成州计划的时候才获得准许的。这是很蠢的。现在，我们按单个集体农庄计算，在完成集中采购的条件下就准许就地分散采购。把这两个问题留在两个人民委员部里是不合适的。这件事交给人民委员会农产品采购委员会是正确的。

关于公约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工作实际上集中在各州，而不是在莫斯科。这里要谈的是遵守我国的价格政策和解决允许不允许采购员为这种商品或那种商品规定某种价格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应在当地解决，而不是在莫斯科解决。价格是在这里规定的，可是各地可以相机处理此事。至于集体农庄市场，克莱纳无疑是对的。

日丹诺夫：我认为在按需求者分配地区之时，我们已经对这件事作了一些规定。我是在边疆区干这件事的，应当说，当我们把工厂和一定的地区连结在一起时，就在为改善工人的供应事业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项措施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因为把城市和乡村直接联系在一起了。这与通过一系列环节把农产品运送到工人手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因为当时工人没有看到采购的困难。当我们让工人直接与地区接触时，他看到我们获得集中采购和就地采购的东西非常困难。当然，以经济合同方式所进行的欺骗行为是比克莱纳谈到的这件事要多些，但这不应该破坏和动摇企业工人供应部与集体农庄之间既定的按合同方式所建立的相互关系。因为按合同办事的这种制度完全证明是对的。

在进一步解决调整问题及在基本工人消费者之间分配采购区的问题时，缩减工厂所属地区的数量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当我们把工厂划归给边疆地区时，经过半年我们就使靠别人供养的依赖心情和

光顾满足个人要求的心情开始消失了，产品必须从边疆区外面运来的心情也开始消失了。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像列宁格勒州这样的州，对许多别的为建立自己的粮食基地作了许多工作的州也是如此。

我们越按公约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促使人们从自己的边疆区得到产品，我们就越能为在每个边疆区和每个州建立自己的粮食基地作更多的工作。因此，公约委员会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

第二个任务是不允许大量采购者在一个地区相遇，因为哪里有采购员相遇，哪里就有竞争，物价就会抬高等等。因此，在同抬高物价的斗争中公约委员会的作用重大。要知道规定价格的主要宗旨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机关不破坏这些价格。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按为集体农庄庄员规定的价格来进行调节，而是按为采购员规定的价格来调节。这个任务继续下去很简单，它还没有像我们要求的那样完成。我想公约委员会的作用就像在国家领导和监督下的采购员独特的购销联营组织的作用。国家不允许这个购销联营组织的成员摆脱共同的约束。这个问题并非无益的，因为如果我们责成主管部门对就地分散采购的价格进行监督，是不会有什好结果的。

现在是集中统一采购和就地分散采购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与商业相比较，当就地分散征购出现许多附加困难时，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有组织地以就地分散采购来进行调节，并把它们与农产品采购委员会实行的集中统一采购分离开，与我们实行的集中采购相比较，这实际上意味着为集体农庄贸易创造了更优惠的条件，因为集体农庄庄员当然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如果把调节就地采购一事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韦采尔自然会站到商业一边，这会对就地采购产生不利影响。他将坚持为商业创造更好的条件，而这不仅影响到就地采购，也影响到集中采购。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在自己的工作中与克莱纳对立。您将竭力使大部分产品

尽可能地落到您的商业网里。

我不能排除随着商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将会以新的方式存在。但目前这个问题却正如我谈到的一样。我认为不能把用分散采购调整一事给韦采尔，而必须把它留在克莱纳处。

但是，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它在这件事中是否应该起共同参加者的作用还是应该起特殊的，而不是普通的购销联营者的作用呢？这是事情的第二个方面。有些采购部门的采购和集中统一采购计划并不冲突。这件事也许可以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必须考虑。

韦采尔：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仍旧存在的定额供应的办法对分散采购施加影响。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营商业影响价格。如果我开设蔬菜、奶制品和别的商店，我可以以此来降低产品的市场价格。第三个办法是通过商品流转施加影响。如果我们不希望商业和分散采购凋敝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对分散采购的调节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

日丹诺夫：您引证的只是表面现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利益角逐。您不想考虑这种因素，您不考虑这种因素是不对的。

韦采尔：我们可以在集中统一采购的那些地区不进行分散采购。现在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调节。最终可以从这件事中排除掉肉类，可是在分散采购比集中采购起更大作用的其余产品中，这些产品无论如何也不能留给农产品采购委员会。

日丹诺夫：有一点您不明白。主要问题在于您将维护集体农庄的利益，而不是城市的利益，正是商业迫使您这样作的。此外还有一个顾虑——分散采购会不会妨碍集中采购。不过，我们有如此强大的杠杆，我们可以在集中采购完成得不好的州里禁止分散采购。但是，我们要不要把采购大军派到那些地区去，允许他们之间发生

冲突或由我们来调节这事——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一回事。用什么来说明我们的富足安康，说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均衡状态，粮食从购粮卡过渡到自由买卖的可能性取决于什么？是集中在国家手里的粮食数量和粮食储备。这种因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决不能失去。主要的问题，调节市场上所有商品和产品价格的主要杠杆就在于所有这些产品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这个观点看，对我们来说集中采购肉、油、奶等等的问题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否真正调节这些价格将取决于我们掌握的产品数量有多大。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克莱纳和他的集中统一采购正起着，而且也应该起首要作用。如果这件事在两个主管部门之间划分开，那么您不可避免地将站在增加就地分散采购额以发展商业这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还没有为把这件事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创造条件。

克莱纳：还有一种情况：我并不感兴趣给哪个部门特权，而韦采尔却对有些部门感兴趣，他将给这些部门特权。

日丹诺夫：关于公约委员会。公约委员会隶属于农产品采购委员会，那就意味着我们承认集中采购比分散采购优越。我们赞成改变产品分配制度，正是为了消灭在这一领域里存在的军事时期的残余。为了向更好的方面改变，我们自己的手里应当有大量集中的储备。

我们交换的意见是初步的设想。在这里我们没有通过任何最终的决定。我仍然认为，不能采纳韦采尔关于把调节分散采购一事交给对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建议。但同时我们应仔细制定改善调节分散采购的办法。这里产品分配制度应占上风，这里分散采购应占上风，发展分散采购的问题在这里有着很大的意义。

我建议克莱纳、韦采尔和捷连斯基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02062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34年12月25日)

250. ——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日丹诺夫同志已去列宁格勒，批准尼·伊·叶若夫同志为国外出差委员会主席。

№02120

政治局关于交通人民委员等职务任命的决定

（1935年2月27日）

25.——关于交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1）任命安·安·安德烈耶夫同志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解除其交通人民委员职务；

（2）任命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为交通人民委员，解除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职务；

（3）任命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伊·叶若夫同志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4）任命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任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5）本决定的相应各项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以征求意见方式批准。^①

① 1935年2月28日联共（布）中央以征求意见方式批准该决定。

№02121

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5年3月10日)

54.——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分工

(1935年3月9日的组织局会议，记录№24^①，第54项)

(1) 决定把安·安·安德烈耶夫同志列为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成员。

(2) 组织局会议由安德烈耶夫同志主持，组织局议事日程由安德烈耶夫同志和叶若夫同志筹划准备。

(3) 责成安德烈耶夫同志主管中央委员会工业局并监督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运输局和事务管理局的工作。

(4) 责成叶若夫同志主管党的领导机关局，解除其对工业局的领导权。

(5) 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督中央委员会其他各部局的工作，尤其是文化宣传部的工作。

(6) 责成卡冈诺维奇同志监督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党组织工作，但是卡冈诺维奇同志的这项工作不能有损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工作。

(7) 准许卡冈诺维奇同志在每次形势需要时可以中央书记身份就铁路运输问题向州委会、边疆区委会要求帮助和支援。

^① 记录中有错误，组织局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记录在№25中。

№02122

**政治局关于日丹诺夫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的决定**

(1935年4月20日)

158.——关于日丹诺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

为了减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分担的工作，责成日丹诺夫同志每个月抽出 1/3 时间在莫斯科度过，从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

№02056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1935 年 6 月 17 日)

161. ——关于蒙古委员会主席

一、满足索柯里尼科夫同志解除他担任蒙古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①，留任他为委员会委员。

二、委任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担当蒙古委员会主席。

^① 1934 年 5 月 26 日政治局解除了伏罗希洛夫蒙古委员会主席之职，任命索柯里尼科夫为委员会主席。1936 年 10 月 19 日他被开除出委员会。

№02057

政治局关于蒙古委员会的决议

（1935年6月25日）

24.——关于蒙古委员会

委托斯托莫尼亚科夫同志一个月后根据经验提出蒙古委员会章程的具体方案，以保证委员会的正常工作。

№02051

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对俄罗斯联邦
最高法院工作进行检查的报告（节录）

（1935年11月5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检查发现最高法院领导和机关对保守国家机密采取了不可容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案件审理制度和程序为泄漏最机密的材料和为广泛传播正在侦查案件中的反革命文件创造了一切可能性。除此之外，最高法院批准的判决本身就是反革命传单。

比如：

1. 似乎为了简化计算被枪决者的总数，在最高法院秘书处制作了一套有关被枪决者的特殊卡片，可自由利用卡片的有14名非党技术工作人员，其中只有一人是从事保密工作的。

2. 最高法院与审查判处枪决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有联系这一事实对最高法院的技术工作人员（利索夫斯卡娅和塔拉索娃——非党人上；金兹堡——联共（布）党员）已不是秘密。他们不仅详细地了解政治委员会的存在，而且还了解它的成员及其决定。特别委员会秘书金兹堡，如查明的那样，还自作主张地制作了一套特殊的“被枪决者的小卡片”，卡片上标出“呈送政治局……（日期）”，“政治局批准……（日期）”。

关于这套卡片的存在，按最高法院特别委员会主席克伦贝格的

说法，在我们检查以前并不知道；现在命令他把卡片毁掉。

政治局委员会有关极刑案件的记录，因为装订而落到技术人员（金兹堡、塔拉索娃、利索夫斯卡娅）手中。除此之外，政治局委员会委员表决和委员会委员在最高法院有关枪决的报告上的签字副本不是保存在人民委员或最高法院院长那里，而是保存在特别委员会秘书（金兹堡）那里，金兹堡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受托人……

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 尼·安季波夫
行政机关小组领导人 纳扎列强

№02032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所属军事技术局的决议

(1936年3月21日)

86.——关于国防委员会所属军事技术局

1. 批准国防委员会所属军事技术局的成员为莫洛托夫（主席）、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鲁希莫维奇代替）、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①、图哈切夫斯基、斯卢茨基、乌里茨基诸同志。^②

2. 批准彼得连科—卢涅夫同志为国防委员会所属军事技术局书记。

3. 设置局属作业处（处长皮达可夫同志）和执行检查处（处长由鲁希莫维奇同志代替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①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驻法国商务代表、苏联国家银行行长、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等职。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1936年9月12日夜里被逮捕，1937年1月在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进行公开审判时被判处枪决。

^② 1936年4月22日亚戈达和哈列普斯基也被接纳为军事技术局成员。

№02015

**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
关于莫斯科河改造决议的附函**

（1936年5月28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市建设北市区运河、改进亚乌扎河和莫斯科河，建造市区桥梁和准备提高莫斯科河水位的各项措施”的决议方案的附函

（1936年5月28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按你们的委托，我们审核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亚戈达、科甘委员会和工程师菇克关于将莫斯科河水位提高到120高程，建造市区桥梁，加深莫斯科河以保证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启用后在莫斯科河上通航的建议，以及与建设北市区运河和改造亚乌扎河有关的问题后，将这些问题的决议方案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

我们认为，从今年起开始对建造市区桥梁、开凿北市区运河和改造亚乌扎河以及排水设备等工程施工是必要的，为此需要从人民委员会的储备金中拨款，按降低工程造价11%计算，需拨款4895

万卢布，由敷设岸边排水设施和排水工程的相关的各人民委员部、机构及莫斯科委员会负担经费 3146 万卢布。

除建设莫斯科 - 伏尔加运河的基本工程计划外，必须从人民委员会的储备金 1500 万卢布中拨给内务人民委员部金额 1335 万卢布，作为取直霍罗舍夫大路和加深莫斯科河的施工所必需的费用。由于缺少这些工程的技术方案和预算，没有把这些费用纳入莫斯科 - 伏尔加运河方案的总预算中。为了使莫斯科 - 伏尔加运河在 1937 年航行期能够通航，这些工程加速施工是必要的。

有关北市区运河的运输用途和亚乌扎河的改造问题，我们提出两个施工方案供你们讨论，二者主要是原水路的开阔程度有区别。第一个方案按水面线测量宽度为 40 米，深度为 2.5 米，拟定沿运河和改造后的亚乌扎河可通过载重量 1000 吨的驳船；第二个方案拟定通过载重量为 500 吨的驳船，为此，航路的足够深度为 2 米，运河和亚乌扎河的宽度为 25 米。无论是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都能同样顺利地为北市区运河的其他用途和亚乌扎河的改造服务，如增加亚乌扎河的蓄水量和疏浚河道，所经过区域的美化设施，岸边的设备等等。莫斯科人不同意第二个方案，我们赞同这个方案。

此外，我们认为有必要通知你们，在讨论北市区运河和改造亚乌扎河的问题时，亚戈达提出建议，即这些建筑物的施工，不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35 年 9 月 8 日所做出的决议那样，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承担，而是由莫斯科委员会承担。亚戈达同志提出自己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必须尽快地从莫斯科市区及其郊区撤走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动力。

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①

丘巴尔

梅日劳克

1936年5月28日

^①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6月11日通过决议，批准第二个方案。

№02016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降低 黄油零售价格的决议方案的附函

(1936 年 6 月 9 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动物油，尤其是高级品（“特级品”、“高级品”）的销售，令人很不满意。到 6 月 1 日，只销售了第二季度计划的 45%。

因此，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在整个地区降低油的零售价格，“特级品”油每公斤降 2 卢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 公斤油从 23 卢布降到 21 卢布），而高级品油每公斤降 1 卢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 公斤油从 20 卢布降到 19 卢布）。

因降低零售价格蒙受的预算损失，由榨油工业生产超过 1936 年度计划任务的高级动物油来补偿。

请批准如下决议：

“1. 自 1936 年 6 月 16 日起，在各个地区降低工厂出品的巴黎油、淡油和咸油的现行零售价格：

- (1) ‘特级’油每公斤减价 2 卢布；
- (2) 高级品油每公斤减价 1 卢布。

2. 对在商业贸易网中和运送途中由于上面所说的各等级油的

重新估价所造成的差额由国家预算负担”。^①

（维·莫洛托夫）

1936年6月9日

^① 政治局以咨询方式于1936年6月11日批准这一决议。

№02063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4月4日)

129. ——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

1. 因为调动布朗同志从事经济工作，故解除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计划财务贸易部外贸处主任的职务。

2. 取消国外出差委员会分会。

规定解决到国外出差问题的下列制度：

(1) 所有出国的许可都应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委员会预先根据有关人民委员的个人报告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必要鉴定进行审查；

(2) 委员会的建议提交政治局批准。

3. 批准国外出差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

(1) 安德烈耶夫

(2) 阿格拉诺夫

(3) 波斯克列贝舍夫

№02011

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4月27日)

77.——关于成立苏联国防委员会^①

1. 为了统一苏联国防的所有措施和问题，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防委员会，由七人组成。

2. 批准下列同志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

(1) 莫洛托夫同志——主席

(2) 斯大林同志

(3) 卡冈诺维奇同志

(4) 伏罗希洛夫同志

(5) 丘巴尔同志

(6) 鲁希莫维奇同志

^① 国防委员会在两天前即4月25日已被政治局批准成立，但在第一个方案中没有国防委员会候补委员和撤消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条款。1939年9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批准新的国防委员会名单：莫洛托夫（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常务副主席），库兹涅佐夫，日丹诺夫，米高扬，贝利亚，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普罗斯库罗夫。1940年7月24日，政治局赞同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为：伏罗希洛夫（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副主席），斯大林，铁木辛哥，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沙波什尼科夫。1940年8月31日，政治局批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任命日丹诺夫，布琼尼，梅列茨科夫，布尔加宁，马雷舍夫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决议。1941年4月9日，政治局批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入国防委员会的有伏罗希洛夫（主席），斯大林，日丹诺夫（副主席），铁木辛哥，库兹涅佐夫。

(7) 梅日劳克同志

候补委员：加马尔尼克、米高扬、日丹诺夫、叶若夫诸同志。

3. 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

№02064

政治局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的决议

（1937年5月11日）

201.——关于国外出差委员会

1. 增补乌里茨基、斯卢茨基和马林科夫三位同志为国外出差委员会委员。

2. 规定凡出国（无论是常期工作还是临时出差）的同志，务必到国外出差委员会领取在国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举止须知。

3. 责成叶若夫和乌里茨基两位同志制定出详细守则并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每位出国的同志应熟悉这一守则，并在阅后签字。

№020132

联共（布）中央十月全会有关中央委员会和
政治局组成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节录）

（1937年10月12日）

安德烈耶夫：现在开始讨论议程的第二个问题。^① 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就全会第二项议程，根据政治局的建议，我提出几个问题供中央全会讨论并提出建议。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成员。六月全会^②后，至本次全会这一期间，有几名中央委员离去、被逮捕：捷连斯基（他原来是沙皇的暗探）、列别德、诺索夫、皮亚特尼茨基、哈塔耶维奇、伊克拉莫夫、克里尼茨基、瓦列伊基斯——共8人。经过对所有材料的审核，经过对材料的核实，结果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

如果没有问题，我建议将此事备案。

喊声：对，予以备案。

斯大林：在这期间内，候补中央委员中离去的、被逮捕的有16人：格林科、柳布琴科（已用枪自杀）、叶廖明、杰里巴斯（日本间谍）、杰姆琴柯、卡雷金娜、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间

① 联共（布）十月全会于1937年10月11～12日举行。主要议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增补政治局成员、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中学必须学习俄语等问题。

② 1937年6月23～29日举行。

谍）、舒布里科夫、格里亚金斯基、萨尔基索夫、贝金、罗森霍尔茨（德、英、日间谍）。

喊声：喔唷！

斯大林：列帕、吉卡洛、普图哈等 16 人。经过审核、核实所有材料，原来这些人也都是人民的敌人。如果没有问题或异议，希望把这问题查照备案。

喊声：同意。

安德烈耶夫：有人提议赞同政治局的提案。没有反对意见。

喊声：没有。

安德烈耶夫：谁赞成中央委员会这一决定，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斯大林：按我们党的习惯做法，当有人去世，或者被开除而离开中央委员会时，中央委员会成员通常由候补委员增补。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现在这样办也同样是适宜的。我们的候补委员名单是在代表大会上编制好的，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名单不是按姓氏的字母排列顺序，而是按得票多少排列顺序。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前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是合适的，他们都是谁呢？

帕霍莫夫——水运人民委员，得票最多。代表大会上得票数在其后者伊萨耶夫——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莫洛金——斯大林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布柳赫尔^①，你们对他都很熟悉。布尔加宁，你们对他也很熟悉。布林，他在军事部门工作。库利科夫，你们对他也应该很熟悉。洛佐夫斯基，你们对他也很熟悉。巴吉罗

^① 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苏联元帅，指挥过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加伦将军”。

夫——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卡罗夫，他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负责钢铁生产工作，共10人。

喊声：对。

斯大林：政治局建议通过关于将在17届党代表大会上得票最多的这些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决定。

安德烈耶夫：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赫鲁晓夫：我想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作些补充。我提一些同志，这些同志不在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按得票数多少排列的顺序之内，这些同志是党中央委员会熟悉的，他们主持重大工作，我认为也应把这些人由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普拉姆涅克，他是顿涅茨克州州委书记，顿涅茨克是个大州，大家都认识这位同志。梅赫利斯，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候补中央委员。米哈伊洛夫，是沃罗涅日州州委书记，也是一位主持重大工作的同志。乌加洛夫，他是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二书记，很早就参加工作，在这样重要的组织内担任工作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建议也把这些同志由候补中央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安德烈耶夫：全会希望……

喊声：表决。

安德烈耶夫：对政治局的提案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提案是否分开单独表决……

喊声：不是提案，是补充。

安德烈耶夫：要不与修正案，与补充一起表决。

喊声：一起。

安德烈耶夫：就是说政治局的提案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补充一起表决。谁赞成这提案，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斯大林：是可以把所有候补中央委员都转为中央委员，我们完

全有这个权力，但是首先这没有任何必要，其次中央委员会不应没有预备队，不应没有候补委员。因此范围可以只限于已通过的那个决议。

第二个问题，关于政治局的成员问题。政治局建议把叶若夫同志接纳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建议依法确认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喊声：正确。

安德烈耶夫：还有什么建议？

喊声：表决。

安德烈耶夫：谁赞成政治局的提案——接纳叶若夫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请举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No02017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 向蒙古政府贷款的决议方案的附函

(1937年11月11日)

机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依照中央委员会今年9月4日的决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出口并交付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载重汽车200辆。

现在蒙古政府请求以这些汽车的价格23.1万美元为贷款,期限5年,年息3%。

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可以满足蒙古政府的请求,请批准如下决议:

1. 以200辆载重汽车的价格23.1万美元作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期限5年,年息3%。

2.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应该用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准备金支付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按边界交货价格以苏联货币计算的上述汽车款。^①

维·莫洛托夫

1937年11月11日

^① 193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以出口汽车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建议。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办理以羊毛、牲畜和皮革抵补出口汽车款事宜。因为斯大林反对。在决议的原件上有斯大林签署的意见:“我反对。蒙古人能用肉或羊毛支付给我们200辆汽车的款项。我认为用贷款把载重汽车卖给蒙古,并且为期五年,这是一种腐败。约·斯大林”。

№02065

政治局关于发行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决议

（1938年2月26日）

3.——关于发行影片在电影院上映

（1）取消现行的为发行影片在电影院上映发放许可证的制度。^①

（2）责成由安德烈耶夫、纳扎罗夫和杜克利斯基三位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批准影片的发行。

^① 30年代初设有组织局电影委员会。1934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了这个委员会，“并委托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文化部今后审查和批准电影计划和脚本，吸引一些最好的作家来创作影片。”

№02134

政治局关于丘巴尔安排问题的决议

(1938年6月16日)

60.——关于弗·雅·丘巴尔

(1) 鉴于柯秀尔、埃赫、特·丘巴尔的供述，此外，还有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的供词，致使弗·雅·丘巴尔同志涉嫌，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不能留任政治局委员，不能留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认为，只能在省内安排他的工作以接受考验。

(2) 丘巴尔同志的具体工作问题在最近两日内解决。

№02135

政治局关于丘巴尔的工作的决定

(1938年6月17日)

78.——关于丘巴尔同志的工作

任命丘巴尔同志为索利卡姆斯纸浆联合工厂建筑工程主任。

No 02022

政治局关于审查负责干部的决议

(1938年9月20日)

57.——关于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登记、检查和确认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防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党的监察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负责干部问题

1. 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防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的下列负责干部应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确认：

(1) 各人民委员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中央机关：

国防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国防委员会和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所有负责干部，从高级职位到部门领导及其副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处处长，——到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各小组领导人及其副职，以及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的所有私人助手和秘书。

(2) 各人民委员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地方机关：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和各部门的首脑，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的、州的和区的机关首脑及其副手和这些机关各部门的首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市和区的各分部的首脑；

国防人民委员部——军区和集团军的司令员及副司令员；军区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区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军区和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和军事委员；军、师、旅的指挥员、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军事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军校校长及副校长；军事武官及其助手，企业中的军代表；

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舰队司令员及副司令员；舰队军事委员会委员；舰队（军事区舰队）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舰队空军指挥员和军事委员；舰艇支队的指挥员、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设防地区和设防扇形区的指挥员，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空军分队长，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主要军港和一级港口的指挥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海军教学中队和水下航行指挥员，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陆海军学院院长和陆海军学校校长、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特种培训班的长官和科学研究所所长、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主力舰和巡洋舰的舰长和军事委员；企业的军代表，舰船制造和军备方面的全权代表和全权代表处的军事委员。

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托拉斯经理，工厂厂长；主管招工和解雇的副厂长；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派到工厂的党委书记；建筑工程局局长；高等学校校长和科学研究所所长；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的全权代表；全权代表处的参赞、一秘和二秘；苏联总领事和苏联领事；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加盟共和国和远东边疆区的全权代表；

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党的和苏维埃的监察委员会在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和副代表；党的监

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处的党委书记；

(3) 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处长及副处长；

(4) 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处长及副处长；

(5)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处长及副处长；

2. 责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党领导机关部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领导机关内组织登记和审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审核的上面提到的干部。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按下列程序进行登记、审查和确认：

(1) 首先进行登记、审查、建立人事档案，将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首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的负责干部，这个工作在三周期限内结束。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余干部的登记、审查和批准在一个月的期限内进行。

(2) 对其他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的登记、审查和确认于1938年12月1日前结束。

3. 允许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部成立部属下列各处、科：

(1) 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和司法检察干部处，定员为15名负责干部和5名技术人员；

(2) 陆海军干部处，定员为10名负责干部和4名技术人员；

(3) 国防工业处，定员为15名负责干部和5名技术人员；

(4) 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干部处，定员为3名负责干部和一名技术人员；

(5) 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干部科，定员为3

名负责干部和一名技术人员；

（6）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干部科，定员为 3 名负责干部和一名技术人员；

（7）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干部科，定员为 3 名负责干部和一名技术人员。

№02137

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书记分工的决定

（1938 年 11 月 27 日）

5.——关于联共（布）中央书记的分工

（1）责成联共（布）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监督、监察农业机构（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2）责成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同志监督、监察共青团机关的工作。

（3）责成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同志监督、监察出版机关并向编辑下达必要的指示。

№02138

政治局关于热姆丘任娜的决定

（1939年8月10日）

33.——关于热姆丘任娜同志

（1）认为热姆丘任娜同志在人情交往关系方面表现不谨慎，不加选择，从而在热姆丘任娜周围有不少敌人的间谍分子，他们的间谍活动自然得以轻易进行。

（2）认为有必要对涉及热姆丘任娜同志的一切材料进行仔细审查。

（3）预先决定解除热姆丘任娜同志鱼品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这一措施以渐进方式实行。

№02139

政治局关于解除热姆丘任娜职务的决定

(1939年10月24日)

130. ——关于热姆丘任娜同志

(1) 认为几名被拘留者陈述的关于热姆丘任娜参与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供词正如他们发表的关于侦讯不客观的声明一样，是诽谤中伤。

(2) 认为热姆丘任娜同志在人情关系方面表现不谨慎，不加选择，从而在她周围有不少敌人的间谍分子，他们的间谍活动自然得以轻易进行。

(3) 解除热姆丘任娜同志鱼品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责成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为热姆丘任娜同志安排适当工作。

No 02140

政治局关于热姆丘任娜任职的决定

(1939年11月21日)

97. ——关于热姆丘任娜同志

(1) 解除热姆丘任娜同志苏联鱼品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

(2) 批准任命热姆丘任娜同志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品—日用小商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

№02023

政治局关于有色金属和橡胶问题的决议

(1939年12月16日)

42. ——关于有色金属和橡胶问题

未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同意，禁止从国家储备中发售有色金属和橡胶。

政治局本决议的副本面交丹琴科同志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委托沃兹涅先斯基监督此事。

№02066

**政治局关于新影片预审和
发行放映委员会的决议**

（1940年8月22日）

310.——关于新影片预审和发行放映委员会

批准新影片预审和发行放映委员会由安·安·安德烈耶夫、格·马·马林科夫、安·亚·维辛斯基组成。^①

^① 1940年8月24日政治局将日丹诺夫列入了委员会。

№02141

**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关于增补政治局
候补委员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节录）**

（1941年2月21日）

安德烈耶夫：……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问题。现在由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我们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在这里商议过，结论是最好扩充成员，哪怕是扩充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政治局里老年人不少，有些人就要离去，必须选拔出其他更年轻的人，让他们多学会一些，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以便他们接任职位。现在谈的就是必须扩充在政治局工作的人员。

具体地说，我们的意见就是最好现在补充人。现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名候补委员是贝利亚，第二名是什维尔尼克。最好增加到5人，再补充3人，让他们帮助政治局委员工作。譬如说，接纳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就不错，他当之无愧，还有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谢尔巴科夫，第三个是马林科夫。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烈耶夫：有谁想发表意见？没有人。现在对整个名单进行表决。谁赞成通过斯大林同志的提案，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人。有弃权的吗？没有。议案通过。

问题就这些，会议结束。

№02012

政治局关于加强苏维埃中央机关和 地方机关工作的决议

（1941年5月4日）

36.——关于加强苏维埃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工作的问题

一、为了使苏维埃和党组织的工作充分协调一致并在它们的领导工作中无条件地保证一致，同时当今紧张的国际环境要求尽量加强苏维埃机关在国防事业中的工作，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苏维埃机关的威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致决定：

1. 任命约·维·斯大林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2. 任命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及苏联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并留他在外交人民委员的岗位上。

3. 鉴于斯大林同志因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坚决要求，仍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不能抽出相当多的时间从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故任命安·亚·日丹诺夫同志为斯大林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助手，解除他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进行监督的职责。

4. 任命亚·谢·谢尔巴科夫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并为他保留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位。

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此项决议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咨询方式批准。

№02013

政治局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的决议

(1941年5月7日)

73.——关于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①

批准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亚·沃兹涅先斯基同志、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米·莫洛托夫、阿·伊·米高扬、尼·亚·布尔加宁、拉·帕·贝利亚、拉·莫·卡冈诺维奇、列·扎·梅赫利斯、安·安·安德烈耶夫诸同志组成。^②

① 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是依据1941年3月21日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建立的。它拥有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职权，其决议作为人民委员会决议公布。它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的季度和月份计划，预算方案和军事订货计划，随后交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批准。它还对日常问题做出决定。

② 政治局于1941年5月15日批准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进入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941年5月30日，又批准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进入常务委员会。

№02014

政治局关于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1941年5月30日）

102——关于国防委员会

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如下决议：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

1. 撤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

2. 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属陆军和海军事务常设委员会，其成员有斯大林同志（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副主席）、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①

① 政治局于1941年6月9日批准铁木辛哥和库兹涅佐夫进入军事和海军事务常设委员会。

【专题说明】

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来往信件

(1930年3月至1940年10月)

本专题选编的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来往信件，通常是留在莫斯科的委员同在南方休假的委员之间就某个事件或决议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之间的信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其次是同卡冈诺维奇的通信，主要讨论党务问题；同古比雪夫的通信，多讨论人民委员会的事务。

通过这些信件可以看出，斯大林不管在莫斯科还是在南方，始终是最高决策者。其次，可以更多地了解政治局的各种决议特别是重大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是在什么级别上进行的。第三，可以看到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前后的细微变化。当然，这些信件也是评价苏联领导人的不可替代的史料。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赵国顺、吕存亮、周绍珩翻译)

№02089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克里沃罗格区农村情况 致斯大林和柯秀尔的信

(1930年3月22日)

致莫斯科，斯大林，3月22日

致哈尔科夫，柯秀尔

我到过克里沃罗格区的两个地区——多林斯克和卡赞卡。^①农村的情况五花八门。整个区都在捣乱。在卡赞卡区，集体农庄瓦解得相当严重。数天以前这里实现集体化的农户计有95%，而今天未必还有40%。在卡赞卡大区，有14000居民，数天以前共计有95%，今天未必还有20~30%，而且留下的全是贫农。在亚历山大罗夫卡村，土地共耕社几乎全部解体，在诺沃尼古拉耶夫卡村，留在土地共耕社的不超过30~35%。扯皮的事一直继续到今天。与诺沃尼古拉耶夫卡相邻的（在距其5俄里^②处）的诺沃米哈伊洛夫卡和格里戈里耶夫卡，土地共耕社全都在播种。总的说来播种处于紧张时期——全都在播种。胡闹的主要肇事者是妇女。她们各自牵走马匹，拿走种子，吵闹不休。在这个地区，庄稼汉们也积极参与。在多林斯克地区，胡闹的人不多，有少数人声明退出，但暂时还没有解体。几乎所有的土地共耕社都在田里干活。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晚间从田里归来，妇女们跑去抓住马牵到自家的马厩里

^① 1930年3月17日，政治局派遣奥尔忠尼启则到乌克兰了解春播准备情况，帮助落实中央关于集体化运动的决议。

^② 1俄里等于1.06公里。

去。这里忙得团团转：已100%集体化了。对个别退出的人既不发给马匹也不发给种子。回答是：我们播完种然后再谈。这里还有个公社，是昨天“组织起来的”。所有的一切，直到最后一根线儿都要归集体所有。公社的一部分人大哭大叫，另一部分人要维持，不允许人离去。这个公社里的领头人是一位共青团员教师和一位从克里沃伊罗格来农村出差的工人。同“公社”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后决定：谁不愿意留在公社就把母牛还给谁，不动家禽、宅旁园地和房屋，只有按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该归集体所有的东西才划归集体。已同马尔基坦（区党委书记）商量妥当，不批准成立公社，全部归农业劳动组合。这里更紧张。甘愿改正的很少：一些人固执己见并为失败感到愤恨，另一些人张皇失措。大家对再拧在一起、再集体化都认识不清，都想将此解释成是因有富农造成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①没有下达到农民那里，而且也没有准备把一切都展示给他们。最大的愿望还是用最大的行政压力扭转局势，希望在区内枪决25~30人，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百分比，尽管群众中有些人大喊大叫，但目前运动还只限于要求——还给我们马匹，归还种子，我们不愿意加入土地共耕社，我们受到了强制性地驱赶。我认为区里的局势是严峻的。区里若有位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来的领导成员将是很有益的。如果不搞蠢事的话，在内行的灵活领导下，区能够完成播种计划。这里最糟糕的是为了追求百分比而使很多形形色色的坏蛋钻进了集体，利用我们的无组织性和弱点从内部搞破坏。已商定：不能惊慌失措，无论如何不动用武力，不允许因退出集体而逮捕人，管教住企图抬头的富农，无论如何要完成播种计划，领导好全村、集体和个体户。在区里除土地共耕社外，任何地方都没有

^① 指1930年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

转到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上来。播种用的春麦不足。必须在3~4天内为卡赞卡区补调2万~3万普特^①春麦。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某些重新配置。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的简单调动就能为更好、更慎重、更平静地工作提供可能。必须对保留下来的集体给予特别注意，帮助他们。他们之中有优秀的坚定干部，但是他们很贫穷。有关教会的任何谈话都未听到。今天夜里我来到尼古拉耶夫。会见了这里的上层领导。照他们的话说，这里的局势十分稳定。85%已集体化，都在播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没有退出土地共耕社的。白天我在村里转了一转。

奥尔忠尼启则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02090

奥尔忠尼启则
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农村情况
致斯大林和柯秀尔的信
(1930年3月23日)

经直通电报

致莫斯科斯大林

致哈尔科夫柯秀尔

尼古拉耶夫斯克区检查过的地区留下的印象很好。根据已有的资料看，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状况。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户的播种在紧张地进行。有些地方将结束春麦早播。计划将全部完成，但是有些地区因种子短缺，麦地的播种计划不会全部完成，不过将改种其他作物。区里83%已集体化。暂时只有个别的退出声明。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年已有23%转为集体，而在秋播期间有45~50%。尖锐的问题是去打短工和拉脚。根据目前的实践来看，集体农庄庄员的几乎全部收入都用来抵补集体农庄的各种花

费。我认为有关外出打短工的农民的规定^①完全有必要扩大到集体农庄以外的所有临时工作上。关于这点，这里谁也没有任何概念。用集体农庄的马匹拉脚时，集体农庄庄员留在手头的拉脚钱不少于50%。饲料奇缺，特别是精饲料。需要刻不容缓地援助。进行了秋播的尼古拉耶夫居民，状况良好。

奥尔忠尼启则

3月23日

① 由于城市中的劳动力不足，苏联人民委员会1930年3月16日应政治局的委托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地方政权机关和集体农庄的领导阻止农民外出打短工（见1930年3月19日《真理报》）。农民外出打短工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要将他们打工所挣得的工钱的相当大一部分扣除归集体农庄。1930年3月20日《真理报》做出说明，“外出打短工的集体农庄庄员所挣得的工钱的扣除额不应超过10%。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坚决禁止集体农庄规定高于10%的扣除额，也禁止从预支款项中扣除一部分归集体农庄”。1930年3月28日，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做出的关于在一些有季节性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工钱扣除程序的决定。决定重申，“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规定，从外出打短工的集体农庄庄员所挣工钱的总数中所扣除的数额为3~10%，不能多于打工者实际所挣工钱的10%”。

№01154

莫洛托夫关于鲍曼的错误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30年4月20日)

我们应当考虑鲍曼同志的态度坚决的声明^①，即他尽管对“左倾”过火分子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但他不是我们党内某条特殊路线的拥护者。

我在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的这段话恰当否？也许应当更明显地说：鲍曼没有特殊的路线，是吗？

维·莫洛托夫

^① 1930年4月18日，政治局以咨询的方式审议了联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鲍曼的声明，鲍曼在声明中承认莫斯科委员会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要求免去其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政治局指出，鲍曼实际上对背离正确路线的“左”倾过火分子表现出了调和态度。参见本卷№02091文件。

No 11678

斯大林关于鲍曼的错误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0 年 4 月 20 日)

当然，应当更明确地说；他没有特殊的路线，他本人也不是“左倾”过火分子，而只是对（或曾经对）“左倾”过火分子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①

约·斯大林

① 1930 年 4 月 22 日举行的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四次联席会议全会满足了鲍曼的要求，莫洛托夫代表联共（布）中央通报了中央关于解除鲍曼职务的决定。

№01155

斯大林关于发送格罗曼等人供词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和马卡罗夫的新供词。亚戈达已把这些供词带给我看了。我认为，应该把所有这些供词加上格罗曼的第一次供词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及我们那些最积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这是头等重要的文件。^①

握手！

斯大林

^① 1930年8月10日，政治局决定将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而遭逮捕的人的供词散发给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和候补中央监委及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

№01156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肃反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8月6日)

维亚切斯拉夫：

8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一、我反对派米尔佐扬去红色工会国际，因为我一贯反对，并仍旧反对从各州，特别是像乌拉尔这样的州里抽调人，因为这个州发展迅速，正是用人之际。^①

二、同硬币匮乏的斗争结果几乎没有什么意义。28万卢布，简直不值一提。看来，揪出几个出纳员就心安理得了。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出纳员。问题在于皮达可夫、布留哈诺夫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赞成进口白银。无论是皮达可夫，还是布留哈诺夫都曾大肆鼓吹进口白银的必要性，并在副手（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我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否决了该项决议，^②骂他们是财政破坏分子的“尾巴”。现在就连瞎子都清楚，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措施是由尤罗夫斯基（而不是布留哈诺夫）主持制定的，而国家银行的“政策”则是由那些被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政府”策动的国家银行机构中的破坏分子（而不是皮达可夫）主持制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1）

^① 1930年8月21日，政治局批准米尔佐扬担任乌拉尔州委第三书记。

^② 1930年7月20日政治局审议了有关兑换用的硬币问题并批准了副手会议的决议（进口白银一项除外）。

要彻底清洗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和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管那些行为可疑的布留哈诺夫-皮达可夫类型的共产党员怎样哀号；（2）一定要把这些机构中的破坏分子枪毙掉20~30个，包括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出纳员；（3）要继续在苏联全境进行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回笼硬币（银币）的战役。^①

三、我认为对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萨德林一案应当十分认真地侦查，不要着急。该案非常重要。该案的全部文件应当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我相信，这些先生与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索柯里尼科夫和泰奥多罗维奇）定会暴露出来。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和另外两三个坏蛋一定要枪毙。

四、一定要把破坏肉食品供应的整个破坏分子集团都枪毙掉，并将此消息在报上公布。

五、你们真的决定现在就发行镍辅币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此事需缓一缓再说。^②

六、真的从英国进口了很多皮鞋（花掉几百万卢布）吗？如果真是这样，这是错误的。

七、美利坚合众国允许进口我们的木材，这很好。^③ 我们的坚

① 1930年8月20日，政治局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加强与投机分子和窝藏兑换用硬币者，其中包括苏联合作社机构中的窝藏者的斗争。”

② 1930年8月20日政治局否决了鲁祖塔克委员会提出的铸造镍币的提案。

③ 1930年美国对苏联出口的火柴、木料、无烟煤、锰矿实行限制政策。1930年7月25日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宣布对从苏联进口的木材实行禁运。7月28日禁止从苏联进口的两轮船木材卸货。在苏方和美国一些大公司的抗议下，美国财政部取消了禁运。但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对苏联商品的抵制后来一直存在。这些国家指控苏联政府使用强制劳动及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一些低于成本价的商品。

定立场取得了成果。对波格丹诺夫的处理暂时等等再说。^①

八、同意大利的条约^②——大有好处。德国也会步其后尘的，顺便问一下，德国贷款一事怎么样了？^③

九、请竭尽全力加紧粮食出口。这是当前的关键。如果我们把粮食运出去，贷款也就有了。

十、请注意斯大林格勒和彼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事态。^④ 那里的情况不妙。

就写到这儿，握手！

斯大林

① 1930年7月30日政治局审议了“关于波格丹诺夫证词”的问题，要求他对“美国贸易股份公司”的状况进行书面汇报。1930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美国贸易股份公司”的决议。在决议中指出，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查明在美国的石油以及其他定货方面有很大一部分多付款项，要采取措施以“根除上述不足之处”。

② 苏联政府和意大利政府间关于按优惠条件购买意大利工业品的协定于1930年8月2日签订。

③ 1931年4月14日，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的谈判结束，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德国工业代表之间签订了德国给苏联提供大量的订货并为此向苏联提供大量贷款的协定。

④ 1930年8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格勒和普梯洛夫工厂的拖拉机生产问题，在决议中强调，一定要完成1930/1931年度的工厂生产计划。成立了以李可夫、古比雪夫、奥新斯基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讨论采取实际行动履行这一决议。后来，斯大林格勒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作问题不断提到政治局审议。

№01157

斯大林关于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管辖西伯利亚的两部分时，西伯利亚人不声不响，从未要求撤换埃赫，而如今，当西伯利亚一分为二，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的工作区域缩小了一半（也就是说减轻了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工作），^①埃赫却突然变得“不胜任”自己的任务了。对于这件事，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得很吗？我不怀疑，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即欺骗中央和建立“自己的”、团伙式的边疆区委员会。我提议将所有的阴谋家首先是克利缅科（乌克兰式的阴谋“手段”）及巴佐夫斯基、利亚斯库特金、库兹涅佐夫之流统统开除出去，并给予埃赫以充分的信任，以便今后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不敢再诬蔑诚实的工作人员和欺骗中央。^②

二、一定要全文发表（在《真理报》上）共中央关于阿塞拜疆的决议。外高加索的滑头们在自己的决议（已经发表）中竟把吉卡

① 1930年7月西伯利亚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从西伯利亚和远东边疆区中分出东西伯利亚边疆区。

② 1930年7月末，联共（布）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常委库兹涅佐夫、巴佐夫斯基、叶戈尔、克利缅科和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利亚斯库特金等人致信斯大林，批评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埃赫并提出尽快将其取代的问题。1930年8月19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声明。克利缅科、库兹涅佐夫、巴佐夫斯基和叶戈尔因“无原则的派别主义和非党行为”而受到申斥，并被撤职。

洛说成了主要责任者（因为他排在被撤回者名单的前列），而主要责任者（阿马斯等人）却成了次要责任者，就差说他们是吉卡洛的学生了。为了粉碎这一花招（欺诈），应当发表联共中央的决议。^①

三、政治局把迈科普从格罗兹尼分出去，做得完全对。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附言：我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约·斯大林

1930年8月13日

^① 关于阿塞拜疆党内状况的问题，1930年7月20日和8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审议，在决议中说：“在积极分子的上层谣言四起，无原则的派别主义、相互之间暗中放冷箭，致使组织队伍道德沦丧，败坏了党的、苏维埃的及经济合作机关的良好工作作风……吉卡洛在初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纠正……暴露出的不足，但他在团结积极分子的基本部分以便更加顺利地展开阿塞拜疆党的工作方面做得很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集团活动妨碍了他的工作）。”吉卡洛、巴吉罗夫、阿马斯被从阿塞拜疆的工作岗位上召回。

№01158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肃反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8月2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国家工业10个月总计增长26%（不是32%）。这个结果不妙。你谈了相应的工业财务计划和中央的号召。^①我认为，只要能达到30~32%的增长率，什么都可以干。我担心现在说这些已为时过晚，——反正10月份（年底）以前是不会作大的修改了。或许可以试试看？也好，试试吧。看来，应该试一试。

二、我们还剩下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出口粮食：从10月底起（或许早一些）美国粮食将开始大量上市，我们很难竞争过美国。如果我们在这一半月内不能出口1.3~1.5亿普特粮食的话，那我们的外汇情况将会非常不妙。再说一遍：必须全力以赴加紧粮食出口。

三、一定要把苏汉诺夫、巴扎罗夫和拉姆津抓起来，应该试探一下苏汉诺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因为她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家里发生的丑事。应该无一例外地将全部供词（不管是主要供词还是补充供词）分发给中央委员。^②加里宁是有罪的——对此不可能有怀

① 1930年秋通过了相应的工业财务计划。1930年9月3日公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号召，提出以突击的方式组织劳动以弥补许多还没有全面完成的计划。

② 1930年9月6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苏汉诺夫等人的补充供词分发给中央委员。

疑。供词中有关加里宁的一切情况全都属实。所有这一切必须通报中央，使加里宁今后不敢再和那些奸徒来往。^①

四、我收到了奥新斯基关于汽车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所的信。奥新斯基不对。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理由将由克利门特^②转告你。奥新斯基真是个无耻之徒。^③

五、附上关于马里乌波尔冶金工厂的剪报。^④算下来这已是可恶的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第四次的挑拨行为了。可不可以好好地惩罚一下罪犯呢？

（载于1930年8月23日《真理报》）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① 被捕的康德拉季耶夫供出了与加里宁会面一事。康德拉季耶夫将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也列入了那些可以进行交谈以获取有关政治形势和党内事务信息的人之列。加里宁委托自己的同事查清他与康德拉季耶夫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接触。1930年10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寄给在南方休假的加里宁如下的一封信：“你要的材料，我已经通知人在下次把你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速记记录寄给你。你只是在那里提到了康德拉季耶夫。我们今天就各大报纸上所刊载的那份报告以及你的‘供词’寄给你”。

② 即伏罗希洛夫。

③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奥新斯基的信谈到了有关如何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争论。

④ 1930年8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报，简报说，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管理委员会审议了新马里乌波尔工厂的方案，它被称为苏联最大的冶金工厂，生产81.6万吨生铁和110万吨钢。

No01159

斯大林关于经济和人事安排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24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你将国家银行及其“领导人”置于专门的监督之下，这太好了。我们早就应当做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了。显然，卡克滕和卡尔克林没有给国家银行的工作带来任何新气象。至于皮达可夫，从各方面来看他依然故我，仍是一个管着糟糕的专家（或专家们）的同样糟糕的人民委员。他成了他那个机关的俘虏。需要通过实践，通过日常工作，通过“小”事来认识一个人。瞧，皮达可夫以他在货币（和信贷！）管理的实际工作让大家完全认识了他，认识了他这个管着糟糕的专家们的糟糕的人民委员。应当跟你说一下，像这一类型的从事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现在对我们危害最大。

结论。应当撤掉他。应当派其他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代替他。10月份我们再议。

二、米高扬告诉我，说收购工作在加快，每天出口100万~150万普特粮食。我认为这还不够。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① 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等）就有落空的危

^① 1930年8月30日政治局通过决议：“鉴于必须立即最大限度地加快粮食出口，责成商业人民委员部保证9月份每天运往国外的粮食不少于300万~400万普特。”

险。有些自作聪明的人主张等一等，等国际市场上的粮价达到“最高点”时再出口。商业人民委员部中有不少这样自作聪明的人。应当把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赶走，因为他们在把我们引入陷阱。如果要等，就必须有外汇储备。可我们没有。如果要等，就必须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占有可靠的一席之地。可我们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已经好久没有任何位置了，——我们现在只能利用当前出现的对我们特别有利的条件去争取一席之地。

总之，必须大大加快粮食出口。

三、米高扬提请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负责人。洛莫夫不同意，因为他已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俄石油辛迪加生产局负责人。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洛莫夫考虑得更多的是辛迪加（石油联合企业）内部如何舒适的问题，而不是加快出口的问题。最好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的负责人。全苏石油出口联合公司出了毛病，应当进行整治，该公司现领导人不称职。^①

四、还是应当撤换腐败透顶的图曼诺夫。^②难道中央会指望他在法国的环境中能改造过来吗？

五、跟中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

六、“连纳—戈尔菲茨”^③ 情况如何？

① 1931年1月18日组织局任命里亚博沃尔为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1931年1月20日政治局审议了石油出口的领导问题，并通过了决议：“收回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的石油出口权，将石油出口权转给外贸人民委员部，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机关中从事石油出口的工作人员转到外贸人民委员部。”1931年1月25日里亚博沃尔被任命为石油出口的负责人。

② 1930年11月25日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解除图曼诺夫的驻法商务代办一职。

③ 连纳—戈尔菲茨是一家英国股份公司，1925年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阿尔泰等地开采黄金、铜、铁等金属矿的租让合同。1930年初，连纳—戈尔菲茨在仲裁法院向苏联政府提出诉讼。1930年政治局不断审议“连纳—戈尔菲茨”问题。

我有些不舒服（咽喉炎！），但很快会好的。
握手！

斯大林

还有，我差点儿给忘了。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一件“小事”，即商业人民委员部目前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委员部之一（如果不是最复杂的人民委员部也是最复杂的人民委员部之一）。可情况怎样呢？领导该人民委员部的人不胜任工作，而且一个人要胜任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应当撤换米高扬，而这尚未得到完全证实；或者应当给他配几名得力的副手，这大概是不会引起异议的。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令人不解，为什么我们不能马上说了就做？为什么？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把罗森戈尔茨（除了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能从哪里找到得力的人呢？）给米高扬，以取代欣丘克这个领导对外贸易工作极不称职的人呢？还需要提出哪些证据来证实欣丘克不称职呢？是为欣丘克感到惋惜吗？而事业才是更值得惋惜的。是不愿意得罪谢尔戈^①吗？那事业，重要而庄严的事业就可以得罪吗？^②

我提议（正式地）：

1) 任命罗森霍尔茨同志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主管

① 即奥尔忠尼启则。

② 1930年9月10日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同一决议任命欣丘克为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经理，免去其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之职。但9月15日政治局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任命欣丘克为驻柏林全权代表。1930年11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改组问题获得了解决。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分成了两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供应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被任命为供应人民委员。

对外贸易)，并解除他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2) 解除欣丘克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其为莫斯科苏维埃乌汉诺夫的副手或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主席。

如果谢尔戈叫起来，我们就把西伯利亚的克利缅科给他。罗森霍尔茨则无论如何也要调到商业人民委员部去工作。应当整治好商业人民委员部。继续等待就是犯罪。

约·斯大林

1930年8月24日

№02092

莫洛托夫关于人事安排和经济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0年8月29日)

亲爱的谢尔戈！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的事，对你夸大了。无论如何直到提出有关斯拉文斯基和罗森霍尔茨问题的时日止，没有过这种敲诈勒索。还是把一些人送到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最近这一周，把若干人派到罗捷曼和其他人处。

当然，最主要的是有关罗森霍尔茨的事。必须选用他去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你非常了解，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外贸部门没有领导。罗森霍尔茨熟悉这事（也熟悉这方面的用语），无疑是合适的人选。尽管有些可惜，但不得罪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谁能替代他？可能是克利緬科、扬松、阿拉洛夫或还有什么人适合做这事？我想来想去，认为我们是能够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你信中关于卡冈诺维奇的事——他需要休假到9月15日，我

^① 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问题是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提出的。1930年8月24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提议任命罗森霍尔茨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参见前一份文件）。1930年9月10日政治局任命罗森霍尔茨为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0年11月15日政治局做出决定，将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分为供应和外贸两个人民委员部。米高扬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供应人民委员。

是同意的，两三天前我已给他拍电报谈到此事。^①

如你所写，已给格鲁吉亚人调拨 10 万普特小麦。没有玉米。

我们的事情进行得不太顺利。据说工业财务计划完成了 94%。这真可耻。我认为必须提请中央委员会照一月计划的方式激发人们努一把力提高这个百分比，支持“响应工业财务计划”的思想等。

关于整顿货币流通的斗争，我们的财政机关无所作为。当然，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在没有为事业和路线进行斗争的情况下，顺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潮流漂浮，幻想着新的硬辅币、进口所需的商品、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真正地为工业财务计划、为消灭信贷的混乱现象（因超过拨给预算款额，在夏季几个月内就发放了 7 亿多卢布）进行斗争，没有通过我们所拥有的渠道动用资金等。现在我们要努力改进这些事。^②

在工厂里稳定劳动力的问题很尖锐。夏天有很多东西被疏忽

① 1930 年 9 月 5 日政治局将卡冈诺维奇的假期延至 9 月 15 日。

② 加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结果是，加剧了经济危机，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政系统紊乱。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纸币贬值，内含白银的硬辅币的需求量增大。居民们喜欢将零钱放在蓄钱罐里，辅币不足成了严重的问题。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布留哈诺夫）和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皮达可夫）为了稳定货币体制，克服危机，建议加大硬辅币的生产（首先依靠进口的白银），将追加的商品储备投放市场，订购轻工业原料等。这得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一定支持。根据布留哈诺夫的提议，1930 年 7 月 18 日副手会议决定扩大铜币铸造量，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关于恢复在国外订购白银的费用的提案，要求额外拨款 400 万卢布，同时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恶意收购银币和进行银币投机作坚决的斗争”。但是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否决了用进口的白银额外造币的提案。8 月初，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这事：“问题在于皮达可夫、布留哈诺夫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要彻底清洗财政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国家银行，一定要这些机关中的破坏分子枪毙掉 20~30 个，继续在全苏推行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回笼银币的战役”。（见本专题文件 No01156）在随后的几个月斯大林的这些要求得到了执行，布留哈诺夫和皮达可夫被免职。

了，现在又慢慢地活跃起来。

好啦，好好休息吧。向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问候，紧握你的手。

你的 维亚切斯拉夫

8月29日

No01160

斯大林关于十月中央全会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底)

维亚切斯拉夫：

上一封信收到了。

一、我无条件地主张把集体合同从1月改为10月。这件事不能拖延。^①但根本不需要为此召开中央全会。

二、我反对将中央全会改在10月初召开。为了把中央全会改在10月初召开，(最迟)应在9月中旬得到控制数字。显然，控制数字在此时是不可能准备好的。此外，问题不在于全会和全会的新决定，而且我们的决定也太多了。问题更不在于发布新的“号召书”和“呼吁书”：每一期《真理报》都有“号召书”、“呼吁书”。现在问题在于积极而经常地进行监督，在于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只要我们还未组织好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就会很差，这意味着计划的执行工作也会很差。我认为，在提前召开全会的问题上，我们最多能将全会改在10月末召开，而且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苏维埃机关能在10月初将控制数字完全准备好。

三、你对于乡镇协作社章程及报刊上的有关宣传的看法过于肤浅。请注意，这个作为新东西而抛出来的倒霉的章程，其意图在于

^① 1930年9月10日政治局做出决定，新的集体合同应当从10月1日起生效，其内容应与完成经济计划密切挂钩。

用它同“旧的”东西即农业合作社章程^①相抗衡。同时，乡镇（新）章程的核心是力图给予个人以“改善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可能性。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国的集体农庄运动方兴未艾，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的自作聪明的人却想绕过集体农庄问题，一门心思去“改善个体农民经济”！我认为，右倾分子在这里抛出乡镇合作社章程，是在进行某种报复，而中央的人由于埋头于工作，却没有看出这个阴谋。

四、关于全会日程问题我已在密码电报中向你谈了我的意见。我认为，中央全会只有不再就泛泛的问题做出泛泛的决定并听取工作最差劲的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总结！）报告，对事情才会有好处。现在对工人的供应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全会是无法绕开这个问题的。应当将消费合作社来个大换班，并将官僚主义者从其中驱逐出去。应当对肉类的供应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有关经济组织进行整治。这就是我对日程的建议。^②

五、最好派欣丘克去柏林。他是个经济工作者，他去那里比苏里茨的作用大，因为苏里茨对经济问题没有经验。土耳其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地方，苏里茨去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认为，把他从那里召回将是一个错误。会找到去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工作的人的（弗里德里希森、扎尔马诺夫——现任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副手）。^③只要有粮食，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工作就能搞好。

六、我建议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卡冈诺维奇作为民用航空

① 乡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章程刊登在1930年8月30日的报纸上。

② 1930年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日程中有4个问题：193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供应人民委员的总结报告和工农检察院关于肉和蔬菜供应的副报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关于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的报告及工农检察院的副报告、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报告。

③ 1930年9月10日苏里茨被任命为驻德国全权代表。

总局局长的人选。^①

七、任命罗森霍尔茨一事办得怎么样了？^②

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我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① 1930年10月15日，政治局批准戈里茨曼为民用航空联合总局局长。

② 1930年9月10日罗森霍尔茨被任命为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01161

斯大林关于防备波兰进攻 和生产面包房设备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日)

维亚切斯拉夫：

请注意（目前）以下两个问题：

一、波兰人无疑会组织（如果尚未组织的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联盟，目的在于向苏联开战。我认为，它们在还没有组成这个联盟之前，是不会向苏联开战的，——因此，这个联盟一旦组成，——它们就会开战（借口总是能找到的）。为了保证我们能击退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波罗的海人，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能扩编（在战争爆发时）不少于150~160个步兵师，也就是说比我们现在的设想多（至少）40~50个师。这就是说，要把目前和平时期我国军队64万人的编制扩大为70万人的编制。不进行这一“改革”就无法保证（在波兰人与波罗的海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列宁格勒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防卫，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进行这一“改革”，我们就一定能保证苏联的国防立于不败之地。但进行“改革”需要不小的一笔钱（更多数量的“枪炮”，更多数量的技术装备，增加指挥人员的数量，增加被服供应和粮食供应的支出）。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我认为，需要增加（尽可能地）伏特加酒的生产。应当去除不该有的愧疚感，并直接、公开地去争取

最大限度地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以使我国的国防得到真正和认真的保证。因此，应当马上考虑这件事，为生产伏特加酒储存相应数量的原料并将其正式列入1930~1931年度国家预算。请注意，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也需要一大笔钱，为此又得在伏特加酒上作文章。^①

二、我们需要大量的筑路机械，面包厂设备和洗衣房设备。生产这些东西——事情并不复杂，我们的工厂完全可以做到。但谁也不愿意干（认为是“小东西”），结果我们不得不动用外汇。乌汉诺夫想抓这件事，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让他干，该委员会占着茅厕不拉屎，自己什么都不干，也不让别人干。必须结束这种乱七八糟的状况。请你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并责成乌汉诺夫（莫斯科苏维埃）立即着手生产面包厂设备和洗衣房设备（以及筑路机械）。这势必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但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们想使事情有所进展的话。^②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刚刚收到中央关于工业财务计划的《号召书》和中央关

① 1930年7月2日，政治局否决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提高伏特加酒价格的议案。1930年9月15日，政治局做出决定：（1）鉴于城市和农村伏特加酒的明显短缺，排长队购买伏特加酒的现象增多，投机活动猖獗，苏联人民委员会提议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增加伏特加酒的生产量。责成李可夫亲自监督本决议的执行情况。（2）通过了1930/1931年度酿造9000万维德罗酒精的计划。（维德罗，俄国液量单位，等于12.3升。）

② 政治局1930年9月25日组成了一个由古比雪夫、乌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以研究所有这些问题。1930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筑路机械》的决议中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

于贯彻《号召书》的实际措施的《决定》。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好了。^①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日

^① 1930年9月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公布“关于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号召书。

№01162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和宣传集体农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我同意，托姆斯基“辞职”，因为他在化学工业方面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①

二、只有在我们准备将康德拉季耶夫“案件”移交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才适宜在报刊上对该“案件”做出解释。我们是否准备这样做呢？我们是否认为需要把“案件”移交给法院审判呢？看来很难撇开法院。

顺便提一下：那些被告先生是否打算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从政治上把自己骂一通，同时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承认集体化的方法是正确的呢？但愿如此。

三、我同意追究那些帮助过格罗曼—康德拉季耶夫分子的共产党员的责任，但对李可夫（他无疑帮助过他们）和加里宁（显然他是被泰奥多罗维奇这个卑鄙的家伙牵连进这个“案子”的）怎么办？对此应该考虑一下。

四、终于使国家银行和烂透了的财政人民委员部里的那些“自由射手”起来揭发了。这太好了。卡尔克林、卡克滕和其他人在国

^① 1929年托姆斯基被任命为全苏化学工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1930年9月6日政治局满足了托姆斯基以患病为名要求免去其这一职务的请求。9月25日戈里茨曼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10月15日皮达可夫又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

家银行都干了些什么？难道在所有的问题上大家都对皮达可夫随声附和吗？我认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检查和打击之后，必须依靠这两个机关来改组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上层领导。

五、我认为，大张旗鼓地公布乡镇协作社新章程并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是错误的。这样做让人觉得是在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来对抗“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这样做使人产生了从“拥护农庄！”的号召退到“拥护乡镇协作社！”的号召的错觉。莫斯科是否打算这样做，——已经无所谓了，实际上让人觉得是要用非驴非马的和凭空虚构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乡镇协作社”来取代意义重大的和胜利在握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集体农庄”。而且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我认为这种想在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刻拉我们后退的企图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并削弱加入集体农庄的势头。我已经就这个问题给你发了一份电报，也许不应当发这份电报，但请你不要为此而骂我，因为我觉得，把我的意见越早告诉你越好。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但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可以立即开始给整个这场“乡镇协作社”闹剧逐渐刹车。我认为，应当，第一，给各州委和各区下一个内部指示，告诫不要迷恋于乡镇协作社，不要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偷换“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加入集体农庄运动上来；^① 第二，用“加入集体农庄”口号的精神武装《真理报》和我

^① 1930年9月24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致各个边疆区委、州委和各个共和国的党中央有关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信的草案，在信中特别谈到：“中央警告在个别组织中出现了—种错误倾向，以农业协作社偷换了劳动组合组织。在一些农业集体化运动比较薄弱的地区恢复了农业协作社。必须展开顽强而坚定的工作，组织作为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运动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

们的所有报刊，责成它们每天和一贯地至少拿出一版来刊登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报道，刊登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经济的报道，并且要把这些报道、通讯、来信等刊登在显要位置上，而不能用小号字刊登在犄角旮旯里。总之，要在报刊上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运动的运动，因为集体农庄运动如今已成为农业建设的一个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因素。

好了，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2日

№01163

斯大林关于修建北方运河和 使用囚犯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7日)

维亚切斯拉夫：

谈两个问题：

一、听说李可夫和克维林不顾政治局的决议，想要扼杀北方运河的修建。应当制止他们并给他们一个教训。最大限度地削减财务计划是应该的，但扼杀这件事却是犯罪！

二、据说想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挑出一批刑事犯（三年以上）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烂透了的托尔马乔夫的阴谋。李可夫极力讨好瑟尔佐夫，也提出过某些意见。我认为，政治局的决议应当执行，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应当关闭。^①

^① 1929年6月27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使用刑事犯劳动》的决议。决议规定，被判剥夺自由3年或3年以上者转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的劳改营。为了接纳这些刑事犯决定扩大现有的劳改营并组织新的集中营（在乌赫塔及其他边远的地区），“以便利用被剥夺自由者的劳动来开发这里的自然资源”。被判剥夺自由1到3年者仍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用于农业和工业垦殖区的工作。但是，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把处以“三年”监禁的囚徒转交给劳改营的规定实行抵制，而是竭力将这些囚徒用于自己的经济部门。1930年8月初，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希尔温德特上书政府，要求重新审议关于必须将囚徒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的决议。这一要求得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瑟尔佐夫的支持。1930年8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副手会议决定：“被剥夺自由3年以上者，如果他们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农垦区或工厂使用，就应把他们留给它们。”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7日

（接第155页注释①） 1930年10月5日，也就是在收到斯大林的信之后，政治局重新审议了《关于使用刑事犯劳动》问题，并做出决定，“仍旧维持政治局1929年6月27日的决定”。

1930年12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解散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其职能转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领导民警局和刑侦处的活动。

No01164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必须立即将那些破坏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的破坏分子的全部供词公之于众。我们为什么不公开这些供词，干吗要“保密”？应当把它们公之于众并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已将此案移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该机构在我们这里类似于法庭）处理，一星期后再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名义发布消息：所有这些坏蛋都已被枪决。应当把他们统统枪决。^①

二、还应当将“英国国家情报处”的间谍尼安德、戈登、邦达

① 1930年9月20日，政治局通过《关于破坏肉类及其他供应的破坏分子》的决议，在决议中说：“1）有必要立即公布在肉、鱼、罐头和蔬菜供应方面从事破坏活动的破坏分子的供词；在这份文件后附上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简短引言，指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已做出决定，把这一案件转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议；

2）刊登一些文章，讲清这一案件的实质，指明这伙反革命匪帮的活动已经被完全揭穿了，现在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纠正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后果。9月22日的主要报纸应用了二页半的篇幅登载这一材料；

3）责成由明仁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李可夫和波斯特舍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公布前审查要公布的材料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引言文稿；

4）5天后公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破坏活动组织的所有参加者所做出的枪决判决。”

所谓“工人供应破坏分子”组织的成员的供词刊登在1930年9月22日的报纸上。10月25日，报纸公布消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会议将48名“工人供应的破坏分子”处以枪决，判决已经执行。

连科、阿克尔曼、博布罗夫希科夫等人关于维克斯公司的职员搞破坏活动，一些人（杰克逊、洛曼斯、利普等）策划爆炸、纵火和破坏我们的工厂和建筑物的供词公之于众。为什么要将这些丰富的材料保密呢？现在，在将要同英国人谈判债务和租让问题的时候，公布阿克尔曼等人的供词，货真价实的供词（作为不容置疑的文件），对我们尤为有利。可以在破坏肉、鱼等的供应的破坏分子的供词公布5天之后再公布这些文件（经过精心准备）。目前，可以只公布文件，而不发布审判或枪决的消息。

三、当然，第一批和第二批供词的公布都不应当是“随随便便地”，而应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司法人民委员部）写一个前言并由我们的报刊做出一定的说明（这种说明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把一切情况都查清了，我们对资产阶级及其纵火强盗和所有破坏分子的阴谋一清二楚并给了他们狠狠的打击）。阿克尔曼及“英国国家情报处”的其他英国坏蛋的供词很可能会对波克罗夫斯基、斯特里若夫等人原先的供词有所补充。

四、关于柳亭我已给你发了密码电报。^①

五、我们苏维埃中央领导班子（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副手会议）患了绝症。劳动国防委员会从务实的和战斗的机关变成了无聊的议会。人民委员会被李可夫那些空话连篇、实质上是反党的讲话搞得瘫痪了。原先是李可夫—索柯里尼科夫—舍印曼司令部的副手会议，现在有可能变成与党中央对抗的李可夫—皮达可夫—克维林或博哥列波夫（我看不出后两个人之间有多大差别）的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斯大林的这封密码电报。1930年9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审议了党中央候补委员柳亭案件，指控柳亭说了斯大林的坏话。涅莫夫向联共（布）中央递交的声明是这一指控的基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将柳亭开除出党。1930年10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同样的决议。柳亭很快就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而被逮捕。

司令部。显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采取根治的办法。至于采取什么办法——待我回莫斯科后再告诉你。而眼下要密切注视皮达可夫这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索柯里尼科夫第二），他现在是李可夫—皮达可夫联盟中危害最大的人物，代表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者的康德拉季耶夫式失败主义情绪。要是能让谢尔戈和米高扬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就好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同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一起能够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副手会议中把李可夫和皮达可夫孤立起来。

六、我的身体现在非常好。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01165

斯大林关于经济状况的 宣传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13日)

维亚切斯拉夫：

对今天的信作如下补充：

一、我认为，对柳亭不能只是开除了事。应当在开除后过一段时间将其放逐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必须彻底打垮这个反革命魔鬼的斗志。

二、我已同甘申谈过了。我认为，从为生产汽油而增加裂化装置的数量这一角度来看，一定要在9月份将石油问题提交政治局。没有石油我们将陷入困境。拖到10月份就晚了。^①

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取缔那些像老鼠般吱吱尖叫，说什么“普遍歉产”、“接连失败”、“挫折不断”等等胡话的刊物。这是歇斯底里的托洛茨基右倾分子的腔调，这种腔调已被材料证明是不正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叫喊得最凶的是《经济生活报》、《真理报》、《工业化报》和在某种程度上的《消息报》。这些报纸抱怨速度“下降”，“工人向农村倒流”，而不解释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工人怎么会一下子“突如其来地”向农村倒流，这种“灾难性的”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食品供应不好？但是难道去年的供应就比今年强吗？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这样的流动，没有

^① 1930年9月25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有关发展苏联裂化装置生产的提案提交政治局审议。在1930年10月5日政治局基本上赞同了这一提案。

向农村倒流呢？工人去农村是为了参加收获，是为了不让集体农庄在分配收成时漏掉他们，是为了在集体农庄当众人之面劳动上一两个月，以此保证自己有权享有集体农庄一份完整的口粮，这些难道不清楚吗？为什么不写这些东西，而只是张皇失措地叫喊？顺便说一句，中央的《呼吁书》也忽略了这个因素。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13日

№01166

斯大林关于李可夫等人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0 年 9 月 15 日)

维亚切斯拉夫：

刚刚收到了你的来信。

一、政治局向李可夫及其一伙发起进攻，这太好了。尽管在这件事上似乎没见到布哈林插手，但他无疑是煽风点火和教唆反党的主谋。显然，在苏汉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这一伙人中间，他（布哈林）是“极左分子”，他在这伙人中间感觉比在联共中好，他在联共中只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失败主义者和苟延残喘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应当把博哥列波夫赶走。^①但事情不能到此为止。还应当把博哥列波夫—格罗曼—索柯里尼科夫—康德拉季耶夫的学生们赶走。这么说来，应当把李可夫及其一伙儿也赶走。现在这是不可避免的。再也不能让这些腐败分子留在苏维埃—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了。但这件事暂时只限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要告诉别人。

二、政治局关于收购工作的指示非常好。收购工作定会成功。^②

① 1930 年 11 月 30 日政治局通过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的“免去博哥列波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工作”的提案。

② 1930 年 9 月 15 日政治局批准了粮食收购指示。指示中指出，1930 年的收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苏联时期）的收成。谷物的商品率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联共（布）中央决定将全苏的收购计划提高 1.17 亿普特，这样就可以使年度收购计划达到 15 亿普特。也批准了各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对早已经确定的收购计划的增加额。

三、我认为，以谢苗诺夫替换阿莫索夫，将对工作有所改进。

四、休假一事你还得再等一等。你不在那里（政治局）将非常困难。我将在10月中旬回到莫斯科。即使你不能在这之后再休假，那至少应等谢尔戈回来。否则情况将变得非常困难。

五、伏罗希洛夫怎么样，他回来了吗？代我问他好。

握手！

斯大林

附言：如果李可夫及其一伙胆敢再次蠢蠢欲动，就给他们以迎头痛击。我们对他们过于宽容。现在对他们宽容——就是犯罪。

再附言：我建议将库兹涅佐夫（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声明^①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声明。1930年12月5日，在决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问题时政治局做出决议：“免去库兹涅佐夫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因为他已经调任其他工作了。”

No01167

斯大林关于领导班子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2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我认为，必须在入秋之前彻底解决苏维埃领导班子的问题。届时将同整个领导人的问题一起解决，因为党的领导人和苏维埃领导人是交叉兼职、分割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如下：

1. 必须免去李可夫和施米特的职务并取缔他们的整个官僚主义的咨议性秘书机构；

2. 你替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必须这样做。否则苏维埃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就会脱节。只有这样安排我们才会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班子，这无疑会加倍增强我们的力量；

3. 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从一个清谈机关变成一个战斗的、有作为的经济领导机关，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大致减少到10~11人（主席、两名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财政人民委员、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陆军人民委员、商业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

4. 应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它的惟一的目的是对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它有权直接对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士的官僚主义、不执行或无视中央决定的行为、组织不力、经营不善等等情况立即追究责

任。该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享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首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检察院和印刷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没有这样一个有威信的、雷厉风行的委员会，我们就不可能打破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的铜墙铁壁。没有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改革，中央的指示往往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最好由谢尔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来担任。

这样一来，苏联人民委员会将总共拥有三个主要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5. 现在的副手会议应予撤销，人民委员会主席同他的副手开会（吸收某些工作人员）可由其自行酌定。

所有这一切暂时仅限我们两个知道，详情等秋天再谈。目前先在亲密朋友的小范围里考虑一下此事，并将不同意见告诉我。

二、乌拉尔的情况不妙。矿场上的矿石堆积如山，却没有运输工具将矿石运出来。没有铺设铁路专用线和厂内支线所需的铁轨，——这就是整个症结所在。为什么就不能把乌克兰或其他地方新上的铁路建设项目停上一年，腾出200~300俄里的铁轨并把这些铁轨立即交给乌拉尔呢？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而这就可以使乌拉尔的冶金工业摆脱对马匹、燕麦等鬼东西的依赖（要命的依赖！）。你能否催一催呢？

为什么柯秀尔还未动身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三、罗森霍尔茨来找我。请求帮他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而不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我答复说，我争取让他留在商业人民委员部。他听后请求帮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带三四个工作人员去（苏金、别连基（工程师）、伊兹拉伊洛维奇，还有一个人，他的姓我想不起来了）。我答应支持他并说我将把这件事告诉你。

四、康德拉季耶夫“案件”暂缓移交法院。这样做并不完全保险。等到秋天再解决这个问题。10月中旬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题。我有几点相反的看法。
暂且就写这些。
握手！

斯大林

1930年9月22日

No01168

斯大林关于工人管理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8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我9月22日的信收到了吗？这封信我是通过亚戈达发的。我在信中顺便提到建立“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谢尔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一职，你就应当担起这一职务，而谢尔戈则可以做你的副手，负责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我认为对于改善我们机关的工作，对于反对简直要把我们吃掉的官僚主义，这样的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

二、然而“执行委员会”只涉及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将其打击锋芒对准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完全将我们的建设事业引上正轨，还应当抓一下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我指的是企业中的“流动”、是“跳槽者”，是劳动纪律，是固定工人骨干的减少，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工人供应的组织工作。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工人按照竞赛原则诚实劳动，另一些工人（大多数）则胡乱瞎整和“跳来跳去”，而且对这些人的供应同对诚实劳动的人一样（甚至还要好），他们在休假、疗养、保险等方面享有同诚实劳动的人一样的优惠条件。这难道不是胡来吗？要知道这样做会毁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的整个现实基础！除了这种胡来以外，我们还时常从生产一线抽调（“提拔”！）较有创造精神的工人并把他们随便往哪个办公室一塞，而他们在他们所不习惯的环境里

苦闷得要命，这样一来，生产一线的骨干工人被掏得一干二净。这就是说，我们再次破坏了竞赛的基础，削弱了骨干工人的队伍。

现在继续这样干下去——就是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采取哪些措施呢？

应当：

1. 把对主要的、有决定意义地区（名单另定）的工人的供应物品**集中起来**并对这些地区的合作社机构和商业机构按照迅速和充分供应工人的原则**进行改组**（如有必要——则解散这些机构并重组），把这些地区置于中央委员（名单另定）的特别监督之下；

2. 在**每个企业推选突击手**，并在食品、服装和住房方面对他们**充分和优先供应**，保障他们充分享有保险方面的一切权利；

3. 将非突击手分为两部分，分为在**本企业工作1年以上者**和工作1年以下者，对前者的食品和住房供应排在**第二位**，并**全额供应**，对后者——排在**第三位**，并按打了折扣的标准供应。关于生病等的保险，大概可以同他们这样说：你在企业工作不满1年，你既然可以“跳槽”，——那在生病时就不能领到全额工资，比方说可领到2/3的工资，而那些工作1年以上者则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4. **禁止把工人从车床旁提拔到任何机关里去**，只鼓励按生产系统（或者按工会系统）提拔他们。应把工人（专业熟练的）从车床旁提拔为副工长、工长、车间主任等。现在我们需要这种提拔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生产一线的骨干工人折腾光，任由败家子糟蹋我们的企业。

5. 必须同托姆斯基在**矿工和劳动纪律**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决裂，消除矿工者能钻的一切“合法的”空子（这些空子使他们处于比诚实劳动的工人**优越的地位**），对矿工者广泛建立工人审判会并将他们开除出工会。

6. 必须同托姆斯基在失业者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决裂，组织对真正失业者的正式登记，定期清理失业者名单，以便把那些偶然失业和肯定没有失业的人从名单中除名，建立严格的制度，失业者凡两次拒不服从工作分配，将自动失去领取救济金的权利。

7.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我不怀疑，诸如此类的措施必将赢得工人的极大支持。

这件事当然是重大而复杂的。对此应当认真想一想，能否把这些措施马上用于所有工业部门，——这也是个问题。但这件事毕竟是亟待去做和必须去做的。

请在你那里在亲密朋友的小范围内好好议一下这件事（以及“执行委员会”问题）并将他们的意见告诉我。

只是请注意，瑟尔佐夫的工人供应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提供任何东西。需要一个建立在另外的原则之上的新委员会。如有必要我也可以参加这样的委员会。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9月28日

附言：我刚刚收到你从顿巴斯写来的信。看来，施瓦尔茨^①不宜担当重任。

约·斯大林

^① 1930年7月25日被任命为全苏煤炭公司理事会主席，1930年10月5日政治局又免去了施瓦尔茨这一职务。

№01169

斯大林关于顿巴斯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10日)

维亚切斯拉夫：

你10月6日的来信收到了。

一、顿巴斯的事情你处理得好。^①对执行情况作了一次列宁式检查的小小尝试。如有必要，我将祝贺胜利。

二、加强计划机关的草案很好。我作了几处修改，现退回。有一点必须要做到，即给计划机关“供应”的大学生不能照单全收，不能不挑不选，而要逐个精心挑选，杜绝仓促行事的现象。

三、将甘申的信及一些材料一并寄上。如果政治局追究甘申法律责任的说法属实，那么我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要免去他所担任的经济领导工作并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他。能否把政治局的决定改得缓和一些，取消关于“追究”甘申的“法律责任”这一条呢？我个人赞成这样做。最好是撤消洛莫夫在“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的职务（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弄懂石油业务），任命甘申接替他。这样做要好得多。这件事等我回到莫斯科后再详谈。

再见……

握手！

约·斯大林

1930年10月10日

^① 指免去施瓦尔茨职务一事。

№ 11679

莫洛托夫关于转交斯大林来信
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30年10月11日)

谢尔戈：

现将柯巴^①昨天的来信寄上。关于甘申的问题10月15日提交政治局，并把原先的决定改得缓和一些。

柯巴的信和他改过的“草案”看后退我。

莫洛托夫

10月11日

^① 斯大林少年时代所喜爱的格鲁吉亚作家卡兹别吉作品的主人公，斯大林将其作为自己的化名。

№01170

斯大林关于大清洗的一些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维亚切斯拉夫：

一、现将列兹尼科夫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实质上是右倾）派别集团的两份报告寄给你。简直太卑鄙了。一切材料都说明，列兹尼科夫的报告符合实际情况。玩弄政变把戏，糊弄政治局，结果完全堕落。

二、至于图哈切夫斯基一案，表明图哈切夫斯基百分之百的清白。这太好了。^①

① 1930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旧军官采取了一次大行动，被捕的伏龙芝军事科学院的教官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招供说，似乎当时列宁格勒军区的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国内的形势很严重，要等待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建立军事专政，图哈切夫斯基在军区有很多支持者。9月24日斯大林致信奥尔忠尼启则，在信中写道：“尽快读一读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想一想结束这一不愉快的案件的措施。你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极为秘密的：它只有莫洛托夫和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不知道克利姆（即伏罗希洛夫——编者注）是否知道。大概图哈切夫斯基被反苏分子所俘，并被右翼队伍中的反苏分子说服。根据材料只能得出这种结论。这可能吗？当然可能，既然这不能被排除。看来，右翼为了摆脱中央、摆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摆脱布尔什维克式的发展工业的速度，甚至不惜准备实行军事独裁。正如你所看到的，奥尔洛夫和斯米尔诺夫的供词（有关逮捕政治局的供词）和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和‘主张’）都源于同一个培养基——右翼阵营。这些老爷们显然想使军人变成康德拉季耶夫—格罗曼—苏汉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苏汉诺夫—布哈林这一派——这就是对照表。但情况……不能用普通的方式（立即逮捕等）结束这个案子。这个案子需要周密地考虑一下。明仁斯基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

三、我们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列扎瓦和克维林被免去（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职务。近日将做出正式决定。

你的近况如何？

握手！

斯大林

10月23日

（接第171页注释①） 最好拖到10月中旬，等我们大家都到齐时再解决。要是你在莫斯科的话就与莫洛托夫谈谈这一问题。”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审查了卡库林和特罗伊茨基的供词。进行了当面对质，在对质时他们证实了自己的证词。加马尔尼克、亚基尔和杜博沃伊也受到了审问。1937年6月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设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插话打断了夏坚科的发言，说：“我们找过杜博沃伊、亚基尔和加马尔尼克。应当把图哈切夫斯基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是否正确。他们三人都说不正确，这是一种误会，不正确……我们进行了对质并决定将这一案件一笔勾销。”

№02093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 工作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0 年 11 月 12 日)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给你寄去如下两份文件，从文件中你可看到，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条款中的说法绝对不正确。可以说拨给全苏汽车拖拉机工业联合公司 1500 万~1700 万卢布是不够的，然而说季度的数额还没有确定——这是不对的。从决议中得到的印象是，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坐镇的都是白痴。我不认为这是你所希望的。

从决议中可以看到，普罗科菲耶夫同志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就是说他被安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上，而他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执行检查处处长。任命他是想让他代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监督汽车制造厂建设的进程。你和斯大林当时说是我获胜了，完全得到了普罗科菲耶夫同志，而现在结果是他凌驾于我们之上。正如你所看到的，结果相当扭曲。这有必要吗？本来应开诚布公地说这事很不重要。几乎每天给我们送来一个接一个的决议，而且一个比一个严厉但远非公正。为什么必须把无中生有的事归咎于我们。莫非这是帮助？！

现在分析分析矿业，这一切都是在 1929~1930 年干的，而今天用来谴责我们。

再说，执行委员会以为它的机关更可靠，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首脑向工厂下达命令。鬼晓得是什么，也许需要这样，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什么用，而为什么我就应该呆在那里。要知道没有那种纪律我们就软弱极了。事情异常的多，需要帮助，而我们得到的则是口头上的东西，再说送给的显然是不正确的通报。请你不要以为我反对对我们的批评和拍打。不过说真的，当为一年至一年半以前的事而谴责我们时，我不能够既不承担责任又不承认有某种客观性。不打扰你了，有时我觉得在已形成的关系中很难工作，不会有更可靠的结果。

№01171

斯大林关于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讲稿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1 年 3 月 11 日)

莫洛托夫：

我只看了关于“倾销”和“强制”劳动的部分。关于“倾销”的一章写得好。关于“强制”劳动的一章写得不够全面和充分。我的意见和修改写在原件中。^①

约·斯大林

附言：关于未被监禁的富农的劳动，或者干脆不用提，或者专门做出有根有据的解释，即在强制迁移的富农中只有愿意者才劳动，并享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权利。

^① 这里讲的是莫洛托夫在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 1931 年 3 月 11 日的《真理报》）。

№02094

莫洛托夫关于古比雪夫要求 调离等事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1年8月14日)

瓦列里安，你好！

卡冈诺维奇同志把你的信寄给中央委员会柯巴，我读过了。

看来，明年的计划和未来的五年计划进行得比预期的要缓慢些。但是，时间不多了，但我们还是有时间，我认为我们拟定的计划，尤其是到1932年底的委员会工作计划，我们应该也能够完成。应当让你的委员会开会，搞出个预定的计划草案来。万不得已时可以提出在政治局召开委员会的问题来。

关于你要离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事根本没什么可谈的。我相信大家也会坚决反对。这是经济年、改革年，具有额外的困难，但是克服困难的途径已摸索到了，事业应当前进。好——比以前更好。

你需要的是稍事休息。这点我认为可以很快实现，从9月初开始。^①这样，我恳切地劝你撤回离开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再也不要提起。现在不是那种时候——必须专心致志地来改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们应当帮助你，我认为从秋季起事情会好起来，会顺利的。

^① 1931年8月30日政治局给古比雪夫一个半月的假，从9月5日开始休假。

致礼并握手！

你的 维·莫洛托夫

8月14日

莫斯科的事情如何？请写封短信来。

No 02095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金属和 煤炭的生产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31年8月25日)

索索^①，你好！

我已经通知你，7月份比今年6月份稍减（2.6%），比1930年7月份增长30%。^② 主要是机器制造减少了，这部分是因为通常在季度开始有许多半成品积压，而在相继的几个个月就出成品了，但这只是局部。轻工业大体上比1930年7月份增长33%，而棉织工业比1930年7月份增长107%。7个月与7个月相比增长12.3%。^③

金属和煤炭的情况依然很严峻。柯秀尔和斯维钦说冶金工厂缺少专家。工厂里没有稍微内行的人。车间没有起码的制度。至今几乎没有任何起色，而现在开始规定煤炭限额。梅什科夫抱怨没有工人，这他会写信告诉你，这是正确的，但主要的还不在于此。糟糕的是不善于利用现有的那些工人。你说过把一切移交给新的建筑工程，老工厂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人，你是绝对正确的。必须进行整顿，毫无办法。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拨工人的话，煤炭业的情况还可能更糟，目前顿巴斯的采煤工人比计划规定的少近3万人，而且在9月1日以前约有2.2万应征入伍的人离开，他们不想放弃当红

① 格鲁吉亚语中母亲对儿子的称呼，这里是对斯大林的爱称。

② 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增长指数。

③ 指1931年头7个月与1930年头7个月相比。

军。今天通过了延期一年应征入伍的决定。通过了许多别的决议，这些决议你将和信一起收到。我想在9~10月份把煤炭采掘出来。无论如何必须做到这事。

最近古格利和弗兰克福特来我这里，弗兰克福特相当肯定地说有两座高炉将如期投产。古格利没有这种信心。我想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的4座高炉至少要再推迟一至一个半月，不过无论如何今年也要点火开工。我们要帮助，同时也要强制。

米哈伊洛夫的拖拉机工厂的情况暂时还不错：到8月13日工厂已经生产了77辆拖拉机，今明两天将达到80辆。目前进行的速度相当均匀。当然，能否搞成暂时还没有任何保障和信心，工厂无疑是在发展。

№01172

斯大林关于削减进口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1年9月24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来信收到了。

你是对的，由于新的情况（英国的金融危机等等）不得不削减我国的进口。我相信，我们非得削减年初确定的进口定额不可。年初的情况是一个样子，现在已经变了（恶化了）。这一点务必加以考虑。^①

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百货商店，^②当然你的意见对。

敬礼！

约·斯大林

1931年9月24日

① 1931年10月25日政治局通过了决议：“1) 鉴于外贸形势的根本改变，从最大限度缩减输入量的角度重新审议政治局、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制订的有关进口补充决议，是绝对必须的。2) 责成由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罗森霍茨、皮达可夫和古比雪夫组成的委员会在两天内划分出绝对必须的订货项目和数额。”

② 在1931年9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审议了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百货商店的问题。政治局通过决议，把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百货商店的供应纳入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制订的总的供应计划，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要开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百货商店的数量及其供应标准。1932年12月底开业了83家百货商店，这些商店将一些稀缺商品只卖给它们主管的工厂的工人和工作人员。

No02097

伏罗希洛夫关于打猎事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1年12月13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已知你15日来我处做客，我仍然想趁此机会给你写上几句。你是否过于急着来莫斯科？我担心你一到来就会被目前的工作吸引住，这样你也就不能好好休息了。要知道往后的工作比去年更多、更繁重。

我决定12月16日去纳尔奇克打猎，12月25日也回莫斯科。我感觉不错，只是手臂疼痛这个小事仍使我很不安。

好吧，祝你一切都好。15日午饭前等你。紧紧拥抱你。也许我们一道去纳尔奇克打5天猎？你来时再商量。

祝你健康！

你的 克利姆

1931年12月13日

№01173

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2年6月19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6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

一、美利坚合众国——情况很复杂。既然他们企图以小恩小惠来诱骗我们同日本开战，——我们可以叫他们滚蛋。但既然美利坚合众国的石油企业主同意给我们1亿卢布的贷款，而且不要求我们在政治方面做出回报，——不拿他们的钱可就有点蠢了。应当对罗森戈尔茨加以约束，而在同石油企业主的协定方面的错误——应加以改正。我们需要外汇。

二、南京人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完全是个骗局。整个南京政府完全是由卑劣的骗子组成的。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同这些骗子打交道，或者说不理睬他们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应考虑到他们是些卑劣的骗子，——还是应该做。^①

三、关于乌克兰人（丘巴尔等人）我已经写信给卡冈诺维奇，

^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32年6月6日通过决议，与苏联进行秘密谈判。1932年6月26日，中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交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一封信，提议讨论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7月6日，李维诺夫提议开始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而我的意见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剩下的就是政治局的事情了。^①

四、你和卡冈诺维奇大概已经收到了我关于召开州委书记和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以讨论组织粮食收购问题的信。我认为，对于这项必要的工作应当抓紧，以便有可能避免重犯乌克兰人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错误。这件事极为重要。^②

五、捷班达耶夫请求拨给他几百万卢布（400万～500万卢布），用来在马内奇河（顿河以东）上修筑土坝。这件事并不复杂，而且看来也是需要的。^③

好，暂且就写这些。敬礼！

约·斯大林

1932年6月19日

- ① 由于实行强制集体化，在国内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乌克兰发生了饥荒。乌克兰的领导人呼吁莫斯科提供粮食援助。斯大林认为乌克兰农业的崩溃是由于敌人的抵抗和共和国政府的坏领导人造成的。1932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致电乌共（布）中央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电文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指出“任何不想完成为你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所规定的谷物交售计划及向国营农场送交谷物的计划的行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交售期限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允许。”1932年6月23日，作为对柯秀尔求援电报的答复，政治局通过了如下决议：“仅以中央通过的决议为限，不向乌克兰额外运粮食。”
- ② 1932年6月2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1932年6月28日就组织粮食收购和完成所规定的粮食收购计划问题召开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州委书记和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
- ③ 1932年7月10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从人民委员会准备金中拨出400万卢布给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修建马内奇河上的土坝的决议。

№01174

斯大林关于革命法制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1932年6月25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关于革命法制的来信收到了。写得不错。我做的为数不多的几处修改见原件。我认为，中央的指示，具体说是前两点及某些修改意见——应当刊登出来，而指示的第三点可以在内部分发。^①

二、你们收到我最近关于兰开斯特及新方案（1亿美元，10年，追加3%，占1亿美元15~20%的定货）的电报了吗？应当坚持这个新方案。这个方案对我们有利。这个方案对兰开斯特也有利，因为他要求的偿付总额提高到了6000万卢布（按照第一个方案为4000万卢布），而定货则达到了4000万卢布（按照第一个方案为700万卢布）。

^① 1932年6月25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革命法制》的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就这一问题向各地方党组织下发如下指示：“联共（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6月2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法制措施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充分贯彻实施这一决议。”

中央指出在加强革命法制的过程中法院和检察院应当发挥特殊作用。中央建议各级党组织：1）保证在加强革命法制的过程中给予它们各种援助和支持；2）彻底贯彻党下达的关于共产党员要为最小违犯法律企图严格负责的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决禁止党组织干涉对个别具体的司法案件的处理。未经上级党的及司法检察机关的同意禁止因工作关系将司法工作人员解职或调离”。1932年6月27日公布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见1932年6月27日的《真理报》）。

三、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书记会议准备情况如何？

敬礼！

约·斯大林

附言：政治局咨询的次数同我的健康无关。你们有多少问题尽管提出，我将愉快地予以答复。

约·斯大林

№02100

卡冈诺维奇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2年7月2日)

亲爱的瓦列里安，你好！

在这里我们研究比较多的是粮食收购问题。通过航空寄送给你：第一，斯大林的信，第二，在边疆区及州书记和主席会议上做出的决议。^①请电告你的意见。本想请你来，后来决定让你休息。

会上不得不狠狠批评了地方当局，特别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情绪，尤其是丘巴尔的情绪很糟，他们带着这样的情绪不仅不能完成计划，总的说来也不能收购到粮食。^②对决议的研究还得几天时间。

我在会上谈到了你的机关，谴责地方当局不注意巩固粮食采购机关的任务。现在我已跟切尔诺夫谈妥，他提出他所需要的人员名单。他本人没有提出副手问题，显然是要等你回来。你休息得怎

① 1932年6月21日，政治局决定1932年6月28日召开乌克兰、中央黑土地带的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等地的党及苏维埃领导会议，研究粮食收购计划的执行问题。

② 1932年春夏，乌克兰的饥荒日益严重。大部分粮食都被征购运出，农民处于饥饿状态。1932年的春播实际上已无法进行。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乌克兰的领导向莫斯科求援。1932年6月17日，乌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要求对受灾严重的地区给予粮食援助。类似的要求和粮食收购的危急情况引起了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对乌克兰领导人的不满。1932年7月初，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去了乌克兰，以便无条件地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样？感冒好了没有？你想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的事情很多，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告诉你这些想让你提前回来。休息完了再回来。采购工作的困难很多。

再见。握手，致敬。

你的 拉·卡冈诺维奇

7月2日

№02101

卡冈诺维奇关于缩减投资、增加有色金属的 进口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2年8月2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至今没有给你写信，好让你能脱开工作休息，不让许多事务，而且是不太愉快的事务干扰你。

一、关于缩减投资事宜^①：朋友，对此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财政状况要求这样做。我们这里工资的发放已延误了很长时间，预算赤字的增长比任何时候都多，总而言之情况大致如此，显然不像1930年的情况那样尖锐，需要你做大量工作才能改善状况。我们已写信给我们总负责的朋友，他认为我们缩减7亿，这种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和及时的。（接你电报后）我试图在政治局会议上减少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压缩数字，但是没有成功。请你不要着急，更不要生气，我深信如果你在这里的话也会同意的，虽然很清楚，这种作法对工业部门是沉重的。

^① 1932年7月23日，政治局组成了由古比雪夫任主席的委员会以研究降低建设成本问题。责成委员会“制定降低建设成本的实际措施方案”，同时也将1932年第三季度对基础工作的拨款缩减7亿卢布。在事先得到了斯大林同意后，古比雪夫在7月26日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将第三季度对基础建设的拨款缩减7亿卢布的决议草案。压缩财政拨款涉及了各个部门，但拨款压缩最多的是重工业，缩减了4.05亿卢布。委员会中代表各个机关的委员试图进行抵抗。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坚持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拨款的压缩数额最多为3.1亿卢布。但8月1日政治局通过了古比雪夫的提案。第三季度基础建设的整个投资缩减了10%，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方面的投资缩减了13%以上。

二、你关于价格的请求，很遗憾我不能满足，请求来迟了，而莫洛托夫坚持自己的决定。^①

三、在进口事务委员会，我们同意增加有色金属的进口，^② 我们远远超过了规定的支付限额，1932年不是6700万卢布，而是7100万卢布，1933年不是8500万卢布，而是9000万卢布。最近已寄给当家人，尚未答复，但是已经再不能削减了，虽然很不愿意增加支付。

四、我们在这里听说要降低成本，事情有点不妙。目前委员会正在研究制定措施，会寄给你的。

五、汽车工厂的金属供应情况仍然不好。通过的决议尚未产生结果，^③ 依照你的电报我们已为红色十月工厂从机动储备中拨出了镍和铬，^④ 而现在不得不采购。

六、现在我们正关注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建设进程，这事应该成功，事情是重大的。

七、庄稼不坏，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收割和采购。起初收割得不太好，现在好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政治局采取了许多措施，特别是从城里（没有从工厂）派劳力到国营农场去。

八、在装卸货物方面，我们目前的运输工作不如去年。每天装货不足4.5万~4.7万车皮。只好加强对它的物质技术供应，并为

① 1932年8月14日政治局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的商品储备和贸易调节委员会（主席为莫洛托夫）所做出的关于规定国有工业生产的日用必需品中的金属制品的售价的决议。商品储备委员会在批准了提高许多金属制品的价格后，否决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提高一些制品的售价。

② 1932年7月16日政治局责成由莫洛托夫（主席）、卡冈诺维奇、皮达可夫、鲁祖塔克、博耶夫、古比雪夫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外汇储备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审议收支平衡表、有色金属的进出口问题。

③ 1932年7月23日，政治局批准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保证供应汽车拖拉机制造业的各个工厂以优质钢材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④ 1932年7月25日政治局解决了“红色十月工厂”的有色金属问题。

它进口金属支付300万。^①

九、国际事务暂时稍有沉寂。我们的党在德国的大选结果特别好^②。美国人继续和我们挑逗。^③日本人暂时忙着自己的满洲事务，他们被牢牢地缠在里面。^④我们和他们暂时也沉寂了。下次我再写得更详细些。

十、我们照旧收到当家人正常的和特殊的指示，这使我们有可能不错过机会，是的，实际上他得工作，否则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你的自我感觉如何？健康恢复了吗？恢复精力吧，因为工作又增加了，尤其是你的工作部门。

在一切困难的条件下，事业越来越发展壮大。无论是在工业中还是农业方面，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胜利。

向你致以诚挚的敬礼。代我们大家问候玛丽亚·马尔科夫娜和马娅·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和伊捷罗奇卡。

吻你！

你的 拉扎尔

① 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拟定的关于对运输给予物质技术供应的决议，1932年8月1日由政治局批准。

② 卡冈诺维奇阐明了苏联官方对德国大选结果的看法。1932年8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德国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胜利”的报导。报导中说，据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共产党获得了527.8万张选票（占14.4%），社会民主党获得了795万张选票（占21.5%），纳粹党获1373.2万张选票（37.2%）。

③ 卡冈诺维奇指的是美国国内对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兴趣渐浓。1932年7月27日俄美贸易厅主席库贝尔向苏联驻德国的全权代表欣丘克就此做出了表示。从7月29日至8月3日国际贸易厅美国委员会的成员李一直在莫斯科。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克列斯京斯基会晤时李表示美国商业界希望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

④ 指日本在1931年9月占领中国东北之后，采取各种行动巩固自己在东北的阵地。

附笔：我把企业出售商品的方案^① 寄去一阅。

① 指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企业有权将自己的产品拿到当时根据政治局的授权所建立的市场上出售的决议方案。1932年7月23日政治局将这个决议方案移交给由柳比莫夫领导的委员会做进一步研究。在长时期的仔细研究之后，1932年10月16日政治局撤消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02102

莫洛托夫关于解决燃料等问题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2年8月28日)

瓦列里安，你好！

我照例在竭尽全力地休息。明天洗完澡，我将是一个充分自由的公民了。但是，莫斯科那些事情使我很感兴趣，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消息。

一、劳动国防委员会中的燃料问题解决得怎样了？关于决议草案^①的事没有听到什么。地方干部来过吗，问题的讨论有什么结果。顺便说说，据说伊·柯秀尔在顿巴斯的时候，很少干事，却与地方干部“广泛交游”。

二、我不知道粮食饲料平衡委员会^②的工作是怎样结束的。给我寄来了结果和相应的资料。

三、你的建设委员会的情况怎样？大概在你最近的任务中这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

四、我们的委员会的配置问题解决了吗？这件事不大，但对工作具有自己的意义。

① 1932年8月8日，政治局委托由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卡冈诺维奇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关燃料的决议草案并将自己的提案提交政治局批准。

② 1932年6月1日，政治局批准了粮食饲料平衡会议的组成：主席莫洛托夫，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第二副主席奥新斯基，委员有切尔诺夫、米纳耶夫、米高扬、罗森霍尔茨、马尔克维奇（农业人民委员部）、盖斯特（国家计委）、奎林、雅科夫列夫、克里尼茨基、丘巴尔、苏利莫夫、尤尔金。

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来往信件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事情进行得如何，你有什么新闻，请来信告之。

紧紧握手！

致敬礼！

你的 维亚切斯拉夫

8月28日

No02004

古比雪夫关于擅自动用储备煤炭问题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便函

(1932年11月14日)

致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呈上济布拉克和亚戈达同志关于擅自动用储备煤炭的两份汇报。^① 储备物资委员会费了很大努力得以积储一些煤炭。随着冬季的到来，强抢煤炭储备的情况增加了，如果稍加纵容姑息，则煤炭储备将荡然无存。因此我建议：

“（1）承认逮捕十月铁路局卡里宁诺和霍夫里诺车站的三名铁路员工是正确的，他们的罪责是，未经储备物资委员会批准擅自动用了煤炭。惩处措施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定夺。

（2）宣布给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比利克同志和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导员梅德韦季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因为他们未经储备物资委员会许可而非法命令从委员会的储备中动用煤炭，同时警告他们，一旦再有这种非法行为，将给予他们最严厉的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见这两份汇报。

党纪国法处分”。^①

请以咨询方式表决。^②

瓦·古比雪夫

11月14日

① 在政治局审查这一问题的前夕，交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向斯大林提交便函：“我的副手比利克同志受到的警告是平白无故的。从储备的燃料中他连1吨也没有拿过”。政治局于1932年11月25日审查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折中的决议。其中第一项是：“1. 指出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比利克同志和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教导员梅德韦季同志未经储备物资委员会许可而从委员会的储备中动用煤炭是非法的，同时警告他们，一旦再有这种非法行为，将给予他们最严厉的党纪国法处分”。

② 这句话在档案原件中被勾掉了。

№ 02099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
给化工品销售机构指示致古比雪夫的信

(不早于 1932 年 12 月 4 日)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古比雪夫同志

今天把你直接寄给苏联化工产品售销机构的指示转给了我，指示的内容如下：“我命令立刻拨出 100 吨三氯硝基甲烷并按劳动爆破机构（OTB）的指示优先运往北高加索”。我认为这种性质的指示越过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是不正确的，我想你是同意这样做的，因此，我请求你按平时正常的手续寄给一切必要的指示。

奥尔忠尼启则

12 月 4 日

№02103

莫洛托夫关于化学工业工作决议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2年12月9日)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你12月8日的便函我刚刚收到。

1. 同意从12月4日国防委员会的记录中删除有关评价化学工业和军事化学工业工作的决议的第1项，因为国防委员会就这一工业问题设有专门委员会。

2. 这一项和第2项的第2款一样，不是随意载入国防委员会记录的，而是因为得到国防委员会赞同的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建议中有这些。显然，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期间，不是国防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来得及熟悉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方案，因而没有反对意见，没有逐项讨论便通过了。

3. 由这一切可见，巴济列维奇同志与这个问题没有关系，攻击他是不对的。

4. 我建议如下：删除国防委员会决议的第1项，而第2款由国防委员会指定的委员会讨论，我不认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我认为，尽管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有争论，化学工业的组织问题是值得在国防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认真讨论的）。

如果你不反对，我将在国防委员会对这一建议进行表决。

维·莫洛托夫

1932年12月9日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很显然，国防委员会关于化学工业和军事化学工业的决议，在措词上有错误。

我把第1项划掉，把改正的国防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分别寄出（寄给原先收到决议的人）。

莫洛托夫

12月9日

№02104

斯大林关于阅读巴克尔等人著作
致加里宁的信

(1933年1月21日)

献给加里宁同志：

阅读巴克尔、米利、孔德、康德的著作，直到他们那些名词，
比理解你，我的朋友，容易百倍。

约·斯大林

1933年1月21日

№01175

斯大林关于莫洛托夫报告的 国际部分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1933年1月24日)

维亚切斯拉夫：

今天我看了国际部分。^① 写得好。对“大”国既鄙视又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往耀武扬威的“列强”的锅里坦然自若地吐上一口，——太精彩了。让他们“吃去”……

斯大林

^① 指的是莫洛托夫1933年1月23日在第六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最后部分（见1933年1月24日的《真理报》）。

No01176

**斯大林关于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晚于 1933 年 4 月 23 日)

维亚切斯拉夫：

我认为，应当完全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即给维申斯克人追加 8 万普特，给上顿河人——4 万普特。这件事看来已经弄得“全民”皆知，在那些地方发生了种种胡作非为的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挽回影响。多给四五万普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这两个区的居民来说，眼下却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表决（请告诉切尔诺夫）。

除此之外，应当派一个人（可以派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到那里去，以便弄清事情真相并追究奥夫钦尼科夫及其他所有胡作非为的

人的责任。这件事明天就去办。^①

约·斯大林

① 1933年春，肖洛霍夫就粮食征购过程中的横行霸道行为致信斯大林。在1933年4月23日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有关维申斯克区的状况问题。决定派什基里亚托夫去维申斯克调查当地在粮食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为的原因，这些过火行为是得到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和边区机关的代表许可的。

1933年7月4日政治局听取了什基里亚托夫就过火行为所作的汇报。联共（布）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区委第二书记济明、边疆区委驻维申斯克区全权代表奥夫钦尼科夫、维申斯克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及见证人肖洛霍夫都受到了询问。政治局指出：“过火行为、大规模地将集体农庄庄员逐出家门、禁止其他集体农庄庄员收留被逐出家门的集体农庄庄员过夜等的主要责任在边疆区委，边疆区委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些过火行为，更不用说预防这些行为了……”决议还指出：“中央认为对抵制粮食收购的集体农庄庄员施加压力的政策是完全正确和绝对必要的，由于缺少边疆区委的足够监督，这一政策在维申斯克区被歪曲了，并被败坏了名声。”济明被撤消了边疆区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奥夫钦尼科夫被撤消了罗斯托夫市委书记之职。维申斯克区的领导被受到严重警告。

№02105

基洛夫关于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学员的 补助金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年5月20日)

我同列宁格勒工业学院的毕业生谈过话。到10月份工学院将培养出毕业生135人，到12月份还将毕业48人。根据毕业生的鉴定看，他们的多数对工业将是很好的贡献。

我支持学院校委会和社会组织的请求，在调毕业生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时，由你按照去年的惯例发给他们装备必需品的一次性补助金，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还请求全苏与列宁格勒工业学院的学员之间不要有差别——也要发给低年級的列宁格勒学员休假补助金，因为莫斯科的学员已经领到了这笔补助金。

谢·基洛夫

1933年5月20日

№02106

莫洛托夫关于商谈第三季度计划问题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3年6月5日)

古比雪夫同志！

根据刚才同梅日劳克同志的谈话，我感到会使你陷入尴尬的境地（与第3季度的问题有关）。这只是我个人的过错。昨天晚上和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①进行了短暂的、也可以说是瞬间的谈话，没来得及和你交谈——而这当然是必要的。夜里和柯巴通过电话谈了会议的事，没有触及到事情的实质（第3季度计划）。让我们现在就会面商谈有关第3季度的所有问题吧。^②我一结束委员会的会议（再过20—30分钟）就给你挂电话。

维·莫洛托夫

① 指梅日劳克。

② 1933年6月7日政治局批准了1933年第三季度计划的主要指标。在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中，这个决议是以小标题《1933年6月7日的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一问题是在政治局的秘密会议上审议的，而莫洛托夫信中讲的就是同意这次秘密会议的议事日程。

№02107

基洛夫就泥炭的运输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3年6月25日)

亲爱的谢尔戈！

本季节我们这里泥炭的采掘进行得比去年好得多，虽然采掘计划没有全部完成，——机割泥煤进展落后了。如果不是因天气很糟，计划可能完成。伊万诺夫—高加索斯基来过这里。为了提高采掘量大家都加劲干。然而灾难也就孕育其中：

1) 我们州在全苏泥炭联合公司的欠款——400万卢布。

2) 我们面临着一定的威胁——因运输条件泥炭运不出去，对此你是内行。泥炭是在需求地点30—40俄里开外的地方采掘的，只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才能将泥炭运到，为此需要：

窄轨和宽轨的钢轨 4000 吨

小型内燃机车 17 辆

窄轨蒸汽机车 15 辆

宽轨蒸汽机车 2 辆

斗车 500—570 辆

你看，要求不少，但没有办法。恳请你的帮助。事不容缓——夏季必须修路。

敬礼

谢·基洛夫^①

^① 在信纸上有“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会”的字样，第一页的上角有奥尔忠尼启则的批示：“拨给基洛夫500吨钢轨”。

№02108

加里宁关于回乡见闻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3年8月11日)

亲爱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我这次下乡^①发现了许多问题，应该就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木材的流送进行得很糟，我觉得比这更糟就不能进行了。河面上到处漂浮着1至5根原木，两岸乱放着木材，河湾里是一堆堆流送木材（脱离木排的部分）；据说——许多木材都沉没了。有经验的人认为，流送造成的损失不少于流送木材的1/3。我慎重地考虑过，这种说法接近真实。由于流送机构的坚持，几乎整个夏季坝都没拦水，磨坊没有开工，农民用磨碾米磨面。只在7月中旬磨坊才开工，现在还等着开业的命令，因为河的上游据说还有许多木材。就是说正好是磨坊开始进粮的时候。林场管理局似乎设在基姆雷，沿河一个负责的领导也没有见到。

二、关于木材采伐，必须改变对木材采伐的季度分配。在最紧张的工作时期，在第3季度下达木材采伐计划。在莫斯科州，伊万诺沃州，木材采伐量比较少，冬季农民很容易采伐完。在第3季度进行这种工作是官僚主义最坏类型的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运木材，这就是不断地折损挽具，对马和人来说是力不能及的重载，再说，这些活冬季可以毫不困难地完成。必须停止这种蠢事。至少要

^① 1933年8月初，加里宁回到故乡——莫斯科州加里宁区的上特罗伊察村。

在采伐量不大的那些林场停止。

三、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利用休闲地种植春播作物：豌豆、青贮饲料、早熟马铃薯等的问题。按我看，在我个人察看过的田地里，田地的土质我了解，秋播谷物的缺额，相当于半休闲地上的25~30普特黑麦。不是95~100普特，而是65~75普特。当然，对这个问题必须慎重，不能不加区分地责怪休闲地的占用。饲料干草很少的地方——对粗饲料的需要量很大：一公顷地收获野豌豆100~150普特，有时收250普特，必须损失15~20普特黑麦。其次是早熟马铃薯。如果收获量为250~300普特，很明显，则可相当可观地抵补不足的黑麦，而且有富余。我想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给区里机动的权利。但是，如果州想获得更多的黑麦、秋播小麦，必须扩大绝对休闲地的百分比。

四、农村集结了大量被惩罚的、主要是被判处义务劳动的犯人。了解犯人的情况后不得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惩罚超过了义务的程度，很大一部分惩罚是形式，很少考虑到各种优越条件。苏维埃民众包括共产党员占犯人的很大百分比。我觉得必须认真地提高法院威信的时候到了，法院的判决（我指的是人民法院）不仅要有法律上的根据，而且要符合所有的案情。我觉得，第一，可以吸收老共产党员——有实际经验的退休者、集体农庄庄员、能办事的党员当法官。法院——普及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场所。莫斯科州党委会有时给检察长和人民法官寄些秘密指示信是很有益的。^①

^① 据官方资料统计，仅俄罗斯联邦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738000人被定罪。大规模的逮捕使得监狱和侦讯隔离所爆满：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拘押了800000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33年5月8日不得不签署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特别指令，将监狱中的犯人减到400000人，并禁止未经批准的流放和逮捕。但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33年下半年在俄联邦又有687000人被定罪。

五、卡中的居民恳请 1934 年在上特罗伊察村建一所农民青年学校，区上负责材料和劳力。

六、区的上层领导在基层很有威信。都认为全部采购计划很紧张，但是比去年完成计划的信心更大。天气未造成明显的损失，但是秋播谷物的收获和拔亚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碍，已经丧失 6—7 个劳动日。

致共产主义敬礼！

米·加里宁

1933 年 8 月 11 日

№01177

斯大林关于产品配套运动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一、老实说，我（以及伏罗希洛夫）不满意你一走就是一个半月，而不是像我们在制定休假计划时说定的那样去两个星期。要是我知道你想去一个半月的话，我就会提出另外的休假计划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是躲避谢尔戈吗？难道你不明白，不能把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长期交给古比雪夫（他会酗酒）和卡冈诺维奇？不错，我对休长假曾同意过（在电报中），但是你清楚，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我认为谢尔戈对维辛斯基的行为是无赖行为。你怎么能对他让步呢？显然，谢尔戈是想用自己的抗议破坏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产品配套运动。^①这是怎么回事？是卡冈诺维奇骗了

^① 1933年7月末，地方上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拍了几封关于扎波罗热的“公社社员”工厂装运缺少一系列重要组件的新康拜因的电报。根据这些信息，人民委员会7月28日以咨询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向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违法发送不成套康拜因”的决议。人民委员会要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立即终止发送不成套的康拜因，补上康拜因所缺的零配件，同时责成苏联检察长阿库洛夫立即逮捕在发送不成套康拜因事件中有罪的一些主管领导并交付法庭审判。这一决议引起了抗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哈塔耶维奇专门向苏联人民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奥尔忠尼启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及乌克兰检察长等几处致信，他证实说，“公社社员”工厂工作得很好，不成套地装运康拜因是为了防止对一些零

我们吗？看来是他骗了我们。还不止他一个人。

敬礼！

约·斯大林

9月1日

（接第210页注释①） 配件的盗窃行为：康拜因的零部件专门装箱单独运送。“从总的来说，工厂是功大于过的。因此，州委认为对工厂领导的调查是合理的，不会引起反感。”接到这封信后，莫洛托夫在哈塔耶维奇的回信中说：“‘公社社员’的成绩我们完全知道，检察机关也清楚。法院会考虑这点的。本诉讼案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取消无疑是不合适的”。

1933年8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刑事诉讼委员会开始审理不成套装运康拜因一案，“公社社员”工厂的一系列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被追究刑事责任。（见1933年8月17日的《真理报》）。在法庭上苏联副检察长维辛斯基说，“诉讼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苏维埃经济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我说的是联盟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我说的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这一讲话激怒了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和雅科夫列夫。1933年8月24日，在斯大林不在的情况下他们使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维辛斯基的话为不正确地指责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借口。后来在斯大林的干涉下，政治局废除了这一决议。

No01178

斯大林关于拨款等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3年9月12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我同意，1934年度的基本建设项目拨款不应超过210亿卢布，而工业产品增长率不应超过15%。^①这样较妥。

二、我也同意，根据1932年度的粮食总产量计算，应该征收6.98亿公担^②粮食。不得少于此数。

三、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在“产品配套”一事上的行为只能说是反党行为，因为这一行为的客观目的是庇护党内反动分子反对联共（布）中央。的确如此，全国都在叫喊产品不配套；党已着手进行产品配套运动，即公开在报刊上进行讨伐；对那些肆无忌惮地恶毒破坏党和政府决定的党的敌人已经做出了判决，而应当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的谢尔戈（和雅科夫列夫）不是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攻击检察长！这是为什么？当然不是为了制止这些破坏党的决定的反动分子，而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向党的舆论证明他们是对的，并以此来诬蔑党正在开展的运动，也就是诬蔑中央的现行路线。

① 指的是关于对国家计委所制订的1934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方案的讨论。1934年11月28日，政治局赞同更高指标的1934年计划。那个计划规定对基建工程的拨款为240亿卢布以上。后来对1934年计划进行了反复修订。

② 1公担等于100公斤。

我给卡冈诺维奇写了一封信，说出乎我的意料，在这件事上他竟然站在党内反动分子一边。

四、由于我的原因你要提前从休假地返回，这使我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显然就要把中央的工作长期交给卡冈诺维奇一个人去做（古比雪夫会酗酒），这很轻率，何况卡冈诺维奇还要同时抓地方和中央的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将回到莫斯科，那时你可以再去休假。

五、我依旧坚持你没必要去土耳其。让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去吧。^①

握手！

约·斯大林

1933年9月12日

^① 1932年5月土耳其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访问了苏联，1933年9月20日政治局批准由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组成的代表团回访土耳其。

No02110

**莫洛托夫关于 1934 年控制数字等问题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3 年 9 月 12 日)

瓦列里安，你好！

我不打算细说，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见面。

(1) 我接到了斯大林的来信，信中说他与伏罗希洛夫认为我去休假一事不当，这样休假不妥，多于预定期限（两周）。^① 因此我立即回复斯大林，说我 9 月 18 日动身回莫斯科。就是说在 9 月 20 日（如果我要在第聂伯联合工厂逗留一天，那就是在 9 月 21 日）我们就能见面了。

谢谢你提供的有关莫斯科情况的消息。

(2) 你设想的 1934 年度的控制数字，我认为正确的。这一点（210 亿 + 15%），我不久前已写信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② 更详细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3) 我对甜菜的良好前景十分高兴。（有 1.3 亿公担，是不是估过头了？）

(4) 皮棉生产任务提高到 2600 万普特是否适当，我表示怀疑。

(5) 有几位克里木人来找过我，他们想把两个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指标降低一下（最近田地“遭霜打了”）。应核实一下，尽快做出决定，因为这会延缓他们完成谷物年度计划。

^① 见 1933 年 9 月 1 日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本专题 No01177）。

^② 斯大林的意见见 1933 年 9 月 12 日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本专题 No01178）。

(6) 恳求你结束劳动人民委员部的事务。^① 米罗什尼科夫是熟悉情况的。

敬礼！

维·莫洛托夫

9月12日

^① 1933年6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做出“关于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合并”的决议，取消劳动人民委员部。1933年7月14日，政治局以咨询的方式将什维尔尼克提出的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合并措施的提案转交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审议。

№02111

莫洛托夫关于五年计划材料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3年9月16日)

瓦列 [里安]·弗拉基 [米罗维奇], 你好!

(1) 收到了你寄来的有关五年计划的材料。我只能浏览某些部分。没有附寄的文本, 很难研究明白, 文本看来要到莫斯科才能到我手上。

(2) 斯大林通知说, 他同意 1933 年度基建工程费不超过 210 亿卢布, 产值增长不超过 15% 的初步计划。你的设想恰好与此相符合。

(3) 斯大林还通知说, 他同意谷物收获量的数字指标为 6.98 亿公担。应以此为根据。

其他事情我不多写了,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

敬礼!

维亚切斯拉夫

9月16日

No02112

卡冈诺维奇关于矿石运输等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不早于 1933 年 9 月 24 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听说，你休息得不大好。你虽然是在休假，可还是加劲干工作。这未必能得到我们的赞许。你应当好好地休息。我们这里工作当然是慢了些什么，事情却不少。当家的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谈了冶金工业所需的矿石一事并要我抓这件事。你的人都积极投入工作，我们狠狠地向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施加了压力。你大概看到了我们做出的关于叶卡捷琳斯克铁路的决议，^① 我们把运送矿石等作为主要的一项。最近一些日子每天都能连续装上 1800 车皮克甲沃罗格的矿石；已经下达指标，每天要把装车量提高到 2500 车皮。

目前开采量没有提高，每日只开采 26000~28000 吨。白云石储备够 90 天用的，石炭石仅够 10 天。无论如何请你相信，在中央运输委员会赋予我的职权中，我放在第一位的是满足你的要求和执行我们当家的关于保障冶金工业的指示。最近，尤其是近一周，运输有些起色，最近 10 天每天装载 55000~56000 车皮，但是日前发

^① 中央委员会 1933 年 9 月 17 日所做出的关于库尔斯克和叶卡捷琳斯克铁路工作的决议刊登在 9 月 18 日的各大报纸上。决议中叶卡捷琳斯克铁路局局长受到了警告：如果在近期内不能保证充分完成运送矿石、焊剂、耐火材料、粮食、焦炭和煤的计划，那么“就将以破坏党的战斗任务论处，不仅要被撤职，而且还要被开除出党”。在随后的几周内在报刊上开展了争取完成运送黑色冶金原料的计划的宣传运动。

现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把中转的货物竟算入重新装车的货物，这是人为地把已装车辆的数量扩大。我们现在正着手调查这件事。

我们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听了关于空军、坦克兵、炮兵等军队订货计划完成情况的通报。遗憾得很，事情进展不好，某些部门甚至很糟。下次会议定于29日召开，准备把厂长们召集来，我建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自己在29日之前召集厂长们并草拟抓紧工作的实际措施，把初步拟定的措施提交国防委员会。如果你能写封信促进一下，那就更好了。

中东铁路的情况越来越复杂。^①很遗憾，你没有随身带上中央的密码。我原来想给你寄去密码文件，后来才想到，问题不在于中央的密码。你已看到了我们就中东铁路计划措施提出的抗议书。我们曾把草案寄给了当家的，实质上整个第二部分是他增添的，他增添了最有意思的内容，提出一切责任均由日本人承担，而不是由软弱无能的满洲国承担。^②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逮捕人了。昨天我们草拟了新的抗议书并寄给斯大林同志，我也寄给你一份。^③远东局势无论如何都是愈加紧张了，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警惕，还应当加强戒备。

农业情况不错，尽管最近5日农民交售粮食的速度有所减慢。

① 指1933年6月在东京举行的将苏联管辖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满方面的谈判。在谈判中“满洲国”的代表团对苏联对中东路的所有权提出了异议，建议苏联以低价出售铁路。这一要求遭到了苏联代表团的拒绝之后，开始逮捕在中东铁路上工作的苏联人员。谈判中断，只是到了1934年中期才恢复谈判。

② 苏联政府的声明刊登在1933年9月22日苏联的各大报刊上。声明中说：“苏联政府认为，对这一违约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日本政府。满洲的真正主人不是既无力又无能为满洲事件负责的满洲国，而是日本政府，它应当为违反了中东铁路条约的行为负责，也应为正在准备中的侵夺铁路行为负责。”

③ 1933年9月26日，苏联报纸又刊登了苏联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新声明。对日本逮捕中东铁路员工的行为提出抗议。苏联政府警告说，这一行为将导致出售中东铁路谈判的破裂。

当然，现在通过某些加压的指示还为时尚早，但严密注视是必要的，以免一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

成就的确是巨大的。这就是一些数字例子。这是9月20日前的情况：

1931年 5.7 亿普特

1932年 4.11 亿普特

1933年 8.86 亿普特

就是说，我们已储备的数量相当于去年11月25日才拥有的数量。收割情况不坏，已收割完8000万公顷，但是应该说，不仅在莫斯科州，还有其他一些地区连阴雨把我们的事情搞得很糟糕。在莫斯科州连阴雨形成了自然灾害。最近我们收到舍博尔达耶夫同志的便函，他说北高加索一些地区收成欠佳。国营农场的收割情况很糟。我们给他把计划降低了1000万普特，派米高扬同志去那里待上四五天，以便加紧收割工作，注视边疆区的情况，以免发生我们意料之外的事。

在农业系统，我们现在下力气做的工作还是各种准备工作，特别是检修期的准备工作。我不知道你的人是否告诉你，但是根据修配用零件的情况，我似乎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问题，我主要坚持的是，今年不是大修90%拖拉机，而是检修量不得超过现有车辆的60%。雅科夫列夫嚎叫不休，但这无济于事；当家的来电补充指出不是不应超出60%，而是不得超过50%；这是正确的，因为不应野蛮地消耗掉拖拉机和备件，要组织好日常维修和中修。

要摸清纺织工业的问题，那里情况很不好。提供质量不像话的产品，党必须狠抓这件事。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为了完成长度计划，人为地抻长织品；这就是说，买了5米布料，做成衣服洗过

后，成人穿的布衫竟变成小孩的布衫了。

这看来是主要的问题。

清洗组织工作进行得很好，党在思想方面有很大影响，因为这次清洗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的。^①

就写到这里，使你疲倦了。

十分诚恳向你致意，握你的手。拉扎尔。

玛丽亚·马尔科夫娜和伊亚向你问候。你家里人还在索契吗？

拉·卡·

^① 1932年12月10日政治局通过了1933年进行党内清洗的决议。为了组织清洗成立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以及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安季波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委员会。主席为卡冈诺维奇。

№0211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休假致基洛夫的信

(1934年3月25日)

亲爱的基洛夫！

你近来怎样？近况如何？我此时坐在这里总是不能原谅自己，我没能让你休假，那怕休息半个月也好。朋友，你听我说，你要休息休息。真的，你10天到15天不在那里，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无论如何，地球是不会毁灭的；你要恢复一下精力，这是必要的，而且也应该作到这一点。

我们的同乡认为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也是应当休息一下的！

当然，不会把你强拉到这里来。你来吧，那怕就地休息一下，你就这样办吧。我在这里休息得很好，天气极佳，真正的春天。昨天鲍曼来了。

向玛丽亚·利沃夫娜致意。

紧紧握你的手！

你的 谢尔戈

齐娜和埃捷里亚向你和玛丽亚·利沃夫娜问候。

谢尔戈

1934年3月25日

№02115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会面致基洛夫的信

(1934年4-5月)

我亲爱的基洛夫，你好！

你狩猎情况如何？你在那里打死许多野禽、野兽吧？老弟，你还是要像正常人一样休息，不然的话还会突然冒出什么来，那就晚了。为了一切，要像正常人那样休息，要休息。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尽管肾几乎一直在疼。我很快就返回莫斯科，到莫斯科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肾脏情况很不妙，但是毫无办法，玛鲁霞会把详情讲给你的。我特别想和你谈谈许许多多的问题，可是在信里是说不清的，最好等见面再说。好，祝你身体健康，你一定要休息好。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

你的 谢尔戈

№02116

莫洛托夫关于第三季度计划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4年5月22日)

瓦列里安，你好！

从克里木向你致意。这里天气不热。我常去游泳，不是每天都去。我在克拉马里斯别墅安顿下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应该把这别墅划归政治局委员使用。在穆哈拉特卡已有好多人。在我们称之为“马叶夫卡”的别墅可以休息得相当好。我对事情只能是“大体上”关注，给你寄去一些文件，文件由赫卢谢尔同志转给你。

我现在考虑着第三季度的问题。我认为，第三季度计划不应大于第二季度。如取较小的建设计划，尤其是考虑到发生旱灾的危险，那就更切合实际。我们要把一切物力调动到生产上，如不缩减某些过分膨胀的建设计划，这一点是做不到的。^① 遗憾的是，发生旱灾的危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上述观点的补充根据。

向丘巴尔同志和梅日劳克同志致以敬礼。

维·莫洛托夫

5月22日

^① 1934年6月4日，政治局批准了1934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计划的限额。基建工程计划的限额为68.9亿卢布。

No 02117

莫洛托夫关于粮价措施等问题 致古比雪夫的信

(1934年6月5日)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你好！

5月27日的来信收到了。

(1) 我认为，有关粮价的措施^①是非常正确的。没有把此事像以前设想那样推迟到秋天，这很好。

(2) 我感到遗憾的是，只任命鲁希莫维奇同志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负责燃料方面的副人民委员。^② 我认为，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燃料+电站）的问题业已成熟。

(3) 对阿穆尔河上的边境事态应特别加以关心。可以看出，政治局很关注此事。

(4) 为什么我的委员会制定的条例（确切地说是机构的条例），即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条例迟迟未得到批准？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异议或疑问？

我参观了黑海舰队，看到了不少东西，等我到你那里，我向你讲述一番。也该帮帕霍莫夫完成造船规划。在和海员交谈中，我感到尼古拉耶夫市的马蒂工厂并没有很好地转到海军规划上。请你按

① 1934年5月20日，政治局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于粮食和饲料作物的决议。其中特别规定，从1934年6月1日起提高“出售给居民的粮食价格以保证粮食配给”。

② 1934年6月3日，政治局做出决定，设立主管燃料（煤、石油、页岩、泥炭）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一职，并任命鲁希莫维奇担任此职。

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系统认真检查一下这件事。

维·莫洛托夫

6月5日

又及。我认为，今年应解决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去国外就医问题。他过去和现在常常身体不舒服，同时他坚信，在国外就医会治好他的病。在这方面你支援他一下。

维·莫·

№02119

斯大林关于乌拉尔之行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4年9月18日)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信收到了，你在乌拉尔几乎待了--个月^①，这很好。我反对走马观花、华而不实的旅行。我完全赞成出外走走，但出行时间要长（一至两个月），态度认真，这于事、于出行各地的人都有裨益，但不要张扬。

你想去休假，这很好。你顺路来我这里吧，那我会高兴的。

敬礼

约·斯大林

1934年9月18日

^① 1934年8月5日，政治局批准奥尔忠尼启则从8月7日到月末参观乌拉尔的工厂和建筑工地。

№02123

伏罗希洛夫关于少年犯罪问题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的信

(1935年3月19日)

致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加里宁同志

寄去 1935 年 3 月 15 日第 61 期《工人莫斯科》报的剪报，剪报一方面以实例说明在我们莫斯科市内少年流氓行为表现出骇人听闻的形式，另一方面说明审判机关对待这些事实近乎温厚的态度（判决刑期缩减 1/2 等等）。^① 我和武尔同志就此事进行过电话交谈，他告诉说，这事件不是个别的，在他那里登记入册的达 3000 名作恶成性的流氓少年，其中近 800 名是公认的无恶不作的匪徒。平均每天他逮捕近 100 名搞无赖勾当的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他不知道该把这些人安置在什么地方（无人愿收留他们）。就在昨天，莫斯科市副检察长科布伦茨 13 岁的儿子被一个 9 岁的小孩用刀刺伤。

日丹诺夫同志领导的（中小学）委员会与加里宁同志领导的（无人照管流浪儿）委员会^② 日内将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但在这之后，清除莫斯科市无人照管的和犯罪的少年的问题也不会从议程上撤掉，因为不仅武尔，还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亚戈达都声

^① 剪报粘在信上，在剪报中说，有两名 16 岁的少年，两次杀人，致使 3 人受伤等等，被判处监禁 10 年（后来，刑期被缩减了一半儿）。

^② 无人照管流浪儿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 27 日组成。

明说，由于缺少保育院他们无法安置无人照管的流浪儿，因此也无法同这小疖子作斗争。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责成内务人民委员会立即安置流浪儿和无人照管的儿童，以保障首都安全，免遭日益增多的“儿童”流氓行为的骚扰。至于提到的事件，我就不明白为何不能枪毙这些坏蛋。难道还要等到他们长成大强盗的时候再说？

伏罗希洛夫

№0212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重工业企业
招募复员军人问题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5年6月16日)

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请求根据惯例从工农红军 1935 年复员的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以及低级指挥人员中招募 3 万名分配到重工业各企业中去。

被招募的工农红军复员军人要去的企业单位将另行通告。

重工业人民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

1935年6月16日

附 录：

伏罗希洛夫写在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上的答复

绝密

亲爱的谢尔戈！

我当然不仅不反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招募我们的（原先的）人，并且我要尽力相助做好这件事。可是说真的，有个（令人苦恼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脑中，使我不得安宁，我想同你谈谈心。有

的人离开红军后将被安置在各个常常是极为重要的企业内极为重要的而又十分牢稳的职务上，我们动员时将如何对待他们这些人呢？要知道，红军也极其需要这些人。这件事你是否想过？

克·伏·

No01179

斯大林关于 1936 年控制数字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 年 7 月 21 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今天议了一下 1936 年的控制数字。^① 梅日劳克根据 190 亿的基建规模，提出了一个设想。重工业人民委员部——60 亿；交通人民委员部——30 亿多一点儿；农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数字减少；卫生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公用事业、地方工业等——数字也有减少。即使再精打细算也无济于事，特别是考虑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完全满足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需求。我提出的数字是 220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 65 亿~67 亿卢布（1935 年为 80 多亿），给交通人民委员部增加 4 亿~5 亿；轻工业人民委员部 2 亿，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 4 亿~5 亿，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将近 3 亿，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地方工业、公用事业、邮电人民委员部等——剩下的部分。还在争的有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想要 90 亿），交通人民委员部（想要 45 亿），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及其余各委员部。委托梅日劳克和丘巴尔在 220 亿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设想）。我们再考虑考虑。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削减的：国防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

^① 指 1935 年 7 月 21 日举行的有关 1936 年控制数字问题的会议。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拟订控制数字的指示为 1935 年 7 月 28 日的政治局会议批准。

——修路和机车车辆的修理以及支付新车厢和机车的费用；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建设；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新装备（技术上的）；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造纸厂和纸浆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某些十分急需的企业（煤炭、石油、平炉钢、机床、粘胶、电厂、化学）。这就使事情更为难办。看看再说。

过得怎么样？休息得好吗？

我身体很好，朋友们也一样。向热姆丘任娜同志问好！

约·斯大林

1935年7月21日

附言：控制数字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重新计算问题等到秋天再说。

№01180

斯大林关于 1936 年控制数字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不早于 1935 年 7 月 28 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一、来信收到了。我们打算组建炮兵、空军和海军军官学校。

二、寄上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于编制 1936 年控制数字的指示。正如你所知道的，基建工程的规模确定为 270 亿卢布，而财政拨款为 250 亿卢布。如果基建工程的造价能下降 8%——这是必须要执行的指示。那么国家拨款 250 亿卢布，基建工程将能达到 270 亿卢布。这使降低基建工程的造价和人们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220 亿是不够的，而且也不可能够，这是显而易见的。增加学校建设投资（增加 7.6 亿），增加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地方工业投资（总共增加 9 亿多卢布），增加国防投资（11 亿），增加卫生保健、莫斯科运河建设工程和其他项目的投资（4 亿多卢布），决定了 1936 年控制数字的特点和大小。

我不遗憾，因为必须年复一年地抓紧，以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就写到这儿，敬礼！

向热姆丘任娜同志问好！

约·斯大林

№01181

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问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8月5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来信收到了。关于今年完全取消工业品和食品配给证的问题，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这件事应当一抓到底。^①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得不错。季米特洛夫和埃尔科利作报告之后，大会开得更精彩。代表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决议草案写得不错。我认为，该在共产国际体系内建立第一书记（总书记）制度了。我以为可以由季米特洛夫担任第一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其他人（外国人）可以作为书记人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②

我确实感到有些疲劳。跟共产国际的人打交道，编制1936年控制数字，处理各种各样的日常问题，——不知不觉就感到累了。

但没有关系，休息几天，哪怕只休息几小时，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敬礼！

约·斯大林

1935年8月5日

① 从1935年10月1日起取消了对肉类及鱼、糖、油和土豆的凭证配给制。而从1936年1月1日起取消了对工业品的凭证配给制。

②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反对法西斯及战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No 02125

卡冈诺维奇关于粮食征购情况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5年9月4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你的信收到了。

非常感谢。

很抱歉，对不起，我由于工作过多没有给你写信。你身体不好，我很痛心。看来，你工作时是靠意志在支持着；一休息下来，各种疾病都找上来了。在纳尔奇克，只要有高水平的医疗监视和治疗，你就应当好好休养。

我们这里情况不错。为了简要描述，我把我和米高扬两个人在加里宁动身去索契时对他讲述的话再复述一下。加里宁临行前问我们，要捎什么话给当家的？我们对他说：请转告“国家和党已经作好了准备，射击手虽然在休息，但是整个队伍都会打枪射击。”譬如说，今年粮食征购进展情况——这是我们空前的、非常惊人的胜利，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我们已经征购 10 亿普特粮食，再加上 3.7 亿普特的去年余粮。乌克兰已结束了征购，一些边疆区也结束了征购。

一位最聪明的外国记者杜兰特写道：在美国有人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①大发议论，可是他们却没有看见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昨日报纸上发表的亚速 - 黑海边疆区关于完成粮食征购的报告。

^① 指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报告对前两三年的情况作了评价并正确地得出结论，这是我们政策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正在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决定除征购的外再收购3亿普特粮食。^①现在我们正仔细研究降低粮食的售价问题。

你的工业部门情况也很好。你的人说，一定要完成年度计划，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也要完成各项质量指标。

今天我们讨论了第4季度的计划，给你增加1亿卢布的年度限额，我们已把问题整个送往索契以取得赞同。^②

我们运输部门情况也不错，但是要一直忙碌到入冬。特别是现在出现了急转弯，蒸汽机车管理的命令^③下达了。应该认为，这样做会确保胜利。我没有去西伯利亚，当家的说：“谢尔戈来之后，你再去。”

他现在在休养，似乎休养得不错。克利姆现在在他那里。克利姆是因军事方面的一些事务去的。

好，就写到这里。恳求你把你的身体状况告诉我。祝愿你的身体很好地复原，养精蓄锐，这是国家和你的朋友——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玛丽亚·马尔科夫娜和玛伊亚向你衷心问候。我们大家向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和伊捷罗奇卡衷心问候。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您要好好照看谢尔戈的身体。如果需要什么，请告知。

敬礼！

拉·卡冈诺维奇

9月4日

① 1935年9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从1935年收获的粮食中收购3亿普特的计划。

② 斯大林当时在索契休息，1935年第4季度国民经济计划1935年9月7日为政治局批准。

③ 指1935年8月11日各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改善机车的使用及组织铁路运输》的命令。

№02126

米高扬关于延长治疗时间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5年9月23日)

亲爱的、敬爱的谢尔戈，你好！

我们原以为，日列兹诺沃茨克会使你的肾脏情况有所好转，结果相反。我认为，把你送往日列兹诺沃茨克这是医生的重大错误。他们无权拿惟一的肾来作试验。尽管我不是一个医士，但我通过对你的一切观察了解到，当你自我感觉好、情绪好的时候，当你不过度劳累的时候，当你工作负担不过多、不急躁、睡得好的时候，你的惟一肾脏也工作得一丝不苟。

中央暂把你的治疗时间延长到11月5日^①。如若到期不见明显好转，可再用一两个月来治疗肾脏。

在其他时间，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观点来看这就困难了。目前你不必费心，你已经使人民委员部和整个工业充满战斗激情，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你的副手——尤其是卡冈诺维奇，还有皮达可夫工作认真，他们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都维护着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利益。

听说，你在休假治疗期间一直像在工作岗位上一样因事务关系而接见那么多人。你如果这样下去，你的病不会很快医治好的。你应该控制住自己，只有这样，你的一个肾才能像我的两个肾一样为

^① 1935年9月24日政治局将奥尔忠尼启则的休假时间延长到了11月中旬，因为需要继续治疗。

你长久地服务。

请代我、代阿什亨以及我的全“集团”向齐娜问候。他们所有人都向你问好。

致热烈问候！

你的 阿纳斯塔斯

1935 年 9 月 23 日

№01182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和 粮食收购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5年9月26日)

维亚切斯拉夫：你好！

关于宪法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同党的纲领混为一谈。宪法中应当写上已经取得的东西。党纲中除此之外还应写上我们正在争取的东西。

我的初步计划如下。宪法应当由（大约）七章组成：（1）**社会制度**（关于苏维埃、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等等）；（2）**国家制度**（关于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关于共和国联盟，关于民族、种族平等，等等）；（3）**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取代它的机关，两院，它们的权力，主席团，它的权力，苏联人民委员会，等等）；（4）**管理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等等）；（5）**司法机关**；（6）**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各项自由，结社自由，教会，等等）；（7）**选举制度**。

在宪法中**原则**不应当同其他条款分开，而应当作为宪法开头部分的前几条收入宪法。

引言我认为用不着。

我觉得应当进行全民公决。

至于说到粮食收购，必须将计划稍稍下调。大家都抱怨计划订高了。如果乌克兰减少 1000 万普特，北高加索减少 700 万普特，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减少 500 万或 600 万普特，给其他地区下调计

划再留出 2500 万—3000 万普特，那么我们就只能保持 2.5 亿—2.4 亿普特的计划了。

敬礼！

你的 约·斯大林
1935 年 9 月 26 日

№02127

卡冈诺维奇关于农业等方面的情况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6年9月30日)

亲爱的、敬爱的谢尔戈，你好！

首先请不要生气，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

(1) 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① 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亚戈达充当这个角色当然是力量不够。当建设的组织者是一回事，而当一名政治上成熟的人，能及时揭露敌人又是一回事。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谋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根据我掌握的情报在肃反工作人员中，除个别的外，对撤换领导的反应是好的。亚戈达本人看来对他的调任感到心情沉重，但这不能引起我们同情，因这事关国家利益。至于洛博夫^②，他同样也是不称职，他担任苏联

^① 1936年9月25日，在家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致电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在电报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亚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中耽误了四年。所有的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州代表的大多数都在谈论这一点。阿格拉诺夫仍旧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叶若夫的副手。”9月26日，政治局通过了免去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之职的决定。叶若夫被任命为新的人民委员，兼任中央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便他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都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

^② 苏联林业人民委员，1936年9月29日被解职。

人民委员的职务是力不胜任的。

(2) 农业方面情况不错，当然一些地区歉收比起先预想的要严重些。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在沃罗涅日州和库尔斯克州情况不太好，但是在乌克兰，在西伯利亚边疆区情况良好。我们本来想要对粮食征购加大压力，但当家的指出了我们的错误，要我们不要仓促行事，这无疑是正确的。截止到9月25日，我们已征购11.73亿普特，几乎占计划的80%；是的，去年只征购了计划的88%；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惶恐不安。到9月底拥有11.73亿普特，这情况已经是不错了，况且我们还有可观的去年的储备粮。

因此，当面粉、面包供应站向我们提出建议：不仅要规定在各地出售的限额，而且要对发到个人手中的进行限制，我们申斥了他们。如果那样办，当然只能对搞法西斯主义的诽谤者有利，何况这一措施是毫无依据的。当家的赞同我们的决定。

工业、运输方面，你自然了解一些主要资料，我觉得情况不错。日前我们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讨论了梅日劳克关于产品新统计的报告和建议，报告和建议是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正在生产的产品品种和质量的计划完成情况的统计决定^①提出的。对报告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报告稿中没有把品种同品级区分开来。如果按产品品级来统计人民委员部或联营组织的计划完成情况，那品级有很

^① 1936年7月19日政治局批准了193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的指示，指示中说：“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1937年各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改善产品质量，必须保证产品的配套性，使产品确实与政府所规定的品种相一致，符合政府所确定的标准规格和技术条件。”“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对产品总量的计划完成情况所进行的统计是不正确的，规定，每个工业企业的计划完成情况首先应当根据成品和成套产品的生产量进行评估，确切地说是按照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所规定的相应的质量标准、技术条件进行评估。”“责成各个人民委员部立即在各部所属的主要企业推行上述制度，在20天内呈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而从1936年第四季度起将其向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所有企业推广。”

大的数量，这就造成了书面上的混乱，不仅不能促进为完成计划而斗争，反而压低了计划。必须确定品种类别，我们将以此统计生产计划是否完成。

此外，顺便一并解决一个具有极重要意义的问题：以价值表现，以含营业加价和营业税的商品价格为单位计算计划。

这意味着：按生产总量，食品工业将居首位，轻工业居第二位，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居第三位。这可能是早晚要出现的，尽管我对此还有所怀疑，但为什么要适逢统计时顺便来解决这样问题呢。总之，报告稿没有通过，责成对报告稿进行修订，交换意见。我认为，当家的不在场，我们不能解决这问题。我们可能把材料给你寄去，或者我通过电话讲给你听。

(3) 西班牙方面的情况^①不太好。白匪正在接近马德里。我把几份局势通报寄给你。我们不仅在粮食方面帮助他们，而且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帮助他们。现在我们正打算提供一定数量的坦克和飞机，但是首先我们在技术上有很大困难，其次，他们本身组织纪律性很差；他们党还较弱，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本性不改，因此，在基层具有战斗精神而地方的组织和领导不强的情况下，外援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我们那个不完全称职的全权代表经常在密码文件中所说的那样，认为马德里的举动是无望的。

我们根据当家的建议派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去巴塞罗那任总领事，他大概要比罗森贝格强些。

如果我们和西班牙有共同边界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脚踏实地地提供援助。顺便说一句，西班牙事件和在我国国内开展的运动显示出我国人民多么优秀、伟大，显示出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感情多么

^① 指 1936 年 7 月开始的西班牙内战。

深厚，觉悟多么高。

(4) 其余的事就是我们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但要告诉你，你走后，就更困难了，这正如我所预料的。总而言之，当家的不在，感到担子很重，而你又离开了，那就感到更重了。很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去找当家的处理大量事务而中断他的休息。他的健康，他的充沛精力对于我们爱戴他的人，对于整个国家是多么重要，此时难以以言语表达出来。

至于反革命案件，我就不写了，因为你去过当家的那里，一切都看了，也谈论过。^① 你不知道的其他新闻暂时没有。

好，就写到这里，不然你会读厌倦的。

我和玛丽亚·马尔科夫娜、玛伊亚向你和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致以衷心的问候。

紧紧拥抱你！

你的 拉扎尔

9月30日

又及：把寄来的安季波夫的关于橡胶工业的便函寄给你。这便函我暂时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请你阅看，然后说说你的意见。

拉·卡·

^① 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会面的文件目前还不为人知。

No 02128

卡冈诺维奇关于汽车生产等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泽的信

(1936年10月12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你的信收到了，谢谢。

昨天我们开了政治局工作会议，是当家的走后开的第二次会议。我把记录寄给你，在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我要详细对你讲的是关于高尔基汽车厂的汽车生产问题。^①

当家的有一次要求查清楚，M-1型汽车的一些零件是否用的是“别克”牌轿车零件？于是我们把问题摆了出来，查明，一些零件：如车轮、驾驶盘、钢板弹簧、机架、减振器、空气滤净器等等确实不同于“福特”牌轿车零件。

由我们来判明这是否有危害，是困难的。于是我们责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研究清楚，向我们汇报。季亚科诺夫本人报告说，这不会产生不协调。利哈乔夫似乎认为，这影响结构质量。但主要的是，在会上查明零件生产质量非常差，从而事故时有发生；查明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和后桥存在重大缺陷。我个人强调说，我们不止一次碰到试制的困难，主要的并不在于在数量方面计划完成得不好，尽管这是不好，但主要的是季亚科诺夫，还有普拉姆涅克同志没有认识到试制汽车的所有严重性。谢尔戈，我

^① 在1936年10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12个问题。高尔基汽车厂的汽车生产问题居首位。

必须告诉你，季亚科诺夫就是毫无热情，讲话像是个旁观者，而普拉姆涅克一味抨击其他供货的工厂，说这些工厂把一切都搞坏了。我们对季亚科诺夫施加了压力并责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10天内提出他们的提案。无人代表你发言。鲁希莫维奇在场，我们也嘱托他准备好提案。

必须帮一下米高扬，催促乌克兰人加快挖掘和运送甜菜。不然的话，甜菜就不行了，别列尼基有些怨言；如果我们再拖延，就可能破坏了食糖计划。

收到了米高扬从美国发回的一封有意思的信，现把他的这封信寄给你。

人民委员部里我的一些事进行得不怎么好。装载出现一些毛病。看来，这事说明，要想保持已达到的水平，就必须始终掌握全盘，一切权力不能旁落。今明两天就着手抓这件事。我知道，你在全力工作，为实现运输机器规划而操心，为此我谢谢你；你把这事委托给布鲁斯金办，这很好。我必须告诉你，根据一些事实，我看出鲁希莫维奇对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不忠诚。

你的冶金方面的情况不错，我尽力帮助他们，我觉得最近一些日子我们运送比以前好。你用不着急于结束休假。这里天气不太好。你在工作速度方面该“稳重”了。已经50岁了。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我们将一起庆祝你的60岁生日和80岁的生日。

总的情况，我们这里不错。我们和当家的联系密切。就西班牙

事件最近的几次声明^①都是由他发起的，是他定稿的，从“刻不容缓”的风格上你可能觉察到了。我们的声明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英国人、法国人）原以为我们变顺从了，以为我们也将以联盟的名义掩饰可耻的欺诈，可是他们又错了。这使西班牙人精神振奋，尤其是在声明之后，不单单只是口头上，紧跟着的是行动。我们派出了……

根据当家的建议，我们在伦敦委员会上将马上首先宣布，我们建议英法两国用他们的舰队实行对葡萄牙港口的监督。如果我们这一建议被拒绝，就根据当家的指示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同意订立不干涉协定并期望国内战争期限将缩短，伤亡将减少。过去的一段时间表明，叛乱者不断得到供应，未受到制裁。因而我们的尝试是不成功的，所以苏联政府不希望处于迫不得已帮助非正义事业的那些人所处的地位，认为应恢复西班牙政府在境外购买武器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权利是世界上一切政府都享有的，协定的参与国则可以出售或者不出售武器给西班牙。这就是最近要发

^①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在法英的倡议下，1936年8月苏、德、意等欧洲27个国家签订了“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禁止把武器输往西班牙，禁止西班牙购买的武器过境。9月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监督协定的执行。这就阻碍了西班牙共和国获得武器和各国人民的支援，而弗朗哥叛军却可以从德、意、葡萄牙等国间接获得武器供应。1936年10月7日，针对德、意、葡萄牙不断对西班牙叛乱分子提供援助的事实，苏联驻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的代表向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赞同将不干涉协定变成掩盖某些协定参加国反对西班牙合法政府，对叛乱者提供军事援助的幌子。”“苏联政府因此不得不声明，如果破坏不干涉协定的行为不马上中止，苏联政府也将不受协定规定的义务的束缚。”

表的声明的简要内容。^①

老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和父亲所精通的政治中的伟大辩证法。现在笨头笨脑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尤其是那些记者大喊大叫：“斯大林想毁掉协定”，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对破坏协定视而不见。斯大林不是想支持扼杀西班牙共和国的卑鄙勾当，而是想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勒死法西斯分子。

给你寄去外国报刊的综述以及应我的请求编辑而成的其他评述。

哟，我的信拖宕起来了。我还要告诉你，叶若夫同志的情况很好！他已按斯大林方式着手工作，很起劲。我们要按布尔什维克方式镇压匪徒，镇压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挑拨者的欺骗卑鄙无耻，耍两面派，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革命的镇压必须是相应的。

好了。我、玛丽亚及玛伊亚向你，向齐娜伊达·加弗里洛夫娜致以衷心的问候。

致以衷心的问候！

握你具有 50 年阅历的布尔什维克的手！

你的 拉扎尔

10 月 12 日

^① 1936 年 10 月 12 日，苏联驻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致信委员会主席，在信中他根据苏联政府的委托向委员会提出由英国或法国的舰队（或两国的舰队）对葡萄牙港口进行监督，以防止对叛乱者供应武器。委员会主席在 10 月 14 日的信中拒绝了这一要求。1936 年 10 月 24 日苏联各报纸刊登了驻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致委员会主席的信，在信中说：“苏联政府与各国签订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协定，是希望协定的参加国都能履行这一协定，以缩短西班牙国内战争的期限，减少伤亡人数。但是，过去的一段时间表明，协定遭到了其一些参加国的不断破坏，叛敌者不断得到供应，未受到制裁……”“苏联政府不希望处于迫不得已帮助非正义事业的那些人所处的地位，它认为摆脱目前局势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应恢复西班牙政府在境外购买武器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权利是世界上一切政府都享有的，协定的参与国则可以出售或者不出售武器给西班牙……”

No 02129

伏罗希洛夫关于红军演习等情况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6年10月16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谢谢你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情况良好，似乎是这样，当然也不是没有过错和缺憾。

工农红军的演习好于往年，人们成长成熟了，掌握技术的信心更足了。

军事技术照常保持良好状态，个别情况很出色，但是……这方面也存在某些漏洞和缺陷。演习过程中没有发生飞机失事，只是波罗的海舰队由于飞行员的过错出了一起愚蠢的事故。

简言之，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能直截了当地对资产阶级说：“现在请便吧！”

我到过高尔基市莫洛托夫工厂，印象极深刻，我认为，M-1型汽车很快就能完成；在21号工厂米罗什尼科夫那里情况不错。你的关于流水作业的指示得到贯彻，我觉得贯彻得十分彻底。需要给米罗什尼科夫以帮助，工作会搞好的。

在92号工厂情况很糟糕，好在罗德凯维奇已被撤换。

一般地说，Φ 22的状况不好。我给基洛夫工厂分去几名炮兵学院的工程师。这种炮的计划完不成。可是人们全力以赴地干，我们一定要坚持完成一件事。

是的……担任你的副职的人^① 竟然是个下流坯，是个一流的恶棍。关于他的传说，你可能已经知道。真是个恶棍！

我们工作十分紧张，期待着您的归来：您不在时，感到有些寂寞。好，祝一切顺利，要休息，要养精蓄锐。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向你问候。

紧紧握你的手！

你的 克·伏罗希洛夫

10月16日

^① 指皮达可夫。

【专题说明】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 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

（1927年6月至1940年6月）

为了保证政治局能有秩序、有效率地工作，能安全秘密地发送和收回文件，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从如何向政治局提交问题，多少时间之前提出，呈交多大分量的材料，到召开会议的程序；从发送决议和指示的保密措施，到逾期不交还文件的处理；从政治局决议执行情况的系统监督，到限期内不执行决议的处罚，都作了相关的规定。

从本组文件可以具体看出，苏联最高决策机构是怎样开展日常工作的。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鲁桓、吕存亮翻译）

№0206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保存、熟悉和归还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制度的决议**

（1927 年 6 月 10 日）

35.——关于保存、熟悉和归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制度

（布列扎诺夫斯基同志）

批准如下决议：

（会议记录№120. 第 35 项附录 6）

保存、熟悉、归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规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27 年 6 月 10 日批准）

1.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应由收到记录的同志本人保存，或由受他们委托的、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第一类人（必须是联共党员）保存。

注：允许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第二类受委托人保存密封形式的中央委员会记录。

2. 将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保存在不能燃烧的卷柜内，夜里卷柜应加封。

3. 绝对禁止将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从组织或机构的房间带出。

4. 绝对禁止将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作为私人档案资料保存。

5. 严禁迁移时将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随身运走。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

6. 收到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同志，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对此专门附带说明，不能让任何人了解记录的内容。

7. 在苏维埃机关进行公文处理时，绝对禁止复制和摘录以及口头或书面引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8. 只有给寄送了组织局记录摘录的同志，才能够了解记录摘录（往一个机关只能寄送一份摘录，并指明在该机关内的所有收件人）。

注：有关任务、决定的摘录只能寄给党组织和机关的领导人。

9. 归还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记录的期限，自收到之日起不得超过 7 天。

10.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的记录摘录应不迟于两周的期限内归还。

11. 组织局特别公文夹中的摘录应在收到之日起 3 天内归还。

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材料允许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和地方党组织在部门和组织领导人亲自负责的情况下保留较长的期限。

12. 在莫斯科，本人或通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受委托人按照上述第一项的办法归还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外埠——只能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要通信使团归还。

13. 在规定期限内，如果没有归还两份以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记录和 5 份以上的组织局和书记处记录时，在归还以前暂时停止继续寄送。

14. 除本决议规定的规章外，收到中央委员会机密材料的同志有责任在每一个别情况下采取补充措施，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工作的最大秘密性。

№02068

政治局关于保密工作的决议

(1929年5月16日)

17.——关于保密工作

(1929年5月9日的政治局记录№79, 第15项)^①

(卡冈诺维奇同志)

批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保密工作决议的修正案(见附录2)。

政治局记录№80, 第17项, 附录2

关于保密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9年5月16日批准)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的秘密性, 认为采取

^① 政治局1929年5月9日的决定要求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采取措施严格执行1929年4月23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所做出的关于保密工作的决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采取特别措施——直至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这才能保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的秘密性, 排除托洛茨基分子获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一些举措的可能性”。因此要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无条件地履行”“领取秘密文件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秘书只能由经受过考验的人充当, 并一定是共产党员”这一决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要求自己的秘书“严格遵守保密规章”, 责成书记处“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秘书及其他领取秘密材料的同志进行精心检查”。

下列措施是必要的：

一、废除第二类受委托人制度（即受委托领取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但无权拆封的受委托人）。建议所有通过第二类受委托人领取文件的同志由本人亲自领取和保存文件，向中央委员会归还时，或亲自归还，或要求中央委员会专门为此事挑选出来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来取。建议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最大限度地简化归还手续。

二、只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及挑选出来出席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身边才能留有领取文件并有拆封、保存和归还权的受委托人。

三、委托由罗捷曼（主席）、波隆斯基、博基、阿格拉诺夫、托夫斯图哈（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代替）、特里利塞尔和皮亚特尼茨基诸位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详细审查所有第二项中提到的受委托人和秘书。工作期限为两个月。

四、采纳托夫斯图哈同志的建议，也委托上述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审查。期限为3个月。

五、重申早先（1927年5月5日）通过的关于归还政治局记录的期限为3天的决定。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没有归还记录，下次的记录不再寄送。

六、照例规定政治局会议的摘录不寄送给收到政治局记录的同志，但紧急问题和特别公文夹中的问题例外（后两种只能由收件人亲自领取和归还）。

七、再次重申坚决执行政治局1927年5月5日关于利用秘密材料的决议（第二、三、六项），把它分寄给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领取秘密文件的人（见附录）。

附 录：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5 日的决议（节录）

关于利用秘密材料

根据原先行之有效的原则，秘密事务只应让绝对需要知道的人知道，为了在往来中和利用秘密材料时保证最大限度的秘密性，认为必需做到：

……

二、关于寄送秘密文件

1. 只有给寄送了政治局记录摘录的同志才能了解政治局记录摘录（往一个机关只能寄送一份摘录，并指明在该机关中的所有收件人）。

2. 规定返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记录的期限，自收到记录之日起，不得超过 3 天。

3. 归还政治局记录的摘录，应不晚于 7 天的期限。特别文件夹中的摘录应在 24 小时之内归还。

注：允许外交人民委员部、军事部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机关领导人亲自负责的情况下把材料留下较长的期限。

4. 重申特别秘密的文件寄送时不应写机关收，而应寄送给有关的个人（在信封上写“亲收”字样）。

5. 寄送给各机关和地方的同样的指示，只寄送到一个地址。

6. 重申分别寄出的各份材料必须编号码。

7. 政治局的密码文件和材料，写明“亲收”的，只能由收件

人拆封。

注：委托托夫斯图哈同志调整当面交接材料的办法。

8. 责成机关领导对及时归还和销毁所寄送的秘密材料进行特别严格和仔细的监督。

9. 照例规定，为两个部门和其他讨论秘密问题的委员会会议准备的全部材料只应寄送给应该了解整个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们，不同部门和机关的代表只寄送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那一部分材料。

10. 规定按委员会议事日程分别寄给委员会主席的秘密材料，就有关问题通过决议后立即归还。

11. 建议所有机关和委员会在没有秘书和报告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讨论最秘密的问题时，由主席本人作记录。

12. 认为必须把寄送给工作需要同志的情报材料缩减到最低数量。

三、关于秘密材料的保存、交流和转寄

1. 重申在住宅和机关保存秘密文件的规章制度。

2. 重申除外交邮件和机要文书外，禁止转寄和转运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密文件的规章制度。

注：按照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决定，这个规章制度可能有特例。

3. 绝对禁止把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材料作为个人档案材料来保存。责成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向所有同志索取他们手头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材料。

.....

六、关于从事保密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

各个机关和组织从事保密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如果在保密事

务方面有犯法行为，应承担超司法程序的责任。

七、关于本措施付诸实施的办法

1. 责成各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尽快实施上述一切措施。今后对秘密文件的保存、寄送及对归还和利用的监督办法要予以特别细心的注意。

2.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博基同志）监督持有密码的机关和个人正确地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密码。

3.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博基同志）监督上述决议的实施情况，同时建议每隔半个月向政治局提交本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4. 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散布秘密决议和各类政治性流言蜚语的同志进行坚决的斗争。

№02069

政治局关于归还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记录的决议

（1929年5月23日）

12.——关于归还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记录
（托夫斯图哈同志）

一、修改政治局今年5月16日的决议（会议记录№80，第17项附录5），规定归还政治局记录的期限为5天。

二、责成领取政治局记录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认真执行政治局关于如期归还记录的决定。

三、恢复以前寄送政治局记录摘录的办法。

№02142

政治局关于无休息日工作周的决定

(1929年9月30日)

31.——关于无休息日工作周

(1) 自10月1日起，中央各机关会议间隔期为10天，规定会议日如下：

政治局会议——每月5日、15日、25日；

组织局会议——每月10日、20日、30日；

书记处会议——每月6日、16日、26日；

(2) 责成担任副职人员开会协调中央苏维埃机关会议日。

(3) 根据(1)项，建议各机关领导和向其他政治局提出问题的人员应不迟于每月9日、19日、29日的12时向政治局提交相关的材料。

(4) 通过副职人员会议的提案：依照惯例规定，在10天周期内应有固定的4天，即每月尾数为2、4、7、9的日子，不召开任何苏维埃的会议或党的会议，用来进行日常工作。这些天应作为领导人的休息日。

No01996

政治局关于为政治局 会议准备材料的决议

（1929年10月5日）

70.——关于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

（1）重申政治局1928年8月9日的决议^①：凡提交给政治局的任一问题的书面材料，都应由①篇幅最大为5~10页的说明书和②政治局决议方案组成。

如果寄来的材料多于这些篇幅，书记处应将材料退给送件人删减。

注：1500个字母（即大约30行，每行50个字母）的一页算作正常规格的一页。

（2）寄给会议的书面材料应不晚于每月的9日、19日、29日的中午12时（相应地为15日、25日和5日的政治局会议）。在此期限之前未呈交材料的机构和个人，不能期望把问题提交到政治局。

（3）建议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不要把虽有提出问题的书面请求，但未寄来有关问题实质的材料的那些问题列入政治局的议事日程。

（4）各部门就给会议寄送材料所作的结论应不迟于它们寄出相应材料之后的两昼夜提出，否则这些部门不得给会议寄送材料。

^① 此决议案是1928年8月9日由莫洛托夫提出的。

№01997

政治局关于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的决议

(1930年9月5日)

1. ——关于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的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

依照政治局 1929 年 10 月 5 日的决议，不得将未提交材料的问题列入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按照政治局的特别决议可以破例。

№02076

**政治局关于边疆区委会和
州委会答复中央委员会有关亚麻大麻
采购的电报决议**

（1930年11月30日）

9/17.——关于边疆区委会和州委会答复中央委员会有关亚麻大麻采购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一、指示乌拉尔州委会、伊万诺沃州委会和东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会的书记们，中央委员会11月20日责成他们在3天内就他们为加强亚麻大麻的收购采取了什么措施，为了加强亚麻大麻的收购对中央有什么要求做出回答的决议，他们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二、责成这些组织的书记们在两天期限内对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做出答复。

№02077

政治局关于检查政治局 决定执行情况的决议

(1930年12月10日)

28/39.——关于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委托波斯特舍夫、阿库洛夫和帕夫卢诺夫斯基三位同志检查列入清单^①中的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10日后汇报。

^① 会议记录中没有政治局决议的清单。

№ 11680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1930年12月30日）

17/27.——关于政治局会议

（斯大林同志）

（1）每逢10日、20日和30日政治局会议只听取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和国防问题，听取货币（机密的）问题和党内一些问题；其余问题移交政治局例行会议（每月5日、15日、25日）研究。

（2）责成中央书记处协同莫洛托夫同志编制政治局会议议程。

（3）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定于1月7日（中午12时）举行。

№02078

政治局关于在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
民族中央委员会检查中央委员会
指示的执行情况的决议

(1931年1月23~24日)

42/43.——关于在州委会（边疆区委会、民族中央委员会）
检查中央委员会指示的执行情况

一、通常在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至少不应少于3名书记。

二、委托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分出一名书记负责检查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示执行情况的检查并负责及时答复中央委员会的查询。

三、建议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通报挑选出来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指示执行情况的书记的姓名。

№02079

政治局关于在规定的期限内 不执行政治局决定的决议

（1931年3月5日）

68/30.——关于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政治局1930年12月10日决议）

一、责成各人民委员部挑选出部务委员负责及时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二、人民委员部挑选出的部务委员在人民委员内部依照附加的条例（见附录）组织系统地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系统地编写关于政治局决议执行过程的旬报。

四、批准政治局委员会1931年1月19日关于把检查政治局一系列决定执行情况的工作移交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的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1931年3月5日政治局记录№28，第68/30项的附录

关于在各人民委员部和各机关组织 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1. 委托直接从属于人民委员部的专门小组进行系统的登记和

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专门小组的组成：

(1) 负责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2) 人民委员部的代理人和 (3) 代理人的副手。

2. 专门监督小组：

(1) 就中央委员会主要决议详细制定实施这些决议的计划（指明具体的执行人和执行期限）和通过执行检查处组织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2) 准备并及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必需的材料和中央委员会决议在决议指出的期限内的执行进程资料（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没有规定期限，那么应在中央委员会检查机关指定的期限内呈交材料）；

(3) 执行中的任何延误都应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指出延误的原因和为完成决议而采取的措施；

(4) 对中央委员会交给该部门鉴定或批准的材料的情况进行登记和检查，并把采取的措施及时报告中央委员会。

3. 所有寄给中央委员会的（检查）材料都应由负责检查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部务委员签字。

4. 认为自收到中央委员会的各种决议之日起不迟于一昼夜的期限内，按惯例在人民委员部里（以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命令等的形式）办理，都是适宜的。

5. 对该部门地方机关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情况的检查，由执行检查处实施，该处是把这些决议作为该人民委员部或政府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处的领导人务必保证首先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须知这些是以苏维埃方式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

6. 通常，规定人民委员应向受委托直接执行该决议的那位副手或部务委员以及执行检查处的领导人介绍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份下

发的决议。委托各人民委员部制定一份有权了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员的准确无误的名单，并将名单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

7. 绝对禁止有权了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在给机关下达命令时，引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命令。这一规章也可扩大到为中央委员会准备材料方面。

8. 对及时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规定严格的责任，建议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对不执行决议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直到解除工作。

9. 进行登记和检查的技术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

№01998

**政治局关于地方
当局质询的现时问题的决议**

(1931 年 4 月 30 日)

4/6.——关于地方当局质询的现时问题
(斯大林同志)

今后就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协同莫洛托夫同志解决地方当局质询的现时问题，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把问题提交到政治局。

№01999

**政治局关于向政治局会议
提交材料的程序的决议**

（1931年11月5日）

3. ——关于向政治局会议提交材料的程序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两位同志）

兹规定各部门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作为政治局会议的材料
的书面报告，不应超过4~5页。

№02000

政治局关于向政治局会议 提交材料的程序的决议

(1931 年 11 月 15 日)

3.——关于向政治局会议提交材料的程序
(斯大林同志)

修改政治局今年 11 月 5 日的决议，将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提交的材料（说明书和决议方案一起）限制为最多 8 页。

№02144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等 召开会议时间的决定

（1931年11月25日）

5.——关于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

（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两位同志）

自1931年12月1日起，正式核准会议时间表如下：

政治局——1日、8日、16日、23日下午2时；

组织局——5日、17日晚6时；

中央书记处——7日、15日、22日、29日晚6时；

苏联人民委员会——3日、21日晚6时；

劳动国防委员会——9日、15日、27日中午12时。

№02080

政治局关于斯大林建议的决议

(1932年4月8日)

10.——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

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为自己的地方机关编写一份具体指示，说明当今的主要任务是天天检查中央下列决议的执行情况：即关于日用必需品的决议；关于发展苏联贸易，改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组织的决议；关于开展和改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轻工业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商品基地的工作的决议；关于实行价格政策并以实现这项任务来检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的活动能力的决议，如果这些地方机关在这方面工作很糟时将其改选掉。

№02001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2年5月29日）

78/21.——关于政治局的议事日程

政治局的议事日程由政治局内部会议制定。

№02002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2年9月1日)

42. ——关于政治局会议的议事日程 (斯大林同志)

(1)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方案，以使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不多于15个。

(2)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古比雪夫同志依照前一项规定，共同制定出政治局9月8日会议的议事日程。^①

^① 这一议案是1932年9月1日政治局结束时斯大林提出的。9月1日这一天的议事日程共列入了41个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有6个问题要拖到下次会议上讨论，一个问题被取消，还有一个要在第二天以咨询的形式进行讨论决定。因此斯大林提出了此议案。

№02003

政治局关于斯大林声明的决议

（1932年10月16日）

5.——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指示中央委员会秘书处^①在政治局会议期间必须停止以咨询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免得分散政治局委员们对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的注意力。

^① 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处负责处理政治局的公文、对政治局的活动给予技术保证。1933年11月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了改组，它仅为政治局服务，并直属于斯大林。

№02070

政治局关于伊克拉莫夫 把政治局记录遗留在旅馆的决议

(1933年2月1日)

125/107.——关于伊克拉莫夫同志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记录遗留在“民族”旅馆的问题

由于伊克拉莫夫同志以不可容忍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中央委员会文件（动身去中亚后，将政治局的记录遗忘在“民族”旅馆的房间里）——剥夺他在3个月内领取中央委员会记录的权利。

№02145

政治局关于政治局会议日的决定

(1933年4月23日)

——关于政治局会议日

规定政治局会议每月3次——5日、15日和25日。

№02071

关于政治局会议记录归还情况的报告

(1933年8月8日)

致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鉴于苏霍娃同志对第5科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就第5科的工作向您作个简短报告。

登记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材料缺得很多。

自1930年7月起，政治局记录的简短摘录便没有查问过，归还是放任自流的，不足60%。对特别公文夹中的摘录查问过，但没按部就班，坚持得不够，因此，直到现在没有归还的1930～1932年的摘录有200份左右（不算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允许这些单位可以留用很长时期）。

用于备案和供会议使用的政治局的材料，包括宣传部的材料，到1933年3月以前均未查问过，归还是放任自流的，不足60%。

对速记记录的查问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但是，对那些虽经两三次索取后仍未归还速记记录的人和党委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因此，1931～1932年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没有全部归还。

对记录仔细地查问过。1930～1932年间的政治局记录有3份没有归还（经您许可），组织局和书记处的10份记录没有归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通信）。由于登记卡的混乱，很难说这些记录是丢失了还是归还后没从卡片上注销。

第5科的工作人员将材料大量欠缺解释成是下列“客观”原因

造成的：

1. 第 2 和第 3 科没有很好地填写登记卡片，因此，为把卡片搞准确花费了很多时间。

2. 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固执地”不愿意在规定的期限内归还材料。

3. 第 5 科工作人员的数量一向少于按编制规定的人数。

实际上大量材料欠缺首先是由第 5 科工作人员的过错造成的。

1. 我通过抽查第 2 科的卡片，的确发现了一些甚至“用肉眼”就能看到的大量错误，这些错误带来了混乱，给第 5 科造成了多余的工作量。

(1) 在印刷厂印的登记政治局会议材料的卡片中，往往没有勾掉尚未寄送该材料的人名。我发现并撤销登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鲍曼等同志名下的 1932 年政治局的材料达 150 份，这些材料没有寄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从卡片中划掉。

(2) 不总是指明很少或初次寄给材料的人的工作地点。

(3) 把暂时不寄给材料的人从卡片上勾掉的作法太随便了。

第 3 科填写的卡片比第 2 科的更糟。

第 5 科的工作人员在收到卡片的当天，不是认真地审查登记卡片和改正发现的错误，而是不做任何检查就把这些卡片钉在登记簿上。

由于第 2、3、5 科的工作人员对待登记卡片的这种态度，第 5 科白白花费了许多工作时间——查询未寄送的材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为了查找他们没有收到的材料也花费了很多时间。

2. 第 5 科的工作人员极其马虎地标出（在登记卡上划掉）归还的材料。

例如：

向皮达可夫同志查询 18 份,	查询前归还 5 份
向伊林同志查询 11 份,	查询前归还 2 份
向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查询 30 份,	查询前归还 7 份
向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查询 37 份,	查询前归还 10 份
向安季波夫同志查询 3 份,	查询前归还 3 份
向加里宁同志查询 65 份,	查询前归还 60 份
向柳比莫夫同志查询 30 份,	查询前归还 3 份
向科马罗夫同志查询 4 份,	查询前归还 2 份
向波斯特舍夫同志查询 18 份,	查询前归还 4 份
向阿库洛夫同志查询 18 份,	查询前归还 3 份
向罗森霍尔茨同志查询 17 份,	查询前归还 2 份
共计 250 份	100 份或 40%

对拖延不归还材料的连续不断地检查表明,由于对待材料登记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致使 20~25% 的归还材料没有从登记卡上划掉,为了“调查”这些材料,第 5 科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白白花费了很多时间。

3. 把积压欠缺材料解释成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和党委固执地不想及时归还中央委员会的材料,同样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我进行的查询实践表明,问题不在于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和党委固执,而在于 4 月 1 日以前在第 5 科中所存在的查询“方法”。

(1) 有些材料的查询延迟了 1~2 年。

(2) 时常查询那些或是没有寄送出去,或是早已归还的材料。

(3) 对查询的寄送不定期。大约过了一年,寄出第 1 次查询,第 2 次是在第一次查询后一年半,再经过一年半才寄第 3 次,等等。

(4) 某些受委托人(肖穆什金、斯韦什尼科夫、约阿尼迪斯、费尔德曼)在 1~2 年时间内连一份材料也没有归还。第 5 科没有

给他们寄发坚决要求归还材料，若不归还便把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函件，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编写未归还的材料清单，仅仅寄了提醒保存期已过的函件而已。

（5）第5科没有检查收到查询的收据，因而有时查询没有寄送到收件人手里（向弗伦克尔同志查询的事件正说明这一点）

这种查询的“方法”致使第5科丧失了威信（如果该科曾经有过的话），而要恢复威信则需很长的时间。

在4~7月这个时期内，科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1）收到登记卡的当天便进行检查，发现缺点立即改正。

（2）在登记归还的材料时把遗漏减少到最低限度。

（3）由于对填写登记卡片向第2和第3科提出严格要求，卡片上的不足之处减少了。

（4）改变了查询方法。第一次查询后，过5~7天进行再次查询，如果没收到材料或回复，便寄送警告。

（5）在登记技术方面采取了某些合理化措施。

由于这些改进措施，1930~1932年欠缺的材料明显地减少了，自动归还1933年寄送的材料百分比增加了。目前，宣传部的记录和摘录保存期满后立即进行查询，这些材料的欠缺已为数不多了。

到8月末，科可以实行格罗斯曼委员会的建议——索回保存期已过的所有各种材料，这样，材料丢失的情况将会消除。

报告您知悉，在4~7月间，在消除材料的欠缺和改善科里工作人员的登记技术和工作质量方面我花费了大量时间，由于上述原因以及由于工作人员休假和亚历山德罗夫和我生病，中央委员会各处，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党委的调查计划没有完成，有关科的情况的方案没有完成。

8 月份，第 5 科各个工作部门的落后现象将被消除。

1933 年 8 月 8 日

(签名)^①

^① 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2072

**书记处关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委会
遗失联席会议速记记录的决议**

（1933年11月14日）

200r——关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委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遗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全会第一批速记记录（1933年）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一、因没有安排好秘密材料的保存及超过保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全会的速记记录的规定期限而造成的延误，向区委负责书记卡西亚年科同志提出警告，在一年内剥夺卡西亚年科同志领取秘密材料的权利。

二、把本决议分别寄给领取中央委员会秘密材料的所有的人和组织。

№02147

**政治局关于党的监察委员和
苏维埃监察委员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1934年2月19日)

69/49.——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政治局会议

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可不受限制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两个委员会委员可以出席与其工作问题直接有关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02148

政治局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和 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1934年3月5日）

153/137.——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

（1）准许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了解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组织局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此外，准许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各小组领导人，就与他们工作直接相关的问题了解寄给中央书记处会议、组织局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有关问题的材料。为此，应寄发给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各一份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与列为会议议程的问题相关的会议材料。

（2）把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组织局会议记录和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发给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派驻各州、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的特派员。

（3）准许党的监察委员会各小组领导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4）准许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各小组领导人出席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会议。

№02081

政治局关于不执行中央委员会 有关莫斯科铁路修配厂决议的决议

(1934年3月31日)

28/10.——关于不执行中央委员会1933年7月23日有关莫斯科铁路修配厂的决议^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为莫斯科铁路修配厂规定低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生产生铁铸件的计划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违反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而且就生产能力而言,工厂是能够完成更高计划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莫斯科铁路修配厂制定过低的生产计划和不利用工厂主要车间的生产能力,严重违反中央委员会决定,因此给托拉斯经理奈蒙同志、工厂厂长基尔同志严重警告。

2. 因违反中央委员会决议批准莫斯科铁路修配厂过低的计划,给予苏联国家计委铁路处处长叶姆沙诺夫同志警告处分。

3. 因铸钢车间工作混乱和设备毁坏,解除车间主任切特金同志的工作。责成安德烈耶夫同志将切特金同志调到低级职位上。

4. 建议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安德烈耶夫同志亲自负责:

^① 1933年7月23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规定:“责成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要求莫斯科铁路修配厂完成1933年建设计划所规定的工作,以保证1934年制作机车车辆的备用零件:锻件不少于15000吨,生铁铸件不少于25000吨的生产计划。”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

(1) 在 5 天期限内，依照开工委员会规定的生产能力为莫斯科铁路修配厂制定出 1934 年的生产计划。此外，在两个月期限内，在莫斯科铁路修配厂组织优质钢的熔炼；

(2) 立即加强铸钢车间、铸铁车间和锻造车间的技术领导，把业务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派到那里去；

(3) 保证充分利用 1934 年拨出的住宅建筑费用。

5. 莫斯科铁路修配厂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业企业的一样。

№02008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致费用的清单

(1934年8月)

第五层全体工作人员^①（一年的）大致费用

工资，300000 卢布

职工社会保险，60000 卢布

发送邮件费，45000 卢布

转寄机密信件，20000 卢布

外交邮件，2000 卢布

邮电费，250000 卢布

印刷费，10000 卢布

办公用品，6000 卢布

报纸和杂志，5000 卢布

定量供给的面包，50000 卢布（不开会时）

食堂用餐的补助金等，76000 卢布

总计 914000 卢布

加上器皿、照明等 86000 卢布

共约 1000000 卢布

因为这些费用是与特别处一起计算的，因此是大致的。

没有为建立节约制度进行系统的斗争，各社会组织对这件事未加注意。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一直住在旧广场中央委员会大厦的第五层，直到苏共存在的最后一天。

联共（布）政治局有关日常工作程序的决议

我们为电报支付的费用是非常庞大的：经常给所有邮电分局和区邮电局拍电报（8000 封），还常经州委会拍（80 封），而且电文与书信文本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我仔细查阅了所有的电报，并依照同拍报人达成的协议删减不必要的词句和标点符号。此外，在同各科员协商后，缩减了各类报纸 30 份。

节约的金额如下：

电报费，48500 卢布

各类报纸，750 卢布（一年）

1934 年 8 月

签名^①

^① 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2030

**政治局关于为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准备问题的决议**

（1937年4月14日）

51.——关于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准备问题

（1）为了为政治局作准备，也是为了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解决保密性质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外政策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下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诸同志。

（2）为了让政治局能顺利地为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性质的问题作些准备，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下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为：莫洛托夫、斯大林、丘巴尔、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

№02073

**政治局关于寄送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决议**

（1938年10月16日）

183.——关于寄送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寄送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各局委员、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州委会（边疆区委会）第一书记、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联共（布）巴什基尔和鞑靼州委会第一书记。

№02074

书记处关于让中央监委全权代表 了解中央委员会记录的决议

(1939年10月5日)

79. 一关于使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了解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记录

责成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向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介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和决议。

№02075

**政治局关于使中央监委在各地的全权代表
了解中央委员会记录的决议**

（1940年6月10日）

150.——关于使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了解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记录

（组织局 1940年6月8日，np.40，п.150～rc）

允许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了解寄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州委会、边疆区委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和决议。

【专题说明】

30年代文化领域的“左”倾浪潮

(1929年4月至1938年2月)

1927年底到1928年春，苏联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导致了党内的“反右倾斗争”，使“左”倾思想和行动大肆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崇拜盛行和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的文化领域也饱受了“左”倾之苦。

20年代末，斯大林在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随之而在国内逐渐推广，取代了世界革命理论。新学说的确立要求修改反映旧学说原则的政治观念。这就使得许多20年代反对非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主力这时也受到了极为凶猛的“左”的浪潮的冲击。以下发表的文件即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苏联政府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的加强，同时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以及预感到灾难将临时所作的微弱抗争。历史学界的斗争更为复杂尖锐，因此把有关文件放在另一个专题集中展示。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马龙闪、胡昊、郝尔启、王宏达、温耀平、
吴能、王伟文、马逸若等翻译)

No05181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
关于贯彻改组决议的通知**

(1929年4月6日)

鉴于全面改组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并根据研究所管理局1929年5月27日决议，造型艺术研究实验室作为未列入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建制机构的一个临时团体，其职能仅延长至1929年10月1日。特此通知。

研究所副所长 纳扎连柯
办公室主任 奥托

№05182

马列维奇关于取消造型艺术研究实验室 给斯维杰尔斯基^①的报告

(1929年4月20日)

在阐述问题实质和说明我这个报告的目的之前，为使您了解情况，请允许我对我从十月革命时起所做的社会工作做一个简短的描述。根据我的工作，您会对我做出不同于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理局的另一结论。

革命前，从年轻时起，我的整个生活就以顽强的劳作而融入了艺术领域。我的父亲没有经济能力帮我获得艺术教育。因此，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凭一己之力给自己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希望能在将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的成就是在绘画研究领域，既在绘画的实践形式上，又在绘画的论析研究上。

这样，我通过多年的顽强工作站稳了脚跟，我的名字现已闻名于整个世界艺术领域，无论是在架画方面，还是在绘画创作问题研究上，抑或是建筑领域。关于这一点，许多西方杂志可资证明，因为它们刊载着我的作品和文章。

我的研究著作在也从事新艺术和现代艺术研究的德国人中间引起了莫大兴趣，因此，他们出版了我的第一部研究著作。

十月革命时，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任艺术部主任。在十月革命胜

^① A. 斯维杰尔斯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管理总局局长。

利的最初日子里，我被选为保护克里姆林宫国家珍品委员会委员。后来，我当选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造型艺术委员会委员，担任造型艺术司司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承担一切可能的组织工作。我曾被选为莫斯科国立高等美工学院教授，也是艺术科学院教授。

我曾被波克罗夫斯基^①同志派往维捷布斯克市^②组织工艺工作室。在维捷布斯克市，我为装饰各俱乐部和各种演出的装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担负着开设讲座和艺术装帧方面的社会工作。

1922年我回到列宁格勒，开始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作。在这里讲授造型艺术方面的课。1923年，我被科学总管理局委任为绘画文化博物馆馆长。在博物馆，以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工业为对象，对整个现代最新艺术成就，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在瓷器生产方面，我采用至上主义形式所进行的实验工作，对革新瓷器装饰画做出了很大成绩。首次采用这种装饰画，是我手下工作人员在列宁格勒瓷器厂创制出来的，并且效果良好。此后，瓷器厂制作出了大量绘有至上主义装饰画的器皿，这些器皿既用于地方工业也用于出口。您知道，在西方举行的一些苏联展览会上，到处都展着带有至上主义装饰的器皿，这些展览都成绩斐然，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部把银质奖状曾授给我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

当时，至上主义器皿曾热火朝天地在都列夫瓷器厂上马生产，这首先是为了出口。这样一来，便在一个领域里成功地应用了被认为是无物体的抽象画，有效地进行了革新，并给国家机关提供了一笔收入。（当然，我作为至上主义的发明者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甚至连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也被埃森同志作为工厂非计划

^① 波克罗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868～1932），曾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

^② 现位于白俄罗斯境内。

项目给取消了。这只是许多这类事情中的一件)。

原科学管理总局局长彼得罗夫同志和科学检查局不只一次对艺术文化研究所作过调查，并对我的工作做过良好的评价。但是，像通常发生的这类事情一样，新事物在所有发源地都遭到许多敌人的反对。于是乎，敌人们便想像着，艺术文化研究所是新艺术的温床，因此它是反对革命美术家协会的。于是就根据这个理由，为达到消灭它的目的，展开了一切可能的进攻。事实上，艺术文化研究所只有一项任务、一个目标，就是在建筑、纺织、装饰、家具、着色、线条画领域，寻找最新的表现形式，并没有提出纯造型艺术问题。因此，不存在同革命美术家协会的任何竞争。

最后，按照科学总管理局的指示，我把1927年的全部工作都灌注到了国家艺术史研究所，都投进了历史学家老人的怀抱。以所长为首的一些老院士们，对这种有辱斯文的事情极感愤懑，我的实验工作似乎是很有辱斯文的，立即陷入了艰难的条件。历史学家的嘴被勒得死死的。但是，把我勒紧绞杀的图谋并不曾得逞。

对研究所来说，幸运的时机——改革的时期终于来临了。在这样一个时期，最老者当中的许多人，都会因为不需要研究“被拔都人侵战火焚毁的诺夫戈罗德教堂的谷囤”，而必将离去。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理局正是利用这个时机，编制了应当缩减的老人名单，其中包括我和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这一招儿绝妙地得逞了……^①

正鉴于此，我请求您重新审议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决议，因为我认为，这种改组、缩编是不正常的。它损害了生气勃勃的事业，

^① 档案原件此处删节了一段：“新任成员名单已编出，据我所知，到列宁格勒就任的科学管理总局局长助理，在当地了解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实验室的工作后，已经将该名单签发。”

更何况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因改革而应成为中心环节，并且应在同现代需要和建立新生活的深刻联系方面发挥它的活动。

被除名的人有：卡·马列维奇、H. 苏耶京、B. 叶尔莫拉耶娃、M. 恩德尔。^① 这是一些从十月革命时起就不是因恐惧而是凭良心进行不倦工作的人，他们在今天却成了被抛弃者。

卡·马列维奇^②

列宁格勒斯维亚兹联合会大街，2栋5号

① 苏耶京（1897～1964），画家，卡·马列维奇的学生。叶尔莫拉耶娃（1893～1938），女画家，1919至1922年任维捷布斯克艺术学校领导职务，后死于监狱。恩德尔（1897～1942），女画家，卡·马列维奇的学生。

② 马列维奇，卡济梅尔·谢韦里诺维奇（1878～1935），苏联艺术家，先锋画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20年代后，他尝试把先锋派绘画艺术引入“实物制作”，他的造型艺术实验室的“立体至上主义”的瓷器作品是工艺美术方面的极大创新。联共（布）中央1932年做出消灭文学艺术的所谓“同路人”团体的决议，先锋派首当其冲，马列维奇的先锋派的艺术成了被摒弃的对象。

№05183

赫沃伊尼克关于马列维奇的评价 致斯维杰尔斯基的便函

(1929年5月27日)

马列维奇是至上主义艺术的头头和奠基人，是这一流派的实践家和理论家。这个派别的确是给工艺美术领域，特别是在瓷器方面留下印记的一个最新流派。在西方，马列维奇作为我国绘画研究的左翼代表人物声名斐然，有关他的文章和评论在那里发表了许许多多。马列维奇的工作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站在那些无条件加入革命的画家的前列，并且在美术行政工作和美术社会活动的岗位上做了许多工作。只要还继续现代艺术研究方面的分析工作，就必须给他提供条件，不允许把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一同抛开。我们这里有人认为国家艺术史研究所里有诺夫戈罗德教堂的一些陈腐透顶的奥勃洛莫夫^①们在进行研究工作，而决定撤消（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这真是咄咄怪事。我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保留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这个下属机构，留下马列维奇及其工作人员——苏耶京、叶尔莫拉耶娃和恩德尔。应当紧急向国家艺术史研究所提出：报送管理局有关改组机构规章的决议，并要求报告有关取消现代艺术委员会和开除马列维奇及其三名同事的理由。

造型艺术司代理司长 Г.И. 赫沃伊尼克

^①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主人公，懒散无为，萎靡不振。

№05184

**斯维杰尔斯基关于呈报改组
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的材料
致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的信**

(1929年6月18日)

艺术总局要求，紧急呈报关于决定改组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并开除其工作人员——马列维奇、苏耶京、叶尔莫拉耶娃和恩德尔的全部材料。并附上就此项问题通过的管理局决议的复制件。

艺术总局局长 斯维杰尔斯基
造型艺术司代理司长 赫沃伊尼克

№05185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关于保留马列维奇实验室 致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总局的信

(1929年7月18日)

致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总局

复贵局1929年6月18日第6957号函

1929年初，鉴于艺术科学院新院长到任，提出了在该院下设
艺术工艺室的设想。因此，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认为，从
1929年10月1日起将造型艺术实验室主任、画家卡·谢·马列维奇
及其实验室中的亲密同事苏耶京调至艺术科学院上述工艺室进行专
业工作，是完全适宜的。

目前业已最终澄清，先前提出在该科学院建制工艺室的计划将
不复实施。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认为，在造型艺术历史和理论
研究室中保留现存的造型艺术实验室是必要的；根据研究所制订的
造型艺术研究计划，画家卡·谢·马列维奇作为该实验室主任同其亲
密的同事可以继续在这里进行工作。同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在
为实验室实验员苏耶京的薪水由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一百而操心。^①

代理副所长 伊萨科夫

办公室主任 奥托

^① 信中附有赫沃伊尼克的批示：“劳驾您，请按马列维奇在声明中提出的地址给他一个复函，说明根据来自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报告，造型艺术实验室不拟解散。也就是说，问题已经解决。赫沃伊尼克，1929年7月23日。”

№05186

**斯维杰尔斯基关于保留其实验室
致马列维奇的信**

(1929年7月25日)

致卡·谢·马列维奇

列宁格勒市，斯维亚兹联合会大街，2栋5号

鉴于收到您今年4月20日的报告，艺术总局责成国家艺术史研究所上报了有关改组现代艺术研究委员会和将一系列工作人员除名的全部材料。

从国家艺术史研究所获悉的解释表明，造型艺术实验室将不予解散。

根据上述理由，艺术总局认为该问题已经解决。

艺术总局局长 斯维捷尔斯基
造型艺术司代理司长 赫沃伊尼克

No05187

弗龙娜关于马列维奇在基辅艺术学院
兼职工作条件致施米特的信

(1929年10月24日)

尊敬的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①：

10月14日，基辅艺术学院管委会曾向您致函，恳请能予准许卡·谢·马列维奇教授不定期前往基辅艺术学院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列宁格勒）能否给马列维奇教授维持先前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条件。因此，恳请不要降低贵所给卡济梅尔·谢韦里诺维奇^②确定的薪水，并尽可能把他每月在贵所的工作集中在一起以留下时间间隔（20天），否则，缩减薪水将使卡济梅尔·谢韦里诺维奇不可能前来艺术学院工作。

请尽早答复，并函告结果，因为已定于今年11月1日由马列维奇教授开课。

致以同志的敬礼！

基辅艺术学院院长 弗龙娜

① 施米特，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1877-1942），国家艺术史研究所所长，艺术理论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② 即马列维奇。

№05188

施米特关于马列维奇兼职问题
致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总局
文学艺术事务委员会的信

(1929年11月19日)

基辅艺术学院管委会于1929年10月14日致函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就准许造型艺术实验室主任卡·谢·马列维奇每月前往基辅兼任一至二周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提出申请。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于1929年10月23日在其例会上听取上述情况报告后，就此做出下述决议：兹允许卡·谢·马列维奇在下列条件下，即扣除其离开列宁格勒期间所应领取的国家艺术史研究所薪水，可以前往基辅做上述兼职工作。此后，基辅艺术学院院长弗龙娜同志致函艺术史研究所所长施米特，再次请求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不要降低艺术史研究所给卡·谢·马列维奇确定的薪水。

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向你们报告这一情况，请求就此问题下达相应指示。

谨附弗龙娜同志1929年10月24日致施米特函件№7064全文。^①

^① 赫沃伊尼克的批示如下：“别斯帕洛夫同志，我认为，马列维奇前往基辅艺术学院不定期出差也是马列维奇在艺术史研究所进行的现代艺术方面的科研工作，不应该将这些出差视作离开职守而缩减他本已不多的薪水（165卢布）。因此，应按所述意思给艺术史研究所下达指示。1929年11月22日。”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所长 施米特

学术秘书 莫库里斯基^①

^① 见专题文件No05187。

№05189

艺术总局文学艺术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关于发放马列维奇薪水给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信
(1929年11月24日)

致国家艺术史研究所
列宁格勒沃罗夫斯基广场5号
复1929年11月19日№155号函

兹根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别斯帕洛夫的指示，委员会秘书处通知如下，鉴于卡·谢·马列维奇到基辅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出差，有关发放给他的工资额度问题由你们进行研究。

艺术委员会秘书 古巴廖娃

№05190

伯恩斯坦关于有声语言科研前景

给卢波尔^①的报告

(1930年4月22日)

艺术语言研究室是我于1920年在生命语言研究所打下根基，1923年被移交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它的任务是，通过经验材料，研究有声艺术语言及其各种形态变化（朗诵、讲述故事、朗读散文、台词、讲演辞、民间说书）的问题。十年间，我广泛收集了各种录音（将近600盘），包括近100位诗人（其中有许多已故的诗人，如勃洛克、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古米廖夫、叶赛宁、鲁卡维什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在世的诗人有别雷、库兹明、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舍尔舍涅维奇、克柳耶夫、卡缅斯基、阿谢耶夫、吉洪诺夫、特列季亚科夫、基尔萨诺夫、谢利温斯基、卢戈夫斯科伊、英贝尔、波隆斯卡娅、萨多菲耶夫、基里洛夫、日罗夫、戈洛德内、布劳恩、萨亚诺夫、埃利克等），一系列散文作家、朗诵艺术家、话剧演员和民间有声语言艺术（民间故事、壮士歌）代表人物的朗读示范表演。

除了收集单独的录音外，我还编排制作了录音片汇集，包含十月革命活动家（包括列宁）的演讲、各种台词、俄语和外语朗诵。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一系列问题。由此综合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学科，并逐渐明确了课题和方法。通过这个报告所

^①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总局局长。

附的研究室的著作目录，可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范围有若干了解。

研究室从本科研年度开始，执行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当前对我来说，中心的问题是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有声语言艺术中的反映问题。研究的方法，除采取多次放听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从整部著作和部分章节直到各单独的音节）外，还借助于计时仪和张力仪进行各个过程的测量。

我在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学术经验，使我必须把研究室的活动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牢牢联系起来。按照这个方针，我在制订上述基本课题的同时，深入研究了政治鼓动的语言问题。在纯实践方面，我力图实现“诗歌属于群众”的口号，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生产相应录音片而后再制作有声电影片，只有以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实现语言艺术作品的有声化生产，这个口号才有可能变成生活现实。

因此，大大扩展了研究室原有工作任务的范围。但极端简陋的录音技术使我没条件充分利用我所收集的录音资料。录音资料并不以声音洪亮和音质准确而见长，更为本质之处在于它们是一种稀世珍品，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工艺条件下，它们还不能够大量复制（在任何情况下，复制都不可能使录音不遭颇大损坏）。在放听的过程中，它们还会受到磨损，这无论对于深入研究还是对日益增加放听表演的需求，都是一种严重障碍。

上述情况要求必须由简单的录音转向录制留声唱片。了解莫斯科“纪念1905年”工厂录音研究室的设备和方法以后，我确信该研究室站在现代技术的高峰，因此我借助于录制留声片，可以把收集有声语言资料的工作卓有成效地继续下去。这样一来，这项工作便能走出它现时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通过留声片录音方式收集的资料，第一，可以成为经得起无数次放听的牢靠的研究对象；第二，能够经得住多次复制和各种场合（博物馆、展览会、图书馆、

阅览室)的陈列,也经得起电台播放;第三,可以留作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语言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纪念物。不久前我在上述录音研究室所做的实验也表明,我所收集的录音资料相当大的部分都能多多少少令人满意地转录成留声片。

再者,莫斯科这个工厂的录音研究室的仪器设备,也给研究有声讲演语言提供了科学基础。我曾在报刊指出,习惯于向听众讲话的政治家专门为灌留声机唱片所做的讲话,是一种艺术实验标本。无论对有关讲演语言本质和类型的一般结论,还是判断有关讲演者的个性风格,它都提供不了高质量的资料。同时,从政治鼓动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值得给予最密切的关注。莫斯科广播中心很欢迎科学首创精神。在该中心的协助下,莫斯科厂家的录音仪器做到了把在自然条件下发表的原声讲话录制并再现出来。不必考虑有否灌制留声机唱片的用意。

终于,同样的仪器设备也为解决配备扬声器这一迫切任务提供了可能。就我所知,迄今为止,只有民族学博物馆使用了录制有声语言的手段,不过采用的是手工录音方式。但这种有声资料是能大大活跃各类博物馆工作的,从革命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到文字、戏剧和教育博物馆,甚至可能推广到技术类和动物学博物馆。莫斯科现有的仪器设备可在这个方面从手工制作转变到工厂灌片的阶段,这样做可以从数量上一下子提供无限的批量,从而为整个博物馆机构提供服务。

综上所述,今后要在收集有声资料方面有效地工作,要在学术上对这种资料进行研究并把它们推广到群众中去,不借助于灌制留声唱片是不可思议的。购置相应的仪器设备需要相当多的花费(为进一步完善仪器设备,支付的费用不少于一万卢布外汇)。相比之下,更恰当的做法是利用莫斯科工厂的现有设备。但需要由苏联无线电工程师对它们大大地加以改进。这样一来,在列宁格勒继续做

收集有声资料的工作就变得不适宜了，它需要工作人员的手工操作，而在莫斯科进行这一工作，却可达到现代技术水平。

根据上述理由，我请求科学总局对下述建议加以研究：

把艺术语言研究室连同其设备和收集的资料，迁往科学总局认为适宜的、莫斯科某一研究所，以便更有效地工作并减少资金消耗，同时也能利用莫斯科留声唱片厂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力量。

如果科学总局和艺术史研究所管委会认为这种迁移不太适宜，那么我建议：

或者，在莫斯科某一学术机构之下建立一个基地，在同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室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我可以在该基地借助于上述更加完备的技术手段，进行两个机构的工作；或者，在艺术史研究所留下惟一一个基地，在保留列宁格勒研究工作的情况下，给该基地在莫斯科进行技术工作提供专门资金。

我认为，第一个解决办法，即将研究室迁往莫斯科，是最为合适的。其理由如下：

1. 可以节约颇多的资金：因为采取第二个解决办法，就必须保持两个或大或小平行的实验室；而采取第三种办法，就会因长期不断到莫斯科出差，因往返运送仪器和资料等等而使艺术史研究所的经费预算困难重重。

2. 将研究室迁往莫斯科，就有条件广泛利用莫斯科无线电广播中心的服务设施。

3. 只有在莫斯科，研究室的工作才能同给各博物馆配置有声设施的任务结合起来。以前都是趁我在莫斯科短暂出差期间，由我在这个问题上给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文学博物馆代表提供辅导的。其实，类似的建议大约在一年前我曾向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提出过，今年秋天又再次谈到过，但都无济于事。

4. 莫斯科集中着无产阶级诗歌和同路人诗歌的优秀力量。如

果说研究室迄今为止还没有录制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朗诵，也还没有灌制卡津、斯维特洛夫、巴格里茨基、别兹缅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朗诵，如果说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朗诵也还录制得很不够，那么，其原因正在于，艺术语言研究室地处列宁格勒一隅之地。

5. 最后，莫斯科也集中着代表苏联各类戏剧艺术，甚至各时代俄罗斯戏剧的优秀剧院。只有在莫斯科才能卓有成效地研究俄罗斯的舞台语言。

我认为解决目前妨碍研究室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效工具的惟一适当的办法，是把研究室迁往莫斯科，有鉴于此，我特向科学总局提出上述三种解决方案，以供研究。

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艺术语言研究室主任 伯恩斯坦^①

1930年4月22日于列宁格勒

地址：列宁格勒，分界大街2号，2栋7号

^① 伯恩斯坦，谢尔盖·伊格纳季耶夫（1892—1970），苏联语言学家，时任国家艺术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主任。伯恩斯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作品的录音实验和研究，他积极促成组建了第一个国家录音库。

No03373

考尔、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反苏活动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

(1930年6月)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①同志：

兹送上关于洛谢夫^②教授反苏活动的资料，以及关于他的《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一书的手稿简介材料，这份手稿实质上是杀气腾腾的黑帮的完整的哲学和政治纲领。侦讯查明，洛谢夫在最野心勃勃的反革命宗教运动——赞名派^③中起着思想上的领导作用。

附件：如上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讯行动处处长助理 考尔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处长助理 格拉西莫娃

-
-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时任驻政治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
- ② 洛谢夫，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1893—1988），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语言学博士。191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学系，从1922年起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和国家音乐学研究所成员，国家美术科学研究院美学部负责人，1930年4月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1931年被判处十年监禁，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上服刑，1932年被提前释放，从1944年起任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授。
- ③ 1910—1912年出现于希腊旧圣山一些正教修道院的教派。赞名派教徒被逐出教会，放逐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北高加索建立了非法的隐修院，30年代被国家政治保卫机关所取缔。

№03374

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的反苏行为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的报告

(1930年6月)

绝密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

关于洛谢夫教授在反苏维埃运动中的作用的资料

从洛谢夫教授（37岁，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学系毕业，曾任下诺夫哥罗德大学、莫斯科音乐学院、第二莫斯科大学^①、国家美术科学研究院教授，国家音乐学研究所成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宗教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最为反动的（正教保皇派）和狂热反苏维埃的那一部分人的思想家。

在洛谢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最近撰写的两本书（《神话辩证法》和《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中，对右翼保皇派反革命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思想理论论证。

洛谢夫的哲学体系是神秘主义唯心论的体系，是直接从中世纪的神秘论脱胎而来的，疯狂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和整个科学认识，否

^① 1918年因改组1872年所创建的莫斯科高级妇女讲习班而建立的，设有历史语言学系、数学物理系和医学系等。1930年大学改组为三个独立的高等学校：莫斯科师范学院、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和莫斯科精密化学工艺学研究院。

认认知，倡导最残暴形式的信仰和正教教义。

必须特别指出，洛谢夫尽管佯装反对“资本主义”，却明白无误地以资本主义欧洲为其目标指向，据他说，那里正在进行清除哲学中唯物主义污垢的“巨大工作”，正在实现“从撒旦到神”的伟大转折。

在《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这本著作中，洛谢夫试图建立一种用以论证必须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哲学—历史学观念。

《补充》中的主要论点可简要归纳如下：

人类的全部历史是基督和反基督、神和撒旦间斗争的历史。封建主义是人类历史的高级阶段，是神的胜利；封建主义在撒旦的打击下崩溃，此后的历史是撒旦精神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撒旦精神的历史载体是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犹太精神（即撒旦精神）的最完整的体现。体现撒旦精神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无政府主义，它不可避免地要从社会主义中产生。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并非是不可能的，不仅从历史上看，甚至从逻辑上看也是如此。为了制止撒旦即反基督的最终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末日，必须用一种积极进取的、不调和的宗教同社会主义相抗衡，这种宗教应当投入同社会主义的斗争，战而胜之，借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对于《神话辩证法》的补充是洛谢夫于1929年秋天在几个月时间内写成的。针对社会主义的顺利进军，洛谢夫试图向广大的居民阶层发出公开的反苏维埃号召，为此他力争由书籍出版总局印行《补充》和扩大《神话辩证法》的印刷数量。当《补充》的印行未获批准时，洛谢夫还是把《补充》中的若干章节和段落增补到《神话辩证法》里去了，这些内容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苏维埃政权政策的尖锐抨击。

对于促使其撰写《补充》，力求把它印出来，以及非法增添

《神话辩证法》的内容的动因，洛谢夫是这样说的：

“对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论述，是在苏维埃政权自己近期的宗教政策中、在其自己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方针中所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这些极端尖锐性措施促使我对其做出病态的反应，尖锐地提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即向无政府主义和人类灭亡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洛谢夫补充说——外部事件不可能决定我的观点的实质，而只能决定它们的表现形式。

《神话辩证法》是1927年写成的，出版是在1930年，我不能不作任何修改就付印。我应当使该书的基本论点具有具体性和完整性，这是由于我对其辩证发展的进一步研究所获得。”

如果说洛谢夫向广大听众宣传反苏维埃观点的企图未能得逞（国家政治保卫局会议没收了《神话辩证法》、书籍出版总局禁止《补充》出版），那么洛谢夫对于反革命运动的骨干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在若干年里，一直从洛谢夫那里获得自己从事实际的反革命活动的思想形式和理论依据。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洛谢夫作为赞名派反革命运动理论家和思想领袖的独特作用。

作为苏维埃政权不可调和的敌人和具有最野蛮的黑帮特点的正教信徒，洛谢夫早在1923~1924年间就同赞名派的领导人开始接近，并认为这一运动是“教会内部最积极进取、最有生命力的派别”。对赞名派的政治方针，洛谢夫自己有以下一段评述：

“赞名派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看做为反基督取得胜利的表现，是撒旦干的事。赞名派的政治理想，是全力支持正教教会的权力无限的君主制。由于赞名派对于苏维埃政权持绝对否定态度，他们的信奉者对于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武装斗争采取了肯定的评价，并且同情武装发动和其他狂热的反苏活动。在侨民的政治派

别中，最接近赞名派的应当算右翼保皇派。”

洛谢夫的主要出版著作和手稿，都着眼于对赞名派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名谓哲学》、《实与名》、《神话辩证法》、《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

至于自己对赞名派的态度，洛谢夫说明如下：

“我对这个运动的本质评价很高。我研究过赞名派的所有材料，在细致研究了运动的基础上我有意为它提供一本详尽无遗的历史—哲学著作。”

“无疑，我所著的《名谓哲学》一书的论点是同赞名派的基本思想相一致的。”洛谢夫的妻子^①在自己的供词中声称：

“从自己的宗教观点来看，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洛谢夫和我信奉赞名派，这是一种表达正教本质的最完备的形式。”

关于自己在赞名派运动中的作用，即作为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作用，洛谢夫自己叙述如下：

“我们（同赞名派活动家）会见频繁，我们就宗教的题目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们总的宗教观点（同赞名派的领袖之一）在基本各点上均相一致，但与此同时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和辩证法方面，而他则全神贯注于实践和政治范围。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我认为我在理论和科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此。”

“我首先是一位理论家、学者，基本上生活在逻辑范畴的领域中。在逻辑领域中我应当承认自己的勇敢和无畏，最为极端的结论也不会让我害怕，只要它们在逻辑上是必需的……但是，现实比逻辑更复杂，因此我的大胆的结论要由历史来加以实现，而且又往往

^① 洛谢夫的妻子1930年6月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监禁。

是以在逻辑上无法预见到的形式实现的。”

除了赞名派活动家以外，处于洛谢夫影响之下的还有一批科学工作者，其中大部分是信神者，是保皇派。有典型意义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又是苏联高校毕业的小青年（28—29岁）。关于这方面的联系交往问题，洛谢夫作了如下的交待：

“我的熟人的政治情绪，总的说来同我的情绪相近。我的熟人圈子对苏维埃政权都是明确持否定态度的，他们都肯定沙皇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我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价，以及对它们特征的描述，得到他们的赞许，他们也同意我关于历史上两种原则——基督主义和撒旦主义——的斗争的构想，也认为它们决定着历史过程各个阶段的内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洛谢夫与在大型科研团体中工作的某些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他们自己主动同洛谢夫建立关系，显然认为他是自己精心掩藏着的反动情绪的一种宣泄点。

总之，洛谢夫扮演了教会保皇派、狂热反苏组织的思想中心的角色，是反苏知识分子集团的现成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提供者。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处长助理 格拉西莫娃

No03375

格拉西莫娃关于洛谢夫
《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手稿的材料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的报告
(1930年6月)

绝密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

关于洛谢夫《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一书手稿的材料
关于洛谢夫对《神话辩证法》的补充

洛谢夫的《神话辩证法》的第二部分（准备于1929年秋天付印），据洛谢夫自己声称，“对他（洛谢夫）从抽象理论研究向阐述和思考具体历史现实的转变是极具征兆性和典型性的”，是教会反革命的完整的哲学和政治纲领。应当特别指出这种黑帮式的纲领的好战性。其使命在于，搜罗、联合并从思想上武装所有“真正的正教”分子去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这部著作首先是着眼于以教会反革命派的骨干为对象，为他们提供思想理论根据和进行大规模恶意煽动的材料。所有论据的着力点都是为了从历史上、逻辑上论证：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为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制度而斗争。其中对于宣称要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派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洛谢夫作品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解释，则完整地再

现了俄国黑帮分子思想家们的“科学结构”。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具有“犹太教的”和“撒旦主义的”特性，对于塔木德^①和喀巴拉^②进行了“辩证法的剖析”，同时对这些结构又采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引言加以“阐释”。

洛谢夫“根据辩证的必然性”得出结论认为，从共产主义的实质必然引发无政府主义，结果必将成为反基督的王国和人类的毁灭。出路在于建立一种绝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好战的教会，只有这样的教会能够投身于同撒旦——以色列的斗争，并摧毁其统治。

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疯狂攻击的同时，他还以极大的激情为正教进行辩护，主要是想煽动“正教徒”的感情。这本著作中纯理论的、教义方面的部分（《认识神》、《无形体力量的辩证法》、《神圣的字母表》、《富有魔力的名谓》）所占篇幅相对较少，这进一步说明僧侣主义纲领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下面对洛谢夫的主要论点加以评析。

“历史哲学”——僧侣主义反革命派的哲学

洛谢夫把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说成是基督教同犹太教之间，换句话说也就是神与撒旦之间、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大规模斗争的历史。在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时期，基督教，因而也即人类社会，获得高度的繁荣与胜利，那是“纯粹的人的关系，自然的关系”，那是一个“伟大精神文化、人类精神的伟大探索和最高成就”、“高度自由”的时代（“神——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最完美的篇章之前，曾有过古代的奴隶制度，它最接近于封建主义

① 占犹太教教规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是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编。

② 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流派。

的完美。同时，他认为，柏拉图主义也是最完善的、最接近基督教的哲学。

古代的奴隶制被说成是“天然的制度”，没有任何剥削和强制的因素，对于老爷和奴隶都是同样合乎愿望和不可或缺的。

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并不是因为人们压迫他们。人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奴隶，他在本性上就是奴隶，是因为他有一个奴隶的灵魂，自由的体验对他格格不入的。解放这样的奴隶是不值得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自由的生活他反正都要看成是奴才式的生活。一个贵族，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是在内在灵魂上自由的人，而且是完美的人。他的自由不可能被剥夺，因为自由是他的本质，而不是偶然的附加物。

为什么古希腊数量众多的奴隶竟不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推翻一小撮贵族？因为每一个奴隶都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而贵族确实比他强，比他更真实，所以奴隶对贵族的需要更甚于贵族对奴隶的需要。

社会分为两个阶级。柏拉图把第一个阶级称做哲学家，把第二个阶级称作手工业者和庄稼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工人和农民。哲学家进行思考，工农群众是哲学家思想的驯服的执行者。哲学家的任务是：聪明地思考出真理，然后把它传给所有其他的人，工人农民阶级的任务则是养活自己和哲学家，并把思想加以体现和实施。哲学家的美德是智慧，工人和农民的美德是服从。工人和农民天生不会思考出思想，他们应当服从于能思考出思想的人们；他们是僧侣的供养者和苦行睿智老人们的杂役。

对于揭竿起义并取得胜利的“奴隶们”的愤恨表现在以下几行中：

哲学家和僧侣们是完美无缺的，自由自在的，合乎理想的，睿智的。工人和农民则丑陋难看，在精神和意识上就是奴隶，平凡

而普通、卑劣、愚蠢。哲学家和僧侣们敏锐机智，思想深刻，行为高尚；他们具有的特点是精神上进取上进，观察精深，对祈祷有内在的亲切感受，平静怡然，理智宏阔。工人和农民愚蠢顽劣，平淡浅薄，行为卑下；他们的特点是对于打骂充满下流的热情，对一切精神的、天赋的、自由的事物不胜羡慕，动不动就骂娘，上小酒馆，对一无所知和无所事事不知羞耻地自满。

显而易见，远古时代的早已发霉腐烂的奴隶不至于引起洛谢夫教授如此强烈的仇恨的发作。

封建—农奴制度的完美无缺又超过了远古的奴隶制度。

我……断言，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追求的并不是剥削劳动人民，而是寻求真理——自然，这是指当时的理解而言。封建制度倡导的真理就是教会和服从教会。古老的农奴制度长期存在的秘密就在于为了拯救灵魂，通过服从真理而表示服从和放弃自己的意志。农奴制的思想和灵魂并不是剥削劳动人民，而是拯救灵魂和教会的教义。应当记住，农奴制度绝不是像各国和各族人民的自由主义者对它诽谤的那样。

中世纪的农奴与远古奴隶的不同之处，恰如圣像不同于塑像，个性不同于肉体，精神深处的音乐不同于形体可见的物体。农奴所想的是绝对自由的；他是一个个人，而不是物体。他的不自由的状态绝非奴隶的状态。

洛谢夫去除了以前对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提出的所有指责，并把这些指责完全归之于人类天性的“天然不完善”，因而歪曲了封建主义的神圣实质。这样，洛谢夫也就给君主制恢复了名誉，同时为了捍卫君主制原则还动用了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①的威望。

^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27～1907），1880～1905年任俄国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

洛谢夫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历史的顶峰，继续向前，人类只能衰落下去。

对于人类而言，既然已经处在了封建主义阶段，最最顺应自然的办法是继续这样呆着，同时改善因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的缺点而产生的缺点。但是，并非所有天生的事物都是现实的事物，而且也并非所有天生的事物都是合乎人类愿望的事物。

长期以来经受着一人治理和寡头治理条件下专制政体的压迫，而又没有意识到独裁制度的缺点，其实正是它所处的社会自身的缺点——理智而科学的人们把贫困艰难的整个罪责都加到了自己的统治者和治理形式上，于是以为随着这种治理形式变为人民治理、代表治理，社会就能摆脱自身的贫困和经受的压迫。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实质上一切都和以前一样，而人们仍然保留了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陷，并把原有的习惯和倾向带到了新的治理形式中来。和从前一样，治理他们的仍是个人的意志和特权人物的利益，只不过是这个个人的意志已不是以君主的名义来实现，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来实现，而特权地位则不再属于世代相传的贵族，而是在议会中或治理机构中占多数的人们（洛谢夫援引的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话）。

公开站出来力求“推翻神及其应有地位”并摧毁了封建主义神圣制度的力量，正是一贯敌视基督教的神的撒旦的力量，这股力量体现在犹太教中。复兴时代结束了基督教的胜利，开始了以色列的历史体现。

以色列想用自己的双手来拯救自己，因此，以色列的自发性正是新欧洲文化的基础。复兴、启蒙、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具有感知天赐的经验为基础，这种天赐是无偿提供的，而且是根据不知谁的决定，对于人的自然力量产生作用，这种力量应当得到奖励，而其中并没有任何隐秘的东西，而是一切都可以触摸感觉得

到，是实际存在的。喀巴拉是人的本性的原则，其主要就是针对天赐的自发倾向的。

喀巴拉是以色列的神化和绝对化。以色列是脱离基督教的原则和全世界恶势力反对基督的堡垒。

以色列是整个基督教最该诅咒的，是全世界首先是基督徒到处驱赶和人人喊打的民族，是基督教所有最高尚的代表最为仇视的对象。那么结果怎样呢？结果，正如圣徒秘密预言的那样，“整个以色列得救了。”

犹太教及其整个辩证的历史后果正是撒旦主义，世界撒旦主义的堡垒。

除了从哲学上和历史上对“以色列进行评述”外，洛谢夫还用了许多篇幅对于“犹太人的心理本性”进行了坦率的排犹太主义的议论，其中大量援引了魏宁格尔^①的话。洛谢夫顺便也“就妇女问题”发表意见，也完全是本着中世纪僧侣主义的精神。

正如同事实上不存在妇女的尊严一样，不可能有犹太人的尊严的概念。真正的犹太人不存在内在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是以自“我”的尊严和尊重别人的自“我”为出发点的。这一点也可以解释犹太人的傲慢无礼正表现出缺乏对自“我”的意识，以及迫不及待地要提高自己的个人的价值——通过降低别人的人格。真正的犹太人，如同妇女一样，丧失了自“我”，因而也丧失了自我价值。犹太人根本不是反道德的。他是否定道德的。因此，犹太人也是不怕魔鬼的。

我想，可以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一个现实的人中存在多少“男性的”或“女性的”因素，或者说“人的”或“犹太人的”因素。而计算结果，无论从解剖学——生理学的观点、从心理学的观点、

^① 奥地利哲学家，《性别与性格》一书的作者。

还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都会是完全准确的。

整个中世纪以后的历史被描述成为一种逐渐演进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善的“喀巴拉精神”的历史表现，与此同时也是人类越来越堕落的深刻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是“喀巴拉精神”在走向最终揭示和独家夺占世界的道路上的一个个阶段。

在中世纪内形成了塔木德和喀巴拉。它们能够进行公开决战不会早于 14~15 世纪（13 世纪“佐嘎尔”^① 出现）。

喀巴拉精神的作用不可察觉地日渐销蚀，但却不可改变地、坚持不懈地、有力地把人恰好沿着在尘世出现这种喀巴拉精神之前其上升时所走过的那些辩证的台阶下滑。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个三段式，在我们面前既显现喀巴拉思想的深奥隐秘的命运，也显现出以色列在逐渐取得胜利。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根本不知道，也猜不到，他们究竟是在奉行谁的意志。因此，不能要求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具有自觉性。从一般的世界神话哲学的观点来看，某个地方有这样一种思想和生活制度存在，它在自己身上一方面把宗教和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由人攻击神或者甚至以人代神，这就足够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制度，那倒反而令人奇怪了。这样的制度应当存在，因为不然的话，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就会悬在空中，而且它也就没有任何一点反宗教的意义了。这里的辩证法是简单明了的：或者是有神，那么你就是它的忠实的儿子和奴隶；或者无神，那么你自己就是神，但是你必须坐到神的位置上去，并使自己享受神的仪式。

^① 喀巴拉派的主要经书，用阿拉米人的语言写成的，作者大概是 13 世纪末卡斯梯里亚的莫伊谢耶夫·列昂斯基。

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于“喀巴拉精神的实质”和“喀巴拉历史体现的阶段”的一般性论证，只不过是哲学上和政治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疯狂攻击的准备而已。

革命——这是撒旦同神作斗争的强大工具。

社会主义——这是撒旦主义、犹太主义最彻底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最深刻的衰退。

喀巴拉的嘱托是，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由新的独裁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人类、社会、社会自发势力逐渐站稳脚跟。在它面前，任何个人的探索，任何个人的渴望，都沉寂下来。只要不转向“人类”，就无法执行喀巴拉的训示，因为最后一个和最为具体的一种喀巴拉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以色列。因此，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能比资本主义更近似地表达喀巴拉的实质，尽管总的说来这是喀巴拉一般历史发展的必要的辩证演进阶段。

社会主义废除了神以及自由主义赋予它的那些思想上的存在物。在社会主义中，第一次确立了彻底的无神论……而从主体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教廷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综合体。这里资本主义恰似教廷，也就是说，是社会化了某种不信神的教会，而且是绝对化了的；与此同时，在这里教廷又恰似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调整经济关系和实现经济关系的社会化。教会的专制独裁在这里与不信神的经济主义相互吻合。

社会主义排除个人的内心生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无个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不允许有科学自由、艺术自由、出版自由、个人的社会首创自由等等。那么它要用什么来代替这一切呢？这难道不是某种绝对的虚无主义和完全扼杀任何的精神生活吗？

生产的绝对化，加上提倡饮食、生长和繁殖的自发性，这就是

专权的神话和自由主义的神话的必要的辩证综合。社会主义——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综合体。

这就是喀巴拉精神最充分的表现，因为喀巴拉就是出生、繁衍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过程的神秘主义。喀巴拉就是人类饮食、生长与繁殖的神灵化。

无论是谁，僧人也好，革命者也好，都知道：基督的世界是同革命绝对对立的。对于僧侣而言，革命就是撒旦主义，因为圣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早就说过，撒旦是第一个革命者。对于革命者而言，僧侣就是卑劣地奴役别人，因为僧侣的内在力量确实强大无比，而由于任何人的力量，按照革命的观点，是主体力量，那么就十分清楚，僧侣就是个别主体卑劣地剥削人民的根源所在。谁去过真正的寺院，谁就会知道：在赞美和祈祷、倾听、顺从和自我体验的气氛下，僧侣在寺院中的歌唱是天使的歌唱；僧侣像天使一样在歌唱。而钟声则是人们的自我改变，是升腾到神那里去并被神愉快接纳的灵魂本身。但是，谁曾经和真正的革命者一起相处，谁就知道：僧侣的歌唱听起来多么令人反感和恼怒，而平时晚祷的平淡的钟声会引发多么大的憎恨。只有这时你才能根据切身体验认识到这两种神话是多么互不相容，这两方面各自从本身的原则出发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结论是多么不相容。

只有没有氏族和部落渊源的人、憎恨一切亲情的人、杀害自己亲朋好友的人、才有可能废除“三位一体”的教义。在这个教义中，存在着最神圣、最永恒、最亲近的东西，存在着亲切的永恒的可贵而最甜美的形象。

什么时候否认神的存在才有意义呢？只有当一个人自己想占据神的位置，当他自己想当神的时候。否则为什么要反对神祇？杀死神，并占据他的位置——这是人的朝夕思慕的梦想，是在有了统治一切的梦想后不久产生的。由此可知，如果把中世纪的整个世界观

都称作为神学，那么，就应当把新的世界观称为撒旦学，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的雕虫小技的长期迷惑的话。

如果说中世纪的本质是基督教，那么新时代的本质就是撒旦主义。或者，你拒不承认新时代和中世纪是相互对立的，不把它们看成是处于经常的斗争之中，或者你认为新时代就是撒旦主义原则。

共产主义思想是仇恨人和人类的，是极其违反自然的，是由“犹太主义的无个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产生的。

以色列——这是无个性的流动的集体的一群体现各自存在的个体，但是又完全不符合逻辑地存在的无个性的多数。

喀巴拉是集体主义的哲学；其中没有任何足以涵盖所有其他事物的个人主义的范畴。

犹太人是与贵族完全对立的。贵族主义的原则在于准确恪守人们相互之间的界限。但犹太人始终在寻求共同性，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是最典型的犹太主义，是用再生的方法改造过的犹太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创始人和主要继承者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一切。

必须积极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论据

反对苏维埃体制

在洛谢夫的著作中，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被说成是以色列的直接统治，是人类堕落和变得越来越浅薄的结果，是“普遍存在的精神市侩习气和庸碌无能、精神上封闭保守、惊慌失措、头脑呆傻”的后果，是“毫无才能的暴发户、没有文化而且贪婪忌妒的守财奴以及对艺术和科学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的王国。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原因就在于群众的愚笨、渺小无能和甘心为奴。

为什么同俄罗斯人民如此格格不入、而又有各种外国分子充斥其间的苏维埃政权，却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全国，而且数十个积极的共产党人直到现在还能统治着一亿五千万居民？当然不是因为在这几十个人一边有多么强大的力量。相反，强大的力量在这一亿五千万居民一边，而不是在几十个人这边。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民自己只配有这样一个政府，因为人民自己十分满意，或者并没有不满到要拿起武器的程度。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俄国人民崇奉的是柏拉图式的世界观（如果这群数以千百万计的绵羊有什么世界观的话），而要寻找俄国发生革命的原因，用不着去翻阅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演说，而只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足够了。愚昧无知，没有个性的、长有数以百万计头颅的农民怪蛇领悟到，苏维埃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它是有益的。一切问题就在于这种领悟。古希腊的奴隶也领悟到，有一批游手好闲的贵族统治着自己在某些方面对自己反而有利。而这样的领悟足有上千年了。

苏维埃政权就其本性而言是没有个性的，因此它必须否定在资产阶级时代由主体创造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和艺术。政权的选举制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因为苏维埃政权就其本性而言是寡头政治的，而选举则是要表明主体的意志，而主体意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苏维埃政权从来不会允许的。封建主义的神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能的个人的位置，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则由没有个性的动物本能的经济所占领。人们对这一种经济像对神灵一样顶礼膜拜，希望从它那里得到拯救和出现奇迹。

或者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一种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尖锐对立的新文化，或者它必须把生产以至整个经济生活绝对化和神化。

经济生活应当提供出原先的神权和后来的个人提供过的东西。经济生活创造着神秘的事物和奇迹。它就是我们得到安慰和获得拯

救的希望所在。苏维埃政权把基督教的节日变容节^①改为自己的节日——工业化日。这里问题不大不小，正好是为了拯救灵魂。社会主义为之奔忙的正是这项任务，而所谓灵魂指的是经济，而所谓拯救指的是工业化和无阶级社会。天文学有浮雕天文学、哥特天文学、复兴天文学、启蒙天文学。看来，苏联的天文学完全不像布尔什维克宁愿损害伊里奇的遗训而仍然在向资产阶级学者们学习的那种天文学。

不可能既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艺术的热爱者，因为近3个世纪的艺术是纯粹意义上的感觉和情感的艺术。可以把正教、流氓行动、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艺术面前深受感动的布尔什维克仍然是怪诞的，正如同苏格拉底担任银行经理或德漠克利特处于现今的机械论者中间，或者如同第欧根尼^②带着他的大木桶来到苏哈列夫卡市场上一样。

关于“选举”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家的议论（可惜，还并非始终如此）恰恰如同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一样。

反对工业化

机器技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被描绘成人类最凶恶的敌人，说它消灭一切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和天赋的东西。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进行攻击。

在机器中有某种被压制的、可怜的和受苦受难的东西。当机器运作时，似乎有人在受罪。机器不是纯洁无瑕的，是残酷无情、内在空虚的。其中有某种真正的庸庸碌碌、精神上的市侩习气，寂寞无聊和阴暗不明。在机器试图取代生命的努力中有某种令人烦闷和

^① 基督教节日，天主教为每年的8月6日。

^② 古希腊哲学家。

讨厌的东西。这是对精神的最深刻的讽刺，只能采用庸碌平凡的刻板公式和机械方法进行限定。心灵在说，当机器运转时，似乎有一个亲近的人，熟识的人在挨耳光。机器是任何创造的对立场，扼杀生动的智慧，使情感麻木和暗淡。有人在这里流泪和悲痛哭号，好像人们在亲人坟墓前嚎啕痛哭一样。机器散发出一种死亡和市侩习俗的气息，以及对一切天才的东西和人的本性嫉恨排斥的味道。机器卑劣而粗暴。在其中晃动着一张无能的市侩的凶恶的面孔，他想用拳头和大棒使自己成为天才。机器是精神卑下的人在狂怒，像撒旦本人一样，既残酷凶狠，又狡猾阴险。看到它，人的心灵会阴暗下来，胸中也沉闷起来。真想逃避这个怪物和无耻小人，同时还要一面奔跑一面闭上眼睛，塞上耳朵，不管跑到哪里都行，只要躲开这个人类不齿的东西，躲开这个精神垃圾和耻辱，躲开这个死神。真想要空气、水、蓝天，即使有一小块蓝天也好。真想去沙漠，去单独隐居，去天涯海角，只要看不到这些齿轮，这些管道，这些螺钉，听不到汽车的吠叫声、电车的野兽般的呼叫，不呼吸工厂空气中的撒旦神香气味。

洛谢夫在以下几行文字中为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评价做了总结：

坚信没有灵魂只有脑子和神经，没有神只有氧气，统治一切的是万能的机械的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自满自足的鄙俗心态，以及他们自己以为有学问的标准市侩的不中用的灵魂，整个这种精神霉烂和毫无意义地寄希望于理智思想的混合物，正是最可怕的怪物之一。这正是人所共知的拉斯科尔尼科夫^①梦里的那个肥胖臃肿、面色红润的麻利泼辣的女人。当不幸的

^①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主人公。

小马遭受折磨而那个孩子扑向奄奄一息、血流不止的小马，泪流满面地抱住它，吻它的头时，她仍坐在大车上高兴地嗑着瓜子。在人类中，真理就是这样遭受着蹂躏和折磨，而只有少数几个人泪流满面而神情悲切地围在它身边，奉献出最后的爱心和忠诚。

共产主义带来无政府主义和世界的末日

按照洛谢夫的说法，共产主义通过巨大的技术成就带来的工业化的胜利、人对大自然的胜利，却为以色列的最后取胜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产生出无政府主义——这个“人世间的地狱”。反启示录的时代，反基督的时代就要到来。

这样，犹太主义的统治——洛谢夫告诫说——逻辑上必不可免地将把人类引向毁灭。

辩证法要求，社会主义也要发生异化。那么它有可能转向哪里呢？通向大自然的路已经不通：大自然是基督以前的神，而这里连基督本身都被否定了。也无法通向主体，因为这已是早已被夺占了的阵地。无路可走，历史已经竭尽其所有。于是这时喀巴拉这个怪物就悄悄地显露出它的神秘面孔。这个自我否定的怪物，同它的名字一样，不是现有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同其他什么都一样，其他什么也都是什么也不是。这种绝对的无政府主义正是喀巴拉的最后一个产品，而我们还从未面对面看见过它，因为当世界还处在分娩社会主义的阵痛之中，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论谁，连在梦中，也没有见过。

如果任何一个人都能做他想要做的事，如果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听到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如果人们有任何一种古怪的念头都能从一个极其精细的能在几秒钟内执行人的愿望的装置得到答复，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天下大乱吗？那不就是彻底无政府主义的王国，某

种人间的地狱之国吗？在这样的国度里，果然，一切地方都有人，一切都在人之中，一切都是为了人，而与此同时一切都是地上的生活本身，都是绝对的人世社会，全能的、自己决定一切的权力，这也就是什么也不是，就是伟大的、确实真正的以色列，只有它惟一能够取代旧的先验的神。社会主义辩证地必然转向无政府主义。共产公社辩证地必然将由无政府主义取代。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模糊不清的面孔刚刚显露出来，但人们已经感觉到它走向何方，会是什么样子。

尘世无政府主义的浪潮常常颠簸着教会之舟，使之多次几乎葬身海底。但是，还没有这样有力的文化，这样长久的生活时期，使无政府主义成为基本的原则和主要力量。而且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时期未必能持续很久。就其实质而言，它也不可能持续很久，不过这样的文化能够把一切都抛向空中，能够掀起巨大的变革，能够（虽然时间不会长久）消灭和不断消灭所有的成形的和能够理解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之后，应当到来的就是这样的时代，而这正是辩证法的要求。

无政府主义是……以色列的最后的欢乐。这是这样一种举世的欢乐，这样一种救世主的降临，它将最终使神安居在人类之中，又使人类安居于神之中，并且使神，在人的帮助之下（如喀巴拉教导的那样），最终也在彻底异化状态中巩固自己的无限全权。但是，这个时代对于基督徒将是启示录的时代。已经不再有沙皇、牧首、僧侣、教会。剩下的极少数基督徒将走向大山，即便是一段时期也好，避开在阵痛中翻滚跌撞的世界。而启示录式的事件的惊心动魄将是他们惟一的感觉。在启示录中对于基督徒还是有所安慰。但是，如果他知道撒旦主义再也不会结束而心惊胆战的日子永无尽头时，他又能够期望什么呢？启示录时代的存在使他产生希望，期待恶和撒旦主义早点儿结束；撒旦主义虽然颠簸着神之舟，但不能把它

倾覆；神终会战胜一切，而创世的神秘力量终于要现出自己的真相，永世站立起来。

教会否定了一切非手工业生活方式，但又无力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庞然怪物作斗争，于是先是走入内在的，后来则是走进外面的荒漠，以便等待启示录早就预言过的这一时间的结束。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组织方式与启示录之间，教会没有别的选择。

两种相互敌对的自发的神话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抗衡：一方面是正教的君主制和牧首制、僧侣、教会和启示录，另一方面则是僧侣主义、革命、共产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后基督教神话学的社会学实质的辩证法。后基督教的神话世界，只能够或者按照基督的训示，或者遵循反基督的要求向前发展。

拥护战斗的教会

肯定在共产主义之后，“辩证地必不可免”要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反基督”的胜利，并不是宣扬“正教教廷”的宿命论和在不可避免的事物面前俯首听命。这类预言首先是一种鼓动手段，是要求在“世界末日”的威胁下积极地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

教会是有出路的，在洛谢夫的理论构建中这个出路在于：从逻辑上看从社会主义向无政府主义过渡和出现世界末日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即使从逻辑上看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况且有可能出现历史的另一种实际进程。基督教的命运、神与撒旦之间长期争论的结局，掌握在教会手中，取决于它的坚定性和不调和性，于是洛谢夫无比憎恨地攻击那些不提出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正教的“妥协分子”，因为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是教会活动中最为生命攸关的、最中心的问题。

对于这样设定的三段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必须提出两个十分重要的意见：第一，这个图式是纯粹辩证法的图式，即首先是逻辑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图式。它根

本丝毫也不能说明，何时有过和何时将要发生这些范畴在历史上的实现，而且最终也不能说明其中某一种类型是否一定要出现。第二，这种辩证法的图式即使从逻辑意义上说也并非独一无二的。现在可以断言，人类确是从封建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但人类也可以不实现这个转变（因为还存在别的辩证的可能性）。19世纪历史的方向看来是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本身的最后要素的范围内也在发生着急剧的社会化，但即使从逻辑上看其他的转变和其他的出路同样也是有可能的。

共产公社——这就是那个辩证法上必不可免的范畴，是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彻底思考的结果。那么，用什么才能和它相抗衡呢？宗教，其中最为成熟的代表——基督教也是社会武器。基督教一直与尘世对社会的所有看法相对立，无论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有组织的社会看法，还是对社会的机体，即“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机体的看法。这正是教会的设制。

就是说，和共产公社相抗衡的是教会。我觉得，这种对立任何人都是一清二楚的，其中包括极端的“共产党人”和极端的“教会派”。作这样的对比，无论从共产党人的观点还是从教会的观点看，我都未必有错。一种辩证法的必要性也是十分清楚的；教会把共产主义看做为撒旦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把教会看做为剥削者和白痴的渊藪，关于这一点不必详加说明。

这个永恒的和世界性的问题就一直保持下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立。其中一个必须屈从于另一个，它们相互共处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人类又一次面临着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在投机取巧和文明自持之间、在女人和男人之间、在氏族与个人之间、在渣滓与珍宝之间、在尘世生活与崇高生活之间——在什么也不是与神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王国，第三个国度是没有

的。

人们，其中也包括哲学家，习惯于认为：可以宣传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但与此同时可以按眼前的经济制度生活和工作。存在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同时又是资本家。存在信奉旧礼仪派的里亚布申斯基家族^①、浸礼派教徒洛克菲勒一家，以及里昂信托银行^②的天主教徒。存在过十二月党人贵族，他们甘愿为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理想受难。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神学院的教授，有实证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还存在过这样的正教牧首吉洪^③，他在布尔什维克面前为自己的反苏活动检讨过，以及都主教谢尔盖^④，他同无产阶级完全并肩齐步，曾经致信，把苏维埃的“欢乐”宣布为教会的欢乐，因而至今一切顺利。在以上的历史闹剧、小品、以及往往是真正的悲剧中，除了谎言、胆怯、空虚以及各种软弱无力的抵制以外，也潜藏着真正的辩证法的必要性，因为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胆怯，从历史上说只有作为一种辩证的状态才能实现。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处长助理 格拉西莫娃

-
- ① 俄国最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家族，1902年开办银行，后来银行成了莫斯科股份银行，其家族中最著名的代表П.П. 里亚布申斯基（1871～1924），是“进步党”的创建者之一。
- ② 法国最大的寄存银行之一，1863年建立。
- ③ 吉洪（1865—1925），从1917年起任莫斯科和全罗斯的大牧首。
- ④ 从1917年起任都主教，从1937年起为大牧首的临时代理，同时从1934年起又任莫斯科和科洛姆纳市的都主教，1943年恢复牧首制后任莫斯科和全罗斯的大牧首。

No05423

梁赞诺夫^① 的供词

(1932年2月18日)

我的供词

1932年2月18日

自从我没有任何罪过、也没经过任何审判而被开除出党并被中断党的研究工作之日起，至今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了。我曾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请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② 这样一来，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31年2月

① 梁赞诺夫，达维德·鲍里索维奇（1870-1983），苏联科学院院士，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年2月被开除出党，遭逮捕，被流放到萨拉托夫。这份供词是在流放地写的。

② 此信是梁赞诺夫于1931年4月28日，即到达流放地萨拉托夫10天之后，发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中写道：

“只是在这里，在萨拉托夫，在被捕后过了三个月，我才得以了解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1931年2月17日做出的关于我的决议。

到目前为止，向我出示的只是以鲁宾的供词为基础的指控材料：1）从他手里得到了用密封的信封装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的某些文件并保存起来；2）预先通知他即将被逮捕的消息。无论是什么样的指控，我过去和现在都坚决予以否认。日前，当我从诉讼速记记录中了解到了鲁宾关于我的全部供词时，我只能表示惊讶，侦查人员怎么会相信这些供词。

但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却以这些供词为理由将我开除出党，关于这些供词从来没有谁对我提过一个字，我只是现在才知道存在这些供词。

17日决议^①所依据的那些材料，我就丧失了对其进行实质性答复的可能性。

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和年龄，越来越有可能出现不可避免的任何意外事件，因此，我现在决定：对那些在我离开监狱并到达了萨拉托夫之后才知道的指控给予答复，以便让历史来进行审判。

2月12日晚上，斯大林同志电话召我前往中央委员会，当时有莫洛托夫同志在场，斯大林同志向我出示了鲁宾^②的信。^③在这封

(接第339页注释^②) 如果我确实是帮助过孟什维克，帮助过国内的孟什维克取得联系，帮助过他们与国外孟什维克中央进行联络的话，那么，我是犯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滔天罪行。鉴于这种指控与我过去的全部革命经历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请求立即重新审理我的案件，给予我机会，让我对那些成为严重指控我的根据的材料和文件做出自己的解释。

我承认，在管理和领导研究院的工作中，我确实有过一系列疏忽和错误，但是，我绝对没有犯过目前指控我的这些罪行”。

① 在这份决议中指出：“梁赞诺夫了解在苏联的孟什维克所进行的反苏维埃、反革命活动，并给他们以帮助，帮助境内的孟什维克分子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进行联络（保存了孟什维克分子鲁宾转交给他的孟什维克国外局关于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党结成联盟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的指示函），——鉴于此，将梁赞诺夫作为叛党分子开除出联共（布）队伍”（《真理报》，1931年3月1日）。

② 鲁宾（1886~1937），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教授，崩得派成员，20年代初为孟什维克，1923年2月到1926年11月处于监禁中，后又被流放，1926年末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员，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1930年末被捕，在1931年3月反孟什维克的庭审中被处以五年监禁，剥夺权利两年。从1934年4月起在阿克丘宾斯克流放，1937年11月27又被逮捕并被枪决。

③ 指鲁宾1931年2月8日给梁赞诺夫的信。在信中说：“最尊敬的达维德·鲍里索维奇，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我向侦察机关讲述了，1930年12月11日，当与您交谈时得知我近期可能遭到逮捕，立即将保存在我办公室里的装有几份党的文件的密封信封转交给您，并请您保存好一直等到我返回，正如当时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保存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根据侦察机关的意见，被我放入信封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代表团的三封信，对于案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把这三封信归入卷宗可以极大地缓解我目前的处境。鉴于此，我恳求您将我于12月11日交给您的装有文件的信封交给侦察机关”。事后证明，这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伪造的。

写给我的信里，鲁宾写道，他曾将一个装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文件的封口信封交给我保管。我声明，我没有收到鲁宾交来的任何带有文件的信封，也可能，他所说的信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精神病人的胡说。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说，他们认为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进行搜查。随后，斯大林同志又召来了明仁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①两同志。当天晚上，我当着普罗科菲耶夫的面将保存在我的秘书苏汉诺娃^②手里的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普罗科菲耶夫，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搜查。15日夜间，我被逮捕。此后，对我的住所也进行了搜查。没有向我出示过任何一份要求进行解释的文件。谈话的题目总是“关于封口的信封”以及“通过E. A. 卡冈诺维奇^③同志预先通知关于逮捕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同我谈过的还有克雷连柯^④同志。2月26日，我被告知：自2月27日开始，将有一段时间不向我提供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调查将在几天之后重新开始。但是，2月28日夜间我又被带到苏兹达尔，只是3月15日以后，我才在那

① 明仁斯基，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1874—1934），1923—1926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自1926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管理处处长，与其助手M. H. 加伊和该处第2、第4科的负责人Д. M. 德米特里耶夫共同办理梁赞诺夫的案子。

② 苏汉诺娃（弗拉克谢尔曼），尼·尼·苏汉诺夫的妻子，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管理处秘书，梁赞诺夫被捕之后，苏汉诺娃被解职。

③ 卡冈诺维奇，E. A.（1896—？），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于30年代被作为一名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镇压。根据亚戈达的指示，1931年2月15日审讯卡冈诺维奇的记录，于第二天由普罗科菲耶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基里亚托夫，并作为决定开除卡冈诺维奇和梁赞诺夫党籍的理由。

④ 克雷连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85—1938），1922—1931年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副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和检察长。自1931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审理孟什维克案件中是主要的公诉人之一，后来被镇压。

里开始得到报纸。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孟什维克分子庭审的全部记录——所有这一切，我只是在萨拉托夫，也就是4月底，当我得到1931年3月1日到15日《真理报》的合订本时才第一次看到。

我首先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开始。该决议是在我被逮捕后的第二天，即2月17日，在我本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无论是在我被逮捕之前还是之后，也无论是2月17日之前还是此后，没有任何人，甚至连提也没有提过：“我知道在苏联的孟什维克从事反革命、反苏维埃活动的情况，并给他们以帮助，帮助他们与驻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建立联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掌握了何种情报、何种材料、何种证词，而向我提出如此沉重、如此骇人听闻、如此野蛮、如此荒谬、与我的整个革命历史以及我的个性极端矛盾的指控？要知道，这种指控的实质是：我作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名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老党员都知道，我从来没有当过孟什维克，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孟什维克文学机关和出版机关的活动，我一直在为反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各种主要思想而斗争。突然间，正是在那一年，当党、共产国际、工会组织、苏维埃机关以及科研机构值我60岁生日之际，对于我的革命和科学工作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的时候，我却变成了一名孟什维克、一名武装干涉者！

《真理报》以及其他机关刊物的所有文章都援引了鲁宾和舍尔^①的证词。再重申一次，我还不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否还掌握其他证据。因此，我所考虑到的只是鲁宾和舍尔的证词（我将使用正式出版的材料：《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诉讼案（1931

^① 舍尔，1906—1907年期间，俄国工会运动活动家，孟什维克。20年代下半期任国家银行主席团成员，此后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人员，1930年秋天被逮捕，1931年3月在审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时被判10年监禁，剥夺权利5年，此后命运不详。

年3月1日至3月9日)》，莫斯科，1931年)。

鲁宾证词的实质可归纳如下：早在9月份，舍尔被逮捕之后，流传着鲁宾可能也被逮捕的谣言。舍尔交给鲁宾保管的文件，开始使他感到不安。11月末，这些谣言更加厉害了。12月初，鲁宾递交了从12月1日起离开研究院的声明，为了将事情处理完他只需再留10~12天。12月11日，在离开前夕，鲁宾前来与梁赞诺夫告别并请求他保管几份文件，这是一些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得到梁赞诺夫的同意之后，鲁宾将这些文件装入一个信封，并把信封封口，以密封的形式转交给了梁赞诺夫。鲁宾与研究院彻底断绝了关系。他声明，从此不再来研究院，甚至不再享受一个普通读者的权利。

我所要重点说的不是鲁宾证词里的这些矛盾之处。这些矛盾只要稍微阅读一下，就会对此一目了然（稍微注意分析一下第143~146、149页鲁宾对于同一件事的证词就足够了）。以下我想谈一下我与鲁宾的关系。首先我想恢复他“离开”研究院这件事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不存在着任何“离开”，也没有什么“告别”，有的只是撤消鲁宾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一职，将其开除出研究院的编制。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不接受鲁宾作为一名翻译和技术编辑人员进行工作这样的问题。

关于撤消鲁宾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一职的问题，还是由我在中央文化宣传局提出来的，这已经是在他，鲁宾，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被解除红色教授学院工作之后。斯捷茨基同志和塔尔^①同志答复我说，决议涉及的只是鲁宾的教师工作问题。在莫

^① 斯捷茨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96~1938），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1930年起为联共（布）宣传鼓动局局长，后来被镇压。塔尔，党的活动家，1931年起为《真理报》编委会成员，1935~1937年联共（布）中央新闻出版局局长。

斯科党的代表会议上，我正是依据了这个说法，就雷金^①同志的报告作了发言，对于鲁宾在研究院的工作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当时，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这还是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我出国之前不久，在我处与斯捷茨基同志和塔尔同志一起商议关于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事宜时，我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仍然是同一个答复。9月底，在我从国外返回之后，无论是中央文化宣传局，还是基层组织，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在附有康德拉季耶夫^②证词的红皮书里，第一次提到了鲁宾的名字。这本书散发出来之后，我不仅找过明仁斯基同志——现在我又回到这件事情上，还去了中央文化宣传局。塔尔同志也毫不否认地认为，鲁宾名字的出现实在出乎意料，甚至很多人其中也包括他，首先想到的是，这可能是印刷的错误，将证词中几次提到的卢金的名字写成鲁宾了。对于我所提出的“是否解除鲁宾的职务”的问题，我所得到的仍然是同样的答复。只是在11月底，代替休假的斯捷茨基同志的占谢夫同志，给我发来了解除鲁宾职务的决议。于是，我立即召见鲁宾，并借口说，由于在科研工作者大会上讨论48人被枪毙^③而形成的紧张气氛，他不能再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一职，并建议他提交辞职报告。我没有对鲁宾说，撤他的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当时在院管理处会议——他被安排在了最普通的地方——的报告中错误地说成，鲁宾是被撤职的，从而对决议的措词进行了修改。

① 雷金（1893～1938），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② 康德拉季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92～1938），经济学家，财政人民委员部市场调查研究所所长，因所谓的“劳动农民党案件”于1930年被捕。

③ 此处指的是枪毙一批所谓的“粮食供应部门的破坏分子”。他们被指控从事“怠工和破坏活动”，以及成立“工业党”的“分支机构”。

但是，在鲁宾被撤消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职务之后，我建议他留任马恩经济学著作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著作出版方面的技术总编一职，每月固定不变300卢布的报酬。处于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非常熟练的翻译人员，也在为研究院工作，但没有在编制之内。在鲁宾的领导下，对于《资本论》，对其索引的翻译工作，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翻译工作，对马克思恩格斯专题汇编——《贸易自由与关税保护主义》、《住房问题》、《雇佣劳动与资本》、一卷本的《资本论》——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斯密^①）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准备。

鲁宾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不得不再三讨论与以上提到的出版物有关的某些问题（如果相信鲁宾的话，那么，他在12月11日将封口的信封交给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146页）。而在145页上，他却证明说，在被逮捕（12月23日）之前的两天还同我进行了谈话，这个事实已被核实）。不仅如此，当时鲁宾已经被逮捕了，我还给他往监狱寄过所收到的稿子校样。1月份，还将鲁宾所做的编辑工作的第一个月的稿酬，支付给了鲁宾的妻子。

此处哪里有“离开”、“与研究院彻底断绝联系”、与我的“告别”、“最后一次帮助”？完全没有这回事。鲁宾的整个故事很像从三流侦探小说中撕下的一页！

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私人关系。在我们认识的整个期间里，鲁宾一次也没有来过我的住所。我与他只在研究院里见面，并且都是由于工作原因。我与他从来没有过政治性的交谈。我之所以重视他，只是因为他是—名非常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名认真负责的翻译人员。对于研究院总的工作进程，鲁宾没有任何影响。

^① 指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即《国富论》），1931年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两卷本。

他的撰稿活动只局限于经济原理史方面的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外国文献书摘。我不赞同鲁宾的基本理论观点。他独立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没有在我出版的杂志里刊登过，而是发表在其他的没有我参与的刊物上，或者是在国家出版总局单独出版。

我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事情。说我对鲁宾“无限信任”，这当然是可笑的。但我总是坚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感觉，而且其他一些与鲁宾在红色教授学院一起工作了3年的党员也这样认为，鲁宾已经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不是什么孟什维克组织的成员。要知道，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确认，1923~1929年期间，鲁宾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

我本人信任鲁宾是有特殊理由的，他与孟什维克分子已经彻底断绝了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早在1919年，鲁宾就在为1919年开始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而工作。鲁宾与特罗扬诺夫斯基^①（现在是共产党员）和其他孟什维克一起，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第三卷及他们的通信集。1922年，当时我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院长了，开始着手出版马恩的文集，我吸收鲁宾参加该项工作。当他于1923年被逮捕时，我曾向明仁斯基同志提出，我为鲁宾进行担保。正如当时我为特罗扬诺夫斯基同志以及其他他人担保一样，经明仁斯基同志批准，我与鲁宾进行了私人会面（并不是在布特尔斯克监狱里，而是在位于卢比扬卡街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鲁宾拒绝了我的建议，但并不是根据他在自己的证词里所讲的那些理由。明仁斯基同志了解，整个这个故事纯粹都是胡

^① 特罗扬诺夫斯基（1882—1955），1904年起为孟什维克，1923年起为俄共（布）党员，1924年起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任驻日本大使，1933年起，任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从事教师工作。

编乱造的。当时，根本谈不上任何集中营。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政治上危险的敌人。作为理论家和教师，鲁宾在当时已经比较有名气了。在崩得组织及作为崩得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持有极左的立场。在莫斯科老党员中他有许多朋友。只能对他以逐出莫斯科相威胁。我答应帮他跑跑，以便准许他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然后再到莫斯科市，以便使他能够在更方便的条件下，为研究院工作。尽管他向我证明，他真的已经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但他仍然拒绝我为其担保。理由是：虽然与孟什维克党已经断绝了任何组织上的关系，但是，他不能保证与一些老同志完全断绝个人关系。“而突然有某个人到我这里来？”，这就可能被理解为，他在继续从事政治工作，这样一来，就会使我陷于一种说谎的境地。

在会面之后，我将我们的谈话内容向明仁斯基同志作了通报。鲁宾并没有被流放到集中营，而是克里木，在那里他继续为国家出版总局工作，并为研究院进行翻译工作。当他流放期满并返回莫斯科时——当时有比我更有影响的同志为他奔忙，他参加了研究院的工作。当时，他对我以及其他同志声明说，他已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断绝了关系，但是，他认为，当他的老同志还在坐牢时，他不可能公开发表声明。当红色教授学院邀请鲁宾去做教师时，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不是从“事务主义的”观点出发，正如当时对我指责的那样。我认为，鲁宾作为一名优秀的“专家”，在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著作时，是可以使用的，但他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大学的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中央文化宣传局里，已经对我讲过，鲁宾只能教授政治经济学说史。鲁宾以何种方式，能够在1930年2月或者是3月之前几年时间里，变成了党的大学里的一名教授，并成为学员的“理论之神”，关于这一点，与他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友好关系的那些人可能会说得更清楚。正是在那次

全苏各宣传鼓动部代表会议上，我讥讽红色教授学院充斥着脱离现实的空论，批驳其纲领的抽象性，要求更多地关注历史、经济和预算等科目。但是，恰好鲁宾的这些理论方面的缺点——我称他为书呆子——使他成了那一领域的一名优秀工作者，比如，在翻译马克思著作时，要求仔细区分思想和定义间的细微差别。

上面我已经写了，在拿到附有康德拉季耶夫证词的红皮书之后，我就立即去找明仁斯基同志。与明仁斯基同志的老关系使我有希望，非常了解我为什么如此重视鲁宾的合作的明仁斯基将会给予我坦率的、同志式的建议。在我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关系中，在处理各种“文化珍品”的事务中，我经常违反所有各种“手续”——无论是已故的捷尔任斯基在世时，还是在明仁斯基同志时期，几乎不存在什么“手续”的问题。按照与亚戈达同志以前订的协定，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研究院工作人员名单，以便向我们指明，谁有理由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

明仁斯基同志曾答复我说，还没有任何根据逮捕鲁宾，调查工作还在继续着。由于在那本红皮书里提到的一些人的名字，有的人名誉被糟蹋得更严重，而他们却没有被逮捕，所以我坚信，鲁宾没有犯罪，他与反革命组织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与此同时，鲁宾将被逮捕的谣言传播得也更加厉害。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批共产党员同鲁宾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之中很多人还经常前往鲁宾的住所，而鲁宾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与苏汉诺夫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10月，鲁宾请求我接见他，谈一下私事（鲁宾的证词中出现两种说法，其一是：10月份我从国外返回，鲁宾向我通报了自己与苏汉诺夫的关系；其二是：我9月末返回，并对他讲过，由于苏汉诺夫的关系才提到他的名字。第一种说法在144页上，第二种说法在145页上）。原来，他想向我详细说明他与苏汉诺夫关系的性质。他使我确信，他们只是私人关系，苏汉诺

夫多次请他参加他的星期日聚会，在那里经常出现一些身份复杂的文学界和演艺界的人，鲁宾去过那里两次。而鲁宾对我究竟讲述了什么，从我请他做的书面阐述里很容易了解到。这份文件，我立即就向明仁斯基同志作了通报。我也指明，必须核实康德拉季耶夫证词的准确性，他提到鲁宾的名字只有一次。

当《真理报》的某篇评论，好像是穆什别尔特写的文章^①，把鲁宾称作反革命分子时，他立即致函编辑部（鲁宾证词中再一次出现的笑话。他证实说，《真理报》刊登了一篇专门的简评，指出他是孟什维克富农破坏分子组织的一名成员，此后，关于他将被逮捕的谣言传播得更加广泛了（143页）。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克雷连柯同志应该立即起诉这些“叛徒”，他们如此公开地预先通知鲁宾他所面临的逮捕行动。有谁会相信，中央机关能够公布关于一个尚处于自由的人的这样的消息？）。鲁宾向我通报的这封信的复印件^②，我也立即转交给了明仁斯基同志。这是第二份文件。

与辞呈一起，鲁宾还给工会委员会写了一份详细的政治声明书，在这份文件里他写道，还是在几年之前，他就与自己的政治历史断绝了关系，并阐述了此后自己所持有的观点。这份文件的复印件^③，我也立即转交给了明仁斯基同志。这是在我的办公室找到的

① 指的是红色教授学院学员穆什别尔特的文章：《为反对“左倾分子”进行实际斗争》，刊登在1930年11月19日的《真理报》上。在这篇文章里，鲁宾被称为“被揭露的孟什维克富农破坏分子集团”的参加者。

② 在鲁宾的调查案卷里，有一封他于1930年11月22日写给《真理报》的信的复印件。在这封信里，鲁宾批驳了穆什别尔特的指控：“……如果通信报道的作者指的是苏汉诺夫-格罗曼集团，那么，我与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也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关系，否则我也不能以坚决谴责的态度对待它”（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NoH-7824，第11卷，第8-9页）。

③ 鲁宾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管理处的关于辞职及其声明的信函的复印件，日期为1930年12月1日，也保存在俄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他的调查案卷里。

三份文件，放在保险柜里，是的，文件是装在信封里，但是，信封并没有封口。我请求普罗科菲耶夫同志，将它们要特别区分开。我不知道，克雷连柯同志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否清楚这些文件，但是，在法庭上却没有出示这些文件，也没有任何人向鲁宾问起这些文件。从鲁宾的新证词来看，如果目前这三份文件能够证明我向普罗科菲耶夫所作的鉴定，即提到这三份文件时，我对普罗科菲耶夫同志所说的“鲁宾是个小人，但这是一个病态的小人”，那么他们就使我更加迷惑不解了。把这三份文件与鲁宾的证词比较一下，就足以使大家明白，这个“政治变色龙”，正如克雷连柯同志称呼的那样，其“真诚”的证词的价值是什么。

在监狱里，与鲁宾进行了所谓的“当面对质”。只有侦查人员能够向鲁宾提出问题。鲁宾的答复也由侦查员来记录。受到过度惊吓、浑身发抖、非常困难地挤出这些话的鲁宾，给我留下了令人生厌的印象，在他回答了侦查人员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之后，我就拒绝继续进行“对质”。^① 如果当时我知道，对于我的案件的调查工作只是到此为止——而正如我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这次“当面对质”的进行，已经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决议之后，——那么，我会克服自己的厌恶感的。

我再重复一次，我仍相信鲁宾在“政治上失去了斗志”。但是，越来越荒唐，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宾在作了所有这些保

^① 当面对质于1931年2月20日进行。向鲁宾提出了三个问题。后来，梁赞诺夫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答复。在回答鲁宾的关于“梁赞诺夫曾经事先通知过他即将被逮捕之事”。梁赞诺夫说：“我从来都没有对鲁宾说过其即将被逮捕，实际上对卡冈诺维奇说过这话”。在回答鲁宾的“他曾告诉过梁赞诺夫，与孟什维克有联系”的证词时，梁赞诺夫回答说：“证词的任何内容我都不能证明，因为它曲解了事件的实际过程”。对于鲁宾所说的曾转交给梁赞诺夫一份装在封口信封里的“孟什维克党的文件”的说法，梁赞诺夫肯定地说：“我丝毫也不能确认这一点”。

证之后，竟敢还建议我保管装在封口信封里的历史性文件。那个坏蛋，或者是那些坏蛋，早在1930年秋天，在写给我的信里（放在封口信封里的请求按指定的克里姆林宫里的地址进行转交的第一封信，我立即将它交给了亚戈达同志和叶夫多基莫夫同志进行调查。要求转交“封口信封”这样的信函我收到过几封），他们请求我按他们指定的地址将信封转交给他们，他们是如此的幼稚。但是，这不是鲁宾，这个拥有著名学者资历的人。

没有任何人转交装有历史性文件的封口信封。鲁宾——既然他还仍然是神经正常的人——那么，他就会清楚地知道，他的试图向我提出这种建议的任何尝试，都会使我立即判断出，我与之打交道的人或者是神经病或者是恶棍。

总之，你越仔细阅读鲁宾的证词，就会越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人在9月份就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被逮捕，却继续保存着有损自己名誉的这些文件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研究过鲁宾的证词之后，我怀疑，可能是卡冈诺维奇^①同志预先告知鲁宾，他将被逮捕。不仅是关于鲁宾被逮捕的可能性的谣言，而且是关于他已经被逮捕的谣言，在实际发生逮捕之前的很久就已经流传开了。关于这一点甚至在共产主义学院一次会议上作了宣布。

在研究院里，由于以下事件这些谣言流传得更广了。这还是11月份发生的事情。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处）打来一个电话，向办公室询问，鲁宾是否还在研究院里工作，如果是，那么他的地址如何。当别人将这件事转告我时，我立即前往亚戈达同志处，并向他指出，这种工作方法叫人纳闷。如果打算逮捕鲁宾，那么对此应该更加保密。

同卡冈诺维奇同志——一名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是鲁宾办

^① 指马恩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E. A. 卡冈诺维奇。

公室的副手——我自然是说过要进行逮捕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两人又都一致确信,鲁宾与孟什维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当我建议鲁宾提交辞职申请报告时,我就正式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领导工作承担了下来,而卡冈诺维奇同志应该负责研究室全部的组织和行政工作。我们商讨了与鲁宾编辑工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鲁宾被逮捕有可能“损害”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名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关注和“担心”最少,况且研究院同其他苏维埃机关一样,很少能避免逮捕行动。

我再重复一次,现在,我怀疑卡冈诺维奇同志是否同鲁宾谈过其可能被逮捕这样的话,如果他真的疏忽了,那么,这样一来,如克雷连柯同志所说的,这可能就变成了来自我这方面的事先通知逮捕的消息?

这样,剩下的只有鲁宾荒诞不经的证词了,说出于对他“个人的好感”,我同意了他的“最后一个请求”,接受了装在“封口信封里”的文件,为其保存对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文件(“我不想让人们看到这些”,——鲁宾在另一个地方交待说)。此处哪里有克雷连柯同志在诉状里极力想要确定的组织联系呢?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舍尔的证词。你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荒唐的胡言乱语,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胡言乱语却得到了非常认真的对待。原来,他向我“暗示”他是孟什维克组织的一名成员,他甚至向我“暗示”他从事破坏活动,他还向我“暗示”这个组织的策略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策略!不过,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完全发挥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尽管克雷连柯同志一再努力,最终,舍尔还是声明说:“我不能担保,他能否从我的暗示中理解出我承认了自己的破坏活动”。但是,“至于我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问题,那么,我的暗示是十分明确的!”

我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是把我所讲的“舍尔是怎样来研究院工作的”与舍尔的证词进行比较。我确实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

为，甚至从纯粹的“事务主义”观点出发，与鲁宾相比，舍尔也是一名二流的工作人员。

我早在1906~1907年因工会组织方面的事宜结识了舍尔。^①1917年8月，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与舍尔多次见面，他或是作为军事部门的报告人，或是与维尔霍夫斯基^②一起参加会议的。从那时起再没有见过他，直到1929年——更准确的日期克雷连柯同志能够确定——当时他是请求我为他的弟弟进行辩护，他的弟弟由于在文化休息公园的某些不成体统的行为而被拘捕。我要求克雷连柯同志多关照此事。克雷连柯同志当着我的面建议向有关检察人员出示准确的调查报告。过了几天，舍尔的弟弟被释放了。

当时舍尔还是国家银行理事会的一名成员。我还知道，他作为一名工人运动史方面的专家，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讲学。在拜访我之后不久，他就由于汽车事故而瘫痪了。几个月之后，舍尔又来找我，这次他请我给他在研究院找一份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我请他过几天再来。我预先与舍尔的顶头上司皮达可夫^③同志进行了交谈。关于舍尔，皮达可夫同志给了我极好的答复：只是因为疾病（被撞的结果）使舍尔无法承担极为迫切和紧张的工作，不得不辞退他。考虑到舍尔的状况，我建议他不要在某个研究室工作，我给他安排在非常安静的档案室里工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部的档案室（与舍尔的话正相反，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一份书面文件，都是一些照片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和手稿都被整理成专门的档案，

① 1912年梁赞诺夫在《新时代》杂志第31卷上发表了对舍尔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人工会运动史》一书的评论。

② 维尔霍夫斯基（1886~1941），临时政府的军事部长，后来在红军中供职。

③ 即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1月在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进行公开审判时被判处枪决。

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内容只有我和佐别尔^①知道），而只是工人运动史分部的档案室。他还应该编制我们收到的文件目录。这样他成了档案室负责人的助手，工资为150卢布。按规定，他提交关于自己工作的书面报告，并列入档案简报里。自他参加研究院工作以来，我只是因为选择拉甫罗夫^②的手稿事宜召见过他一次。舍尔给我以及我的同事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精神极其压抑的人，并且工作能力十分低下。

1930年的6月或者是7月，舍尔通知我说，他被原工作机关清洗掉了。后来他又向我通报了决议和自己的申诉状。舍尔对我说，他去过皮达可夫同志处，皮达可夫同志答应支持他向中央委员会递申诉状。关于这个问题我同他没有进行过任何交谈。皮达可夫同志向我证明了他将支持舍尔的上诉。要知道，谈的是舍尔在国家银行的工作，而不是在研究院的工作。我的错误在于：我确实认为，既然舍尔已经向中央清洗委员会递交了申诉状，那么，他暂时还是可以留在机关里的。很遗憾，审理舍尔的案子被拖延了，一直临近暑假，而党的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又立即去了国外。当我于9月末返回时，舍尔已经被逮捕。

我当然知道，“在苏联境内的孟什维克分子进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活动”，但是，我却不太知道，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银行、中央统计局以及其他一些孟什维克分子在其中担任着比翻译、图书管理和编写目录更为重要的工作的苏维埃机关的

① 佐别尔（1886～1947年之后），匈牙利共产主义者，1922～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国际交流，1935～194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匈牙利文学分社的负责人，1947年10月，返回匈牙利。

②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1823～1900），哲学家、社会学家、时事评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自1870年起，侨居国外，《前进》杂志和《民意导报》的编辑，《历史信札》的作者。

负责人，究竟是谁在进行这些活动。作为对1920年12月8日中央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议的答复，我提交了关于组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对策”，我还被允许使用孟什维克分子。在中央组织局1921年1月11日的决议案里——该决议案由克列斯廷斯基^①签署——在第二条里指明，批准我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组建研究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整理出版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需要大批通晓外语、专业水平高的工作人员。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在进行着其他的更积极的工作。已故的斯捷潘诺夫^②根据中央的委托，试图借助一批共产党员的帮助——他们的名单当时曾经被公布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当然，我所选用的孟什维克分子，一定是我确信他们不会“进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活动”的人。研究院作为一个独立机关，在其存在期间，一直到鲁宾和舍尔被逮捕，即从1921年1月到1930年9月，在研究院里工作的孟什维克，没有一人被逮捕。相反，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马尔丁诺夫、德波林^③等人）。

①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法学家，1917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自1918年起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11月到1921年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后为驻德国全权代表，自1930年起担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1870—1928），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1919—1925年期间，担任国家出版总局编辑委员会副主席，自1925年起，担任《消息报》主编，自1927年起，担任《真理报》副主编，整理和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③ 马尔丁诺夫，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1865—1935），民意党人，1900年起成为经济主义思想家之一，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自1923年起为俄共（布）党员；德波林（约费），阿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1881—1963），哲学家，1917年以前为孟什维克，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2月当选为院士，1931年初，成为马恩研究院的副院长，并负责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编辑工作。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德波林及其学生（德波林学派）被指控为犯有大的理论错误：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评价不足等。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说，我曾帮助苏联境内的孟什维克分子与孟什维克驻国外的中央建立联系。这种令人不快的、荒诞不经的指控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根据舍尔以下所说的话？

“梁赞诺夫经常强调说，国外的孟什维克为研究院完成了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那个写了一系列文章的尼古拉耶夫斯基^①。但是，由于梁赞诺夫善于使用一些不明显的暗示，说一些含混不清的话，因此，我们的交谈没有明确性，也不能够从触及的东西中做出结论。从他的这些含混不清的话以及暗示中，我得出结论：他想像有一个在俄罗斯工作的孟什维克组织，这是他从国外孟什维克那里得知的。他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性质，我还不清楚”。

如果舍尔能够这样胡说八道，如果他能够将自己病态想像出的东西冒充实际存在的东西，又怎么能够如此严肃地接受这些“谁也无法知道的细微暗示”呢？

在所有的这些胡言乱语中，只有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这就是提到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是的，他写的不是一系列文章，而只是一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俄文书籍》的信息文章，并在《马克思主义编年史》中刊登了一些通报和文件。但是，尼古拉耶夫斯基是《苦役和流放》杂志的活跃的撰稿人，早在1931年的时候，他就为这本杂志写过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以自己的观点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并在国家出版总

^① 尼古拉耶夫斯基，波里斯·伊万诺维奇（1887～1963）档案学家、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20年代初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22年与其他孟什维克一起被驱逐出境，先到了柏林，后来又去了巴黎和美国，编辑《社会主义通报》，1923--1931年期间，为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通讯记者。

局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他还是已出版的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①通信集的责任编辑。

至于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购买书籍和文献资料方面的代理人，还是研究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的代表，这些都是我们的各级机关清楚的。尼古拉耶夫斯基还完成了列宁研究院和革命博物馆的一系列委托。只有通过他才可能使用同闻名的别布托夫的俄国革命文献集品一起存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里的国外孟什维克的档案材料。当我将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②一文所写的著名序言，以全面的、毫不伪造的形式出版之后，A.布劳恩^③拒绝向我们提供任何文件，甚至连研究院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需的材料也拒绝提供。自1928年起，所有的德国档案馆都禁止向我们开放，尼古拉耶夫斯基就成了我们与这些档案馆的惟一联系。只是在他的帮助下，背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通过秘密途径，我们才获得了我们需要的材料。尼古拉耶夫斯基将自己弄到的全部资料都转交给我们驻柏林的大使馆，大使馆再将这些资料交给外交信使转寄给我们。还是在1930年的秋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分支机构曾天真地请求我，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搞一批关于当前时期的有关材料。我只好解释说，目前有两家德国社会民主档案馆——一家是对科学研究工作者开放的，而另一家是政治档案馆，后者同目前任何一家政党的档案馆一样，对于不相关的人员极少开放。

①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1856～1918），哲学家，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的创建人。阿克雪里罗得，帕维尔·波里索维奇（1850～1928），《劳动解放社》成员，自1900年起，担任《火星报》编辑委员会成员，自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

② 全名为《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③ 布劳恩（1862～1929），自1920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成员。

我想提醒注意的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和列宁研究院之间的权限划分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负责收集从1889年到1914年8月4日期间的国际历史的资料。但是，所有材料的获得，只能通过第二国际各级组织和原成员的协助，从国际书记处一直到各党派的著名代表。在这项工作中帮助了我的——这一点所有同志都非常了解——是我的私人关系和良好声望，不仅在国际民主运动中而且在学术界，还在战争前我就赢得了这种声望，我是用自己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第一国际史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赢得了这种声望。无论是我，还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收集资料方面给了研究院以巨大帮助的各位代表——从契切林和李维诺夫^①同志一直到我国在柏林、巴黎、伦敦、维也纳、布拉格和华沙的公使人员——我们所有的人在欧洲面前总是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当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不是战斗机关，它是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科学研究机关。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成功获得进入各国档案馆的许可，并在那里获得了我们其他机关的学者享受不到的特权。外交人民委员部还给研究院派来了阿尔贝尔·托玛和王德威尔得^②，以及各种公使人员。来研究院工作的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在自己的文章和报告中称我们是杰出的学术机关，这更加强了我们的威望。我利用自己的关系，能给我们的红色教授写推荐信，使他们获得在国外科研机关工作的许

^①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苏联外交家。191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1921年起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② 阿尔贝尔·托玛（1878～1932），法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国际联盟属下的国际劳动局创建人和领导人；王德威尔得，埃米尔（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

可，并在学术工作方面得到帮助。

但是，在我们加强同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同时，却逐渐中断了同第二国际的各种联系。1927年发生的维也纳事件之后，我中断了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的各种私人关系，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②之后，与希法亭^③也中断了各种联系。只有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基，我们才获得了进入由布拉克管辖的盖得^④档案馆的许可，以及在最后一次的国外旅行中，进入了威廉·李卜克内西^⑤档案馆，这是一座对于第二国际历史有着巨大意义的档案馆。也是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协助下，我拍照了布劳恩坚决拒绝提供给我们的恩格斯致倍倍尔^⑥的信函，遗憾的是，这些信并不是原稿，只是打字稿的复印件。

正是作为一名机灵和认真负责的代理人，尼古拉耶夫斯基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对此能够作最好证明的是，我的外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佐别尔与其进行的大量通信。

① 阿德勒，弗里德里希（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1911—1916年，担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是第二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

② 指1927年5月22日—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基尔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个农业纲领，接受了希法亭在代表大会专题报告中所阐述的改良主义思想：即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扩大政治民主，建立经济民主，工人运动内部容忍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获取和保持社会民主党在乡镇、邦和联邦各层次上的权力职位，适时参加政府。基尔代表大会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思想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③ 希法亭，鲁道夫（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

④ 盖得，茹尔（1845—1922），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⑤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⑥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者之一。

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我所犯的不只是一个错误。不应该忘记的只是：除了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收集和编校工作之外，我还要负责组织行政工作以及与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一切联系。

1929年6月我承担了——这也是经我同意的——在1933年3月前必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俄文版的出版工作（还有20卷），并根据德国共产党的要求，于1933年4月前，完成20卷通俗的、富有战斗性的德文版马恩著作的出版工作。除了研究院的出版物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丛书”等等。早在1930年3月13日的决议中就指出研究院里合格的专业学术人员的数量“完全不够”，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给我配备助手，以使我从行政组织工作中解脱出来。1929~1930年间创下了研究院学术出版工作纪录，我是极其疲惫不堪地结束这次行动的。两个月的国外旅行一直没能使我得到充分休息，这次对我的帮助比平时还要少。

9月底，当我从国外返回时，鉴于“特别季节”，我不得不花去很多时间用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研究院预算的改订以及相应的各级机关的申辩。我的两位助手——德波林同志和斯泰恩^①同志——对院里的组织和实际工作从来也只不过问，这一次又被拖进了哲学辩论^②中，完全没有精力去工作。少数党员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异常尖锐化。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调解各种冲突上。掀起了反对负责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文版工作的三位主要人员的运动，目的是将他们开除出党。只是作了很大的努

① 斯泰恩（1899~1937），哲学家，1928~1930年为马恩研究院副院长，在红色教授学院和莫斯科大学任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② 指1930年夏秋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组织的辩论。

力，并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和鲁边^①同志的帮助下，才把他们留下。把自己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院工作上的共产党员人数日益减少，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除了党务工作之外，还要承担一些高等学校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特别重视每一名不拒绝被一些年青共产党员轻蔑地称之为“粗活”的工作人员。

在党的报刊上，也提出了对我的指控，指控涉及到了我的学术著作。^②这里就不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将来能专门就此写个报告。目前我所关心的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

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一名老革命者，党和共产国际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了解，多年来一直与一些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却被剥夺了我在做出判决之前答复那些为了挽救自己狗命的阶级敌人卑鄙诽谤的一切可能。我所能够重复的仍然是，我在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呼吁书（1931年5月）^③里所说的那些。

“我承认，在管理和领导研究院的工作中，我有过一系列疏忽和错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绝对没有犯过目前指控我的这些罪行”。

达·梁赞诺夫

-
- ① 皮亚特尼茨基，约瑟夫·阿罗诺维奇（1882~1939），1920年起为俄共（布）莫斯科州委书记，1921年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起任书记，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27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鲁边，联共（布）中央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 ② 在梁赞诺夫被捕后，舆论界（在1931年3月12日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第5期上）很快就有人指控他隐藏不公布马克思1881年4月11日致女儿燕妮的信，在信中马克思对卡尔·考茨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31年4月11日在苏兹达尔监狱中梁赞诺夫给《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驳斥了对他的指控。梁赞诺夫的信没有公布。
- ③ 指梁赞诺夫1931年4月28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03379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毁坏藏书现象 致鲁祖塔克、斯大林和波斯特舍夫的信

(1932 年 9 月 5 日)

绝密

鲁祖塔克同志

斯大林同志

波斯特舍夫同志^①

据我所知，近两年来，几乎在所有图书馆确实发生了毁坏藏书的现象。这是打着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 1930 年颁布的原则指示“清洗”藏书中思想不健康和有害书籍的旗号进行的。这项原则指示被教育局编制的某些书单给加以“具体化”了。因而导致了如下后果：

被清除的图书有：根据自然科学资料揭露宗教的全部反宗教书籍（置列宁广泛利用该类书籍的指示于不顾）；第八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五次全会前出版的全部工会文献；关于失业现象和无休息日工作制、关于向 7 小时工作日过渡的书籍；几乎全部 1930～1931 年前出版的关于合作社、社会保险、劳动保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大众读物；康德和黑格尔^② 以外的全部唯心主义

① 波斯特舍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1887～1940），联共（布）中央书记（1930～1933）兼组织局委员（1930～1934）。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哲学书籍；斯宾塞^①、西美尔^②、布哈林等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著作。

此外，还建立了“内部书库”，此处图书仅供党的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大学学员使用。转入这一内部书库的有下列图书：诸如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涅夫斯基^③、克尔任采夫^④、雅罗斯拉夫斯基有关党史的书籍；萨拉比亚诺夫^⑤、克里茨曼^⑥、塔尔^⑦、齐佩罗维奇^⑧有关经济政策的书籍；季米里亚泽夫、约费^⑨的物理学书籍；别赫捷列夫、谢切诺夫、巴甫洛夫^⑩（院士）的反射学书籍。1930—1932年，仅在莫斯科州从莫斯科市各工会图书馆就清除了35万册图书；从各区图书馆将20万册图书运往莫斯科（阿尔巴特书库）。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由莫杰斯托夫、埃京戈夫、列别津斯基、布津耶尔四同志组成的特别支队，从莫斯科教育局图书馆清除了韦伯^⑪的《工联主义史》（我要提醒一下，列宁在流放中曾翻译过韦伯著作）、洛佐夫斯基^⑫的《世界工会运动问题》和他的另外四部书、弗里切^⑬的《西方工人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② 西美尔·格奥尔格（1858—191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③ 历史学家，列宁图书馆馆长。

④ 历史学家、新闻记者，1921—1926年为驻瑞典和意大利的全权代表。

⑤ 此人身份不明。

⑥ 历史学家、政论家，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⑦ 党的活动家，1931年起为《真理报》编委会成员，1935—1937年联共（布）中央新闻出版局局长。

⑧ 经济学家和文学家。

⑨ 季米里亚泽夫，自然科学家；约费，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

⑩ 别赫捷列夫，俄国心理学家。谢切诺夫，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⑪ 韦伯（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工人运动史学家。

⑫ 1921年起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⑬ 艺术理论家、历史学家、批评家、文艺学家。

运动史概论》等书籍。

某些教育局，例如，古达乌特教育局，竟做出清除如倍倍尔和拉萨尔的著作、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等书的指示。

某些图书馆，尤其是列宁格勒图书馆，清除了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因为我们许多图书馆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版本的马克思著作，这就意味着几乎清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

还可以举出一系列事实来说明这种狂热达到了何等地步：列宁格勒州锡尼亚维诺泥炭开采场从图书馆清除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①、别济缅斯基^②、波德亚切夫^③、米·伊·加里宁^④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列宁的著作等等。列宁格勒邮电工会中央图书馆清除了罗曼·罗兰的著作，而这恰恰是在我们发表罗曼·罗兰的信件及其呼吁书《超出混战》的时候。西部州“十月二十五日”玻璃厂图书馆清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雅罗斯拉夫斯基、克尔任采夫、克雷连科、布勃诺夫、杰米扬·别德内、别济缅斯基、屠格涅夫、柯罗连科、茹科夫斯基^⑤等人的著作。在我们年轻时代都曾对乔万尼奥里^⑥的《斯巴达克斯》这类书爱不释手。1932年，此书却被“评论与图书编目研究所”剔除。可以理解，此书现在被

①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均为俄国知名作家。

② 苏联诗人。

③ 俄罗斯作家。

④ 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1926年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⑤ 俄国诗人。

⑥ 意大利作家。

研究我们的评论和图书编目的图书工作者们清除，是因为他们害怕把这类书留在图书馆里，会被某位胸无点墨的评论家在报刊上对它们大加挞伐。

针对这些清除图书的事件和对图书十分野蛮、令人愤慨的“清洗”活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在1932年9月4日《劳动报》第206号上发表了关于停止此种“清洗”的决议，并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群众文化部派出专门委员会调查错误地清除工会图书馆图书并将教育局的工会藏书转移、抛售的肇事者。

我认为，仅仅发表这一决议是远远不够的。我提议：派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组，令其更严肃地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过问工会图书馆，而且过问整个图书馆网。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部存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尽的材料。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

1932年9月5日

№03380

马尔采夫关于毁坏藏书现象 致鲁祖塔克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

(1932年9月21日)

秘密

鲁祖塔克同志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各图书馆清除思想上有害和陈旧的书籍，这项工作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没有明确的指示和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1930年3月29日颁布的惟一指示，并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审查和清除书籍的办法，而且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提法和不正确的、有害的观点。它不能作为实际清除时的参考。因此，在一些州（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出现了本州的指示。由于开展这项工作有困难、有风险，结果，往往听之任之，顺其自然。这样，可以将责任推到直接执行者身上。

后果十分糟糕。在负责这一工作的领导人会议上查明，全部藏书中有60%以上遭到清除。有些图书馆被清除的书籍竟高达80.9%。来自苏联全国各地的报道表明，哲学、自然科学、高雅文学的经典著作，甚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遭到清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狄更斯、雨果、党代会革命文献、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谢切诺夫、季米里亚泽夫、赫沃尔松、伊·巴甫洛夫——这些被“清除”

者的名字已提醒我们注意清洗过程中的犯罪行为。

以执行者的愚昧和愚蠢为理由难以将这一切解释清楚。因为，如果说某些情形，譬如说，列宁的书署名伊林，或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前面印有梁赞诺夫写的序言，可属例外；那么，在其他许多情形下，这种解释就不能成立了。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清洗委员会公布的由“有权威”、“有修养”的人士开列的参考书单，确定了方针，这些方针也在地方上执行了，其结果也未好到哪儿去。

列宁格勒在关于“哲学”书籍的指示中提出：从公开借阅的图书中将“唯心主义”哲学（只留下康德和黑格尔文集）全部清除。清除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塔尔德^①、马·科瓦列夫斯基^②、西美尔的著作，清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德波林、科尔尼洛夫^③的著作；从反宗教书籍中清除考茨基的《基督教的起源》，还有我本人尚不了解的90种书籍，但是，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的名字；从“社会政治”书籍中清除考茨基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卢森堡的《积累》，罗森贝格^④的《〈资本论〉注释》，萨布索维奇^⑤的著作，博里扬^⑥的《西方的国家监督》，雅罗斯拉夫斯基著作第2卷和第4卷，涅夫斯基、克尔任采夫的著作，波格丹诺夫^⑦的《教程》，希法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⑧的著作。

① 法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

② 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③ 科尔尼洛夫（1879～1957），苏联心理学家。

④ 苏联经济学家。

⑤ 此人身份不详。

⑥ 苏联的国务活动家。

⑦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873～1928），俄国革命活动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

⑧ 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别赫捷列夫、谢切诺夫、巴甫洛夫的书籍，很多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特别是生物学的书籍。

莫斯科的指示与列宁格勒的指示略有不同。有70种书单所列图书应予以清除并转入州图书馆特别书库。书单未经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即散发全苏各地，书单上列有许多极为珍贵的书籍。其中仅有以自然科学资料揭露宗教的全部反宗教书籍，有工会改革前的全部工会书籍。其中还有盖得、饶勒斯^①、王德威尔得（《比利时工人阶级状况》）、韦伯的著作、洛佐夫斯基的一系列著作、托姆斯基^②——经政治局赞同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纲、弗里切的《西方工人运动史》、谢切诺夫、弗洛伊德^③、狄慈根^④、柯伦泰^⑤（《新道德和工人阶级》）的著作。

小说的书单拟得相当随便，因此，遭到清除的有汉姆生^⑥、狄更斯、豪普特曼^⑦、兹洛托夫拉茨基^⑧、波塔片科^⑨、罗斯丹^⑩、奥·王尔德^⑪、费特^⑫、雨果、苏德尔曼^⑬，甚至卢那察尔斯基^⑭、

① 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

②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1880～1936），任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等职。

③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

⑤ 柯伦泰，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1872～1952），“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之一，政论家，1930～1945年任驻瑞典大使。

⑥ 挪威作家。

⑦ 德国作家。

⑧ 俄国作家。

⑨ 俄国作家。

⑩ 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⑪ 英国作家。

⑫ 俄国诗人。

⑬ 德国作家。

⑭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1875～1933），教育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作家、批评家。

巴尔蒙特^①、阿·康·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根据十分简单而笼统的评价，说是这些作品与国家出版社至今仍在出版的数百种形形色色蹩脚小说相比，或多或少是有害的。

结果是出现了对读者施加教育监护的某种暴虐行为。而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基本指示还较为持重，不那么粗暴。

但是，即使根据这一指示，也“应从大众图书馆剔除革命前出版的书籍并将其转入中央图书馆和教育图书馆”。这里包括教育方面的书籍：革命前所有的数学教科书、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选、朗读材料和故事集。在小说类中，清除阿韦尔琴科^②、克列斯托夫斯基^③、瓦·涅米罗维奇-丹钦柯^④的全部作品。不过，允许留下一些“勉强可以接受的”作品，其中包括伯努瓦^⑤的《阿特兰提德》、著名的《塔尔赞》和其他作品。

由于采取了完全无法容忍、缺少严格规定的清除办法，这一切都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危害。或当作废品处理，或一卖了之，只要这样最终决定被清除书籍的命运，这还叫什么“中央”图书馆？叫什么区图书馆、州图书馆？这个问题竟交给了地方解决。莫斯科州图书馆在23个地点建立了这种中心。

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提出：“所有正确清除出来的书籍，在每种由档案室保留两册并选出可能对科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有价值的书籍之后，将其拆散，卖给工厂造纸。”有了这样的指示，发生类似莫尔尚斯克销毁各地方图书馆的全部哲学书籍的事件还有什么惊奇的呢？这种情况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

-
- ① 俄国象征派诗人，从1920年起侨居国外。
 - ② 俄罗斯作家，1917年后侨居国外。
 - ③ 俄罗斯女作家，原名H.A.赫沃辛斯卡娅。
 - ④ 俄罗斯作家，1921年起侨居国外。
 - ⑤ 伯努瓦（1886~1962），法国作家。

但是，问题不止于此。

根据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指示，大批珍贵图书每种在图书馆的所谓“档案室”中保留两册。在莫斯科政治教育委员会和莫斯科州工会理事会的指示中，规定建立“特别书库”。在列宁格勒，规定建立“内部书库”。除“应在读者群中积极流通的”书籍之外，其余不应受到清洗和清除的书籍均收入这些书库。这些书籍应“与核心书籍分开，单独存放在专门房间内，或置于单独的书架上、书橱内，读者不得自由借阅。其目录卡片从总卡片中抽出，单独存放，以供查询。”这种做法的意义仅仅在于，除了正式清洗的书籍，读者在允许保留的书籍中也只能使用图书管理员可以支配的书籍。因为甚至也不让管理员知道，图书馆里还有哪些图书（目录卡片已被抽出）。

所有指示均特别强调工作的紧张性和迫切性。连夜用卡车将图书运往莫斯科州图书馆，而且根本谈不上井然有序的接收。将成堆的图书统统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是不可能的。人们寻求并且找到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卖书。州图书馆在清洗工作中为自己创造了一笔不错的收入。结果，在所有旧书店都出现了没有图书馆注销公章的书籍。为所欲为的愚蠢做法又加上了肆无忌惮的盗窃行为，因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中的不良分子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监守自盗的机会了，现在盖有图书馆公章的书籍在旧书市场上出现是合法的。

在这件事上，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泰然自若与无动于衷，不如说是工会舆论的默不作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专刊《红色图书管理员》，从1930年1月开展清洗工作以来，除发表上述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指示外，仅有一篇文章提及清洗。该文作者季莫费耶夫1931年6月曾指出，即使清除各图书馆藏书60%，还会剩下许多有害和陈旧的书籍。他要求加深并扩大清洗工作，简化交售废品的程序。无须任何批准和转

运手续，只要编造一张统计表格（作者当即提出表格形式），一式两份，然后将图书当作废品交售即可。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清洗工作是在完全无视图书管理员意见、施加高压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秋明、卡西莫夫）过问清洗藏书工作的某些事例引人注目。

在卡西莫夫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探在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手中截获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并抓住出售此书的图书管理员，将其传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加以申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9月4日《劳动报》上发表的决议中正确地指出，清洗工作中的偏差造成了“十分明显的政治损失”。但该决议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第一，虽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该决议第一段中坚决禁止工会机关清洗书籍，但是，在随后的几段中不仅提出制定“清洗办法”，而且为继续清洗规定了如下办法：“清洗工作应由工厂或基层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为首的权威性委员会进行”，“清除书单应由工厂或基层委员会或者由工会理事会批准”。这就是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清除办法中实际上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使清除书籍成为更加不负责任的举动。因为不能委托任何一个工厂或基层委员会决定书籍的命运问题。也无法承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这种指派专门工作组以调查错误清除书籍的肇事者的做法是令人满意的。图书工作者中的部分成员正是这整个事件的直接肇事者。来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州工会理事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等方面的四名图书工作者组成的工作组不能查清，谁是通过犯罪的清洗活动给社会主义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其严重的政治损失和经济损失的真正在政治上有罪的人。这种工作组的活动不可能也不应该局限于工会图书馆范围之内。

因此我提议：

1. 向联共（布）中央提出立即停止清洗、转运和倒卖各图书

馆书籍的建议。

2.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进行犯罪的清洗活动的真正肇事者，并制定旨在消除这一活动有害后果的措施。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马尔采夫

1932年9月21日

№03381

布勃诺夫关于马尔采夫 9 月 21 日的信

致斯大林等同志的信

(1932 年 10 月 22 日)

绝密

亲启

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波斯特舍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关于由安季波夫同志分发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尔采夫同志的短信，兹说明如下：

1. 信中陈述的事实是正确的，但是断言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在各个图书馆发现的不成体统的现象采取“镇定自若”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如短信中所说），则完全不正确。

首先，马尔采夫同志的短信本身就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处提供给他资料编写的，而且不止于此，马尔采夫同志的短信是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处顾问今年 8 月的专题短信拟写的（短信上注明为今年 9 月 2 日）。短信于今年 10 月寄给了马尔采夫同志。

而且，当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工作处副处长罗曼诺夫同志把这封短信呈送给我的几位副手时（今年 9 月 10 日），他特别指出，“审查藏书在不少图书馆进行得荒谬绝伦，如果不说是罪恶行为的话。”

此外，还应注意，9月中旬曾向所有的边疆区和州教育局提出停止对图书馆藏书的审查。在今年9月15日就此问题发出的通知中说：“群众政治教育工作处建议，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专门指示下达前，禁止各州、边疆区的所有图书馆大规模地清除图书，并且警告说，一旦发现违反这一规定的，将对教育局局长和图书馆馆长追究刑事责任。”

2. 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于今年9月4日和10月4日两次研究了图书馆的藏书问题。其中后一次做出决议，向所有边疆区和州教育局局长提出：“立即停止从图书馆大量清除图书”，并“立即指示各图书馆不得出售图书馆的书籍”。对以下人员做出了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西部州图书馆馆长和莫斯科州图书馆馆长，并指出一些州——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西部州、下伏尔加州和中央黑土州的教育局局长，“从局长工作方面来看，对图书馆藏书审查工作领导极端不力”。

3. 采取上述措施不仅是根据政治教育工作处（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处顾问拉比诺维奇的便函）提供的信息和资料，而且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一系列负责人员专门出差调查获得的材料。例如，今年5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派出恰普林同志（部务委员会责任秘书）前去调查和处理彼尔姆市高尔基图书馆（国内最老的图书馆之一）的事；8月份，科洛季洛夫^①同志专门对西部州图书馆（在斯摩棱斯克）进行调查；8月份，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专门对莫斯科州图书馆进行了调查；也是在8月，中央文化宣传部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队等又专门到中央黑土州、下伏尔加州及其他一些地区调查图书馆问题。

4. 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处顾问关于审查图书馆藏书工作状态

^① 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处长。

的短信于9月份呈送给党中央文化部（扎利金^①同志），并于10月份送交中央监委（根据马尔采夫同志的要求给了他）。

今年10月4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做出决议——“立即把审查图书馆藏书中发生歪曲做法的全部事实报告联共（布）中央。”

5. 图书馆藏书审查至今仍按照1930年3月29日的专项指示（指示信）进行。这项指示是由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在著名图书馆专家参加下拟订的，由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签署。此外，起作用的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的专项指示。1930年关于图书馆藏书审查的指示应当作根本的修改，但它毕竟包含有一系列预防要求，可是在实际中往往不被注意，并遭到歪曲。

6. 陈述以上各点，我决不是想否认目前图书馆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而且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图书馆网包括对于图书馆藏书审查的领导和监督，是完全不够的。

我必须说，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就图书馆藏书审查问题进行调查时所发现的一切荒诞做法，极其尖锐地说明，图书馆事业的状况十分糟糕，并迫使部务委员会提出整个图书馆的问题。

为此目的，部务委员会成立了在沃林^②同志主持下的委员会，责成它研究以下问题：“（1）图书馆网的问题；（2）图书馆藏书的问题；（3）干部问题；（4）图书馆进书、保管和清除图书的问题。”

7. 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今年10月4日的决议附后。^③

安·布勃诺夫

1932年10月22日

① 1932~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② 1931~1935年为图书出版总局局长。

③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决议

№0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图书馆清洗工作的会议记录（节录）
(1932年10月23日)

绝密

(1) 鉴于近两年来图书馆清洗工作具有了完全不能允许的、实质上是反苏的性质，立即停止清查、转运、出售所有图书馆的藏书。

(2) 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发生此类清洗事件竟未能及时干预和制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3) 在中央监委主席团之下成立委员会，以便追查进行罪恶清洗的真正祸首，并制定清除此种清洗的有害后果的措施，于10天后报告中央。

(4) 委托安季波夫同志、波斯特舍夫同志、布勃诺夫同志和佩列佩奇科^①同志拟定一个制订改善图书馆事业措施的委员会的名单，以便委员会能够听取实际工作人员关于所有图书馆（也包括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图书馆）的状况的意见，并拟制改进措施。^②

中央书记

^① 佩列佩奇科，1931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

^② 1932年10月30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立了由叶努基泽任主席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党的机关的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图书出版总局的代表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02525

格拉巴里等人 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8月27日)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报上报道的有关拆掉苏哈列夫塔楼^①的消息^②，使我们不得不——目前还不算迟——向您提出做出这一决定的错误性。我们坚信，我们的意见并非偶然，也并非极少数几个人的意见，而是苏联整个科学和艺术界人士所共有的思想和感情的表白，而且是不分流派、信念和趣味的。事实是：

1. 就本质而言，拆毁塔楼是不适当的，因为，如果其目的是为了改善道路交通状况，那么可以采用其他一些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结果，而不是去走捷径。为此，如果打开所有穿过塔楼的5条宽阔的、但目前被阻塞住的孔道，让一个方向的交通（斯列坚卡—麦伊斯卡亚）穿过塔楼，就足够了。而对另一方向的交通来说（花园路

① 苏哈列夫塔楼是17世纪末的出色建筑，是遵照彼得一世的倡议，按照建筑师乔格洛诺夫的设计方案，于1692~1695年间建造的。塔楼因位于附近的Л.П.苏哈列夫团的射击军村而得名。17~18世纪，一所数学和航海科学学校设在苏哈列夫塔楼的豪华厅室里，随后又成了海军部莫斯科办事处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以后，1925~1934年城市公用事业博物馆设立在苏哈列夫塔楼的大厦里。1934年苏哈列夫塔楼被拆除，塔楼原先所在的广场取了个新名称，叫集体农庄广场。

② 1933年8月17日《工人莫斯科》报刊登了“拆除苏哈列夫塔楼”的简讯。简讯说，8月19日将动手拆除苏哈列夫塔楼，1933年10月1日前要将苏哈列夫广场腾空。

圆环)，则应该采用拆掉环绕塔楼四周陈旧房子的办法来加宽广场。

同时应当安装自动的交通信号灯，交通信号灯在二分钟的时间里，无需人力之助，一会儿将放行一个方向的，一会儿又放行另一个方向的，在美国一些大城市里都是这么做的。建筑师小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着手详细制订改造苏哈列夫广场的方案，以最理想的措施来解决交通线图问题，以一个圆环形的新建筑群把广场围绕起来，这些新建筑物将把这个广场变成莫斯科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2. 苏哈列夫塔楼是伟大的建筑艺术的不朽典范，它举世闻名，而且处处都得到了一致高度的评价。尽管有一切最新的技术成果，但是塔楼对建筑干部来说，依然不失其巨大的示范和教育意义。

3. 我们不仅不反对拆毁救世主教堂^①，而且热烈拥护拆除，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伪民族风格的形式，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毁灭崇高的天才的艺术作品，如同反对毁灭拉斐尔的绘画一样。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拆掉一座很不受欢迎的封建主义时代的遗迹，而是关系到一位大师创作思想的毁灭。

目前为时还不晚，我们恳切地请求停止毫无目的地拆除塔楼，这有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光荣的时代精神。因此，应对决定重新加以考虑，如果有这样一个决定的话。

附：可能解决苏哈列夫塔楼广场交通问题的示范（初步的）线图，请参阅^②。

功勋艺术活动家 И. 格拉巴里^③

① 救世主基督教堂，是19世纪的建筑遗迹。1931年12月5日被炸毁，建了一座苏维埃宫。现在这里还有一座露天的“莫斯科”游泳池。

② 收集的档案中无此图。

③ И.Э. 格拉巴里（1871~1960），苏联画家和艺术学家，功勋艺术活动家。

建筑学院士 И. 福明^①

建筑学家 И. 若尔托夫斯基^②

建筑学院士 (签名)^③

莫斯科

1933年8月27日

① И. А. 福明 (1872 - 1936), 苏联建筑学家, 建筑学院士。

② И. В. 若尔托夫斯基 (1867 - 1959), 苏联建筑学家, 功勋艺术活动家, 建筑学院士。

③ 档案原件签名字迹潦草, 无法辨认。

№02526

卡冈诺维奇在莫斯科 共产党员建筑学家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1933年9月4日）

……在我国建筑学方面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对这场斗争进行领导。从最近的一些现实中，就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一小批老建筑学家反对拆掉苏哈列夫塔楼。我不了解这些理由的实质，可能，苏哈列夫塔楼我们也是要保留的，但是，要知道，特殊之处是，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对待一个坏得毫无用处的小教堂，若因这点理由，就不写抗议了。十分明显，这些抗议的出发点不是关心保护古代的遗迹，而是另有政治动机，那就是试图指责苏维埃政权破坏文物的行为。那么，党员建筑学家是否创造气氛，给予建筑学界这样一些反动分子以激烈的反击和舆论的谴责呢？没有，现在非但没有创造这种气氛，甚至纵容这些反动分子。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的这种消极被动导致的结果是，部分非党的青年开始在老家伙的周围聚集起来了，而不是聚到我们身边。

№02527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关于拆除
苏哈列夫塔楼问题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3年9月18日)

我们研究了关于苏哈列夫塔楼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塔楼务必拆掉。我们建议拆除苏哈列夫塔楼并拓宽交通。反对拆除的建筑学家是在瞎指挥，缺乏远见。

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

第40号^① 1933年9月18日

^① 此信自索契寄往莫斯科。

№02528

卡冈诺维奇关于拆除
苏哈列夫塔楼致斯大林的信（摘录）

（1933年9月20日）

……6) 关于苏哈列夫塔楼问题：自收到您第一封电报之后，我交给建筑学家们一项任务：拿出一个改建塔楼（拱门）的方案来，目的在于缓解交通状况。我没有许诺说，我们已经放弃拆毁一事，但我对他们说，这要视他们的方案究竟能将交通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而定。现在我恳请允许让我少许等待一下，以便收到他们送来的方案。因为这一方案当然是不会使我们感到满意的，那时我们就向他们宣布说，现在我们要拆除苏哈列夫塔楼。要是您认为不用等待，那么，我当然将尽快地，也就是说立即，组织这项工作，就不等他们的方案了。

好吧，就写到此。

敬礼！

您的 拉·卡冈诺维奇

№05424

梁赞诺夫关于限制其住地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4年2月22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1年2月17日，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我被缺席开除出党，没有进行任何审问，决议依据的是我直到今天还不清楚的材料，这些材料仿佛确定我与孟什维克驻国外中央有着犯罪的联系，这种指控如此荒谬和令人难以相信，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1931年4月12日，我在苏兹达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内部监狱受到两个月监禁后，根据那个被吓坏了的、为挽救自己的狗命把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牵扯进去的坏蛋的虚假证词，在没有向我出示过卑鄙证词，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就依照刑事法典第58条中的第4点，将我判处流放萨拉托夫，并被剥夺了全部的政治和工作权利。这个坏蛋的精神空虚和犹太式的假仁假义，现在已经被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第三种力量》一书所刊登的内容有根有据地证实了。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办公室里的全部书籍、全部资料、全部手稿、书摘和短札都被没收，至今尚未归还。

我失去了使用大量书籍、小册子、文件、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可能性，同样地也失去了使用有关第一国际历史文献资料的可能性，这些文献资料都是我在1907～1917年期间从劳拉、保

尔·拉法格、倍倍尔、考茨基^①以及其他人手里搜集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创立之前我就转交给了研究院。

我遭受了3年的精神饥荒，我3年时间无法跟踪我专业方面的外国文献著作。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得到那几卷俄文和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这些书籍是由我整理、加工和校编的，并于1931～1933年期间，以阿多拉茨基^②等人的名字出版的。

我试图努力使我的案子获得重新审理，但是没有成功。与老同志和老革命者相比，他们更相信坏蛋和变色龙鲁宾，对此我不得不暂时容忍下来。

可以想到，三年中断自己热爱的科学工作和一切政治活动，对于没有犯罪的人来说就已经是残酷的惩罚了。

但是，我又错了。今年的2月2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通知我说，我可以离开萨拉托夫，允许我今后居住在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外的苏联境内的任何地方。我被无条件和无期限地禁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城市居住。

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个决议尽管还给了我“自由”，并给予我离开萨拉托夫的权利，但它也只是一种嘲弄行为，因为两个老人中的一个已经被医疗委员会确诊为完全残废，而他们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都不能改变一下对他们的健康极其有害的气候条件，如果说像在萨拉托夫这样简陋的栖身之地和亲人的关心都不能保证，那么，去哪里也没有用。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根据，依照什么理由，我又一次遭到了惩

^① 劳拉（1845～1911），马克思的女儿；拉法格，保尔（1842～1911），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第一、第二国际活动家，劳拉的丈夫。在拉法格夫妇自杀前梁赞诺夫曾在他们的档案馆工作，整理档案；考茨基，卡尔（1854～1938），第二国际理论家、政论家，1917年与梁赞诺夫相交甚厚。

^② 历史学家，梁赞诺夫被捕后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2年当选为院士。

罚，对于我，一个64岁的人，又是在这样的健康状况之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决议相当于判处死刑。

对我关闭的正是那两个我能够从事专业科研工作的城市，这将使我的余生经受比这3年的生活还要痛苦的精神折磨。这将彻底剥夺了我在科学领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可能性，也剥夺了我在实际中运用通过数十年顽强的劳动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方面的知识的可能性。我再重复一次，这样的决议相当于判处死刑。这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处决，是用一粒粒子弹和一根根针，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处决。

因此，我要求进行法庭审判。^①在革命法纪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下，法庭将向党、向共产国际、向国际无产阶级证明，我没有犯过任何罪行，既没有反对党，没有反对无产阶级，也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达·梁赞诺夫

^① 档案原件此后还有一句话：“遭到坚决拒绝”，被作者划掉了。

№02529

尤翁等人关于拆除 苏哈列夫塔楼致斯大林的信

(1934年4月17日)

十分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们怀着激动而又痛苦的心情向您，向您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人提出请求，您是能够阻止那明知不对而正在做着的一件事情的，而且您是能够改变这件事情的。

出乎意料的是（在问题似乎已经顺利解决了之后），有人在开始拆毁苏哈列夫塔楼了。塔尖已经被拆下来了，外面楼梯的柱形栏杆已经被敲下来了。这一建筑遗迹，彼得大帝时代建筑的极其罕见的典型，莫斯科辉煌的历史名胜古迹，其意义是不容争辩、巨大无比的。拆除塔楼为的是调整道路交通。这一任务是绝对必要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可以采用其他一些不太过分的办法。拆除塔楼这是最不费力的办法。我们可以向您保证，苏联的艺术和建筑思想能够很快就提出几种其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这些方案可以保证在这一地段的道路交通完全畅行无阻，同时又能把苏哈列夫塔楼保存下来。这样的方案是有的，有好几个，那就是从拆除毗连塔楼的街道拐角上的一些小房子（这立即便可加宽绕行的道路）到把整个塔楼移动几十公尺，移到广场比较宽阔的部分（这就能使街道的十字路口畅通，并将使来往各个方向的交通畅行无阻）。

我们坚决地请求您赶快过问这个问题，停止破坏塔楼，并建议立即召开建筑学家、艺术家、艺术理论家会议，研究审核对莫斯科

这一地段的其他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将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街道交通的需求，同时又能保护好这一出色的建筑遗迹。

功勋艺术活动家 K. 尤翁^①

建筑学院士 A. 休谢夫^②

功勋艺术活动家 (签名)^③

功勋艺术活动家 И. 格拉巴里

A. 埃弗罗斯^④

院士 И. 福明

建筑学院士 И. 若尔托夫斯基

1933年4月17日

于莫斯科

① K. Ф. 尤翁 (1875~1958)，苏联画家、苏联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活动家。

② A. B. 休谢夫，(1873~1949)，苏联建筑学家，建筑学院士，苏联功勋建筑学家，列宁墓的设计者。

③ 档案原件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

④ A. M. 埃夫罗斯 (1888~1954)，艺术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

№02530

斯大林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 致休谢夫等人的信

(1934年4月22日)

关于不要破坏苏哈列夫塔楼建议的信已收到。

关于拆毁塔楼的决定是某个时候由政府做出的。^① 我个人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苏联人是能够创造出比苏哈列夫塔楼更加宏伟壮丽、更值得纪念的建筑式样来的。我很遗憾，尽管我对你们十分敬重，但在目前情况下，我没有可能为你们效劳。

尊敬你们的 约·斯大林

1934年4月22日

^① 1934年3月16日联共（布）中央同意了莫斯科党委关于拆除苏哈列夫塔楼和中国城的城墙的建议。

№11681

**斯捷茨基关于《公社报》
发表瓦西里耶夫文章给联共（布）
中央组织局的报告**
(1934年5月)

今年4月28日，州报《公社报》（中央黑土区）发表了《如何缓解牲畜缺额》一文。文章作者沃罗涅日兽医学院组织学教授瓦西里耶夫提出，为了增加牲畜的肉产品重量，5、6、7月停止屠宰牲畜。而且，作者肆无忌惮地直言不讳：“仅在中央黑土区暂停屠宰3个月，对全苏的总平衡影响微乎其微。”

这篇文章未加编辑部按语，于州委员会决议公布前夕刊出。该决议指出，肉类计划交售的执行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并强调肉类计划交售工作情况欠佳的原因之一，是许多区将发展畜牧业的任务与肉类计划交售对立起来。

对我们在电话中提出的“文章作者是何许人”这一问题，该报编辑施韦尔同志未能做出答复，而且将瓦西里耶夫教授旨在破坏肉类计划交售的文章轻描淡写地说成“头脑不太清楚”，现在才准备在最近一期报纸上发表编辑部对该文的答复。

应该指出，《公社报》最近在数篇宣传文章中还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指出这些错误的，有《真理报》（4月21日述评《不学无术的顾问们》）、中央委员会杂志《布尔什维克出》（第5期）和瓦累基斯同志。后者不得不在4月3日《公社报》上发表文章，仔细剖析该报前一天，即4月2日刊登的《集体农庄的富裕》一文中极

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公社报》宣传文章中的这些错误，是在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各报宣传党的十七大总结的决议之后犯的。

《公社报》在工农通讯员工作和对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信件的处理工作上也做得非常糟糕：今年第一季度有2000多名写信人未收到编辑部任何答复。

中央文化和列宁主义宣传部提请组织局通过随信附上的关于因工作不胜任而解除施韦尔同志编辑职务的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文化和列宁主义宣传部主任 阿·斯捷茨基

№05218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公社报》 发表瓦西里耶夫文章的决议

（1934年5月29日）

1. 认为，4月28日《公社报》（中央黑土区）发表瓦西里耶夫教授旨在破坏肉类计划交售的《如何缓解牲畜缺额》一文是编辑部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

2. 解除该报编辑施韦尔同志责任编辑职务。

联共（布）中央文化和列宁主义宣传部主任 阿·斯捷茨基

附 录：

瓦西里耶夫教授1934年4月28日在《公社报》上发表的《如何缓解牲畜的缺额》一文及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

《如何缓解牲畜的缺额》

据调查，肥羊胴体所含热量比重量相同的瘦羊胴体多一倍。这一比例也适用于牛和猪的胴体。由此可知，屠宰羸瘦的牲畜会带来何等损失，多少头牲畜会被白白浪费。

供应人民委员部指出，必须坚决屏弃对屠宰季节的限制。这一指示初看似乎正确，但是，它会影响发展和恢复畜牧业这一任务的

完成。

如果我们在 1934 年不仅限制季节屠宰，而且在 5、6、7 月（即在过冬后和春季的前两个月牲畜掉膘时）停止屠宰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屠宰量，将加工畜肉的工作推迟到 8、9、10、11、12 月（在放牧肥育和饲养肥育之后），那末，肉产品的重量将增长 50%，热量将增长一倍以上。因而肉类交售的年度计划也将在屠宰头数最少的情况下大大超额完成（按百公斤带膘肉计算）。牲畜胴体这种在存放、运输、制成罐头、进行精加工时会发生变化的商品，其性能也会相应提高。

在温暖的月份里，放牧肥育和饲养肥育最容易成功。有适宜的温度、茂盛的青草，随后再用酒厂和糖厂的酒糟和甜菜渣进行饲养肥育，这都能使牲畜肥育，这都能使牲畜长膘。

应该对预定 5、6 月屠宰的全部牲畜进行放牧肥育，并从 8 月开始陆续交给肉类联合加工厂。9 月之后，将其余牲畜送到糖厂和酒厂。

众所周知，正是瘦瘠的牲畜肥育效果最明显。一头毛重 30 普特的犍牛，屠宰时产生肉 12 普特。放牧肥育后，其毛重将增至 36 普特，屠宰时产带膘肉 19 普特。

一头中等膘情的犍牛，毛重同样为 30 普特，产带膘肉 13 普特 20 俄磅，放牧肥育后，产带膘肉 19 普特 10 俄磅。

中央黑土区肉类托拉斯拟于 5、6、7 月屠宰 13253 头牛、8665 头猪和 36362 只绵羊。似乎拒绝在此期间屠宰如此之多的牲畜就会破坏肉类计划交售。但是，实际上这里毫无可怕之处，因为三个月的“破坏”随即会被肉和脂肪产量增长 50%，热量增长 100% 以上所弥补。

另一方面，仅在中央黑土区暂停屠宰三个月，对全苏总平衡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主要的是，我们原定交售的牲畜，仍会毫无问题

地送到肉类联合加工厂。

有一种流传已久的看法：“瘦牲口，皮包骨。”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在瘦瘠的牲畜身上，连我们称之为有用废料的皮和骨都没有。

所谓的用骨头煮汤，能熬出味道鲜美的浮油。骨头受到厨师和家庭主妇的青睐，因为骨头含有许多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高明厨师收集煮肉剩下的骨头，而不把它扔到污水坑里。他们把骨头和蔬菜、土豆一起再煮一遍，做出可口的、油汪汪的第一道菜。

这可能吗？对羸弱的、骨瘦如柴的牲畜的骨头可以这样利用吗？不行。那种骨头即使用高压锅、加两个大气压，也几乎煮不出一星油来。不但第二遍不行，第一遍也煮不出来。这种骨头毫无食用价值。

定量配给一公斤瘦瘠的牛肉，外搭一块没有油水的骨头（一块徒具虚表的石灰质），这是“走形式”。因为肌肉组织含水很多，养分不多的腱状结缔组织比例极大。用这种肉做淹肉效果更差。瘦瘠的淹牛等于一层树皮再加上那块石灰质，如此而已。

5、6月从瘦牛身上剥下的皮价值极小，羊皮更逊一筹。牲畜换毛后皮质松弛，恰恰在这几个月皮蝇幼虫造成大量透孔。同是这些皮革，到8、9月几乎成色十足。全苏皮革工业每年因皮蝇造成的损失高达6700万卢布。

此外，5月许多母牛通常尚未下犊，我们只好目睹宰杀怀犊母牛的惨剧。

饲养肥育后期，还可以用人工方法提高脂肪的产量。科学和工业实践表明，定期放血（人为贫血）可以使食用优质饲料的牲畜增膘。自然，给瘦瘠牲畜放血不应早于7月。

每月可以放血数次。

诺斯科夫同志（见1932年12月19日《消息报》）索性建议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牲畜全年自始至终放血（牲畜组织利用法），

以获得十分珍贵的食品——血。

根据他提供的资料，一头牛每次可放血4~20公升（视年龄、品种等而定）而于其无害，全年可放血185公斤。

从200头牛身上，每天可放血130~150公斤。用这些血可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制作520~540份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食品，全年可制作19万份菜肴或罐头。

如果说，诺斯科夫同志提出这一任务目的在于获得食用血，那末，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借助放血使畜群人为增膘；第二，使农业劳动者得到物美价廉的食品。

放血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我们认为，在兽医指导下，医士和卫生员很容易学会操作。这作为一项新措施，当然需要置于科学监督之下。

“置于科学监督之下”

（叶列涅夫斯基教授的意见）

我认为，瓦西里耶夫教授关于5、6、7月停止或至少减少牲畜屠宰的建议，从动物饲养学和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是正确的和适宜的。

他提出的定期放血法十分重要，值得特别注意。对这一方法必须加以检验，在高水平的专家指导下进行实验。

C. 叶列涅夫斯基教授

“一项重要措施”

（州输血站站长叶尔莫连科同志的意见）

失血会加强某些器官及其系统的活动，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在

适当的营养条件下，机体生命活动中的这种改变，可以被用来改善总的身体状况，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如此。

在重复放血和经常放血的情况下，有各种理由期待脂肪的大量积储，这是因为不断放血会降低机体氧化过程的速度。此时，一个确定无疑的条件是适当地饲养动物。

应该认为，瓦西里耶夫教授的建议一定会引起有关经济单位的强烈反响。这一建议并不需要巨大的物质消耗。先在一个国营畜牧场中，在实验室监督条件下落实这一建议，它有各种理由成为改进我国肉类工业的重大措施。

州输血站站长 叶尔莫连科博士

“必须进行大规模实验”

(戈尔德贝格教授的文章)

我认为，瓦西里耶夫教授的建议十分重要。重复放血对牲畜绝对无害。一些细菌实验室经常从马身上大量取血，已有丰富的经验。

重复放血必须在实验室监督之下进行，因为不同牲畜（视饲料、品种、年龄、性别等而定）血液恢复的过程有所不同。

我深信，由于进行组织良好的大规模实验，定会挖掘出许多事先难以预见的潜力。

戈尔德贝格教授

№02531

卡冈诺维奇关于苏哈列夫广场改名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34年10月25日)

我们打算把苏哈列夫广场改名为集体农庄广场，同时打算在节日之前建造一个莫斯科各集体农庄的光荣榜^①，关于光荣榜一事我已跟您谈起过。

我们将在广场不通车的、对交通没有任何影响的地方建造。您有何意见，请告知。

卡冈诺维奇^②

① 1934年11月8日莫斯科州集体农庄光荣榜在集体农庄广场揭幕。

② 此信自莫斯科寄往索契。

№02532

**卡冈诺维奇关于光荣榜的
建造地点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34年10月26日)

索契，斯大林同志

关于光荣榜的问题，我不得不再次征求您的意见。

我们打算立即就开始建造，并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之前完工。

如果建造的地点在苏哈列夫广场，这会引起疑义的话，那么可以把光荣榜建造在离红军宫不远的萨莫捷奇广场，或者建造在阿尔巴特街沿线的斯摩梭斯克广场上。

务请将您的意见告知。

卡冈诺维奇

№ 02533

斯大林关于建造光荣榜地点
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4 年 10 月 26 日)

关于在苏哈列夫广场上建造光荣榜的问题，我同意。

斯大林^①

10 月 26 日

^① 此信自索契寄往莫斯科。

No 05217

中央报刊和出版部主任关于书刊检查工作 给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信

（1936年1月5日）

国内出版的书刊由书刊检查机关进行两次检查。有书刊付印前的所谓“预检”，由直接在出版社工作的书籍出版总局全权代表进行；还有书刊出版后的所谓“复检”，由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进行（各种日报例外，书籍出版总局常驻报社全权代表对报纸的检查即是最终检查）。

对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工作的检查表明，国内书刊检查的状况令人十分不满。

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对已由其直接在出版社、报社及边疆区（州）书籍出版事业局工作的全权代表审查后报送的书刊进行复检。因此，根据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的工作，可以评价其驻各出版社和地方机关进行预检的全权代表工作的成绩和质量。

书籍出版总局机关由4个主要的部组成：政经部、文艺部、农业部和边疆区检查部。指导预检工作也是各部的任务。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是如何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的呢？

政经部对32家出版社（从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到国家医学书籍出版社、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世界语学家中央出版社等）进行复检。该部共4人，其中无1名经济学家。该部工作人员，无论就其数量，还是知识修养，都无法保证对书籍的专业审查。因此，对报送的大多数书籍根本不作审查，而让它们“扎堆儿”（政

经部“扎堆儿”的书籍竟达70~75%)。甚至在该部审查书籍的比例极其有限的情况下,1935年仍有30种已通过预检的书籍被禁止发行,而同一年在预审中仅有25种书籍不予付印。

这说明预检工作极其薄弱,预检人员对工作敷衍塞责。

政治编辑莱斯因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在审查党员证件时被开除出党。然而,直至今日他仍在该部工作。该部原领导人卡赞斯基同志(根据组织局决议被撤职)既不过问本部工作,又不指导预检工作。卡赞斯基对中央监察委员会揭露出来的书籍出版总局驻国家财经出版社全权代表扎列茨基的损公肥私反党行径,姑息纵容。该部还让介绍托洛茨基主义书籍的梅济耶尔的图书分类词典通过检查。

农业部审查所有农业书籍。部内有4人。其中3人具备某些农业方面的知识,1人毕业于哲学史学院。但是,实际上该部并不能保证认真的审查。部内无一名畜牧问题专家,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该部“扎堆儿”的书籍多达60~65%。对大多数有关农业迫切问题的书籍,只是“笼而统之”地审查一下。然而,该部仍有大量书籍被禁止发行:1935年多达116种。

文艺部的4名工作人员中,只有部长斯帕斯基同志毕业于红色教授文学院,其余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修养。派驻主要文学出版社的全权代表不具备文学知识修养。

边疆区检查部审查各边疆区及其各州出版的所有书籍,从社会政治、文艺书籍,到兽医、医学等书籍。在该部工作的5个人的职责是按地域特征划分的,这倒也合乎情理。每位政治编辑负责几个边疆区。他们本该具备某些综合知识,以保证在自己负责的边疆区审查各个门类的书籍。然而,因为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复检只是敷衍了事,只能发现一些极其严重的错误,而这类错误在边疆区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物中俯拾皆是。边疆区检查部虽然工作很差,

在1935年仍查禁并清除了79种书籍，其中18种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的。

边疆区检查部副主任直到最近仍是奥尔洛夫。他在审查党员证件时被开除出党。原来他不是奥尔洛夫，而是奥利舍夫斯基，现在被流放的旧警察署长的儿子，沙皇军队的军官。奥利舍夫斯基与其兄（一个非法进入苏联的白卫军分子）保持着联系。

由于书籍出版总局全权代表在各出版社工作不力，国家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市场则充斥着种种质量低下的书籍。在12个中央图书出版社中，在1935年的11个月里，有69种书籍经书籍出版总局复检被清除并化作废纸，使国家损失413510卢布；有85种书籍限令修改，损失148300卢布。

从上述书籍出版总局各部工作概况可以看出，这绝不说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组成情况良好，而只说明进行预检的全权代表力量薄弱，工作糟糕。

必须使书籍出版总局中央机关不仅要纠正迟钝的预检所犯下的使国家损失大批资金的错误，而且特别要组织并加强预检工作，为预检工作选择人才。现有干部鱼龙混杂，且多为兼职。而书籍出版总局直至最近对预检工作不曾过问。不仅未加研究，而且对预检工作人员，诸如驻各出版社、报社、地方机关全权代表和政治编辑，甚至不曾登记。现在才刚刚开始登记。通过登记立即发现，莫斯科有个人档案的88名预检工作人员中，有46人因犯严重政治错误受过（有的数次受过）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在科学院出版社担任书籍出版总局全权代表的鲁巴诺夫斯基，因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和同情反对派观点（他曾在加米涅夫领导的出版社工作，至今仍继续工作）而多次受到党纪处分。书籍出版总局驻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全权代表戈罗杰茨卡娅，曾因泄露军事秘密受过严重警告，在审查党员证件时其党证被扣留。许多驻中央报社的政治编辑人员政治水平

不高，不了解自身职责，往往对工作敷衍塞责。因此，在各报政治编辑的指示中，各自为政的东西比比皆是（一位政治编辑准许刊登另一位政治编辑禁止刊登的内容）。有许多因禁止发表完全无可非议的作品而闹出笑话，而根本不应发表的消息却仍然陆续见报。

在预检工作人员中，几乎人人兼职之风愈演愈烈，令人忍无可忍。莫斯科的126名预检工作人员中，有76人兼职。而在各科技出版社的42名全权代表和政治编辑中，有35人兼职。在军事书籍检查机关的35名工作人员中，有25人兼职。

如果说中央书籍检查机关的状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地方上尤其是各区的状况，简直就是一种灾难。除了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摩棱斯克、高尔基和罗斯托夫，整个情况是，书籍出版总局对所出书籍的检查有名无实。至于对报纸的检查，几乎各区都责成区教育局局长、军事委员或区委员会工作人员兼管。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和塔吉克斯坦，3250名区全权代表中仅有297人不兼职。

各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对书刊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根本不为其拨派工作人员，或者拨派一些犯过错误、对任何工作都完全不能胜任的人。

书籍出版总局工作中的症结在于，现行预检政治编辑的劳动报酬的体制。在此体制下，政治编辑不是在书籍出版总局，而是在其供职的各出版社领取薪金。这一体制不仅造成在劳动报酬方面各行其是，而且使政治编辑处于依赖出版社的状态，还产生书刊检查人员滥用职权、损公肥私和敷衍塞责的现象。已被中央监察委员会揭露的书籍出版总局驻国家财经出版社全权代表扎列茨基便是一例。他每月总收入约3000卢布，而驻外国工人出版社全权代表阿克塞

尔罗德每月收入达 5000~6000 卢布。

必须立即终止现行劳动报酬体制。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扎列茨基案件的审查，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书刊检查的现状严重落后于党对出版事业提出的任务。谨提出决议草案，随信附上。

中央报刊和出版部主任 Б. 塔尔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签名)^①

^① 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3177

肖洛霍夫要求接见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6月19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来莫斯科住3~4天。很想见到您，即使5分钟也好。如果有可能，请予接见。^①波斯克列贝舍夫^②知道我的电话。

米·肖洛霍夫^③

1937年6月19日

① 在1937年6月克里姆林宫值班秘书的记事簿中没有关于斯大林接见肖洛霍夫的记载。

② 波斯克列贝舍夫，从1935年8月起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斯大林的秘书。

③ 米·亚·肖洛霍夫，苏联知名作家。193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193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No03178

斯塔夫斯基关于肖洛霍夫处境 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9月16日)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

由于听到有关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到维申斯克镇他那里去了一趟。

肖洛霍夫没有去西班牙参加国际作家大会^①。他说这是由于“自己在维申斯克区的政治地位的复杂性造成的”。

米·肖洛霍夫至今没有交出《静静的顿河》的第四卷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卷。他说，他在维申斯克区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使他无法写作。

我读了300页《静静的顿河》第四卷的打字稿。鞑靼村被毁坏的景象、达莉娅·麦列霍娃和娜塔莉娅·麦列霍娃的死，以及整个300页上展现的一片衰败和某种前景渺茫的总的基调，使人心情十分沉重。在这种阴暗消沉的基调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反对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的闪现和对将军们的仇恨的火花也都荡然无存

^① 1937年7月在西班牙举行了第二届国际作家反法西斯大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决定，由M.科利佐夫（主席）、爱伦堡、托尔斯泰、维什涅夫斯基、斯塔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米基坚科、A.巴尔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工作。

了。

米·肖洛霍夫对我说，最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终将放下武器，停止斗争。

“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写成一个布尔什维克。”

肖洛霍夫所在的维申斯克的环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3个月以前，原联共（布）维申斯克区委书记卢戈沃伊被捕，他是肖洛霍夫政治上的好友和私人知交。在此前后，一批区委工作人员被捕（有原区地政处处长克拉休科夫、原区执委会主席洛加乔夫等）。他们均被指控参加了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

米·肖洛霍夫向我直言不讳地声称：

“我不相信卢戈沃伊有罪，如果判他有罪，那就是说我也有罪，也会判决我。要知道在区里我们一切都是一起干的。”

回忆起卢戈沃伊时，肖洛霍夫在他身上只发现了优点，特别是对卢戈沃伊在同人民的敌人舍博尔达耶夫、拉林及其一伙斗争时表现出的热情赞不绝口。

米·肖洛霍夫极其激动地、用几近恼怒的口吻说：

“我还不知道，现今的边疆区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不，第二书记伊万·乌里扬内奇·伊万诺夫来过一次，住了两天，一起喝伏特加，谈话，他说得多好。我已经想到过，他要比叶夫多吉莫夫更加坚定有力，可结果他却是人民的敌人，现在已经被捕！”

“你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催促我们播种，收割，可他们自己却把粮食堆在巴兹基让它烂掉。成万普特的粮食在露天发霉腐烂！”

第二天，我调查了肖洛霍夫的这些话。果真如此，在顿河岸边的巴兹基存放着约1万吨小麦（部分已经霉烂）。直到最近几天

(下雨以后)才把防雨布运来。粮食联合收购站的破坏分子已被逮捕。

米·肖洛霍夫恼怒地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区里的工作人员在监视他，并在搜集有关他和他的家人的种种流言蜚语。

米·肖洛霍夫谈到心里话时说：

“我常想，以后总有一天我会害怕他们的。”

我对这话的理解是，他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不加掩饰地正面问他：你是否以为在区里在你周围有敌人在活动，而他们希望你不要写作了？现在你不写了，敌人在某种程度上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肖洛霍夫的脸色变得煞白，住口不说了。从接下来的谈话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他最近已经犯下了重大的政治错误。

(1) 8月初，他收到原区地政处处长克拉休科夫从流放地寄来的信（写在香烟纸上），但他没有给任何人看，在同我谈话时才第一次拿了出来。而这成了为卢戈沃伊辩护的证据。在克拉休科夫的信中写道，他是无辜的，侦讯是不正确的和违法的，等等。

我问他：他是否把这封信复制了下来？他说，复制了，但既没有交叶夫多吉莫夫同志，也没有交给区委。

(2) 肖洛霍夫是区委7名委员之一，但却不从事任何党的工作，不到集体农庄去，坐在家里或者出去打猎，只听“自己人”的报道。

肖洛霍夫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对他将他们忘记，几个月不来表示极度不满：

“他生活中还缺少什么呢？房子是一座二层楼的宫殿，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一辆汽车，两匹马，几头奶牛，一群狗，还老是唧唧喳喳，总在自己家里坐着。”

(3) 在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上，肖洛霍夫被选人书记处，但他

一次也没有去过。

在边疆区里（顿河罗斯托夫），对待肖洛霍夫极为警惕。

叶夫多吉莫夫同志说：

“我们不想把肖洛霍夫交给敌人，想把他从敌人那里夺回来，并把他变成自己人！”

与此同时，叶夫多吉莫夫同志还补充说：

“如果这不是具有名望的肖洛霍夫，他在我们这里早就被逮捕了。”

我把我同肖洛霍夫的谈话全部告诉了叶夫多吉莫夫，他说，卢戈沃伊至今不认罪，虽然存在明显的破坏事实和大量指控他的见证。关于侦讯中的问题，已引起边疆区内务局的注意。

显然，在区里活动的敌人躲在肖洛霍夫背后，利用了他的自尊心（区委常委会多次在肖洛霍夫家开会），现在还试图利用他作为自己的袒护者和辩护人。

对于肖洛霍夫来说，最好是离开镇上到工业中心城市去（现在他的亲属对他和他的妻子还产生影响，直接散布反革命思想），但他断然拒绝这样做，在这方面要说服他我也无能为力。肖洛霍夫斩钉截铁地声称，他同党和政府的政策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卢戈沃伊的案件引起了他对地方政权机关行为的极大怀疑。

当抱怨他无法写作时，米·肖洛霍夫不知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提及，他曾向国外寄出第四部的片段，但在莫斯科被（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截留下来，因此，国外向他询问：手稿在哪里？是否出了什么事？

肖洛霍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加以纠正，这既指克拉休科夫的信，也指党的社会工作方面。他说，谈话以后他感到轻松了一些。

我们谈妥，他将多写一点，并于近日来莫斯科。

但主要的是：他的辗转不安、孤立独处（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他的怀疑令人极为忧虑，为此我告知以上情况。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斯塔夫斯基^①

1937年9月16日^②

① 弗·彼·斯塔夫斯基（基尔皮奇尼科夫），作家，1936～1941年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

② 文件上有斯大林的批示：“斯塔夫斯基同志，试着把肖洛霍夫叫到莫斯科待上两天。您会答应我吧。我不反对与他谈谈。约·斯大林”。1937年9月25日下午4点30分到6点斯大林接见了肖洛霍夫，当时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叶若夫。

№03179

肖洛霍夫关于维申斯克案件 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10月5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叶若夫^①同志肯定已经向您报告了维申斯克案件的结果。他昨天说，今天将把释放卢戈沃伊和克拉休科夫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②

我这10个月的经历使我有权向您提出请求，请您在叶若夫同志通报维申斯克案件之后，或者在您认为方便的任何其他时间，允许我见您几分钟。

我对您本人，对中央委员会有一个请求。

请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通知我，他知道我的电话。

肖洛霍夫

1937年10月5日于莫斯科

① 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95～1940），1935年2月起为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6年9月起为内务人民委员。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7年11月17日的决议批准了联共（布）罗斯托夫州委1937年11月14日做出的关于恢复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克拉休科夫在维申斯克地区的原职。

No03180

肖洛霍夫关于接见之事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10月7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由于紧急的事我不得不于今天回去。本月二十几号，因《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大剧院上演，^①我肯定要再来莫斯科，并将请您那时接见我。如果我无法来莫斯科，我将从维申斯克镇写信^②告知您本想当面谈的事。

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米·肖洛霍夫

1937年10月7日于莫斯科^③

① 1937年10月23日《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大剧院首次上演。

② 见本专题No03181文件（193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

③ 在信的打印件上写有：“我的档案。斯大林”。

№05219

凯洛夫关于乌克兰卫生
人民委员部大批解除专家职务
致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的信

(不晚于 1937 年 11 月 17 日)

今年 10 月，联共（布）中央学校部收到基辅医学院教授克鲁普斯基的申诉书。该教授就他曾为后来被揭露为人民敌人的柳布琴科一家治过病而被解职之事提出申诉。

学校部将该申诉书和其他许多关于无充分理由而被解除医学院工作人员职务的申诉书转发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并建议该部派专门工作组到当地，会同苏联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就这些材料进行详细调查。

调查证明，基辅医学院在一天之内解除了 32 人的职务，敖德萨卫生细菌学研究所两天内解除了 35 人的职务。

在曾被解职、后又被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组恢复原职的人员中，有许多诚实工作的著名专家。解除其中大多数人职务的理由是，他们有亲属在国外（虽然其中许多人与亲属并未保持联系）。

还有这样的情况：不准被解职的人员进入研究所，他们的工资和其他款项均寄往家中。卫生细菌学研究所工会基层委员会竟然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公园里收纳会费。

地方保健机构不接受任何被解职人员参加工作。结果，约 70 名专家失业。

基层单位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理所当然的不满，这只

能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已将上述情况报告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并受莫洛托夫同志委托，就此问题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交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学校部副主任 凯洛夫

№05220

普罗珀 - 格拉先科夫
关于大批医务人员被解职
致叶若夫的信

(1937 年 11 月 17 日)

叶若夫同志：

10 月份，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受理了一系列关于大批解除基辅医学院和敖德萨卫生细菌学研究所工作人员职务的申诉。其中基辅医学院院长沙什科在一天内以“不符合苏联高校教师要求”为由解除了 32 人的职务；敖德萨卫生细菌学研究所两天内解除了 35 人的职务，并未说明理由。

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专门工作组会同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代表所作的调查，证明上述情况属实。

所有被解职的基辅医学院工作人员，随即也被基辅其他医疗机构解职。他们在试图寻找某种医务工作时，到处遭到拒绝。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联合工作组，为受到基辅医学院审查的 47 人中的 26 人恢复了原职。工作组派遣其余 21 人参加实践工作，原解职提法作废。

在曾被解职、又被工作组恢复原职的人员中，有许多著名专家，他们诚实工作，忠于苏维埃政权。著名细菌学家舍列梅特曾因研制细菌过滤器荣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奖状，并因将过滤器应用于工业受到奥尔忠尼启同志嘉奖。他向工作组一针见血地申明：“我被解职是阶级敌人干的。”

生理学教授鲁坚科被基辅第一医学院解职（据说理由是某次讲课时曾有醉态），第二医学院院长为保全自己，立即解除他在第二医学院的职务，理由竟是他第一医学院兼职。

细菌学家斯基宾斯卡娅是一位有12年医龄的医生，发表过几部科学著作。她被基辅医学院解职后，由于市卫生局拒绝派她作其他医务工作，她去了一家工厂当了缝纫工，勉强充数，结果引起工人的愤慨。

敖德萨卫生细菌学研究所所长阿宁娜，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处的指示，在两天内解除了35人的职务。其中4人是研究所主要科室的主任，11名是科研工作者、医生。

所有被解职人员的共同点是有亲属在国外，虽然其中许多人与亲属并未保持联系。

在被解职人员中，有几位著名专家（帕拉万多夫教授、库珀尔施泰因副教授、格林费尔德研究员）已在学院工作15年以上，多次受奖，是优秀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

卫生细菌学研究所解除工作人员职务的工作，进展非常迅速，不准他们交代工作，为了解除其中一些人职务，将其从休假地提前召回。被解职人员不得进入研究所，工资和其他款项寄往家中。为收纳会费或发放个人卡片之类的东西，工会基层委员会竟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公园里办理。解职理由也未告知当事人。

尽管所长对每个被解职人员宣称，该人员是诚实的专家，其名誉丝毫未受损害，可以在同专业的其他机构工作，但是，地方保健机构拒不接受任何被解职人员参加工作，这些人现在实际处于失业状态。

即使根据政治原因，需要解除卫生细菌学研究所上述人员，问题也应该逐步解决，将其调往其他工作岗位。

采取此种“清洗”高校和科研机关的办法，结果造成约70名

专家被剥夺劳动权利。这只会科学工作者中引起惊恐和愤恨，只能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我认为，这些事实是反革命行为。我提请联共（布）中央给予注意，立即采取措施，以防今后类似事件发生。

苏联副卫生人民委员 普罗珀-格拉先科夫

No 03181

肖洛霍夫关于维申斯克案件

致斯大林的信

(1938年2月16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维申斯克区委书记卢戈沃伊、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洛加乔夫和人民委员会农产品采购委员会全权代表克拉休科夫被释放以后，党的罗斯托夫州委常委做出决定，恢复卢戈沃伊和其他人的原职。决议中写道：“……侦讯材料说明，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克拉休科夫三同志是被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组织和社会革命党白卫组织为了达到自己卑劣的敌对目的而恶毒地诽谤所陷害的。”

这种提法实质上是不正确的，是为了消除敌对活动的痕迹而编造出来的。多么简单：敌人诽谤维申斯克的共产党员，他们之所以诽谤，正因为他们都是敌人；被诽谤的人得到平反，罗斯托夫州委和州内务局的迷雾被中央的决议所驱散。可是，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州委（敌人就曾在州委里，而且现在还有）在对卢戈沃伊和其他人立案时明明知道，卢戈沃伊和其他人与敌人的活动并无牵涉，敌人把他们开除出党，而盘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罗斯托夫州机关中的敌人强迫其他被捕者对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克拉休科夫提供虚假的口供。他们不仅强迫某些被捕者进行诽谤，而且也千方百计试图要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克拉休科夫自己提出假口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这方面也有些成就：被拷打摧垮了的洛加乔夫就对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其中还包括我，提出了假口供，而且还毁

谤了自己。洛加乔夫，和其他被捕者一样，在新切尔卡斯克监狱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我在信的最后还要回过头来谈在亚速海—里海地区的侦查和审问方法），就按照给他的暗示提出了假供词。

在州委和州内务局曾经有过而现在仍然保留下来一批未被彻底打垮的、力量强大的串通一气的、并且又极其隐蔽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他们力图消灭全边疆区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这批敌人多有得逞，特别是在人民敌人卢金及其帮凶曾大力活动的边疆区北方几个区。维申斯克案件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卢戈沃伊和其他维申斯克人承蒙您的干预获得释放，但是，被党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逮捕的成百上千的别的共产党员至今仍在监狱中或流放地经受折磨。

该是最终查清这一桩疑案的时候了，斯大林同志！总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存在下去，即一方面卢戈沃伊获得释放和恢复党籍，而另一方面“因与人民敌人卢戈沃伊保持联系”而被捕和判刑的人仍然继续遭罪和受着不应有的惩处。那些有意识地把正直的共产党员关进监狱的人也不应一直逍遥法外。然而，目前一切如旧：无辜的人们蹲在监狱里，而有罪的人却过着快活日子，谁也不想去追究他们的责任。

在两次^①和您会见时，我不可能按顺序前后连贯地向您陈述边疆区里过去发生的事和现在的情况。请允许我现在把所有这一切都向您叙述清楚。

您知道，斯大林同志，一批维申斯克的共产党员在舍博尔达耶夫及其周围一伙人眼中印象不好。直到现在才弄清楚了舍博尔达耶夫反对我们的原因：我们妨碍了他们的破坏活动，而他妨碍了我们

^①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37年9月25日；第二次是1937年11月4日下午5~6点，5点30分之前肖洛霍夫与斯大林单独交谈，后来莫洛托夫和叶若夫来了。

诚实地工作。舍博尔达耶夫多次发现，我不怕在任何情况下把他们的劣迹报告给中央。看来他对此十分反感，于是决定摆脱维申斯克人。他毫无任何理由地几次提出撤换卢戈沃伊的问题，指责后者主张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止一次要开除其出党。他把在维申斯克区工作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用各种借口先后从区里调走，而把自己的人派来代替他们。他派来的人胡作非为，千方百计中断工作和打击区的领导。

这些人从来到区里的第一天起就大搞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竭力排挤支持卢戈沃伊、支持区委的人。舍博尔达耶夫的这帮爪牙无恶不作，卑劣至极。这场隐蔽的战争早就开始了，而在中央审查奥夫钦尼科夫的活动以后斗争特别激烈起来。当时，奥夫钦尼科夫因过火行为受到中央严重警告处分，而一个月以后舍博尔达耶夫在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上却要把奥夫钦尼科夫提拔为边疆区党委常委候补成员。卢戈沃伊提出异议。舍博尔达耶夫、拉林、阿罗茨克尔和边疆区党委的其他常委来到北顿河区代表团会议上，施加压力，要求投票选举奥夫钦尼科夫和帮他搞过火行为的助手沙拉波夫。卢戈沃伊再次表示反对，北顿河区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也支持他，结果奥夫钦尼科夫和沙拉波夫两人均未选上。

代表会议刚一结束，舍博尔达耶夫抓住某一件小事不放，提出撤换卢戈沃伊的问题。中央没有批准边疆区党委的这一决定。在这之后，舍博尔达耶夫在维申斯克区的亲信、内务局情报科科长梅尼希科夫（已于去年被捕，系德国间谍）和区委第二书记基谢廖夫大肆活动，简直让人无法呼吸……向边疆区委员会，向中央散布了大量对卢戈沃伊、我以及同边疆区委员会怀有敌意的领导作斗争的其他共产党员的诽谤材料。区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时，没有一次不遇到舍博尔达耶夫分子的直接或间接抵制。对任何问题都会出现分歧，特别是在纠正奥夫钦尼科夫犯下的过火行为方面更加严重。

突然之间，舍博尔达耶夫对于我的写作生活的前途表现出关怀备至的态度。每次见面，他都小心翼翼但却坚持不懈地说，我应当转向其他的题材，必须进入工人阶级的生活激流，去描写他们，因为哥萨克农民这个题材已经挖掘殆尽，党需要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意愿的作品。他极力劝我搬到某一个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去住，甚至答应出力为我的搬迁提供方便。我婉转地暗示，如果放弃写作生活那就不务正业了，总之，一再婉谢……

舍博尔达耶夫劝我变换住处，而他的同伙们则不遗余力地散布说，肖洛霍夫是一个富农作家和哥萨克反革命势力的思想家。维中斯克的舍博尔达耶夫分子则把我每一次保护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农庄庄员的行动都说成是维护富农的利益，而内务局情报科长梅尼希科夫又利用1929年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叶兰金，诬陷我的《静静的顿河》是从叶兰金那里剽窃来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自从我于1934年向您，斯大林同志，叙述了北顿河地区集体农庄中的状况，叙述了边疆区党委不愿意纠正1932~1933年发生的过火行为的后果的情况，自从中央下达关于帮助北顿河民族区集体农庄的决议以后，——梅尼希科夫、基谢廖夫等等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梅尼希科夫安装了一个窃听装置，偷听我和卢戈沃伊的电话谈话，对我进行几乎明目张胆的跟踪；和基谢廖夫一起，他们开始在区委常委会上公开取消卢戈沃伊或我提出的任何一个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建议。已经无法工作。这迫使我们把区里发生的情况告诉边疆区党委。

在罗斯托夫，我和卢戈沃伊向舍博尔达耶夫通报了梅尼希科夫、基谢廖夫和他们手下人的活动事实。参加谈话的还有马里诺夫和拉林。我说，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太困难了，本应用于创作活动和党的工作的时间白白浪费了。最后我宣称，我不是犯人，不愿意在公开监视下生活。舍博尔达耶夫回答说，可以把梅尼希科夫和基谢

廖夫从维申斯克调走，不过他又补充说：“我们派蔡特林（早在1936年就被逮捕）到你们那里去任第二书记。卢戈沃伊政治素养不够，而蔡特林是一个有素养的汉子。也将派一个称职的内务局长去”。停了一会，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不过我们还是要看着你们……我向中央提出过撤换卢戈沃伊的问题，因为他迟迟不取消郊区农庄，但是中央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当然，中央看得更清楚，……但是反正，卢戈沃伊，你不得不同维申斯克告别……我们在一起处不好。你奉行自己的一条路线。你以为可以不受惩罚一走了事？办不到！”

不久之后，梅尼希科夫不是调到某个别的区里，而是得到升迁，去了索契。基谢廖夫也调走了。前来取代他们的是第二书记切卡林和内务局情报科长基姆钦科。

我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罗斯托夫。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舍博尔达耶夫又将重新开始对我们施加压力，而且将更加不遗余力。卢戈沃伊当时就建议我把所有这些事情写信告诉您。是我劝他不要这样想。“我们和舍博尔达耶夫没有任何瓜葛。让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同他进行斗争。至于抱怨他对待我们不好，那就不必了，看起来像孩子吵架一样。”

我们就是这样过着日子。把他们用来毁坏集体农庄和日复一日地整治我们的所有做法都写出来会令人伤心和作呕。在罗斯托夫从各个方面都破坏性地安排我们区的经济。从以下的力量对比您可以做出判断：

1934—1935年

在相邻的上顿河区：

播种面积，23000公顷

拖拉机（轮式），100台

（履带式），5台

在维申斯克区：

播种面积，34000 公顷

拖拉机（轮式），66 台
（履带式），6 台

1937～1938 年

相邻区的巴兹科夫机器拖拉机站

播种面积，14000 公顷

拖拉机（轮式），56 台
（履带式），16 台

维申斯克区科隆达耶夫机器拖拉机站

播种面积，18000 公顷

拖拉机（轮式），66 台
（履带式），9 台

甚至在维申斯克区本身，就两个拖拉机站机械化力量的安排，从对比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险恶的用心：

杜达列夫机器拖拉机站

播种面积，16000 公顷

拖拉机（轮式），38 台
（履带式），7 台

科隆达耶夫机器拖拉机站

播种面积，18000 公顷

拖拉机（轮式），66 台
（履带式），9 台

其他区都得到备用部件，而我们的则在米列罗沃出售。年复一年地迫使我们毫无目的地把种子粮在冬天运来运去，存心要在春天到来时使耕畜受损伤而不能使用。计划我们区的播种面积时安排得无法按时完成，然后又在决议中加以责骂，等等。

民族区也奉行这样的路线。民族区党委对于维申斯克人也不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因为领导民族区的也同样是卢金、穆拉夫尼克、巴扎尔尼克、卡西洛夫等这样的敌人。他们通过对卢戈沃伊、对其他从区里排挤出去的人进行各种攻讦来进行破坏活动。卢戈沃伊在集体农庄买下一公担土豆，监察委员会就以极大的罪名“自给自足分子”立案。这个无聊乏味的案子一拖几个月；又是请示、又是审问、又是侦查人员调查，而土豆只值 5 卢布 50 个戈比，且这批土豆，集体农庄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民族区党委千方百计地阻挠卢戈沃伊参与工作。一切问题都同第二书记切卡林联系，而且建立了一种很不寻常的联系方法：民族区党委工作人员来到维申斯克镇，悄悄地去切卡林家里，同他谈论党的事务，而不去区委就离开了，我们——区委委员——从切卡林口中才得知来人的目的，有时则根本不得而知。民族区党委明显地侮辱我们，偏偏指责我们向集体农庄庄员隐瞒斯大林宪法。提出如此吓人的指责，有什么借口呢？有 2 个拖拉机队在宪法草案公布的一个半星期内没有学完草案。之后发生的统统是这样一类事情。

区里有 3 名区委常委委员（区委第二书记切卡林，内务局侦查科长季姆琴科、区报编辑维杰林）公开声称，他们是边疆区党委派来监视我们的，把党组织中的不满分子拉拢在自己周围，让他们远离区委，还散布谣言说，卢戈沃伊一两天内就要被边疆区党委撤职，他是人民的敌人等等。而与此同时，他们表面上又不显露出他们有敌对情绪。切卡林几乎没有一天不对卢戈沃伊造谣中伤，可是当面却说要更加亲密和睦地工作，要相互接近，更加信任，一句话，他奉行典型的两面派政策。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点呢？无疑，是知道的。知道而保持沉默，这是因为我们深知，如果要求调换他们，那么派来的还会是这样一类的人。在撤换基谢廖夫和梅尼希科夫以后，我们对此已经深信不疑。舍博尔达耶夫委派来的三个人，

在同我们作无原则斗争时是不择手段的。1936年夏天，他们开始给我和我的妻子投寄下流的匿名信，破坏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品德和人格。我有一次讲到这事，季姆琴科笑着表示愿意帮助我调查这件事，并追出匿名信的作者。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因为我确信他本人正是这些不干净作品的作者。季姆琴科不止一次对我说，一些哥萨克反革命组织正准备谋杀我。似乎有一个被遣返的军官在我住所附近被他逮捕，搜查出他携带武器，此人在预审时声称，是到维申斯克来杀我的。有一次季姆琴科喝醉了酒，说有人在打猎时跟踪过我，但又怕向我射击，因为知道一旦不能命中便会被我打死。他最后说，“他知道你枪打得很准，所以不敢冒险。”第二天，当我想更仔细地弄清季姆琴科讲的消息时，问他是谁跟踪过我，此人是否已逮捕？季姆琴科眼睛也不眨地回答说：“我没有向您讲过这样的话。您理解错了。”

当季姆琴科一次要求我通知他我到哪里去，似乎要采取保卫措施时，我大笑着用一句俗语回答说：“但愿上帝让我避开这样的朋友，而遇到敌人时我会对付的”。这里何必低声细语呢……至此，我们的关系也就确定下来了。

边疆区、民族区、乡镇——这就是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来源。但您不要认为，我们当时就已经成了不幸的可怜人。我们知道，如果问题达到严重的地步，您不会让我们被毁掉的。我们的希望，斯大林同志，就寄托在您身上，就寄托在中央身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要是没有这样的希望，难道能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生活一年吗？

自1936年起，事态发展得更快了。有了一次用普通的无风险的手段同我们进行清算的机会，在全边疆区开始了消灭敌人的行动。一有机会就这样做了。在卡沙尔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破获了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我们这里的全权代表

季姆琴科也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参加清查行动。在下格列科沃镇上逮捕了教师伊万科夫。克拉休科夫——维申斯克区委常委、我的朋友——就是这个镇上出生的人，而由于人民的敌人奥夫钦尼科夫的照顾已经坐过一次牢了。

季姆琴科和米列罗沃边疆区内务局局长斯佩兰斯基——原先是显赫的贵族和沙皇军队的中尉——强迫伊万科夫供认克拉休科夫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组织。有了这样的口供就足够了，克拉休科夫于1936年11月23日被捕。

当克拉休科夫还是个16岁的孩子时，他就志愿参加了红军，自1920年起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03年出生的他本人只见过伊万科夫几次。又是贫农家庭出身。但是，谁需要这一切呢？谁会对克拉休科夫的过去感兴趣呢？需要逮捕一个维申斯克人，有了恰当的借口，就逮捕起来。他们的盘算很简单：从克拉休科夫口中搞到诬陷所有维申斯克人的假口供，那样就可以以这个假供词为根据对其他人下手。

不必说了，对于逮捕克拉休科夫，维申斯克剩下的6名常委看法各异。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我，知道克拉休科夫是一名极端正直，忠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认为他遭逮捕或者是出于误会，或者是季姆琴科卑鄙行动的结果，因为他们之间关系不好，或者是公开的针对我们的讨伐行动开始了。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我反对开除克拉休科夫出党，认为必须等候边疆区党委有关逮捕理由的材料来到。其他三人：切卡林、季姆琴科和维杰林赞成开除。

在区的党员大会上，绝大多数党员通过多年来在区里的工作而了解克拉休科夫，反对开除，因为秘密逮捕的原因谁也不知道，而区委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104名党员中投票反对开除的有91人）。

会议委托区委到边疆区党委弄清逮捕克拉休科夫的原因，然后再重新讨论克拉休科夫的问题。

1月份，叶夫多基莫夫来到罗斯托夫。我们对他的任命感到十分高兴，以为边疆区的事情会像样地开展起来，对我们的态度也会有变化。我们还期望，他会关心克拉休科夫的案件，并把一切都查清楚。但是，叶夫多基莫夫从他到达的最初几天起，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处境仍将和原先一样，斗争并没有结束。在1月召开的边疆区党委全体会议上，卢戈沃伊作了发言。他说到边疆区党委原领导人的错误，列举了事实。在说到边疆区领导人领导经济方面的糟糕状况时，他不经意地说出：“我们维申斯克人在舍博尔达耶夫手下一直处于失宠受贬黜的地位。”

叶夫多基莫夫带着难以解释的恼怒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卢戈沃伊发火，大喊大叫起来：“干吗向我大讲失宠受黜的话！你们在维申斯克塑造了一个大文人！你们有个肖洛霍夫，这就是主要的一切！放了一块石头在自己面前，就向它祈祷了！让肖洛霍夫写他的书吧，而政治则不是他而是由我们来搞！”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2月份，相邻的巴兹科夫区格拉乔夫机器拖拉机站站站长科列什科夫来找我。他原先曾在维申斯克担任区地政科科长。他向我讲了以下内容：米列罗沃内务局局长斯佩兰斯基传唤他去，审问了他14个小时，最后声称：“你曾在白军中工作，入党时隐瞒了这一点。在白军中服役期间曾打死过红军战士。我们这里有你的一大本案卷。”他指给他看一个大卷宗，“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的把你关起来。不过现在我们不想这样做。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你和斯拉布琴科、和卢戈沃伊、和肖洛霍夫关系很好。目前，我们需要你向我们提供斯拉布琴科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材料。你必须帮助我们搞清他的问题。你到国营农场^①去找他，同他一起喝伏特加，从他那

^① 斯拉布琴科曾任卡沙尔区“国营红穗养猪农场”厂长，1930~1931年在维申斯克工作。

里掏出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材料。否则对你不利。要知道，你在我们掌握之中。现在我跟你心平气和地讲话，而要是关进我们的牢房，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同你讲话了……”同时，斯佩兰斯基还警告他，如果他向谁透露这次谈话的内容，那不仅要逮捕他，而且会当即枪毙他。

科列什科夫问我：“我该怎么办？”

我劝他写信给叶若夫同志，说斯佩兰斯基挑唆他，并以逮捕相威胁强迫他提供对斯拉布琴科的假供词。

科列什科夫是否到斯拉布琴科那里去过，我不知道。但到3月份，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命令，斯拉布琴科被逮捕了，不久之后，科列什科夫也被捕了。

得知克拉休科夫是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的，在他被捕2个月之后，我们开除了他的党籍。

4月份，叶夫多基莫夫来到维申斯克镇。在区委的秘密常委会上，我们向他谈出了我们同切卡林一伙人的分歧。叶夫多基莫夫责怪我们直接维护人民的敌人克拉休科夫，他声称，克拉休科夫是凶恶的敌人，我们在长达2个半月的时间里不开除克拉休科夫出党是对党犯了严重的罪行。他直截了当地维护切卡林和其他一些人。由于卢戈沃伊在党的会议上把切卡林称作“舍博尔达耶夫分子”，叶夫多基莫夫严厉地责骂卢戈沃伊说：“谁给你权利把舍博尔达耶夫的名字到处乱用的？！”在作总结发言时，叶夫多基莫夫暗示，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应当接受审查，必须把他们调离维申斯克镇。

他离开以后，切卡林、季姆琴科、维杰林对播种公开进行怠工。他们几乎不到田野里去。切卡林坐在区委足不出户，一心搜集卢戈沃伊的材料，季姆琴科干脆拒绝去播种现场，借口工作忙，而维杰林则前往罗斯托夫“出差”，并且未经区委同意在那里实际上无所事事地住了2个星期。切卡林和季姆琴科公开向共产党员们

说：“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的日子不长了。播种要失败。卢戈沃伊即使没有这一条已经是麻子了，现在要更加增添麻点了。”

播种的领导工作完全落在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身上。是他们两人奋力把播种工作挽救过来的。几星期不回家，夜里就在垄沟里睡觉，吃不饱也睡不好，但他们不离开拖拉机，同技术人员和拖拉机手一起修理故障；不丢下最差的地段不管，而是直到把情况搞好为止。一句话，他们是完全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工作的。

但是，切卡林和季姆琴科有一点竟是对的：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的日子不长了。5月，边疆区党委常委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委托沙茨基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当时风行一时的一个动词，从“教育”一词变化而来）。他们被撤职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开除克拉休科夫出党行动迟缓。完全一致地投票通过了将他们撤职的决定。不过，那时常委会成员在进行敌对活动方面是极其一致的：拉林、伊万诺夫（从库尔斯克来的）、谢米亚金、沙茨基、舍斯托夫、卢金等。所有这些人，除叶夫多基莫夫和柳什科夫外，现在都在监狱里。

在常委会上，叶夫多基莫夫又一次对我们发火，再次在参加会议的常委委员和边疆区党委委员发出的一片愤慨声中重申我们无权把切卡林称作为“舍博尔达耶夫分子”，把季姆琴科称作为“鲁季分子”（鲁季——原边疆区内务局长，人民的敌人），并在最后说：“为了澄清克拉休科夫案件，由柳什科夫同志向常委会通报克拉休科夫究竟是什么人。”

柳什科夫站起来，声称：“克拉休科夫是顿河一带的一个大反革命头子。他是别洛博罗多夫的密使，充当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顿河反革命势力之间的联络环节。侦讯材料和克拉休科夫本人的供词可以证明这一点……”

“看看你们维护的是什么样的人！”叶夫多基莫夫悲愤感慨地喊

了起来，同时看着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和我。

所有这一切都是像按乐谱弹奏出来的一样。

与此相联系，我想在这里谈几句关于柳什科夫的情况。柳什科夫当时在会上讲的全部内容，没有一点是符合实际的。克拉休科夫从来不曾是社会革命党组织的成员，跟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甚至从来不曾亲眼看到过别洛博罗多夫，从被捕之日起至获释为止没有提出任何供词。柳什科夫讲话是不负责任的。或者他是被自己机关的工作人员所蒙骗，或者是蓄意诬陷克拉休科夫，期望事后能从克拉休科夫那里获得证明其有罪的供词。

6月6日，叶夫多基莫夫用电报召唤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去罗斯托夫。所谓“进行教育”就在于：沙茨基把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分别依次叫进办公室，命令在他那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搜查，然后说：“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事情明白无误……”

6月11日在边疆区党代表会议上，沙茨基对我说：“你的朋友蹲在监狱里，肖洛霍夫。揭发他们的供词接连不断！但就维申斯克镇而言，这才是开始……那里会出现有价值的事情。维申斯克镇还将让全国为之震惊！”我回答他说，逮捕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是一个错误，但更正确地说，是敌人的行动。沙茨基笑着问：“这不是指我说的吧？你听着，不可能。我是经过审查的。从一件事你就可以判断：尼·伊·叶若夫曾调我去担任负责工作，是叶夫多基莫夫花了很大力气才从中央把我要来的。”

我曾经在见面时向您说过，我不止一次请叶夫多基莫夫查清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克拉休科夫案件。他回答说，将责成柳什科夫去核查，柳什科夫离开后他又答应让科甘去了解，后来又说他找杰伊奇去搞清楚。其实是不想把这件事搞清。后来不得不由叶若夫来调查。联系这一点我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叶若夫同志能够在两

天时间内就把问题搞清，并确认卢戈沃伊和两位同志是完全无辜的，而在罗斯托夫为什么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以为，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想做。

与此同时，在整个边疆区开始逮捕原先在维申斯克镇工作、并同卢戈沃伊关系较好的共产党员。在莫罗佐夫区，曾在维申斯克镇与卢戈沃伊一起工作、担任过工厂党组织负责人的莫罗佐夫区执委会主席利马列夫，由于与卢戈沃伊曾有联系，遭到了逮捕；逮捕了一度在维申斯克镇粮食采购站工作的卡普列耶夫，早在此以前就逮捕了曾在维申斯克镇担任过区执委会副主席的巴兹科夫区、执委会主席舍甫琴科。

新任维申斯克区委书记卡普斯京，据沙茨基说，是叶夫多基莫夫亲自在15名他审查过的区委书记中选定给维申斯克的。卡普斯京在切卡林和季姆琴科的协助下开展了“铲除与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有联系的共产党员”的工作。4个月内，在维申斯克区就有18名党员和16名共青团员被以各种借口开除出党和逮捕。

7月末，联共党员、原红色游击队员И.丘季金，在遇到我时激动地说，他的儿子А.丘季金（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维申斯克镇侦查科秘书）听说，季姆琴科在审问一名被捕的哥萨克（人民敌人卡西洛夫和卢金建立的民族区哥萨克合唱团成员）时，强迫他提供指控我的供词，说似乎我曾经劝这一名哥萨克在合唱团去莫斯科期间设法暗杀政府的某一个成员。我不慎把这一令人气愤的事件通报给区委书记卡普斯京。就在我同卡普斯京谈话的2天之后，丘季金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至今还关在米列罗沃监狱中。

不久之后，季姆琴科向我宣告，他不得不逮捕B.肖洛霍夫——我的一个亲戚，1924年的共青团员，曾任叶兰斯克中学校长。当我问起B.肖洛霍夫犯了什么罪，季姆琴科回答说：“我有他一大叠材料”。我请求让我看一看这些材料。季姆琴科给我看了几张

打印的纸。这份指控结论的内容竟是最骇人听闻的臆造，粗劣的无稽之谈，胡说八道。叶兰斯克中学曾是原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唯一的一所于1934年因工作优异而获得全苏奖金（1万卢布）的中学，而按照季姆琴科的材料，这所学校已经一片衰败，那里全是敌人，等等。B.肖洛霍夫受到的指控是，他有意识地把学校搞垮，在学生和教师中进行敌对活动，破坏学校的经营管理，等等。我就这个问题去找了卡普斯京。他说，他有关于B.肖洛霍夫的材料。作为证据，他举出以下几例：（1）在学生中传播宗教情绪，学生有读圣经的；（2）B.肖洛霍夫破坏性地在学校的园地里砍伐了10000株果树；（3）B.肖洛霍夫系统地破坏学校的教学工作；（4）作为一名历史教师，B.肖洛霍夫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讲授历史。

根据区委的决定，建立了调查委员会。卡普斯京和季姆琴科把自己的同伙安插了进去。但是，尽管如此，经过调查确认：（1）学生不是读圣经，而是在家里翻阅1913年出版的《觉醒》画报，内中有涉及福音书内容的复制照片（如“未来的卡莫”等）。（2）B.肖洛霍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毁掉10000株果树，因为校内花园面积只有半公顷，而果树只有65株，至今完好无损。（3）无论如何都无法证实B.肖洛霍夫破坏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因为这违背事实真相。（4）同样，他并没有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讲授历史。然而，尽管如此，委员会还是歪曲事实，寻找借口，竟能得出如下结论：“……将B.肖洛霍夫撤职，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机关。”

我坚决反对此种侦查方法。卡普斯京动摇了，决定不承担责任。他打电报请求舍斯托娃从边疆区教育局派委员会来调查。在共青团区委的常委会会议上，在卡普斯京的参加下，将B.肖洛霍夫开除出共青团，在联共（布）党的区委常委会上撤销了肖洛霍夫的校长职务。舍斯托娃立即派来2名边疆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他们

只调查了学校的教学工作状况，并且基本上是以区委的第一个委员会的决定为基础进行的。

逮捕 B. 肖洛霍夫的企图未能得逞，但季姆琴科仍在继续努力搜罗他的材料。他动用了自己的情报网和所有因为各种原因对 B. 肖洛霍夫不满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我的在契尔诺夫村任小学校长的另一个亲戚立案侦查。

一份沙茨基寄给卡普斯京的文件，奇迹般地在区委的案卷中保存了下来，并透露了这一案件的真相。“绝密。卡普斯京同志亲启。第 15308 号。8 月 5 日在区委会议上讨论了叶兰斯克的案子。尽管揭发材料极多，你们还是对 B. 肖洛霍夫做出难以解释的宽大决定，对他本应严予追究责任。请立即解释原因何在？沙茨基。”

沙茨基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想在逮捕卢戈沃伊、洛加乔夫等人以后再捕我的亲戚，以便表明我周围的人——政治上接近的人和亲友——都是敌对分子，以便再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强行搞到诬陷我的供词，然后就是给我贴上一个“人民的敌人”的标签，也把我送入监狱。季姆琴科未能来得及把自己的工作进行到底。早在春季，当叶夫多基莫夫来到维申斯克镇时，撤换他的问题已经预先决定。他早已名誉扫地，而且工作极不光彩……当时叶夫多基莫夫就说，要派相邻的巴兹科夫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科长克拉夫钦科来维申斯克镇。克拉夫钦科在这几个区工作了 8 年，早就以制造夸大的假案而闻名遐迩。4 月份叶夫多基莫夫就确定要他来我们这里，但到 9 月份才把他调来。他当即热心投入他的前任季姆琴科来不及做完和无法做完的未竟之事。

逮捕卢戈沃伊以后，卡普斯京开始摧毁党组织。在杜达列夫机器拖拉机站的范围内，11 个集体农庄主席中有 9 个被撤职。其中大部分人被逮捕判刑。92 名区党组织的党员中，被开除出党的有 18 名。而且开除是明显不正确的。科隆达耶夫机器拖拉机站站长

格列比翁尼科夫作为人民的敌人被逮捕。但是，这个“敌人”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以前是贫农，赤色游击队员，因战功昭著荣膺一把银色手枪，曾经是而且现在看来也是绝对忠诚于党的人。64个党员被立案侦查，其中多数被开除出党。

原区委办公室主任胡多米亚索夫因明显的假案而被开除出党，判刑10年。原党员杜达列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博科夫等被逮捕并判处不同期限的流放。

克拉休科夫（以他的被捕作为公开迫害维申斯克人的起点）通过米列罗沃被押往罗斯托夫，关入内务局的内部监狱。他是1936年11月23日被捕的，11月25日开始审问。第一次审问就接连持续了4昼夜不停。96个小时内只给他吃了两顿饭。这期间他一分钟也没有睡过觉。

依次轮换的侦查员托皮利斯基中尉、马尔科夫中尉和博布罗夫中士问了他些什么呢？他们强迫他揭发“托洛茨基分子”斯拉布琴科、科列什科夫，强迫他供认自己似乎曾进行过敌对活动。自1937年1月起又开始询问有关我、卢戈沃伊、洛加乔夫的问题。每次经几小时的间隙后又把他喊去审问，并在侦查员办公室一连盘问了3~4~5个昼夜不停。侦查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卢戈沃伊和洛加乔夫已经被捕，他们已经供认，并以枪毙相威胁，用不给睡觉来折磨他。因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供词，1937年3月17日又把克拉休科夫投入一种单人囚房——长2米、宽1.5米的石室，阴冷潮湿，一片漆黑。只能躺在光秃秃的地上。就这样一连关了22昼夜。然后，再次把这个精疲力竭、痛苦已极、无力站立的人用手拖到侦讯室连续审问，每一次3~4个昼夜。4月25日，侦查科长奥西宁大尉喊了他去。谈话简短：

“不讲话？不肯招认，坏蛋？你的朋友都在坐牢。肖洛霍夫坐牢了。再不讲话，让你烂掉，像牲畜一样扔到垃圾场去。”

审问时不让他坐下，直到脚站不住倒在地上，直到人们用脚踢也站不起来为止。没有哪一种侮辱克拉休科夫没有经历过：从未听见过的辱骂、吐唾沫、不许去厕所、站着审问十几个小时，3~5个昼夜不许睡觉地审问，不给东西吃；这一切都是侦讯的手段。

当侦查人员确信从克拉休科夫身上搞不到想要的口供时，就把他送进了罗斯托夫监狱。整个夏天都关在一间原本关8个人如今塞进60个犯人的囚室。只能并排紧挨着分两头屈身侧卧地睡觉，如果有一个人想翻身，那所有60个人都要同时翻身。里面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呢？据在里面蹲过的一名司炉讲，要比轮船的机房热许多倍。人们依次轮流爬到门缝边，以便从走廊吸几口虽然潮湿闷人但毕竟稍稍凉爽一点的空气。

他们用什么样的毒刑拷打也未能迫使克拉休科夫诽谤自己和诬陷别人。当对他说他会死在监狱里时，他回答说：“就是临死我也要讲，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万岁！而你们，法西斯匪徒，好好看着，也学一学正直的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去死！”

9月份，他被送往米列罗沃。在那里的20天中，有18天他是在审问中度过的。在米列罗沃，按照斯佩兰斯基的指示，连续审问了6个昼夜，几昼夜内不给水喝，三昼夜内不给东西吃。直把他搞到发生便血性腹泻，如果不是传唤他去莫斯科的通知及时来到，他一定会死在米列罗沃监狱。他一共住了11个半月监狱。

关于他当时的状况，克拉休科夫是这样说的：“最怕人的折磨是不让睡觉。不得不尽一切努力同自己作斗争，以免接受速死的诱惑，以免提供别人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供词。当在侦量员办公室连续坐了或站了5个昼夜以后，枪毙或其他惩罚简直成了一种解脱。支持我的是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因此选择了最艰苦的死法：情愿被折磨至死，也不毁谤自己和别人。”

卢戈沃伊从被捕之日起就被关进单人牢房，由侦查员康德拉季

耶夫、格里戈里耶夫和马尔科维奇进行审问。折磨被捕者的办法大体相同，也稍有差异。也是一连审问几个昼夜，让他坐在一张高凳子上，不让脚够着地，而且40~60个小时内不让站起来，中间停止2~3小时，又接着审问。卢戈沃伊要在侦查员的桌子前面两手紧贴裤缝站16个小时。不同的做法有：向脸上吐唾沫而不许擦，拳打脚踢，向脸上丢烟头。然后又转入更加精细的折磨方法：先是去掉床上的垫子，然后再从单人牢房里把床搬走；为了防止感冒引起肺病复发（卢戈沃伊患有肺结核），他把扫帚垫在身下，以便不直接睡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于是，把扫帚也拿走了。后来，又在卢戈沃伊单人囚室对面关进一个逮捕后在监狱发了疯的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格里申，他从不休息的呼喊乱叫使卢戈沃伊在审问回来的短时间内无法打个盹儿。这种做法依然无效，又把卢戈沃伊转入另一个特殊的单人囚室——臭虫窝。床是钉死在墙壁边的，床上（用卢戈沃伊的话说）成百万只臭虫蠕动着。严格禁止睡在地上，一定要睡床上。而灯光又故意设计得很暗，根本无法捉臭虫。一天以后，全身布满血痂，而人也整个变成一个血痂了。在臭虫窝关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送入单人牢房。为了获取假供词而对被捕者进行“心理震撼”的做法是：夜里，侦查员格里戈里耶夫来到牢房，作这样一番谈话：“反正你不可能一直沉默下去！会让你开口的！你在我们手中。是中央批准逮捕你的吗？是的，中央批准的。这就是说，中央知道你是敌人。而对于敌人我们是不客气的。你不说，不交待出同伙，我们会打断你的手臂。长好以后再打断你的腿，腿长好后，打断你的肋骨。你会全身淌血。那时，你会满身是血地趴在我们脚前，祈求死去。那时我们再杀死你，写一个证明材料说你死了，丢到坑里去。”

洛加乔夫也经受了同样的折磨。对他不停地侮辱，摧毁人的自尊，随意打骂。整整审问了8个昼夜，然后又在一个满地老鼠的单

人牢房关了7个昼夜。在关进去之前，先剥掉衣服，只穿内衣在里面关着。从那里已经不是带出来的，而是用担架抬出来的。左腿瘫痪了。又审问了4昼夜，让他一人躺了3个小时，然后再抬去审问，一连审问了5个昼夜。已经不能坐了，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请求侦查员沃洛申允许他躺在铺在地面上供走路用的粗地毯上，未获同意。在光秃秃的地面上躺了约一个小时，又把他拉起来。又拷问了4个小时，对他不断进行挑唆。侦查员马尔科维奇大喊大叫：“为什么不提肖洛霍夫？他就关在我们这里！关得牢牢的。一个反革命作家，而你却包庇他？！”不断打他的脸。到第4个昼夜结束时，洛加乔夫在侦查员捏造的读给他听过的材料上签了字。

关于自己当时的状况，他简短地说道：“我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更准确地说，是把我搞到这样的地步，即使要我签字承认我是罗马教皇，我也会签字的。只想一件事：赶紧死。”

被捕的利马列夫在米列罗沃监狱中转告克拉休科夫说，卡普列耶夫被连续审问了10个昼夜。利马列夫关在隔壁一间牢房，全部听到。卡普列耶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健壮男子，曾经指挥过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团队同白匪、马赫诺和顿河上的大量土匪作战。据利马列夫说，他在审问过程中哭了多次，到第10个昼夜请求道：“哪怕读给我听一听，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此后，他不再做声。审讯随即结束。应当认为，卡普列耶夫在侦查员丰富的幻想所创造的所有作品上签了字。

同卢戈沃伊一起关在新切尔卡斯克监狱里的是鲁季的一个办事员，他在一间单人牢房关了20几个昼夜。这个牢房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层一俄寸^①厚的水。卢戈沃伊说，这个人的背部全部溃烂，长满了疖子，一个个连成一片。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这名办事员

^① 1俄寸等于4.4厘米。

诬陷了鲁季，后来又向其他被捕者承认，说不想死去……

别的被捕者也向我写信仔细描写审讯的情况，他们现在在流放中。他们写信给我，要我告诉您，是怎样审问他们的，是怎样把他们打成敌人的。

有27个人的供词指控卢戈沃伊。连一些从没有当面看到过他、也没有到过维申斯克镇的人，也揭发他有敌对活动。这是叶若夫同志在复查此案时查实的。大部分供词是巴兹科夫区的被捕者提供的，在那个区担任内务局侦量科长的是克拉夫钦科，后来他被叶夫多基莫夫派到我们区工作。这个克拉夫钦科在自己区内进行逮捕工作，因为夏天他被动员去米列罗沃内务局从事侦讯工作，他又负责侦讯。他从被捕者口中千方百计挖出口供。为什么不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把他从维申斯克区调到最大的卡缅斯克区，并把季姆琴科调到齐姆里扬斯克区？为什么不追究那些把卢戈沃伊、洛加乔夫、克拉休科夫关进监狱里，和为了自己的敌对目的而强迫他们提出供词的人的责任？难道这一切都将这样保留下去，让敌人有可能继续这样干下去吗？

斯佩兰斯基对我说过，斯拉布琴科被判决后送去流放了。他坐牢是因为同卢戈沃伊有联系，这一点从他自监狱里传出来的纸条可以得到证明。在去流放地之前，斯拉布琴科的妻子看到过他。犯人被押着去澡堂洗澡，其中也有斯拉布琴科。他不顾别人用枪托在驱赶他，竟来得及向她喊道：“真理是不会被埋葬的。不要为我担心！莫斯科会知道的，斯大林同志会知道的。我会获得自由！”

克拉休科夫向我叙述说，5月1日那几天，罗斯托夫监狱里一片叫喊声。各个牢房传出一阵阵口号声：“共产党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

甚至连可怕的监狱生活和残酷无情的审讯方法也无法摧毁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党、对您的信任，他们自己受尽折磨，却高声向党、

向它的领袖表示祝愿。

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侦讯方法，这种把被捕者毫无监督地交到侦查人员手中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这样的方法造成了许多错误，将来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错误。侦查人员的那些上级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受侦讯人是否招供，案件有无进展。而侦查人员本身，从卢戈沃伊等人的案件看，关心的并不是搞清事实，而是他们构想的指控内容是否无懈可击。无怪乎当那个要从克拉休科夫口中搞到他所要的供词的侦查员舒米林被克拉休科夫问到“莫非你们要我说谎？”时竟回答说：“那就说谎吧。你说的谎话我们也要记下来。”在罗斯托夫州的监狱里，被捕者除了能看到审问自己的侦查人员外谁也看不到。被捕者请求向检查长或内务局长写申诉书全都遭到粗暴的拒绝。写好的申诉书当着被捕者的面被撕毁，致使被捕者越来越相信侦查人员的为所欲为是毫无限制的。诬陷别人和供认自己从未犯过的罪就是这样产生的。

必须结束对被捕者进行刑讯的可耻办法。不能准许连续不停地一连审问5~10个昼夜。这种办法将败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光荣名声，也不可能查清真相。

侦查人员进行工作不受监督，会让钻进侦查机关的敌人得以肆无忌惮地从事可怕的活动。巴兹科夫区执委会主席舍甫琴科在内务部米列罗沃监狱里蹲了14个月并接受调查。我坚信舍甫琴科不是敌人，但这期间他也被迫提供了假供词，因为他是由克拉夫琴科和其他敌人进行审问的。其中一人（侦查员马林采维奇）已经被捕。

应当认真复查去年和今年在罗斯托夫州判决的案件，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是无辜坐牢的。他们是蒙敌人的关照而坐牢的。

因为整顿后方而受到处理者的案件也应加以复查。当时不仅处理了狂热的白卫分子、移民、讨伐队员，即应当处理的人，而且也在这个名义之下伤害了真正的苏维埃人：年轻的作业组长、拖拉机

手、饲养员。这也是一种敌对活动的方法：企图借此煽起哥萨克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情绪，制造动摇和恐慌思想。敌人达到了目的。在顿河流域北部几个区中，老百姓并非嘲讽地说：“抓第二拨时，把我家人带走了。”

从熟悉的农庄庄员口中，我不止一次听说，他们生活在一种特殊的“动员准备”状态之中；一直保留有备用的面包干，一套干净内衣，准备一旦被捕时可以使用。这怎么能行呢，斯大林同志？是否正是由于这个情况，去年大丰收竟收不上粮食来，大量粮食霉烂在地里，种籽也不保留，秋翻地没有耕完？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求您亲自——您一向关心我们——，请求中央，彻底查清我们的案件！

请把我这封信的内容告知尼·伊·叶若夫，不正是他最早倡议解开维申斯克镇的难解之结。并请派出由我们党内大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这里，把这个难解之结彻底解开。州委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我已经向叶夫多基莫夫说过：“为什么州委不采取任何措施把因为同卢戈沃伊有联系而被关押的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把被敌人关进去的人放出来？”他回答说：“你不是把这一切都告诉叶若夫了吗？那就行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能把人关进去，但却说他不能把关错的人放出来。那么，他为什么能问起沙茨基、谢米亚金、舍斯托娃的事：“他们是否不该关进去？是否有人诬陷了他们？”

请派 M. Ф. 什基里亚托夫来处理被捕的共产党员的案件。他知道 1933 年以前这里的许多人，他能很快摸清情况，还有请派叶若夫同志的某一个副手来。让他们了解罗斯托夫的案件后，认真地注意一下叶夫多基莫夫！他十分狡猾，是一只只有经验的跛脚狐狸！他在契卡的工作中经验极其丰富，怎会看不到聚集在他身边的这批人：皮沃瓦罗夫、克拉夫佐夫、沙茨基、拉林、谢米亚金、舍斯托

娃、卢金、卡西洛夫等等的敌对活动？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同志！但是，如果叶夫多基莫夫不是敌人，而只是一个大窝囊废，那么，我们州里政治形势如此极端复杂，被敌人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还真需要这样的领导人吗？

5年来我好不容易写了半本书。在维申斯克镇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不能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生活也是极端困难的。现在生活也相当紧张。在我周围敌人仍在编织黑色的网。季姆琴科和克拉夫钦科离去以后，他们的亲信仍然继续进行打击别人的工作。请看——我附上的申诉书，您会看到老的一套仍在重复进行。关于这个“政治上成熟”的坏蛋西多罗夫的活动（对农庄庄员进行恐怖活动，又自封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代表”），区委已通报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科斯坚科的侦讯结果在申诉书内已有叙述。叶夫多基莫夫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追究西多罗夫的责任。不可能——都说出来，这一些已经足够了。

信由我自己带去。如果您需要找我，波斯克列贝舍夫能找到我。如果我见不到您，恳请您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把您的决定告诉我。^①

紧紧地握您的手！

米·肖洛霍夫

1938年2月16日于维申斯克镇

^① 在信的结尾处有斯大林亲手写的：“对肖洛霍夫的陷害”。

【专题说明】

“左”倾路线下的历史学界

(1928年12月至1944年7月)

20—40年代，在整个文化领域都受“左”倾之苦的时候，历史学界遭到的打击更是巨大。苏联史学的奠基人波克罗夫斯基院士、俄国第一位人文科学女博士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以及众多著名史学家先后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逮捕判刑。在这一过程中，1937年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会议和1944年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历史学家会议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把批判扩展成为全国性运动。

另一方面，并授命编辑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辑《苏联国内战争史》。这些书成为范本，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从本组文件可以看出：一些人在全力辩解、请求公正对待自己，但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一些人在遭到错误批判的同时，又不公正地指责别人；一些人今天是批判他人的先锋，明天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还有一些人则为迎合上级的意图，肆意颠倒黑白，陷害无辜。所有这些构成了苏联史学界政治斗争的复杂画面，及其悲惨的遭遇。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马龙闪、赵洪、胡昊、吴能翻译）

№05116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列宁格勒图书馆人员被捕
致马尔的信

(1928年12月5日)

最尊敬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①！

我担心，您还没有读我的信，就会说它是多余的。因为我在信中对您写的问题，该知道的您都知道了，能做的您也都做了。

但我还是要请您读读这封信。考虑到情况的艰难，我不打算触及问题的所有方面，出于同志的感情和责任，我想与您，我们尊敬的上司谈谈尼娜·维克托罗芙娜、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和雅科夫·彼得罗维奇。^②我能想象得出您心里是多么为大家担心，我在大家面前说的那些要打动您的话是多余的和无足轻重的。

① 马尔，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1864～1934），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专门从事高加索地区的语言研究。他倡导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也是有阶级性的。他把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称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说”。他的语言学说是与30年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二战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斯大林反对将所有科学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批判了马尔的语言学理论。1924～1930年，马尔任国立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馆长。

② 四人均均为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1928年年底被捕。尼娜·维克托罗芙娜·皮古列夫斯卡娅（1894～1970），拜占庭学家和东方学学者，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别涅舍维奇（1874～1938），拜占庭学家和教会法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柳勃林斯基（1903～1968），历史学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格列宾希科夫（1888～1935），图书馆员。

但是，我认为坚持与事情有关的某些情况是自己的职责，是公务上的和国家的职责。对涉及的事情我认为自己负有直接的和重要的责任——在您的高层的负责下。尽管这些情况您是知道的，但有些细节和准确性不一定知道，谁知道呢，这些细节和准确性，也许，在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日子里可能是实质性的东西，而主要的和首要的是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大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想，最尊敬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请求为所有这些意见所累的您，再听一次。

我想请求您再一次考虑的人和事情，是巴赫京^①及其在我们图书馆里研究西方手稿的事情。最首要的是最古老的拉丁古抄本的记叙文目录。

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谈这个人，我将谈的每一个词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确信他不仅什么严重的罪行都没有，而且实在是有什么罪都不能加在他身上。如果他是一个信教的人（尽管他并不讨社会先进分子们的喜欢，但法律也没有预见他有罪），信教也从来没有，即使更早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其社会影响或效用。早在他被捕之前，在1927年，他就懂得了，即使是和那些有宗教情绪人的偶然的无恶意会见也会引起麻烦，因此，他千方百计地躲避他们。

这是一个对任何政治都漠不关心的人。一般来说，这不是长处，特别是在我们热火朝天的战斗时代更不能看成是长处。人们期待一个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具有值得赞许的积极性，否则人们就会对消极行为表示疑虑。自然，人们不会把这种工作人员“提拔”到需要具有朝气蓬勃的社会积极性的地方去，自然，他们也不

^① 巴赫京，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洛维奇（1901~1951），中世纪史和古文献学学者，其时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工作。

会有大的作为。但是这，似乎，不应当惹来麻烦，既不应怀疑他，也不应责难他、惩罚他，也不能不让他从事那项十分特殊的事业，他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与荣誉从事这项特殊的事业是无可责难的，而且他也是无人可替代的。巴赫京这种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不过，近来他开始在这方面接受教育，并接受委托在我们这个部门收取会费，总之，已开始对社会工作和职务工作感兴趣）是他总的性格弱点：冷淡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一般的禁欲主义，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因此，在这方面这个人特别博学多识并真正与众不同：才华横溢、狂热的钻研精神、顽强的意志、日日夜夜不倦地工作，这别人既注意不到，也感觉不到，他是一个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

由于命运的安排，在他负责公共图书馆手稿工作的年代，他的巨大的精力和才能都付诸于捍卫图书馆的西方手稿^①之事上。您要理解，别人常常不理解他，指责他缺乏社会积极性。为了每天赶着研究和准备用于“波兰争论”的几十份手稿，有时因这些手稿要和一些权威的学者作斗争，他，一个年轻工作人员不分黑天白夜，也不顾自己的眼睛不好，废寝忘食地想要吸取渊博的知识，以便仔细研究和巩固所需要的线索。他放弃了欢乐，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这个工作，在这一工作中脱颖而出。也许，图书馆认为尽可能为他做些什么是公允的。

如今在这一工作领域，经历很多年才培养出一名出色的拉丁古

① 根据1921年3月18日的《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和约》的规定，沙皇时代从波兰运到俄国的文物、其中包括手稿和书籍要无条件归还波兰。与波兰的历史和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料也应当无条件归还波兰。而关于俄国的波兰收藏品中的一些西欧的材料归属问题引起了争论，即所谓“波兰争论”。双方就此进行了谈判，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及她的一些学生作为专家参加了谈判，对手稿进行了论证。

文字学、古文献学和手稿方面的专家，一名在它特殊部分达到（特别是在珍贵的古老的手稿方面）高度精细和准确的专家。由于多年的勤学，目前巴赫京达到这一要求水平。随着争论时期的逐渐结束，鉴于“波兰争论”工作已取得结果，他摆脱了繁重、费力和常常是不受称赞的工作，终于能和我一起将精力集中在可以得到认可的、更为重要的目录编写工作，首先是古代的手稿目录编写工作。

您是知道的，我们一些西方的同行对我们手稿部门、对手稿部门的西方财产中的珍贵部分是非常注意的，过去长期以不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最近这种不信任开始由感兴趣和某种程度的同情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巴赫京的工作造成的。您知道，《新档案》^①，这是外国人几乎无法打入的刊物，如今刊载了他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文献的考订》^②。12月3日，正如我在近日所收到的通知中所看到的，在古文字科学院，兰格鲁阿^③做了一个关于《兰斯法典和让维利的文章》的报告，这是他极为精细研究的成果。巴赫京的古文献学研究分析证明了我们手稿中一份8世纪瓦尔涅弗里德（即所谓巴维尔·季阿康）信件的真实性的真实性，这引出了林德赛（《拉丁古文献学》的编辑）和柏林的斯特莱克教授间的通信。关于“指明方向的发现”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由此——似乎提高了苏联的科学声誉，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是这位年轻学者的悲哀？有人请巴赫京为纪念瓦尔涅弗里德诞生1200周年出版的集子写一篇文章。美国《反射镜》的一位编辑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您的学生们正在做极为出色的专论”。《历史杂志》^④对正在做的目录表示

① 原文是德文，《Neues Archiv》。

② 原文是德文，《Zur Kritik der Urkunden》。

③ 沙尔利·维克托尔·兰格鲁阿（1863~1929），法国中世纪史学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在巴黎的老师。

④ 原文是德文，《Historische Zeitschrift》。

欢迎，剑桥的明斯教授预先称它为（当然是过早地）“对科学的宝贵贡献。”

巴赫京所撰写的目录方面的稿子不仅是重要的，如今它也是不可替代的。正如您所知道的，由于多年的工作我们认为第5~7世纪的手稿目录已基本完成。我们要往下编，需要最后研究出版第二批：第8~10世纪的手稿，所有这些是特别困难而又极为重要的部分，某些叙述部分要求精细的科学-宗教知识和素养，这些部分是巴赫京的专业，谁也无法取代他来做这些部分。把他开除出去就意味着人们期待的、合乎科学要求的第二批目录的出版成为泡影。

为什么要开除他？基于日常的深入交往，我深信不疑地（唉，我知道这深信不疑不是到处都有用）再重复一次：除了牵连到消极的宗教方面的某种误会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事情。也许，有人对他个人不喜欢。他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研究上，是个严重的“盲人”，由于紧张的手稿研究工作，他冷漠，不太礼貌，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生硬和有点儿怪，是否要因此而受磨难？

深深地、无限失望地想到关于我们工作的毁灭，想到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未必有利的影响，想到这种影响将使已经开始以新的兴趣来认识这一工作的地方将要再次停止这一工作，想到关于第二批目录的出版又要搁置一段时间，而谁知道呢，第一批目录是否能付印？想到我们将重新在波兰人面前受侮辱的感觉，波兰人客气地把昨天还是我们自己的手稿目录散发给我们（我们的远古的目录哪怕是我们长期默默无闻的一种补偿也好），我意识到能够做的和不可能做的都必须去做，以便捍卫这微不足道的、但在我们共和国里是重要的事业，我们珍爱共和国的荣誉，对那些认为应当捍卫它以免遭到敌人侵害的人来说不能不珍爱。敌人不会是手稿部的正直的工作人员。

我想请求您，最尊敬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帮助我寻找捍

卫我们事业的手段。如果对您来说太困难和不方便，甚至不可能为我们“拉丁”的麻烦事做那种您为拜占庭和叙利亚的事情都没有办到的事，那么请您开恩，让我个人进行尝试。很显然，科学院将为拜占庭和叙利亚的事情感到忧虑。请告诉我，您是否不反对就我们的事业寻找个人提出申请途径的尝试。我向哪儿去的思路还很模糊，但如果您准备给我一点时间和我交谈一下，那我会和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的。要知道，显而易见的是，在巴赫京已经坐了一个月左右的牢的时候，应找个适时的机会到他为之忘我工作的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谈一下他，就像谈其他人一样。我非常珍视在这一申请提出之前和您谈谈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可以独立地举行，当然最好不在图书馆。

在事业发生不利转折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极端办法，我想试图要求释放巴赫京并让他留在图书馆来完成目录的工作，可由某一个人作保，大概要一个共产党员来作保。

致以深深的敬意！

奥·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①

^① 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奥莉加·安东诺芙娜（1874—1939），苏联历史学家，世界通史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她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和世界通史博士，是在旧大学里通过答辩获得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的惟一一位女性。她在西方中世纪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工作者。20—30年代在列宁格勒图书馆任手稿部的负责人。

№0511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其住所被搜查致马尔的信

(不早于1928年12月24日)

最尊敬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

请原谅，我因不舒服，躺着难以动弹（脚上的淋巴管发炎），不用铅笔就无法写。

我认为必须告诉您，24日晚上对我这儿进行了搜查，从11点搞到1点，时间相对来说并不是太令人惊慌的时候，搜查也进行得无可指责和彬彬有礼。我的学术著作，讲课提纲、工作纲要等等由于我对其内容作了声明，没有被翻动，还有一包过去年代来往的信件也相信我的简单声明没有动，近三年我按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俄罗斯）保存的几包信件是首要检查的目标，然后把最大一包“德国”和“法国”留在原处，但对“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几包以及放在桌上的最近几天的几封信产生了兴趣。除了一包有几封私人性质的信，其余的都是就手稿部门的工作与西方学者和机构进行的事务和学术交往的信件。

我近乎惋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德国”的一包和“法国”的一包几乎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而这些信件全面和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规模。拿走了“英国和美国”的那一包——也主要是学术和业务方面的，还有一包“俄罗斯”的。这一包由于数量不多而引起了疑惑，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在苏联范围内我的通信会如此的贫乏，这类信件是否还保存在别的什么地方，但是

我想他们会相信，我的声明是完全真实的，当然了，除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哪儿也没有保存自己的私人信件，那些很久前的信，他们亲自看过，没有找到需要的，我有不少这样的信。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我忙于极为重要的事情，眼睛又不好，我几乎没有进行私人通信。

除了一包“俄罗斯”“业务方面”的信件外，在桌子的几只抽屉里毕竟还是拿到了几封信，顺便说一句，其中有一封是您的。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您回答我在1926年向公共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该提供几幅我们的手稿的照片和我在高级研究学校、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铭文研究院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给一家巴黎的出版社出版的、内容为关于一本书的命运俄文出版物（我现在已记不起这本书的名称）刊载。这个报告驳斥了我们的图书馆将被毁灭的谣言，讲了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手稿珍品的集中情况。您的回答是这样的：您对给我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感到犹豫，尽管如此，作为个人意见，您还是说了以下想法：可以说明我们工作的真相，反对歪曲真实情况的谣传，更应在那些特别容易传播和进行有倾向性传播的地方加以澄清，但是您不能确定《杂志评论书籍》时的语调是否平和，不知道是否会给作者带来麻烦。我模糊地记得（最后一点我没有把握），您好像建议在我们全权代表处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从我那里拿走格列夫斯、卡列耶夫、彼特卢舍夫斯基、塔尔列的信；我的一首玩笑诗，1921年《俄罗斯思想》的片断及对一些历史书的评论；一张1921年的罗马尼亚报纸，这是在巴黎时历史学家约尔加送给我的，在这张报上登了他在罗马尼亚考古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是这一年夏天他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艺术史会议上作的）；还有，我觉得最不愉快的是（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

在个人隐私方面)拿走了我的一封遗书,这是我在10月写的,在心脏病发作恶化期间,这封信我的亲人都不知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私人感情。除了这些东西外,信中也有业务上的指示:要求促进目录的印刷;帮助巴赫京到国外出差,为了这一目的我将我身后留下的所有钱都给了他;要求把我的学术著作分给我的学生们,他们的名字我已列出。可能,那里还提到您的名字,要求您让巴赫京出差和完成目录的出版。

还有一点。他们以很大的兴趣问我,有没有与意大利来往的信件,我,当然,说了我收到的那两封信:一封是在7月来的,另一封是前几天来的。两封信是由以下消息引起的,林德赛(《拉丁古文献学》的编辑)从我寄往意大利的信里知道并通报了巴赫京证明在我们的手稿部存有的伦巴德人^①瓦尔涅弗里德(所谓巴维尔·季阿康)一封信的真实性。由于即将是瓦尔涅弗里德1200周年纪念,为了出纪念集子,有人从意大利来信要这一研究成果。

我认为,理智地对待所有这些材料,无论对自认为丝毫也没有违犯法纪的这些材料的主人,还是对那些在拿去仔细研究的信件中提到名字的人都不可能不良后果。

我占了您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尊敬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我决定再补充一点。我知道,由于错误的猜疑而使事情陷于极度模糊的情况下,是很难为我们青年学者做什么事情的。由于身处主要职责范围内,我想说两句话。

但是M.A.^②急着要走,下次我再写信给您。

^① 即古日耳曼人。

^② 指玛利亚·安东诺夫娜·多比阿什,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的姐姐。

No05653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协会路线问题致红色教授学院历史学家组的信

(1929年10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有人对我通报，在清洗弗里德兰^①同志时，A. 西多罗夫^②同志向后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的秘书格林同志提出指控，似乎他们，弗里德兰和格林同志“在波克罗夫斯基名声的庇护下”，在上述协会执行自己的某种值得谴责的路线。

我坚决声明，上述两位同志仅仅帮助我推行一条我及与我一起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认为惟一可能和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实质是：(1) 把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中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残余在这些文献中仍非常多；(2) 当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厚颜无耻地公开表现时，在最近几年它经常有所表现，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推行这条路线时，我经常不仅遭到托洛茨基方面的抵制，而且多少也遭到布哈林（斯列普科夫^③同志文章中的某些地方声明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集团的抵制。使我感到十分苦恼的消息，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某些历史学家好像也有反对这条路线的倾向。我深

① 弗里德兰（1896～1937），历史学家，通史专家，从1929年起为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理事会成员。

② 西多罗夫（1900～1966），历史学家，20世纪初俄国经济史专家。

③ 斯列普科夫，苏联历史学家、政论家。1924～1925年与波克罗夫斯基在党的各种杂志上展开了辩论。

信，只要我们能够面对面、心平气和与不急不躁地解释清楚，不要把理论争论（如果这里有争论的话）与就其性质不能变成理论争论的党内清洗联系在一起，这种误解就将立即烟消云散。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①

^① 波克罗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868～1932），苏联杰出的历史学家。30年代中期以前，他的史学思想在苏联史学界占主导地位，先后任共产主义学院、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波克罗夫斯基从学院建立到1932年去世一直是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院长。

No05654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对泰奥多罗维奇的批评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

(1930年2月27日)

亲爱的叶梅利扬^①：

谁也不会“摧残”泰奥多罗维奇^②同志。对他的“严厉批评”^③，

-
-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科学院院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筹委会成员。
- ② 伊·阿·泰奥多罗维奇（1875～1937），1928～1930为农民国际的总书记。1929年，在纪念“民意党”五十周年时，他提出了民意党人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先驱，他们为“彻底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活动扫清了道路”的论断。这一论断引起了争论，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论断缺乏根据，指责他是修正主义。波克罗夫斯基也认为泰奥多罗维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民意党人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 ③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的会议上批评了泰奥多罗维奇的观点，1930年2月2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波克罗夫斯基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很遗憾没能参加完你们的会议，没能在会后与您就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交谈。我希望在最近交谈一下。但有一个问题要求我尽快做出解释，要求您作些干预，因为这个问题提到了您的名字。这就是对待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问题。在纪念民意党五十周年时，他不幸第一个发言谈民意党问题。我认为他的文章包含了一些新的提法（这一点，如布勃诺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及其他一些同志也同意）。文章有一些积极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泰奥多罗维奇同志以对很多同志来说是新的提法表述了对民意党的一些看法，他成了批判的中心。据我看他在有些表述上犯了错误（在民意党那里就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萌芽，有了苏维埃思想的萌芽，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思想的萌芽等等）。可以而且应当揭穿这些错误，应当揭穿的一系列错误不仅仅是泰奥多罗维奇的。要知道，我们当中所有写过有关民意党文章的人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客观地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意党的看法，叙述列宁对民意党的观点，这是事实。泰奥多罗维奇试图这么做。

就像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①“严厉批评”我那样，就像从那以后在红色教授学院（最近一次是在一年级课堂讨论后的第三天）对我正在进行的“严厉批评”那样，就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研讨会^②，最近一次就杜勃罗夫斯基^③的书）对我“严厉批评”那样。对我没有做出过决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最后大多数人认为恰恰是我的观点正确。确

（接第456页注释^③）——但没有完全成功。是否因此就要像现在这样污蔑他呢？是否就要在论民意党的提纲中将泰奥多罗维奇（和密茨凯维奇）作为修正主义者提出来呢（而对其他写了关于民意党文章的同志的错误则闭而不谈，他们的错误并不比泰奥多罗维奇少）。向红色教授学院提交有关泰奥多罗维奇是右倾修正主义者的决议是否正确？在您开会时您可能就会看到，弗里德兰同志及其他人（很久以前弗里德兰同志是否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把历史领域的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发言归到泰奥多罗维奇身上的。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请求您出来加以制止，以免使泰奥多罗维奇遭受不必要的摧残，因为您对推行这条路线的同志能够产生影响。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了解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过去；遗憾的是，像塔达洛夫这样一些同志忘记了这个过去，塔达洛夫拿着普列汉诺夫的‘杰米扬诺夫鱼汤’为所欲为，试图现在以此来反对泰奥多罗维奇。但泰奥多罗维奇同志对我们来说不是要被埋葬的人，他不仅过去，就是在今天他也是有用的，至少要比弗里德兰、比塔达洛夫、比格林更有用。他现在是农民国际的主席，从事着巨大的社会政治工作。因为他过去的错误就将他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否正确？要知道，他没有参加提交了有关他的决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的会议。

我的意见是：无须在民意党提纲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名字上。红色教授学院没有给泰奥多罗维奇同志就对他的指责做出某种解释的机会，提交他是右倾分子的决议，这是不正确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由于他的论民意党的文章而将其划成列宁主义的修正者是不正确的。”

- ① 1924年的第14期《布尔什维克》刊载了斯列普科夫的评论，这是党的理论刊物第一次发表批评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念的文章。
- ② 1928年5月4日和11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举行的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上，波克罗夫斯基的开幕词和《作为历史学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报告遭到了批评，当时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自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策略的解释有错误。
- ③ 历史学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一书的作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会员，1929~1930年在讨论社会经济形态时，他的观点“因对马克思和列宁有修正”而遭到批评。

实，如果人们能够证明我有错误，那么我非常乐意承认——我从未把自己想象成绝对正确的教皇，不想败坏自己对手的声誉，使他们成为公众的笑料。

伊万·阿多里弗维奇^① 近日找过我。他试图说服我，自己的反对立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却没有成功。但这十分成功地证明，“自我批评”的概念与他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一个没文化的小孩子，竟敢批评我，一个被列宁承认是党内最有文化之一的老布尔什维克”。我答应他，将竭尽全力使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② 杂志上不折不扣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正如您现在看到的，尽管我能够做到，但不那么容易。

在您参加的那次会议上，十分明显地发现，难以说服人们冷静地对待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发言，可惜您没有待到会议结束。我当时既反对对泰奥多罗维奇，也反对对杜勃罗夫斯基同志做出决议。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自己收回他们不正确的论断（就像我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这将好一千倍。但情绪是这样，我决定不把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问题付诸表决（特别难保护他，因为他的错误立场十分明显，他自己又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他顽固地把1905年争论中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冒充为列宁的观点，我对此十分清楚）。经验证明，甚至我拼命地进行了努力，也不会有结果：当杜勃罗夫斯基作了非常大的让步，就他的问题进行表决时，与我一起举起的只有一只手，而反对的则是十八只手。

当然，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与有关人士协商，是不能公布

^① 即泰奥多罗维奇。

^② 1926~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1926~1931年为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和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波克罗夫斯基为其责任编辑。

的。如果您认为对与民粹派在理论上接近的作者泰奥多罗维奇的评价不正确（关于右倾直接写在决议草案中——通过的决议只作为“基础”——没有说明），可以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要用自己个人的威望来“压制自我批评”，那么，亲爱的叶梅利扬同志，请您相信，除我的威望受损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No05655

波克罗夫斯基
关于修建十月革命档案馆等事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3月3日)

亲启

联共（布）中央莫洛托夫同志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最近我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去看您，其实，除共产主义学院^①的全体人员外——最好是不晚于3月11日最近的书记处会议前去看您，因为3月20日我们将举行全会——我还积累了些问题，希望得到指示。

第一个是关于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问题。请您无论如何不要认为，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攻击过我这个事实与此问题有什么关系。我与斯捷克罗夫和梁赞诺夫^②、更早与托洛茨基就理论问题进行过激烈论战，除了我的对手外，没给任何人带来不安。况且现在远不是泰奥多罗维奇一个人攻击我。问题并不在此。但我遇到纯粹政治上

① 共产主义学院（1918～1923年名为社会主义学院），是党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波克罗夫斯基曾任其主席团主席。1936年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撤消共产主义学院，它的各个机构、研究所和主要工作人员转入苏联科学院。

② 斯捷克罗夫（1873～1941），政论家；梁赞诺夫（1870～1938），1921～1931年为马恩研究院院长。

的麻烦。我认为，泰奥多罗维奇同志重复了1905年我从社会革命党人中听到的话——民意党人首先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应当把他们作为我们的先驱来崇敬等等。我打算阐述答复，根据我的习惯，在答复中我准备客气地、全面地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但党的中央机关报^①不仅没有与泰奥多罗维奇的路线划清界限，却采取了称不上是明显的缓冲立场：他们说，泰奥多罗维奇的对手们是相对正确的——他本人也相对正确。他只在细节上不正确（关于苏维埃等诸如此类）；但民意党人首先更多的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和我们直到现在都这样看待他们的。

无需说，在目前农村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特别要指出的是，正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文章中不加解释地使用“农民社会主义者”的这一术语一样），这种“模棱两可”会产生什么后果。中央能否就此问题做出指示？如果中央书记对此问题有疑问，那么可以把它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以讨论文化宣传部提纲的方式）。如果没有疑问，那么我希望尽快把这些提纲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出来。

否则，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上的发言实际上就会成为反对《真理报》的发言，我当然不想弄成这样。同时，我国的青年极其焦急地等待着我这个发言——这个明确的发言。

第二个问题不太复杂，但也非常严重。阿多拉茨基^②同志与您谈过此事——为此还在一个月前，他就向中央提交了专门报告。现在不得不抓紧。昨天，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会决定1930年开始建设列宁图书馆新大楼。这就意味着最近开始把修建十月革命档

^① 指《真理报》。

^② B.B. 中多拉茨基（1878～1945）193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档案事务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1～1939年任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院长。

案馆之事也纠缠在一起了。首先要拆除过去的教堂，出版资料（报刊、小册子、传单等）的档案馆设在那里。当然，可以把它搬到另一个地方——尽管搬家者把出版资料与手稿分开将非常不方便。但要是等到过几年拆毁十月革命档案馆整个大楼时——我们就不能把它的所有内容搬到另一个地方了，因为没有地方。

到 1933 年前我们应该有新大楼。虽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委早就承认建设大楼是合理的，但却一直拒绝给我们拨款，今年就拒绝了，不仅俄罗斯联邦，而且苏联也这样做。怎么办？向政治局提出吗？有没有可能我们得到今年开始修建大楼所需的 50 万（全部造价——3 年 150 万）？

就此等待您的指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05656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清洗俄罗斯联邦中央档案馆等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30年8月31日)

绝密

亲启

亲爱的谢尔戈同志：

从6月初我从克里木回来起，就焦急地等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国家档案馆今年3月开始的“清洗”的结束。^①您可能还记得我5月底就此问题打扰您的电报：我在电报中请求“把菲加特纳^②同志的委员会的报告推迟到我从克里木返回之时”。

从那时起，3个月过去了，我就同一件事又要打扰您。这段时间我的病有所恶化，医生也不允许拖延例行的手术。我要求在莫斯科动手术，萨努普尔坚决反对——因此，中央做出决定：我必须到柏林做手术。什么时候回国就很难说了，经验表明：或许要过20天（至少这样），也许要50天后。在我们熟悉的约瑟夫^③没有见

① 对中央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的清洗开始于1930年3月，主要是要对国家机关、苏联科学院和其他机关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

② 菲加特纳（1889～1937），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1929～1930年是领导清洗国家机关、苏联科学院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③ 波克罗夫斯基在柏林的主治医生。

到肿瘤之前，什么也不能说。

根据以往的情况判断，有希望在我过 20 天回来后，还会看到“清洗”没有结束。但相当可能的是，在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内，菲加特纳同志最终会向您、工农检察院委员会或者中央做报告。由于我回国的时间相当不确定，我没有决定再次请求延期——尤其是中央国家档案馆在“清洗”的影响下，明显地开始散架：人员流失，工作停顿。要知道，“清洗”6 个月了——这据我所知是没有其他先例的。菲加特纳同志近日非常笼统地向我介绍了委员会的结论。这些结论的组织部分或多或少与我最近观察的结果一致，显然我与委员会在这里没有分歧。我们的许多东西已过时了，这毫无疑问。区别在于，或许我作为专业人员，比“生产队长们”更好地预见“重建”中央国家档案馆的困难。但无论困难与否，重建必须进行。

另外还面临着人员问题。我有一种印象，不仅“生产队长们”，就连菲加特纳和克雷扎诺夫斯基^①同志也没有想象到，为排在苏维埃系统最后一名（证据——工资在整个苏维埃系统中最低）的机关培养人才是多么困难，从党的系统看，它被看做是介于流放地和养老院之间的机构。如果红色教授学院今年招生缺额为 40%，那么负责工作人员的工资远比红色教授学院学员的助学金低得多的中央国家档案馆又会如何呢？

为了真正地充实中央国家档案馆及其机关的人员，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必须做出一系列决议，从根本上改变档案工作的精神和物质状况——大约需要 3 年时间（从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中是难以在一个月培养大档案馆的馆长或副馆长的）。对此应加上一个特殊的困难：要求能接触秘密档案（十月革命档案馆或前警察局档案馆）的主管者在政治上沉着稳重，这个要求甚至技术上训练有素的

①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工作人员。

共产党员也难以满足。这里的要求应当与红色教授学院招生的要求是相同的。

中央组织分配部、莫斯科市委和哈莫夫尼奇区的相应机关完全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这些机关把档案馆看做是垃圾堆放点，随便地把那些它们认为在其他工作中有危险的倾向分子塞到那里。这样我们十月革命档案馆就得到了利亚多夫^①同志，很快就在此人周围滋生出了与他亲近的分子。菲加特纳同志的委员会从这个小组成员得到大量批评中央国家档案馆现任领导的资料：我希望，费加特涅尔同志使用这些资料时应该考虑到，批评是来自在政治上敌视这个领导层的阵营。如果我们撤销那些实际上在与右倾进行斗争、履行自己党员义务的人们的职务，引起右派的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那就非常可悲了。

毫无疑问，无论如何我们与委员会在人员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在上述条件下，中央国家档案馆机关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范例。简要地说，在我国的档案馆中，我们或者有对档案事务不熟悉的共产党员，或者是有好的专家但政治上与我们敌对。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熟悉档案事务的共产党员就更加宝贵了。在我们没有培养出认真的接班人之前，如果撤消他们中的一个，当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因为这或者意味着有意识地降低我们档案机关本来就不高的水平，或者是在此机构中增加非党专家对共产党员的优势。

然而，我非常担心委员会不考虑这些——它有一种倾向：或者撤消如马克萨科夫^②这样的有组织地实现“中央国家档案馆”思

^① M.H. 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革命运动的活动家，倾向于“右倾”反对派。

^② 历史学家，1918 加入俄共（布），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的组织者之一。

想的工作人员——他对档案馆的了解要比在那里工作的任何共产党员都要多，他是政治上与利亚多夫及其集团斗争的主要代表——或者把档案馆的机构连根拔掉，来个竭泽而渔，使它在最近几个月内注定要陷于工作破产，因为没有共产党员它不能完成任何任务。我非常清楚马克萨科夫的缺点——也了解其好的方面，在阿多拉茨基同志和我对他日复一日的经常影响下，他的缺点得到克服，我利用了他在档案事务方面的巨大组织才能和谁都无法与他相比的工作能力（我还没见到像他这样的工作人员）。四分之三的不幸在于，我从1928年起，由于生病和工作负荷太重，而阿多拉茨基同志从1929年起，由于较多地忙于其他工作，我们对中央国家档案馆工作投入不够。应该在我们的位置上安排一位常务领导人，他哪怕一天关照中央国家档案馆2~3个小时也好。假如这个新领导人（由于上述原因，必须从政治上精心挑选）看重马克萨科夫——与马克萨科夫同志一起工作几个月，直到认为他不适于工作，不得不提出撤消他的问题。

如果我在会议上听到菲加特纳同志的报告，就会把这一切在会上说出来——但我担心他会不在的时候做报告。因此，亲爱的谢尔戈同志，我恳请您，关注一下近十年就近观察中央国家档案馆工作的十分真诚的人写的这封信——我不能亲自关注这件事，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离开。说组织上有缺点，——在这点上，我100%同意菲加特纳同志。但是进行人事改组的这个人必须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应依靠那些熟悉工作和政治上十分稳重的人们。这样的人在中央国家档案馆不多，但是有，必须珍视他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05657

波克罗夫斯基
关于历史学界状况报告
致萨韦利耶夫的信

(不晚于1930年12月25日)

秘密

亲爱的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①：

给您寄去我给中央的关于历史战线状况的报告的最原始草稿。草稿还未写完，必须补充：1) 关于调和主义；2) 关于我们自己。关于后者写什么（保尔·奥西波维奇的小册子^②）还拿不准——今天我与斯捷茨基^③同志商量。26日我可能就在莫斯科——也许25日就到了。我们见面再谈。

米·波克罗夫斯基

① 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萨韦利耶夫（1884～1939），1928～1930年为列宁研究院院长，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副主席，1932年当选为院士。

② 指И.О. 格林的《1905年工人代表苏维埃历史概要》（1930年第二版，莫斯科）。该书第一版就已经引起了争论。第二版出版后，遭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③ 斯捷茨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96～1938）1915年入党，1930年起为联共（布）宣传鼓动部负责人。

№05658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学界状况 给萨韦利耶夫的信

(不早于1930年12月26日)

绝密

致列宁研究院^① 萨韦利耶夫同志：

历史战线的状况反映了政治战线的状况。在所有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有这种情况。但在所有科学中政治性最强的历史学中，这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

这样，我们党内过去和现在有过的某些倾向不能不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正如党内的所有倾向不是列宁主义的某种分化一样——列宁主义永远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主义——而是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的结果，就像一些党员的历史倾向是十月革命前长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遗迹。这里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谈两句。

资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地主资产阶级）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与19世纪6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农民改革有关。部分通过欺骗，部分通过做出现实的微小让步而进行的农民改革，阻止了已经

^① 1923年开始筹建，1924年5月31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成立列宁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加米涅夫），1928年与联共（布）党史委员会合并，1931年与马恩研究院合并，统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成为不可避免的农民革命。地主国家通过进行这个改革向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迈出了一步。步伐尽管不大，但是已经让地主和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由此产生了对国家这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智改革把“社会”（即统治阶级）从“无政府状态”拯救出来的创造者和全能者的推崇——对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智改革创造了贸易、工业、科学甚至是“社会”本身的国家的推崇。这个国家当然是超阶级的或是各阶级的——它对一切都给予同样的关怀。当提出这个善良的力量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案是：它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全社会免遭外敌的入侵。

这个理论通过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米留可夫^①传给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和米留可夫的一系列提法逐字逐句吻合。特别是在下面一点上，他们看法一致：俄国君主专制的产生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经济上解释，因为俄国专制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异乎寻常的原始——是非常初级类型的自然经济。

托洛茨基在与笔者的论战中，总是强调，对他来说，这不仅是理论而且是他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历史根据，也就是说，是他的政治路线的基础。由此他深信，随着专制制度这个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缔造者，这个贸易、工业、文化等的缔造者的垮台，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诠释的“不断革命论”）——由此他也就否定了昨天刚刚从自然经济中走出来的社会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此，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前就说过，只有具有“十分特殊的大脑构造”的人们才会幻想这个问题。没有西方经济上较发达国家的帮助，俄罗斯不能建成社会

^① 米留可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历史学家，俄国立宪民主党的领袖。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二月革命后，长期侨居于法国巴黎，著有《俄国文化史纲》、《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等。

主义。不依靠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会走向灭亡。与此思想有联系的是对命令、法令的信仰，一句话，就是对行政压力的信仰，这是“左派”的特点。如果过去国家建立了一切包括国家本身，那么这为什么现在就不可能呢？

托洛茨基和“左派们”猖狂地攻击那种认为俄国革命前历史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理论。承认1905年的俄国就已经成了“相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列宁的话，他认为，20世纪初，不仅几乎全部工业，而且约50%的农业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经济基础”和君主专制人为地培植资本主义的神话。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从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前身商业资本主义一出现在地平线起，就特别疯狂地开始四处蔓延了。起初他们试图证明，提及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的商业资本本身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商业资本离开工业资本无法存在（卡列夫^①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课堂讨论上如是说）。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数百条引文面前，他们不得不缴械——但是商业资本在俄罗斯历史上“没有起任何作用”的说法在一年前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②进行的一次讨论会的提纲中仍可见到。“左派”诠释俄国历史最近的例子是两个月前加兹甘诺夫^③同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报告（在预科部，即向刚入学的学员所作的），报告中自然经济作为俄国经济的主要形态被延伸到20世纪初：只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了原始积累。很清楚，加兹甘诺夫同志没有得出在这样的国家中只有具有“特殊大脑构造”的人们才会思考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这是他的听众中大脑具有最

① 卡列夫，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在红色教授学院工作。

② 以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址设在莫斯科，1919年设立，1932年关闭，是苏维埃共和国培养苏维埃和党的干部的第一所学术机构。

③ 加兹甘诺夫，历史学家，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

起码构造的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轻易做出的结论。当然，在加兹甘诺夫的追随者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冒充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概念”，它与非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波克罗夫斯基的公式”对抗。

这些观点通过托洛茨基与19世纪下半叶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老巢就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成人专修班和部分历史学教员。部分由于我的过错，在那里形成了很不成功的组合：历史部主任瓦纳格^①同志和历史部支部书记加姆巴洛夫^②都是前托洛茨基分子。在加姆巴洛夫同志主持进行的东方学研讨会上，托洛茨基的腔调就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加姆巴洛夫同志本人发现了这些，就努力“恢复平衡状态”，在决议中批评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更加幼稚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拥护者为了“战线一致”抗议这样做，这就暴露了问题的内情。加姆巴洛夫同志作为“老布尔什维克”（1907年入党）和口若悬河的人，在学会中享有较大的影响。他行事非常谨慎——继续指责他有什么托洛茨基情结（相当巧妙地伪装起来了）——是不可能的。瓦纳格同志起初盲目地追随加姆巴洛夫同志，然后试图纠正自己的路线，但没能作到就走了。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让坚定的党内同志担任历史部主任，他将会依靠构成部里绝大多数的青年专修班，赢得青年人的信任，摧毁老学员中的派别倾向。

这样，目前红色教授学院的这些倾向主要是“左倾”。但这并不意味着，红色教授学院历史部没有右派倾向——相反，不久前它们还是清晰地表现出来。卡冈诺维奇^③同志知道的，那件与潘克

① 瓦纳格，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1925年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俄国的财政资本》。

② 加姆巴洛夫，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学家，1930~1931任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历史部支部书记。

③ 指政治局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拉托娃^①同志有关的事件就是右派排演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以加姆巴洛夫同志和瓦纳格同志为首的“左派”非常坚决地支持右派的倡议。这种互相纠缠的例子，甚至在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越是深入，就表现得越频繁。

历史战线上的右倾也是从对 60 年代的叙述开始的，但不是由于胜利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改革，而是由于不成功的农民革命。农民革命是革命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在历史方面——归结为，俄国历史的主角不是超阶级的国家，而是农民，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是整个历史进程的核心，其他的都是附带因素。特别典型的是，如果米留可夫的陈旧概念感染了托洛茨基，那么民粹派的观点现在也感染了米留可夫本人，在其近著中（如 1925 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崩溃》），他全盘接受了俄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观点。他所有的希望和预测都寄托在农民身上。

如果“左倾”将其锋芒对准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话，右派事实上是个体农民经济的辩护士。由此就把过去所推崇的与个体农民有关的一切联系起来——如宣布革命的民粹派分子是布尔什维克的鼻祖（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观点）。最近这种倾向在纪念 1905 年时特别明显地体现出来。迄今为止，仍有人把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如乌克兰的亚沃尔斯基^②。亚沃尔斯基认为 1905 年革命的真正动力是农民。现在这种观点的代表已经不是亚沃尔斯基，而是明茨^③同志（在未

① 潘克拉托娃，安娜·米哈伊洛芙娜（1893～1957），历史学家，1953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② 亚沃尔斯基，乌克兰历史学家，1929 年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29～1930 年遭到了尖锐的批判。

③ 明茨，伊萨克·伊兹拉伊列维奇（1896～1992），历史学家，重点研究党史、十月革命史和国内战争史。1946 年当选为院士。

被《真理报》刊登的关于格林同志的小册子《1905年革命中的苏维埃》的评论文章中)宣称格林“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格林不承认农民是“1905年革命的动力”。当然,明茨同志也没有忘记提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像加兹甘诺夫同志不忘无数次地援引列宁的著作——简单归结就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农民群众的先锋队。许多民意党分子非常同意这样理解。无产阶级不单是先锋队,它和它的党还承担着“为了全民族与沙皇专制斗争的利益领导最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的任务,尽管明茨的这句话引自列宁的著作,但是他显然不理解其意思。

宣称1905年革命是农民阶级的革命,在我国现代文献中传播得十分广泛——遗憾的是,它也涉及到了党的某些文件,例如文化部文化宣传处由埃里沃夫同志编撰的《论1905年革命》的方法论评述。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在那里确实并不太明显,如编辑在第15页中说“真正的领袖——俄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并且引用了列宁的相应著作——农民由“动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者”;所有这一切当然是正确的,——但所有这些否定了小册子前几页的内容。这个提法贯穿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编辑的大部头的《联共(布)历史》第二卷的始终。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大剧院的讲话^①,他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上一篇书评对《联共(布)历史》的相应地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作为编委会成员,文章付印前不能不知悉)评价为“社会革命党”的观点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给编辑部寄来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信中不仅反对使用“社会革命党”的术语,而且为所有实质性的地方辩护。有理由认为,信只由雅罗斯拉夫斯

^① 指1930年12月2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大剧院所作的《论1905年革命》的报告。具体内容见1930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

基同志签名，而是《联共（布）历史》这章的作者所写。非常遗憾的是，历史战线上的右倾再次（第一次是关于民意党和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有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党的权威的名字所庇护。

“左”的托洛茨基倾向和右倾是历史战线上的主要倾向。它们带有明显的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部分简直就是资产阶级的性质（米留可夫—托洛茨基理论）。除这些倾向外，还有个人倾向，诸如皮翁特科夫斯基^①同志著的《商业资本主义形态》或杜勃罗夫斯基同志的《农奴制形态》（区别于封建形态）。两个理论都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当然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变种。但是这两位同志都暂时没有加入某个集团（明天这可能改变）——原因在于，右派和“左派”特别疯狂地批评过杜勃罗夫斯基，又匆忙使他得到无可指责地忠实于列宁主义的名声。

正如我已提到的那样，我对民族战线不予注意，准确地说，是俄罗斯—乌克兰战线，因为“在莫斯科写作的历史学家”（乌克兰的术语）与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或突厥人没有任何矛盾。日益加深的——我要说是——人为制造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战线上的矛盾，并不是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乌克兰有各种各样“左倾”和右倾。后者由于亚沃尔斯基的揭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主要支柱。似乎是鲁巴奇^②同志占据了他的位置，但根据其过去经历看，鲁巴奇同志至少不是右派。他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而被红色教授学院清除。显然，他极其狡猾和谨慎，从那时起就没有为从这方面指控他提供任何借口——否则他就不会担任乌共（布）中央一个部的部长。尽管其他乌克兰人（卡尔本克^③

① 皮翁特科夫斯基，历史学家，共产主义学院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② 鲁巴奇，乌克兰历史学家，1929～1932年任乌共（布）党史研究所所长。

③ 卡尔本克，乌克兰历史学家。

等同志)明确希望达成协议,但他在莫斯科千方百计制造莫斯科与哈尔科夫的破裂,因此他的立场值得怀疑。乌克兰人不需要这种破裂,莫斯科同样也不需要。就像所有给党的队伍造成混乱的人一样,他对托洛茨基分子有利。这些全是我个人的推测——我没有证明鲁巴奇同志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今的新事实。但对他的诡异立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米·波克罗夫斯基

No05659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泽尼斯等人的声明 致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信

(1931年1月16日)

致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所有成员：

1月15日在主席团会议上听取了泽尼斯、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和帕舒卡尼斯^①同志所作的声明，对我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开会前，我在文件夹中找到了这个声明。他们未就此事与我进行过任何预先的谈话。当然，“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出人意料的打击——绝对是暗中进行的——是最有效的。但我应该指出，我在共产主义学院（前身是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13年中，类似的“战略”我第一次遇到。

昨天在讨论中已对文件作了总体评价——没必要再谈它了。由于完全没有准备，妨碍我充分而明确地叙述泽尼斯等同志声明中涉及到的历史战线的部分。

“在历史领域”，声明的作者们说，“共产主义学院还没有进行全面而无情的自我批评，但是，这并不证明没有错误，只是由于这些错误至今为止还没有被揭露出来”。

这些论调使我十分痛心，我不能把它称为别的，只能称为诽谤。声明的作者不能不知道，正是在历史部门，我们有自我批评的

^① 泽尼斯，经济学家，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经济学家，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帕舒卡尼斯，法学家，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

机构，而这是其他部门所没有的。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为代表，它团结了所有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和接近它的莫斯科成员以及我国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学家，在协会内可以完全公开而无拘无束批评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方针，协会本身的领导也不例外。只要回忆起梁赞诺夫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讨论会上的发言就够了——他在发言中指出了协会主席的真正错误，他本人当场对此承认了——或者是泰奥多罗维奇在关于民意党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按照“无情”的原则，甚至在对德波林同志及其小组做出决议后，也没有给他任何他所希望的东西。在民意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的领导得到了党的领导的支持，这只能证明协会缺乏某种“急速离开孟什维克主义”，而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没有自我批评。在承认和揭发自己错误的意义上，历史战线的自我批评与其他战线相比，与其说是少了，到不如说是多了，例如，在法学理论战线上，“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地流行了数年——最后，直到阐述哲学上的争论时，才发觉这些错误。

在辩论中，说我似乎掩饰格林同志著作的薄弱方面的论断，是诽谤性的。不说现在已在高校中的各协会支部进行辩论，还指定涅夫斯基^①同志于1月25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就这本书作报告——埃里沃夫同志作副报告，他是这本书的主要批评者。自然，泽尼斯等同志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就著作作者的缺点说出自己所有的意见——同时辩论会做速记，将视技术可能性，在报刊上把它公布。

这样，泽尼斯及其他同志关于历史战线的状况的声明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因为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以掌握的事实准确性为前提。对我的发言的政治意义的问题，我没有得到帕

^① 涅夫斯基，历史学家，1924年起任列宁图书馆馆长。

舒卡尼斯同志的任何答复。我只能自己做出关于目的的结论，即在
这种情况下，泽尼斯及其他同志的目的是要有意歪曲事实。我希望，
在这些结论中——就像迄今为止自己的一些主要结论一样——
我与党没有分歧。

米·波克罗夫斯基

№05660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编写历史战线上的
意见分歧的报告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 年 2 月 3 日)

致联共（布）中央卡冈诺维奇同志

亲爱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几天前您建议我为您和中央的其他书记编写有关我国历史战线上意见分歧的报告。我已经编好了——我觉得它学术味太重，而且枯燥，就没有寄出。非常巧的是：因为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三名成员（我听说，通过非正式的谈话，主席团的其他人也加入了）发言反对我。这样我可以抛掉一切学术味，直接说清楚。这会更简短和生动一些。

把所有这几份报告给您寄去。如果您认为文件值得下发，您可以命令这样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No05661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学界状况 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31年2月5日）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所有书记和莫洛托夫同志

副本送中央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

在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三名成员所作的声明中，评价了共产主义学院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也许对历史部门给予了最严厉的指责。声明说，那里好像没有错误，其实只是那里的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读成“被掩盖起来了”）。

这样，完全可能的是，在历史战线有一些东西不逊于鲁宾学派^①或德波林学派，但由于它们“没有被揭发出来”，被掩盖了，因为在历史战线缺乏自我批评，结果，广大的各界人士对这些错误一无所知。

大家都同意，“被逼到内里”的病比经济或哲学上揭开的脓疮更糟糕。实质上，声明请大家对历史部门进行最细致的检查。

我个人坚决拥护这样的检查。这些年来，我习惯于自我纠正并深深地感谢那些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这就是我对声明说

^① 以经济学家鲁宾为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20年代末，随着批判布哈林和“反右倾斗争”的展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着重批判右倾的“机械论”，鲁宾被作为“机械论”的代表遭到了尖锐的批判。

历史战线的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和缺乏自我批评表示愤怒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 1925 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正是自我批评的举动。在我的开幕词中，我揭露了我们当中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当时歪曲非常严重，因为许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我指出了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不能把它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过程的解释。我引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著作《论我国革命》中的话，那些现在仍站在“经济唯物主义”立场的人，“应该及时地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是傻瓜”。^①

如果算上我几年来成了“经济唯物主义者”，并在 1906 年以这个名字出版了小册子^②，自我批评已经够“无情”的了。我的发言刊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 1 期上。

在同一次会议上，我不得不就纯粹的具体事务作自我批评。我应该承认我对普加乔夫个人和他在“普加乔夫起义”中的作用的旧评价是不正确的。我的这些悔过为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了败坏我名声的借口。我体面地回答了他，但我一点也不对自己的“悔过”而后悔。

当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有人指出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策略的阐述完全不正确，我也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的发言有速记，刊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上。

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议上，涅夫斯基同志援引我《俄罗斯文化史概要》（写于 1913 年）的机械论的导言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我发了言，并与自己错误的东西划清界限，指出无论如何不能

^① 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72 页。

^② 指波克罗夫斯基的《经济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讲演和专题报告》，莫斯科，1906。

再引用这些陈旧的观点。我的这个发言也速记了，刊登在会议的《论文集》中。

还可以列举许多这样的例子。但这些已足够了。这决不是想自夸，我经常请求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向我指出，他们何时何地如此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理论上的错误，并且多数是主动说出的。除了帕舒卡尼斯同志的情况外，实际上经常遇到完全相反的现象——拒绝承认被别人揭发出来的错误，而且不承认有充分证据证明的错误。

但是，那些大叫历史部门“压制自我批评”的人——与其说是那些签署声明和对此表示同情的人，不如说是我在历史战线另一个阵营的敌人——他们需要的是完全不承认我有个别错误。他们十分清楚，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犯错误。他们需要证明，历史中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与经济学中的“鲁宾学派”和哲学中的“德波林学派”是同样的东西。这是对列宁关于一般历史过程，特别是俄国历史过程观念的直接歪曲。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某些课堂讨论上，“列宁公式”与“波克罗夫斯基公式”^①被直接对立起来。

去年，这种“对立”在个别场合被打破。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极其尖锐地把列宁和波克罗夫斯基对民意党的历史意义的评价对立起来。泰奥多罗维奇同志就此要求把我的书立即付之一炬：这难道不是“无情的自我批评”？这种企图遭到了异乎寻常的失败：未经争论，就向泰奥多罗维奇同志证明，他或者是不理解列宁或者是有意歪曲列宁。现在证明，泰奥多罗维奇同志的发言是右倾在历史领域、在理解和解释过去方面的最明显的体现，这可以看做是闯门而

^① 1930~1931年，红色教授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流传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书中收录了波克罗夫斯基的一些与列宁观点不一致的言论。此书的作者是德罗兹多夫和马拉霍夫斯基，他们还倡议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集体致信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揭露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念违背了列宁的历史观念。

人。

但这是个别场合。对“波克罗夫斯基公式”的进攻，总的来说在进行。这个公式是什么，它为什么如此地受人仇恨，必须对此做简要地说明。

“波克罗夫斯基公式”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革命前俄国历史的基础（迄今为止在我的著述中相关的阐述没有超过1916年）。这个公式努力证明，我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它既不是由于西方影响所产生的，也不是由于专制制度“培植”我国工业和贸易而产生的，而是具有深厚的民族根基。16世纪下半叶我国就开始形成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则是19世纪初出现的。到1905年前，俄国就已经是“相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语）——因此可以提出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把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为没有这样的胜利，所以转变没有发生——但1917年二月革命的完全胜利很快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这以后可以提出在我国不用西欧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十分自然，所有怀疑我国依靠自己努力建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人，首先都要通过历史论据努力消除“波克罗夫斯基公式”。如果20世纪初的俄国是全盘自然经济的国家，那里勉勉强强开始了原始积累（与加兹甘诺夫同志最近在红色教授学院报告中的纲要相似），那么显然，只有那些“具有非常特殊的大脑构造”（托洛茨基语）的人们才能解释俄国的社会主义：有谁会提出在阿富汗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呢？何况全盘自然经济的国家当然是农民国家：怎么能够蓄意侵犯作为整个经济基础和未来保证的个体农民经济呢？波克罗夫斯基的从“民族”根基中长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这是“农民资本主义”，他们是发了财的农民，同时也是小铺老板，高利贷者和小企业主——俄国资本主义的温床。“农

民资本主义”的术语使斯列普科夫十分愤怒——狂热地置疑这种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可能，他第一个（比博古舍夫斯基^①还早）宣布，至少现在在苏联还完全没有富农——“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富农”。

“波克罗夫斯基公式”也受到了自我批评，而且这是在作者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对这个公式的严厉批评是于1928~1929年冬以红色教授学院“学术界”的方式进行的。

头两次会议不让作者参加（他的确也没有据理力争）：批评者们想彼此协商。当我去参加第三次会议时，原来，我的对手没有协商好，他们互相吵起来，我毫不费力就战胜了他们。但在此我也承认我的公式有错误：它“有点肤浅”（我记得，1925年^②斯大林同志给红色教授学院学员们的答复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最陈旧的论述中，无疑对商业资本主义作用问题，尤其对它的政治作用问题有些夸大。这个思想完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档案》第1卷第236~239页和《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第2版第63页）——但是把提法发挥到这种地步，如专制制度——这是“戴莫诺马赫王冠的商业资本主义”，则意味着完全掩盖生产的封建基础，而全部实质就在这个基础。17世纪的专制制度无疑是依靠商业资本，并且在对外政策上部分完成了它的任务，但专制制度本身是封建土地占有制专政，而不是商业资本主义专政。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也做了速记，但十分遗憾的是，没有发表：如果发表了的话，在历史战线

① 博古舍夫斯基，历史学家。

② 这里波克罗夫斯基弄错了。斯大林答复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不是在1925年，而是在1927年3月。他在信中指出，波克罗夫斯基的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的理论“在对专制制度的形成过程作简单化的经济上的解释时有极端性和过分之处”。

上没有自我批评的论断就会失去其最后基础。但是，在攻击我的历史专家圈子中，人们当然是非常清楚这个速记的。

必须指出，这个圈子不太大。大批红色教授学院学历史的学员和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没有被任何右倾感染。令人难过的是，由于我个人的过失，倾向分子们能够占据决定性的地位。比如，我长久地容忍了明茨同志作为自己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助手，现在他扮演的角色已经十分清楚了。最后，我失去了耐心，把他撤换，任命瓦纳格同志取而代之——十四大前，他曾是托洛茨基分子——我相信，他早就根除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原来我错了，同托洛茨基派的往来和结交继续影响着瓦纳格同志，我不得不把他也撤了。现在实际上是雷克林同志领导历史部，他是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西欧主义者，显然是一位有正规情绪的同志——但我不很了解他。我们焦急地等待杜贝尼^①同志的到来。曾出现过—一个由潘克拉托娃同志取代瓦纳格同志的方案，这等于让潘克拉托娃同志去送死：新的诽谤会比以前的更猛烈，她将承受不了。

我再重复一下，诽谤者只是一小撮人。红色教授学院中有5~6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理事会中有4~5人（在40人中）。为什么这些少数人集团会有影响呢？这里必须指出，如果说倾向分子是极少数，那么倾向的调和分子很多。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场斗争中保持中立。有时事情也越出中立界限。例如，涅夫斯基同志不明白由于格林同志的书引起冲突的政治意义，就愤怒地抨击（在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的信中）格林借用了“托洛茨基雄辩精粹”（四分之三的引文来自1905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社论，遗憾的是，没做预先声明，引文是托洛茨基的），这已经不是中立了：涅夫斯基同志不

^① 杜贝尼，历史学家，共产主义学院历史部的研究人员。

能没看到，引文对书的结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涅夫斯基同志不能不知道，书的第一版遭到托洛茨基的痛骂（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里面也有这些引文，托洛茨基正确地把这些引文的意义归为零。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立场使局势更加混乱。在关于民意党的争论中，他起初站在泰奥多罗维奇同志一边。然后开始“修正自己的路线”——但到最后也没有修正过来：没有把泰奥多罗维奇同志评价为右派分子。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辩论中，埃里沃夫-明茨的观点得到他的支持，即这场革命是农民的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农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季诺维也夫^①集团主张的新版，这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秘密。但埃里沃夫-明茨有的东西比这稍好一点：1905年还不可能提出转变问题，因为据他们说，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好心的苏汉诺夫^②分子们（见列宁《论我国革命》）也不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共产党宣言》时，欧洲大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要比1905年的俄国低。

无论如何不能将此解释为“好心犯错”。对读者掩藏了《两种策略》^③的著名地方，其中列宁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转变问题。巧与不巧，明茨同志和埃里沃夫同志引用了列宁的大量论断——他们对

① 季诺维也夫，格里里·叶夫谢耶维奇（1883~1936），1921~1926年为政治局委员，1917年12月起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年3月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12月在党的第十四次后因为反对斯大林而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

② 苏汉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2~1940），政论家和社会学家，1903年起为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之后，在苏维埃机关工作，1922~1923年在柏林出版七卷本的《革命札记》，1931年3月在孟什维克诉讼案中，被判处10年监禁，剥夺权利5年。

③ 指列宁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

此就像猫儿围着热粥盆转悠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大剧院的发言^①中必须引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后来听到的谈论证明，听众正确地理解了我的举动。

我痛心又遗憾地看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因政治原因受过苦役的人，为各种各样的半社会革命党和半孟什维克分子打掩护。完全可能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个人不同意明茨-埃里沃夫集团的观点。在他于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没有一句重复这个集团所固有的庸俗论点：他报告的提纲是全党关于1905年革命的提纲，区别仅仅是，他完全没提及转变问题。在就泰奥多罗维奇问题给我的信中，主要写了他不愿意“摧残”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纯道德动机。我个人准备承认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好心肠：我记得，1924年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清洗中他是如何支持我的（而且我们阻止把现在的倾向分子中的某些人清洗出去，例如斯·米·杜勃罗夫斯基同志；我乐意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分担这个问题上的责任）。但应该明白，好心肠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美德。布尔什维克是些“恶”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与各种非党和反党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当然，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理论上对此非常了解：但最后必须把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米·波克罗夫斯基

^① 指1930年12月25日波克罗夫斯基在大剧院所作的关于1905年12月莫斯科事件的回忆。

No 03310

高尔基就《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波泽尔恩的信

(不晚于1931年8月10日)

亲爱的鲍里斯·帕夫洛维奇^①：

想同您谈一谈有关《国内战争史》第1卷的工作。冶金工人的首府^②是工人阶级对敌人首次实施成功打击的地点，希望叙述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第1卷也成为我们文学工作中的同样成功的行动。

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写历史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以至于在我看来，由于谈论过多反而冲淡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实际上并不复杂。

我们编写这部《历史》书的目的，在于发扬群众的阶级自觉、革命自觉。我们写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工人阶级实现其革命阶级对于政权的权利的历史。因此，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去详尽地描述纯粹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当然，军事行动并不能排除，但同时也应当记住，我们编写的并不是军事战略教科书，而是政治作战史，是群众在他们的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党这一先进部队的智慧和意志的领导下战斗成长、革命成长的历史。

① 波泽尔恩，鲍里斯·帕夫洛维奇（1882—1939），1917年为明斯克苏维埃主席，北方战线的政委，1922—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1924—1926年东南边疆区书记，1929—1933年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被镇压。

② 指列宁格勒。

也就是说，工作的主要重点不在战争，而在战争的意义，在阶级斗争。之所以必须选用个别的作战片段，是为了渲染、修饰、使文章生动，之所以必须要描述某些战士的形象，是因为他们的机敏、勇敢、英雄主义或者反映出战斗集体的总的情绪，或者振奋着因作战失利、疲劳、饥饿等等而陷于低落的情绪。

必须努力去充分显示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行动的阶级动机，而且各处都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

然后是形式。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力求做到：极度的简单、明确和叙述的生动形象。正是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任务，我们也邀请了几位小说作家。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对文字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容易为文化不高的群众读者所理解。他们参加的工作仅限于此，他们是文学编辑和文字的修改者。

十分清楚，对于那些解释事件的政治意义的章节，对于那些其中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的章节，如果需要改动的话，则小说家应当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来审阅。

凡是由小说作家对回忆材料和战斗积极参加者的追忆进行加工时，应当使他们有较多的行动余地，但是本卷的主要编委应对原始材料和小说家的成果进行核对。

对于《彼得堡》一节，我们拟定约请拉夫列尼约夫、李别进斯基、特尼亚诺夫、施洛尼姆斯基和奥丽加·福尔什^①等人作为事件

^① 拉夫列尼约夫，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1891～1959），作家，中篇小说《风》（1924年）、《第四十一个》（1924年）、话剧《断口》等的作者。李别进斯基，尤里·尼古拉耶维奇（1898～1959），作家，国内战争和革命作品的作者。特尼亚诺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1894～1943），作家，文学家。施洛尼姆斯基，米哈伊尔·列昂诺维奇（1897～1972），作家，其作品多描述苏维埃知识分子的生活。福尔什，奥丽加·德米特里耶夫娜（1873～1961），作家，《大乌鸦》等作品的作者。

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参加。编辑委员会有权再增补一些它认为对工作有益处的人。您，鲍里斯·帕夫洛维奇，是州委委员，我通过您恳切地请求州委全力支援这项工作并注意监督其进程。

我们必须在10月25日庆祝节日之前出版第1卷。必须这样做。这将是给无产阶级在它的伟大节日——它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取得胜利的节日快乐之时的极好礼物。《国内战争史》应当表现出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工厂史》^①应当表现出，工人阶级起先——在十月革命以前，是创造资产阶级文化的干粗活的苦力，后来，则是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动力。我们希望，这些书将成为发扬群众阶级自觉、革命自觉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它们能够，也应当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

总之，亲爱的鲍里斯·帕夫洛维奇，让我们一起工作吧！

请向基洛夫、乌格拉诺夫、乌加罗夫^②等同志转达我诚挚的敬意！

紧紧握手。祝您健康！

阿·彼什科夫

-
- ① 在高尔基的倡议下出版了几套丛书：《工厂史》、《年轻人史》、《农村史》、《杰出年轻人的生活》等。
- ② 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1886～1934），1904年入党，从1926年起为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同年遇害。乌格拉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86～1940），20年代任一些省的省委书记，1928～1930年苏联劳动人民委员，中央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被镇压。乌加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900～1939），1918年入党，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从1934年起为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从1938年起为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从1934年起为全俄中央执委会成员和苏联中央执委会成员，后来被镇压。

№05662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信件 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委会的信

(1931年12月19日)

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委会所有成员：

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信^①，我应该首先声明，无论是塔达洛夫^②同志在历史研究所的发言，还是塔达洛夫同志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委会成员的信，我一无所知（尽管我是上述编委会的成员）。我没读过斯卢茨基^③同志的文章，就此交换过意见与否，我也不清楚——其实都明白，因为我当时在克里木。

所以，我难以对信件的主要论点，即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控塔达洛夫同志“说谎、欺骗和把同志们引入迷津”，说出什么看法。

对此我不能不补充两点意见：

第一，斯卢茨基同志是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他“受托为各类党校编教材”——这些事实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这个编辑部没有把任何工作人员派到某些研究所，更不太可能委托某人为党校编辑教科书。

① 指雅罗斯拉夫斯基1931年12月15日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他抗议塔达洛夫指控他支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上发表斯卢茨基的文章。

② 塔达洛夫，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会员，1930~1931年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的编委会责任秘书。

③ 斯卢茨基，历史学家，通史专家。

第二，雅罗斯拉夫斯基经常在自己的信件中避免把塔达洛夫称为“同志”——把与此有关的其他同志的旁边标上记号（如巴耶夫斯基^①同志）。之所以必须注意，是因为剥夺自己对手的同志称呼已经成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方式：如在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第二版第三卷第二册的文章中，没把克里茨曼^②同志、罗宁^③同志、瓦纳格同志和我称为同志。显然，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早就预先把所有这些人视为被开除出党的人，视为自己的敌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① 巴耶夫斯基，历史学家。

② 克里茨曼，历史学家、政论家，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③ 罗宁，法学家。

№05663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编委会的构成致卡冈诺维奇的信

(1931 年 12 月 21 日)

绝密

亲启

亲爱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9 月份我动身去克里木之前，我请您推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委会新成员问题。现在新编委会的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了，再不能往后拖了，——同时确定了一个名单，吸收他们参加这项事业将是有益的。

要求这些同志具备两个条件：(1) 他们不应是“死灵魂”——为此要确认他们对历史战线的事情有兴趣，并积极地表现出这种兴趣；(2) 要这些人在政治上十分冷静和明确——新编委会中不允许有任何“中立主义”和“经院派”。

根据这些特征，通过挑选，我列出了一个名单请求批准：萨韦利耶夫、克诺林、潘克拉托娃、杜贝尼、卢金、格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等同志。

萨韦利耶夫同志是共产主义学院的领导之一，也是我在历史部门的实际副手。

克诺林同志已经在历史学家会议上做过几次报告，他将保持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

潘克拉托娃同志必须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杂志的组织工作，在那里她已经非常疲惫（应该再休假一个月）。同时，她是研究所所务委员会杜贝尼同志最可能的继任者，后者非常有可能转到红色教授学院历史部。

您很熟悉杜贝尼同志，无须再说他了。无疑他现在是共产主义学院历史部最充满活力的工作人员。此外，他负责我们与乌克兰的联系。

卢金同志享有“经院主义者”的声名——这十分不公正。他只是个优柔寡断的人，难以使他振作起来，如果他振作起来的话，会向着既定的方向迈进。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使大家十分满意，引出拉狄克^①同志的激动的即席讲话，在这种环境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推荐。此外，H.M. 卢金^②同志是我们拥有的惟一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没有他的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不能成为学术刊物，在我们有了以《阶级斗争》为代表的大众化的学术普及刊物之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办成学术刊物成了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当然，最有争议的候选人是格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请让我为他们说几句话。

自然，格林同志犯了巨大错误，1930年，没经任何修改，就出版了年轻时代写的关于1905年苏维埃的著作，里面包含着较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一开始我坚持要他登报声明与这本陈旧的著作划清界限，但他拒绝了，加重了这个错误。但他关于苏维埃的书基本上是党的作品，而不是倾向性的著作。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

①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1885～1939），1919～1924年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② H.M. 卢金（1885～1940），《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杂志编辑，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院士。

志编的《联共（布）历史》第二卷的评论中，他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正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本人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实际承认的那样：他承认的那些错误，实质是那些格林同志在书评中指出的。把格林同志开除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编辑部，意味着证实了由那些现在被定为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和非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编造并流行起来的对格林同志的令人厌恶的评价是正确的。我恳请您不要把格林同志交给明茨之流随意支配，不要把他逐出杂志编辑部，事实上他是杂志的创始人。

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刊登在12月20日《真理报》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完全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平了反，否定了他本人犯有任何倾向或错误的指责。根据这个决议，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只有“腐朽的自由主义和阶级警惕性迟钝”的过错，“领导学术机构的其他人员”同样也犯有这样的过失。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们大家，历史战线上的主要工作人员，也犯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过错——我在红色教授学院纪念会上对此作了完全公开的认错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如果根据这些原因把人们逐出编辑部，就得把我、萨韦利耶夫、卢金同志也逐出去——那就不知道，谁来组成历史杂志的编辑部。既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把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与我们大家放在一条线上，那么，也就没有逐出他的任何根据。

编辑部的第九名成员应该是杂志的责任秘书。迄今，塔达洛夫同志仍在这个位置上。他绝对是糟糕的组织者，每一期杂志出得极其不正确，内容形形色色，放任自流，没有计划。在最近的冲突中，塔达洛夫同志的表现极为奇怪：时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帮腔，时而又起来揭发后者——对这个事件的审查刚开始，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责塔达洛夫同志诽谤他。总之，我认为，不能留下塔达洛夫同志作为新编辑部的常任责任秘书，没有任何可能性和

任何意义。同时，像挑选编委会成员一样，让他担任副手也不是简单的事，因为编辑部需要的是至少能把自己一半时间用在杂志上的人。我有四位候选人，向您推荐，如果您查实认为他们合适的话。他们是泽伊马尔同志，《真理报》图书目录部主任，不久前是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部主任；米尔施泰因同志也是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无产阶级史组潘克拉托娃同志的助手，这两个同志都在莫斯科，如果他们不合适的话，就得在莫斯科以外找，我推荐谢列兹尼奥夫同志（在新西伯利亚），他是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专家，《作为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一书的作者；或者是季霍米洛夫同志（在巴库），他是我的学生，近年毕业生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在莫斯科时政治上较少表现自己，据说，在巴库表现很好。当然，关于这些，必须向地方查询。

鉴于上述原因，必须事先决定，或者暂时任命塔达洛夫同志，但期限要短；或者第九个位置空缺，以便在一旬内解决塔达洛夫同志的继任者问题。因为后者反正要去休假，事实上什么样的决议都不会对事情有所改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米·波克罗夫斯基

№05664

波克罗夫斯基关于历史研究所的工作责任 致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信

(1931年12月29日)

给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

副本送联共(布)中央文化部斯捷茨基同志

除对斯大林同志信^①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一般决议外，还将向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提交一份有关历史研究所的缺点及必须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合理清洗的专门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要为研究所学术研究的缺点负责的确实是那些学术研究领域的领导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漏掉了作为研究所所长我的名字。也许，决议草案的作者认为，我从2月起就生了病，一次也没有去过所里。

接受这样的观点，要有很实质性的限制。第一，机构的杂乱无章和纲领的前后不一贯本年2月前就有了；第二，当我预感到自己长期患重病时，今年4月就申请免去我的所长职务，把工作交给卢金同志，但被拒绝，没有被免职。这促使我多少尽力去参与对研究所的领导——因为我不能亲自去所里，我就应该定期地、一个月不少于一次索要研究所和所科研工作状况的详细报告，特别是我应该坚持，所里的一切人事任命必须与我协商，无论我病得多严重，但

^① 指1931年10月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历史的一些问题》的信。斯大林要求创立完全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党史。这封信对苏联的历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疾病发作的间隙内，我有可能进行时间不太长的事务性谈话。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各种其他的目的，但不是为了监督历史研究所的工作，我不能推卸责任。

这样，由于我的马虎，我认为决议草案中关于研究所工作的全部缺点，都是我自己的过错。我的病可以成为某种原谅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证明我的马虎是正确的，

米·波克罗夫斯基

№05425

施略普尼柯夫^① 关于对其回忆录的评价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不早于1932年1月8日)

关于《1917年》

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多年以前出版的名为《1917年》的回忆录，12月25日《真理报》的社论^②竟认为其中包含着“对列宁、对党的卑鄙的托洛茨基式的诽谤，对我国革命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的解释等等”。编辑部在进行如此评价时，竟未提出任何证据，也未直接引用包含着诽谤和对革命做出孟什维克解释的章节。

12月26日我送到《真理报》编辑部的书面抗议，在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未能找到容身之地。只是通知我，编辑部对我的书做了“仔细研究”，将发表评论文章。

这篇对四本书的评论一次性刊登在1月8日的《真理报》上，集体署名。谈的是历史，那么我认为从我的著做出版的历史开始自己的答复是有益的。

《1917年》这四部书写于1922~1930年期间。第一部1923年出

①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1885~1973），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参加者，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劳动人民委员。1920~1922年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1933年被开除出党。

② 1931年12月2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机会主义和腐朽的自由主义更猛烈地开火》，其中批判攻击了施略普尼柯夫。

版，第二部 1925 年出版，第三部 1926 年，第四部尽管在 1930 年才出版，但其主要章节早在 1926 年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发表了。

一般而言，所有的书都要经过党史委员会^①，后来要通过列宁研究院。发表的关于二月革命时期党内事务的部分资料，还是手稿时，我就把它送给有关同志审读，审读过我的回忆录的任何同志，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均未向我指出我的著作有任何与布尔什维主义对我国革命的动力和性质以及我党的真实历史的看法不相符之处。之所以没有指出来，是因为我的回忆录中既没有诽谤，也没有恶语中伤，更没有孟什维克式的解释。“学者”组也未能证明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对我的书所作的评论中所提出的东西，是颠倒事实，是对我书中内容的直接歪曲，是对我的诽谤。

对我的第一个指控是，在书中把“革命想象成‘自发的过程’——孟什维克的‘自发性理论’，明显地低估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抬高资产阶级的作用”，这证明了“学者”组对政治问题和党的历史的极端无知。评论家们捕风捉影，把革命的自发性与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理论混为一谈。甚至党史小组的学员也不应把这混淆，更不要说教授了。是的，我认为并把革命作为自发的过程来准备。但是，这样理解革命的自发性与当时经济学家们和孟什维克分子特有的对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的崇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是的，我把即将到来的革命与自发性联系起来，但是，我也做了一切工作，以便准备使无产阶级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领导这个自发性，并赋予其组织性。

我把二月中临近的革命事件看做是自发性的，即是在某个中心

^① 党史委员会是根据 1920 年 9 月 21 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1921 年 12 月划归俄共（布）中央领导，出版党史和革命运动史文献。1928 年与中央列宁研究院合并。

的“有计划的预见性”之外产生的，这是否错了呢？没有，无论如何没错。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阶级力量来说，二月革命过去不是、也不可能是有组织的并且是由我们党“号召”的。

甚至在俄国已存在苏维埃，各政党和工人阶级要比二月革命前的组织性好得多的时候，即使在那时，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也未失去其自发性。“学者”组应该明白，甚至在我们党以列宁为首的时候，在四月运动中，在彼得堡7月的日子里及在前线和省里的各种形式的运动中，其自发性也是明白无误的。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对待自发过程也和我们（即中央局^①）在2月里和2月之前一样——竭力要控制这一过程并使它具有最大的阶级性和组织性。

从我与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工人领导人就政权问题的谈话中，评论家们由于无知和包藏祸心而得出了我没有原则的结论。下面就是我书中引起他们“学术”愤怒的地方：

“在我们的同志式的争论中，也经常提到政权问题。但是，所有关于政权、其阶级构成的话，都带有抽象的、‘原则’的性质。大家都十分明白，政权及其性质问题将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斗争中的现实力量对比关系来解决。把政权问题具体化的尝试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家都以讽刺的态度对待所有细节和讨论——‘不要与虎谋皮’。”^② “学者”组的所有“无原则”、“事务主义”的论调仅仅证明，这些人不仅不明白事件的政治意义，而且也不理解他们所读的内容。从谈话中应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与虎谋皮”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对我们讨论中有过的关于政权问题的提法的回答；第二，这个回答根本不能证明如此回答问题的人们没有原则性。

^① 施略普尼柯夫当时是党中央局成员之一。

^②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70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如此回答问题的工人同志们完全不是冷漠地对待革命中的政权构成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是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把自己所有力量和注意力集中于准备资金，以便打死那个“野兽”——沙皇制度，需要“谋”它的皮。

这些“学者”不明白所写的内容，把自己的臆断硬塞给我，似乎“我”认为，“党在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问题上没有任何前瞻性”等等荒诞不经的话，他们指的是1905年的教训，他们读了我的书，但隐瞒了他们引证的那一页的背面的内容。请看我是如何叙述的（第1卷第58页）。

“然而，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的组织对革命的基本问题、权力构成问题漠然置之。问题的基本方面早在第一次革命时已经解决，我们没有任何异议和偏离。在我们的宣言、传单中，我们提出了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临时革命政府要立即实现我们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的基本主张，还加上停止战争的条款。我们知道且明白，资产阶级试图牢牢地抓住权力，为了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要利用自己的一切‘反对派的’资本和向左或向右的妥协能力。但是，早在决战前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知道，甚至是由国家杜马进步联盟左翼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不能实现我们革命的要求，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进步联盟的阶级性，它的帝国主义倾向与革命人民的要求直接矛盾”。^①

这就是我写的，但五位“学者”评论员有意地或本身无知地歪曲了所写的内容。谈到自发性，引用斯大林的话，无知的历史学家们把1914~1916年孟什维主义所没有的特点加于它，即对自发性的尊重。如1914年的自发性事件——孟什维克分子对此持坚决否定态度。孟什维克对1916年革命时期的自发性的否定和敌对态度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70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致使它在7月的日子里扮演了屠杀工人的刽子手角色。

只有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是作为真正的革命者对待自发的工人和革命运动的，并力求赋予它最大的组织性。“学者”组从我书中的下述地方做出我“崇拜”自发性的结论的尝试，不但没有获得结果，而且令人感到十分可笑：

“在中央局会议上，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在我与彼得格勒各区工人同志的无数次会面中，以及与省的个别代表的协商中，不止一次地试图使正在临近的革命事件具体化。围绕着三个问题交换意见：（1）关于革命风暴最可能‘爆发’的地方；（2）关于即将到来的事件中的动力；（3）我党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策略任务。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计算革命运动力量的角度进行的。我们没有人打算提前拟订‘革命的计划’，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必须了解事态的发展并拟定自己的行动路线”。^①

但是“学者”组对我特别愤怒的是，我否认了孟什维克把工人运动中的“布朗基主义”的密谋思想、“革命计划”思想及与我们对立的类似的胡说八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指责。由此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我是经济派，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能够向“学者”组指出，在当时我是处于地下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带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的特殊任务回到俄国。组织了领导中心——中央局并进行了党的工作。学者组从那本他们引证来反对我的教科书中得知，我的工作在何种程度上像是“经济派”的工作？请打开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在同一页关于自发性的论述中，你们可以找到我所说的话的证据——即“对自发性崇拜的理论……坚决反对赋予自发的运动以自觉的有计划的性质，这个理论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17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自觉的水平”等等。

在以下几句话中你们能够找到对这个理论在实践中的评价：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①

我在当时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符合类似的实际。书中的所有内容都坚定地驳斥了“学者”组对我提出的类似的污蔑。

对我“低估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高估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指控就更不真实了。这里的指控是建立在无知地歪曲思想之上的。下面就是我写的关于我们的组织性和对革命斗争中组织的作用的理解：

“在当时我们的组织中，我们只有很少的最勇敢的、最自觉的工人。由于他们在工人中的能力和威望，我党的影响增大和加强了。当然，我们秘密状态下的组织性还不能与资产阶级的组织性相提并论。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战争堂而皇之地自我组织。我们既没有政治的、工会的、也没有启蒙性的组织，我们甚至还没有达到我国资产阶级已有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我国革命运动首先应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扫清道路。不得不向同志们指出，我们面前还有自发性的革命过程。世界还没有看到有组织的革命。在这个自发性的过程中，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小组和党的组织具有组织性意义。在我们期盼的革命是自发斗争的时刻，坚强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作用和意义将十分重大。追随榜样行动不会太久了：每个工人都对我们的罢工、抗议和示威游行记忆犹新。坚定的、团结和精神饱满的工人小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在工人发动时总是站在运动的前头。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工厂工人小组、军事集体在与沙皇政府的决战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第6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56。

中，应该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工厂的和其他的党小组和集体应把一切非党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它们是党对革命群众进行领导的执行者”。^①

试图荒谬地指责我低估党的作用，这只能用不懂布尔什维主义，不理解事件，不善于分析和理解写出的东西来解释。

是的，我认为当时我们党、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比资产阶级差。是的，我确认这点，现在还要重复。之所以这样，我现在援引评论家们不敢攻讦的人来作为见证。在《革命的教训》中，列宁写道，“政权之所以落入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②

对我不相信革命胜利的指控也是同样的迂腐。“相信”本身的提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我一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就不再是相信，而是希望并且努力去理解它。我当时确信，我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并竭尽全力使它来临并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这次革命中取得胜利。如果我说，早在2月24日我就知道，26日我将成为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那就是历史性的谎言。

1916~1917年冬天，我们彼得堡工人有过几次大的罢工：10月16日，10月26日，1月9日，2月10~14日和2月23日——以运动开始，以革命结束。所有这些罢工使人确信，革命问题只能在士兵加入后才能解决。这在何时发生——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力争使士兵加入这个运动，早在10月16日列斯涅尔的工人^③就办到了。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68~69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53~54页。

③ “联合机械厂”股份公司彼得格勒“新列斯涅尔厂”的工人。

在当时所有的发动中，布尔什维克都执行把士兵纳入革命运动的路线。但是，要我们在2月23日确信，我们的希望在2月26~27日开始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巫医。下面就是书中叙述这些思想的地方，它成了学者组欺骗性攻讦的靶子：

“运动每小时都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吸引了数十万名工人，除了我们党组织外，任何人都难以制止它。我们通过决议，决定让运动向士兵加入的方向发展，绝对不能用规定三日总罢工的某种机械性的决议限制这一发动，而这在彼得堡委员会是时髦的举动。彼得堡委员会委托我们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普·扎鲁茨基执行这一路线。以个别成员基里尔·舒特科、斯克罗霍多夫为代表的彼得堡委员会必须在最大限度地扩展运动问题上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当然，我们谁也不确信，这是对沙皇制度的‘最后的、最坚决的斗争’。我们没有这样的把握，当我们说到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展革命运动时，我们注意到并只考虑到了自发的力量。我们认为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与忠于皇位的警察军队将最大限度地进行决战，决战后，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屠杀，最后是某些低潮。组织也应考虑到这种情况，不使发动变成为毁灭，应有组织地把它终结”。^①

学者组不明白所说的政治意思，把问题的中心视为，进入2月24日的罢工后，中央局和彼得堡委会及我个人没有掌握能够使我们有根据说2月26日沙皇制度将被推翻的资料。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我们也应考虑到另一个结局。这哪里有不相信，与不相信有什么相干？但是，评论家们也不全是出于无知。有许多地方是恶意的伪造。请看一下，诽谤性的论断是怎样“提出来”的，似乎我在“革命发生以后，不是把无产阶级看做是革命的领导者，而是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看做是领导者”，还有对此所加的类似的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87~88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添油加醋。指控所依据的引文，摘自论述1月里的事件和情绪的章节，即不是革命后、而是革命前两个月的事。“学者”组援引的第一段引文，摘自《1月9日前》一章，其中论述了彼得堡和莫斯科情绪的区别及与此相关的即将到来的革命事件。以下就是引文：

“关于革命情绪可能爆发的地点，有两种推测：彼得堡和莫斯科。1916年底和1917年初，莫斯科经历了革命爱国主义的高涨。这次高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真正爱国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反对亲德国的彼得堡政府和宫廷的斗争引起的。在莫斯科，当时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工厂举行代表大会，强烈要求拯救俄国并获得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生中也有革命情绪。工人的革命情绪也不逊于小资产阶级，但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热情。当时，在莫斯科，工商界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一切情绪和社会运动定调子。在彼得堡情况则相反。在彼得堡，尽管国家杜马举行了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①进行了斗争，但所有运动的调子由工厂工人来决定。虽然战争时期工人的成分有了改变，不利于无产阶级，然而工人运动仍然保留下来了，在总体上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彼得堡工人对沙皇的政策，对沙皇制度的态度是否定的和革命的。战争没有得到多数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支持。工人与企业主的斗争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停止。工厂中存在战时不为人察觉的动员这一偶然因素，但不能摧毁工人的战斗团结。经济和政治罢工和谐地进行，有纪律和有组织，尽管警察采取了措施”。^②

第二段断章取义的引文来自《沙皇君主制政体的垮台》一章：

“然而进步联盟和有远见的宫廷代表拯救君主政体免于垮台的

^① 1915年9月成立，由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组成，十月党领袖古契柯夫任主席，主要负责在各企业间分配军事定货。

^②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17~18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一切美好愿望都是徒劳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天天地吸引着新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的反沙皇情绪也传给了城市和乡村的其他民主阶层。沙皇及宫廷的不妥协政策只是加强了革命情绪。沙皇当局准备对付‘人民的暴乱’，准备了警察机枪手骨干，进行血腥的屠杀。斗争从塔夫利达宫转到了工厂和军营。政府准备对付暴乱，工人则期待——准备革命”。^①

最后一段形象地反映出的事实是，国家杜马中的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仍对某些工人和士兵产生影响，也仅仅如此。

从不同的地方和根据不同的原因摘出所说的词句和对革命前部分莫斯科工人情绪的评价，“学者”组把它变成了对革命“已经进行”时期的工人的评价，并把它硬塞给我，成了似乎我“在革命展开以后，不是把无产阶级，而是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看作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一论断的依据。“学者”组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我，无意掩盖自己的政治面目，但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学者”组还指控我说，我没有正确地描述无产阶级在革命开始时的作用，他们武断地说，在当时——3月初期，我们已经存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把李沃夫公爵—商人古契柯夫和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政府描绘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代言人。“学术”批评家们，你们把革命的3月时期看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时期，你们大错特错了。当时权力属于资产阶级，它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如此描述3月时期，“学者们”陷入了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持的3月“革命的领导者”的观点，而他们的政策正是布尔什维克当时所反对的。你们驴唇不对马嘴地引证，你们对事件不理解，用对我的诽谤掩饰自己的无知。

评论家们对我对资产阶级在3月初期所发挥的作用的判断不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16~17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满。当时我写道，“各省革命的有组织的开端是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学者”组不能推翻这个论点，所以指责我使用了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俄国晨报》。但你们拥有无产阶级的资料吗？——索尔莫夫和卡那文的工人参加了消灭警察势力、尼日尼保安队的斗争，但不是他们任命地方当局，不是他们选举省的委员，而是西罗特金等人^①。相反的论断——这不仅意味着“跨越”事件和时期，而且把无产阶级的敌人描述成朋友，把与其格格不入的政府描述成它的领导者，它的统治者。瞧，批评布尔什维克3月时期的路线的企图会把评论家引向何处。

似乎我“有意识地抹杀和贬低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它为争取群众的斗争”，这种指控部分是谎言，部分源于“学者”组的无知。我所有的书都是党推荐的，在所有事件中，我自己曾是它的负责的代表，但是，迄今为止，谁也未敢对我抛出类似的指控。“学者”组甚至没有援引任何一件被歪曲的事实来加强对我的诽谤，就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我，似乎我把事件描述为，革命是在“党之外”进行的。我没有任何类似的描述，也不可能。作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受它的委托，我自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组织了中央局，中央局莫斯科区委，协调了与省里的关系。我写道，我们党组织不仅参加了当时的革命事件，而且也组织了这些事件。这是我概括的主要特点。

但是，“学者”组武断地说，似乎我对资料进行了专门的筛选，以便隐瞒“党的组织作用”，这具有明显的诽谤性质。“学者”组没有援引一件被我隐瞒的文件就赤裸裸地宣布，我对党争取群众所做的工作“欺骗性地不置一词”，我“隐瞒”了四月会议^②，回避了

^① 指1917年3月组成的以百万富翁西罗特金为首的尼日尼市杜马执行委员会。

^② 指1917年4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① 等等。

确实，在我的书中，党的文件比其他书要少。但是，要知道我写的不是联共（布）党史，不是别的，而是《1917年》。

“学者”组指控我说，我从历史中“删掉”了四月会议，我没有描述党在5—6月间的活动。是的，在我的书中，党的活动仅写到列宁回来之前，有关四月会议及以后我还没有写。然而，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我“隐瞒”了什么东西。对人们从列宁全集和1925年才出版的四月会议记录中所共知的事实，我能隐瞒什么呢？

指控我忽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具有代表性。“学者”组自己确认，我的这本书写到7月，但这不妨碍指控我，说我的书没有涉及到8月的事件。我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写作计划中，列有党在4—8月的活动，将来我会叙述。

“学者”组指控我，似乎我的书包含“对俄国革命的性质作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有两段话被摘出作为我的“孟什维克主义”的证据。第一段属于革命前的事，讲的是“经常就一系列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时候争论涉及我国目前革命的性质问题。把我国革命的任务限制在资产阶级秩序的框架内，许多同志认为这‘不合心意’。有人向我们通报，在哈尔科夫，人们在从理论上对我国革命的性质进行评价时，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同志把即将来临的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开端。一些人主张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之内”。^②

这一段评述了对当时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态度，其中一部分同志采取了不正确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们认为，战争已使群众准备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否定民主的意义（哈尔科夫、彼得

^① 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8月召开。

^②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67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堡)。列宁在1916年的信中警告我说，他反对对我国革命的任务做类似的理解，他指出，“目前摆在日程上的，不仅是要继续贯彻我在决议和小册子中已经确认的（反对沙皇制度等的）路线，（这一路线已为许多事件如英国的分裂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还要清除其中那些非常荒谬和非常糊涂的否定民主的东西（这里包括废除武装，否定自决，在理论上错误地‘一概’否定保卫祖国，在国家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上摇摆不定等等）”。^①

我坚定地执行了这个指示，否决了诸如最好是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等各种“真诚”的理由。

作为同一指控的证据，列出了第二段，其中我论述了在革命初期，2月28日和3月1日，妥协分子和资产阶级就政权问题进行勾结时中央局所采取的立场，这就是：

“在去劳动交易所开会前（彼得堡委员会第一会址），我与维·莫洛托夫和普·扎鲁茨基^②商量了他们应以我党中央局名义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推行的那条总路线。关于政权结构及其任务问题，我们没有分歧。我们建议执行委员会组成由当时加入苏维埃的各党派成员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其纲领应是实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纲领中的最低要求，以及解决停战问题。我们赞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即我们在经历着以革命打碎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时期，取而代之的将是资产阶级关系中所固有的各种‘自由’。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我们把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作为我国革命的直接任务，而他们将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最高纲领派’。我们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庸俗而残缺地理解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34页。

^② 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袖都不在彼得格勒。当时由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和莫洛托夫三位年轻人领导党中央俄罗斯局。

质。我们认为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希望通过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手段来履行工人和农民的要求是有害的。在何种程度上发生革命地摧毁农奴制关系，这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当时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右翼希望‘通过经常和不断地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它向左转’来最大限度地（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达到革命性的摧毁。我们认为这个策略是错误的，并用内容并不丰富的我国过去的例证来指出和证明，通过‘促使’资产阶级的手段来取得现实成就的希望是不可靠的”。^①

这一段（第1卷第180—181页）是对3月初期情况的评价。在这些日子里，中央局和我本人执行列宁在1916年10月给我的信中论述的路线，认为我国革命应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批驳孟什维克（巴扎罗夫—阿维洛夫—苏汉诺夫之流）的指责：即建议苏维埃政党夺取政权，我们就陷入了最高纲领主义。我们在右的方面同支持临时政府口号的提出者（巴扎罗夫和阿维洛夫等人）作斗争，在左的方面同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口号的某些彼得堡委员会和维堡区委员会的成员作斗争，我们按照列宁的指示行动，因为提出立即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就等于接受了“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早在1916年4月，列宁就论述了这个口号的不正确性。^②这样，评论家们批评我，竭力把一些与我党格格不入的对革命任务的看法强加于我，实际上他们作了当时托洛茨基思想体系的俘虏。

这些地方是“学者”组得出结论的依据，似乎我先于他人有了“1916年加米涅夫的观点”。为了彻底搞臭我在3月的行动，“学

^① 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1卷，第220页，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论策略书》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两文。

者”组援引了斯大林在党的六大上对6~8月状况的评价的引文，不加思考地指控我，似乎我有意不提这些情况，只把情况描述到4月。“学者”组自己的一切论据仅仅证明，他们既不理解布尔什维主义，也不理解列宁讲过的话。

同样的无知促使“学者”组指控我在书的第4卷第250页诽谤党，因为我在那里谈到，我党在七月事件以后抛弃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我可以向评论家们指出列宁在1917年7月出版的《论口号》的小册子，其中说“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唐·吉珂德精神，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做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做没有发生”。^①党当时寻求另一类口号以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了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权斗争的口号，其中的一个形式就是为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工人政权而斗争的口号。“学者”组不理解党的六大记录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放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引起了多么大的抵抗斗争和大量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谁也不能否定这个口号的意义的实质，它是列宁在其《论口号》的文章中提出的。“关于形式的问题不是主要的。有革命的高涨——就会产生有组织的形式”，^②斯大林的这一声明消除了一些形式上的考虑。

由于新的群众性的革命高涨，1917年9月初列宁和党又回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上。列宁在他的《论妥协》^③一文中对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8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4页，莫斯科，1958。

^③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这个阶段作了评价。当我写道，“7月初反革命的嚣张使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处于防卫状态，暂时推后了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他们指责我，似乎我在诽谤党，我的答复是，看看列宁的《论妥协》的文章，其中在9月初提出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① 这个策略步骤也证明了我的论点，7~8月时期，党推后了期待新的革命高涨中的苏维埃政权问题，寻找新的口号，准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权。

嚣张而伪善地指控我在1916~1917年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搞调和主义和联合主义，评论家们对事情的这种论述完全不符合实际。无论在何地何时，在战时还是夏季（1914年）在俄罗斯居留期间，我未捍卫过联合，也不属于调和主义者。评论家们引证的地方，仅证明了我们的党组织和齐赫泽^② 党团及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在反对沙皇专制的发动中采取联合行动问题进行谈判的企图。在任何一次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过党的联合和“调和”。

通过尼·德·索柯洛夫^③ 和阿·马·高尔基，我们收到了参加这些会议的正式邀请。按照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局的委托并在它们许可的情况下，我参加了会议。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局和我个人的态度完全符合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因为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总是不仅支持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见列宁的《论妥协》）。^④

从同一书中可以看出，我相当谨慎地对待协调行动问题。评论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131页。

② 齐赫泽，尼古拉·谢苗诺维奇（1864~1926），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2月27日至9月9日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③ 索柯洛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70~1928），中派社会民主党人，律师。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④ 这段引文在列宁的《论妥协》一文中没有找到。

家们翻到了一页（第1卷第44页），会找到这个地方，“对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兴趣，我没有采纳任何形式上的联合，它要使我们的组织协调自己的意志和行动以与其他组织的企图保持一致。当然，有人对我大加责备，说我狭隘，指控我不愿意联合‘一切民主力量’与沙皇制度斗争，竭力以宗派主义的方式孤立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从而损害了它的解放事业。

我们党的中央——中央局和彼得堡委员会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其他组织的评价是一致的，大家都拥护在国内不断出现的运动中保持完全独立，同时在毫不动摇地执行反对沙皇制度和战争政策方面大家也是一致的，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战争初期就推行这一政策。对于一切‘孤立’、不愿意进行真正联合的哀号，我们的回答是，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和巩固我们的地下组织。我们认为，我们用自己坚决的斗争把最积极的革命民主成分团结到我们的旗帜周围，要比将我们的斗争变成有点迟钝的外交联合可靠得多”（第1卷第52~53页）。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所谈的仅是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协调问题，绝对不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联合。列宁给我的信的引文只是证明，“学者”组——“读了列宁的信，但这些老爷们一窍未通！”

关于我们党内的联合趋势问题在第3卷中我已作了详细的论述。“学者”组不用特别动脑筋，但不要伪造，就可以找到我对这个直接问题的态度。

指控我似乎“暗中破坏武装和组织工人战斗队”是完全歪曲党的政策。“学术”诽谤者们既未引证彼得堡委员会，也未引证中央局，更未引证其他机关报的任何决议，谈到何时何地决定了建立工人战斗队的问题。这样的决定在1916年没有也不可能。我们提出，解决1917年革命胜利的问题，取决于能否顺利吸引集结在彼

得格勒及其郊区的数万名士兵加入到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之中。这个任务——吸引士兵，其中不少是工人——是我们、中央局向当时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党的工人提出来的。况且中央局没有任何武器储备。对个别工人请求给他们武器的呼吁——我根据上述我们在武装推翻沙皇制度问题上的方针——建议同志们从军营士兵那里搞到武器，或者与他们一起去警察管区和仓库弄。

我们（中央局）采取的这个方针，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其结果我曾在书中以工人丘古林^①的个人事例作了证明，2月26日白天他带着从士兵那里得到的武器和弹药来看我。我们的策略——号召工人走上涅瓦大街，工人与士兵联欢，最后是他们的联合及警察统治制度的崩溃，正是这样，街头事件发展起来了，它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把我描绘为“孟什维克分子和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学者”组既是诽谤我，也是诽谤党，更是诽谤列宁。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无论在当时、战时、还是在二月革命前、二月革命后，没有任何与我共事多年的党员，揭发我的活动和我的犯罪性的理论，而是相反，无论在地下时期，还是在革命时期，都支持我并把我选到负责的工作岗位上，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够了。从我与列宁的通信以及他和克鲁普斯卡娅给我的信中，一切党员可以知道我的理论和我的活动。他们两人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对机会主义分子非常敏感，如果我与“学者”组给我画的形象相似，那么，列宁就不会在地下或党的其他活动中支持我。

把诽谤和对人身的攻讦搁到一边，让我们来解析一下“学者”组以这种腔调对二月事件的描述：“局势是困难的。第一，不能立

^① 丘古林，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1883—1947），1917年任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维堡区委员会书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

即推翻通过苏维埃联系起来的临时政府，第二，不能在不顾一切地支持临时政府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我们党在列宁回国之前，绝大多数坚决地反对不顾一切地支持临时政府，反对不顾一切地向护国主义让步”。

仅此而已？除了反对支持临时政府和反对向护国主义让步以外，我们党再没有提出别的了？由苏维埃各党组成的“革命政府”的口号藏到哪里了呢？当时我们根据3月提出的口号要求“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应把全部政权集中到唯一的革命政府——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学者”组为什么要否定这个口号呢？（见第1卷第193页）

从我的书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3月份已经看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革命民主派本身夺取政权，而“学者”组把它解释为还在3月时我们党就为夺取政权斗争。中央局的立场相当接近于列宁在政权问题上的提法，当时一部分党的工作者偏离了这个立场。“学者”组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现在从早在1925年出版的《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的文集也可知道这些。^①有关党如何同自己队伍中的护国主义做斗争，我已写得相当多了，但却认为我把党的立场与沃伊廷斯基-谢伏卢克^②立场等同了起来，这只能是恶意的无知。作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成员，党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说起当时的领导并把这种领导与我对立起来，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而且是有意伪造历史和诽谤我。

关于当时党的领导，尽管我作了简短但是真实的论述。它不是一致的，在战争与政权问题上内部有斗争，只是在列宁回来时党才

^① 《为列宁主义而斗争》（莫斯科，1925年）一书载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托洛茨基的。

^② 沃伊廷斯基-谢伏卢克1917年3月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同意列宁的观点很快就退出了布尔什维克而转向孟什维克。

克服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内部斗争。

批判我和我的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诽谤，这从把我看作是“十月的逃兵”的企图中就可看出，尽管也有大量的揭穿这种谎言的材料。读一下191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记录》的第169页上有签名的文件：维·诺根、阿·李可夫、弗·米柳亭、伊·泰奥多罗维奇、达·梁赞诺夫、尼·德尔贝舍夫、伊·阿尔布佐夫、尤列涅夫、格·费奥多罗夫、尤·拉林和我的按语：“我同意大家对妥协必要性问题的政治因素的总评价。我认为放弃责任和义务是不容许的。劳动人民委员亚·施略普尼柯夫”，大家都会确认这一点。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个文件出来以后，中央还让我担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所以有关我的逃兵行为的一切说法，都是恶毒的臆断。似乎我作为五金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接受”了工厂主协会的挑衅性的建议，并且似乎通过了反对我的决议，评论家们的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对我的诽谤。工厂主协会采取了挑衅行为，这众所周知。但是把事情描述为这样，好像我作为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屈服于挑衅，这就是伪造。还在1926年，我给列宁格勒五金工人杂志纪念号写文章，论述了事件的原委：

“我在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代表们赞同我们采纳协定的第16条及其附注，但是坚决反对工厂主协会的提案。企业家组织提出的第4条提案，特别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这条说‘得到一定的最低工资保证，工人有义务付出最低的工作量，这由评估委员会来决定’。对这个提案（最低工作得到最低工资）进行辩论完全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对工人是危险的。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不断地攻击工人，好像他们不愿劳动，然而却想因无所事事而得到高额的工资。以此挑拨士兵对工人的恶意，而在此条件下对第4条进行争论是不合时宜的。此外，这条讲到，这个最低工作量由评价委员会决定，它由两个平等

的方面组成：工人和企业当局”。

“围绕着工厂主协会提案的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最后以工厂主协会的一切提案被否决而告结束。中央理事会的所有提案得到少数代表的赞同。中央理事会的许多成员被争论进程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建议我作中央理事会辞职的声明。但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中央理事会在斗争的时候退出也是有害的，与中央理事会党组成员协商后，我们决定服从代表会议，但抗议它的政治路线”。

“争论本身极具政治性。当时大多数彼得堡五金工人情绪出现转折——对妥协政策失望——并在经济斗争中开始显现出自己的不妥协。这是个可喜的事实，尽管没有纳入应有的轨道，我们，中央理事会的大多数人也考虑到了。我们向代表指出，他们不仅应通过五金工人联合会表现自己的不妥协，而且也应在苏维埃选举中表现出来，苏维埃决定着当时的政策”。

事情就是如此。他们引证所通过的反对我的那个决议，是我和阿·卡·加斯捷夫^①起草的。

其余的诽谤性的攻讦不值得答复。

类似的“评论”竟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找到地方发表，不能不令我感到极端惊奇。

亚·施略普尼柯夫

^① 加斯捷夫，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1882—1941），1917—1918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年筹建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并领导该所直至1938年。

No03311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曼努伊尔斯基^①的信

(1932年7月27日)

亲爱的同志！

由于缺少您那一章，我们无法结束《国内战争史》第1卷的工作。

现在给您派去一名科研人员，帮助您搜选材料，同时恳切地请求您抽出几天时间，把这一章的工作结束。这一章不能按时交稿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全卷整整一个月的工作。全卷工作能否较顺利完成取决于您。

《国内战争史》总编辑委员会 高尔基

^①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1952年为党中央委员。

№03312

明茨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拉狄克的信

(1932年9月9日)

尊敬的同志！

我受《国内战争史》编委会委托请求您给予接见，以便汇报《战争史》一书的工作进程，并就委托给您编写的《国内战争史》第1卷中的那一章（《十月》）进行磋商。

接见日期请打电话告知总编辑委员会，电话1-14-01。

《国内战争史》秘书处 明茨

№05120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往事 致奥尔登堡的信

(1933年2月3日)

亲爱的谢尔盖·费多罗维奇^①和叶莲娜·格里戈里耶芙娜^②!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达没有说出的祝贺，根据自己的个性，当然，昨天^③不能表达这种祝贺，而只能以某种普通的形式表示。事实上意思已包含在一系列具体的回忆中了。

首先是1895或1896年。我们准备去参加在高级妇女讲习班的会议，在那里得悉“奥尔登堡院士，女学生的朋友”要参加会议。关于这位院士伊万·米哈伊洛维奇^④在交谈中对我们说：“我在年纪很轻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多么令人喜爱的青年，真的是一位令人喜爱的青年！”这句话使我对您的形象有了总体的认识。

而当我们在那天晚上看到您（那时所有“生活的印象”是如此之生动）时，您以迅捷的步姿走到您的位子前，这种敏捷的动作与“院士、常任秘书”^⑤的称呼不相符合。这一动作与“青年人”这一名字更相配。在这方面既有点扫兴，同时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魅

① 奥尔登堡，谢尔盖·费多罗维奇（1863—1934），著名的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作者老师（格列夫斯）的朋友。

② 奥尔登堡的妻子。

③ 1933年2月1日在科学院的会议厅里举行了庆祝谢·费·奥尔登堡从事学术—社会活动50周年纪念会，1933年2月2日在列宁格勒学者之家——举行了“茶话会”。

④ 即作者的老师伊·米·格列夫斯。

⑤ 实际上，奥尔登堡是1900年当选为院士的，而1904年才成为科学院的常任秘书的。

力。这种魅力以特别微妙的色彩加深了讲习班时萦绕在我们这代人心目中对您崇敬的光环。

由于在科学院发表我的学位论文一事，1915年我与您有了往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此事的关心态度，您对此事的推动。

极不安定的、满怀激情的年代来了。革命似乎没有被我们立即接受，至少没有被当时的我们所立即接受。我和您被相提并论不是根据“层次”，而是根据“源流”。它，革命，认为需要“摸透”我们。我记得我和您深夜3点被叫醒谈话，我们在什帕列尔诺街房子里的长凳上遇见的情况。^①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等待的时刻。

您疲倦、面色苍白；您有一张特别稚嫩的、几乎是一张孩子的脸，穿着软翻领的西服便装。1921年，这一幕被遗忘了。您被叫去从事一些宏观的工作，我则做些细小的工作。在保卫我们的西方手稿过程中我又和您相遇。这是些美好的、尽管又是令人有些不安的日日夜夜，美好的是我们那时已经深深地和坚实地与革命融在了一起，革命相信我们，它给我们的工作无疑是我们能够胜任的。在沃伊科夫^②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动作迅速的青年”）的领导下工作进行得很好。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同事们充满亲切友好的感情。革命使我们大家青春焕发，通常您比我们大家更年轻。

在最后一次去莫斯科的回程路上，我和您乘坐同一个包厢。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布劳多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彼尔加蒙特^③

① 1919年9月2~20日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在彼得格勒什帕列尔诺街判决前羁押的房子里。奥尔登堡也在那里。

② П. Л. 沃伊科夫是与波兰进行手稿谈判时的苏方代表团团长。谈判的专家委员会除了С. Ф. 普拉托诺夫、И. Э. 格拉巴尔和其他一些人外，还有奥尔登堡和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③ 布劳多，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1864-1924），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列宁格勒）副馆长。彼尔加蒙特，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1866-1932），法学教授。他们也参加了有关西方手稿的谈判。

在上铺打瞌睡，他们两位已经去世了。我和您谈了很久很久，交换对革命和波兰争论以及文学的感受。谈话涉及到尼采。您认为他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因而不同情他。我向您提到我喜爱的一段引文：“生活中有那么多燃起来的太阳，那么多没发现的岛屿，让你们的船去把它们寻找，把它们寻找。”这一思想突然鼓舞了您，由于激动您在评论这一思想的同时说了那么多，不仅说到好的事情，也说了令人惊异的事情，说到了未来，也说到了过去，其中您特别亲切地回忆学生时代的印象，还谈了我们（我）这一代人。只是半年以后我事后才明白，这一次青春的振奋不仅和您对生活 and 革命的信念相关，而且和您个人命运中某种日益增长的美好的方面相联系，因为那以后您很快结束了单身生活。当您为此美好方面谈到我们这一代学生时，您当然想到了在您旁边成为朋友的人。

在毫不掩饰地暗示这一点之后，我想举杯为叶莲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健康干杯。但是，当然，我不能使这一祝愿付诸行动。

当2月1日，您坐在台上的时候，我对纳塔利娅·叶戈罗芙娜^①提到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关于您像个青年人的话。那时您的外貌年轻多于老成。而前一天我们的熟人弗拉基米尔·利沃维奇·达舍夫斯基向我表示对您的疲劳过度感到忧虑，说应当“制止”您，我想起涅克拉索夫的话：“别为这种疲劳的人担心，让他走下去”，他的预言是“当你在路上走时，你就能够生存下去。”对于您和叶莲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来说，我们一直相信，你们的这种内在的不停顿的内心活动及与此相联系的长久的光辉灿烂的生活就存在于这内在性里面。

您的诚挚的 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① 维尔纳茨卡娅，纳塔利娅·叶戈罗芙娜（1861—1943），科学院院士B.И·维尔纳茨基的妻子。维尔纳茨基、格列夫斯和奥尔登堡从大学时代起就是好朋友。

№03313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克雷连柯的信

(1933年2月8日)

亲爱的同志！

在对全卷进行编辑时，为了全书的完整统一，我们不得不把您那一章的若干材料抽出用于其他几章，并用一些新的材料补充您那一章。鉴于我们的工作是集体的劳动，在一卷内部我们就不准备注明各个章节的作者。不过将说明，全卷由克雷连柯、斯捷茨基、曼努伊尔斯基等等同志撰写。此外，将指明总编辑委员会的构成。

恳请您看一看《十月革命在前线》一章，全卷校样将给您寄去。

祝一切如意。

总编辑委员会 高尔基

Nq03314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 编写问题致明茨的信

(1933年6月29日)

亲爱的明茨同志：

鉴于题目的重要性，我极其仔细地读了第1卷中4章的手稿。请允许我同志式地坦率向您陈述我的印象。

当然，我懂得我读的是草稿，但是，按照我的看法，这一情况却特别令人信服地暴露出作者工作的主要缺陷。通常，在写草稿时，作者是凭着“一股热劲”，让自己的感情完全自由地表达出来，只有到了后来，在对草稿进行修改加工时才多少让“凭一股热劲”写出来的东西冷却。本来以为，撰写十月革命，撰写劳动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规模巨大而凯歌高唱的革命，本来以为，由这场革命的直接参加者亲自动手撰写的手稿初稿，应当特别有力地反映出胜利者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反映出在微不足道的短短15年里得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坚实基础的人们理所当然的自豪感。

既疑惑不解，又感到悲哀，我应当说，这4章的手稿写得“颇为勉强”、“心地冷漠”，带着明显的“不情愿”，似乎人们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课业。这是总的印象。不同人的文章也有某些差别。例如，克雷连柯写的就比别人生动一些，但是，他一开始就向读者声明，占有的材料极少或完全没有材料，如关于罗马尼亚战线和高加索战线就是这样。

他说：“关于这两处战线，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准确点说，材料是有的，但是必须把它们寻觅出来，加以整理和研究。”（他的文章中还是有一些关于罗马尼亚战线的材料）。显而易见，这项声明会使我们的书在读者眼里名誉扫地：既然历史学家告诉读者，他，作为作者的他，竟不拥有写历史需要的材料，那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呢？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这里提醒大家，我国国内战争的历史应当不仅仅只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的指南，它的国际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必须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现在，我再从事情的实质转向写作的形式。材料的文学加工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贝尔曼^① 那篇材料可贵的文章，在语言上却完全不行，我在他的手稿上已经作了标记说明。在他笔下，西伯利亚是一个“民族”，如同芬兰、乌克兰一样。某些列宁的引言需要加以说明。所有作者都滥用“插入句”，打断了句子的语流，破坏了句子的准确性，造成阅读的困难。不应当在文中援引诸如（谢德林作品中的）“巴拉拉伊金”这样的人物。我们的读者不知道，——这是谁？黑人、中国人、印度人等等，都还没有读过谢德林的作品。很可能，以后也不会去读。如果在历史中可以摘引杰米扬·别德内^② 的讽刺诗，那么至少也要简单指出国内战争时期他的诗从总的方面曾起过宣传鼓动作用。

在叙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作用时，作者们采用的论战语调时常不乏嘲讽的口吻。这并不能使读者高兴，而论述的分量反而会因而减弱。论战必须严格保持政论文体的严肃性。

作者对军人群众也有“描绘”，但并没有直接加以叙述，他们的行动是通过文件、决议、信函来表示的。在数以百万事例中只用

^① 贝尔曼，《国内战争史》秘书处成员。

^② 杰米扬·别德内，作家。

了两个。应当把这一批人写得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我极力推荐采用一些书籍的内容使他们生动起来，如沃伊托洛夫斯基^①的《沿着战争的足迹》、费多尔琴科^②的《战争中的人民》，及其他小说中的材料。完全没有提到军队各级委员会的管理组织工作，没有提到它们为了把伤病员从前线护送回来而同军需部门的斗争。

我没有到过前线，但从前线士兵同志们的叙述中我得到一个印象：随着肉体上的军事纪律压力的崩溃，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军队委员会中开始出现革命思想的纪律。这种纪律不可能不在管理组织工作和前线生活中反映出来。

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我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今天再重提“土地完全归农民所有”，以及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相同，是否合适？自然，如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说，“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我们的历史是还没有结束的作战的历史，所以我们，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的话说来，仍然处于“作战的队伍之中”。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的最为主要的和基本的真相所在。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无论是在谈到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加速它们的最终化为灰尘。

最后，作者们大量说着相互重复的话，这当然必须纠正。

正如我所说：个别文章未能达到我们的读者所需要的那种力量

① 沃伊托洛夫斯基，列夫·纳乌莫维奇（1876—1941），作家和批评家，参加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其作品《沿着战争的足迹》获得了高尔基的高度评价。

② 费多尔琴科，索菲娅·扎哈罗夫娜（1880—1959），作家，其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

感人、前后连贯、叙述明确的要求，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才能使《国内战争史》发挥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作战指南的作用。

因此，这部历史的每一卷应由一个人进行加工。

马·高尔基

No03315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不早于1934年4月1日)

致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同志！

3月20日，编辑委员会的秘书给我送来了国内战争史的第1卷。这一卷主要讲述的是十月革命的历史。一项巨大的工作完成了，对于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时刻之一，首次写出了一部综合性著作。其中有许多新的和有价值的资料。

我通读了全卷，指出了若干具体问题——意见写了14页之多。这里只谈谈主要三点。书中有重复之处，这是因为作者们未能看到本章节前后的文章，各人按计划自行撰写所致。若干论述不够明确。作者们往往忘记了我们是在编写一本行动指南，是在编写一本供世界无产阶级使用的关于武装起义的教科书。

各章节常常是“没有人物”。没有反革命组织者的肖像和传记。克伦斯基、切尔诺夫、帕利琴斯基、萨温科夫、唐恩、策烈铁里、齐赫泽、叔尔根、里亚布申斯基、古契柯夫——都不是大人物，但是在黑暗之中，一支无足轻重的脂油蜡烛也能照亮。正是要利用他们来照亮策划者们的反动黑暗。

在一些章节中，事件的进行没有人物的参加。但是，应当设想，在这些事件中，譬如个人的才干或庸碌无能，充满革命的真诚或为人卑劣，有时毕竟起着显著作用。

要说明这种素质不同的作用，只要回忆一下在同一时期活动的人物就可以了，例如：天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费奥多尔——也是伊里奇——唐恩。

在克伦斯基时期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是“人民社会主义者”、经营纺织品的百万富翁季托夫，他生性蠢笨，对粮食贸易一窍不通。至于克伦斯基，以及像李沃夫、米留可夫等人则无疑可以对他们的言行作一点简要的述评。

把社会革命党人分成三种，没有提供充分的根据。我特别坚持要介绍社会革命党人，正是因为他们想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即大多数居民的政党，而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某些地方对历史发展前景说明得不完全准确。例如，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性错误，就应当准确采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也有的地方尚未加工完毕。例如，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孟什维克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其动机并未得到清楚的解释。

这只是就实质问题提的一些意见，而在文字形式上也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事情。

总的印象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卷在翔实珍贵的材料基础上撰写的书。现在还需要做的，就是解决上面我指的那些意见（以及布勃诺夫和斯捷茨基两同志的意见，如果他们也提出来的话）。余下的工作无疑要由我们秘书处来完成，不再把原稿退还给作者，——不然出书就要推迟很久。此外，我还建议指定三名文学家坐下来加工，他们是弗·伊万诺夫、帕夫连科和尼·吉洪诺夫。^①要让他们读一下这一卷书，从文字上整理一下，如有必要，在事件的叙述上再

^① 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维雅切斯拉沃维奇（1895～1963），作家，中篇小说《游击队员》的作者。帕夫连科，彼得·安德烈耶维奇（1899～1951），作家，国内战争的参加者，1924～1927年为驻土耳其商务代表处的秘书。吉洪诺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1896～1979），作家、社会活动家。

生动些。这项工作要和明茨一起进行，以免发生错误或在某些地方歪曲政治内容。完成这项工作，给他们 20 天时间就足够了。

如果您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就对编委会的记录做出批示。

通过我们秘书处 2 年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对其组成作一些调整。塔尔^① 同志和贝尔曼同志，看来因其他工作过重，绝对未给予我们任何帮助。托夫斯图哈和埃德曼^② 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想，按我提出的名单组成秘书处完全可以保证工作：这样更灵便一些，工作能力更强一些，同总编辑委员会的联系也会更密切一些。

高尔基

① 塔尔，党的活动家，1931 年起为《真理报》编委会成员，1935～1937 年联共（布）中央新闻出版局局长，《国内战争史》秘书处成员。

② 托夫斯图哈，伊万·巴甫洛维奇（1889 - 1935），1913 年入党，1922 年起为总书记的第二助手，从 1931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副院长，从 1934 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埃德曼，罗伯特·彼得罗维奇（1895 - 1937），1932～1934 年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被镇压。

No03316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不早于1934年11月1日)

捷谢里自然疗养地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寄上《国内战争史》第1卷。将它拼版打样只是为了便利总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阅读，但是，当然，可以划去任何一个段落，任何一幅图片，而并不会提高成本和增加印书的困难。

急切请求您和总编辑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尽快读完。写这一卷花费了很长时间，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作者们忙于其他工作，还在于他们对于这部《历史》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这正是“辩证法”！——“有祸必有福”，在编写这卷最为困难的期间，秘书处为以后的许多卷次准备了材料，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文件，编纂了国内战争详细地图，总之做了很多有益和重要的事情。我特别赞赏明茨同志的工作，他真是一名对于承担的艰难工作异常忠诚的模范工作人员。订购这部《历史》的数字已几乎达到20万册，而红军还没有开始预订。第一版看来需要印行25万册，我因此恳请您通知托姆斯基^①同志，

^① 托姆斯基（叶弗列莫夫），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1880～1936），1918～1921年和1922～1929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1930年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从1932年起任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总经理，后来自杀身亡。

要他设法防止印刷延误。

十分激动和不安地等待您和其他总编委会成员对第1卷的评价。

我本人，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认为第1卷是成功的。以后的各卷次自然要容易一些，也会完成得快一些。不过，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容易和迅速，而在于准确恰当而又形象生动地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讲述他们对于敌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神奇的胜利。

如果这本书是在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的事件^①之前问世，那该多么好啊！

我觉得，时间在要求我们加快《国内战争史》的出版。

衷心地祝您身体健康。

马·高尔基

这里天气真奇妙：一直是暖和的晴天！

^① 指的是1934年2—10月奥地利、荷兰和西班牙所发生的工人与警察、军队和法西斯新编部队的武装冲突。

№03317

高尔基关于《国内战争史》编写问题 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4年12月9日)

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

开端成功：国内战争史第1卷的工作已告结束。我觉得就这样拿给群众看，我们不必羞愧，从征订情况判断，群众早就在期待这本预告过的书了。已约有20万人预订了这本书，不得不停止征订，而红军中征订还没有开始。我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希望我们也实现了：本书附有大量图片，而且大部分照片和插图都是专为这一卷而订制的。

恳请您抽出时间读一读这一卷。可以删去任何一段和增加任何改动：我们将这一卷拼版打样，只是为了审读方便。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从明茨同志那里得到说明。

我们正继续进行其他卷次的工作：总得在新的战争爆发前出版旧的战争的历史。

紧紧握您的手。

致以敬礼！

马·高尔基

No 0439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信件问题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①的信（摘录）

（1935年2月2日）

……这几个月我姐姐希望（要知道她自己不能读了）我给她读过去40年来往的信件。她的信写得特别好，出神入化，带有一种微妙的幽默，绘声绘色。我和她共同相处的过去，一些逝去的人的形象重又复活了。我给她的信则更复杂和不易理解，但其中许多主要是我过去的和在巴黎的经历。这“一包”亲人的信保存在我姐姐那里，一般来说，也是保存在我们那里。

“友好”信件的命运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步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三次“探访”时，我的这些信件的大部分都被搜走了，各个角落都搜遍了，搜到的都被拿走了，没有交还……这些我那时保存的信件会对我的通信人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不知道。可能，甚至可以设想，会很糟。没等第四次“探访”，为避免任何进一步的调查，我把所有留下的烧了，后来把所有收到的也都烧了。新的造访只能在我那儿找到几只空空的抽屉……

现在造访已经停止了几年……但是我不再保存朋友们的信件了，我反复地读几遍，对信从头至尾逐行进行研究，然后就把它毁了。您应把这封信毁掉。^② 只有业务上的和纯学术方面的信才敢保存。现在对我来说，亲密朋友中的任何人受到怀疑都是难以忍受的……

① 彼特卢舍夫斯基，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1863～1942），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院士，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的朋友

② 档案原件这句话是用德文写的。

No05118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就巴赫京问题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5年2月2日）

……我的学生巴赫京的命运很久以前就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成了我的心病。我早就把消除这块心病作为自己的任务，我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一切，目的要把他从国外局的科学工作者的处境中拉出来，在那里他碌碌无为，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经济学家”的岗位上了。

No 11682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5年2月26日）

……到莫斯科去，以报告来解释自己的这次出行——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目的是在 Д.С.^① 的帮助下到什么地方去通路子（到布勃诺夫^② 那儿去？）并要求什么人给巴赫京弄到身份证。他正是我自认为最重要事业（古文字学、批判史料学等等）方面的惟一的真正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不能被确立为我的助手和副手，那么这方面的事业就不能继续。

^① Д.С. 是作者的丈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②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1883—1940），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后被镇压。

№05117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
致布尔斯基^①的信（摘录）

（不晚于1935年3月1日）

……他（巴赫京）1934年秋提前解除来列宁格勒的限制，在那里口气很硬地答应给他身份证，说一系列机构（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文史哲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的书籍、文献及书信研究所）会接受他，给他工作的，有人对他说，身份证“几乎已在他口袋里了”。可是，在2月份（就“清洗”来说这已是困难的时日^②）他去问到底什么时候才发给他身份证时，却又遭到了拒绝。他不愿在这非常复杂的时候拿自己的处境去冒险，便去了加里宁，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位置……

① 布尔斯基，梅齐斯拉夫·伊里奇（1903—1944），30年代一系列农艺学史方面的集体著作的组织者。

② 指基洛夫遇害后列宁格勒的形势。

No05121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格列夫斯情况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5年5月6日）

……您问到关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①和关于姐姐的情况。对前者我可以告诉您一些令人苦恼的事情：我们在这两个月所经受的一切也对他的肉体和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许多亲近的人和亲人离别；我们中世纪史学科中有太多的位置空缺了，失去了不少可贵的、或者是不错的、至少是非常需要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损失、离别和送行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破坏……

^①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的老师。——格列夫斯

№03318

明茨关于《国内战争史》 编写问题致加马尔尼克的信

(1935年8月19日)

亲爱的扬·鲍里索维奇^①！

8月6日，举行了总编辑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同志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向与会者解释了他对《国内战争史》第1卷作了哪些修改，以及为什么必须作这些改动。这些改动的总的性质在于，准确性、简洁、以及所有表述都必须完整。有一些改动是理论性的，有一些补充是事实性的。某些修改的篇幅超过了一页以上。

关于总的印象，3天以前就告诉了我。早在8月3日那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就喊了我去，说了以下的话（逐字记录）：

“我通读了全卷。依我看，前16章应当分出来作为单独的一卷，作为《国内战争史》第1卷出版。据此，我提议删去关于对外政策的一章……”

我打断说：

“这一章是拉狄克写的。”

“这并不重要，这一章无论从文风还是从材料的丰富程度，都同全书不相适应。它很抽象，其中一般性的论述很多。我们能否在哪里集中一下，由我来讲一讲这一类的工作？我不是阅读，而是审校了一遍。想想看，这是多大的工作！”

^① 即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

从这次简短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这一卷是得到肯定了。

8月6日，会议就这样开始了：斯大林同志相当严肃地走到桌子边，迅速打开书，就说了起来：“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我们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编写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更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向千百万工人和劳动者解释清楚，为什么欧洲革命未能成功，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成功了，而且并未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我要求很严格。”

我不隐瞒，听了这几句话后，我开始慢慢地向桌子下面缩进去，但是，唉，我不得不坐得更近一些，并认真看着书。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下去：“这一卷应当分为两个独立的卷次。把16个章节归入第一卷，直到起义爆发时为止。我建议把这一卷或者称作为《准备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这里哪一个更自然一点？”

阿历克塞·马克西莫维奇^①回答说，第二个更自然一些，但它不完全符合俄语习惯。克利门特·叶夫烈莫维奇建议保持《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对此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反对说，这样文学气味太多了。有人建议这一卷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斯大林同志反对说，这样自发性又太多了，完全没有人为因素。

“总之要定这样一个题目，让人感到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从那个时代的各种条件发展而成的，但是这个题目又要让人感到革命是由我们党领导的。”

最后建议暂时先用《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同时再考虑一个真正的题目（顺便说一说，会议开过的两天以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又一次打电话来，问是否想出了这一卷的题目，后来

^① 即高尔基。

得知我们还要对第一卷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加工，他回答说：“好吧，还有时间考虑。”）

此后，审校人开始对自己的每一处改正加以解释，而几乎每一页上都有修改、增加和改动。简单说吧，我们花了 3 天才把改正意见转抄到别的书上。

对这一卷的总的评价是：“书写得很好，简洁、易懂，有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第二次又说：“工作干得不错，书读起来像长篇小说。”

建议出版此书，印数为 30 万册，同时翻译成 3 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同时保留一切装帧形式。其他各卷均以第 1 卷为蓝本。

总之，我们工作的一个重大阶段就此结束。我承认，在我个人的工作中，某一个阶段也告结束了。

为您在工作过程中给予的热情、殷切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觉得我部分地没有辜负您的关怀。

祝一切顺利！

伊·明茨

No03319

别尔津^① 关于《国内战争史》内容问题 致该书总编辑委员会

(1935年12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国内战争史第1卷中,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我被放在和一些原联共(布)中央委员同一列之内,这些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中两名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即已沦为工贼,而其他人后来都变成了叛徒和反革命坏蛋。

我当然丝毫也没有想过,这组名单的编纂者有意把我在政治上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一伙人等量齐观,而我无论在1917年,还是在后来,同这些人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现在毕竟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把我和他们同样看待了。许多不知道我的政治历史的人真是会这样来理解的。当把这伙人同四月代表会议上选出的那一批中央委员相对比时,这种结论就特别难以摆脱:那里最后一排清一色全是工贼和叛徒。

我请求总编辑委员会对上述由六大选出的十月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排列作一些变动。因为这部好书的第1卷尚不普及,实际上这样做还是可以办到的,而且我看这样做并不困难,是打不乱整个排列

^① 别尔津,扬·安东诺维奇(1881~1938),1902年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1919~1920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自1921年起为驻芬兰全权代表,1925~1927年为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17~1918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1938年被镇压。

的。例如，如果把第三排的人稍靠紧一些，那就不难把，例如，诺根^①同志放进去，而我则可以放到他的位置上，这样就把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完全孤立起来了。固然，这样的话，我的近邻将是右倾分子，而我在革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也都不曾与他们的机会主义动摇有过任何相同之处，不过他们现在也是形成明显的一组，因为在这排中也还有像阿尔乔姆^②这样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而且如果总编委会认为有可能按照我的意见改动，那么第四排的性质又会有所改观。

我期望总编委会接受我的要求，并设法把我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一伙分开。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扬·别尔津

① 诺根，维克多·巴甫洛维奇（1878～1924），1898年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任工商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成员。

② 阿尔乔姆，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1883～1921），1901年入党，1917～1918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州委书记。

No05119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巴赫京问题
致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8月9日）

关于“费尔干纳计划”^①我知道，如果巴赫京能到那儿去，我会感到很幸运。这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加强”，也是他返回到科学职业上去的一个步骤。我只担心，他的宗教信仰会使他拒绝给他的这些机会，我这半年努力的结果，大概也会因宗教信仰而化为泡影。从他自己来说，他当然是对的，对他来说巴黎用不着做日祷。

① 在费尔干纳师范学院（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教师要求开中世纪史课。

No 05122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自由和 真理问题致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8月9日）

……至于实质性的、伟大的和重要的东西，其面貌改变得当然也非常大，非常彻底和非常深刻。对我来说实质性的、重要的和伟大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它更多地是在彼岸，而您通常、而且经常是很不正确地将受谴责的评述归入彼岸。然而，这些评述应当不针对一大群人，而是针对一些渣滓，不是针对本质（也是“实质性的、重要的和伟大的”），而是针对无成效的、早期的，有时是庸俗陈腐的实现。

在“科学”里（尤其是在西方的历史科学里）难道真的充满着“自由和真理”？就是我亲爱的朋友 M.F. 罗特^①（兰格鲁阿则更自由和广博）难道没有把倾向性的修正意见加进我的著作里？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根本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真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真理。现在当然没有。但这也是很困难的……

^① 费尔迪南德·罗特（1866～1952），法国的中世纪史学家。他和沙尔利·维克托尔·兰格鲁阿都是多比阿什-罗日来斯特文斯卡娅在巴黎的老师。

No 11683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信念问题致格列夫斯的信（摘录）

（1936年9月19日）

……我不再相信上帝，无论是人，还是“统治力量”——个人的力量，无论这力量是在世界之外，还是散布在世界上……我不相信任何绝对者，他不过是我们思想的产物。“一切在流动”。我不相信道德制裁的绝对力量。伦理道德是我们精神工作的产物，它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其力量、其健全性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它们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我，使我敬仰，它们创造了最好的伦理道德，走向“活生生的人的上帝”的崇高形象，伴随着迷惘、伴随着失误。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在自己总的、正确道路的方向中，我诚挚地和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昨天的“唯心主义”的弱点，我觉得它格格不入和过时。

但是我看到一种可能性（在彼岸），把它的一些好的成分和正在锻造、还远未形成的世界观（现在它在很多方面可能遭到残酷性的破坏并为肮脏的手消灭）融合起来。在“新岸”的优秀的人们正在寻找它，而且比旧岸寻找的人们更加充满热情……

No05123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中世纪书信史》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6年10月19日）

……我现在不无伤心地自己骂自己，我（几乎是大概?!）没有寄给您夏末出版的我的书信史方面的那本小书^①的第二版。现在寄给您一本。在书中（因赶在课程开始前匆忙出版，以供我上课用和我的几个学生用）有许多印错的地方。在给自己朋友的几本书里我发现的都改正了。

但是，这本书，似乎，有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还是有一些严重的事情，威胁着我。有人“友好地”告诉我，我的前言（第4页，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两篇前言都请读一下，其余的想必都不去读了!?)引起对作者的不良“议论”，认为作者“在西方科学面前奴颜婢膝”，有点儿像是“卢津^②之流”。这样，警惕性笼罩着我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于是我以相应的愉快的感情等待着近期有某一位警惕性很高的好汉在某篇书评里对我的书肆无忌惮地评论。应当这样，因为所有这警惕……

① 指作者的《中世纪书信史》。

② H. H. 卢津（1883—1950），著名数学家。1936年曾遭批判，指责他藐视苏联科学，而在国外发表著作。“卢津分子”成了战后“卑躬屈膝”和“世界主义”的同义语。

No 05124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新年贺信（摘录）**

（1936年12月25日）

最尊敬的和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

新年就快到了，在这季节变换和人类生活转变的美好时刻，我谨向您问候并致以衷心的祝愿。我恰恰要在冬至日讲授关于中世纪起始点的课程，要援引普罗科皮奥斯著名的片断，如“35昼夜之后图拉的居民们爬上山峰，欢迎来临的太阳……”，还有布尔哈尔德·沃尔姆斯基的问题集：“在1月的朔日根据多神教的习俗你是否爬上屋顶，把剑佩在腰带上，看到和了解到，在未来一年中你将面临什么？”

那么，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我在想象登上普罗科皮奥斯这座山或者布尔哈尔德·沃尔姆斯基的这个屋顶，我感觉到自己“把剑佩在腰带上”。在世界每一根神经的颤动中我感觉到战争将要来临。在这种情况下，亲爱的朋友们在1月的朔日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朋友们得到梦想中的：希望这一可怕的战争尽可能的短，希望我们经受住这场战争，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不知怎么我相信，那样的话将最终真的重新锻造剑和犁，而这不仅在直接的物质的意义上，而且更为内在：那样的话不仅“民族的纠纷”消失，而且任何敌对的理由，在一个民族中间的猜疑也消失；随着多余而渺小、凶恶的告密者这类臭不可闻的人（不是那些

必不可少的、需要的防卫真正敌人的卫上，而是那些骑在我们脖子上和喝我们鲜血的奉承拍马之徒和走狗，有时他们后来成为真正的敌人）的消失，和谐与和平就将来临。这一切我们会看到的……在我们的年代，无论是“新的幸福”，还是“新的健康”都已经谈不上。但是在希望新的世界有新的幸福的同时，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这新的幸福，并且最大限度地维持原有的健康状况。我衷心地祝愿您健康和精力充沛，亲爱的朋友。

No05125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就自己的心情状况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年3月7日）

……我已经不再怜悯和愤怒了，而是平静地看着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感觉到在这“复杂费解的东西”里——青春逝去的可怕征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直接意义上心灵，已经不再和怜悯还是愤怒，于是不由地做出自卫的姿势，用淡漠的枕头来作掩护……

№05126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对她的“控诉”问题致科马罗夫的信
(1937年4月3日)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①！

我内心极为愉快又无限忧愁地感到必须给您写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您的话里，从许多参加者的叙述里，通过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我感觉到您以完全鲜明的立场为我，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女劳动者所进行的坚决、有效的驳斥。

忧愁的事，这也是需要的。

当然，甚至像《中世纪书信史》这样远离现实的书里，读者应当看到暗示：在这里一个辉煌时代的起飞为自己的翅膀所伤及。仿佛，把新经济政策开始时的时代（放在新的第2次印刷中的第1版序言）与我们时代的欣欣向荣（放在第1次印刷中的第2版序言）相对立——这更加合理和鲜明吗？什么能更令人鼓舞？我就是这样感觉的。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请您读读两篇序言，我请求您。难道我是如此的不正确？

使我特别气愤的是指责我是“卢津之流”（对我书里用红笔标出的有关研究所1936年总结说明的正式称呼）。我感到不解和伤心的是，H.M. 卢金院士怎么能在普通的礼貌中看到某种被指控的东西。4位学者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表示感谢），两位已到

^① 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科马罗夫，苏联科学院院长。

75岁，其中最老的，古文字学“先生”84岁。

我对这些牵强的攻击极为伤心，我一次次重新翻阅自己的书，同时，我毫不谦虚地不由得想道：“你们，现在的人们，哎！……”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我冒昧地把自己的书寄给您，恳请您看一下书中头几页标出来的地方。我非常不愿意您对我的学术活动、对我对我们经历的伟大时代的真挚和景仰留下不正确的印象。也许，您还翻阅书的其他地方并在那里找到某些不无兴趣的东西，甚至是对很少有共同点的专业的学者来说是新的东西。

衷心感谢您！

致以深深的谢意！

奥莉加·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11684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对她的
“控诉”问题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

(不早于1937年4月4日)

最尊敬的和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

昨天我曾给您写了封信，这封信（在某些部分）后来觉得是不对的或是不确切的，这就是第5页和第6页上所说的部分。于是我考虑怎么办，把它全毁了再给您写封新的信？可与此同时在这里真实与不准确的消息如此紧密地缠在一起，而这“不准确的消息”中的部分又是如此的准确，以至于好像还是值得对您说。要说，但是要更准确地补充和限制。但愿您“历史地”来接受这一切，就像我那样接受。因此，如果您愿意，先从2~3页读到第6页，然后再回到第7~8页的背面，接着这一页再往下读。

1937年4月2日

最尊敬的和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

现在我想向您略微谈谈我自己。

眼看已经有3个月或4个月了，从各个不同方面，有时轻一点，有时重一点，“不时地咬”我。我觉得，甚至几乎是毫无疑问地，这“咬人”（在党的圈子里）是由其他学派引起的，也是发生在党的圈子里（特别在妇女中间），在那里似乎要将“被咬”的科学院院士候选人问题像“通风换气”那样进行讨论。关于这，当然，绝对是在我们之间。这“通风换气”有时活跃热闹，有时静止

下来，因此“咬人”也时而热闹，时而平静。

说真的，“咬人”是非常软弱无力的。但毕竟还是不太愉快。已经第三次在这里的历史—考古研究所^①提出一个问题（也许它必须提出，但很少受到敬重。B. И. 格列科夫，他作为主席，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尽管看来这是很容易、很自然能做到的，而且甚至是他直接的职责）：“在你们研究所里有没有危害分子：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有一个着实不文明的人物第三次站出来，他就是“学术秘书”斯彼尔钦科，他声称：“这样的人有，这就是：奥·安·多—罗^②，此人有罪，在自己的《书信史》的序言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在另一次是‘卢津主义’）表现。”

指控的地方有：1）在第9页上，“在我们时代，人们匆匆而过，书却留下了……”，应该说，任何一个听到这话并保持沉默的人都能明白，这与托洛茨基主义、卢津主义有什么相干，或者一般说，有什么过错？但大家都不做声。另一地方——第4页倒数第二段：感谢西方古文字学的4位艺术大师，特别要感谢我们学科的“先生”林德赛等等。看来，不喜欢“艺术大师”，更不喜欢“先生”，很明显，报告人不是把他作为“老者”（林德赛84岁）来理解，而是作为西班牙的先生或封建的先生、西班牙大公或诸如此类的人。

可见，这是“不学无术的人”——缺乏理性的、无知的人说的话。主啊！原谅他吧。有几位比较理智的人支持这种事情（那时），

① 1931—1936年在列宁格勒有一个苏联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B. И. 格列科夫院士是历史考古所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历史考古所和共产主义学院合并后组建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金院士任所长，而格列科夫任列宁格勒分所所长。1938年初卢金被捕后，格列科夫任历史所所长。此处作者仍按旧名称称呼。

② 即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他就是班特克^①，也是“学术秘书”。不过，在他发表意见后一个星期，他（班特克）被清洗出党……但一些最有理智的人却默不作声，一言不发。这未必值得称赞。

这一情景又第三次重复。最无知的人已经成为“积极分子”——在历史—考古研究所年轻的党的副所长的主持下，他受充满警惕性心灵的嘱托的驱使，再一次提出指责……

然后又是第4次重复。在莫斯科召开的历史研究所会议上，历史研究所所长 H.M. 卢金在科学院主席团面前提出指责——不过形式更为谨慎（“与卢津之流相似”）……我不能不说，有时候是多么伤心地感到遗憾，在这些重要的场合，朋友们和同事们受到对他们来说不无危险的伤害时，却没有一个朋友、专家和科学院研究室的负责代表能够说一句理智的和有分量的话。

幸运的是还是有人说了这话。И.А. 奥尔别利猛地站出来说了话。但院长^②说了话，他制止了发言人并教训了他。他说不知道我的前言，无法对此处理得很确切。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说他做得很好，而我为此也深深地感谢他。

但是我并不打算到此为止。我打算寄一份声明到主席团去（特别要对院长表示感谢）并向卢金“挑战”，在这里附上“挑战”书的副本。我想（但不会再采取专门措施）让对这一切负有直接责任的人^③亲自感觉到这一点。要让挑起警惕性的人，默默地接受“不学无术者”的报告的人，还有，很显然，为了表现出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而把所有材料转交给研究所所长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

① 班特克（1888—1937），历史学家和党务工作者。1936—1936年主持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工作。从1936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学术秘书。1937年被捕。

② 指 B.И. 科马罗夫。

③ 指格列科夫。

当然，所长也对表现出来的高度警惕性的情况非常高兴……

4月4日

而现在请读第7~8页、那儿有反驳。

是的，亲爱的德米特里·莫伊谢耶维奇！由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有参加，而是凭人们告诉我的情况。那么现在当参加者已经做出进一步解释之后，我看，我被告知的情況不完全正确。在我们的城市里，在历史-考古研究所的会议上确实，正如许多参加者告诉我的，我采取的上述措施遭到指控……但是大家认为（原来是）指控的人自己引证得不正确。支持他的那些人更多的是指另外的事：那第2篇（按时间是第1篇）先在第1版上发表并在第2版上引证的旧的序言是为了表明12年来变化是那么的。但是尽管序言是为此而发表的，然而，结果是当代的一位党员的感情无法忍受它，尽管他难以直接指出罪行的内容……

由于这一“指控”的不明确性，我真的变得极为困难。于是我，大概（也许，不，但这应该考虑），会拒绝书面“抗议”和“挑战”。正如大家所说，一切（在莫斯科）是如此的沉寂，与此同时院长又是如此明确地提出异议，以至于我被困在这种不是在我面前发生的、不是我亲耳能听到的某种不明朗的事情上。也许，我将再沉默，因为我不知道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忙于撰写《克雷莫纳法令》的绪论。对这篇绪论也是无休止的喧嚷和改写。我们既无法和出版者（安宁斯基），也无法和“助理编辑”（奥尔洛夫）达成一致和签订协议。而一旦（如果）我们达成一致，卢金或乌达里佐夫^①或者还有谁也将不会同意。“老

^① 乌达里佐夫，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1883~1958），历史学家，193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鹰吻鸡”（鸡也就是我的绪论）吻到最后一根鸡毛，就像精耕细作农田一样。

祝您健康，亲爱的朋友！衷心地拥抱您！

您的诚挚的 多比阿什—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No03112

卢金等在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 党的公开大会上的发言记录（摘录）

（1937年5月5—6日）

卢金：同志们，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的编辑，在和你们谈我们杂志的未来前景之前，应当先讲讲它艰难的去。

你们清楚地知道《真理报》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表的文章和小品。^①出发点应当是：由于该杂志责任编辑政治上盲目无知和粗心大意，杂志出现了绝对无法容忍的状况，《真理报》对此做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对1936年末以前杂志的这种状况，责任编辑自然要负全部责任。

你们知道，在一段时间里，人民的敌人弗里德兰、达林、弗罗洛夫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里不受监督地胡作非为，他们挤进了杂志编委会，主持它的各个栏目，其中包括批评专栏、书刊简介栏和新闻栏。另一方面，最近两年来杂志曾刊登过人民的敌人皮翁特科夫斯基、瓦纳格、托姆辛斯基、季霍米罗夫的文章^②，后来他们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这些卑鄙的两面派在意识形态上服

① 指1937年3月15日和20日《真理报》发表的不署名的短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的愚蠢毛病——粗心大意》和费奥多罗夫的文章《政治盲目性和粗心大意——1936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

② 指皮翁特科夫斯基的文章“密探处有关1774年农民情绪的档案”（1935年第7期）和“密探处资料中的1775—1795年农民起义”（1935年第10期），瓦纳格的文章“关于沙皇俄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的问题”（1935年第10期），托姆辛斯基的文章“彼得大帝改革的意义”（1936年第2期），季霍米罗夫的文章“有关豁免权在封建罗斯的产生和性质的问题”（1936年第3期）。

务于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破坏活动。用斯大林同志的话说，这是按外国谍报机关的指令行动的一伙疯狂的和不择手段的反革命破坏分子、特务和杀人犯匪帮。

但在人民的敌人被捕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并没有吸取这次惨痛教训，没有接受警告，也没能及时改组。责任编辑及其副手德罗兹多夫同志很少关心杂志。

首先是没做揭露人民敌人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没有发表一篇能让我们揭发像瓦纳格、弗里德兰和达林等形形色色卑鄙的两面派的文章，而与此同时这些破坏行为却照干不误。现在，当我们翻寻并查遍近两年的杂志，我们才摸索到一点东西。我可以引述恐怖分子弗里德兰这个人民敌人的文章，作为破坏活动的一个例子。该文刊登在1936年的一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文章题为《欧洲外交与布朗热运动》，里边满是标志该作者假学识的东西，充塞大量学术著作的附录，一眼甚至很难读懂；人们不得不检查每条引文，每一个摘录，那里边还有作者使用的各种捣鬼的伎俩，以求证明他所需要的论点。

恐怖分子弗里德兰在这篇文章中与希特勒的干将们遥相呼应，他们为了替德国法西斯反对苏联和法国的政策作辩护，伪造法俄关系史，认为今天的法俄互助条约，无非是1893年法俄联盟的直接延续；就像当年的法俄联盟旨在反对爱好和平的俾斯麦德国一样，现在的法俄互助条约也是为反对同样爱好和平的希特勒德国，如果希特勒德国武装起来，就足以自卫，就像当年的俾斯麦德国能够自卫一样。

在探讨作为法俄联盟前的历史时期的要素之一的布朗热运动^①

^① 指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以布朗热将军为首掀起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要求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燃起对德国复仇的沙文主义狂热。

时，人民的敌人弗里德兰妄图把 90 年代初的法俄联盟说成是对德意志帝国存在的直接的和非常现实的威胁，从而完全抹杀了俾斯麦政策的侵略性质。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并给俾斯麦的政策辩护，弗里德兰运用了各种手段。他首先通过忽略恩格斯的某些论断的方法伪造历史，恩格斯认为欧洲强国的对外政策在 70 年代以后一方面是由俄德矛盾，另一方面是由法德矛盾决定的：弗里德兰没有谈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而是塞给了读者另外两个矛盾：法德矛盾和英俄矛盾，闭口不谈俄德矛盾。然后通过伪造恩格斯的引语、删节一些有价值的地方、以及通过省略一连串论述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文件及现在德国刊物《大政治》上登载的文献，他试图要对事情做这样的论述：似乎在 1886 年，在布朗热运动的高潮时德国被夹在了法国和俄国之间，腹背受敌。但文献所讲的恰好相反：首先我们知道，1887 年曾签订德俄间的所谓互保条约，另一方面我们有德国大使瓦尔特泽的直接证据：他致信俾斯麦，在信中说，目前法国感到需要和平，凭它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敢对我们宣战。伪造者弗里德兰置这些直接证据于不顾。例如只字不提威廉一世与亚历山大三世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法俄的阴谋完全证明俾斯麦当时的挑拨性政策是正确的，掩盖俾斯麦在德国边境逮捕法国人施尼贝尔的狂妄行径。最后，他还歪曲这封信的涵义，以此将自己的结论塞给读者，即在布朗热运动处于高潮时期，德国有能力自卫，俾斯麦理应采取攻势，因为德国受到了威胁，它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这种观点与法西斯史学家如出一辙，今天他们正用来自苏联和当今法国莫须有的威胁，来为希特勒的政策作辩护。这就是破坏性作品的典型，我再重复一遍，由于缺乏政治警惕性，由于政治上盲目无知和粗心大意，这些文章被与法西斯史学家遥相呼应的弗里德兰塞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之中。

现在如果看看评论、批评和书刊简介栏目，在这里我们应当

说，我们杂志刊载的大部分文章都有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毛病。以捷尔维斯针对《德国和波兰》文集所作的批评性文章为例。该文集在法西斯德国出版，其中收录了18位各种类型的德国史学家的文章。这篇批判文章缺乏政治尖锐性表现在哪里？在于捷尔维斯在探讨德波关系时，忽略了我们今天特有的紧张的政治形势，他不从最近的德波关系着眼去分析这本文集，他完全没考虑下述情况：即今天希特勒政府就波兰采取的一切友善步骤和发表的声明，都是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友善步骤和声明根本不是要否认希特勒制度和他的政府恰恰是波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事实。

既然缺少这个坚定的立场，既然作者在这儿不是以今天业已形成的德波关系和最新的国际关系为出发点，那么他的评论本身也就丧失了政治尖锐性。

还有另一个错误。我说过，该文集有18位参加。作者把他们一股脑全当成法西斯分子。然而，参加该文集的还有这样几位德国教授，他们不适合法西斯制度的需要，他们现在已被解职，被当作敌人赶出了编委会，如格·乌耶格……等等。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法西斯分子，把所有这些混为一谈，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德国有一些教授正在犹豫不决，他们在考虑怎么才能不和希特勒的制度亦步亦趋，他们为此而被撤职。我们不应将他们混为一谈。作者在这方面，把文集的所有作者都一锅煮了。

我再讲一个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评论的典型。这就是多勃罗留布斯基对马泰兹的新书《执政内阁》的评论。马泰兹在这本书里修正了对巴贝夫^①主义的旧看法，试图证明，巴贝夫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评论者在分析中只字未提这种倾向是具有反革命性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派理论家和领导人，他主张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建立平等者共和国。

质的倾向。他不同意马泰兹对巴贝夫做这样的解释，但却没对这种解释进行政治评价。结果评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至于新闻专栏，特别是“国外史学”分栏，《真理报》当然始终都是正确的。在这里，由于编辑部在政治上盲目无知，的确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消息，报导在法西斯德国发生了什么，只作些资产阶级的客观说明，政治上软弱无力。了解法西斯德国发生了什么，这是需要的：为了与敌人斗争，需要了解它，研究它的文献。但问题在于如何提供这些信息？报导这些消息时几乎不加任何批判，不揭露法西斯德国通过报告、书籍等抛出的法西斯破烂儿。为这个信息部挑选材料的人，以平静的口气直书其事，报道各法西斯研究院的报告、摘要、再版的书籍，新的纲要、计划等等。结果是替法西斯主义大肆宣传。

所以当《真理报》说，这样一来，这些杂志就变成了人类和文明的凶恶敌人的传声筒，这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应当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除掉人民的敌人之后，该部乃未改变其面貌。还是由于这种愚蠢的毛病——粗心大意、缺乏警惕性——编辑部对这个专栏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编辑部继续墨守二流编辑为该专栏制定的陈规。

再者，我们同冒牌的法西斯历史学家和当代德国的伪历史观的斗争也很不得力。如果以1936年为例，那么在整个1936年里，我们只发表一篇鞭挞、或者至少是理应鞭挞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这就是卡巴克契耶夫同志研究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我们在该文中看到的是什​​么？很遗憾，卡巴克契耶夫没有从必要的方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宣传进行揭露。作者从法西斯的文献资料中摘录出大量东西，而希特勒分子则妄图通过这些文献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法西斯政府很关心工人和农民利益似的。因为作者没有批判这种厚颜无耻的法西斯蛊惑宣传，这就可能给经验不足的读者造成虚假印象，好像法西斯主义并不像被形容的那么坏。

在另一处地方，作者引证说，法西斯的议会主义被描述成是“波拿巴主义”，是受历史委托来代替正在走向死亡的、变成政治性的议会……。引述议会制的这些特征，引证法西斯政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恶意攻击，面对这种有问题的提法却不作尖锐的批判。结果造成下述印象，似乎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捍卫资产阶级民主遗迹和恢复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文章在政治上明显的软弱无力。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在介绍法西斯政治，而不是论述法西斯的伪教授和伪史学家。

1936 年历史学界并不十分关注法西斯主义。我们没在这里发表一篇文章。我们不曾揭露过希特勒的学者们伪造历史的情况，用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 7 次代表大会上的话说，他们改写了每个民族的全部历史，目的是按法西斯的方式歪曲历史，使之成为法西斯制度服务。

如果认真看看我们的同志（决非破坏分子）所写的其他文章，则我们仍应指出，在它们当中确实偶有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就说德罗兹多夫的纲领性文章《党和政府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决定和苏联史学家的任务》吧。这篇纲领性的重要文章，发表在我刊 1936 年第 1 期上。

应当说，《真理报》讲，我们与波克罗夫斯基及其流派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与实际上会导致我国史学毁灭的观点所进行的斗争十分不力，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但它也没有摆脱粗制滥造的表达方式。在这篇文章中，德罗兹多夫一方面说，而且十分正确地肯定了这一点，即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至死都没能掌握马列主义方法论；但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又断言，波克罗夫斯基完成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俄国历史观的任务。结果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能彻底粉碎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好像我

和你们在这里无事可做了。而实际上非常明显，正因为波克罗夫斯基没有掌握马列主义方法论，正因为他站在认为可能有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立场上，正因为他持社会学的观点并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忽略具体的历史材料，或者只使用一部分，所以他才不能彻底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俄国历史观。而那篇文章却说，波克罗夫斯基全力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史学，这又是不确切，又是粗制滥造的论述。因为，如果他不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他就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反对资产阶级史学。

班特克的文章《为建立法国共产党而战》则更不像话。文章提出了一个错误观点，说“法国共产主义小组是由被俘的士兵组成的……”（原文照读）。

作者一方面夸大在苏维埃俄国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战俘联盟的作用，夸大其在建立法国共产党的事业中的作用，从而忽视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国内力量，对其领袖如马塞尔·加香的活动估价不足，而他们早已开始在法国国内组建共产党。

可见，产生法国共产党的土壤首先是在法国国内准备好的，这个事实完全被班特克忽视了，几乎被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当他谈及这个在苏维埃俄国、在战俘中出现的国际集团的领导人时，他没有强调，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注意到下述情况，即该小组背着十分沉重的反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包袱。甚至被他推到首要地位的萨杜尔，在这方面也很突出。虽然萨杜尔在许多问题上打算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但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又犯了严重错误，其根源恰恰在于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包袱。

最后，在读这篇文章时你会感到，作者没考虑到下述情况，即他是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之后写这篇文章的。他对第二国际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那种态度，证明作者没有考虑到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给国际无产阶级发出的指示。工人运动中所独有的统一

战线思想，它今天已是日常口号，本文对此也未予考虑。

本刊最大的错误是，1936年没发表一篇从斯大林同志、日丹诺夫同志和基洛夫同志对教科书大纲的意见的角度阐述我们史学战线面临的至关重要问题的文章。甚至在1935年，杂志对该问题还很重视。1936年没有一篇文章涉及政治局委员们就教科书纲要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这些问题。

从上述意见和政府决议中完全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和历史杂志应当把关注的中心放在苏联史和苏联各民族史上，然而关于苏联各民族的历史，整个1936年我们共发表两篇文章，公告栏几乎没提供资料。在某些方面，1936年我们甚至赶不上1935年的成绩。例如，1935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发表过4篇有关世界古代史的文章，而1936年则一篇没有。在……^①史方面，1935年发表一篇，1936年一篇没有。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沙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准备世界大战过程中的作用，反映得十分不够。

我们的杂志根本赶不上生活的步伐。即使有了所需的文章，发表也太迟。例如1937年4月出版的第1期才刊些反映我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文章。我们应在1936年庆祝的纪念日，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纪念日，到1937年在我们这里仍无反映。这一切证明，编辑部没有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完整的长远计划，发表的那些文章都带有偶然性，它们在杂志上刊登，大部分是听其自然的。

我们经常抱怨干部不够。然而十分明显的是，编辑部没有为使这些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做任何事情，没有寻找、教育和培养他们。在我们的皮包里装着大量来稿，它们几个月得不到审阅，因为乍看起来，它们好像不适用，然而，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些，如果想和这些作者（即使是文章写得不太好的和不成功的初试之作的作

^① 此处档案原件有遗漏。

者)一起下点工夫,我们多少也能为这些新干部的成长做点什么。

在我的报告的最后我应当说,我们完全赞成《真理报》做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内容如下:“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因而编辑……”(原文照读)。

但是很少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不是我们,而是我党中央机关报揭发出来的。十分明显,编辑部必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最终使我们的杂志具有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面貌,使之成为历史战线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机关刊物,把它变成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战斗机关。

现在看看,我们编辑部为进行改革做了些什么,我们对我刊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设想的,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近期的前景规划应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讲了,1936年我们不曾为揭发我刊破坏活动的事实做任何事情,因此十分明显,杂志首先必须做净化工作,必须清除腐烂的东西,揭露招摇撞骗行为和破坏活动,这些东西在历史战线普遍存在,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上。必须揭露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弗里德兰塞进法国革命领域和史学研究领域的观点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本质:在这些地方,弗里德兰把所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看成是一群十足的反动派,他在这里也歪曲了恩格斯对这门科学历史的看法等等。必须揭露另一托洛茨基分子扎伊杰尔伪造第二国际历史的行为。必须粉碎瓦纳格和杜勃罗夫斯基在苏联历史方面、普里戈任在资本主义……^①史方面、右倾复辟主义者布哈林在科技史方面的托洛茨基观点。布哈林在其诽谤性文章中称

^① 此处档案原件有遗漏。这里遭批判的扎伊杰尔和杜勃罗夫斯基是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瓦纳格是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普里戈任是列宁格勒历史哲学所所长。

俄罗斯民族天生就有奥勃洛莫夫习气。必须向读者讲明，与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及其同谋者作斗争，老方法已不适用，应当使用新方法，无情地予以根除和粉碎。

从我们当前这一首要任务出发，我们想在最近一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首先发表一篇正式的编辑部文章，来揭露我们所有的弱点，批判我们今天讲过的可悲的过去，指明前景。然后还打算在这一期上发表科兹洛夫的文章《弗里德兰通过“历史地”阐述进行反革命走私时造成的反科学的混乱》、托尔斯托夫的文章《论阶级社会史上的破坏活动》、诺托维奇专门论述弗里德兰在其文章中走私法西斯主义违禁品的文章。

我们再也不能逃避和拒绝揭露乌克兰史学家（其中包括格鲁舍夫斯基院士）历史著作中的民族主义观点了，也不能推卸与白俄罗斯历史著作中的民族民主分子斗争的责任。我们应当发表一系列批驳和揭露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反列宁主义观点的文章。我们想在第2和第3期上发表十分具体的文章，已经定下来了，这些文章是基恩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伪造》，巴赫鲁申教授的《罗斯的洗礼问题》。……（全场喧哗，大笑）。

你们笑也没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人喊：作者是谁？

卢金：这位声誉卓著的老教授巴赫鲁申正在改变观点并愿帮助我们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我们不能拒绝也不准备拒绝这样的帮助。（笑声）。

以后我们还要发表德罗兹多夫论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的专文，有理有据的文章，作者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笑声）。

接下去还有根金娜的文章《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历史学派对民粹运动史的伪造》，鲁宾施泰因的文章。这样拟定了一系列基于具体

历史材料的课题，我们通过这些题目，利用具体历史材料，而不是用泛泛之词和老生常谈，来驳倒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我已经说了，对苏联史和苏联各民族的历史，注意得十分不够。现在，在本年末至明年初的前景规划中，我们将发表一系列阐述苏联各民族历史和苏联史的文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出版物。

在谈及与政治局委员们对教科书大纲发表的意见直接相关的问题时，我必须指出我们近期准备反映的两、三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几个问题在我们的出版物中，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阐述。这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其次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我不清楚你们的情况怎样，但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不单是学生，就连教师对这一点，至今都没有完全正确和清楚的意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革命历史过程中发生过的革命，各应划归哪一范畴？……

有人喊：读读斯大林的著作罢……

卢金：光读斯大林的著作还不够。请您用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具体材料证明这一点，请您说说，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当您完成这项任务时，光是泛泛地议论，有如此这般的革命，这是不够的。贯彻斯大林的指示，必须分析具体历史材料，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于沙皇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反革命作用和关于沙皇俄国是欧洲宪兵的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提出来的。迄今为止，我们就这个问题还没有发表一篇像样的文章。不错，科学院历史所在准备就这个题目撰写特大部头的著作，但这部书提供的还是原始材料。应当利用这些原始材料，以便在具体历史材料的基础上阐明这个问题。

杂志应当发表一系列反映我党反对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同谋——右派复辟分子斗争的文章。当然，这个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应

山《革命史》杂志来阐释，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不应忽视这类题目。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2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想出一个专号，我们设想其内容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0 周年，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应当由某位专家来写。国内战争史的文章……（原文照读）。然后是文献资料，批评和书刊简介栏。而且在书评和书刊简介栏要〔包含〕批判性的评价和评论纪念伟大无产阶级革命 20 周年的一些书籍。此外还想有下列评介：概述 20 年来苏联各民族史方面的出版物和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文献等等。以上就是这个纪念专号的内容。

我们的选题还应包括一个重要问题或一系列问题。同志们，我们无疑面临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是两大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决定性的冲突。因此我们杂志必须刊载一系列阐明实际情况和产生战争奥秘的文章。一方面我们应当反映我们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英勇斗争。我们应当利用这些具体历史材料，以列宁遗嘱的精神——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以苏联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读者。这个问题与世界战争的起源有关。不光在我们的杂志上，而且一般讲在我们的历史著述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非常不够。除了西欧出版物，我们还有苏联的出版物，它们的部头相当大：已出版 8 卷，今天我们又有了一系列小资料，它们被刊载在《红色档案》上。

我觉得，我们杂志的错误之一就是，我们近来忽视了整个战争史的一些最重要阶段。划分成不同时期的战争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布匿战争，或革命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 18 世纪，拿破仑远征，1812 年战争，殖民主义战争，最后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几次最重大的会战，我们的英勇的红军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所有这些都应列入我们的选题，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根据党和政

府的指示应当学习和编写的真正的人文历史。

还有一个或一系列方法论性质的问题。你们大概知道，科学院历史所在这一年里开始完成两项基本任务：第一，撰写一部苏联科学院史，另一方面，写一部全世界的苏维埃史。但在具体写作这两部著作前，必须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是与古代和中世纪史等的分期相关的问题。像构建苏维埃史纲和世纪史纲这类问题。这一系列方法论性质的问题也应在我们的杂志上介绍。

我想，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在我们杂志受到严厉批评的过程中，你们也谈到了杂志自身的结构，谈到了它的各个栏目之间的关系。

如果暂时不谈我们批评栏和书刊简介栏的文章质量，那么也应当说，在1936年，我们遵循相应领导机关的指示，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进步，杂志比以往更加注意批评栏和书刊简介栏了。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表明了这一点。在1935年，批评文章、评论和书刊简介部分，占全年总印张的7.5%，而1936年，这几个部分的总和占总印张的12.4%。1935年我们总共只发表了54篇评论，1936年发表108篇评论和88篇书刊简介。说编辑部在这一年里对评介栏更加关注，这正确吗？我们给这几个栏目提供足够的版面，这样做对吗？另一方面，1936年我们失去了1935年曾存在过的栏目，即历史教学部分，首先是高校的历史教学，应当承认这是错误的。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们的计划和前景。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不把干练的积极分子团结在杂志周围，那么所有这些计划和前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将是良好的愿望而已。1936年的以各种方式给我们杂志写东西的作者人数总共86名。这是一个难以依赖的很狭小的作者群。如何扩充它？首先要常把杂志的作者和读者积极分子召集到一起。这些积极分子应当详阅杂志的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同时他们应当通过讨论杂志上刊载的

最重要、最迫切和有争论的问题或文章，为编辑部提供帮助。因此，这些积极分子同时也应当是来自下面的监督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过。只有这种来自下面的监督，才能帮我们避免我刊不幸在1936年犯下的大量政治错误和遭受的失败。这种通过广泛的民主监督，通过广大作者和读者积极分子自下而上的监督，将是对杂志领导最重要的帮助。

再者，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一些学术机关的密切联系，当然，首先是和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其次是诸如各红色教授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迄今为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我们所和杂志一直袖手旁观，尽管德罗兹多夫同志大概已经对你们讲了这一点，试图把你们吸收到这个杂志上来，但你们却行动迟缓。不过今天我要说，是我们没好好招呼你们，我们没邀请你们，我们没有向你们汇报，因此你们对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对你们袖手旁观。我不讲那些对年轻同志来说可能太难了的文章。但像批评栏和书刊栏，我想，甚至可以把红色教授学院一年级的学员吸引到这个栏目来，还有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你们在这里似乎可以读完预备学校。这不仅对杂志是个帮助，对你们自己也如此。然而在这方面迄今却一事无成。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杂志的批评和书刊栏主要是被老专家或无党派人士垄断了，这是极不好的，也是完全不允许的。必须把年轻的共产党员最大限度地拉过这边来，必须把他们团结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儿是锻炼年轻的党员历史家的地方，他们在这儿能得到预先的培养。

迄今为止，杂志与历史学界的科研组织的联系一般还很不好。如果你们看看苏联范围内的学术生活新闻，你们就会确信，这些新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偶然的。杂志要想结束这种状况，就应在每个这样的机构里，编织一张专职通讯员的完整网络。例如你们的历史研究所，就应当定期地、每月两三次发布反应你们学术生活的新

闻。我们应当在各大科研机构里，不仅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还有各个加盟共和国、州的和边疆区中心的科研机构里，聘任此类通讯员。

还有，为了扩大我们的作者队伍，我们应当带着有关的报告到地方去，特别是和加盟共和国的以及联盟的各大中心联系。问题在于，我们的许多加盟共和国虽有十分强大的科研力量，但他却至今仍与我们的中央定期出版物毫无联系，他们只在自己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参加学术生活，但与我们没有联系。既然我们今天要撰写苏联史，要探讨其与苏联各民族史的密切关系，那么这些史学家的帮助，将之吸引到我刊的活动中来，就成了首要任务之一。

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迅速地 and 坚定地改革编辑部的整个工作（但改革需要在史学界的大力帮助下完成），才能帮助我们弥补我刊中出现的大漏洞，并帮助我们完成党和政府下达给历史战线的指令。

主席^①：同志们，我想以后再回答问题。

下面由维兰德^②同志发言，谈《历史杂志》的情况。

维兰德：同志们，你们知道，《历史杂志》的性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是个大众化的杂志，是反映人文史问题的通俗杂志，当然，这也就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它这个大众化杂志，必须提供政治思想水平更高的历史材料，因为它要教育广大干部读者，必须使它保持必要的理论高度。

1937年我们杂志还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我们也要反映历史教学问题。我们增设了一个固定的历史教学问题栏目。可以说，这就

^① 主席是红色教授学院历史所党组成员泽温。

^② 维兰德，《历史杂志》责任秘书。

更加明确了本刊的面貌，即该杂志主要面向中学教师，面向宣传工作者和党的积极分子，然而，正如中央对我们讲的，杂志应提供有趣的历史读物，也就是说，应当叙述和阐明人文史的特定时期，而且要从现实出发提出这些问题，要有政治尖锐性。

所以，同志们，应当说，在这方面，即在我们提供的材料的政治思想水平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正如《真理报》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这方面站得不高。我们的杂志编辑同样表现出政治上的短视。你们知道，人民的敌人杜贝尼钻进了我们编辑部。尽管他没有积极参与杂志工作，但编委的头衔却能掩护他干那些卑鄙下流的勾当。

后来在1935年，人民敌人的文章也渗入了我们杂志。发表了瓦纳格的文章，弗里德兰的文章，阿纳托里耶夫、泽利采尔和帕拉吉佐夫的几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表现出政治上的短视和轻率，我们不善于揭露在历史战线活动的、以及在我们工作的部门活动的敌人。你们都读过《真理报》谈我们杂志的那篇文章。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真理报》对我们工作状况的评价是正确的，它批评和指责我们政治上短视和轻率，说我们的工作没有达到如今强烈要求思想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应达到的政治思想水平。

具体地说，我们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头几个月有哪些缺点呢？你们知道，早在斯大林同志、基洛夫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意见中就向史学家提出了一项中心任务：即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从量上看，我们多少还做了些事情。1936年我们大约发表了10篇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的文章。其中6篇谈具体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如论动乱时期，论米宁、波扎尔斯基、彼得一世改革，论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等。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提出批判与波克罗夫斯基观点密切相关的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这些文章并未达到那个政治思想水平。其中不

少文章所提问题缺乏政治尖锐性。

例如论鲍·赫麦尔尼茨基的文章。这里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呢？用整整一章来批判波克罗夫斯基，证明〔联合〕的进步性，但却没有揭露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破坏活动，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对乌克兰民众所具有的与俄罗斯劳动人民〔联合的思想〕，以便从事反对波兰人的斗争的愿望闭口不谈。人民的敌人这么干是完全自觉的。尽管我们提出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强调得不够，作者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没加以纠正，因此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软弱无力。

又如，在一系列论述彼得一世改革问题的文章中，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只用一段。很不够。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基洛夫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意见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展示问题的积极方面而对其加以发挥，但却忘了批判波克罗夫斯基。

应当说，我们1936年初发表的几篇文章，现在再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某些文章的观点根本不对，这些观点和波克罗夫斯基的立场如出一辙，例如1936年第2期上发表的兹维亚金采夫的文章，他把伟大的学者罗蒙诺索夫称为献媚取宠的学者。除此之外我们在该文中就再也找不到值得一提的东西了。该文没有论述罗蒙诺索夫，只是顺便提了提他，但却作了这样的评定。这个评语和历史战线上的破坏活动如出一辙。

所以应当说，尽管我们试图提出这些问题来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观点，但这方面批判的政治思想水平远不符合要求，在很多情况下水平相当低，批判缺乏必要的政治尖锐性。因此在受到《真理报》的批评之后，在我们自己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了自己的产品之后，这是我们上的第一课。

还有对史学领域中破坏活动的揭露。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1936年我们干了些什么事？发表了一篇谈波克罗夫斯基的

书的批判文章。这是惟一的一篇文章。但所作的批判与该书所起的破坏作用相去甚远。我们面临的仍然是我们提得不够有力的问题。所提问题必须具有政治尖锐性。

同志们，接着我要讲讲，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哪些不足呢？也就是说，在苏联史方面。例如近代史。从执行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就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所作的指示的角度看，我们在近代史方面同样所做甚少。所做微乎其微。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问题。还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就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一点只在一篇阐释法兰西宪法的文章中一笔带过。这显然不够，而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就法国革命发表一组文章，还要在这里揭露弗里德兰在这方面的破坏活动，因为我们在揭露这方面的破坏活动上，除了批判皮翁特科夫斯基和瓦纳格外什么也没干。揭露弗里德兰和其他破坏分子的文章，我们一篇也没发表。

我们杂志工作中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反法西斯斗争问题。这里的问题应当这样提出：首先是在具体历史时期例如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问题上，揭露法西斯主义史学，因为众所周知，法西斯史学正在利用古代和中世纪史来确立自己的法西斯理论。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1936~1937年，总共只有一篇揭露法西斯中世纪史学研究的文章。在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方面，我们就西班牙史发表过几篇文章，然而毕竟十分不够，与西班牙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争的意义根本不相称。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应改弦易辙。

下面谈谈党史问题。这里亦如此，如果讲数量，应当说，这类讲党史的文章大约有13篇，其中大都是有关党的反倾向斗争史的文章，我们完全没有涉及诸如在国际舞台上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问题，与民族主义倾向斗争的问题。也不曾提出有关反右斗争的问题，只是现在要出的这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写反右斗争的。顺便说一下，同志们在等待着我们的刊物，但只有第1、2期，而第3、

4期合刊将在5月10日出版，太晚了。应当说，我们去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太谨小慎微了，结果造成严重拖期，但我们希望下一期能按时出刊。

总之，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在我们杂志的工作中存在许多严重缺点和漏洞，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改革。

但在谈我们近期正在拟订的问题和我们想抓什么样的选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和我们共事的干部。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们杂志无法收到科兹洛夫、德罗兹多夫这样的大历史学家的文章，我们只能去发掘年轻干部。所以我们必须面向年轻干部并找出他们。但应当说，我们还是拉到了点儿人，也培养出了几个人。1936年有大约15人首次在我们刊物上发表东西。而且应当说，在和这些作者一起工作时，我们为他们提供材料花了很大功夫，只要对作者抱有好的愿望并给予必要的重视，从这些文章中确实能提炼出有趣的材料。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有许多谈国内战争史的文章，其作者都是从未动过笔的国内战争参加者。他们提供的材料自然组织得很差，但材料十分有趣。于是我们花很长时间加工这些文章，终于使文章看得过去了。曾有一篇肖洛霍夫谈德国占领时期的国内战争一段情节的文章。还有一篇谈1917年4月奥列霍沃-祖耶沃市党组织历史的文章。作者都是当时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能提供事实材料。此外我们也吸引过来一些年轻的工人、历史系大学生和研究生。

在最近这一期杂志上将刊载索菲诺夫的文章。作者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论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内政策的文章十分有趣。在这篇文章上下了很大力气，对作者进行了指导，文章写成后很有意思。年轻作者贝奇科夫在我们的普希金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普希金的文章。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中间，很少有人写东西。这既是我们的错，也是你们的错。昨天我们检查谁发表过东西，只找到了谢列

兹尼奥夫的两篇文章，此外就再也没有了。这篇文章中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看来他是在研究原著，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提供了有趣的材料，但必须说句批评的话，即该同志对原著的态度很不严肃。第一篇文章没有注释，什么也没有。当核对原文时，全都乱套了，断章取义，大概是背熟了引自马克思著作中的什么位置。又像是把5页的内容拼凑成一段引语。这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对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来说，他应当学会使用原著。然而这篇文章说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同我们主要栏目有关的研究所吸收干部。

你们在研究原著时获得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个人着手写文章，想想脑袋里有什么，等等。然而你们钻研的是原著。假如一个同志用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原著，他会沉思，他能为我们的读者提供哪些有价值的材料。而我们的读者是历史教员。现在没有教科书，你们能给我们杂志以巨大的帮助。

我们制定出了近期的选题，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留在这里，留给你们，让你们多了解它。而且我要对你们说，我们在文章加工方面将给你们以巨大的帮助。我们常常不得不压缩文章。而后做出说明，等等。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你们更靠近我们。应当说，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和我们更接近，或者说我们更靠近它。我们拟定了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选题，我们和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挑选了一些题目。这些同志选了题，正在进行研究，我想，大概会有不错的材料。经过适当的文字加工，这将是我们的宝贵材料。

总之有干部问题，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认为，你们更多地参与我们杂志的工作，你们就是我们的作者。

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从我们的工

作所受到的批评，从我们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自我批评还很不够，还没有充分展开）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会帮助我们，会指出我们无法发现的毛病。很清楚，从对这些毛病的批评中可以得出我们最近的任务。

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拟定苏联史选题之所在。我们要抓哪些问题？我们所抓的大部分课题都是特定的具体问题，我们应当就这些问题揭露并将继续揭露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揭露历史这个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观点。我列举若干课题：“开拓克里木”、“比隆苛政”、“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和其他一系列题目。还有“基辅罗斯”……首先是没得到充分阐述的基本课题。这就是基辅罗斯时期。这里有分封的公国问题，9~12世纪的基辅罗斯。

而后是下一阶段——鞑靼入侵及其产生的影响。这里可以就此问题对破坏活动加以批判。再下来是“叶尔马克远征”、“斯杰潘·拉辛起义”和一系列其他题目——“沙皇政府——欧洲的国际宪兵”、“1812年战争”、“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征服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尼古拉的对外政策”，等等。总共37个题目。我们要求，在每一个要阐述的问题中，都应对皮翁特科夫斯基、瓦纳格和其他人进行批判。

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问题。去年对这些问题已有所反映，但就我们提到首位的那些问题来说，我们毕竟没有突出与法西斯主义史学和历史战线上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中的迫切问题。今天我们要改进这一点。我们想就古代史发表文章，以证明雅典民主的奴隶主性质，揭露所谓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这里要揭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因为他认为雅典民主是完美无缺的制度。然后还应发表关于古罗马奴隶主民主的文章。大体需要一系列文章，以便批判法西斯史学家。在这方面，我们正重新调整我们的古代史选题。

下面我们谈谈中世纪史。这方面发表的东西很少。如果谈具体选题，则我们过去并没把它和法西斯历史学家的种种歪曲结合起来。例如“古日耳曼人”这个课题。这里需要证明，古代的日耳曼人与法西斯分子所描绘的相反。再就是《6至11世纪的拜占庭》这篇文章。这里需要揭示拜占庭对基辅罗斯的文化影响。《6世纪的阿拉伯人》一文，应说明这有何意义，说明这终归是高水平的文化，以揭露法西斯和种族理论。再有《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文，德国法西斯分子把这场战争视为法西斯运动的直接前奏。还有西班牙史和中世纪西班牙问题，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我们早就打算发表这些东西，但怎么也找不到作者。

下面谈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在文章中似乎揭露了，希特勒所说的“德国始于〈……〉”意味着什么。而后是德国对待斯拉夫民族的政策。我们早在3~4期上发表了论涅瓦河会战一文，但这只是第一篇文章，我们打算发表系列文章。这就是我们拟定的中世纪史和古代史的选题。在近代史方面有哪些中心环节的关节点呢？这里我们首先应当以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对教科书大纲的意见为出发点。

其次，应当更多地反映历史，要比我们已经反映的更多些。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印度史、太平天国革命，而后是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中国红军史。这是第二组问题，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第三，是近代史的一个领域，帝国主义战争的两大策源地——日本和德国，揭示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日本民众进行的革命斗争，反映这场革命斗争的历史，对德国亦应如此。这大约就是我们设想的近代史选题。

党史也是如此。我们就党史拟定了一系列课题，它们能反映党的反倾向斗争，其中有论莫斯科反右斗争的文章，同乌格拉诺夫现

象的斗争，同民族问题上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例如与格鲁吉亚倾向分子的斗争。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反映同我们兄弟党内各种倾向的斗争，同法共和德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现在，同志们，1937年的主要篇幅应当是关于十月革命20周年这一栏。在这几期杂志上，对这一部分的反映还很不够。

由于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的帮助，我们认为，我们将顺利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務。

同志们，现在谈谈如何改进同我们的作者和读者积极分子的关系问题。我们打算在5月10日把我们杂志的积极分子召集起来。我们请求你们派代表参加，我们将在那里对我们杂志的工作做更全面的批评，并提出我们更详尽确切的工作计划。一般地讲，我们将定期举办这样的积极分子会议。迄今为止，应当说，我们既没召集过我们的读者，也没召集过作者，这是最终反映在我们整个工作中的最大错误。假如我们接受我们读者和我们作者对我们的工作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许我们的许多缺点老早就暴露出来了。

同志们，关于我们杂志的工作，我想讲的大体就是这些。你们大概阅读我们的杂志，并能补充揭发我们的许多毛病。很遗憾，我们的缺点不少，但我们认为，有你们的支持，有我们广大积极分子的支持，我们终究能改进这份杂志的。

主席：我们继续开会。……下面请马克萨科夫^①谈《红色档案》杂志。

马克萨科夫：同志们，《红色档案》杂志在今天这里提到的所有杂志中，是最老的一种，但在听众如此众多的大会介绍（尽管很简短）该杂志，这还是第一次。我从创刊时起就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如果不算我们关于中央档案馆的报告——报告捎带谈了一下

^① 弗·瓦·马克萨科夫（1886--1964），《红色档案》代理编辑。

《红色档案》的工作，我不记得还在这样的会议上报告过工作。这一点说明，我们的工作中有许多错误、缺点和漏洞，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此脱离史学界，这一点不能不在一本历史杂志的工作中反映出来。

我们杂志的性质特殊，它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历史杂志》，也有别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我们是历史文献杂志，是公布文献而似乎不搞研究工作的杂志。但实质上，发表文献就是重大的历史研究活动，因此应当知道，要发表必须会发表，要会提供文献材料，还要善于评注这些历史文献，这就意味着从事大量研究工作，这就意味着，必须有清楚明确的看法，知道我们历史档案馆数不胜数的材料中，有哪些是史学战线需要的，哪些是群众需要的。任务艰巨而又严肃，自然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我们在《红色档案》杂志上是怎样完成自己任务的呢？我必须说，卢金同志在这里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就该杂志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所讲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我刊。同志们，我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史学家，特别是年轻的史学家，都像他们应当了解的那样了解我们的杂志，也并非都研读它。同志们，这就使我们的情况复杂化了，使我们在该刊上难以开展自我批评。史学界在这件事上给予卢金和维兰德同志很大帮助，我想今天的会议也会帮助我们更深刻、更广泛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首先，我们的杂志是个什么样的杂志？我想就此讲几句话，因为在我看来，出席今天会议的同志，并非都能系统地按期阅读和研究我们的杂志。两小时前，在今天会议的入口处，我遇到了一位同志。他说：我们那儿有这种杂志，偶尔有人看上一眼，但这只是在上面发表与他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时，总的来说读得不多。这个同志反映的情况可能不完全符合实际……

有人喊：拍下照片了。

马克萨科夫：现如此，我认为我有权浪费 7 至 10 分钟，起码得讲讲我们的杂志是什么样的杂志。

历史文献杂志，是从事文献发表工作的杂志。我们发表哪些文献？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同志们，我在来这儿开会路上想起一件事，杂志在其创刊号上写过它想做什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事后一切都昭然若揭”，这句格言是《红色档案》的座右铭。它的基本任务是：揭露帝国主义政策和外交的秘密。接下来，这一点又得到了扩展和补充：“与这项首要任务并行不悖的是，《红色档案》也不拒绝发表有历史或文学史意义的文献。”最后说：“在发表非外交材料时，《红色档案》编辑部也将忠诚于自己的座右铭，介绍俄国历史时期和该时期的各个方面，即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且为各种传说所层层笼罩的各个方面……”

有人喊：“这是谁写的？”马克萨科夫：波克罗夫斯基写的——下面我要讲这件事——波克罗夫斯基是这个杂志的创始人。我要讲，我为什么引这句话，在今天的会议上讲这些有什么重要性。

这就是《红色档案》编辑部创刊伊始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如果我们浏览一下 1921、1922 年直至最近几年的各期杂志，那么总的来说，杂志走的正是这条路，即杂志发表了涉及沙皇俄国外交政策的文献。这方面的材料公布得最多，后来公布了相当多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材料，随后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材料，其数量也相当大，尽管没有前者多。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即最近做了些什么，看看近两年——1935 和 1936 年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会看到，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用简单的数字说明，在最近这个时期发表的众多题目属于哪些方面。关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特别是与 1905 相关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35～1936 年发表的材料

数量不大。关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35年发表了205页，1936年只发表近42页。党史165页，民族史近150页。其余的是更古时期的材料，而后是政治家的日记和书信，最后是文学史材料。正如你们看到的，外交政策问题所占篇幅甚少，几乎不曾提及，尽管也发表了些东西。十月革命所占篇幅格外少。

如果用数字来说明，如果从这些年公布的具体材料的各组文献之间对比关系的角度看，以党史材料为例，那么我们这里发表了大量与争取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斗争有关的中央与地方的通信。而后是《火星报》和《真理报》时代的材料，与布拉格代表会议和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活动有关的材料。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这里我们有粉碎弗兰格的材料。在红军和十月革命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山区反革命和武装干涉的材料，有1917年为工人监督而斗争，有莫斯科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此外，关于国内战争时期奥尔忠尼启则事迹的材料也属此列。还有从二月至十月革命时期为土地而斗争的材料，有关于劳动哥萨克的材料，关于布列斯特的材料。

继续发表大量工运和农运的材料。1935~1936年我们发表了哪些工运材料？有关于1905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运动的大量文献，有关于顿巴斯和其他许多地方罢工运动的材料。这里还应考虑到，1935年是有纪念意义的周年，因此相当多的文献材料是关于1905年的。而后是农民运动，有关于切尔尼戈夫省、赫尔松地区和俄国中央地带土地运动的材料，有关于1861年改革的材料（也是个纪念日，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历史杂志》完全把它忘掉了）。我们发表了两份篇幅相当大的材料，其中之一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就是斯摩棱斯克省的材料，也是有关19世纪初的土地运动和农民运动的。

我们在1935~1936年发表了下一组文件，是有关苏联各民族

历史的文献。我们曾在这里发表 17 世纪的布里亚特，有关 17 世纪布里亚特蒙古的文献；再就是哥萨克在 18 世纪同沙皇俄国的往来；再就是达吉斯坦在两次革命之间时期的土地关系的材料，1916 年中亚起义，最后是雅库特的历史，关于 1905 年的亚库特人联盟。

这就是按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基本部分发表的文献的简单目录。

我再谈两种必须查阅的文献材料的发表，这就是革命前的选举权和宪法等问题的资料。这里我们发表了两种材料。一种是沙皇统治时期制定国家杜马条例时期的妇女选举权，再就是沙皇统治下各民族共和国和州的选举权。

还发表了其他一些东西（如文学史家的日记等），我就不详谈了。

为了阐明我们文章选题的一般原则，我认为有必要指明这些题目。你们看到了，1935～1936 年我们的杂志是根据集中于我们历史档案馆中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工作的，今天杂志应当给我们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师，提供有关十月革命史的材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的材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的材料，最后是大量发表十月革命本身的材料。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很不重视这个问题。同志们，这是我们最近时期的工作中最严重的和主要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表明我们工作缺乏切实的计划，杂志的全部工作缺乏实际考虑、必要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方向；表明我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0 周年前夕犯了错误，尽管我们两、三年前就清楚地知道，应当把文献材料从档案馆里调出来，尽早进行加工处理，而不要等到杂志要用这些文献的那一刻，那一天，那一年。我们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却没有采取理应采取的必要措施，我们能提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材料，大概要在 1937 年，1937 年末，而不是理当拿出来的 1936 年，也不是 1937 年初。相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 1935 年发表的十月革命史的文献材料，比 1936 年多得多。我以后再谈档

案馆和杂志之间存在的隔阂。这是谈到我们杂志选题时必须指明的第一点。

第二，正如你们听到的，从杂志创刊号上所写的东西出发，我们本不该大搞远古史，而应把着眼点放在现代，强调不搞远古时代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尽管直到今天这些东西仍是很“神圣的”。同志们，这无疑反映了波克罗夫斯基对具体历史材料的总看法，也决定了我们这些在波克罗夫斯基领导下工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追随波克罗夫斯基。我们按这条路线办的许多期杂志，都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当十分清楚明确地要求我们必须提供具体历史材料，提供民族史材料时，同志们，我们才想起来，为什么此前我们不研究这些问题呢？因为与民族史有关的任何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发掘藏于封建农奴制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历史档案馆等地方的历史材料。而对这些档案，对这些档案馆的文献的态度是这样的：它们处在半封存状态。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东西，这里只需用个别文献为某一论题和观点作例证就行了，而无须翻找大量文献材料，以便在此基础上得出某种结论，支持某个观点。

只是到了现在，即当我们面对我党中央政治局文件时，当我们读了就人文历史教科书所作的指示时，我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些文献和这些档案，即使如此，仍然十分胆怯和小心，特别要考虑这些档案馆的现状，即直到最近，这些档案馆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未得到真正的关注。我在1936年提出了几个有关民族史的题目，5个题目，应当说，在前一时期，在最近几年，我们收到的在历史方面、在编年史方面较为深入地探讨苏联民族史问题的题目，不足两三篇。

所以，你们看，直到最近，在具体历史材料方面，在与苏联民族史有关的问题方面，波克罗夫斯基对我们的影响，过去和现在都

还有所表现。只是今天我们正一点点地开始改变，但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样去做，而是怯生生缩手缩脚地在干。

同志们，下面是与选题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了，1935至1936年发表的这些题目花样繁多。但这里看不到我们为之下功夫的中心关键问题。这里看不到我们从历史战线的任务和需要考虑而有计划地切实工作的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就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指示，不言而喻，我们本应早就在我们的计划中对该选题做出反应，但除了这5个民族史题目，我们在杂志上找不到对这些指示的其他反应和考虑。在这里必须十分坦诚地指明这一点。我们在《红色档案》上发表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東西，也可以说是乌七八糟的材料，证明我们杂志缺乏某种计划性，实质上是存在着放任自流的现象。情况十分严重。

如果要谈我们杂志的其他严重错误和缺点，我首先应当说，我们提供的文献材料过于庞杂，没有突出和强调中心课题，我们没有像应当做的那样提供这种材料。我们所写的前言和我们为前言所作的注释，远远没达到其应有的理论高度。这顶多不过是对古文文献的简短说明，即文献出自何处，与其他文献有何关系，等等。更糟的是，想用一页半的篇幅对某些题目进行整体研究，而这种研究几乎和作者发表的具体文献毫无关系。同志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无法掩饰的，这是些缺乏研究的前言，它们软弱无力，不客气地说，它们往往是粗制滥造的，这是严重缺点。如此对待注释和前言的结果是，在得到有关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是什么货色的明确无误的指示之后的两年里，我们在我们写的前言和给这些前言加的注释中，甚至没想揭发波克罗夫斯基的这些反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没想到如何证明插手历史战线研究的一系列问题的人民敌人的有害伪造行动。这当然是个必须谈到的重大错误。因此我必须说，我们的杂志使人民的敌人在这些前言中找到了栖身之所。我

们也没能避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历史杂志》存在的问题。1935年我们发表了弗里德兰论布朗热运动的文章。我们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好几个月。

有人在座位上喊：同一篇文章。

马克萨科夫：我们发表了，不知道后来它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上。不管怎么说，是我们首先读到该文，首先暴露出政治上的盲目性。我们没明白这个敌人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发表了这篇以文献材料为幌子的文章。同志们，这种伎俩是尽人皆知的。托洛茨基分子，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不止一次地玩弄这种把戏，利用大量文献材料，以学术著作为幌子，贩卖反党反苏观点。我们熟悉施略普尼柯夫的一系列著作，这个档案材料的垃圾堆。这不单是垃圾，而是有其特定任务的著作，即在学术著作附录的掩饰下偷运施略普尼柯夫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兰也惯用这种方法。他不单写文章，而且出版论布朗热运动的大部头著作。我们对这部著作不够熟悉。

这是一点。此事发生在1935年。1935年发表了皮翁特科夫斯基论1月9日和论对普加乔夫审判的两篇前言。毫无疑问，这里我们依旧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粗心大意，没有察觉出皮翁特科夫斯基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觉得这是软弱无力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东西。可是，同志们，这不是粗制滥造的货色，这是有敌视我们的特定政治目的的东西，而我们却视而不见。这样在我们招引的、钻到我们身边的作者中，我们有两个被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那个杜勃罗夫斯基几年前就给农运材料写过注释。我谈近年的情况，是因为容易察觉和推测。

还有，同志们，我们根本不和历史战线联系，不和红色教授学院联系。我们闭门造车，孤立无援地工作。杂志在这一点上的错误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说，例如，我们来到红色教授

学院历史研究所并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①，您帮帮我们吧。我们在各个时期都不曾来，也没和某些同志说过。这是个重大的缺点，它使我们无法严肃地提出把我们的整个杂志提高到应有理论高度的问题。

还应当谈谈我们的干部。看起来我们很容易，实则解决该问题的难度很大。我们和文献打交道。有些年轻人觉得事情很简单：到档案馆，从架子上取下文献，读读看看，写个简短的引言附之于上，一篇历史作品就大功告成了。在我们找到这份材料之前，必须了解这个档案馆用以查找〔材料〕的目录，如果没有目录，就得钻进档案馆，从书架子上取下这些文献。而后再在大量材料中找出所需的材料。遗憾的是，干这件事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红色教授学院历史所年轻的史学家，在我看来——我这两三年有点脱离中央档案馆，但我认为，红色教授学院太远离中央档案馆了。它不在中央档案馆的各馆工作。

有人喊：不。

开始从事学术活动时不在档案馆工作，而在历史战线工作，从事研究活动，这怎么能想象呢？我对此无法想象。由此产生一种情况，即如果年轻的和比较成熟的史学家都不在档案馆工作，他们要发表历史研究著作，能从什么地方搞到材料呢？这就是说，他们应当走阻力最小的路线。

有档案专家，有年老和年轻的档案专家。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些技艺高超的人，他们能用老的标题编制目录，利用他们所做的目录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拟制出新的标题。但他们能否从事我所说的这项研究工作，这一点值得怀疑。

然而情况正是这样，即今天没有能够立即投入这项文献公布工

^① 即卢金。

作的历史学家。就是说，我们必须走档案馆工作人员这条路。他们收集材料，选取的往往是无关重要的材料，拿出发表。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当写前言。一个档案馆工作人员，不能写前言和注释材料。就是说，必须找一位能为这份材料撰写前言的史学家。但他并不知道，是否拿到了全部文献，选得准不准，有价值的文献是否被有意隐瞒了，而提供的却是不关这一事件的无足轻重的文件，这些他一概不知。给他的是现成材料，他写前言。其结果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废品。在这一点上，那位收集材料的档案馆员并没有错儿，因为他并非史学家；写前言的也没错，因为他不可能下到档案馆去查阅全部文献。有错的是编辑部，因为它没能创造条件，以使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让选取学术材料的人自己加工提炼，以供杂志发表。问题很大。它要求我们史学家，必须有组织地经常到我们的档案馆去工作。第二，它要求在我们的档案馆里有史学家从事历史档案工作，他们在那里少得可怜。只有这样，同志们，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和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已经说了，编辑部在这方面所做甚微。一方面，它把档案馆工作人员吸引过来参加提供材料的工作，而后是使用它所了解的历史学家。但我们没有做或者几乎没做动员年轻史学家和动员更广大的史学工作者的工作。结果出现了我们抱怨干部不足的状况。确实应当抱怨，因为现有的干部根本不够，提供的也不是所需的产品。迄今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今天的大会开过以后，这里，即在红色教授学院或许能更广泛地提出在档案馆工作的问题，那时情况将大为改观。

同志们，现在我简单谈谈历史学家们应当了解的东西：《红色档案》编辑部是如何工作的，它是怎样的编辑部，这件事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同志们，两三年来，杂志一直没有编委会。今天无法把杂志编辑部的人召集起来，事实上是不存在编委会。责任编辑别

尔津病了。罗特施泰因不工作。帕舒卡尼斯干了一年半，但她被开除出党，已不是编辑部成员。^①在这件事上帮忙的是副主任马尔采夫^②，他事实上并不是编辑。实际是马尔采夫总揽一切，他站在中央档案馆一边。这就是杂志的状况。我急需一份资料，我们的材料即将付印。我给档案馆副馆长打电话。他回答我说，无法提供资料，因为他正忙于更重要的工作，他工作是有计划的。这里说的是杂志，它必须出版，不得拖延。谈话结束，我们同时挂上听筒。我去找马尔采夫，他干预了这件事。他打电话给馆长。馆长回答他们有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计划，没空管这些。首长的态度起了作用，东西拿到了。

假如一个编辑部这样工作，那将一事无成。这里需要一位作为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编辑，因为这是档案杂志。首先必须依靠档案馆，然后才是吸引大批史学家。中央档案馆领导可以做这一点，而他们必须更加接近杂志编辑部。眼下还不行。最近可能会有，那时情况将会改变，但今天的情况相当严重。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哪些？首先是组织编委会问题。必须为编委会这个集体创造工作条件。应当让编委会展开工作，而我们无法组织。我们应当从档案馆工作人员和史学家中造就杂志工作积极分子，应当与开始从事科研究活动的同志建立联系。

第三，我们应当和〔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红色教授学院〕等共同商讨，以制定两三年的远景规划。讨论计划并考虑，近两三年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围绕这个计划动员档案工作者，以便及时获取材料。

① 帕舒卡尼斯因“中央档案局间谍组织”一案于1937年1月被捕别尔津于1938年8月被处决。

② 马尔采夫是中央档案局管理处副主任。

我们今天面临着哪些基本课题呢？十月革命。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文献，我们发表得不多，这个问题最为紧迫，应当围绕该问题发动工作人员，研究有关苏联史的文献。如今必须开放旧有档案，例如十月革命档案，我们将在那里找到许多文献。

再者，我们还应着意避免那些单纯古文献学式的或非常软弱无力和粗制滥造的前言，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把杂志的整个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必须揭发波克罗斯基及其流派的错误和人民敌人的破坏活动。对这方面应予以严重关注。我们直到最近都忽视了这项紧迫任务，更要考虑，波克罗夫斯基至死都是该杂志的〔主编〕，其作用和影响不能不遗留至今。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近期能够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无疑会使这个杂志得到提高；杂志做的不是坏事，但这件事做得很不好，而且是通过坏人之手干出来的。对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加以改善。

主席：请雷克林^①同志发言。

雷克林：我不会耽搁你们太久。《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杂志原本是十月革命和苏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4年，后来该杂志于1928年成了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再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

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介绍我们杂志的内容。你们都是阅读它的。

有人喊：我们都读了。

雷克林：这就是说，大概没必要详细评述各期的内容了。

因为杂志得到了斯大林同志和全党的直接指示。你们晓得，

^① 雷克林，《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责任编辑。

1930年，由于杂志旧编辑部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曾出版托洛茨基的私货，即托洛茨基伪造党史的作品。^①

在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斯大林同志揭露了这批托洛茨基私货的本质，责成杂志编辑部将布尔什维主义史研究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撕掉托洛茨基和其他各种伪造者的假面具。

我们杂志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工作的。在继斯大林同志的信之后，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专门决定，让我们杂志一年出三次文集。实质上，《无产阶级革命》杂志是作为文集出版的。第一，就篇幅讲，每期杂志平均17至18个印张。我们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关于一年出三集的决定。而且今年连一期都没出，只是到了今天，即最近几天，才印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期。

我们杂志的工作有哪些缺点呢？首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还没有成为在党史战线工作的干部的组织核心。第二，杂志没给党史教科书的编纂者和作者们以应有的帮助，杂志也不曾提出诸如我党历史分期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没给阐述下述问题的教科书的作者和编者以帮助，例如帮助他们编写这样的党史教科书，以使党史不致成为有趣的故事，而是编写讲授布尔什维主义的教科书。例如，我们杂志内部对波波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党史教科书作了批评。我们揭露了这些教科书——既有波波夫的，又有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某些错误、某些缺点，但没有把我们对这些教科书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我们杂志应当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机关刊物。

第三，我们杂志周围没有紧密团结的积极分子。这是我们杂志工作中的第三个，也是基本的和主要的缺点。正如你们看到的，缺点非常大，极为严重。我们必须克服这些缺点。

^① 指斯卢茨基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

关于出版《无产阶级革命》文集的问题。这里，编委会应负的主要责任是，我们迄今为止才一年出两集，而1936年只出了一集，只是近日才能出第8期杂志。这是编委会自身的错误，它不善于组织工作，以使我们完成中央委员会关于一年出版三本文集的决定。这是第一个主观上的原因，是编辑部自身之过。

第二，同志们，我们与党史战线的干部们合作不够。同志们，应当说，例如我们不只一次造访过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求人写文章，也出了一些题目。我们的杂志上没有刊登过一篇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学员的文章。而且我们甚至没能让一个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在简介栏出现过。我们杂志收不到书刊评介文章。党史干部的科研工作状况也无望有大的改善。我们杂志对文章和作者的要求极高，但遗憾的是，我再说一遍，我们从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同样没收到一篇文章，虽然我现在参加该所的会议。这里当然错在编辑部，因为我们本应更多地和积极分子合作。现在我们有存稿26篇，每篇3、4、5或6个印张。在这26篇文章中，有25篇不能用，一篇能用，不过我们要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其进行认真加工……

(有人喊：这些文章来自哪里?)

这些文章主要来自各省。

编辑部一个大的缺点和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和这些干部，这些投稿的同志，不能一起工作。把来稿丢进纸篓，或是写封此文不宜使用的信，这当然是容易。这件事易如反掌，但是和这些作者一起加工，既然人家已经写两三个印张的文章（是的，科兹马·普鲁特科夫说，简短是智慧的表现，应当写得短些），既然人家在工作，在写，就应当和他们一起干。遗憾的是，我们没这样做。我们甚至不和莫斯科当地的作者合作。莫斯科有许多投稿的作者，但来稿却被压在文件夹里，因为它们不适于发表。也不对其进行加工。继续这么干不

行。我们不能这么团结积极分子或关心作者，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缺点。

我们到底为党史科学做了些什么？我再说一遍，同志们，杂志应遵循斯大林同志直接给编辑部下达的指示和评论去做。我们还有许多该做而没做的事情。

让我们看看杂志的内容。第一，我想请大家注意社论。我们的同志习惯于不读杂志的社论。他们常说，社论都是老生常谈，千篇一律，等等。同志们，我以为，社论一般总是该读的。特别是我们不仅想在我们的社论里及时地对党交给党史战线的任务做出反应，以某种方式响应这些指示，而且我们也想在我们的社论中为读者提供迄今从未发表过的材料，公布他们至今一无所知的事实。

举例说吧。在第8期的社论里，我们将告诉读者某些新的事实。此文题为《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文章反映了中央全会的决定，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党的敌人。你们知道，在我们的期刊和杂志中，曾出现一系列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反党反列宁角度反映他们两人政治生涯的文章。这一系列事实不久前被期刊公之于众，我们不想在社论里重复尽人皆知的事实，而要告诉同志们一些新东西。

例如托洛茨基。这个地道的盖世太保的走狗，这个破坏性特务暗杀活动的组织者，这个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以民粹派的追随者、民粹派分子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1898年，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集会上，他首次公开发言，在那儿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意在维护民粹主义。应当指出，这里讲的是90年代末，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登上社会政治生活舞台，而民粹派，用列宁的话说，已蜕变为庸俗的小市民激进主义，托洛茨基的发言就是要捍卫这种民粹派信徒，在发言结束时他说：“民粹主义万岁，打倒马克思主义！”

这个地道的盖世太保走狗的首次公开政治发言，就是如此。—

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当他结束其捍卫民粹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时，与会的一位老者走近他。老者属于民粹派营垒，他握住托洛茨基的手说，您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我和您是同路人。和托洛茨基握手这个人叫魏斯，他实际上是出卖许多革命者的奸细，1899年被一个革命者处决，这个奸细葬送了几十位革命者的生命。

托洛茨基完成由民粹派信徒向社会民主派的“图希诺倒戈”式的转变之后，如你们所知，他曾疯狂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托洛茨基提出人人皆知的欧洲联邦口号。换言之，是首先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然后是在全世界建立联邦卡特尔的口号。该口号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与在几个或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口号是对立的。

人们到现在还没有注意这一点。1916年，托洛茨基曾在《我们的言论》报上撰文，声称：“欧洲的，而后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应当取代民族资本主义列强。”

接着又宣称：“假如德国帝国主义能用暴力将欧洲几乎统一起来，那么革命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发展德国军国主义建立的这个联合体的基础。”

1916年他就是这么写的。你们知道，列宁曾指出，托洛茨基的欧洲联邦口号和瑙曼、罗尔巴赫——这些现代法西斯主义代言人，幻想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梦想压迫和剥削各国人民的野蛮残暴的人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

托洛茨基的言论至今没引起重视，而这些话对理解托洛茨基与希特勒、与赫斯和与所有反对派——德国法西斯主义走狗的谈判，很有典型意义。

同志们，我们知道，布哈林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也曾提出自己的反列宁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提纲。然而，人们对布哈林在

提纲中所阐发的一个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重视不够，该提纲的第五个论点出自于伯尔尼代表会议，会议的要点就是认为〔布哈林〕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理论的拥护者。^①

请你们回忆一下 1922 年布哈林干的一桩事。应当记起此事。1922 年，众所周知，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起参加了三个国际的一次会议^②。列宁的文章《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尽人皆知，列宁在文章中指责布哈林和拉狄克对第二国际做出的让步，实质上保护了应该和已经受到无产阶级审判的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写道，布哈林和拉狄克在三个国际的这次会议上作威作福，使反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恐怖分子逍遥法外。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我们没把这些事实写成专文，而是在我们的社论里提到了它们。我们不想把我们的社论写成一般文章，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力量、可能和能力，使我们的社论充满了每个党内和党外布尔什维克需要了解的材料，以便更积极更有力地进行反对党的敌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

我们杂志的选题主要是党史。我们在我们的文集中反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和反动时期及高涨时期党内斗争问题。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平中此前鲜为人知的情节，能够为党所用。1909

① 指布哈林 1915 年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布哈林发言的原文及其提纲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没有公布过，美国历史学家、布哈林问题专家史蒂芬·科恩认为，布哈林和列宁的分歧不大，主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分歧，而不存在主要分歧。

② 指 1922 年 4 月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和伯尔尼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柏林举行联席会议。在会上，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布尔什维克不要处决狱中的社会革命党人。

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瓦爾斯基达成协议，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党；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要取消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消灭布尔什维克中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货币储备。我们还使下述文献为党所有：它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列宁撒谎，欺骗列宁，出卖列宁。我们将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8期发表关于1910年中央全会的文章，我们在那里公布有关李可夫的新材料和若干新文件。李可夫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达成协议，不让列宁出席1910年的中央全会，以便在这次没有列宁参加的全会上能与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谈判取消布尔什维克中央、取消布尔什维克党，取消各种货币储备。我们公布的文献，描绘了李可夫的这个角色。他伙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历史上这一最重大时期，在党的生死关头，在这一时期李可夫伙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卖了列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将发表有关加米涅夫在1910年的立场的文件，发表说明加米涅夫在1910年的立场的文件，发表说明加米涅夫在这个时期的叛卖政策的文件。

同志们，下面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提供的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材料。我们首次系统发表关于布拉格会议筹备和召开的情况，发表了此前从未发表过的出自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之手的15份文件。这些信件能说明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筹备和召开布拉格会议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些文件十分耐人寻味。

同时，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还要讲一件事，此事突出说明，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并为党而斗争的。我想提一提这件事。

当时在布拉格聚集了8~10名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会议尚未开始，列宁还没到布拉格，但这几位代表已准备出席布拉格会议，并决定邀请召回派—前进派分子、托派、崩得分子、拉脱维亚地区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民族组织等参加会议，他们将此事告知列宁。列宁来到布拉格，走进这8人或10人开会的房间，他们正等候列宁

的答复。列宁声称，你们干了一件蠢事，如果你们不放弃这种愚蠢行动，不改正错误，我就不和你们同路，我将自行召开代表会议。当这8个或10个代表发现事态很严重——列宁已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他们明白，这不是开玩笑的，于是向列宁宣布，他们放弃邀请，他们将就此写一份严肃声明，完全追随列宁，从而跟列宁走。

我们认为有必要引述此事。这是个极为有趣的情节，我们将在布拉格会议材料中引述。

我想请大家注意第8期杂志公布的材料。迄今为止，研究反动时期党史的历史学家，完全忽视了巴库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是在〔1910年〕著名的一月中央全会后又过了3周获得通过的。一月全会通过背弃列宁、反对列宁的决定，列宁在会上成了少数。而巴库决议则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参与下通过的，该决议激烈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索柯里尼科夫，他们在决议中被称为调和派，托洛茨基类型的调和派，等等。

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在1910年中央全会后两三周之内的事情。对该决议还需进行研究，因为该文件极具重要性。文件曾发表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应当仔细研究，有可能使该决议成为我党的财富。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介绍了与二大、三大有关的问题，反动时期和高涨时期党内斗争的问题。后来我们又发表了党史中有关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文章，关于布列斯特、关于1923年争论；关于党和右派斗争的文章。以上就是我们的选题。

下面，我们提请大家注意我们文章所要达到的应有的学术水平。我们可能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我们要求每位作者的文章，都要用文献加以证明，要提供事实材料，作者要善于概括事实材料。如果一篇文章证据不足，没有事实材料，对事实材料缺乏概括，那么，它就不会是一篇好的学术文章。我们对每位作者的要求都是如此。

今天我们已踏上这样一条路：我们将一期一期地登载党史的重大日子，即按天、按月介绍我党的历史。眼下我们要在第8期反映筹备和召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历史日程，不折不扣地按天、按周做出反映，从1911年6月直到斯大林同志被捕。此外，我们还将反映讨论工会问题的日程，也是逐日反映，发表地方组织史。我们将逐期地系统发表有关反映党史上这些重大日子的资料。

第三个情况是我们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特别值得自豪的。这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同志们，应当说，我们几乎还不曾公布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这很为遗憾。出现过一份恩格斯揭露对第一国际的诬蔑的文件。现在我们想发表一篇马克思论国际内假分裂的文章。对历史学家们来说，此文非常必要，也许有裨益，我们将在最近予以发表。我们还想发表马克思为准备《资本论》而写的几份极为有趣的资料。其中有他论述国家和所有制的部分，它既十分独特，又有现实意义。此外，同志们，我们还将从积存的两个卷幅中发表马克思的通史纲要。第1卷于8月份发排。它包括14世纪前的时期。第2卷为14~16世纪，两卷中某些属于14~16世纪的摘录，我们将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上。然后从准备付印的28卷中拿出此前从未发表过的恩格斯书信，予以发表。

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献资料，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已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系列最宝贵的文献变成史学家的财富，其中有列宁的笔记和他论无政府主义的提纲。而后我们又把列宁的其他文献公之于众。现在我们将发表一份列宁的极为有趣的文件，首先将令哲学家们感兴趣。一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国外搞到几篇列宁评舒利亚蒂科夫《从德谟克利特到恩斯特的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的短文。这本书里有列宁的极为有趣的短评。我们将发表该文献。短评激烈反对庸俗化，反对舒利亚蒂科夫的思想，而这些人思想衣钵已为波格丹诺夫、布哈林和佩列维尔泽夫等人所

继承。我认为，这份文献对史学家和广大党员将有巨大意义。同志们，我们打算发表斯大林同志的一系列文章。如果斯大林同志允许，我们将发表大量此前在报刊上未曾发表过的文章。眼下，我们将在近期公布斯大林 1917～1937 年间的著作目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这部篇幅为 5 至 5 个半印张的目录。在我们看来，将要发表的某些文献非常有趣。

第五，与党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的旧期号不同；我们以前出版的各期不刊登回忆录，但现在我们将发表回忆录文章。我们在这一期发表阿利卢耶夫和施维采尔回忆斯大林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这两篇回忆录〕对收录斯大林同志的政治生平资料是个巨大的贡献，今后我们将继续发表此类材料。

我们的书刊评介。我们的评介栏办得很不好。的确，在我们这里的另一个并排的房间里，还有另一个机关刊物——研究院院刊。这是不久前才问世的机关刊物。这是研究院的一个专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评介性杂志，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放弃尽量办好评介栏的工作。应当说像《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杂志，毕竟很难搞好评介，因为很遗憾，对党史文献，对值得专门写评述文章的文献，几乎是没什么可评介的。而对地方党史机构出版的某些小册子，杂志要发表书评和批评文章。我再重复一遍，应当设立书刊评介部。我们可以设立，我们不仅应当抓党史文献，而且要抓历史文献。

最后，同志们，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想从你们这儿得到些什么？首先，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今天，在今年的几期，在最后的几期，刊登斯大林同志责成我们搞的党史分期的具体内容。我们应当发表一系列科研和科普文章，遵循斯大林拟定的分期，反映系统的党史或某一时期。由此产生我们的任务——对旧有的分期方法中的错误进行批判分析，即批判分析这种党史分期内容中的相应错误。

第二，我们的任务在于，反映与苏联史和通史有关的党史。同

志们，在这里我们必须得到你们的帮助，以使苏联历史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得到反映。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研究苏联史的专门性文章，我们必须发表苏联史的某个时期的概括性文章。这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史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在这里，我们寄希望于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将召开一次史学家会议，会上我们将听取有关党史的报告，同时在那里我们将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具体计划，说明希望从同志们那里得到什么。

同志们，今后我们应当向党发表一批至今尚未发表的文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但可以设想，我们发表的文件是相当有趣而且重要的。

十月革命20周年前夕，列宁研究院将专门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十月革命20周年专号的具体计划问题。这一期将包括，第一，几个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对十月革命史的阐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军队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战果问题，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

同志们，最后是关于地方党史机构的问题。我们有这样的机构，但它们对我们帮助不大。今天杂志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以使这些地方党史机构能给我们提供地方党组织史方面的文章，不这样就根本无法将党史研究提高到应有的学术水平。我们和它们有联系，我们希望得到一些东西。

这里有个条子。一位同志问：“为什么你们一直不想刊登马克思的《秘密外交》？”^①有些人想得很简单，找到一篇马克思秘密外交的文章，为什么不立刻予以发表？

同志们，问题需要极其仔细地研究。有些段落可能不是马克思写的，这种情况不能排除。此事需要研究。

^① 指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有人从座位上喊：梁赞诺夫有时间发表这篇文章。

雷克林：您呀，同志，大概不了解情况，因为问题不在于找到文章。应当发表它。但文章需要研究。您读过它吗？

答：从梁赞诺夫那儿读到的。

雷克林：你们只要认真在梁赞诺夫那儿读读，你们就应当明白，这篇文章尚需加工和解释——是否完全出自马克思之手？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文章需要研究。

当这位同志说，梁赞诺夫发表了，而我们没发表时，我要说，文章需要研究……（大厅发出喧闹声）。

您指的是，该文数月前就译出来了。可能会发表几章，也可能整个著作将不予发表。看来这是清楚的。

有人喊：不清楚。

雷克林：我再解释一遍，需要研究，整个著作是不是马克思所写，抑或出自反对马克思的人之手。

主席：我想，这是清楚的。

收到好几张条子，都是给一个报告人的，给卢金同志。能答复这些条子吗？

卢金：一张条子说：“杂志刊登明显反革命的文章，这是怎么搞的。难道你们在刊载前没读过它们？”

我一开始就对你们说了，这种状况说明，责任编辑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和粗心大意。这首先是缺乏政治警惕性；第二，我们编辑部自身的工作中缺乏足够的规则。存在许多玩忽职守、毫无计划和缺乏监督的情况，这就有可能造成下述事实：质量低劣的材料终究还是通过了，这是由于编辑或其助手监督、注意不够。当然还必须考虑到，在8个编委中有3个实际上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现在他们坐牢了，如果编辑和助手对杂志不十分关心的话，他们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易被识破；此外，这种政

治上的盲目无知和粗心大意也有可能让此类反革命文章钻了空子。这就是原因。

问：为什么由月刊改为双月刊？

答：1935年我们曾尝试出月刊，但应付不过来。如果看看1935年的杂志，你们会发现许多合刊。这表明，编辑部完不成这项任务，它不善于依靠十分广泛的作者集体，不善于组织这样的集体，不善于在编辑部内部精确地组织自己的工作。杂志误期，不得不出〔几期的〕合刊，走阻力最小的路线。

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为什么不介绍东方国家史？

答：我今天由于马虎，漏掉了提纲上的这些问题。应当说，杂志几乎没给东方史，如印度、中国和日本，留下篇幅。也没给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史留地方。这是个很大的空白，这位同志是对的，他提醒我们，应当提出这个选题。

问：你们未来的工作计划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地方讨论的？

答：初步提纲由编委会内部制订。召开了相当大的会议，与会的有我们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我们杂志是研究院的机关刊物。编辑部提出的这项计划得到一系列补充，都是我考虑到的。今天，通过展开争论，还会提出大量问题，我也将予以考虑，这样就能制订出一个较为详尽的、充分展示前景的计划。

问：从哪儿选拔通讯员？

答：我已经说了，通讯员至今都是偶然得到的。我们从各科研机构取得情报资料，但主要是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如果不算科学院自己的分支机构的汇报，那么我们就不能从地方上得到这类材料。与加盟共和国、与边远的共和国和州中心缺乏联系，这是我们的根本缺点之一。在我们得到这样的通讯员之前，我们就无法和这些机构联系，我们将不会有吸收新作者的一个重要源泉，同时我们也不会得到有关我国学术生活的系统的和十分专业化的信息资料。

No 11685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林德赛逝世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年8月18日）

不久前收到在苏格兰圣安格鲁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一封使我十分感动的信。根据林德赛小姐的要求，告知我那位亲爱的老头儿、中世纪拉丁文字学“先生”林德赛（现在我事后为因在我书里对他表示“敬意”而“遭罪”几乎感到自豪）不幸去世的噩耗，我的那位来信的人告诉我，去世的林德赛教授对我的才学很赏识，对我来说，这一沉寂的声音的回声使我深深感动。

№05127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
关于别涅舍维奇的专著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年10月11~12日）

我想简要地告诉您另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您已从报上知道了，这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别涅舍维奇有关的很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事件。他今年在慕尼黑出版了一大卷希腊-拉丁-斯拉夫（带有斯拉夫典范注释）典范文字：是他35年工作的结晶，是他当时跑了世界上许多地方、许多图书馆的成果。正如他所说的，他在战前和革命前以及战后和革命后多次建议我们的科学院出版这本书，也正如他所说的，最后一次是1933年和马尔谈论这件事的，后者建议他当时哪里向他要就给那里，他就给了慕尼黑科学院。

您是知道的，我不大喜欢B.H.^①，一般来说也不完全相信他，但我确信这件事在这种场合下是合乎事实的。回忆这些年马尔的情绪并考虑到尽管这是在1933年，但那时在我们这儿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希特勒分子作为一个“危险的”和最终确立的政权的进攻，大概马尔也还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至少，这本书的出版引起我们大学舆论异乎寻常的愤怒。问题被提到教研室讨论，这一讨论是在难于忍受的沉重的形式中进行的，其结果B.H.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讨论以做出严厉谴责而结

① 指别涅舍维奇。

束。尤其严厉的是，尽管在会议开始时书的作者作了自我谴责，声称，他“现在明白了，在黑暗势力和仇视人类的巢穴里发表自己的著作是令人厌恶的行为”，然而接下去他又陷入了自我矛盾中，他说，“如果大学认为需要，那么他准备以后几卷（第2、3、4卷）不给巴伐利亚科学院，尽管他个人对此感到伤心并将因此和他的朋友施瓦尔茨^① 争吵，而且施瓦尔茨可能会降低他在西方学者眼里的地位。”

我无法对您说，这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多大的爆炸。无疑，这说得非常不好和奇怪。怎么能在为自己的行为谴责自己（而且很严厉）的同时，出于“友好的感情”却说要继续自己的行为的愿望……听了他第一部分的话感到同情和怜悯的人后来都非常愤怒，那些已经这样愤怒并装上弹药的人，我就不说了。结局是一系列决议：严厉谴责、向系主任提出教授的行为与地位能否兼容的问题及许多别的问题。作者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他哭着，说道，现在在一切方面他都信服了，并要收回以前所做的一切。难以用语言形容。今天我得知他在公共图书馆也递交了辞职书，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但他在科学院的位置和合同怎么办呢？我极为沉痛地想着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我认为一切是他自己的错，甚至我无法明白他怎么能这样做。这是这些天我们感受最强烈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不断地被这一情景所压抑，其细节就不说了。

^① 施瓦尔茨，爱德华（1858～1940），德国古典哲学家，出版家。别涅舍维奇1912年与他结识，很早他们就设想合作出书的问题。

№05128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关于拜占庭学家的命运
致彼特卢舍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7年11月6~7日）

……感到非常忧郁的是，您写了关于我们的拜占庭学家……但如果他的命运使我伤心，那我不能不说，他的策略完全使我惊讶：他对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理解，对不能不看到的可怕斗争的真相不理解……

No02270

斯大林在宣传员会议上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年10月1日）

（速记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我原想，聚集在一起的同志们会帮助中央委员会并将提出一些重要批评意见。很遗憾，我应当指出，批评是轻描淡写的，不深刻的，而某些地方简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认真的批评会对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央委员会不是一切都能看到，也不能看到一切。你们在各地工作，你们从一个侧面见到一些事情，我们在上面——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而把上面的和下面的经验结合在一起那就好了。但是没有得到这种结合。你们走马看花地滑过去了。

有人说，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太少——一些人在埋怨。这是对的。当然，谈得太少了。可以谈得更多一些。于是，据说，工人们在问：“为什么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这么少呢？”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乌拉尔人、巴库人或者哈尔科夫人，如果有的话，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关于我们的事情谈得这么少呢？”如果按照演说家在这里所叙述的那种宗旨来作判断，就应该满足一切人的要求，谈谈乌拉尔、谈谈莫斯科、谈谈列宁格勒、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他们有过非常伟大的业绩，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有过，谈谈罗斯托夫、谈谈巴库等等。这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不是联共（布）的党史了，而是我国各个地方的革命

运动概况汇编。这是中央不想做的事情，因为这类概况汇编我们多得很。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简单汇编，而是需要党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总结的历史。

所以，从这方面批评简明教程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任务是什么。最容易不过的事就是，如增加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增加一些关于乌拉尔的情况，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了！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巴库，但这将成为贪多嚼不烂的事，这将不是联共（布）的党史。

另一些人埋怨说：“譬如，关于农业问题方面谈得太少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譬如，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都做出过一些决议，而在教科书中却丝毫也没有谈到”。中央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叙述我们党过去的农业方针，那末，应当全面地叙述农业问题的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曾要求把一小块土地归还给农民。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否具有代表性呢？这不具有代表性。这不能说明党的农业问题方针的全部状况。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过没收所有的公有土地的问题。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呢？不，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农业问题方面的政策实质在于，在把全部土地没收充公的情况下，宣布对所有一切的土地实行国有化。这个观点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明过。关于这一点在党史简明教程中作了说明。还需要什么，让人不理解。

有人说，关于民族问题谈得少了。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党的主要决议作了充分的叙述。你们还想要我们说些什么呢？要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叙述列宁及我们党的其他理论家的文章的详细内容是不可以的！依我看，这是多余的。

第三部分人埋怨说：他们说，丝毫也没有谈到我们党为党章第

一条款所作的斗争^①有什么国际影响。是的，好像，谈过？

喊声：谈过，谈过。

斯大林：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我们为党章第一条款所作的斗争对无产阶级国际运动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理解这一点。同志们，这是胡言乱语。为争取这一条款所作的斗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国际影响，没有任何的。他想说什么？他在那里？让他来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曾为党章第一条款进行了斗争，而西方社会民主党左翼最优秀的人士反对过布尔什维克：罗莎·卢森堡^②，巴甫洛夫^③反对过。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把这种情况称为布尔什维克争取党章第一条款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什么叫作不是影响？（笑声）。

至于谈到问题的本质，谈到我们党章第一条款在我党的历史上的意义，那末，依我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并无必要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作冗长的叙述。

有人说，关于1905年革命对国际的影响问题谈得太少，或者丝毫没有谈到。很对。而且对1917年的革命的国际影响谈得更少。但如果研究我国三次革命对国际工人运动国际影响或国际作用，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成倍地扩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范围。

^① 指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的第一条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当时列宁提出，承认党纲，在物质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活动的人均可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则主张，只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而无需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便可称为党员。每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都能宣布自己为党员。当时是马尔托夫的主张获胜。

^②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和波兰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代表之一。

^③ 此人身份不详。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研究联共（布）党史的一些问题。所有现存的教程或是教科书中的缺陷中的一个通病是，他们想怎么教就随便怎么教，——1905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添枝加叶详细地叙述了好几页并丝毫不谈比1905年的革命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1917年十月革的国际影响。

为什么这样守旧，用老习惯把1905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提到首位，而丝毫不谈1917年革命的国际影响呢？这对还是不对呢？不，不对。一切都不成比例，不相称。

如果谈我们的所有的重大措施——我重复一遍，他们都具有国际影响，势必写出的不是联共（布）的历史，而是写的我们三次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历史。这倒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而第二^①，简明教程不能经常离开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党是怎样发展的这样的主题，而转到不是本题的其他实际理论方面去，去论述1905年革命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或1917年的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国际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埋怨说，关于共产国际大会谈得太少了或是丝毫没有谈到，多半是谈得太少了。我熟悉联共（布）党史方面的一些教科书，书中相当详细地说明共产国际大会的情况，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要么应当写联共（布）党史，要么写共产国际大会的历史。两者中写一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胡言乱语，这是国际主义，这是沿着树干四处漫流，当一个人失去目标时，他就开始向各种题目四处漫流。中央委员会，这样说吧，不能去仿效到处游荡、四处漫流的那些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的目的是希望让这本教程去说明联共（布）党的历史。你看这里提出的所有批评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太少，是轻描淡

^① 原件如此。

写、浮光掠影的批评。

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抱的目的是什么？中央委员会已了解，我们图书界有大批的简明的和非简明的各种教程、指南，搞出许多波波夫^①的、布勃诺夫的、克诺林^②的、因古洛夫^③的的各种的政治常识教程。中央委员会知道，各类指南、教科书、政治常识教程、各类文选读本多得要命，这真把人弄糊涂了。党员同志们不知道，选择什么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没有任何一种教程、没有任何一种选读本或是政治常识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鉴定、签证，因而这更加把人们搞乱了。人们不清楚，买谁的更好，买雅罗斯拉夫斯基^④的，买波斯佩洛夫^⑤的，买克诺林的，买布勃诺夫的，或是买波波夫的，还是买随便什么人的。在教科书这样丰富的情况下，在观点上缺少实际上的统一，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鉴定。这一切造成了人们头脑中的紊乱现象，而且连我们党的干部们也不知道买哪种好，需要紧握住的指南针在那里，不声不响地认为，如果给我们一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或是波斯佩洛夫的教科书，这就意味着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但同时又怀疑了起来，有没有同意？的确，没有得到中

① 波波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91—1938），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著有《联共（布）党史概要》、《乌共（布）党史概要》等。1938年被镇压，苏共20大后获平反。

②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副处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筹委会成员，1938年在教程出版前被镇压，1955年获得平反。

③ 在联共（布）中央负责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任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

④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科学院院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筹委会成员。

⑤ 波斯佩洛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98—1970），党务活动家，院士，历史学家。从1934年起任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处长，后任副部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筹委会成员。后来又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书记。

央委员会的任何同意。有人曾委托过写本教科书，而后来中央委员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鉴定这本教科书，这可就不好了，这是一个错误。可以用工作负担过重对此加以解释。工作负担过重未能有机会从头至尾审阅那怕教科书中的一种并给予签证。情况就是如此。

怎样摆脱这种状况呢？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对联共（布）党史给予指导，并希望能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在学习这种指导的时候，希望党员和积极分子不要产生任何的怀疑，希望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在这方面能看到中央委员会向他们所推荐的东西。

那么首要的任务——从各式各样的、多种教科书、教程、选读、政治常识中，从这种混乱中进行挑选，我想说，要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对这种指导不会产生怀疑——这就是中央委员会所正式建议的：应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这是首要的任务。

对联共（布）党史的材料应当怎样讲述，应当怎样沿着批评此书的同志们给我们所指出的道路去叙述？当然，他们是为中央委员会好，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片紊乱，完全是一团糟。

问题不在于想要去描述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切事情，问题不在于想说很多的事情，想说一切事情，问题在于要使这本教科书，简明教程，或是随便叫什么名称，使其能包括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的关键问题，党的主要发展阶段。围绕这些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说明这些阶段特点的一切主要的问题上。

在我们党内有什么样的阶段呢？我认为，我们党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三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想称为：“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或是按另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开头的四章叙述了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要谈论某些事情的一切细节，问题在于在四章中

对所叙述的一切事情要围绕主要的轴心，围绕着从1900年到1912年，到布拉格代表会议^①。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的一个阶段，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的阶段。应该这样去安排材料。

由此可以看清楚，为什么简明教程把重要的注意力转向列宁的这样一些书，如《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两种策略》^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好这4种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切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准备从政治团体组成独立政党的东西。由此拟订开头四章的计划。与这个计划比较，所有批评意见，如某段对民族问题的某些细节没有谈到，某段关于莫斯科谈得太少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是尘土。主要的问题在于，要让开头的4章指出一切本质的东西，并能说明布尔什维克为建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斗争的特点。这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以下3章：第5章，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到第4章结尾和第5、第6和第7章。^③

这个阶段，或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

① 通常认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正式分裂为两个独立的政党。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实际上，布拉格会议并没有把整个孟什维克派开除，被开除的仅是其中的取消派。而且会议还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派进行斗争。而“一切护党分子”首先指的就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他们并没有被开除出党。还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出席了这次会议。只是在会议后，孟什维克不服从会议的决议，因而同布尔什维克脱离了关系。但两派仍旧共同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直到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之后布尔什维克党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后面加上了“布尔什维克”字样，以示区别。1918年3月在党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才改名为俄共（布）。

② 全称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1卷。

③ 原文如此。更确切地说应是，“第二阶段包括第4章的结尾，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和第5、第6、第7章”。

个特殊的时期。党成立了而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着，它在为开辟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而斗争着。我想为这个阶段加上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

所有的缺陷，如哪一点没有谈到，哪一点没有强调，——这一切都是琐碎小事，与说明党的两个阶段特点的那些主要事实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事实及引证应围绕这些重点。因此，一切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意见，都偏离了摆在简明教程面前的任务，即搜集事实并集中思想，使它们像聚光灯那样照耀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第三阶段——剩下的5章：第8、第9、第10、第11、第12和结束语。可以给这个阶段加上这样的标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是的，布尔什维克在执政。

这就是作者在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所遵循的提纲。

现在你们自己来评论一下，不把党史中的三个主要阶段当作教科书主线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意见有什么价值，并强拉着我们向那边走，结果让我们出版的不是党的历史，而是革命运动在俄罗斯一些主要地区的概况汇编。这种汇编可能会使每个工人满意——乌拉尔人来了并说：“关于乌拉尔怎么样，谈到了？”谈到了。“嗯。还行”。（笑声）。哈尔科夫人来了并问：“关于哈尔科夫也谈到了吧？”你瞧，小伙子，这里谈得很少。“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用处？”巴库人来了并问：“关于巴库怎么谈的？”漏掉了。“漏掉了？嘿，那是什么简明教程，又有什么价值”。

你瞧，你们看见了吧，有两种观点：要么指明我们党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主要路线，所有的事实都应围绕它们，要么，我重复一下，向树干浇水，形成四处漫流。

所以，出版这本教科书时，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这是惟

——一部经中央委员会核准的、手续完备的、具有中央委员会签证的、统一的教科书，这是统一的指导，希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对它要有信心，这不是波波夫，这也不是因古洛夫，而是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在于，要去消除近年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脱节的现象。你们要知道，我这里有一份为党的教育小组准备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学习计划，你们看，共有 11 个专题。大概，大纲你们是知道的。第一个专题——讲座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第二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到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第三个时期——从俄国革命开始，等等；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形成和发展；列宁与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和继承人。

这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列宁奠定了基础。其余的一切谈的是列宁关于斯大林的书写了些什么^①，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②一书的那些标题丝毫不差，完全相同。这本书叙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新的、特殊的贡献。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假如列宁没有给马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其原意大概应为：“关于列宁，斯大林的书写了些什么”。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克思主义宝库的极重要的部分带来任何新的贡献，我们就不会有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我不想说，斯大林在书中对一切都谈得非常详细。如果仔细地去读，不是2~3遍，而是10遍，15遍地读列宁全集，那末在那里可以发现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多得不可比拟的新思想、新方针、金刚石。但不管怎样，斯大林的书是试图叙述列宁带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主要的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或多或少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研究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就足够了。绝对没有的事。在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相比较的过程中叙述列宁提出的新东西是一回事，提出怎样研究列宁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当学习恩格斯的著作。列宁一向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他是正确的。当然，这不单是他谦虚，而是历史事实。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学习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或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其他政论著作，还要学习像《资本论》这类的主要著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认为，什么《资本论》？在苏联资本主义早已经完蛋了，是否还有必要花精力去研读《资本论》这部书。同志们，这是错误的。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有、并有论证。

凡是想研究列宁主义和想研究列宁的人，都应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西。列宁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的思想是因为，他肩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任。新的思想是好的，但是要知道，新思想所负的责任也是好的，这是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一切都是这样一回事，同志们，不了解它们是不可能弄懂列宁主义的。而在我们的一些大纲中，大概地说，出现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现象。

因此，《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在于，要消除这种分离现象并把马克思提出的东西与列宁提出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第4章要完成这项任务，整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第1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要完成这项任务。把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联系起来。史册所谈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个别草稿，如分散的、顺便说出的想法或是在来往书信中某处顺便说出的论点，这些思想怎样被列宁抓住并进一步发展了，而又用新的观点提出论证。这一切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尽可能地都提到了。

因此，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就在于堵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出现的缺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基础提出的东西与列宁继承发展了的东西之间的缺口。因此，要更好地、科学而更准确地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使作为列宁主义基础的旧东西与作为这些基础的继承和发展的新东西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第三个任务在于，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的历史时期中的作用。因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以讲授的方法在人所共知的前提基础上概括某些思想；但也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在并非杜撰而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从而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史数十年的时期内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就是说，第三个任务就在于要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授变得简捷，当然要简捷，不是按叙述某些前提和思想的演讲叙述方式进行教授，而是要在联共（布）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第二种方法——不是演讲的方法，而是历史的方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你们是与事实打交道，你们能够查验大量的文献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判断列宁主义的价值是

什么，当历史向我们提出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时，而它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这是一所学校，这是很大的考验。假如在几十年的时期内理论证明自身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它是有某些价值的。这就是第三个任务。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个任务在于，要在这本不太厚的书中证明、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表明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和意义。理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旧规律不够时去发现新规律的指南。这是很好的事情，请你们确实相信。而且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认真地去学习。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有很多人认为，理论——是很困难的事情，怎样才能掌握它呢？不对的。理论同一切知识一样——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東西，要有掌握它的愿望，最主要的是，不要头一回遇到障碍就退却，不要躲避障碍，而要迎着它，克服它，而在不能迎着上的地方，就用迂回的办法来克服，那么理论也就为你们掌握了。

这样，要用历史事实来指明我们党的发展，指出理论的力量和意义。我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尤其令人信服地谈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们要想一想，假如列宁和列宁周围的那些人，他们人不多，假如他们在1917年4月没有提出从民主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方针^①，党就会迷失方向，在黑暗中徘徊。我

^① 指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后，于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说，即所谓的《四月提纲》。当时不仅资产阶级反对列宁，孟什维克反对列宁，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当场站起来维护列宁观点的也只有亚·米·柯伦泰。但经过列宁的不懈努力最后才为党内多数逐步接受。（《四月提纲》的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情况，——在黑暗中徘徊。结果列宁回来了，提出了新的方针，于是大家开始明确了：党把事业推向何处去，党知道它的目的何在？这不，我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讲清楚了。假如说没有四月提纲，没有党的这一新方针，没有新方针，革命就会遭到失败，我敢保证，苏维埃就会变成附属品，变成预备国会，围着这个不幸的民主共和国转，并会失去很多东西。你们瞧瞧，理论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善于发现新规律，假如新的规律不能很快被发现，那就提出路线，给个引导事业向何处去，确定打击目标为谁照明灯。

或者，譬如，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吧，沙皇已被打倒了，克伦斯基^①及李沃夫^②总理也在摇摇欲坠。而下一步事业将向何处去，没人知道。大家都说，俄国还不发达，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好想的，这里哪有什么社会主义，上帝保佑，就维持民主共和国的状态吧。人们是这样说的，社会舆论也是这样的。你们想象一下，党也是这样指示方向的，俄国在政治方面不发达，文明程度也不高，——这儿哪有什么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有人曾这样说：你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上帝给你们的那些自由，暂时设法抓住并保持住。这也是普遍的风气。而伊里奇却闯进了这个泥潭并说：“不，不对。俄国已经成熟到了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他也正在证实这一点。如果没有列宁的这个小组及其着手这项事业

①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曾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1917年7～10月任总理。

② 李沃夫，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1861～1925），立宪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1917年3～7月任临时政府总理。

的学生们从理论上提出根据，并不顾大家的反对，开始努力向前奋斗，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理论，先进理论给你们带来的力量和意义！中央委员会就是想以简明教程来向我们的干部证明，理论的力量是伟大的和无法估价的，证明没有它，没有理论，党势必有时在经验主义的黑暗中徘徊：今天指示你向这个角落走，向那边瞎闯，明天指示你向另一个角落走，像一条瞎眼的小狗向那边瞎闯，明天从背后把你拽回来，往回走，这就是你的领导！这算什么领导？要领导就应当了解情况，要有预见，而为了善于预见，就要掌握理论，也就是说要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理论。

或者，譬如拿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怜的人——民粹派，当他们想把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活动的基础和支柱力量时，他们为什么会受挫？他们受挫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构成了大多数。为什么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或是如他们所说的无产者时忸怩作态？因为无产者人数很少，要手持蜡烛去寻找无产者。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解体，与农民相联系的那种生产形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有理论才能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社会上数量不多的少数无产阶级。抓住什么阶级作为依靠力量，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党的命运。民粹派的失败即在于此。

或者，譬如，他们希望在俄国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从农村，从村社开始，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发展最简单、最起码的规律，不懂得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在起领导作用，不懂得社会中的领导力量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不懂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要从城市开始。他们说，城市是毫无希望的事情，说城市——是又脏又乱的地方。而农村——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是村社。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不懂得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决定着农村的命运。

这就给你们指出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民粹派——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另一种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掌握了理论、懂得历史发展规律，推行一条能取得成绩的正确路线。那就是说，第四个任务：要在这本最简明的教程中证明理论的力量和意义，以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尤其要去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牢记住，这不是什么困难和大不了的事情。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可以十分容易、心安理得地去掌握它。不要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顶聪明。他们也是如你们一样的非常普通的人，懂得的东西比你们还少，读的书也比你们少。现在给了你们非常丰富的书，在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们当时弄不到书，我们也见不到书。我记得，在1898年梯弗里斯，为了租《资本论》第一卷来阅读，我们，这些穷光蛋，每人5戈比，将近100人，凑够了25卢布，将《资本论》租来看了两星期并把它抄下。而你们现在手头上有各种书。权力是你们的，出版是你们的，所有的书也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会很容易地就掌握理论。好吧，而如果不想去掌握——那是你们的事。

第五点，中央委员会出版简明教程，任务是为了使我们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们的领导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避免简单化，避免对某此原理的庸俗化，避免低级趣味。

例如，常常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描写成仅仅是护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要进攻，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他们反对战争”。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归结为这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不对，不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懂得各种战争之间的区别并完全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开始进攻。我们还记得列宁在《论欧

洲联邦》^①的著名文章中所说的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了政权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之后，形势将迫使其对其余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征讨，以便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应当对布尔什维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切精微处、一切细微差别、方针说明清楚，说明布尔什维克不单纯是为和平而伤感的和平主义者，仅在有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的。这不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形势比较合适，如果条件有利，布尔什维克也将主动进攻，他们将主动开始攻击。他们完全不反对进攻，不是反对任何的战争。我们现在大声呼吁防御——这是面纱，面纱。所有的国家都在掩饰：“与狼生活在一起，就不得不学狼嗥”。（笑声）。敞开心扉地坦白是十分愚蠢的。人家会说，你们是大傻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有点儿被庸俗化了。有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已经夺取政权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没有考虑另一面，即社会主义很快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不仅教导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个别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落后，一些国家刚开始起跑，但列宁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一些国家落后，另一些在起跑，一些在作战，另一些在搔痒，同时进行打击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与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相对立。可不知什么原因，这第二句话人们通常避而不谈。什么是发展不平衡？如果说所有国家都平衡发展的话，可以说，进行打击时所有的国家也都同时

^① 此文的确切名称为《论欧洲联邦的口号》，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

成熟，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说，同时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列宁曾说过：“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天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了，明天另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落在后面的其余国家逐一在赶过去，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在发展，一些国家落后了，另一些又跑到了前面。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成熟的程度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可能同时取得胜利。这是傻话。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方面人们避而不谈，而仅谈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这没有充分地表达列宁的观点。应当对这一点说清楚。一些问题在普及的过程中被简单化了。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教科书、政治常识、各种文选中简单化导致了庸俗化、低级趣味。

或者，譬如，关于抵制杜马的问题。所有的教科书都对读者避而不谈在抵制第一届杜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结果在这里进行了掩饰，而这有什么好掩饰的？抵制还处在妊娠中的布里根杜马，抵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埋葬了它，在全俄罢工的情况下没有让布里根杜马诞生。

而后来的维特杜马，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召集的杜马，我们也对它进行了抵制。在塔墨尔福斯^①代表会议上决定抵制。所有的教科书都隐瞒这件事是不对的。列宁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错误不大，可以很快纠正这个错误，也很快地纠正了，但这总归是个错误。

而你们是怎么想的，历史可以修改吗？历史应当是与事实相符的，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丝毫不能增补。我们这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评论50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这怎么可能呢？

^① 即芬兰的坦佩雷市。

在圣弗拉基米尔^①时代宗教起过积极作用，当时是多神教，而接受基督教还是后来的步骤。现在我们的哲人身处20世纪，他们从新形势的观点出发，说弗拉基米尔是下流的东西，多神教徒是下流的东西，而宗教也是下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辩证地评价所发生的事件，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时间、地点。

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历史既不能往好改，也不能往坏改，根本不能有丝毫的增补，它是怎么发展的，就应当怎么叙述，不能有丝毫增补。比如在抵制第一届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并应该去纠正，这要不容争辩地去纠正。

或者，譬如，有人把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庸俗化了，他们说什么，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基础，上层建筑算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它的作用是不值一提的，他们把这庸俗化了并陷进了低级趣味的泥潭。而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对此作了强调。列宁是专门深入研究先进思想作用问题、并发展了社会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组织人们、动员并引导他们将旧社会改造成新社会。新思想是在经济方针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新思想，对行为的改造、对革命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新的思想如同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必须的，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这被庸俗化了。在这被简单化后，社会理论的积极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滑到了经济唯物主的或者低级趣味的唯物主义路线上去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丝毫共同之处，——这是简明教程的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要清洗脑筋，以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

^① 圣弗拉基米尔，即弗拉基米尔（960～1015），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980～1015）。他在基辅确立了统治地位后，立即将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众多神祇的偶像树立起来，顶礼膜拜，企图以此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国家的统一。

化，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袭，使其不被低级趣味化。

于是，第六个任务是提供这种统一的教科书或是统一的教程，要使书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或多或少地集中起来，因为这将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宣传质量。

对我们，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十分清楚，宣传质量大家不很关心，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数量上，希望网点能多些，希望小组多一些，办公室大一些，想炫耀一下：瞧我们这里小组有好几千了，而你们那里有多少？没那么多，就是说，你们的事情没有办好。完全有可能，哪儿少哪儿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这样一来，出版这本简明教程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从数量强度转向广度，转向质量，转向提高宣传质量。中央委员会出版这本简明教程，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宗旨。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理论问题上。你们这些宣传员坐在这里，当然，你们感觉到，在学习时或是在学这本教程时，好钻研的人会来向你们请教许多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们没有谈这些问题。你们会说，因为在教程中没有叙说这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那样一些问题？你们会说，当然，有这些问题，在课堂讨论中，在小组里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向你们请教，你们不但不把问题提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避开这些问题。你们愿意躲起来，而我尽量设法把你们拽出水面来。（笑声）。

以恩格斯为例子。在简明教程中是这样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及社会政治、社会意识的发展。讲述这一点不受任何时期的限制。而有人就会来问你们：“对不起，恩格斯不是那样说的，而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

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

宣传员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这一点对还是不对？我认为，这不对。在任何条件下形态往往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往往如此。恩格斯引证了群婚，引证了母权制。但母权制本身也是繁衍来的（正如现在大量的材料对此所作的阐释一样），即在当时，男子去打猎，而打猎不是获得食物的经常性源泉，妇女从事原始的农业，栽种作物，从鸟巢里取蛋，取鸟雏，驯养禽类。当男子打死扁角鹿后，把活着的鹿的幼子留下，妇女们将这些鹿的幼子拿去驯养，这样，妇女就成了奠定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基础的第一个群体——即简单地驯养禽类和动物。她们（妇女们）或多或少地有了些经常的食物储备。事实说明了什么？男子打猎归来，什么也没有猎获到，向女人乞讨：“给点吃的吧！”——“没有什么吃的，再回去，去打猎”。而男子便坐下来像小孩子一样地哭泣，因为是野人，不太像人，他们央求，哭泣，要吃的。这就是母权制所建立的基础。

在从原始的农业转向畜牧的生活方式之后，妇权（母权制）也就失去了意义，家庭也变化了。

恩格斯试图把家庭形式和生产形式作为两种起同等作用的因素相提并论，存在着推翻这种试图的事实。马克思从来不赞同这种观点，从来不。顺便提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作过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6。

任何一点儿暗示，无论是注释中还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他们是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家庭》的呢？伊里奇在其《人民之友》^①一书中说“大概这属于非常远古的时期，人和猿猴还不能区别开的时候”。别尔托夫^②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怎么，你们在挖苦我们？”米哈伊洛夫斯基^③当时也挖苦过我们——“他说，你们说什么？时而是生产方式决定，时而是家庭决定？你要明白，忽而这个，忽而那个，将会有什么结果”。普列汉诺夫也不承认，并说这应当从下述观点来理解，即从这属于什么时期，也就是说从属于那个当时连人与猿猴都不能区别开来的时期来理解。试问，难道我们在研究猿猴，而不是在研究人？这种理论是属于猿猴还是属于人类社会？如果理论是属于类人猿时期的，那么就给猿人留下吧。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在其中处处都是基本因素。

血缘氏族，氏族公社。什么是血缘氏族？对它是如何定义的？就拿家庭为例来说。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是贫穷的，食品缺乏，而人在繁衍，家庭就要分成若干个单位，一批人就应当从家庭中分出来。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上，还行吗？不，当然不行。生产资料不允许一家的人太多。于是就产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萌芽。结果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血缘氏族，而是那种辅助力量，即生产工具状况，生产工具状况为在该领域内拥有达到一定范围的大的氏族公社提供了可能，而后来当它无法维持大的公社生活时，这些公社

① 列宁 1894 年的著作，全称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此书是列宁与自由民粹派理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论战性著作。

② 普列汉诺夫的笔名。

③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最著名的理论家。

就解体了，由两个分成了4个，血缘氏族就渐渐消失了。

依我看来，这是冒险的事，它不完全符合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所学的东西，应当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起同等作用的两种基本因素：家庭和生产方式。只有一种形式，即生产方式，它决定了社会形态、家庭形态和婚姻形态。

我不知道，难道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问过吗？没有问过是不可能的！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处都写着：“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而在这里“在一定历史时代和某个国家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或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这是什么样的胡说八道？这不对。如果要我提建议，那么我建议你们，如果人们向你们请教的话，他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在简明教程中说的是一回事，这里说的又是另一回事”。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不对。我们的理论家不是那样处理的。例如，以米丁^①同志为例。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第2卷。米京同志，他在这里吧？

喊声：在这里。

斯大林：他引用了这句引文，但很巧妙，巧妙地引用（笑声）。他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样的引文：“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这些。什么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没有说明并对读者暗

^① 米丁（1901~1987），哲学家，1939年起为院士。在这次会议上，米丁在“论简明教程”的发言中说：“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是我们全党的一个真正的节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又多了一部著作，它与一些经典性的思想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一些著作一起放在最前排列是无可怀疑的”。

示，这反正都一样，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余的一切他都撇开了。为什么？不适用的——（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他都撇开了。依我看来，这里不必使用巧妙的办法，也没有必要断章取义，虽说这引文是恩格斯于 1884 年提出的，当时马克思已不在人世……最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诚实地说：“依我们之见，这是对的”，或是说，“依我们之见，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钻研的人会向你们提出来的，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不管怎样都要明确地回答——或是，或不是。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的问题。经常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国家就要消亡。为什么它不消亡？该消亡了，20 年都过去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而你们还不想消亡（笑声）。

真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消亡？这个问题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我给你们读一读恩格斯的某些原理，而且不仅是恩格斯一人，而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那种论点，我所读的也是很多人所遵循的论点。

这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这里国家为什么不消亡，它什么时候最后消亡。你们熟悉关于国家的理论。你们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抗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工具，国家是秩序、是保障、是多数服从少数。如果阶级和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也得存在。当敌对的阶级消亡了，国家就该消亡了。这是你们所熟知的普遍原理。

以此为根据，恩格斯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

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国家形式上是社会代表，而实际上仍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在粉碎资产阶级和出现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国家第一次能够在实际上代表社会说话。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这将是这个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到那时，国家政权对这方面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国家就逐渐自行消亡。到那时，对物的分配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取代政府对人的统治。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逐渐自行消亡的。这就是说，当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在整个历史上取得所有权时，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

这也将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在这以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我们在1918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行动。但为什么国家还不消亡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是，例如，有这样一句话：“国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个祸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又能是什么），它以继承的方法传给了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像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刻消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一直到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后才能抛弃国家组织这个废物”。^②

对这个问题人们是如何看待呢？这一切是否都正确？资产阶级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② 该引文的出处和作者不详。

被推翻了，它的政权被摧毁了，按照我们的理论被打碎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政权不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旧的国家机器被毁坏了，旧的国家机器由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取代。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在此之后它的作用开始失去效力，逐渐消亡。这正确吗？据我看，这是正确的，但仅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假如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的国家，至少是在大部分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假如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周围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那时，大概国家政权就不需要了，它应该消亡。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那时该怎么办？这一理论对这种情况是否适用？不适用。20年来我们的全部实践，我们的全部工作——它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毫无疑问，——这一点正得到证实。须知理论是怎样发展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怎样产生？在实践中，或是在实验室，或是在群众的实践中。社会也是实验室。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实践常常发出信号说，某种理论不完全适用，说这种理论是有害的，像巴巴宁^①报告所说的那样，有关北极的理论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请作些修改。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理论与实践要相联系。理论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斗争过程中的实践又在不断得出理论应该注意的新的经验。

在1905年以及后来1917年2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我国出现之前，经验证明，民主共和国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法国、德国等国革命基础上产生的，那里的民主制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① 巴巴宁（1894—1986），苏联第一个漂流站——“北极”第一研究站的站长，苏联英雄（1937、1940），第一、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但是革命运动，即实践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代表苏维埃。当然，彼得格勒的工人，当他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在按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理论进行大变革。他们不过是想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帮助下实行自卫以抵抗沙皇。1917年2月，当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后，其倡议者也没有料到，能由此搞出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过是想有个可依靠的特殊据点，以便打击敌人。但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组织，而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支撑点。这就是实践，这就是革命运动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如何指导着这个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来，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或者他们不顾外部条件地去发动革命——是实验室式的。这样说吧，这是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在科学中存在，使一种现象与周围现存的一切相脱离：离开空气，离开水等等，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来研究它，以便研究这一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因素，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国际因素，按照这种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可以完全正确地阐述，国家不是从外部带来的，而是在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在存在阶级社会的地方从内部产生的。而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规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即如果国家政权，或是有政治权力的该国家，没有摆脱国际因素怎么办，因为被罩在玻璃罩里、不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的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假如在按实验室的方式研究了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之后，我们就提出对事情产生影响的国际因素问题，那么，情况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会得出另外一些结论。

他们用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能的，因此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我对国际形势不感兴趣，有包围或是没有包围，这与我无关。作为学者，我研究国家政权，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如果阶级社会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就不应该有政

权。我作为学者，不准备去考虑国际上的包围)，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它不是始终适用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随便丢开什么都可以，而在现实中你不能丢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包围着你。我想对这种形式的不完备性加以解释。或是这样，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如果所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那么这将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而且他们当时不容许无产阶级政权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历史经验和形势都表明，应当容许有这样一种意外情况，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所有国家而是仅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且它没有被击溃，相反，获得了巩固，存在着，并想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提出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个政权本身也存在着，它在巩固，在加强，社会主义在建设着等等，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局限于对问题的现有提法，而应该继续前进，可以说，应对问题做出另一种提法：如果无产阶级政权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国家它还未获胜利，那该怎么办？而在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周围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又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消亡还是不消亡？如果这样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大概会说：“不消亡，不应该消亡”。但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于是他们自己可能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而历史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存在了20年。

尽管马克思写完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巴黎执政2个月的一本书^①，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并看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存在了20年，那他就会写出非常有价值的新书，会找到我们没有见到的、而

^① 指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

他也是很晚才发现的新真理。

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提法。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实验室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我们应予以尊重。

以实验室的方式来研究政权内部发展规律的方法是正确的，是非常好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在弄清某些问题时，是比较好的方法，而当你转入实际生活时，这里实验室不能避开任何现象，既避不开空气，也避不开气候。你们并没有罩在玻璃罩中。这里既有周围各国人民，也有周围的各个国家，应该考虑到他们。

假设说，如果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存在，它也就应该在其他国家存在。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即政权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要在所有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假设成立的情况，从而可以这样说，国家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然后它自行消失。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问题的提法是，现在的情况不同。如果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也不是在大部分的国家，而是仅在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而除了这个政权之外，形成了憎恨社会主义国家、并找机会进行破坏的资本主义的包围，那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是消亡呢，还是不消亡？这里应当回答说，不消亡。即使各地将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那样快消亡。真的，假如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我们这里都发生了革命，那时我们就不需要常备军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什么叫常备军？它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我们将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对军队提供补给，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动用国内的一切资金来进行防御。这就是国家所创造的一切要素。

我想，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它经历了两个时期，两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当它还是阶级的政权时，它与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一致的，因为其目的就是镇压反抗。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即以往的一切国家政权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镇压，而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劳动居民对不劳动的剥削阶级的少数人进行镇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国家不仅仅是进行镇压，如果拿 1918、1919、1920、1925、1930、1934 这些年代来说，在消灭敌对阶级之前，国家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职能，捍卫职能，保护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还有第三个职能即接管公有化的生产资料，调整自身的生产，进行有组织经济援助）。而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国家政权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少数人利益的政权，它们也有保卫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在进行自卫以免外部敌人侵犯之时，它们同时也行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

在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政权。它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职能，在这方面它和其他所有的阶级政权是一样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镇压之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所有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它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镇压剥削者，而不是镇压被剥削者，——这是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经济组织的职能。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组织任务。第三个职能是保卫生命、财产和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就这三种职能。这是第一阶段——在消灭了阶级，政权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我不想说，现在是阶级政权，说这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不是白白地使用劳动人民苏维埃这个称呼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镇压的职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阶级已被消灭，也就是说构成阶级政权典

型特点的这种镇压的职能在消失。也就是说，这种职能残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在这里其职能已不是要对付什么阶级的反抗，而是要去对付个别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反抗，只要有惩罚机关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军队来对付，有些规模不大的惩罚机关就足够了，这些惩罚机关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镇压一些个别人。就是说，镇压的职能在我们政权内部，它的确是已无必要了，但是经济领导的职能却相当大地增长了。这里也不需要镇压。这里需要有组织的工作，任何镇压都不需要，经济领导也不需要任何的部队，甚至连惩罚机构也不需要，镇压职能也就失去意义，但破坏分子中有人受惩罚被擒获，这种情况除外。

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恩格斯说：“政权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那么，好吧，阶级在内部消灭了，而在外面却留了下来？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而那里有还想与我们作战的资本家，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阶级还没有被消灭。

我想以恩格斯的先决条件作为依据。既然没有敌对的阶级了，就不需要国家政权了，这是在国家内部，而假如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敌对的阶级呢？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国家政权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把恩格斯的属于内部阶级制度的观点搬到国际领域去，那就会发现，在那里阶级没有被消灭，我们没有脱离世界，剥削者依旧在那里逞威作福，而我们这里是劳动人民，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大概，政权还是需要的。

只要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敌对状态的阶级还存在，也就需要这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及国家领土的职能就要不断发展，目的是，譬如说，镇压某些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及他们的残余，不需要军队，——这是第一种职能的事，镇压的职能，这种职能逐渐在消

亡，我也许会说，它已经消亡。

就经济领导的第二种职能来看，进行管理，甚至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机关，而要履行第三种职能——防御的职能，保卫受到致命威胁的生命、财产及我们国家的领土，这里非要有军队来履行这种职能不可。

什么是军队？这里说的可不是民警机关，有人报警，工人来了，拿起步枪，去进行战斗，这不会有结果的。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国家一定要有高技能的军队。问题不在于，拿起步枪就可以结束一切，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空军，多种多样的空军，各兵种部队，需要有炮兵，有炮兵的各兵种，需要坦克，需要化学武器和反化学武器。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里人材不是很快就能训练出来的，这里需要经验，需要常备军。在民警制度的基础上，在民兵制度的基础上，不能组织任何的防御，不能组织任何对生命、对国家领土的保卫。一定要有常备的、训练有素的、具有高技能的、在各个方面造诣很深的军队，这种军队将要有第一流的空军、化学、坦克、炮兵、工程师、技术员，因为这里是技术决定着一切。

而如果有军队，那么，军队的存在就需要经费来供养军队，就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需要国家机关，需要官员，但不是那样的官员，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选举中产生的，今天选出了，明天又赶走了，需要那种非常有经验的官员，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一点，对军队的任何供给，军队的任何防御都是不可能的。这里也需要普通的工作人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既然军队将存在，国家、国家机关、政权机关也将存在，它要粉碎敌人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击。既然有军队，那么，也要有侦察机关，有反侦察机关，就是说，国内的肃反机关也得加强，因为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是在睡大觉，他们时常暗中向我们派新的人员来摸情

况，看看在我们这里可干些什么事，能不能炸毁些什么，毁坏些什么。就是在党内也有这样一些人，是有的，是有的，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为了暗派人员，收买和贿赂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已肃清了一切。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人就将继续存在。这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存在的依据。因此，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何苦你们坐着20年而不想消亡呢？”你们对他们说：“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社会主义在各国都取得了胜利的话，我们早就消亡了，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只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周围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军队，为了军队需要有国家机关，需要国家政权，它不能消亡，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它”。非得要给这样的回答。这一点你们同意或是不同意，而如果要按照马克思或是恩格斯对此所做出的那种回答行事，我们早就应该关门了。（笑声）。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想停业……（笑声）……而相反，想要继续生活下去，击退敌人，甚至粉碎他们，那么国家政权一定要存在，并一定要加强，无可争辩地应当加强。

有求知精神的人在小组里和在课堂讨论中还会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有求知精神的人你们那里是否很多，我不知道，但在你们那里大概总会有的。例如，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生产资料，一会儿生产力，一会儿生产方式，一会儿又是生产工具？请你告诉我，在你们那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接生活的生产，直接生活的再生产，这是怎么定义的，请明确的告诉我们，能不能将这些术语条理化？”混乱不堪的情况，往往使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混淆在一起，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混淆在一起，总的来说，这里是一团糟。因而旧时代敌人嘲笑我们说：“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你们自己都谁也没有搞清楚，分不清哪儿是主要的，哪儿不是主要的”。因此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想对一些术语做出某种精确的

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应当做出规定。例如，米丁同志引证马克思的话。依我看来，要善于引证马克思的话。比如，米丁在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书中说，“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工人阶级是生产工具之一。马克思在40年代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后来在《资本论》中他抛弃了这个结论，对它作了更为准确、更为清楚的表述，在书中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另一种态度。总之，应该指出，在《资本论》写成之前，马克思更喜欢谈物质的，使其与精神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战，为争取它的胜利而战，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某些因素下定义时就不是很规范，他想为那条被称为生产资料的总航线开路，也就是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他围绕这个问题在奋斗，而存在的构成要素，特别是生产的组成要素，他不是始终都能做出确切定义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任务。50年代以后，当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获得了活动舞台，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他对个别术语的定义就比较准确、比较规范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所下的这些定义就清楚了。如果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当然，就应当使用最好的术语，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劳动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在《资本论》中，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劳动手段，也就是生产工具，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们用来加工改造劳动对象——自然界的原材料——水、矿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所使用的那些东西，他没有把人归入生产工具一类，要不然，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无产阶级成为生产工具中的一种的话，那么结果将是，现在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工具便构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在革命时势必要把这些劳动工具（无产阶级）变为社会公有的，这是十分荒唐的。在《资

本论》中及在《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从对社会物质生活作一般性的界定转向了对生产组成要素的界定，因此，我们只能在《资本论》中看到他的准确清楚的表述，就应当使用这种表述。他说，假如把劳动手段，也就是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也就是人进行改造的一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石，——这一切将构成生产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包括机器、一切仪器设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藏、原料、交通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概念包括机器、所有的设备、土地、森林、水源、矿藏、原料、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一起构成了生产资料，即应当综合的那些东西。

生产力——这一概念——这是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那么，这里也应当说说，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工人阶级是最宝贵的工具。应当说，工人阶级在所有的生产力中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要不然，工人阶级作为生产工具势必也要变为社会公有，势必会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这也是错误的。

就是说，生产力——这是生产工具加上使生产资料运转起来的人。劳动手段，换言之，生产工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篇第二点里有。你们打开《资本论》的第2卷——那里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是分开的。他说，有生产资料，有工人，假如把它们割裂开来，无论是工人，还是生产资料——它们都不能代表任何的生产力。

我讲这一点是鉴于在一些教科书中在这方面存在着十分混乱的现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拿起它来阅读就恶心，完全是杂乱无章，应该增强明确性。

有时说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问题，假如拿我们的宪法来看看，那里也是这样的说法。有人可能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是生产资料，这里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是为了通俗化。通常，假

如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为例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料主要理解为建筑物、原料等等，而把生产工具撇开了。为了使宪法明白易懂，为了能使它不引起任何的非难，将生产资料列入了。从学术方面来看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做是为了通俗化。我本人也不鼓励这种事情，但是这是由大家所希望的通俗化造成的。在联共（布）党史中经常有某些重复，这是容许的，是为了不引起误解。而从理论和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容许的，因为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

还有，在结束语中还会产生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你们杜撰的，过去说的所有原理都是正确的，而在这里竟然要篡改它们。却说什么，这叫做用新的经验来丰富理论。在制定某些方针之前，为了不至发生变化，你们此前要从事丰富的工作。而很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学习得太仔细了，说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他们想，由于情况的变化，新问题的产生，这些原理和结论可能会改变的。

这不，关于国家问题。恩格斯推测，社会主义将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关于三个要素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而结果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周围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说，这是新情况，不得不改变对国家及其消亡问题的看法。有人可能会想，我们决定要做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人还都认为，理论和结论应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将其背熟并静静地坐等，不会不成功的。而现在看来，原来并不是一切都那样永恒不变，并不是一切都是完美的，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比较自由主义的态度看待个别原理和结论的，这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进行了

叙述。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吧，这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好著作，也是较好的著作之一。依我看来，恩格斯虽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熟悉宣言的原则。马克思比恩格斯花了更多的精力。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这是赞美诗，我说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上杰作。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称这本书是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40—60年代的国际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实践纲领也是萌芽中的国际^①的理论和实践纲领。这本小册子出版25年后，各种语言的版本几乎都有，而且出了好几版，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小册子中最普及的一种。在这本小册子出版25年后，马克思考虑到48年的革命经验及后来的公社，他认为，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已过时了，他认为，如果他不得不重新写的话，他会按另一种方法写这本书。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完全不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个别原理和得出的个别结论是一劳永逸的。他们作为懂科学的人和作为真正的辩证法学家懂得，一切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而且个别的原理和结论会由于发展的进程而不适用了，也就是说，要求提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原理。

瞧瞧，在1872年德文版的前言中他们写了什么：“最近25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总体说来直到现在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的地方应该作某些修改。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正如在宣言中所说的，要以当时当地的条件为转移。因此，绝不应该认为，在第二章的末尾所附加的革命措施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这一点现在势必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发展，其根据是，由于最近25年来，大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组织的发

^① 即1864年9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成立后，通常被称为第一国际。

展和工人阶级的发展，由于二月革命的实践经验，及后来规模更大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在那里首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这一点现在在某些地方已过时了。”

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他对我们 20 年的革命经验会谈些什么呢？“这一纲领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现在他对这一切评价说，这个基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说不应该简单地掌握政权，而应该打碎旧的机器并建立新的机器，公社尤其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为自身的目的服务，需要摧毁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接着：“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文献的评论对现时来说还不全面，因为它只写到 1848 年，这方面的评语也是这样……（他在读）^①……尽管对现在的一些评语已过时，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完全改变了，而且，事件的发展使得已出现的共产党的大多数都被彻底消灭了。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历史性文献，而且我们不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其中的任何地方。以后的各版中将有一版出版时可能将附有增补遗漏的前言。而目前版本的出现使我们感到突然，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对这项工作进行调整”。

你们瞧，一切都在变化，也可能会变化。假如有人问：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什么永久性的东西？今天是一回事，而明天又是另一回事。怎么生活？应该这样去解释：如果你们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应该懂得，理论基础是没有变化的，而个别的原理可以改变，就是说，应当动脑筋去思考。

好，我就指出这四个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你们也会碰到这

^① 原文如此。

些问题的，我尽力设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回答。

现在来谈一些实际问题。

怎样改变宣传工作的安排？我们这里的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好，从中央委员会开始，这我们应当承认。这项工作那里安排得不好，很不好。这是我们的错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我的错误和有关部门的错误。我们都很忙。这不是辩护的理由。不过我想解释，但如果承担了这项工作，就应该去做，用不着推诿说工作忙。但是，我想说，实在是忙，就算是理由，但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好，无组织性，很分散，工作方法很落后。大家都在竭力追求小组的数量，谁那里的小组多，而很少去研究，小组在做什么；追求课堂讨论的数量，但很少去关心课堂讨论中做了些什么；或是夸耀党的研究室的数量，而不说党的研究室里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应该明白，这件事没有组织性。宣传的质量因素被忽略了，这一切直接向广度发展开来，而要想控制住，就要了解，做了什么事情，不仅要了解领导或监督情况，而且还要了解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一点就没有做到。这是一个主要缺点——向广度发展了，而没有深入进去。

依我看，对待小组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的小组，为什么？我不理解。要知道人们是能在自己家里阅读的，要知道是用俄语写的，假如有不懂的地方，有辞典，还可以向随便什么人去问。难道为了能理解所读的内容就需要有上千个小组。我对很少利用报刊，而总是指望小组这一点很不理解。在我们没有掌权时，报刊不属于我们的，那时可以这样去做，而现在报刊是我们自己的。

在某个小组里，想必会有好的宣传员，假如把他的全部讲课内容登载出来，这些讲课材料就成为大家的财产了，否则他仅能将自

己的经验局限于自己小组的范围内。须知，这是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机械化的生产与手工劳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将所有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一起，用于一处。这是一个起码的组织任务，而我们，想必有许多可以写出好的讲课内容的好宣传员，是有很多，不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就在小组的范围内进行教授。仅仅在小组里才认识他们，而那怕向莫斯科委员会、区委员会提出任务，听听10—20个宣传员的课，看他们怎样讲解，要他们讲述并作为例子刊登出来，这或许能将其经验传遍全俄罗斯。你们看看，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意味着什么。以国家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一回事，以家庭手工业的方式提问题，这是另一回事。很多的小组是不必要的，报刊利用得太少。

其次，依我看，你们党的研究室太多。依我看，这不对。这里有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不很熟悉这事情，所以我唠叨几句。这不，在听人们讲课时，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研究室里完全不受监督，完全是独立的，无论是在组织宣传时还是在进行辅导时都没有集中的管理。没有集中的管理，个别的点、小组、党的研究室是完全独立的。那里，大概坐着一些好人，但要帮助他们。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会白白浪费时间，会在政治上毁灭。你瞧，他坐在那里，在工作，工作是好是坏，没有人知道。谁也不关心他们，谁也不来问问。而如果有任何人两次，三次来提醒，帮助这种人就好了，不然的话会被抛弃，这种人会被抛弃的，因为没有人来帮助。我很担心的是，党的研究室也是这种状况，他们已被抛弃，没有人领导他们，没有人询问他们，没有人进行检查。而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宣传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一些人是这样解答疑问，另外一些人按另一种说法解答，第三部分人按第三种说法去解答。这件事情要在某种程度上集中管理。我反对压制人们的首创精神。不，人们的首创精神——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应当这

样来安排工作，以便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能有共同的东西，以便对人检查。这就是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利用报刊来进行辅导。在党的研究室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对各种问题作了很好的准确的解答。那为什么不去搜集他们在党的研究室中的经验，搜集他们对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实质性的问题是，不仅要问，在什么书里，在第几页可以找到。实质性的问题是，要搜集这种资料，印刷出版，以便使其变为大家的财产。

国家和家庭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国家能够总结经验并把它变成苏联的东西，而手工业者仍然停留在自己手工作坊的范围内，谁也不知道他。当不得不按旧的手工业的方法在办公室里非常勤快地干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掌握政权。在党的研究室里有好的经验，而报刊不登载它，这是不对的。

小组的数量要减少，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少，不是减少50%，我反对这种做法。应当研究一下，什么地方有哪些小组，什么地方由谁在教课。或许在莫斯科在2—3个月内小组就有可能减少，而宣传员可以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调到党中央机关，或是调到莫斯科市委的机关去。

宣传局在干什么？它好像不见了。有谁见到它没有？乌加罗夫同志，你们那里有宣传局吗？

乌加罗夫：有。

斯大林：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停办了高级党校，撤消了红色教授学院^①。还有什么专修班吗？

莫洛托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专修班。

^① 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培养高校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及科研机构、党中央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教学机构。

斯大林：我不敢说，那里的工作室安排得很好。停办了学校，是因为学校提供了两边摇摆的人。

喊声：对。

斯大林：但是应当改进，而你们立刻就停办。高级党校一定要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分开。不然的话会弄成这个样子，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从事活动的基础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党校应当组建不只一所，而要好几所，因为非要办这样的学校不可。是否将这样的学校与其他培养组织家的学校合并，或是分开，——这应当讨论一下，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级党校一定要办，无可争辩地要办。^①

再次，至于是否要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制订学习计划的问题？我认为，你们已经谈过这件事。你们这里什么叫学习计划？是问题或题目的项目单吗？

喊声：题目的项目单。

斯大林：你们要明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使我们的干部积累丰富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我指的是党的干部，不是指那些按党的狭隘路线工作的人，而是指在苏维埃的工作中、在经济方面、在商业组织系统的共产党员，合作社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在保健方面，总之，在一切管理部门，希望在各地的共产党员——这些有知识的人能够成长。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一点要牢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应该是我们最优秀的分子。过去对知识分子进行挖苦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实际上是轻率无知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上天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剥削

^①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在战后才得以执行。战后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两年制党校。

者服务。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干部，不太说，从前他们是工人、从前他们是农民。就拿什基里亚托夫^①同志打个比方，既然离开了车床并开始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您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请原谅（笑声）。十年前您是干什么的，与谁也不相干，而现在您是知识分子。

什基里亚托夫：对，斯大同志，我同意您的意见。

斯大林：我们全体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应当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且也能够成为。只有知识界能够成为国家最优秀分子，为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最优秀的人，他们应该学习，应该把书带给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我不知道，或许他们自己也想学习《简明教程》，要帮助他们提高其政治水平并使其积累丰富的知识。

外国情报机关破坏了我们这些知识界干部的一个小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事件。我们对知识界的及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些干部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教育。

我想再重复几句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话。我们这里过去曾对知识分子持一种荒唐可笑的轻视态度。我们人家都深入过车间，走近工人，却忘记了在工人中很少能找到那些能找到空余时间成为理论家的工人，或是他们掌握了理论，这样的人很少。工人工作8小时，他们不习惯看书，不习惯于总结，他们应当去习惯。你们带着宣传材料钻进那儿，却忘记了在你们的周围有上百

^① 什基里亚托夫，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1883—1954），党的活动家，农民出身，小学文化。从1921年起在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12月至1941年2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没有一人受过完全的高等教育。1939年，71.4%的联共（布）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民族区委书记及41.1%的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没有受过中等教育。

万的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在机关里有知识分子在工作，这是以前的工人，以前的农民，是我们的人，他们已成为有文化的人，他们同样与我们一起在管理着国家。你们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写写指示。这是胡扯。管理国家，意味着要在实际中执行，要善于在实际中执行决议，有时甚至要修改决议，假如这些决议不好，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向都是好的，也有错误。有这样一些实践家，他们修改决议，说我们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老爷派的夜郎自大习气，相反，我们认为，有时要有人向我们提醒，说我们不对。要使我们的一切决议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了解全国的情况。这是胡扯。于是，这些人在进行管理。他们在执行我们的决议，意味着在进行管理，而我们对他们估计过低，轻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异己的。昨天车床旁边的工人是很有才能的人，受到尊敬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配得上去学校学习，受教育，为什么又对他瞧不起。我或许说，这是以粗野的、马哈伊斯基^①式的、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这种态度对我们党来说是有害的、危险的。正是由于在军队里，在合作社，在商业，在工业中，在农业中以这种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这种流氓式的态度，我们才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抛弃了，没有使他们在政治上积累丰富的知识，而使成为所有这些情报机关的猎获物——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随便哪个国家的。由于我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疏忽大意的、错误的、流氓式的、有害的、轻视的态度，几十个人被毁掉了。所以应该把这本书发送给这些知识分子，让党员以及那些不比党员差的非党员读读，让他们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并提高自己的水平线、自己的政治水平。

^① 19世纪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流派。

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我认为，有三点是主要的，让他们来读一下，以便于学习。

第一点——这是基层小组，政治上还未成熟者的小组，他们是一些忠心耿耿的、革命的、一切都作好了准备的人，但是在政治上还未成熟的人。我想为他们提出这样的学习计划：把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四章“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当时党本身还没有出现”；第二部分——有三章“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和第三部分“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当它掌握政权后，它在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简短地教授了这个问题。大概，基层小组不可能完全掌握全部内容，但稍微减少一些并分成三个阶段：党的发展史以这种形式教授。或许，这会容易些。而一年后，他们开始看书，懂得会更多一些。

中级小组——人数最多并对我来说是最感兴趣的，由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组成。按书中的内容、按章篇，12章，12个主要部分来制定学习计划，再没什么了。

第三小组——高级小组。对这个小组可以按照附加的章篇制定学习计划。每一章中有一附加的章篇，每个附加的章篇都列有书目、文献资料。学了一章后，就转向附加章篇，让他们看文献资料，以便他们学得扎实，让他们掌握比书中提供的更多的内容，附加的章篇是为了高级小组掌握基本的问题，十分清楚的问题，并迫使他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找到向这一章过渡的相关书籍。

我想这样去安排。如果是很少受过训练的，就用简明的方法；具有中等知识的要学完全书的内容；而对知识比较丰富的人，要按照书目，按照附加的章篇学习书中所讲的内容以外的更多的东西。

我说完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英明的斯大林同志万

岁”!)

日丹诺夫：对下一步安排还有什么建议？

喊声：停止讨论。

日丹诺夫：赞成停止讨论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有反对的人没有？没有。讨论结束。

№05119

**巴赫京娜关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逝世
致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信**

(1939年9月8日)

尊敬的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

我是已故的奥莉加·安东诺芙娜的学生弗谢沃洛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巴赫京的母亲，巴赫京目前居住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对您遭受的沉重损失我表示诚挚的、深切的同情。亲爱的奥莉加·安东诺芙娜对我儿子的关爱，我永远铭记并将以深深的感激之情铭记。我的病使我无法上街，无论是追悼会还是葬礼我都不能参加。

致以敬意！

M. 巴赫京娜

No05179

亚历山德罗夫等人就史学著作中的 缺点错误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44年5月7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同志、谢尔巴科夫同志

关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著作中的 重大缺点和反列宁主义错误^①

在史学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中，现在出现了一些严重缺点。最近出版的一些苏联史学家的著作，在内容上有一些反列宁主义性质的重大错误。在一部分苏联史学家当中，流传着德国历史学家编纂的有关俄国人民过去历史的反动传说，表现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对俄国人民历史的鄙薄态度；这是该学派固有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复活。在这些历史学家当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有相当的传播。

1. 关于德国历史学家的反动观点对现代俄国史学的影响

在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②、鲁宾施泰因^③和雅可夫列夫的

① 1944年5~6月，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安德列耶夫、马林科夫主持召开了史学工作者会议。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党中央宣传鼓动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真理报》编辑波斯佩洛夫和宣传鼓动部副主任费多谢耶夫于会议开幕前11天呈交了这份材料。

② 潘克拉托娃在1944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受到批评，9月被解除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职务。

③ 鲁宾施泰因，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1897~1963)，教授(1938)，历史学博士(1948)。

著作中，包含着一些在德国历史学家反动思想影响下所犯的反列宁主义错误，这些德国史学家，包括拜耶尔、施略策尔、米勒、哈克斯特豪森和克莱因施米特^①，当年曾在俄罗斯活动或撰写有关俄罗斯问题的著作；他们的目标就是把俄国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置于德国人的影响之下，最终在意识形态上为德国侵略者培养向东方扩张的别动队。

一些反动的德国历史学家一向对俄罗斯表现着极大的兴趣。他们被派往俄罗斯时都抱着长远的政治图谋和意识形态目标，在这里建立了历史档案并将它们攫为己有，还搜集历史资料并系统地加以整理，以证明，似乎是他们德国人对建立俄国民族国家发挥了组织的和文化传播士的作用。

渗入俄罗斯的这些德国历史学家的真实面目，从德国人施略策尔的自传中看得一清二楚。施略策尔写道，德国历史学家在俄罗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发财之路。“不必是天才，也不必是从事批评活动的学者，只要掌握俄语，并勤奋一些，就足够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能用大罐大罐的啤酒宴请公众，并可望听到夸奖和感谢之声。做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的牺牲，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把在俄罗斯了解到的东西变成德国钱财。”^②一些贵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当年在德国人伪学术活动的熏染下，千方百计吹捧德国史学家对发展俄国历史科学事业的作用。在德国史学家和罗蒙诺索夫的冲突中，

^① 拜耶尔，戈特利布·西格弗里德（1694—1738），德国历史家、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成员（1725），“诺曼理论”的奠基人。施略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1735—1809），德国史学家、哲学家和统计学家，1761—1767年在俄国供职，彼得堡科学院副研究员（1762）。米勒，格拉尔德·弗里德里希（1705—1783），俄国史学家，德意志族人，彼得堡科学院成员（1731），从1725年起居留俄国。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1792—1866），普鲁士官员、经济学家，1843年在俄国旅游，曾考察俄国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村社，是俄国村社制度的发现者。克莱因施米特，阿尔图尔（1848—？），德国史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

^② 《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汇编》，第13卷，1875。

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公开站在德国人一边。比如不无名气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一方面夸大德国人在俄国史学中的作用，同时却唾弃罗蒙诺索夫和谢尔巴托夫^① 创建俄国历史科学的功绩。米留可夫写道：“罗蒙诺索夫和谢尔巴托夫代表 18 世纪史学史上一股模糊不清的浊流：前者是出于爱国主义，后者则是出于对古代史问题的无知。”^②

罗蒙诺索夫激烈的不妥协的反对德国人的言词，反映了 18 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科学的发展要求和德国历史学家要在思想上奴役俄国、证明俄国对普鲁士的完全依赖性并以此为其向东方发动进攻扫清道路的反动图谋之间的矛盾。德国史学家断言，国家观念和文化是由德国人带到我国来的，俄罗斯一切最重大的改革都是在德国人的影响下进行的。比如德国史学家克莱因施米特教授写道，在 18 世纪初，俄罗斯就其文化发展而言还同中国和阿比西尼亚^③ 处于同一级别，而彼得的一些改革——建立枢密院，取消贵族杜马，建立科学院，派遣白令考察队^④，这都应归因于德国人的倡议和影响。^⑤

德国反动史学的上述意图，至今仍被德国人顽固地大加发挥，其最鲜明表现之一，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反科学的俄罗斯国家“诺曼起源论”。按照这种说法，俄罗斯国家仿佛是在德国人最高尚的国家观念和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德国人描述的有关罗斯起源和俄国国家形成的“诺曼理论”，

① 谢尔巴托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733—1798），历史学家、政论家。

② 米留可夫：《俄国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第 1 卷，第 100 页，莫斯科，1898。

③ 今埃塞俄比亚。

④ 1725 年初，彼得一世在弥留之际，下达了一道敕令，决定派遣一个考察队调查亚洲和美洲是否连在一起。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彼得二世秉承了彼得一世的旨意，组织了对勘察加的考察（1725—1730），考察队是由在俄国海军中任职的丹麦人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率领，白令海峡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⑤ 克莱因施米特：《俄国历史三百年》，第 146 页，柏林，1896。

最初是在18世纪由德国人拜耶尔提出来的，接着又得到了德国人米勒和施略策尔的支持，并为他们所发挥。德国人这一理论影响之大，甚至于使一些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波戈金和索洛维约夫^①）也站到了诺曼论者的观点上。“诺曼理论”断言，斯拉夫人无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才由德国人建立了俄罗斯国家。这一理论认为，斯拉夫人的社会结构简陋无比，其人民的生活野蛮落后，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德国人具有依附性，等等。在俄罗斯科学院任职的德国史学家施略策尔则认定，“所有文化成分都是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带给了尚处于野蛮人水准的东斯拉夫人的。”

俄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代表——罗蒙诺索夫、科斯特马罗夫、格杰奥诺夫、扎别林、克柳切夫斯基^②和马尔等人，证明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流传至今，得到一些苏联史学家的支持和辩护。

高校苏联史教科书第1卷（由巴赫鲁申、格列科夫和列别杰夫^③主编），不去阐述有科学依据的、能摧毁《诺曼理论》的历史资料，

①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766—1826），俄罗斯作家、政论家和贵族历史学家。代表作为《俄罗斯国家史》。波戈金，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1800—1875），历史学家和作家，彼得堡科学院成员（1841）。他继承了卡拉姆津的史学观点。索洛维约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820—1879），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院士。代表作为29卷的《从远古以来的俄国史》。

② 克斯托马罗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17—1885），历史学家和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76）。格杰奥诺夫，斯捷潘·亚历山德罗维奇（1816—1878），历史学家和戏剧活动家。扎别林，伊万·叶戈罗维奇（1820—1909），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7）。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奥西波维奇（1841—1911），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代表作为五卷本的《俄国史教程》、《古罗斯波雅尔杜马》等，从他的《俄国史教程》的内容来看，实际上他是支持“诺曼起源论”的。

③ 巴赫鲁申，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1882—1950），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格列科夫，鲍里斯·季米特里耶维奇（1882—1953），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别杰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95—1966），教授。

却大讲两个世纪来诺曼论者和反诺曼论者之间的争论，最后仍然是站到了诺曼论者一边。教科书说，“长达近二百年的争论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以新的事实丰富了我们的科学，并且最终向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大大地靠近了。显然，北部罗斯是同斯堪的纳维亚相连接的，也正是同处在芬兰湾北岸的瑞典部分相连接”（《苏联史》（供历史系使用），第1卷，第91页）。

同“诺曼理论”直接相联系的是德国研究者的下述论断：俄国历史仅只是从“瓦良格人受命”才开始的。德国人施略策尔写道：“俄国历史始于留里克的到来和俄罗斯王国的建立，那个时候，三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即诺夫哥罗德人（斯拉夫人）、楚得人（芬兰人）和罗斯人（诺曼人）联合到一起并组成了一个民族。这是在9世纪中叶或者公元860年前后发生的事，这怎么能不使爱国主义者对此表示气恼，因为他们的历史并没有延伸到混乱时代，也不是像古希腊罗马的历史那样古老，甚至于比德国和瑞典的历史还要年轻”。^①按照施略策尔的看法，在留里克之前，就地理学和民族学范畴而言只可能是俄国史的序幕期。

德国人这些伪造历史的说辞，在19世纪俄罗斯史学家的著作中接二连三被重复，甚至在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由潘克拉托娃主编于1943年出版的《苏联历史》教科书第1卷，在对9世纪以前的斯拉夫人草草提过一笔之后，便写道：“一些瓦良格王公带领他们的卫队，在‘瓦希之路’上攻占了最有利的据点，并且向周围的斯拉夫居民征收贡税。他们常常消灭当地的斯拉夫王公或者迫令他们降服称臣，取其地位而代之。”接着，潘克拉托娃的教科书叙述了有关瓦良格人受命的著名传说，并得出结论：“留里克是在诺夫哥罗德站稳脚跟的……他的一个兄弟西涅乌

^① 施略策尔：《涅斯托耳》，第1卷，第418-419页，圣彼得堡，1809。

斯坐守白湖一带，另一个兄弟特鲁沃尔则镇守伊兹波尔斯科。瓦良格部落的另外两个首领阿斯科尔德和季尔控制了波利安人的基辅。在波罗的海通向第聂伯的另一条通道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外来者在波洛茨克王国的西德维纳也站稳了脚跟。”潘克拉托娃这样把传说当作历史文献资料叙述之后，得出结论道：“相当晚，在9世纪才形成了这样一个传说，仿佛诺夫哥罗德的斯拉夫人由于他们之间的内讧，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要求，才在862年（这个年代是由编年史作者臆猜出来的）把留里克和他的兄弟们邀请了进来。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为了证明留里克的后裔有权得到大公的爵位（《苏联历史》，第1卷，第36页）。”

由此可见，潘克拉托娃紧步德国历史学家的后尘，认为从留里克才开始了俄国的历史，并且把有关俄罗斯国家源于瓦良格人这一德国人的伪造学说强加给了苏联人。就实质而论，潘克拉托娃是不承认9世纪之前，所谓“瓦良格人到来”之前的斯拉夫人国家的。

《俄国史学史》一书的作者苏联历史学家鲁宾施泰因公然为“诺曼理论”的奠基人拜耶尔辩护。这位史学家写道：“在拜耶尔的缜密研究中，必须突出他在直接研究斯堪的纳维亚资料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瓦良格—俄罗斯问题”。鲁宾施泰因认为，罗蒙诺索夫反对德国历史学家的言论是不合乎科学道理的，他宽容地将这些言论解释为“民族自豪感”。^①看来，鲁宾施泰因在这里追随着德国史学家米勒的反俄罗斯情绪；这个德国人对罗蒙诺索夫的爱国主义持反对立场，声称：“历史学家应该没有祖国，没有信仰，没有君主”（佩卡尔斯基^②的《科学院史》，第1卷，第38页）。但是还有一

^① 鲁宾施泰因：《俄罗斯史学史》，第97页，莫斯科，1941。

^② 佩卡尔斯基，彼得·彼得罗维奇（1827—1872），文化史、文学史学者，图书编纂学家、院士（1864），主要著作作为1870、1873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彼得堡科学院史》，1、2卷。

位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伊万·博尔京^①，为此列举了列克列尔克^②一句颇为重要的话：“好久以前就有人说过，历史学家不应该有祖国、亲族和朋友。假若说这个法则是正确的，那么，历史学家也就落到了最可鄙的那一等级的人们中间；因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是成了兽类中最不幸的、最齷齪的一类了吗？”（博尔京：《列克列尔克的古今俄国史注疏》，第2卷，1788年，第120页）。

一些苏联历史学家重复着德国历史学家的这种诽谤之词，说什么德国人奠定了俄国历史科学的基础，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等等。德国历史学家克莱因施米特断言，“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略策尔其实是俄国历史的真正创立者”（海德堡大学教授阿尔图尔·克莱因施米特：《俄国三百年史》，柏林，1898年德文版，第146页）。苏联史学家鲁宾施泰因奴隶般地跟着德国人亦步亦趋，竟然这样写道，仿佛是俄国历史学家塔季谢夫^③由于撰写俄国史的失败而突现出了米勒，使这个德国人站到了俄国18世纪下半叶整个历史科学工作的中心（《俄国史学史》，第16页）。鲁宾施泰因接着又说道，历史学家谢尔巴托夫的失败促使德国人施略策尔着手研究俄国的历史，而这个德国人的主要影响在于他“武装俄国历史学家”的那种“科学方法”（同上，第165页）。照鲁宾施泰因的说法，在19世纪，“新史学流派的头号代表是约翰-菲里普-古斯塔夫·埃维尔斯^④”（同上，第223页）。这样，俄国历史科学的真正奠基人塔季谢夫和谢尔巴托夫被鲁宾施坦因描绘成了德国人的直接

① 博尔京，伊万·尼基季奇（1735～1792），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② 列克列尔克·尼古拉斯-加布里耶利（1726～1798），法国医生和历史学家。

③ 塔季谢夫，瓦西里·尼基季奇（1686～1750），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④ 埃维尔斯，约翰-菲里普-古斯塔夫（1781～1830），俄国历史学家，德意志族人。1803年来到俄国。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826）。

摹仿者。

为了给他们的反动理论和东方侵略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德国人千方百计发挥有关斯拉夫民族奴隶性格的诽谤之词，仿佛这种奴隶性格在各斯拉夫民族的心理、文化和国家观念中都一一表现了出来。

在对斯拉夫民族的评价上，雅可夫列夫教授跟着反动的德国史学家亦步亦趋地写道：“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一般来说，恰是‘斯拉夫人’这一部族名称成了表示奴隶的普通术语，这个名称经过了一系列变形，但扎根于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各种说法之中”（《17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奴隶制度和奴隶》，第13页）。雅可夫列夫这一令人怀疑的词源研究想必是要证明，斯拉夫人在诺曼人和日耳曼人部族集团的所有语言中，表示的意思都是“奴隶”。由于试图为斯拉夫人奴隶出身的反科学理论作论证，雅可夫列夫写道，斯拉夫部族是“从印度到直布罗陀海峡整个古希腊罗马世界”奴隶的基本来源（同上，第8页）。事实表明的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格列科夫和其他史学家则证明，在古希腊占多数的奴隶是来自色雷斯人和小亚细亚人，而并非来自黑海一带的人。

雅可夫列夫的说法是虚构的，他甚至说，“在罗马时代，来自多瑙河、第聂伯河或顿河一带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市场上是人们很熟悉的一种人”（同上，第9页）。众所周知，在包括迦太基人、高卢人、希腊人、日耳曼人在内的成千上万奴隶中间——西徐亚人并没有占明显的地位。法国历史学家瓦隆^①证明说，小亚细亚地区是罗马奴隶的最重要源泉。雅可夫列夫这些反科学的“研究”，无非是德国人那些奇谈怪论的老调重弹。

我们知道，苏沃洛夫早就对想方设法诬蔑斯拉夫人的普鲁士佬

^① 瓦隆，亨利·亚历山大（1812～190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作过嘲笑。苏沃洛夫说“斯拉夫人”的名称“来自‘斯拉瓦’^①”。甚至像米留可夫这样远非进步的俄国历史学家，在考虑这个词源时也承认，“斯拉夫人”的名称发源于“斯拉瓦”一词（米留可夫：《俄国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第1卷）。

苏联历史学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真正科学的观点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对斯拉夫民族的种种谰言。苏联科学院一研究所撰写的《各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重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主要是德国人的数十种“理论”，以此把问题弄得混乱不堪。比如，杰尔查文^②院士在《古代斯拉夫人的社会制度》（9世纪前），一文中，就这个问题详细叙述了卡德列茨、伊列切克、阿诺尔德、巴利采尔、布亚克、诺沃提尼、博布任斯基^③和其他一些人的理论。作者对以现代科学的观念理解这个问题所作的草率说明，反而完全淹没到了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理论的阐明和诠释当中。

譬如，杰尔札温院士在详尽阐述卡特列茨的理论时叙述道：“为什么斯拉夫各民族这样长久地，直到10世纪初还仍然停留在简陋的部落组织中，而在以前没有能建立起庞大的政治联合体？就这个问题，卡特列茨回答道：第一是因为，从有史之日起，斯拉夫人就没有政治意识，这同他们的气质、缺乏毅力和性格软弱相联系……第二，为什么直到10世纪前，斯拉夫人都没能建立庞大的国

① 意为光荣。

② 杰尔查文，尼古拉·谢瓦斯季亚诺维奇（1877～1953），史学家、院士（1931）。

③ 卡德列茨，卡列尔（1865～1928），捷克法学史家。伊列切克，康斯坦丁（1854～1918），捷克历史学家。阿诺尔德，埃马努埃尔（1800～1869），捷克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巴利采尔，奥斯瓦尔德·马里扬（1858～1933），波兰历史学家。布亚克，弗兰基舍克（1879～1953），波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沃提尼，弗兰齐斯克（1768～1826），捷克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博布任斯基，米哈尔（1849～1938），波兰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家联合体，按照卡特列茨的说法，其原因在于，斯拉夫人对待异族太软弱、太驯服，而在内部相互关系中又以内讧和缺乏统一著称。”

所有这些直言不讳的诽谤，都是从希特勒和罗森贝格的书籍中照搬过来的，但却由杰尔札温用晦涩难懂的文字最终完成：“无需说，像卡特列茨描绘的古代斯拉夫的社会图画，同真正的历史现实很少有相似之处”（《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形成》，第40页）。作者连认为需要用一个肯定性的词语来驳斥和揭露卡特列茨的胡说也不曾有过。对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也一概是这样来阐述的。

这样，甚至仅摘引一些苏联史学家——潘克拉托娃、鲁宾施泰因和雅可夫列夫的最新著作，就看得出来，这些史学家在祖国历史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仍然处在德国史学家反动的反俄罗斯观点的强烈影响之下，并且公开散布伪造的、为我国人民所敌视的历史观点，用显而易见是来源于德国的意识形态来污染苏维埃人的头脑。这样做，就为我们在政治上、道义上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制造了种种困难。

2. 关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对我们祖国往昔历史的鄙薄态度

在潘克拉托娃、巴赫鲁申、列别杰夫和涅奇金娜^①等人的俄国史教科书和文章中，表现出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对俄国史的巨大影响。在上述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祖国过去的伟大历史受到了贬低和侮辱，俄国人民杰出活动家的作用遭到了歪曲和抹煞。

1917年10月以前的俄罗斯史，在苏联史中学教科书（潘克拉托娃编）和高校教科书（巴赫鲁申、列别杰夫、格列科夫和涅奇金娜编）中的阐述是片面的。在这些教本中，反动派的活动不恰当地

^① 涅奇金娜，米利察·瓦西里耶夫娜（1901—1985），历史学家、教授（1935），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3）、院士（1958）。

占据了过多的篇幅。对沙皇统治的反动措施研究得过分详尽，而进步活动家和进步势力同反动势力的斗争则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

譬如在高校苏联史教科书中，给阿拉克切耶夫、福季大司祭、马格尼茨基、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波别多诺斯采夫和其他反动人物的个性和活动作了详细的评述。作者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人们，保罗一世在授予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爵位时给后者徽章中写进去了什么话，他们甚至不放过这样的“重要”情况：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讲话时，“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焦躁不安”，而福季大祭司则对奥尔洛娃—切斯缅斯卡娅伯爵夫人暧昧地亲昵。同时在三卷本的高校教科书中，比如对杰出的俄国海军统帅乌沙科夫却不置一词，而对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总共只叙述了三行文字。教科书的作者们不厌其详地大肆渲染比隆式的生活方式、保罗一世的反动、尼古拉一世在内政方面的反动措施、80年代政治上的反动、沙皇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等等。教科书的作者们津津乐道于描述俄国史上反动的阴暗面，造成了一种虚假的观念，似乎是反动的活动家决定了我国的面貌。

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从18世纪末叶起，俄罗斯似乎不是向前发展，而向后倒退。这样就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前进发展虽看似偶然，但与暂时的低潮相反，归根到底要给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教科书的作者们由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描写反动势力，这样就淡化并模糊了我国的发展与进步，以及革命前俄国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的激化，它也使最终为俄国革命胜利准备条件的不断高涨的进步势力显得黯然失色。

对我国往昔历史的鄙薄态度表现在，在一系列苏联史书籍中贬低了俄国人民的杰出活动家的作用，如伊凡四世、米宁和波扎尔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乌沙科夫、纳希莫夫、拉吉舍夫、十二

月党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

在潘克拉托娃编的中学教科书中，关于伊凡四世曾这样写道：“伊凡四世以雷帝之名载入史册。他从幼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使同时代人尤为吃惊，而这种残酷在同不肯驯服的波雅尔进行酷烈斗争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这一斗争也使他身上那种对人的病态的多疑得以发展。喜怒无常、暴躁易怒的伊凡四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是总了解得很清楚。由于暴怒，他挥杖打死了长子伊凡太子”（第1卷，第140页）。

在巴赫鲁申、格列科夫和列别杰夫编的高校教科书中，对伊凡四世的个性也作了这样尖刻的否定评价。“伊凡四世在1584年3月18日去世。历史文献对伊凡雷帝的评价众说纷纭，相互抵牾。卡拉姆津拒绝对这个人的‘心理之谜’加以猜解，因为在此人身上将‘天使’与‘恶魔’的特征结合了起来。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伊凡四世的残暴是由他少年时代所处的条件所铸成的。精神病学家科瓦连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伊凡四世患有精神病态异常症。对伊凡四世天性的残酷暴虐未必能加以否定，这在现代俄国的和外国的史料中，说法都是一致的，虽然也往往有不乏夸大的倾向。”“无疑，伊凡四世有若干精神病的特征；他经常迸发一阵阵暴怒；在一次迸发暴怒时他挥动铁手杖击毙了长子。”“他无可节制地贪淫好色、酗酒无度，这使他过早地衰老，他是在离暮年尚早的岁数死去的”（第1卷，第389~390页，巴赫鲁申为本章作者）。

科学院撰写的《苏联史》第4卷的作者，在关于17世纪的一部达1430页之多的巨著中，只有15页用来写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民兵武装和将波兰人赶出莫斯科的斗争。就连在这不多的篇幅中，该章作者、史学家戈季耶竟然还巧施伎俩，责难波扎尔斯基的记忆力。他引述一个出自德国人手笔、受到波克罗夫斯基赞赏的传说，并由此发挥出一种说法，似乎是波扎尔斯基要德皇的兄弟马克西米

利安登上俄国帝位。在多卷本《苏联史》的第4卷中是这样写的：“波扎尔斯基把原先曾在俄国供职的一个德国翻译派到了德国，并且让他带着写有波兰国王‘伪诈谎言’的一纸公文。口头上说可以把德皇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遴选为沙皇，可是当一年之后从德皇那里得到满意答复时，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已做了沙皇”（第4卷，第1章，第170页）。

在苏联史（涅奇金娜主编）高校教科书的第2卷中详细地描绘了拿破仑怎样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指挥军队作战，对他行动的细节写得绘声绘色。与此同时，教科书作者对库图佐夫在战役进程中指挥军队作战的情形却不置一词。给人的印象是，波罗金诺之战并非是由俄罗斯史学家所阐述，而是出自法国观察家的手笔。

就连为中学教科书挑选插图时也表现出了对俄国人民伟大活动家的鄙薄态度。在这些教科书中印有成吉思汗、拔都、帖木耳和伪季米特里的肖像，却没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画像。

在一部分苏联历史学家当中，存在着一种显然不正确的观点，他们总以为，俄罗斯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在发展上一向落后于西方文化，俄罗斯的杰出的活动家们包括学者、作家和文化艺术家，只不过是西方活动家的简单效仿者，并没什么独特的创新。例如，高校苏联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评述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拉吉舍夫的：“拉吉舍夫是法国纯理性主义者的典型弟子和神秘教派的敌人，虽然在他的一些哲学观念中，戈利巴赫和格里维奇^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从莱布尼茨^②（他在莱比锡曾研究过他的著作）那里汲取来的

① 戈利巴赫，波尔·安里（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格里维奇，科隆德·安德里安（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维尔格穆（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

唯心主义概念出人意料地混杂在一起。他关于家庭、婚姻和教育的思想来源于卢梭和马布里^①。在拉吉舍夫这里，关于一般人类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在另一个法国启蒙主义者莱纳尔^②的影响下形成的”（第1卷，第725至726页）。

对伟大的俄国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也是这样评述的：“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1834~1836年，他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迷恋着谢林和费希特的哲学……1837~1840年，别林斯基经历着‘同现实妥协’的严峻时期。由于错误地理解黑格尔的论断‘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别林斯基开始维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但是他在1840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转向了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1842年他的朋友赫尔岑给他介绍了费尔巴哈，别林斯基开始成了唯物主义的拥护者”（第2卷第303页）。

也同样是按照这一精神对其他一些俄罗斯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作了评述。并且抹煞这一事实，在19世纪的俄罗斯曾有过对西方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伟大的文化艺术和文学。苏联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对俄罗斯历史大肆加以歪曲，对俄罗斯文化史的评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恩格斯1884年在致俄国旅居伦敦侨民帕普利茨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彷徨徘徊，那么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

① 卢梭，让·雅克（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里，加布里耶尔·波诺杰（1709~1785），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② 莱纳尔，吉伊欧姆·托马斯·弗兰苏阿（1713~1796），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我指的不仅是参加实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的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①

一部分苏联历史学家对于重新审查对待我国过去历史的一系列错误评价这一原则问题，采取了顽固对抗的立场。这一事实说明，“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复发症在他们那里表现得是何等顽固。

1941年5月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这篇著作批评了在评价俄国对外政策上的错误论断。发表斯大林同志这篇著作，是责成苏联史学家立即着手对俄国对外政策史进行深入研究，以结束在这个问题上所遵循的所有不正确方针。但实际上苏联历史学家对斯大林同志这部著作却保持沉默。从发表斯大林同志文章迄今，在历史出版物中，没有一部有关这一题目的著作，惟有筹备出版的第2卷《外交史》是个例外。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二十五年》论文集中，潘克拉托娃在《历史学家在伟大卫国战争条件下的任务》一文中谈到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必要性时，竟对斯大林同志发表评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和由此而向史学家提出的任务不置一词。潘克拉托娃历数了近些年出版的数十部全然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历史著作，而对斯大林同志的这篇著作却连提也没提。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打破了对待俄国历史的反列宁主义观点。而这些观点却为“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广为传播，潘克拉托娃至今仍顽固抓住它们不放。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171页。

这样一来，在一些苏联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巴赫鲁申、涅奇金娜和列别杰夫——的著作中，迄今仍培植着陈旧的、受到党所谴责的对于俄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和俄国杰出活动家的鄙薄态度，不恰当地鼓吹俄国反动活动的作用。这样，不管怎么说也无助于培养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无补于培植对我国昔日历史的热爱之情。

3. 一些历史学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列宁主义观点

在苏联史学家近来撰述的一些著作中，比如阿卜迪卡雷柯夫和潘克拉托娃主编的《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史》、科学院历史所撰写的《巴什基尔史纲》，对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学说都作了修正，实质上表述的是十月革命前反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待我国历史和苏联各民族关系的那种观点。

在这些历史著作中，俄罗斯是作为非俄罗斯民族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来描写的，把这些民族合并到俄罗斯被看做是对他们犯下的一种绝大的罪恶。与此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却没有表现俄罗斯民族在建立和发展俄国多民族国家中的主导作用。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史》和《巴什基尔史纲》的作者们把波克罗夫斯基的反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他们著作的基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历史地、真实地阐述人民的历史，历史地、真实地阐述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关系的发展，把人民的全部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研究，这一切都被他们抛到了脑后，这些著作的编撰者们错误地解释了把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合并到俄罗斯这一根本历史问题，他们忽略了苏联历史教科书国家竞标专门委员会在有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归并俄罗斯问题上的著名指示。政府专门委员会的决议指出：“我们说，在18世纪末，把格鲁吉亚纳入俄罗斯政权之下的事实也像乌克兰被并入俄罗斯统治之下的事实一样，被作者们看做是绝大的罪恶，

这就失去了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联系。这些作者们没有看到，格鲁吉亚当时面临着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或者被沙赫君主制的波斯和苏丹统治的土耳其所吞并，或者转到俄罗斯的保护伞之下。他们就像当时乌克兰所面临的选择一样，或者为波兰和苏丹土耳其所吞并，或者转到俄罗斯统治的版图之内。他们没有看到，第二种选择毕竟还是最小的一种恶行。”这种评价也完全是针对《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史》和《巴什基尔史纲》的作者们所作的，因为他们也完全忽略了历史上发生的将哈萨克人和巴什基人并入俄罗斯的具体历史环境。

在给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局的《信》中，《哈萨克通史》的编撰者们写道：“不应当说沙皇政府夺取哈萨克斯坦是‘最小的恶行’。具体发生侵占的这一过程有别于在乌克兰或者格鲁吉亚发生的事，因为这是在另一历史环境和另一时代发生的”（《信》，第10页）。作者们的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与俄国征服时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真实情况不相符。

在那个时期（18世纪），众所周知，哈萨克民族处于被卫拉特^①野蛮征战部族和中国人完全消灭的威胁之下。那时候，哈萨克斯坦是各个游牧部族的杂居地。相互之间几乎不断发生仇杀。不时出现的政治联合极不稳固，动不动就作鸟兽散，发生解体。哈萨

^①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额鲁特”，也称卫拉特。国外学者又往往沿袭突厥语习惯，称之为卡尔梅克。12世纪末、13世纪初，斡亦剌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1207年成吉思汗派遣长子术赤北征，斡亦剌忽都合别乞首先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命他管理各部斡亦剌人，并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此后斡亦剌的统治者与元朝皇室世代联姻，地位尊贵，是元代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明末清初，瓦剌各部经过长期发展变化、迁移和战争，并融合和吸收了周围突厥语系和东蒙古诸族成分，最后归并为准葛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由于准葛尔部势力最大，故清代史籍往往把额鲁特也统称为准葛尔。

克斯坦无能力抵抗野蛮侵略者的毁灭性的强盗袭击，世世代代遭受着东方野蛮邻国的不断侵扰。

在 18 世纪 20~30 年代，准葛尔卫拉特人曾两度使哈萨克斯坦遍遭火与剑的袭击，肢解了整个哈萨克部族。哈萨克斯坦的三分之二（大月支和中月支）被卫拉特征服。整个哈萨克人在这场斗争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卫拉特人本身的遭遇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被 1758 年征服准葛尔的中国军队几乎全部斩尽杀绝。从这时候起，哈萨克人就处在中国人的灭绝性的威胁之下。哈萨克人的村落也经常遭到卡尔梅克人和巴什基尔人的毁灭性袭击。这样一来，哈萨克斯坦当时就面临着被东方野蛮民族奴役或完全灭绝的前景。

在这样的条件下，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这个比亚洲国家更文明、并形成了强大集权制的国家，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是最小的恶行，也是拯救哈萨克民族的举动。

正是这个缘故，更有远见的哈萨克汗期望从其西方邻国俄罗斯寻找保护伞。众所周知，哈萨克人曾数次求助于俄罗斯，请求接纳他们为俄国臣民（曾在 1594 年、1717 年、1725 年和 1730 年这样做过）。一些最先进的哈萨克活动家都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归并俄罗斯、同俄国人友好相处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都给这一史实以正确的评价（如诗人布哈尔·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1731 年小月支归并俄罗斯以后，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部族几乎没再遭到过侵袭。

然而，《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史》的作者们置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于不顾，却断言，哈萨克斯坦归并俄罗斯是绝大的罪恶。他们声称：“对哈萨克草原的进攻是从四面八方进行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敌人则是沙皇俄国”（第 189 页）。这些作者对哈萨克斯坦的国务活动家作了错误而有害的政治评价。他们把同俄罗斯亲善的哈萨克进步活动家视作哈萨克民族的敌人，而却千方百计对主

张同中国、准葛尔、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①亲善的活动家进行颂扬，以为他们采取的是“明智之策”。该书的编者写道：“该书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评述了哈萨克社会上层在其民族遭受殖民奴役过程中所扮演的叛卖角色”（《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的信》，第10页）。使哈萨克斯坦归并俄国的阿布尔海伊尔汗被打入了卖国贼的行列。编者们屡次强调，阿布尔海伊尔汗欺骗了人民，置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走上了投降俄罗斯的道路（第153、155页）。

编者对阿布尔海伊尔汗抹黑以后，在结尾作结论道：“阿布尔海伊尔汗提出的任务没有一项得到完成。不仅如此，他力主依靠沙皇政府并使哈萨克汗国臣服俄罗斯的企图不仅引起了大部分人的反抗和谴责，而且招致了子孙后代的唾骂”（第161页）。

与此同时，该书却对阿布莱汗赞口不绝，因为他表面向俄国称臣，同时也承认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他在两大强国之间无法采取正确方针，因而实行了两面讨好的矛盾的政策。这一政策除了有害于哈萨克人以外，没有带来任何效果。作者们不得不承认，人民群众的状况在这个时代变得更糟了。但他们还是断言，“尽管如此，阿布莱的国务活动是符合哈萨克的民族利益的”（第169页）。阿布莱被说成有远见的政治家、智勇双全的军人云云。（第164页）。在该书作者看来，他“比许多别的汗都更明晰哈萨克民族所面对的天下大势和政治任务”（第165页）。但是，事实却没有证实这一点。甚至对卡拉泰苏丹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这是惟一一位打算窃取汗的权力并怀着这个目的反对俄罗斯的人，该书编者也对他作了正面的

^① 浩罕汗国，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位于费尔干纳河谷，19世纪中叶以前领土包括塔什干、齐姆肯特和土尔克斯坦等城市。境内主要有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希瓦汗国位于阿姆河中下游。居民主要为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

评论。

哈萨克斯坦史的编者在责难阿布尔海伊尔向俄罗斯称臣的同时，却以民族主义的精神将哈萨克人过去的国家制度理想化。他们把事态阐述成这个样子，似乎是哈萨克汗国原本有能力捍卫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对有关哈萨克汗国的稳固和实力问题作这样一种解释，不啻是企图对哈萨克国家的实力水平作反科学的夸张，以此把俄罗斯描写成一个消灭哈萨克国家的角色。事实上，哈萨克国家直到哈萨克斯坦被合并到俄罗斯之前，都还处于萌芽状态。

《哈萨克斯坦通史》的作者们由于遵循着俄罗斯是哈萨克人最凶恶的敌人这一基本论断，他们对哈萨克民族的历史作了非科学的分期。编者把革命前哈萨克斯坦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两部分：独立时期的哈萨克斯坦（从上古至19世纪中叶）和殖民地时期的哈萨克斯坦（从19世纪中叶至十月革命）。这样的划分是同哈萨克民族的实际历史相矛盾的。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在臣服俄罗斯之前曾数十次遭到侵略和奴役。仅是鞑靼蒙古人在将近二百年间就不断把哈萨克斯坦置于奴役地位。在这样一个时期还能谈得上什么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因此，作者没有任何理由把哈萨克斯坦许多世纪以来遭到野蛮民族的侵略看做是独立的时期。

对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尔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极端片面的研究，差不多只是从它们遭受殖民压迫的角度来考察。与此同时，该书作者们却对俄罗斯对东方各国所起的进步作用（比如，对从游牧业转向农业定居的影响，对出现更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等等的影响）不置一词。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此写道：“俄国的统治，……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恩格斯1851年5月23日的信）。^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85页。

编者把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历史的基本内容归结为描写这些民族反抗俄罗斯起义的历史。同时，该书的作者们却精心地记述了这些民族反抗俄国人的每一次运动，无论其目的如何、鼓动者是何许人，规模多么微不足道，都一一作了记录。比如，在《巴什基尔史纲》中，编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1572年和1581年的“运动”。参加前一“运动”的有120人，卷入后一运动则700人左右，其中“巴什基尔人”还居少数。

该书的编者甚至还把那些通常不分青红皂白对俄国人和巴什基尔及哈萨克的村庄大加劫掠的土匪团伙的行为列为“人民运动”。从另一方面说，编者也没有把真正的人民运动同受巴什基尔族和哈萨克族的仇敌——诺盖人和鞑靼人的汗、准葛尔卫拉特人等等煽动和操纵的运动加以区分。例如，1662至1665年巴什基尔人的起义就是由克里木汗和西伯利亚王子库丘克鼓动和领导的。1855至1856年以冒险主义者比·叶谢特·科季巴罗夫（顺便一提，此人被编者吹捧为勇武的英雄）为首的反对俄罗斯的“哈萨克人民运动”，则为希瓦人的汗所领导。叶谢特无非是希瓦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代理人。他在哈萨克人当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的全部“军队”只不过才由1500人组成。

这样构建历史的直接后果，是《哈萨克斯坦通史》的作者对哈萨克人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忽视。编者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哈萨克斯坦，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没有展开加以评述，仅只是限于对这个问题草草作了一些记载。实质上，并没有把这个时期哈萨克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揭示出来。正鉴于此，就制造出了一种虚假的观念，似乎哈萨克民族各阶层不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存在着统一和团结，并把哈萨克人的宗法封建社会制度给理想化了。哈萨克斯坦的整个内部斗争首先不是被视为阶级矛盾的结果，而是被看做拥护和反对同俄罗斯亲善的双方的斗

争。

有关哈萨克斯坦史和巴什基尔史著作的作者们，没有考虑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指导性原则，把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反沙皇政府起义的性质问题给弄乱了。

把许多民族联合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俄罗斯国家，是通过使俄罗斯境内所有民族服从于俄罗斯族统治阶级的形式进行的。这种联合也不可能以另一方式进行，它只能在阶级压迫的社会条件之下发生。

俄罗斯各民族的这一暴力联合方式，自然引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其说是进步的，毋宁说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是同俄罗斯族劳动群众反对专制农奴制的斗争结汇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这些广为人知的原理，并没有引起哈萨克斯坦史和巴什基尔史作者们的注意。

这样一来，在上述哈萨克斯坦史和巴什基尔史的著作中，作者们在我国居住的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把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归并俄罗斯看做是绝对的坏事，并把俄罗斯描绘成这些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些著作的作者们的错误指导思想，给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反对列宁—斯大林旨在巩固苏联各民族友谊的政策提供了思想武器。

※ ※ ※ ※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历史杂志》变成了脱离广大史学界的封闭的组织机构。

历史研究所的领导人员把一组人或一群人以“集体合作”方式

编纂历史著作的反科学的有害的方法强加给了史学干部。鉴于此，苏联舆论界只晓得历史著作编纂者的姓名，而这些著作的许许多多真正的作者，反而不为人们所知。下面一些著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编纂出来的：《哈萨克斯坦通史》（阿卜迪卡雷柯夫和潘克拉托娃编）、苏联中学历史教科书（潘克拉托娃编）、《苏联历史科学的二十五年》论文集（沃尔金^①、塔尔列和潘克拉托娃编）、苏联历史高校教科书第1卷（列别杰夫、格列科夫和巴赫鲁申编）和第2卷（涅奇金娜编）以及《西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斗争》（塔尔列编）。年轻史学家的著作长期没有得到历史研究所的重视并协助出版。比如很有才干的年轻史学家科茹霍夫^②的《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两卷本著作，在长达三年中间为历史所不管不问、也没有交付讨论。

鉴于这一原因，积极独创的学术著作对广大年轻史学家没有吸引力，许多极端重要的史学问题没有得到研究。我国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历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首当其冲属于这些历史问题之列。就苏维埃国家历史的这样一些重要时期，比如国内战争以后的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工业化、集体化时期，历史学家连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写出来。苏联历史学家直到现在也无意于以充分的论据揭露法西斯的伪造史学，揭露德国人有关斯拉夫民族历史的研究著作。

《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所没有就苏联史学家的著作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此展开过批评。在历史学家中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宽恕原谅的情绪，存在着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不能允许的，对历史性

① 沃尔金，维亚切斯拉夫·彼得罗维奇（1879～1962），历史学家，院士（1930）。

② 科茹霍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914·1978），历史学家，波罗金诺军事历史博物馆馆长。

或原则性错误的容忍。例如，潘克拉托娃对巴赫鲁申、雅可夫列夫、塔尔列等史学著作中的错误一次也没有进行过批评。上述这些史学家从他们方面来说，也对潘克拉托娃著作中的错误论点和各种荒谬之谈视而不见。显而易见，历史研究所目前存在的这种完全不正常的状况，严重阻碍着历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历史科学领域的这种不良状况，鉴于一些苏联史学家的错误观点对年轻史学家干部队伍和对大中学生的有害影响，有理由要求对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历史杂志》的事态加以纠正。

格·亚历山德罗夫

波斯佩洛夫

费多谢耶夫

抄送下列同志：谢尔巴科夫、什维尔尼克、米哈伊洛夫、基谢廖夫、沙姆别尔格、伊茨科夫、亚历山德罗夫、雅可夫列夫、什基里亚托夫、费多谢耶夫。

No05180

亚历山德罗夫等关于呈送有关 大国主义错误材料致中央书记处的信

(不早于1944年7月1日)

致安德烈耶夫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谢尔巴科夫同志

现将这份关于苏联史学家的大国民族主义错误的材料呈送你们，作为对《关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著作中的严重缺点和反列宁主义错误》报告的补充。这些错误主要不是出现在历史学家发表的著作中，而是表现在他们的口头言论和文章手稿中。

亚历山德罗夫

波斯佩洛夫

费多谢耶夫

附 录

关于部分历史学家中间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

浏览一些历史学家公开言论的速记稿和其他材料，就可以看出，在一系列史学家，尤其是雅可夫列夫和塔尔列的讲稿、公开言论和文章稿中，表现出了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表露出他们试

图重新审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俄国历史所持的观念，有意美化沙俄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并为之进行辩护，也暴露出他们企图把俄罗斯人民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对立起来，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玷污反专制制度的人民运动。

例如，雅可夫列夫教授1944年7月1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次例会上声称：“我以为必须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动因提到首位。我们很尊敬加入我们联盟的各个民族，并对他们充满着敬爱之情。但是俄罗斯的历史是俄罗斯人民创造的。因此，我认为，任何一种有关俄罗斯的教科书都应该建立在这一主旨之上……这一民族发展的动因——它鲜明地贯穿于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历史教程中——必须传达给教科书的所有编纂人员。我以为把对加入我们国家的百十来个民族的兴趣与此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作为俄罗斯人，想有一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一部俄罗斯机构制度的历史，但这是要在俄罗斯的条件之下。”

雅可夫列夫的这一席话，明显地表现了对非俄罗斯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鄙视态度。

一些有立宪民主党思想的历史学家，从放弃“狭隘”的阶级观点和对历史现象的阶级评价这一需要出发，要求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塔尔列院士在萨拉托夫讲课时宣称：“现在正对似乎早已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着一次很大规模的重新审查”。塔尔列院士建议进行这一审查，并主张放弃历史科学的“刻板公式”。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这一论断就是这样的公式。塔尔列力图证明，帝俄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代，即1814至1859年时期，在欧洲实行的政策是进步的。他说：“实际上，俄国是在什么时候以其雷霆万钧之力猛攻自由的欧洲并将其窒息？只是在1849年。这是惟一的一次”（1944年2月25日速记

稿)。塔尔列就是从这一观点为沙皇政府镇压 1830 至 1831 年的波兰起义进行辩护的。

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出版社会议上，格列科夫院士在讲话中也声称，历史学家现在“醒悟”而且懂得，国家和人民是不可能分离的。显而易见，应当把史学家的醒悟看做是不再对国家作阶级的评价。格列科夫说：“在当年最著名的人物卡拉姆津写出《俄罗斯国家史》的时候，我国那些自由主义史学家很有些愤愤不平，甚至说什么，他怎么写这样一部国家史。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回答，一部相当平庸然而却是多卷本的著作《俄罗斯人民史》^①问世了。但这两者是完全不可分离的。怎么能够将人民和国家分开呢？”因此，格列科夫院士把在苏维埃国家形成的关系——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的一致性，搬回到了过去的历史中。

众所周知，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全部史学，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相统一的前提出发，将任何革命运动都宣布为反国家的，因而也是反历史的行为。这一资产阶级的观点在阿杰米扬之流的作品中公开受到辩护。在寄给《历史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阿杰米扬提议不要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历史事件，认为这种观点是什么“左派幼稚病”。他进一步建议，要重新审查在俄国各民族革命斗争问题上采取的方针。阿杰米扬把革命的起义界定为反动事件，因此，按照他的观点，这些起义破坏了俄国专制政权的力量。比如，阿杰米扬就把鲍洛特尼科夫、拉辛和普加乔夫的起义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归入反动的起义之列。

阿杰米扬写道：“我国理智的史学界由于惬意于表达人民的创

^① 该书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伏依（1796～1846）所著。波列伏依是 19 世纪前期在俄国历史上出现的史学流派“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试图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完整地阐述俄国历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一些进步原则。

造作用，对拉辛、鲍洛特尼科夫、普加乔夫、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形象感到亲切，但却很忌讳表现季米特里·顿斯科伊、阿·涅夫斯基、伊凡雷帝、彼得一世和苏沃洛夫等人物的业绩。这是为什么？因为前一类人反对国家，而后一类人却相反，主张巩固并弘扬国家；前者是破坏国家，后者却是建设国家的。”

说到普加乔夫起义，阿杰米扬指出：“他们的胜利尽其所能打击了俄国的政治实力；由于罗曼诺夫王朝缺乏足够成熟的继位人，这一胜利也得以把俄国逐出了世界强国之林。如果普加乔夫一旦胜利，俄罗斯恐怕就会陷入血腥野蛮的渊藪之中”（摘引自作者寄《历史杂志》的文章手稿）。

一些史学家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描写彼得一世改革的意义。例如，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教授在其1943年出版的《彼得一世的“正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一书中，便滑向了这一立场，即否定彼得专制制度的贵族地主阶级实质。按照瑟罗米亚特尼科夫的观点，彼得一世实行的都是反封建的措施。“彼得法律制度的反封建倾向引起了作者的特别注意”，——瑟罗米亚特尼科夫这样写道（第3页）。

被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列入这类“反封建措施”的有这样一些法案：1714年的“一子继承法”^①，它取消了贵族按个人意图支配土地的权利；颁布“官秩表”^②法令，彼得一世仿佛是以此向贵族固守特权等级的企图“宣战”，“对没有任何爵位的人都广开晋升之阶”；彼得的军事改革，它“迫使贵族服役”，断了他们竭力坐守庄园的意图。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把商人和工业家的支持视为彼得一世

① 该法令规定，贵族只能将其不动产（封地或世袭领地）传给一个儿子，其余没有分得不动产的儿女只能继承其他动产。

② 1722年1月24日颁布，它把全部文武官员分成十四个等级。以“论功取仕”取代了以门第取仕。

实行“反封建措施”的证明。

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教授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措施实际上总的来看，无非是适应了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了贵族和商人的国家，尽管这些措施也损害了个别封建主集团的权利，引发了一些贵族反动集团的反对派情绪。

许多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某些复活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是同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理想化，同寄希望于苏维埃国家演变为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相联系的。事非偶然，雅可夫列夫教授在其《学习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和讲话》的手稿中，涉及英国时这样写道：“大不列颠是经典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国家”。对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理想化和资产阶级复辟派观点，在某个叫萨佐诺夫的人提供给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位论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萨佐诺夫在其《经济政策理论导言》的手稿中把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描绘成苏联长入资本主义国家体系。萨佐诺夫建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让我国向外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把整个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80%转向股份化，将股份主要卖给外国资本家，云云。

手稿中发挥的最主要的理论原理可归结为一点，即证明在苏联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些经济规律。他力图证明，既然在苏联保存着商业和货币，那么，它们也具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性质。按照他的观点，价值规律在苏联的作用同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作用没有任何差别。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同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就其本性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同。

萨佐诺夫的这些复辟派观点，是同一些苏联史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派意识形态直接相联系的。

由此看来，一些史学家在其言论中复活了大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同列宁—斯大林的旨在巩固民族友谊的政策相敌对

的；同时，他们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并试图将资产阶级制度理想化。

亚历山德罗夫

波斯佩洛夫

费多谢耶夫

【专题说明】

30年代俄国侨民中的法西斯党

(1933年5月至1937年)

这是一组有关30年代中期在满洲的俄国法西斯党和在美国的全俄民族革命党的档案文献。这些材料重点讲述了侨民中的法西斯党的一些活动，同时也涉及到这一时期北满俄国侨民的生活状况，以及部分海外侨民对苏联国内政策的看法。

这些文献是了解30年代苏联与德国法西斯政治关系的重要辅助材料。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李树柏翻译)

№03128

旺夏茨基致俄国 法西斯分子总司令部的公开信

(1933年5月10日)

亲爱的战友们！

正在成长中的俄国法西斯主义，现在还只是在新征程中迈出了头几步。它现在只是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它正着手把自己的根基由侨民移向俄国人民。俄国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就是，站在俄国必然发生的事件之前。

斯大林的法令和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动员“突击”力量标志着，残暴的共产主义必定走上这样一条路：即把农民完全禁锢在农庄里，从而使农民和苏联当局之间的斗争急剧尖锐化。正是在此基础上，增强了俄国农民的反抗倾向，增强了他们自卫的能动性和决心；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西伯利亚和库班）正转变为公开暴动。

为了加重世界经济萧条，苏联当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外商品市场抛售原料，它不关心俄国工人，而只顾达到其主要目的——动摇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

事实是，因国家“突击”工业化而造成的劳动强度过大，表现为工作日紧张，通过“布尔什维克”竞赛而使工人疲于奔命，致使工人衰老体弱，倍受工厂奴役。苏维埃政权以通过各种克扣降低工人工资的形式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使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俄国工人阶级对自己境况如此急剧的恶化尚无感觉，这种恶化

在任何方面，都不如不断加剧的生活过度紧张方面表现得更强烈。显然，整个俄罗斯民族尚未做好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准备。至于说俄国侨民，那么迄今为止他们还不曾给自己的民族以任何帮助。侨民的过去影响到了他们的现在。旧的残余构成了侨民目前要走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们将顺利地通过转折点，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向前发展，由一个人数不多的宣传组织，变成一个俄国人民的群众组织。

但这是整个客观形势和斯大林共产主义战后总体发展在当前向俄国法西斯主义提出的任务。这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服从这一任务。

国外的大多数俄国政治组织都表现出，它们一点也不理解俄国工农阶级的心理；它们在分析工农阶级不满意共产主义政权的根本原因时，犯了大错误；它们也没有充分考虑发展工农阶级政治自觉性这一事实。俄国法西斯主义必须纠正这个错误。

全体俄国农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能联合他们进行共同斗争的主要要求是：

1. 私有制的自由；
2. 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分给农民；
3. 农产品的自由贸易。

广泛地、坚持不懈地宣传上述三个要求，应是俄国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任务。法西斯主义者只有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战，才能联合广大农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在城市工人中深深扎根，变成群众性的法西斯组织。俄国法西斯主义要想成为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只能通过俄国农民队伍中建立自己的主要堡垒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基础，同时保持自己在工人中的阵地。

这个面向俄国“穷人”、“中产者”和“富农”的方针，必须经过俄国法西斯主义的全部活动，才能成为组织无组织者的基础。

为使俄国法西斯主义坚定不移地踏上使其变成人民大众的民族组织之路，有三个条件现在是绝对必要的，而俄国侨民至今还不理解这三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这三个条件如下：

1. 正确分析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制度的普遍危机；
2. 把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置于组织工作的中心；
3. 使组织摆脱侨民的狭隘性，使其建立在俄国农民的广泛基础上，对在外国人中开展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我号召战友们完成这些决定性的任务。

旺夏茨基^①

^① 此信刊登在《法西斯分子》杂志第1期。

№03124

西瓦琴科夫要求加入 俄国法西斯党的申请书

(1934 年 2 月 3 日)

上帝，民族，劳动

申请加入俄国法西斯党，第 _____ 号

我真誠地请求吸收我为俄国法西斯党党员，同时完全赞成党的思想体系和策略。

入党后我保证履行党的相应最高机构的一切指令，严守必要的机密。

西瓦琴科夫

1934 年 2 月 3 日

1. 姓、名、父称：西瓦琴科夫，费奥多尔·斯杰潘诺维奇。
2. 民族：俄罗斯。
3. 国籍：侨民。
4. 宗教信仰：东正教。
5. 出生年月及地点：1887 年 2 月 12 日；斯列坚斯克市，外贝加尔州。
6. 推荐人姓名及确切地址：马尔卡罗夫，亚历山大·埃拉斯托维奇，别墅街 4 号楼 50 号；尼基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别墅

街4号楼50号。

7. 文化程度：报喜节中学，彼得堡林学院。

8. 专业：林业。

9. 服役（或工作）地点：无。

10. 月工资额：没有。

11. 家庭成员：妻子和两个女儿。

12. 家庭住址：叶戈罗夫大街3宅11号。

13. 我加入俄国法西斯党的原因：我个人的信仰与党的思想观点一致。

14. 备注：_____

因上面所填情况属实，又因政治和道德上完全可靠，我愿为西瓦琴科夫作保。

保证人（签名）^①

^① 档案原件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3125

西瓦琴科夫关于海拉尔法西斯党情况 给马特科夫斯基的汇报信

(1935年1月17日)

上帝，民族，劳动光荣属于俄罗斯！

最尊敬的战友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①！

现在，在我来到海拉尔市一个月之后，我的党务工作情况和我的个人的情况已相当明确，想到在我离开之前你我的谈话，我认为必须将全部情况详细报告给您。

应当回顾一下我在哈尔滨的最后几天。米弗塔胡吉诺夫战友想整顿海拉尔的党务工作，责任繁重，许诺给党派去的人提供饭食和住宅。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②打算让我去，希望为《我们的道路》^③工作，能再多挣30~40卢布。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我到来之前已经租了一个地方作党的办事处，面积5.5平米，一个带平台的房间3.5平米和2平米的小房间。

① 马特科夫斯基，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内战结束后，带着全家侨居哈尔滨。积极参加满洲的俄国法西斯运动，1935年前一直是俄国法西斯党的领导人（远东部部长），后来任伪“满洲国”侨民事务总局三处（侦察和反侦察处）处长，与驻哈尔滨的日本军事代表团积极合作，1945年11月为苏维埃政权逮捕，长期监禁。70年代初死于苏联。

② 指罗扎耶夫斯基，康斯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1907~1946），俄国侨民，满洲的俄国法西斯党的领导者和创建人。1946年9月为苏维埃政权逮捕，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判决，1946年9月被枪决。

③ 俄西法西斯的日报。1938年前在哈尔滨出版。

党员人数不是像对哈尔滨报告中说的25至30人，肯定住在海拉尔的有3~4个人，其他人各奔东西或失踪了。正如您会在名单上看到的，现在法西斯党员人数是41人，加上4个没上报的，总共是45人，而每天还有新党员到来。每天晚上上课，讨论100个问题，研究纲领和条例，这时屋里平均要挤下25人，白天来访者人流不断。

我在小房间生活和工作，但由于太挤，这个房间从早9点到夜里12点总是人满为患。现在不可能规定严格的接待时间，因为这样我们会使振作起来的居民反感。

鉴于上述情况，几乎无法搞通讯工作，此外，就连写给和寄给《我们的道路》编辑部的文章，大概也因编辑部材料过多，所以上报发表的时间非常晚。紧急会议的重大报告就是如此进行的。此次会议于本年12月30日在海拉尔公共中学召开，但至今还没有在《我们的道路》上加以报道。这么不认真，还有减少我的供应，都会降低我在当地民众面前的威信；民众知道我是《我们的道路》报的代表，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这个报道，因为会议实际上是我倡议召开的，它有力地唤醒了沉睡中的海拉尔民众。

没有报道，人们向我提出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同样，不是单独的房间，而是兼做办事处的地方；不是30~40国币^①的工资，而是每月勉强拿8~10国币，不是正餐，而只是一顿午饭，就连这也是分部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因为分部财政状况严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扩展，情况当然会改变，但现在困难重重。

另一件我们曾考虑过的工作——在中学教课，也无法进行。在海拉尔公众面前，我是一个政治工作者，而当地的头面人物为了保

^① 伪“满洲国”的货币单位。

护自己的政治清白，对法西斯主义不信任，都想躲开。不可能有服务，此外也无法把我干的工作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个人营生结合起来。正如您看到的，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困难很多，我的经济状况也很不乐观。这里不付给我生活必需的30国币，所以我只能坚持到精疲力竭为止。

至于工作的技术方面，也不得不强调不利于其开展的条件。对海拉尔死气沉沉的工作早已习惯了的战友米弗塔胡吉诺夫没有解雇我并要我相信哈尔滨，分部完全能得到各种必要的材料和文件。

实际上什么都很少，无法应付工作的广泛开展。说明最新情况后，我请求远东部^①给我寄些纲领、条例、《法西斯主义入门》^②、履历表、入党申请书、个人登记卡、部里不需要的宣传画，等等。尽管我一再要求，但请求却始终没有回音。

首要的是派我到海拉尔工作，故此我的要求应百分之百优先得到满足，否则，拟定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而我的派出，对党，对我，对任何人都将是不必要的牺牲。

这里按期召开妇女运动^③大会和先锋队^④集会。我没有这些组织的章程，我请把这些材料寄给我，现在我只能沉默不语。没人通知我，我写信，部里收到什么，没收到什么：这有重大意义。近10天来，我两次向印刷厂紧急订购传单^⑤，第一次，传单晚寄来两天，第二次看来根本没寄。结果只能冒险定货，免得把事情搞糟。为了事业，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便亡羊补牢，再这样下去是会耽

① 俄国法西斯党远东部统一领导在满洲的法西斯各支部。

② “俄国法西斯主义教科书”，由100个问题和答案构成，由俄国法西斯党的领导人之一塔拉丹诺夫编写，罗扎耶夫斯基主编。1934年在哈尔滨出了第一版，1936年出版第二版。

③ 俄国法西斯妇女运动是俄国法西斯党内的妇女组织，成立于1934年。

④ 1934年在俄国法西斯党内设立的青年组织，一直在满洲存在到1943年。

⑤ 法西斯传单，在俄国侨民中散发，同时也向俄国境内运送。

误工作的。

现在我转向纯属我个人的问题。我的家还留在哈尔滨，顺便说说，我走之后，家里的生活很难得到保障。长时间生活在我现在生活的境况中是不可能的，我想把我21岁的大女儿弄到海拉尔来，她可以帮我组织妇女运动。然而第一，她的护照过期了；第二，没有来海拉尔的车钱。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您能否通过党，免费给她搞到护照和一张来海拉尔的免费车票？

如果说这方面还将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请您吸收我女儿入党，请您说明，为此她做些什么和怎样做。我家的地址是：纳哈洛夫卡^①，叶戈尔街，门牌11-3号。我女儿叫：塔吉娅娜·费奥多罗夫娜·西瓦琴科娃。我在这里，在当地给她找份工作。这么办，将使我的状况有所保障，并为工作创造更安定的局面。我想，我给您的这个私人信件，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并成为中央和海拉尔分部关系更加正常化的开端。

光荣属于俄罗斯！

致诚挚的敬意和法西斯的敬礼！

海拉尔分部主任 西瓦琴科夫

1935年1月17日于海拉尔市

第12号

^① 当时哈尔滨市的一个区。

№03126

西瓦琴科夫关于海拉尔分部工作情况 致法西斯党远东部长的汇报信

(1935年6月1日)

光荣属于俄罗斯!

致俄国法西斯党远东部部长^①

尊敬的战友!

在我呈送1935年6月1日开列的海拉尔分部战友名单时,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分部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工作环境。大部分党员是1930~1934年从外贝加尔逃来的难民^②,多数是不太适合作战斗材料的哥萨克。在这群人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屈指可数:就是他们,也要为一块面包而奔波,没有时间给党工作。这里的知识分子人数很少,且已结成有特定观点的小团体。该团体受全军同盟^③代表的领导,对我们持敌视态度,其大多数成员都在干勒索钱财、酗酒和赌博的勾当。党内无一人来自他们当中。在这种暗藏的仇视的情况下,实际上不管是在责任重大的公事上,还是在党务上,都不可

① 即马特科夫斯基。

② 非法越境的苏联公民,在越境后一般要受到驻满洲的日本军事行政当局的严格盘查,越境出逃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

③ 俄罗斯全军同盟是俄国君主派侨民的政治组织。出现于20年代,在俄国侨民居住的各个地区都有分支机构。

能得到帮助，我完全是单干。这里有民族协会^①在的时候，我的工作进展顺利。3月，海拉尔成立了总部^②的分部，我和其他许多俄国人一样，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很遗憾的是，这些希望落空了。海拉尔分部的头头是沃尔金，此人虽然聪明，但文化水平不高，此人的过去很不光彩，他和海拉尔的主要团体联系密切。

他一开始工作，就邀请了所有前民族协会近20人做总部的准会员，因此改变的只是组织名称，技术工作全推到一个新人，就是我的身上，本质依然如故。但因总部是比民族协会更有权威的机构，因此其行动路线，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对民众有巨大精神作用。

沃尔金的领导方法和法西斯主义的行为方式直接敌对，尽管形式隐蔽（尽管他是哥萨克的头领）。法西斯工作给海拉尔的沉闷生活带来了生气，所有以前在此地平静工作的可疑的投机者都惊恐不安，他们千方百计干扰法西斯活动的开展，破坏我这个分部主任的威信，最终是要让我的工作负担过重而放弃党的工作。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加宁转交您的一份总部给分部下发的命令的副本，您从中可以看到，给我戴的头衔有办事处书记兼主任，而事实上办事处根本没人，分部的所有工作全压在我头上了；而沃尔金的领导工作就只是在文件上签名。从五号令上您可以断定，我得干多少琐碎的事情（杂志的出版、发行、装订）。从早8点到晚5点我在总部的分部，休息一小时后再干到夜里12点或1点——按党的路线工作。非难、捣鬼、告密、流言蜚语、挑拨离间、造谣诬蔑，使人神经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状态。打击不仅来自似

^① 民族协会是俄国侨民组织，30年代初作为全俄侨民中央在满洲成立。一直存在到俄国侨民事务总局成立之时。

^② 即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总局，1935年建于哈尔滨，一直存在到1945年。

乎与我们友好的组织的代表人物，这些组织在这里和敌视法西斯主义的集团联手反对海拉尔的法西斯组织。

和分部所属的法西斯青年组织相反，组成了完全忽略政治发展的教导队，它千方百计支撑着，在日本人面前招摇过市。教导队里有教官，购置了吹奏乐器，装备有体育器材，但却顽固地向青年人脑袋里灌输听天由命和不问政治等基本原则，同时灌输复辟思想，其表现是对以前曾有的一切盲目崇拜。在总部里，一切稍微近似法西斯主义的东西都被清除，极力把法西斯主义搞得荒唐可笑。在一封写给联络主任的第 83 号信中，我已经写了很多，现在我补充一个新的事实。阿库洛夫上校 3 天前当着卡尔鲍涅的面（他不知道卡尔鲍涅是法西斯）讲：“我们头儿^①很快会把整个北满铁路的保卫工作抓到手，到那时，法西斯主义者就不得不缩减。”这些话表明了我们的“朋友们”内心的希望，他们正等待着以促使我们的事业败亡。

从呈送的名单可以看出，19 人离开了海拉尔分部，一部分人被开除，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了。由于上述原因，入党的人相当少。当然，一切都会克服，海拉尔迟早会为我们所占有，就像出现了法西斯的很多其他据点一样。

5 月份召开过两次鼓动大会，5 月 1 日一次，25 日一次，在两次大会上发言的，除了我，还有女战友法尔科娃、我女儿和战友扎鲁宾。我们的鼓动性发言唤醒了下层民众；他们大都同情我们。把战友波波夫调到满洲里，这对分部的党务工作是个沉重打击。他是惟一的一个能担负起联络工作、报刊征订、文件散发、收缴党费等

^① 指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1890—1946），西伯利亚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满洲俄国侨民的政治活动家。1945 年秋被苏联政府逮捕，并被处决。

工作的人，目前我还无法代替他。再次请求把他调回海拉尔。与车站和三河的联系正在建立，但把我绑在总部而又没有钞票，影响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工作的正常开展。

同样由于阻碍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那些基本原因，目前妇女运动的发展也很慢，此事需要忍耐和坚定，一切都将步入正轨。

在组建先锋队方面，已形成了一种完全敌对的局面，只有借助于您，尊敬的米哈伊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才能改变这种局面。问题在于，按照教育处^①的旧条例，严禁把学生编入任何组织；以中学校长列瓦什科为代表的校领导以开除相威胁，禁止学生加入先锋队，禁止出席我们的晚会和讲解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公开课。孩子们当然害怕，甚至报了名的也不来见我们，因为这所中学是唯一的一所中学，对每个人来说，被开除都是十分尖锐的问题。必须通过ДНП^②的监督员向列瓦什科讲明，条例是一回事，当前的生活条件又是一回事，应当对他在年轻人方面的所作所为重新分析。我们在这条战线的成败有赖于此，其余部门也都动摇不定，必须从和我们敌对的集团的这个薄弱部分动手，因为这将是海拉尔协会领导人的整个基本方针在道义上的失败。在这里，在这份报告里，必须指出我的助手米弗塔胡吉诺夫的作用。在给总书记的报告中，我已经相当清楚地描述了他在海拉尔的反党活动，在这里我应当讲讲他的最近一次进攻。他讲好了要在5月25日宣读塔拉丹诺夫^③战友起草的报告《法西斯运动的任务》，但他却不来做报告；他对我派去的战友扎鲁宾声称，他将不做报告，因为报告中只谈到俄罗斯人。此事发生在会前15分钟，我不得不仓促上阵，读这份报告，因为

① 指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的教育处。

② 这一缩写名称所指不明。

③ 俄国侨民，满洲俄国法西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的命运不祥。

我们没有预备其他人选。可见他是想对节日进行部分破坏。我感到惊讶，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早该解决的问题的具体办法。

最后要说的是，“往那边”^①的工作因犹豫不决而耽误了。20天前我通知说，一批人准备经过满洲里赴 Ц - ая 和 К - ая 地区，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孩子们也焦急不安，因为耽搁，不知问题何时才能解决。哈尔滨必须发出指示。文件的内容和叙述必须简洁、明快；再者，我现有的传单都不是写给我们要给的人看的。

所以，必须准备足够数量的这种材料，以供分部夏季工作之用。如果忽略了什么问题，请提出，我将详细回答。

光荣属于俄罗斯！

致法西斯的敬礼！

俄国法西斯党海拉尔分部主任 西瓦琴科夫

1935年6月1日

第90号

^① 指的是所谓的“内部联盟工作”——在俄国境内建立法西斯支部，运送法西斯文献，收集情报等。

№03127

西瓦琴科夫有关三河地区现状的汇报信

(1935年6月9日)

三河地区的现状

三河地区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村屯，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他们从事畜牧和农耕。整个地区构成一个特别省，该省的行政大权都集中在来自新京^①的一个日本代表^②手里，他不受地方当局管辖。这位中央政权的代表有一帮俄国助手，他和他们一起，由他们协助，对居民进行判决和执行。所以三河地区又像是国中之国，非经特别许可，不得进出该地。去年秋天以前，三河地区的一切最重要的行政职位，全由正统派的代表^③占据，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对老百姓非打即骂，横行霸道，大施淫威。正统派因实行自以为是的和目光短浅的政策，从而丧失了哥萨克们的一切支持。三河地区的所有居民，大都是1920年和1921年这段时期从俄国逃亡过来的；虽然也有晚几年过来的，他们既无牲畜，又无钱，所以大部分是三河地区的工人骨干。这些人来到新地方后，多年来为建设自己今天的富裕生活，耗费了大量的体力，牺牲了青年

① 即长春，伪“满洲国”首都。

② 指日本驻满洲的军事行政代表。

③ 正统派组织是革命后俄国侨民中的君主派组织，在俄国侨民居住的大多数地方都有其分部。

和部分老人的智力和精神发展。

由于上述原因，三河人便成了十分闭塞的、愚昧无知和缺乏最起码的文化生活的人。有保障的较为富足的生活，使这些人养成了一种冷漠态度，他们对超出其日常生活范围的问题毫不关心。逢年过节，闲暇无事，年轻人只是酗酒和打架……

不久前我碰上了一件反映三河地区生活的有代表性的事情。几个月前，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住进了一个村子，此人来自哈尔滨。当他看到年轻人纵酒狂饮，便提议组织一个俱乐部，下象棋、跳棋、排戏，甚至答应教年轻人踢足球。哥萨克认为这是造反，他们派村社代表去海拉尔向分部主任报告。分部主任（沃尔金）虽然认为法西斯会在各处出现，但却向日本警察局报告这个哈尔滨人的个人情况及其活动。

我的保护与事无补。这个文化人终于被迫放弃工作，并走一百多俄里去讲自己的情况，解释自己的想法。

由联合行政当局代替哥萨克^①导致了一批煽动者取代另一批，因为搞政治和当宪兵的通常都是坏蛋。这些以前表现就不好的新活动家，当然不可能带来新办法，他们也不擅长新方法。

宪兵队的一名爪牙，名叫萨文，因其残忍凶暴，人送外号“刽子手”，我了解他本人，我能肯定，这种人只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才没加入肃反人员的队伍，但其残暴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

萨文是曾在蒙古和三河地区活动的兹科夫游击队的参谋长。

在我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人们向我介绍了谢尔巴科夫。他是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反布尔什维克的前游击队员，已加入法西斯党。我在这儿和他会过面，商量如何在他定居的村子开展我们的工作，

^① 从30年代中期开始，伪“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总局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常为侨居的哥萨克组织的代表。

该村在三河地区（离德拉戈岑卡20俄里），但眼看已经一个半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我想，现状不允许他采取任何行动，他暂时不想做这件事。

在说明一般情况时，我认为有必要引述一下我们在上述地区活动的史实。

1931年，在海拉尔市，领导法西斯团体的是个叫加弗里洛夫的人。这一时期哥萨克大批入党，但由于行动轻率，考虑不周，有些人断言他是法西斯党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被置于危险境地，党员中甚至有人在他搞的军事冒险中被打死。

海拉尔人对加弗里洛夫仍然记忆犹新，而在三河地区，哥萨克们一谈起法西斯党，总离不开加弗里洛夫的个性和活动，此人光给我们的事业帮倒忙。

去年，三河地区收到一批揭发曾为苏联干事的人的材料。这表明，由于缺乏宣传、监督和广泛的社会主动性，那里的一般气氛是多么不健康。在努力探寻我们的工作土壤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光指明某人为合适的工作人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个人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我在三河地区有知心朋友，他们自己出于谨慎，给我介绍的都是三河地区最稳重的人，因为除了朋友，还有大量敌人。

不能说法西斯工作没法进行，但这个工作不统一，缺乏高度组织性。我们的哥萨克法西斯党员都出身三河地区，熟悉三河地区，我们常到那儿去，带去点材料，在亲朋好友中搞些法西斯宣传。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还搞不成运动，但我们将有少量自己人的干部，他们分散在整个三河地区，一旦情况改变，他们将成为组织者，同情我们的力量便会聚集在他们周围。

如果有人对您讲，在当前条件下在三河地区可以做更多工作，谈各种可能性，您必须警惕，查明许诺做更多工作的人的身份。

在这方面，海拉尔分部可以做许多事情，一切阴谋诡计都将被戳穿。

光荣属于俄罗斯！

全俄法西斯党海拉尔分部主任 费奥多尔·西瓦琴科夫

1935年6月9日第28号

第5号

№03129

全俄民族革命党的一张传单

(1937年)

俄国法西斯主义者总司令部的战斗号召

15年前，内战在俄国结束了。结果，俄国成了一片余烟弥漫的废墟，千百万俄国人非死即伤。工人和农民的目光都投向了克里姆林宫的专制者们。

以往的15年，是戳穿允诺的共产主义“天堂”幻想的时期，也是这一幻想的破灭时期。梅毒患者列宁和其他共产无赖，从科舍辛斯卡娅私宅^①的阳台上发出许诺，答应分给农民土地作为私有财产，而给他们的却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答应给工人工厂，允许其过自由生活，结果却是为完成他们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而使工人处于贫穷半饥饿的境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比生活在“自由的”和“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国家工人好上千倍。

在反对日益迫近的革命民众自发性斗争中，苏联当局仅依靠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俄国法西斯主义者总司令部号召被压迫的苏联人民在它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与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斗争。

红军战士同志们！共产主义政权强迫你们射杀自己的人民、你

^① 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

们的父兄。

工人同志们！共产主义政权意味着掠夺你们工人的力量，极其残酷剥削你们的体力和精力。共产主义正把你们变成其机器上的螺丝钉，吮吸你们的鲜血，迫使你们的妻子在合作社前排队，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请把你们的队伍团结在俄国法西斯主义即人民革命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在俄国人民——被压迫的工农阶级统一的旗帜之下，团结在俄国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之下。

农民们！第三国际夺去了你们的土地、最后一头牛、一匹马，强迫你们在集体农庄像奴隶似地干活。它在压榨你们。它在侮辱你们。它将你们的汗水、你们的鲜血在外国交易所换成了金币。请了解并记住：法西斯专政的钟声将为你敲响，这是你们获得解放的钟声。它将使你们成为私营企业主，自己土地的所有者；它将把从农庄夺回的机具转送给你们一部分。加强你们的解放斗争吧！

苏联公民们！不要相信骗人的共产党员，他们正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得到幸福之类的甜言蜜语哄骗你们。

俄国民众！俄国法西斯主义者总司令部号召你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反对共产党的剥削！

反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恐怖！

反对政治局专政！

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谎言！

反对宗教迫害！

反对集体农庄奴隶制——争取集体农庄革命！

反对第三国际和共产国际——争取民族革命！

民族革命万岁！

俄国法西斯主义万岁！

№03130

全俄民族革命党宣言^①

(1937年)

盼望已久的，把俄国从斯大林政权的血腥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日子正在到来。共产主义使俄国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深重灾难和各种不幸罄竹难书。

但上帝还在！

摇摆的天平正趋于平衡。布尔什维主义折磨人的制度正在俄国崩溃。玩弄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及诸如此类的所谓“先进的”和“进步的”现象等的自由主义理想的，轻率的罪恶游戏结束了。所有这些政治学说都已寿终正寝，因为它们清楚表明自己完全站不住脚。所有这些学说都曾导致并仍在导致各民族的物质贫困化，文化贫困化，丧失道德基础，导致民族创造力的泯灭。一旦法西斯专政摆脱了该隐^②和哈姆^③，且不再需要犹太侍候，它就会唤醒民族的美好情感，激发它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保护它的美好历史传统；把它的精神、民族创造和国家创造的伟大力量提高到创造奇迹的极高水平。

世界的政治前途属于法西斯主义。看不见和不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天生的笨蛋，就是根本不能接受光明和真理的阴险的投机商。

全俄民族革命党清楚，只有即将在俄国确立的法西斯制度，才

① 该宣言刊登在《法西斯分子》杂志第42期。

② 出自旧约创世纪，指杀弟之该隐。

③ 指无礼之徒。

能在布尔什维克垮台之后，给我国带来安宁，其他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因为它们会重新开始进行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实验。俄国各族人民又会像从前一样，在内战中饱受苦难。

俄国接受崭新的国家制度——法西斯主义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有在神圣的“卍”字旗下，俄国各族人民才能够正确、理智、真诚和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地解决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

俄国应当是，而且必将是伟大的法西斯帝国。

【专题说明】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苏联对远东的新方针

(1937年11月至1939年8月)

30年代初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苏联为了避免日本继续北进，在远东地区对日采取了妥协和退让的政策，这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和出售中东铁路。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北进的呼声日高，并对苏联实行挑衅，从而威胁到苏联的东部安全。出于自身的安全利益考虑，同时也想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苏联开始改变方针，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期通过中国的牵制阻滞日本的北进。

本专题文件包括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助中国问题的谈话记录、蒋介石请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电报和信件，以及斯大林的答复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抗战爆发至苏德改善政治关系期间斯大林对远东问题的战略考虑。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周绍珩翻译)

No02459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 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37年11月11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应该记住，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谁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的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卖武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官提供给你们，这要比向外国人购买武器更便宜。

杨杰^①：这是对的。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援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是要援助你们的。

杨杰：我们全国都寄希望于你们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你们的航空事业怎么样？你们制造飞机吗？

杨杰：我们不能制造发动机，其余的我们都能制造。

斯大林同志：我们给你们发动机，要多少给多少。我们自己用木料造飞机，你们也可以制造……开创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吧，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教官……如果中国想站立起来，就应该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

杨杰：请求援助我们。

斯大林同志：要记住，仅仅指望外援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

^① 杨杰（1889～1949），又名漱石，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的总参议，随军参加北伐。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长、军事委员会常委、陆军大学校长等职。1938年5月至1940年出任驻苏大使。1949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途经香港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己的工业。英国人指望中国同日本打仗，然而，英国既害怕日本胜利也害怕中国胜利。它希望中国和日本都被削弱。中国人无疑能够战胜日本人。……假如我是中国人，我将号召我的人民不止抵抗3个月而是抵抗3年。在这3年内我们都将支援你们。你们将有自己的飞行员，自己的大炮，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战胜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石油生产。如果你们想成为独立的国家，你们就应该有飞机、大炮和石油。当你们打垮日本人后，将需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我以为，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也应当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机枪。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方说英国打交道。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对的。中国也需要从不坚定的盟友那里得到援助……。

杨杰：伟大领袖斯大林所说的一切，我将转达给蒋介石，而且，如果我们濒临灭亡，我们将寄希望于苏联。

斯大林同志：不，这样伟大的国家是不会死亡的。

……

№ 11857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

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7年11月26日)

莫斯科，杨杰元帅并转
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先生

请您，伏罗希洛夫元帅，将这份电报转呈斯大林先生。

读了杨杰元帅的书面报告和听了张群^①的口头汇报后，我很高兴，并深深地感谢您对中国命运的真诚同情和全力关怀。

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是东亚和平的基石。两国人民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相互依存，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日本。

我屡次得到您的援助。在中国的这一困难时期，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再次斗胆向您提出下列衷心的请求。

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出于国际义务，中国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现在，中国军队在最大限度地做出最后努力的同时，在进行着撤退，但仍保卫着南京。

我希望友好的苏联将给予中国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部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中苏

^① 张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调任外交部长，应付对日事宜，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重庆行营主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赖于您，也只有您能解决。
艰难时刻书此，惟望拨冗作复。

蒋中正（蒋介石）

中华民国 26 年 11 月 26 日

于南京

№02460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

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绝密

莫斯科，副总参谋长杨杰转
斯大林先生和伏罗希洛夫元帅

由于你们多次给予了全力支援，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的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

现在中国缺少许多武器，特别需要飞机。我本人曾和贵国大使谈及此问题，同时电告杨杰，让他开始关于从贵国获得大宗武器和飞机贷款的谈判。我要求他申明我们愿意缔结正式的贸易信贷协议。我想，对此你们已经知晓。

中国上述的愿望和请求与贵国的精神一致。如果从通常的贸易方法和正常的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上述请求不可能满足，因为既然我们不能提供现金，也就不能得到商品。中国对此当然十分理解。对于过去以贷款的形式得到的武器，我们尚未最终付清，也不曾补偿大量运货的开支。对于此种情形，我甚感不安。

然而中国深信，苏联拥护和平和正义。中国和苏联在东亚政治局势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一般

友好关系的范围。中国和苏联是患难与共的朋友，我深信您亦忧我们所忧。故斗胆向您提出上述超出常规的请求。

我很抱歉没能及时付清以前你们预先贷给我们的款项。请您相信中国没有可以送出国的现成黄金。如果略有可能，那我不等您提醒早就全部付清了。贵国热诚相助，中国为保全国与国之间信任着想，岂能稍有耽搁。和平时期不难筹款，而现在战争正激烈进行。前方决定战争胜利的手段是武器和战士，后方在战争进程中要依赖资金周转的稳定。中国特别缺少现成的黄金，如果马上转汇如此巨大的数额，则难以保持中国的国际货币结算汇率，中国的整个经济将会受到打击。那时尽管军队充满决心，却无法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当然希望贵国援助武器并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极端困难。我们为保持国家的经济实力而采取的措施更是一言难尽。

在收到要求加快偿还垫付的商品及其运输的 3200 万预支款的电报之前，我本人曾对德拉特温武官说，中国虽然实在不能立刻还清，但需要编制详细的结算，并准备在可能时全数偿还。

现在我愿向您宣布，中国决定并已调拨 3200 万中国元，作为补偿款项以便紧急购买这一数额的商品。这不至于影响中国的国际结算汇率，也能维持经济的正常状态并顺利地继续进行战争。

贵国定会理解中国采取这一措施的难处并予以同意。

真诚请求你们尽快同意签订以贷款形式提供武器和飞机的协议，并开始成批装运，这将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特别需要的是飞机，现在中国只剩下约 10 架轻型轰炸机。由此可知对飞机的迫切需要。请求首先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轰炸机和发动机，对此我们已经达成一致，并且要赶快运到中国。

对于余下的所有武器也请尽快缔结协议并付诸实现。为使对日作战不致半途失败，为使贵国慷慨给与中国的援助不致因拖延时日而失去意义，这样做是必要的。全中国的军队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贵国在极其艰难的时刻给予的援助。

我深信您出于原则上的考虑将会满足我的请求。请将您的答复亲自交给杨杰并由他发电报转我。

祝您成功并祝健康！

蒋中正（蒋介石）

1938年5月5日于武昌

电文无误，元帅（杨杰）

1938年5月8日

附 录

伏罗希洛夫给斯大林的送件便函^①

斯大林同志：

今天杨杰曾来我处，带来他收到的蒋介石给你和我的电报。现附上电报。杨杰口头复述了蒋介石的电报并补充道：前线深感轰炸机不足，请求尽快提供65架这种飞机。此外，他还要求快些对蒋介石关于5亿新贷款条件的电报做出回答。杨杰谈了以下几点：1) 贷款将用中国货币支付；2) 规定只用于向我们购买武器；3) 偿还条件为每年偿还5000万美元，另加付全部债款总额的 %^②。接着他告知，蒋介石和政府未征询他的意愿就任命他为大使，他请求在这新的、尚不习惯的职务上和其他方面给予帮助。

1938年5月9日

① 便函附在蒋介石电报的后面，写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公文用纸上。

② 原文如此。

№02461

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偿付贷款方式 致蒋介石的电报

(1938年5月10日)

杨杰元帅转致蒋介石大元帅

我们完全理解中国艰难的外汇财政状况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既不要求中国用黄金也不要求用外币支付武器的贷款，但我们希望从中国得到茶、毛皮、锡、钨等类商品。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这类商品且无损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国防。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将提供这样一些商品。

至于苏联的援助，你们可以毫不怀疑，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给予为反对侵略者而进行英勇解放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以援助。您所要求的飞机我们即将送去。关于向中国提供新贷款的问题将在苏联最高机构内讨论。我们希望取得成功。

请接受我们热烈的敬礼，祝您在中国解放斗争前线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

1938年5月10日

No 02462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6月22日)

最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趁首席参赞恰金返回祖国之际，请他向您转达我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

我国与日本的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

由于您领导下的苏联全体军民的深切同情，给予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使得我们能够进行长期的解放斗争。为此我们向您深表谢意。

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签订的协议，中国得到更大的援助，对此永远难以忘怀。

现在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敌人的兵力消耗殆尽，正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们在竭尽全力驱逐掠夺者和维护正义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希望苏联作为中国的特殊好友，能够更进一步带领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对日本进行有效的制裁。

现在，最受尊敬的贵国，正与英国和法国进行缔结反侵略协议的谈判。如果这一协议涉及远东，则由此将完成一件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业。

我们的前领袖孙逸仙临终时给友好的苏联国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的深切希望，希望进步的革命国家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从而使弱小民族获得解放。我相信您无疑会这样做。

首席参赞恰金在中国热情工作，并有着良好的态度，这应该说

是您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衷心感谢，并祝一切顺利。

蒋介石

No 02463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

(1939年8月26日)

斯大林先生：

您6月19日的亲笔来信^①收到了。为崇高的友谊向您表达无限的谢意。

对于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卫战争的、处于孤立状态的军队来说，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自始至终被寄予真诚而热切的期望的国家，而且是您亲自领导着全世界保卫和平事业的斗争。

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将要取得的胜利中，全中国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贵国的真诚援助和在为伸张正义的斗争中您的卓越领导。

苏中两国的伟大人民对于维护全面和平和正义负有同样责任。

我深信两国之间的合作将日益加强，侵略者最后失败的日子定会到来。

我惟一的愿望就是：与您一道，通力合作，尽快促其实现。

谨以此信作复，并祝健康！

蒋中正亲笔

8月26日

^①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信。

【专题说明】

境外立宪民主党人的反思

(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

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1906年1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改为此名），是1905年俄国革命大潮中兴起的一个代表新兴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它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执掌了很短时间的政权。1917年11月28日，苏维埃政府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被迫转入了地下，继续进行反苏维埃的斗争。国内战争结束后，立宪民主党人大多逃到了国外。他们一方面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调整自己策略；另一方面仍密切地注视着苏维埃俄国国内的动向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试图东山再起。流亡国外的俄国人民自由党人分布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巴黎、柏林、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华沙、芬兰的维堡、以及哈尔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都有人民自由党的小组或分部。柏林小组是人民自由党的一个重要的境外小组，巴黎小组则是最有权威、人数最多的小组。1921年5月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会议结束后，党发生了分裂，统一的人民自由党不复存在。

本组文件有人民自由党巴黎小组根据米留可夫报告通过的告其他小组意见书“克里木惨败后怎么办？”。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与以前

不同的新的策略原则，主张放弃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斗争，坚决与复辟及君主制倾向划清界线，联合俄国所有的民主派利用苏俄国内的不满情绪和紧张的局势战胜布尔什维克。这虽是由米留可夫提出的，但反映了人民自由党内一整批政治家的普遍情绪。本组文件还包括柏林小组对米留可夫报告的反响，克柳奇尼科夫所作的关于人民自由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党内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的情况。从这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人民自由党对自己失败的痛苦反思，它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值得重视。

(本专题文件由徐天新、刘显忠编辑和校注，
刘显忠翻译)

No07814

米留可夫关于修改人民自由党策略的报告

(1920年12月21日)

克里木惨败^①后该怎么办？

关于修改人民自由党的策略的报告

(1920年12月21日巴黎小组通过的告其他小组意见书)

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能因俄国国民军^②的失败和俄国领土的丧失而告终。应一直斗争到使俄国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压迫为止。与布尔什维克和解是不可能的。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但也十分清楚，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能再按原有的形式继续下去了。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从根本上调整一下我们的策略。斗争从原来的民族俄罗斯的各军事中心，正根据需要部分转到了境外，部分转到了俄国内地。一方面是党的境外中心，另一方面是备受布尔什维克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所追随的国内优秀人士被推到党小组的位置上，它们距斗争地点最近、策略也适应地方条件。

① 指1920年11月弗兰格尔军队在克里木半岛的失败。这以后，一些人民自由党人认为通过军事斗争求得东山再起的希望破灭，寻求新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策略。

② 主要指弗兰格尔的军队。

在这份报告中，党的巴黎小组表达了一个境外中心的意见。因此，特意对报告题目作了限制。

巴黎小组直到最近还支持处在反布尔什维克前线的国民军的武装斗争策略。但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斗争领导的失误，尽管更换了军事领袖，但这些失误仍经常重复出现，并每次毁灭性地导致同样一种结局。

当然，我们国民军的失败不仅仅是由军事领导的失误这一个原因造成的。我们的盟友的错误政策和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内部发展过程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领导国民斗争的领袖们可能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可以间接地削弱上面所指出的两个因素的有害影响。巴黎小组在1920年5月20日的决议中就说明邓尼金将军的失败，除了军事指挥的疏漏以外，还犯了四个致命的政治错误。试图以有利于有产阶级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把农民抛在了一边；重新起用以前的一些社会成员，主要是滥用一些旧的军事官僚们，而把地方居民中的其他人士和地方知识分子撇开；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狭隘的民族传统引起了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边区各民族的反感；军事利益的优先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个人利益的优先原则妨碍了按时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但巴黎小组没有急于由此就做出武装斗争必然失败，应当立即停止的结论。小组只是一再地强调，新的尝试若想成功，就必须以激进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吸收赢得了居民信任的地方人士协同工作，吸收一切有生力量参与经济活动，在联邦制基础上与竭力想要独立的民族签订自愿协定书。小组认为，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可能使旧统治阶层的那些十分有害的习惯失去活力。因为正是这些十分有害的习惯把地方居民和欧美社会对军队的同情推开。弗兰格尔将军的新政府实际上最初就意识到了上面逐一列举的邓尼金时期错误的危害。与人民自由党巴黎小组的愿望相一致的“左派

政策”，是有意向欧洲公布的。但在国内，比以前更加独特，把旧政府的全体人员都保留了下来。旧社会的著名活动家仍身居要职，并宣布了“以右手推行左的政策”的原则。尽管这个前线战斗的最后时期是很短暂的，但是恢复旧策略的后果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如果同盟国推动波兰去与布尔什维克议和的政策未曾限制弗兰格尔将军改革后的军队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话，那么这一后果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小组致弗兰格尔将军的信^①是巴黎小组对弗兰格尔将军政府国内政策的态度的明证，信仅仅是因偶然原因而没有寄出去，它附在本报告后面。

我们谈论小组反对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将军的国内政策，主要是因为在这类反对意见中已经蕴含了新策略的萌芽。新策略在前线的武装斗争崩溃后，正在取代现政策。前线斗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掌握斗争领导权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失败，这一阶层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斗争以某种政治色彩。旧有的统治阶级的习惯和方法现在应为新的民主俄国的方法所取代。

这种更替起初可能要遇到某种心理上的反抗，这是很自然的。在克里木惨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一般说来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影响将有多么深远。还没有意识到随着克里木的丧失，斗争形势将发生多大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再也没有地盘了。与前线斗争时期有不可分割联系的那些政权形式也不可能存在了——甚至对它是完全无用的。国民军中的最后一支，直到最后都在英勇地捍卫俄罗斯复兴理想，它将自己的一半战斗部队置于最后一个堡垒前面，这既令人诧异，也令人景仰。被其头领救出的剩余部分，受到了各地的高度赞扬。在

^① 这封信批评了弗兰格尔的用人、农业及反犹政策。原件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几个月近乎非人的努力之后，尽管他们极度疲劳，至今仍在准备继续斗争。这种决心使他们去国外变得容易：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仍保持祖国战士的坚韧不拔精神。但是这些脱险军队中精神刚毅者的情绪本身就将特殊的使命赋予了那些在经过如此失败之后，现在又要求军队做出新的牺牲的人。首先，十分清楚，俄国军队不应用于非俄罗斯事业。俄国军队的血不应像雇佣兵的血那样流掉。确切地说，也就是俄国人民的军队不应成为恢复旧秩序的工具。另外，它也不应帮助别人进一步肢解俄国。当然，随着克里木的撤退，布尔什维主义最终由俄国内部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首先，在特殊的和存在着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的现实危险的条件下，欧洲国家由此会得出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其次，要加倍小心，以免在这种新的“干涉”形式下越过界限，使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有可能变成反俄国的斗争。对于撤离的军队来说，认为可能立即出现一种利用其力量的良机的各种想法，都不大可能。考虑到按国际惯例军队不能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军事单位保留在中立的别国领土上这一因素，我们的盟友由此得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承认弗兰格尔的军队已经终止了自己的存在。当然，境外的俄国机关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构成俄国军队的战士生存到最美好的未来。但是，所有关于保留哪怕是一部分军队、保留旧的斗争方法和旧的政权组织的打算，现在都应抛弃。当然，在今后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武装力量可能还需要，以后的需要应作为特殊情况按新的总体规划处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已结束的斗争时期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

这一新计划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把军事力量及其指挥人员从他们不可避免陷入的政治伴随中分出来。应当永远地结束军事斗争的这一政治方面。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考验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寄希望于改善军事指挥政策的可能性了。避免重蹈覆辙的惟一实际的保

证就是把政治统治权从军事统治权中分离出来，把前者转交给得到社会认可的某个非军事性的权力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小组又拾起了早在俄国社会各派出现原则性分歧之前，即1918年秋前就提出的并得到了公认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新策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一系列国内政策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国家的组织形式问题。国家的组织形式由于特别重要，党至今仍认为必须将其搁置一旁，直到立宪会议做出决定。这并不是说，小组否定立宪会议有权通过或否定现在提出的决议。但现实本身正在解决或者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仍将其搁置起来而不解决，与其说是对人民权力的尊重，不如说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现实所做出的这一决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构成了一种政治分界线。可以在分界线的某一面，但应当采取明确的立场，以便让国家知道，要把它引向何方。

人民自由党在这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它引导的去处正是它过去引导的地方。但是对这条道路的最终目标，现在依据新的生活经验，描述得比以前更清楚了。

从人民自由党的旧纲领向现在这种有利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决定过渡要比从任何其他纲领过渡都容易。满足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各民族的要求，是与党纲的总的精神完全一致的。当然，重新建立的国家实体的自由联合原则应比以前更为突出，作为现实所强迫提出的一种方法，应更向前迈进一步。最后，统治形式的问题已由纲领的第13点^①解决了，党内分歧将因此而有一定的缓和。

^① 人民自由党对国家体制的提法前后经过了几次变化。1905年10月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国家体制由基本法确定”。1906年1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条进行了修改，认为“俄国应成为立宪的、议会制的君主制国家”。1917年3月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的第13条宣布：“俄国应当成为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在刚刚提到的方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则，将为党在未来的、以民主的原则复兴起来的俄罗斯进行政治活动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应当牢牢地记住，在俄国国内，在布尔什维克暴力的硬壳下正发生巨大的心理变化，在这三年内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新的阶层和情绪出现了，对此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复兴的保证就在于此。在我们眼前及全世界都发生了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土地关系方面，在劳资关系方面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它预示着在俄国我们只能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造纲领行事。这一政策的必要性现在就连右派人上也意识到了；但与他们的观点相反，这种政策应由“左手”来推行。而且俄国进行新工业化的必要性也呼唤走这条路，因为布尔什维克制度使俄国退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退回到了中世纪农耕式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深处。

为了使党能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形势下起它过去所起的作用，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它迫于俄国各地的地方斗争条件，不得不根据急速变化的形势行事。它认为必须暂时结盟，必须向一些与其精神不同的政治派别做出让步。必须补充一点，暂时的盟友利用这种联盟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的，让党为政策承担部分责任，而党对这些政策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随着斗争形势和条件的全面改变，也就没必要做出这些让步了。无论在国外的社会舆论界，还是在苏俄居民当中——在未来的任务呼唤党去的这两种舞台上——党不可能在那里出现和发挥作用，那种环境只能使它丧失实际作用，不会给俄国带来好处。

人民自由党巴黎小组根据自己的活动舞台不得不首先提出所有这些原则。它不得不首先从中做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推论，因为形势不容许等到全党的意见都弄清了的时刻再作结论。在巴黎现在正在制定一套新的策略方法，这一举措正为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们

接受。在这些代表中也不可能少了人民自由党一派，它的代表甚至比其他党派的代表更多。

11月21日的“声明书”是小组所采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声明书”号召建立具有相当权威的“民族委员会”，以便代表境外的俄国社会舆论。小组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权力机关，并与境外的俄国官方代表机关竞争。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也不想这一机关附属于那些与现已结束的斗争时期有传统联系的机关或人士，仅仅起咨询或辅助作用。小组认为，“民族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内应是独立的，这一活动本身就应决定了它的比重及其对旧政权机关的态度。

联合组成反布尔什维克战线的思想当然不仅仅出现在人民自由党的一个小组中。其他派别也为类似的目标作了一系列的尝试，小组也必须明确自己对它们的态度。

小组对那些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仅限于作一些事务性的、纯慈善性的工作的尝试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当然，“中立”这一概念在这里使用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就实质来说，小组当然不可能不承认这些工作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新的难民潮高涨之时。

境外俄国各机关的组织力量和资金都应当用于完成这一任务。

政治性的联合尝试——是另一回事。小组必须立即对它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

恢复在巴黎的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现有成员的活动的尝试是此种尝试中的第一个尝试。基辅和叶卡捷林娜达尔的这种尝试^①的悲惨结局在1918年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某种注意。从那时起，经验

^① 1918年10月在基辅成立了俄罗斯国家联合委员会，由9个党派的代表组成。彼得格勒省地方自治局主席、国务会议成员梅勒-扎科梅尔斯基任委员会主席。联合委员会没有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

就已表明，正是右翼组织成员的活动导致了那些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与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斗争的结局。小组认为，正是因为犯了这些错误，才要对策略进行重新修订，在修订策略时不可能与不为策略负实际责任的流派保持传统性的关系。今后共同活动的任何尝试只会把社会舆论界引入迷途，妨碍由于上述原因而出现的、并且比较符合党的真正精神的新团体的形成。

这就是为什么参加了两次原立法院成员会议的小组成员，坚决反对任何图谋以此种标志建立常设组织的原因。尽管小组收到了亚·伊·古契柯夫^①的请帖，邀请参加由立法院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但由于上述原因，它到底还是以书面的形式拒绝参加。

小组对社会革命党人小组的“宣言”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这一“宣言”其实就是由人民自由党的“宣言”引起的。社会革命党人小组决定在1月8日召开立宪会议成员代表大会，“制定一套活动的形式和方法”，这完全与我们的提议相类似。当然了，立宪会议过去是与极为痛苦的回忆联系在一起。1918年秋天恢复立宪会议的活动尝试^②，是引起俄国社会两个阵营间深深分裂的诸多主要原因之一。两个阵营的分裂从那时起就逐步加深，它是整个反布尔什维克斗争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过，会议的倡议者绝对没有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保留某种权力的机构，而仅仅是当作一种外部标记，在其周围可以把俄国社会各界、不分党派、真诚赞扬1917年二月革命及其逻辑后果的、有或多或少威信的代表，聚在

①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62—1936），十月党的领袖，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② 1918年9月8—23日在乌法召开了国务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立宪会议委员会的代表、一些“政府”、哥萨克、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等。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构成了国务会议的大多数。会议选出了最高权力机关——执政内阁。10月内阁迁到鄂木斯克。1919年11月18日，发生政变，内阁被推翻。

一起，形势也因此而获得缓和。

这样就清楚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提案是第一个和惟一符合巴黎小组计划的——在境外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俄国社会各界代表机构。只有在与出席立宪会议的各党派联合之时，巴黎小组现在所拟定的那种策略才能获得实现。当然了，上面所提到的新策略的特点并不是一定要达到与这些派别接近的目的。假如这种接近并没有实现，赞成新策略的论据也绝不会变得缺少说服力，巴黎小组的观点也绝无改变之理。但就小组所通过决议的实质来看，在联合俄国社会左翼的道路上还存在一系列的障碍——这些现在仍然还在阻碍建立共同战线的障碍，可能正在消失。代表大会的决议可能早就预先决定了。但现在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在对当前的策略问题看法一致的情况下，有可能建立一种具有某些职能，特别是能在与外国社会各界以及边境各民族的关系方面经常发挥作用的机构。

当然了，党员在出席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时，不能事先就被会议的决议束缚住。巴黎小组在12月14日颁布的声明^①中就明确地作了预先说明，指出党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提案是有先决条件的：1)不提恢复1917年的立宪会议的全权；2)决议将不是以偶然组成的成员表决的方式通过，而是以各党派协商的方式通过；3)同时，关于把与新的斗争策略在思想上有联系及在社会上有威望的其他党派纳入已设计好的常设机构的问题，不要事先消极地做出决定。

本报告的目的是促进巴黎小组和党的其他小组之间就所触及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正经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党处于转折关头，此时有通向各个方向的路。党内形形色色的思想进行协商的

^① 声明刊登在1920年12月14日第198期的《最新消息报》、1920年12月14日第152期的《共同事业报》上。

条件，在党的这一重要时刻远不如以前任何时候有利。但小组仍然相信，忠于党的理想和党的光荣传统的党员的政治信仰将会出色地经受住困难的考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作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从旧俄国转向新俄国，它有丰富的经验，没有丧失与居民的旧有联系并且能够获得新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能够适应新的机会和正在复兴的祖国的要求。

№07815

人民自由党柏林小组
对修改策略报告的意见

(不早于1921年1月9日)

在1921年1月1日和9日的两次会议上，柏林小组对巴黎委员会内容广泛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柏林小组在表述自己对这一报告的评论和反对意见时，由于巴黎报告中缺少任何条理清晰和明确的主题而陷入了某种困境。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突出基本思想，以便对这些基本思想进行讨论，而报告中无足轻重、意义不大的次要细节可以忽略。

柏林小组的代表们认为，必须联合俄国社会上的左翼以建立一条统一战线是报告的基本思想。导致做出这一基本结论的思路可以在下面的提纲中体现出来：

一、武装斗争的屡屡失败要求对策略必须进行根本的修订，以便在抛弃旧的斗争形式后寻找新的斗争形式。

二、新策略是掌握了斗争领导权并赋予斗争以明确的政治色彩的那个社会阶层失败的结果。旧统治阶级的习惯和方法现在应为新的民主的俄国的方法所取代。

三、一直受人民自由党支持的“前线”的武装斗争现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在今后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武装力量可能还需要。境外俄国各机构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护组成军队的战士的生存，一直到最美好的未来。

四、但在恢复武装斗争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的

分离以及前者转交给某个得到社会承认的非军事政权机关，军事方面应当与政治方面坚决分开。这是新策略计划的第一个特点。

五、策略计划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解决国内政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1) 土地问题；2) 民族问题；3) 国家体制的形式问题。正确地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可以为党在未来的俄国开展政治活动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党应当带着一个进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造的纲领走入未来的俄国。

六、党自身应当展示自己的本来面目。迄今为止的环境，使党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没有给俄国带来好处。

不接受原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成员参加常设机构，相反在一定条件下让他们参加临时召开的立宪会议，以便有可能“建立一种具有某些职能，特别是能在与外国社会各界以及边境各民族的关系方面经常发挥作用的机构”，这是以上诸条中最合乎实际的结论。

巴黎的报告认为，一旦组成军队的士兵为自己找到新的用武之地，“最美好的未来”是有可能到来的。报告仅仅认为，在这最美好的未来来临之时，军事力量及其指挥人员应与非军事的政权相分离。

柏林小组首先认为，在所说的一切中还不包含任何“策略计划”。的确，这里存在对旧计划的否定。但是既然在谈武装斗争的原则，那么这种否定也只是暂时的（不言而喻，因为现在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和有条件的。

但是，一旦斗争恢复，就未必能像现在这样来推测，新计划的这个“第一特点”是否能成为现实了。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相分离，理论上当然是可能的。但倘若军事斗争真的恢复了并将获得成功，那么，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不以政治派别和政党的愿望和要求为转移的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柏林小组认为，在这方面党的主要的传统的观点应归结为，尽全力支持意在

推翻布尔什维克和恢复秩序及国家体制的斗争，况且广泛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只有在军事斗争阶段过去之后才能成为可能。此外，不能不对下述军事斗争进程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这一进程中，因战场需要而授予一切全权的军事政权在发挥作用，而后方的非军事政权不会仅仅局限于简单地恢复和维持法律、安全及基本的公民制度，它还要在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性改革。

巴黎的报告并没有指出明确的斗争方式，但是规定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既涉及到了进行这一斗争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社会力量，也谈到了应作为这些社会力量政治世界观基础的那些纲领性条件。至于前者，显而易见，当然是要在“左翼旗帜”下与社会革命党联合。关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如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并没有提及，大概是因为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重要影响或确信它们不会参加这种联合。但是，首先不得不指出，社会革命党如果按其党刊上刊登的正式文件来判断，它现在正在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的态度脱离所有的非社会主义派别，拒绝与它们达成任何协议。这种立场对这一政党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看来，布拉格^①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要比我们的巴黎同志更清楚，知道在现有的条件下，这种联合是以内部的弄虚作假、意见不一致和未来不可避免的瓦解的萌芽为基础的。

当然，可以谈论适合于所提出的经常发挥作用的立宪会议机构，因为立宪会议机构将履行“某些”职能。但应当思考一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确定这些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可能立即引起误解，徒劳无益。因为从党的报刊上可以断定，组织农民运动（起义、审判运动、合法暴动等）是社会革命党的现今策略任务。我们的党组织处于境外，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这一工作的任何机会。纵使这一工

^① 布拉格是社会革命党的最重要据点。

作有现实性，也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进行着。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考虑到今天的实际条件，那么柏林小组认为向左转的新方针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实现正好违背前面第6点（显示自己的本来面目）中所指出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需的和适时的原则。党不仅没有展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不得不戴上绝非它所固有的假面具。这在最近的一些具体的实例中可以表现出来：尽管那暂时是新方针的惟一实际结果。柏林小组对与克伦斯基接近的决定，它使已忘却的有关1918年立宪会议的痛苦记忆重新复苏，对把挽救俄国的事业置于维克多·切尔诺夫^①的实际或精神领导下的决定，持否定的态度。毫无疑问，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的眼里，这种转变不能做其他理解，从一方面讲只能是对过去几年内党坚定不移奉行的一切行动路线的坚决谴责，同时也是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成果的投降，是向当时（1917年）在俄国具有巨大和优势影响并以自己的活动为布尔什维主义猖獗奠定基础的势力投降。

巴黎的报告认为，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将为党在未来的俄国开展政治活动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报告说，这些问题不能仍悬而不决。他们的这项或那项决定就构成了一条政治界标。但同时，如果不算土地问题上的一些不明确的说法和纲领中已经做出的一些完全明确的答复，关于统治形式的问题，报告没有包含任何能够明显又现实前进一步的规定。在现时，当党的大多数精英力量处于境外，当最后一次讨论党纲后已过了一段时间，详细研究并弄清楚报告中指出的内政上的那些基本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一观点柏林小组无疑是同意的。彻底弄清楚在土地问题上现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纲领性立场，是真正极为必

^①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需的，也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民族问题，自己弄清党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原来的观点，并在这里通过能适合俄国现时需要和实际需要的新决议。我们认为这一任务，这一任务的执行真正应当反映党的世界观，并为党在未来开展工作做准备，但它是一个纲领性的任务，而不是策略性的任务。如果打算完全从如今党在政治上成败的策略考虑来制定纲领性决议，那是绝对不正确的。

进行深刻经济和社会改造的原则不属于策略问题而是纲领性的问题，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党只能带着它回俄国去。

报告认为，迄今为止党由于自己处在右的包围中而丧失了实际的作用，如果党出现在左的包围中，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柏林小组认为，党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绝不在于是处在左还是右的包围中，而在于那种现实的条件，在那种条件下，党在境外落到自己大多数领导人手里，而在俄国境内，在不受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方（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控制的地方），党为武力所左右，谈不上党的实际工作，谈不上拟定党的纲领意见以及实现党的任何口号。同时柏林小组也不否认，不好的国内政策在我们国民军的失败中起了作用。但从指出过去的这些错误转而面向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切与新方针有关的人，理由是不充分的。面向社会革命党人，过去已经尝试过了，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第一，社会革命党人无力摒弃党的观点，并无法提高到理解俄国民族国家任务的高度；第二，他们表现出了对管理任务和政权本质的完全不理解，将统治归结为说服，要以大张旗鼓的意识形态性的声明来取代有组织的统治工作。巴黎报告所谈的新民主俄国的其他方法，我们还不知道。如果在革命的初期，在旧事物受到破坏之时，可以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掌权最合适。现在，当俄国面临的完全是其他任务时，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行事，扮演什么角色才更适合国家的活动。

由于革命的进展，由于某些政党、团体和民族对国家和政权所

提出的无休止的要求，俄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遭到了破坏。旧有的实物无可挽回地受到了破坏。现在面临的完全是另一项任务——重建作为统一整体、作为国家有机体的新俄国。为此，在国内应首先恢复政权和秩序。这一任务不是党的任务，而是民族的任务，它不是通过政党的联合，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民族创造力的激情和热情来实现的，这种激情和热情是以人民群众、以他们对秩序和合理政权的渴望、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托的——要以正在进行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精神来实现这一统治。若没有这种激情，俄国就不会摆脱目前的颓废状态，但可以确信，这种激情不会产生于各个政党谈判、交易和妥协的气氛中，它将产生于其外。

也产生了一些比较合乎实际的争论，那就是由谁来实现这一民族任务——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些能够享有政权并有效地将其表现出来的人将实施它，吸取了革命教训的人将实施它。如果说以前的任务是要把俄国从奴隶国家变成自由国家，那么，现在就要使俄国从一个濒临死亡的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为此，首先需要恢复物质生活的最基本的条件。应当让俄国有饭吃，有柴烧，有衣和鞋穿。这一任务——不是党的活动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得法的、有经验的技术管理。

要想战胜布尔什维克也需要武力和政权，组织和管理。如果这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里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也不见得会在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那里出现。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恢复破坏了的俄国，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需要所有的有文化的人参加。同时，还有一个十分清楚的征兆，那就是“左翼民主派”不会脱离自己的具有偏执特点的传统立场，假若它注定要重新处于首位的话，第一届杜马和临时政府的历史就要重演，那么俄国就不会摆脱从克伦斯基到列宁的怪圈。尤怪乎最近正从左翼民主派的队伍里传来了呼吁——要正式弥合这一圆圈，使克伦斯基与列宁协调起来，使左翼民

主派和苏维埃政权相一致。这条道路将导致俄国的彻底崩溃。

柏林小组在总结时认为，新策略的实际原则只有在各独立小组内进行精心讨论之后才能确立。此后应当试图召开代表大会，即使被各独立小组赋予相应全权的代表的人数不多，也应如此。

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归纳成几个简短的共同原则。柏林小组认为：

1) 在恢复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之间的关系将是现实社会力量间的对比关系，它不以某个政治派别和政党的要求和愿望为转移。

2) 现在所提出的左转方针并不会给党提供新的斗争方法，它只是想让党重新以它所格格不入的形式起一种它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3) 重建俄国不是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它应受到联合在一起的人民激情的鼓舞，应由一些有头脑、有技术经验的代理人来完成。其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恢复政权和恢复服从它的心理。由此应当指出，重建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由“左翼民主派”的一些势力来完成。

4) 为了适应这一任务，人民自由党现在就应对一些基本的纲领性问题进行修改，弄清楚在俄国所面临的国家生存的新条件下，现有的决议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修改、发展、补充、删节或保留。

No07816

克柳奇尼科夫^① 关于立宪民主主义的 新任务的报告及讨论记录

(1921年2月17日)

报告人^②一开始就声明，他是在小组中作报告，因此，现在仅局限于阐述自己的一些基本论点。他说，革命经验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最后一段时间走错了路，如果它还按那条路往下走，今后还会重犯以前所犯的 error 和经受以前所遭受的失败；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必须使党恢复最初的心态。下面就是党所犯的 error：在革命的初期，我们没能认清俄国不能再继续作战的形势，没有由此做出一个适时的结论，而把这一王牌塞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继而我们又支持无法实现的外国武装干涉，拥护军事专政，但它却辜负了寄予其的希望；现在我们终于开始与社会主义者联合了，但是，这种联合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任何积极的结果。

因为我们往往认为，有了新的经验，往后我们就不会犯 error 了，但每一次总是失利。失利的原因过去隐藏于下列因素中：首先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策略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出发，即从与世界性事件相比是很小的一些前提条件出发；其次，以前我们通常避难就易、避开大的行动，时时表现出对当时形势的高度警惕，结果却成了最不谨慎的党。布尔什维克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他们一直

^① 克柳奇尼科夫 (1886--1938)，是人民自由党巴黎委员会的成员。他的报告是在巴黎委员会会议上做的。

^② 指米留可夫。

立足于新的国际条件——立足于新的世界局势——也注意一瞬即逝的每一个细节，当天的所有事件，因此成了斗争的胜利者。

由于我们采取了不正确的策略，今后还会有新的失败等着我们：党正在分裂，其两翼向左和向右转，中派与它们志趣不合，这将导致知识分子力量的分散。同时世界上现在一切都纠缠在一起，在重新配置，这使比较小的、但有组织的势力获胜。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和立宪派力量为例，如果立宪派走的路正确，那么是会发挥相当大的历史作用的。我们现在将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一瞬即逝的事件上，我们正在过早地丧失精力，正在丧失未来进行创造所必须的社会力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精力，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上，以某种简单化的形式抨击布尔什维克，说这是一伙强盗、土匪、恶棍，就再也没什么了。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无论就实质还是就形式讲，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强大，它已经生存三年了。以后，我们在自己的策略中逐步吸收了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否定方面。布尔什维克最初的确像一伙强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获胜，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在开始时，眼界宽广，接着逐渐走向狭窄圈子——宣告暴力无罪，向不公正妥协等。起初，我们轻率地认为，布尔什维克最多能存在两个星期，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在不具备胜利条件的情况下开始同他们作战，继续进行当时我们自己也不相信会取胜的战争，这只能加速俄国的崩溃。布尔什维克毁灭了俄国，但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准备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他们取得了成功，世界革命只有在世界向他们让步的情况下才不会发生。布尔什维克开始了自己的可怕的社会实验。因为当时均势被战争破坏了，出现了进行这种实验的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的纲领就有了历史的现实性。

在当时我们没有认清全世界的生存条件，而布尔什维克却正确地窥视到了世界局势的特殊意义。他们的纲领是三个主要的世界性

纲领：保守的、自由民主的和革命的纲领之一。其中，第一个纲领，战前十分强大的、希望所有其他国家服从自己的德国，是其最突出的体现者。这一纲领竭力要求以统治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矛盾，整顿世界。这一纲领在其他力量打赢了的战争中遭到了失败；第二个主要纲领——自由民主纲领，威尔逊是其代表人物，这一纲领否定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竭力要以自由协商的途径来调解国际关系，但它也没能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问题。当时，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第三个纲领——革命的共产主义纲领，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继承者——布尔什维主义是其代表。它所提出的一致性原则是建立在国际力量——全世界的社会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基础之上的。这股联合起来的、甚至不是很大的势力是能够控制局势的，因为上面所列举的三个纲领中的任何一个纲领的出现和获胜的条件都是由一定的形势决定的。而每一个纲领所需要的形势都是很独特的。保守的纲领要获胜，就要求一切顺利，但是战争却没有使其顺心遂意。第二个纲领——自由主义的纲领要成功，必须有像美国那样的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才能提供赶时尚的可能，但战争在这一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卷入了战争，处于崩溃的边缘，结果这一纲领也没有成功。第三个纲领——革命的纲领要成功，就要求有引起全国骚动和不满的情绪，这正好因战争而发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是一种最现实的理论的原因。破坏及与它的斗争越厉害，对它就越有好处，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只会巩固其地位：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存在初期，十分弱小、行将垮台，就是在受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①的武装力量从四面八方围攻、许

^① 尤登尼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62～1933），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任白军的西北军总司令。

多人认为它将彻底垮台之时获得巩固的。在其生存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现了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这为它提供了进行反抗和获得胜利的力量，因为人民的心理是宁愿拥护布尔什维克也不支持白卫军。

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原因，我们不应当再以最小的前提为出发点，即不要把赌注下在正在垮台的弗兰格尔身上，也不应下在明天就会破裂的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上，因为在世界局势中不存在有利于两个流派联合成功的条件。布尔什维克一旦被推翻后，这种联合就会荡然无存了，第二天就会在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更右的派别间开始新的更为可怕的斗争，这种斗争比布尔什维克本身更可恶，在这种条件下就无法重建和挽救俄国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体制正在衰落，由于这种混乱和斗争，它将在心理上和原则上得到巩固，可能在俄国及其他国家首次真正在思想上占上风。我们必须尽早地注意到这种危险并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尽力找到自己的明确的位置。

为此，我们应当以立宪民主派的精神作为自己策略的出发点，而不应以自己以前的一些教条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有的旧纲领（政治和社会的纲领），如果从字面上看的话，不难发现它们都已经过时了。比如，沙皇时代我们宣布建立共和国是一种进步的追求，而现在则是一种倒退。所以我们现在应当以意识到自己是一股进步力量为出发点，而不应以坚持旧的字面意思为依据，因为立宪派的实质就是在现时条件下献身于进步事业。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以立宪派的精神为依据的，而不是以字面意思为依据。我清楚地看到了，最现实的未来正好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尽管它在俄国可能正在瓦解，但它将以精神在世界上获胜。所以必须争取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像历史上那样合法地和平共处，不再与其进行只会巩固其地位的斗争，从它那里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以用于渐进性

的创造。

米留可夫个人提出的放弃与布尔什维克斗争对俄国来说要比立宪会议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更为重要和有益。我们应当在精神上更新，布尔什维主义有时既不令人厌恶也不可憎，——应当回俄国去，去面对瘟疫和霍乱，而不应避开它。反正都要如此，即返回俄国，以政治形式与它进行斗争，取代武装斗争及炸毁它的企图，我们迟早要回去。最好早点儿这么做——比如，现在就支持克拉辛^①，而不是去阻止他，因为我们现在将取得毫无疑义的成绩。俄国不会灭亡，即使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也得去那里。报告人随后援引了他在不同时间所收到的一些年轻的立宪民主党人（年龄在30—35岁之间）——乌斯特里雅洛夫^②、波捷欣^③和他弟弟的来信以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也援引了科罗温^④和卢基扬诺夫^⑤的公开发言。他说，所有这些人，分布在各地，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见解；不要再进行像立宪会议委员会那样的新的基本毫无结果的工作尝试了。我们必须走近他们^⑥，走近这些谩骂布尔什维克，但又希望在俄国进行政治工作的人。应当以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事实——以承认它作为自己策略的出发点。

①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1870—1926），历任外贸人民委员、驻英大使等职。

② 乌斯特里雅洛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90—1938），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政论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失败后，他对白卫运动、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0年代成为路标转换派的主要思想家。1935年回到苏联，任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1937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判刑，1938年去世。

③ 波捷欣，从1917年起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成员，第一期《路标转换文集》（布拉格，1921年）的参与者。

④ 此人身份不详。

⑤ 卢基扬诺夫，参加过“高尔察克政府”，《路标转换文集》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⑥ 指乌斯特里雅洛夫等人。

Л.Е. 埃利雅塞夫认为报告人所援引的波捷欣的话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原是莫斯科总督所特派的官员——只是在1917年才入党，几乎就没被看成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他本人后来在基辅退出了立宪派，自认为与克里沃舍因同道。

主席建议开始讨论报告的实质，П.Я. 雷斯发言。

П.Я. 雷斯也认为对那些作者的信件的引用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以那些信件的内容为依据，从报告本身来看，报告人在报告中脱离了党在此时的立场，不是向左而是向右转了。这种右倾是他对社会学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的结果。报告人要求党走上一条新路，与所有的旧路中断联系，无缘无故地谈其道德创造的磨损度，而没有注意到立宪民主党人从来就没有社会基础，因为这个党是超阶级的，而作为社会基础只能是阶级的——左的或右的。从阶级的观点看，党一直在斗争，因为它是以阶级利益的调和为依据的。在沙皇时代，我们进行斗争，反对右派的基础，现在当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另一个社会基础时，我们不能不与之斗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实质上是以发端于犹太教的优秀人种理论为基础的，后来通过基督教变成了一种优秀阶级的理论。这是纯宗教理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是一位宗教狂热者，他深信自己的思想。自由主义却否定这种宗教原则，拥护建立在广泛社会基础上的社会自由。显而易见，报告人没有对此进行过深思，就提出了要与布尔什维主义和解。

巴·尼·米留可夫指出，Ю.В. 克留奇尼科夫的报告很难理解，也很难对它提出异议，因为在报告中有部分观点是正确的，部分不正确，报告完全只是一个总纲，并且是相当一般化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回俄国去的主题是相当清楚的，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因为这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形势下的部分生活。在信中作者们谈了自己的经历。我们的新策略要以这些经历，以我们要从中学习的

我们以前的错误为基础。在报告中没有什么创新。比如，报告人建议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从激进派别中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他没说在它们那里有什么好东西，因为他本人大概也不会认为这些流派的危险性及其取得成绩所依据的那些纷争和破坏是好东西。继而，他号召我们要以立宪派的精神作为自己策略的出发点，而不要以它的字面意思为出发点，报告人没有更明确地指明，他这是指什么而言？因为，我们提出自己的新策略是有根据的，我们考虑的就不是字面意思，而首先考虑的是党的思想体系。报告人随后断言，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性危险大概只有以向它做出让步才能消除，他完全没有谈，应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比如在英国，现在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报告人是如何看待它的？在克留奇尼科夫还没有更充分、更明确地展开自己的原则时，批评是很困难的。

B. A. 奥博连斯基也对报告表示不理解，认为它只是反映了一种情绪，感觉到了处于侨居状态——处在大俄罗斯之外的不满情绪。无疑我们大家也感到了那里正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不能很清楚地想象这种变化。报告人试图要弄清楚这一变化过程，但却采用了一些不合适的方法，他只提议适应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但与俄国的情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心理。报告的有益之处就在于，它毕竟唤起了我们向这方面思考。

Ю. В. 克留奇尼科夫认为对其报告不理解的原因在于缺少共同的相互理解，据他认为，惟有生活本身使我们走到了这一步，随后，他反驳了雷斯，指出他在自己的报告中以及在自己的、以政治生活为内容的社会学的学术著作中，谈的不是社会的即经济的基础，而是社会学的基础，后者是人在社会中生活的结果。这样的基础有三个：1) 上帝选择的个人权力的强制原则（即保守主义体制）；2) 平等协商原则，即民主主义体制；3) 一致原则，对这一原则来说需要破坏以前的一切——这是革命的共产主义体制。这

样，从它这方面来说就不存在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背叛，它也不要求其他人成为布尔什维克或保守主义者，而恰恰是要他们始终作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只与布尔什维克保持协议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向他们证实，必须将他们的一致性要求归结为平等和协商，并将列宁的运动从共产主义的变成立宪主义的。奥博连斯基的反对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报告正好是以俄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建议与布尔什维克和解，不是赞同其纲领，而只是与现实力量和解，因为党必须进入俄国国内。与列宁在一起要比与阿夫克森齐耶夫^①和米诺尔在一起更有好处，因为前者接近于左派社会学基础，而后者是与反动堡垒和反革命结盟的，其本身就处于最右派政党的位置上。报告人和信件的各位作者心有灵犀互相理解，一直向前走。探索最符合这一历史时刻的真正的道路，而不是踏步不前。

巴·尼·米留可夫说，他现在弄清楚了他为什么不理解报告的意思，因为报告只是报告人关于社会学理论著作的一个序言。必须详细地了解这一理论，那时才能断定那里是否有新东西，是否是一些老生常谈。

Ю.В. 克留奇尼科夫在总结自己的谈话时指出，他并没有坚持要大家现在就必须理解它，但生活本身将会导致这一结果的。遗憾的是，这大概只有在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不利条件下才会发生。

^① 阿夫克森齐耶夫（1878-1943），社会革命党领袖。二月革命后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内务部长、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主席。1918年任反布尔什维克的乌法督政府主席，后流亡国外。